

目 录

第一章 战争进入第二年时的形势与战略方针	(1)
第一节 战争形势的变化	(1)
一、人民解放军力量增长	(1)
二、解放区日趋巩固，军工生产迅速发展	(4)
三、解放军面临的暂时困难	(6)
四、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8)
五、国民党的军事、经济、政治危机	(10)
第二节 国民党实行“戡乱总动员”，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	(17)
一、实行“戡乱总动员”	(17)
二、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	(23)
三、撤换高层指挥官，制定对付解放军的战法	(25)
四、乞求美援与魏德迈来华“考察”	(28)
第三节 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与战略方针	(32)
一、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32)
二、以一部分主力继续在内线作战，收复失地，巩固解放区	(45)
三、全力准备战略进攻	(47)
第二章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转入战略进攻	(52)
第一节 刘邓大军举行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进攻序幕	(52)
一、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与鲁西南地区的兵力部署	(52)
二、刘邓大军外线作战的准备	(53)

三、突破“黄河防线”，夺取郟城、定陶·····	(57)
四、激战六营集、羊山集·····	(63)
第二节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70)
一、跃进大别山的决策和部署·····	(70)
二、千里跃进大别山·····	(77)
三、关于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方针·····	(84)
四、迅速实施战略展开·····	(90)
第三节 陈谢集团挺进豫陕鄂边区·····	(99)
一、陈谢集团的编成与出征前的准备·····	(99)
二、强渡黄河，转战陇海路潼洛段·····	(100)
三、向伏牛山东麓展开·····	(108)
第四节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	(112)
一、华东野战军分兵与西兵团的任务·····	(112)
二、沙土集战役，歼灭整编第57师·····	(119)
三、挺进豫皖苏边区·····	(122)
四、陇海路破击战·····	(127)
第五节 中原三军粉碎国民党军 对大别山区的“围攻”·····	(128)
一、国民党军“围攻”大别山的计划和部署·····	(128)
二、中共中央军委反“围攻”的方针·····	(132)
三、刘邓大军主力转战大别山·····	(134)
四、刘邓大军一部向桐柏、江汉、淮西展开·····	(138)
五、陈粟、陈谢两军举行平汉、陇海路破击战·····	(141)
第三章 内线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反攻和进攻·····	(148)
第一节 西北野战军成立与举行战略反攻·····	(148)
一、西北野战军成立·····	(148)
二、一打榆林，诱调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	(149)
三、沙家店战役，扭转西北战局·····	(155)
四、关庄、岔口追击战·····	(161)

五、出击黄龙，攻克清涧·····	(163)
六、二打榆林，激战元大滩·····	(170)
第二节 华东人民解放军保卫胶东与坚持华中·····	(176)
一、国民党陆、海、空三军进攻胶东解放区的 “九月攻势”·····	(176)
二、华东野战军东兵团作战方针的确立·····	(178)
三、胶东阻击战·····	(182)
四、胶河战役·····	(184)
五、胶（县）高（密）追击战·····	(187)
六、解放莱阳·····	(190)
七、坚持华中解放区的斗争·····	(192)
第三节 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清风店战役与 解放石家庄·····	(194)
一、晋察冀地区军事情况与晋察冀野战军的 任务·····	(194)
二、围攻涞水，出击大清河北·····	(196)
三、攻击保北徐水，调动国民党军增援·····	(198)
四、当机立断，清风店地区歼灭第 3 军主力·····	(200)
五、攻克石门，开创华北解放军夺取重要城市之 先例·····	(205)
六、平汉铁路北段破击战，重创傅作义主力 第 35 军·····	(211)
第四节 东北民主联军举行秋季攻势·····	(218)
一、东北夏季作战后的战场情况·····	(218)
二、蒋介石、陈诚扭转东北战局的措施·····	(219)
三、东北民主联军秋季作战任务与扩编野战军·····	(223)
四、秋季攻势第一阶段，辽西三战·····	(228)
五、秋季攻势第二阶段，出击中长路·····	(231)
六、秋季攻势第三阶段，北围吉林，南击华北出援	

的国民党军·····	(233)
第四章 国民党实行“总体战”，共产党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 行动纲领 ·····	(239)
第一节 转入战略进攻后的全国形势 ·····	(239)
一、军事形势根本转变·····	(239)
二、人民解放军继续壮大，国民党军进一步削弱·····	(240)
三、解放区土地制度彻底改革，国民党区经济危机加重·····	(245)
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蒋介石集团完全孤立·····	(247)
第二节 国民党实行“总体战” ·····	(253)
一、“总体战”的提出·····	(253)
二、“总体战”的内容·····	(255)
三、实行分区防御，调整指挥机构·····	(257)
第三节 中共中央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	(259)
一、打倒蒋介石口号的提出·····	(259)
二、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262)
三、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	(265)
四、十大军事原则·····	(265)
第五章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	(271)
第一节 人民解放军需要整军 ·····	(271)
一、整军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271)
二、新式整军运动是解决军队内部不良现象的有效方式·····	(277)
第二节 新式整军运动的内容与做法 ·····	(280)
一、土改教育·····	(280)
二、普遍开展诉苦·····	(285)
三、进行三查三整·····	(292)

第三节	新式整军运动的作用与经验·····	(308)
一、	新式整军运动的作用·····	(308)
二、	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	(318)
第四节	发扬三大民主，加强军队党的建设·····	(323)
一、	广泛深入开展民主运动·····	(323)
二、	连队士兵委员会的成立·····	(328)
三、	健全党委制，加强党支部建设·····	(332)
第五节	加强纪律性，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	(336)
一、	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337)
二、	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加强集中统一指挥·····	(340)
第六章	南线战局重大发展，中原军区暨野战军的	
	成立·····	(344)
第一节	“中原三军”联合作战计划与主力一部跃进	
	江南的方案·····	(344)
一、	国民党军加强“清剿”，妄图彻底摧毁大别山	
	解放区·····	(344)
二、	“中原三军”联合作战计划·····	(347)
三、	以一部分主力跃进江南的方案·····	(353)
第二节	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粟裕兵团转至黄河以	
	北，洛阳战役·····	(357)
一、	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	(357)
二、	粟裕兵团转至黄河以北·····	(365)
三、	洛阳战役·····	(366)
第三节	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的成立，粟裕兵团加	
	入中原作战，宛西、宛东战役·····	(374)
一、	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的成立·····	(374)
二、	宛西战役·····	(377)
三、	粟裕兵团加入中原作战·····	(382)
四、	宛东战役·····	(387)

五、中原军区部队开展反“清剿”、反“扫荡”斗争 …	(390)
第四节 华东野战军举行豫东战役 ……………	(393)
一、在鲁西南地区歼灭整编第 5 军的构想与豫东战役决心的形成……………	(393)
二、攻克中原重镇开封……………	(398)
三、放弃开封，歼灭区寿年兵团……………	(403)
四、围歼黄百韬兵团与主动撤出战斗……………	(406)
五、豫东战役的伟大胜利……………	(409)
第五节 中原野战军阻击胡琏、吴绍周等兵团和攻克襄樊 ……………	(412)
一、襄樊的战略地位与夺取襄樊的作战方案……………	(412)
二、缓攻襄樊，集中兵力阻击胡琏等兵团，直接配合豫东战役……………	(414)
三、袭占老河口、谷城与强攻襄阳……………	(420)
第六节 山东、苏北解放军发动攻势，恢复与扩大解放区 ……………	(426)
一、山东、苏北兵团的成立……………	(426)
二、山东兵团转战胶济路和津浦路……………	(429)
三、苏北兵团进行益林、涟水诸战役……………	(440)
第七节 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进攻 ……………	(445)
一、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与作战计划……………	(445)
二、围攻宜川，诱歼胡宗南援军……………	(449)
三、围困洛川，解放黄龙山区诸城……………	(454)
四、进军西府，收复延安，转战陇东……………	(457)
第七章 北线解放军发起强大攻势 ……………	(466)
第一节 东北人民解放军举行冬季攻势及其发展壮大 ……………	(466)
一、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问题及措施……………	(466)
二、东北民主联军冬季作战方针及部署……………	(468)

三、战役第一阶段，北宁路和沈阳以西、以北地区的作战·····	(471)
四、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	(477)
五、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479)
六、战役第二阶段，转兵辽南与夺取四平·····	(480)
七、冬季攻势胜利的意义与经验·····	(486)
八、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	(489)
第二节 晋察冀野战军实行宽大机动作战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克运城、临汾·····	(492)
一、晋察冀野战军实行宽大机动作战方针的确立·····	(492)
二、出击察南、绥东·····	(495)
三、围攻应县和粉碎阎锡山部偷袭石家庄的图谋·····	(499)
四、解放运城·····	(501)
五、攻克临汾·····	(505)
第三节 华北军区成立和华北人民解放军加强进攻作战·····	(515)
一、华北统一领导机构的成立·····	(515)
二、华北野战兵团的编成与军区建制的调整·····	(518)
三、转战热西、冀东·····	(520)
四、再战保北·····	(525)
五、横扫晋中，威逼太原·····	(527)
第八章 南方游击战争的发展·····	(537)
第一节 闽粤赣边、粤赣湘边和粤中游击战争的开展·····	(537)
一、游击战争的展开·····	(538)
二、粉碎国民党军“清剿”，游击队发展壮大·····	(545)
第二节 粤桂湘边、粤桂边和桂滇黔边游击战争的	

发展·····	(561)
一、游击战争的展开·····	(561)
二、游击队在反“清剿”斗争中壮大·····	(569)
第三节 海南岛游击战争的发展·····	(578)
一、琼崖独立纵队坚持海南岛游击战争·····	(578)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成立，五指山解放区 的扩大与巩固·····	(580)
三、琼崖纵队发动秋季攻势·····	(582)
第四节 闽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584)
一、闽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展开·····	(584)
二、闽浙赣边区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和游击 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586)
第五节 苏南和皖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592)
一、苏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592)
二、皖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596)
本卷结语 ·····	(601)
后 记 ·····	(617)
附图 (1—5)	

第一章 战争进入第二年时的形势与战略方针

第一节 战争形势的变化

全国解放战争从 1946 年 7 月全面爆发，至 1947 年 6 月，进行了一年。战争双方经过激烈、残酷的较量，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基本的变化，中国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人民解放军力量增长

(一) 总兵力上升，装备改善

战争进行一年之后，据中共中央军委一局 1948 年 1 月统计，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 195.4 万余人，其中正规军（野战军与军区正规军）103.5 万余人，各军区非正规军 90.3 万余人，华南游击队 1.5 万余人。同国民党军同期相比，总兵力为 1：1.91，正规军为 1：1.5。双方兵力对比，同战争开始时的 1：3.4，1：3.5，已发生了明显变化。

由于不需要派正规部队去守卫地方与城镇（那种任务是由地方部队和民兵去担任），因此，人民解放军尽管总兵力、正规军兵力都还少于国民党军，但其机动作战的兵力却超过了国民党军。

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陕甘宁晋绥和华东 5 个大战场，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二年开始时的兵力是：东北总兵力达 51.8 万余人，其中野战军约 24.6 万人。晋察冀总兵力约 19.4 万人，其中野战军 8.5 万余人。晋冀鲁豫总兵力 42 万人，其中野战军 28 万人。陕甘宁晋绥总兵力 11 万余人，其中野战军 4.5 万人。华东总兵力 63 万余人，其中野战军 27 万人。

在第一年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及其他军用物资等，改善了自己的武器装备。蒋介石从美国政府要来的枪炮子弹，又通过他的军队“转给”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真正成了名符其实的“运输大队长”，这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之一。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结束时的武器装备与战争开始时的武器装备情况比较如下表^①：

火炮类

	五〇炮	六〇炮	轻迫炮	重迫炮	机关炮	战防炮	高射炮	九兵炮步	山炮	野炮	榴弹炮	其他炮	合计
1946.6		476	1083		6			124	58			361	2108
1947.6	204	1918	1446	24	89	97	6	86	369	136	69	98	4542

筒类

	火箭筒	掷弹筒	枪榴筒
1946.6	30	5050	1428
1947.6	223	9370	763

枪类

	长短枪（枝）			机 枪（挺）				
	步马枪	短枪	合计	冲锋枪	轻机枪	重机枪	高射机枪	合计
1946.6	447697	44683	492380	2678	16295	1699	5	20677
1947.6	520781	28188	548969	7946	25078	4439	28	37491

（二）士气旺盛，军事素养提高

当蒋介石凭藉其强大军事优势，向解放区发起猖狂进攻的时

^① 中央军委一局：《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末我军兵力武器统计》，1949年7月20日。

候，能不能打败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军的部分指战员中存有疑虑或悲观思想。但是，经过反复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特别是解放军在战争中取得一个个胜利，使全体指战员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们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而且是能够打败的。指战员们从战争实践中体会到，他们之所以屡战屡胜，最重要原因是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对毛泽东怀有无比深厚的阶级情感和坚定的信赖。这同国民党军官兵对蒋介石的信念日益动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蒋介石调集重兵进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时候，“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是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英勇作战，消灭大批国民党军，成为解放军指战员的自觉行动。全军士气高昂，决心用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对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共产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降低。毋宁说正相反，他们似乎获得了较好的武器供给，自信有继续战斗两三年的能力，估计到时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战斗，抛弃一切自私的野心和个人享受。”^① 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坚定相信，解放战争虽然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最后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经一年的实战锻炼和利用战斗间隙的军事训练，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军事素养普遍提高，尤其是纵队以上高级指挥员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和战斗作风等方面均大大提高。他们能够从战争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分散与集中，保守地方与歼敌有生力量之间的矛盾。在坚决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的时候，结合本战区实际，创造了许多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例如：华东解放军针对国民党集结重兵，

^① [美] K·W·瑞阿、G·C·布留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3—134 页。

分进合击的情况，采取打一仗，歼灭其一部，后退一步的“边打边走”的战法；晋冀鲁豫解放军抓住敌人比较分散、后方空虚的弱点，采取在大踏步进退中调动敌人，创造和捕捉战机，各个歼灭的战法；西北解放军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条件下，利用有利的群众条件与地形条件，采取“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的战法；东北民主联军针对敌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企图，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密切协同配合的战法，迫使国民党军陷于南北两战场作战的不利态势；晋察冀解放军及时总结作战的经验，采取“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法，使自己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

二、解放区日趋巩固，军工生产迅速发展

解放战争开始时，人民解放军拥有面积为 239.1 万平方公里、人口 1.49 亿的解放区作为自己的战略后方，这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然而，正像毛泽东指出的，“中国解放区还只有一万万多一点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反动封建势力还没有被肃清，土地改革还不普遍和不彻底，就是说，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还不是巩固的。”^① 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又先后侵占了解放区的所有中心城市及部分乡村，侵占面积达 24.7 万平方公里，控制的人口达 3040 万。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遭受很大破坏。

为着动员解放区人民支援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于 1946 年 5 月 4 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并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领导农民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到 1947 年 6 月，解放区大部分地区的土改已基本完成。例如：晋察冀解放区有近 1000 万亩土地重新回到了劳动农民手里，晋冀鲁豫解放区约 2000 万人口的地区，土地平分，农民获得土地总数的 90—97.3%。据太行区 40 个县、市统计，从土改中得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246 页。

到利益的人口达 330 万（全区人口为 500 万），农民获得土地 376.2636 万亩。晋西北解放区有 20—60% 无地缺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每人平均得到土地 2.57 亩。据 1947 年 7 月统计，全东北有 503.1908 万垧（东北多数地区一垧合 15 市亩）土地分配给 629.0824 万个无地少地的农民，最多的有一人分得 10.3 亩，最少的也分到 3 亩，平均每人分得 8 亩左右^①。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获得了巩固。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年战争中，自愿参加解放军的农民共达 60 万人，支援前线的民工达 6000 万人以上。

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工业，由于解放区经济不发达（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缺乏重要的原料和机器，生产能力很薄弱。据 1946 年 7 月的统计，解放区军工生产的月产量是：迫击炮 2 门，步枪 1030 枝，机关枪 15 挺，手榴弹 28 万余枚，迫击炮弹 4710 发，步机枪子弹 29 万余发。这当然不能满足前线的需求。为解决军工生产落后的状况，人民解放军集中了很大一部分力量来加强军事工业的建设，生产水平迅速提高。

晋察冀军区从 1947 年起，月生产水平为：82 迫击炮弹 1 万发，炸药 2 万—2.57 万公斤，手榴弹 7 万—10 万枚。

晋冀鲁豫军区 1947 年 6 月的军工生产较之以前提高了 4—7 倍，其中炮弹月生产量达 4.6 万余发，步枪子弹 10 万余发。

山东的胶东区，到 1947 年 8 月，兵工厂由原来的 5 个扩展为 8 个，职工人数达 3700 余人；鲁中区也由 5 个兵工厂发展到 8 个，职工人数达 1400 余人。将胶东区 1946 年下半年与 1947 年上半年械弹产量作一对比，很能反映解放区军工生产的发展情况。

^① 转引自《中国农民负担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18—619 页，第 657、764 页。

1946年下半年与1947年上半年胶东区械弹产量比较表^①

项 目 厂 别	品 名	单 位	械弹生产量		1947年上半年 是1946年下半 年的倍数
			1946年下半年	1947年上半年	
一厂	掷弹筒	具	95	2215	23.3
	掷弹筒弹	发	50429	161509	3.2
	四一式钢炮弹	发	1067	1226	1.149
二厂	一〇〇迫炮弹	发	3828	40004	10.5
三厂	七九子弹	发	444194	1560275	3.5
	六五子弹	发	488425	31646	0.064
四厂	八二迫炮弹	发	19682	71660	3.6
五厂	迫弹无烟药	斤	2099	22942	10.9
	子弹无烟药	斤	4710	11051	2.3
	军用炸药	斤	22793	117244	5.1
	甘油炸药	斤	17130	871	0.05
	信号弹	发	336	13377	39.8
六厂	四五式步枪	枝		1467	
七厂	八二迫击炮	门		160	
	一〇〇迫击炮	门	19	80	4.2
八厂	七九机枪	挺		12	
	掷弹筒	具			

东北的军事工业，从1945年9月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到1947年秋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成立，经历了一个“工厂搬家，机器打游击”的艰苦阶段^②，奠定了以后大发展的基础。1947年上半年东北先后投入生产的军工厂有36个，并具有相当规模。

三、解放军面临的暂时困难

人民解放军虽然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同时也面临一些相当严

^① 转引自王东溟：《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

重的困难。总兵力少于国民党军,而且没有海军、空军,部队的武器装备仍处于劣势;解放区面积缩小,人口减少;解放区的经济原本不发达,加之国民党军队进占后的破坏,自然灾害的袭击,其经济就更困难了。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地区,遭到战争破坏更为严重。陕甘宁解放区所有县城都被胡宗南军侵占。耕地面积由1600余万亩下降为1200余万亩,粮食产量减少一半,棉花产量减少70%以上,畜力减少30%左右。绥德县王家坪牲畜减少一半以上,农业减产30%^①。据鲁中14个县统计,被国民党军抢去的耕畜达8.39万头,使120万亩土地无力耕种而荒芜,百万农民沦为灾民^②。沂蒙山区是交战双方争夺最激烈的战场,在纵横50余公里的范围内,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100万人,支援解放军的民工有130万人。粟裕说,“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③冀鲁豫解放区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④

1946年3月,华中各地发生严重灾荒,灾民达400多万。1947年春,太行山区普遍干旱,到1948年,全区26个县共有灾民73万余人。1947年7月,晋绥解放区发生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华中、山东解放军区也发生严重灾荒。

为着支援战争,解放区人民的公粮田赋负担普遍加重。根据《中国农民负担史》一书提供的数字,1946年,农民的公粮负担占农业收入的比例,山东16%,晋冀鲁豫12.3%,晋察冀10—15%,晋绥12.75%,陕甘宁8.9%,东北20%,热河20%。1947年,山东全区粮赋比例为20%,晋冀鲁豫14.90%,晋察冀16.85%,陕甘宁为27.33%,东北平均为23.98%(其中吉林省达33.55%)。除了公粮田赋负担外,村款负担也重。据晋冀鲁豫、晋察冀和山

① 《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1页。

② 《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史》第42页。

③ 《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5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东各地的报告，村财政负担在中心区或老解放区约占公粮的50%，在边沿区或新解放区约占公粮的一倍以上，甚至有达两倍三倍的^①。

这些，就使人民解放军继续在解放区内作战遇到的困难日益增大。归纳起来是两个困难：一是人力物力不足以供应战争的需要；二是要在解放区内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四、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

由于蒋介石推行卖国政策，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陷于极端痛苦的境地。工人大批失业。例如，1947年上海失业、半失业工人近200万人，重庆18万人，天津7万人，青岛7万人，昆明6万多人，湘潭4.8万人。工人的工资名义上虽有提高，但远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农民终年劳动得不到粮食，常常以野菜、野草、树根、观音土等充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吴景超在《广西灾情视察报告》里写道：广西农村“的确有许多是靠吃野草度日的”，并有“以梧桐的树皮磨粉混合他种食料来吃的。”^②这就迫使各阶层人民起来为救死求生而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展开。

为了加强和统一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周恩来兼任部长的中央城市工作部。1947年春，周恩来依据中国革命将要出现新高潮的形势，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1947年2月28日的指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

^① 董必武：《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与负担问题》，1947年8月27日。

^② 转引自《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第396页。

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5月5日的指示指出：“近日，蒋顽因军事、经济、政治种种危机难以解脱，于是大造谣言，捏造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企图一方面借此陷害民主人士和群众团体，另一方面借此捕杀我党秘密人员和进步分子，以镇压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在此情况下，你们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中共地下党员的带领下，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军的第一条战线的斗争。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青年学生始终走在前面。1947年5月，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5月4日，上海各界学生举行反内战宣传示威，揭开了5月斗争的序幕。随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大中城市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其规模之大，用蒋介石的话讲，“实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②。5月1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命令各地方当局对于一切越级的或10人以上的请愿和罢课、罢工、罢业、游行示威或其他“扰乱公安情事”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止”。5月19日，蒋介石发表《告学生谈话》，污蔑学生“形同暴徒”，学生运动“离奇怪诞”，宣称要采取“断然之处置”^③。5月20日，京、沪、苏、杭16所大专院校6000人，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国民党当局竟然出动军、警、宪、特，围攻、殴打手无寸铁的学生，造成学生重伤19人，轻伤90人，被捕20人，遭毒打者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8—271页。

② 转引自新华社时评：《蒋介石的末路》，1947年5月23日。

③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2、564页。

500 余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5·20 惨案”。蒋介石政府的血腥镇压并不能阻挡学生们的斗争，学生运动反而进一步发展成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60 多个大中城市。

学生运动获得了工人、农民、市民的同情与支持，同时又推动了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1947 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城市，有 120 万工人参加了反对内战，反对美军暴行的罢工和游行，罢工次数达 3000 余次。

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也投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反美反蒋斗争洪流之中。南京“5·20 惨案”发生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农工民主党等均表示同情青年学生争民主争自由争生存的斗争。北京大学 31 位教授于 5 月 22 日发表支持学生运动的宣言，指出“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实，唯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南开大学 60 位教职员于 5 月 19 日发出联合签名支持学运，“对于你们这次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我们完全同情。我们认为你们所代表的是全中国广大人民内心中所共有的意见。我们相信凡是对于国家现状感到痛心万分的人，都愿意和你们站在一起。而且我们觉得反饥饿的行动与要求是人民应有的权利。我们愿意大家共同为和平民主而努力。”^①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加深了国民党的政治危机。

五、国民党的军事、经济、政治危机

（一）军事危机

军事危机的第一个表现，即是有生力量的大量被歼灭和机动作战兵力的减少。

在第一年战争中，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的营以上正规军，折合约 97.5 个旅（师），292.5 个团，78 万人；被歼的营以上非正规军，折合约 127 个团又 3 个营，34 万人。两者共计被歼

^①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第 364、365 页。

营以上部队 426 个团，112 万余人。国民党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 430 万人下降至 370 余万人，其中，正规军虽然仍保留 248 个旅的番号，但人数由 200 万人下降为 150 万人。在被歼灭的或受到歼灭性打击的 113 个旅中，有 11 个旅尚未得到补充，有一些虽获得了补充或较多的补充，但其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被歼灭，是指一个战斗单位（例如旅）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受歼灭性打击，是指一个旅有一个团以上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国民党的总兵力虽然经过不断补充，还是减少约 60 万人，正规军减少约 50 万人。

这时，国民党以 248 个旅中的 227 个旅进攻解放区，其中，用于南线战场的 157 个旅，一部分担负防御、守备任务，能够作战略机动的仅 40 个旅左右；用于北线战场的 70 个旅，大部担任对交通线和重要据点的守备，能作战略机动的兵力为数寥寥；国民党军的后方非常空虚，在长江以南及西北新疆、青海、宁夏等 19 省的地境内，只有 21 个旅，其中在湘、桂、黔、闽、浙、赣等 6 省，几乎无一个正规军。国民党已没有什么第二线部队了。

军事危机的第二个表现，即是士气衰落，厌战情绪发展。

在第一年作战中，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正规军将领，上将 1 名，中将 7 名，少将 97 名；非正规军将领，上将 2 名，中将 14 名，少将 55 名，两项合计 176 名。被击毙的正规军将领，中将 2 名，少将 14 名；非正规军将领，中将 3 名，少将 7 名，两项合计 26 名。总计被俘、被击毙的高级将领 202 名。这些人中，大多数是蒋介石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跟随蒋介石多年征战，为建立与保卫“蒋家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被俘或被击毙，无疑给了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也是蒋介石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因为高级官长被俘，反而使我们官兵在心理上受到刺激与侮辱，以致精神上转为沉闷、消极，无法振作起来。”^①

^① 蒋介石：《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1947 年 10 月 19 日。

蒋介石原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一举打败人民解放军，但结果是自己有生力量大批被歼，他宣布的结束战争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在这种情势下，广大官兵的厌战情绪，失败情绪，随着在战场上屡打败仗而日益发展。不但下层官兵，就是高层指挥官也对这场战争能否取胜持怀疑态度了。蒋介石本人就承认，许多高级将领，“对于剿匪军事的前途，表示悲观，以为没有胜利的希望。”^①“一般中央同志对于时局怀着种种忧虑，甚至感到惶惑不安”，“许多同志，都丧失了革命的信心，忘却了自己革命的立场和责任，心里面笼罩着一片悲观的心理”^②。对这种状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看到了，他在1947年3月12日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写道：国民党政府军“没有士气，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而战”。他在7月17日的报告里又说：“厌战心理和日甚一日的不祥之兆，正瓦解军心。”司徒雷登多次敦促蒋介石要引起重视，想办法振作军队的士气。

国民党军队士气衰落还反映在广大官兵对蒋介石信念发生了动摇。对战争前途丧失信心，必然导致对蒋介石信仰的动摇。蒋介石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并经常对部下灌输封建忠君思想。许多将领曾认为，跟着他打共产党，搞“戡乱建国”，一定能够胜利。但是随着战争连连受挫，广大官兵想到这是因为蒋介石决策的错误，指挥的错误造成的，因而对蒋介石的信仰发生了动摇。蒋介石自己也察觉到这一点，1947年2月26日，他在南京专门作了《恢复信心，信仰最高统帅》的演讲。指出，现在一般高级将领，“不把剿匪当作我们生死攸关的一件事，这种现象，已经是我们的失败之兆”。然而，“我认为最危险最痛心的一件事还不在此”，而是“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

① 蒋介石：《建立必胜信心完成剿匪任务》，1947年6月19日。

② 蒋介石：《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1947年6月30日。

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的一个老头了，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蒋介石说，这就是“一切失败的总因。”“对于统帅的信心如果不能恢复，那我们今后作战不仅不能胜利，而且还要陷于更悲惨的境遇——大家都要作土匪的俘虏！”然而，这种状态不但没有恢复，而且日趋发展。

军事危机的再一个表现就是军队内部矛盾加深，高级将领中，胜则争功，败则不相救，各自保存力量。

国民党军包括中央军，亦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地方军（如西北军、东北军、滇军、川军、晋军、粤军、桂军、马家军），其比例大体各占一半。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地方军与地方军之间，乃至中央军内部，均矛盾重重，各图保存自己实力为第一要着。“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现象，在这次战争中常有发生，而且呈上升趋势。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击毙的张灵甫（整编第74师师长）在给蒋介石的诀别信里写道：“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① 蒋介石经常拿张灵甫的这封信教育部属希望能纠正这种恶习，但效果微乎其微。

军事危机还表现在战略态势不利。

战争进行到1947年6月，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只在陕北、山东两战场还在继续，但是，其势头已经大大削弱了，且被陕北、山东解放军拖住，进退两难。在这两个战场的中间鲁西南、豫皖苏、豫西，直至大别山区，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形战略态势。在东北、华北，自从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的时候，这两战区就已转为战略防御，在东北、华北人民解放

^① 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1947年6月5日。

军的打击下，战局日趋恶化。几个主要战略集团已被分割，相互间难以协同配合。

（二）经济危机

抗日战争结束时曾经是蒋介石政府财政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得到了美国政府大量的装备、剩余物资、救济物资和各种贷款，还接收了大量侵华日军物资。蒋介石 1947 年 6 月 30 日说，“抗战胜利之日我们的外汇已达到九亿元（美元）。”但是，这些横财不久就大部消耗，经济危机随之爆发。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工商业大批倒闭，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危机。

由于蒋介石政府推行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美国资本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中国（1936 年美国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 8%，到 1947 年已占 70%，稍后达到 80%），美国资本与蒋介石的官僚资本相结合，控制着中国的经济生活，使已经处于困难境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大批民族工商业倒闭、破产。从 1946 年下半年至 1947 年初，仅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 20 多个城市，倒闭的工厂、商店达 2.7 万家^①。上海市原有工厂 4050 家，1946 年底已倒闭了 3160 家，1947 年的开工率为 20%。天津原有大小工厂 5000 余家，1946 年底已关闭 1500 多家，1947 年完全停工和半停工的达 95%。1947 年的工业生产量较抗战前的 1936 年下降 30% 以上^②。

中国是一个农业不发达的大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历届反动政府的残酷压迫、剥削农民，农村经济一直是落后的，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又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遭到极大摧残。抗战胜利后，广大农民盼望重建家园，休养生息，过安静的生活。但是蒋介石政府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反商把内战的重担强加在农村人民身上。农村壮

① 转引自《民国价格史》，1992 年版，第 392 页。

②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42 页。

丁被抓去当兵，地主的残酷剥削、保甲长一年四季的勒索，使农业生产破坏，农民生活更加悲惨。1946年河南、湖南、广东三省，弃耕农田达5800万亩。1947年各省耕地大片荒芜，江苏高达3/5，安徽和湖南各占1/3，河南占1/4，广东高达3/4。农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1946年稻谷总产量比抗战前的1936年减少约7720万担，1947年又比1946年减产约1420万担。小麦1947年比1936年减少4995万担^①。1946年的农业产量与1936年相比，减少33%至40%^②。1947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粮荒。按最低需要统计，稻谷缺6000万担，小麦缺5600万担^③。司徒雷登在1947年5月30日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里写道：“在中国最杰出的国立研究机构中的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员，对大使馆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由于粮食问题，中国的经济形势普遍比已知的情况更糟。他们声称，在长江流域的华南，80%的农民现在完全没有大米，大米都在富裕的地主手中。”^④中国农村两极分化加剧。

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1947年为14万亿元（法币，下同），总支出为43万亿元，财政赤字29万亿元，占支出的近70%。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征税。把巨额赤字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47年5月20日，有一位参政员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参政会上，讽刺国民党的税收政策，“民国万税，老百姓只有放屁，方不纳税！”当时人活着要纳税，死后还要交坟墓捐。二是大量发行纸币。1946年货币发行量为3.7万亿元。1947年猛增至33万亿元，为1946年发行量的10倍。除国内印币厂赶印纸币外，还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其恶果是货币贬值，物

① 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676页。

②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742页。

③ 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史纲》第676页。

④ 《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01页。

价猛涨。如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约为1800倍，到1947年7月则约为6万倍。米价，1947年4月上旬，每担10.7万元，下旬28万元，5月下旬上涨至40万元。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2头牛，1945年只能买2个鸡旦，1946年只能买固本肥皂1/6块，1947年则只能买一个煤球。货币贬值之快，物价上涨之猛，都是空前的。

导致国民党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不断扩大内战，从而造成军费激增。1946年的军费开支占国民党政府全部收入的60%左右。要摆脱经济危机，就必须停止内战。但是，蒋介石既不想，也没有可能把这场由他挑起来的战争停下来。他像赌输了的赌徒一样，总认为只要打下去，他就能挽回败局。战争更激烈，蒋介石的经济危机也就越严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评论说：“中国的经济问题，不能与政治军事问题分开。通货膨胀问题虽是十分严重，但它只是更广泛，更深刻的问题的一种征象。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已成为一种破坏性的经济事实。但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却是一个军事上的事实，就是说2/3以上的纸币发行是直接用于支持政府的军事努力的。而且，纸币流通速度的突然增加，是与军事失败而使纸币信用骤然降低有着连带的关系。”^①

（三）政治危机

蒋介石政府的政治危机的一个表现，是这个政府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蒋介石的政治欺骗已经破产。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丧权辱国条约；大借美债，大用美国送来的军火，屠杀中国人民；严厉镇压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学生、城市贫民；逮捕和暗杀爱国民主人士，取

^① 转引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0页。

缔民主党派，这一切就使蒋介石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遭到全民的反对。

蒋介石政府的政治危机的又一个表现，就是这个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随着战局的日趋恶化而加剧。派系之争也愈来愈激烈。

从以上军事、经济、政治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全面内战虽然才进行了一年，但是，无论在哪条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正像毛泽东1947年5月30日指出的那样：“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事实证明，“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①

第二节 国民党实行“戡乱总动员”， 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

一、实行“戡乱总动员”

1947年6月1日，蒋介石作《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的讲话，对一年来的“剿匪军事”进行了检讨。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按说，无论就那方面的实力来比较，人民解放军打不过国民党军，拿蒋介石的话说，就是“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但是，事情恰恰相反。蒋介石承认，“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4、1227页。

是什么缘故呢？”人民解放军“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蒋介石一连提出了四个为什么。他最后的答案：“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①

“精神的因素”是什么？蒋介石说，那就是军心不振，士气不高。他分析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因为前方在作战，中央在谈判，以致使得前方官兵的心理徬徨，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作战？第二，是一面作战，一方裁军，前方官兵人人自危，恐怕缩编，影响士气甚大。第三，是前方死伤的官兵不能公开发表，明令抚恤，战死战伤毫无荣誉，也是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②

所谓裁军，是指1946年3月开始计划一年时间内，“用集体转业、个别转业和给资遣散三种方式”^③，对庞杂的国民党军进行裁并。军缩编为整编师，师缩编为整编旅，军长降为整编师长，师长降为整编旅长。这次整编虽然精简了老弱病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斗力，但留下了后遗症。“失业军官动辄以千计，部分失业军官，生活无着落，甚至到南京中山陵‘哭陵’，指责中央对他们残忍不道。”^④降职使用的军官心理也不平衡。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次裁军是军事上最大一次败军。武汉行辕主任程潜说，“无形中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使士气降低，人心涣散。”^⑤其实，国民党军队军心不振，士气不高的原因，并非像蒋介石所讲的这几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动的战争的非正义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蒋介石战争是蒋介石企图使中国仍然恢复到抗

① 蒋介石1947年6月1日对军官训练团第3期研究班全体学员的讲话。

② 蒋介石：《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年2月26日。

③ 《陈诚评传》，台湾群众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48页。

④ 同上，第149页。

⑤ 程潜：《在大别山剿匪检讨会议上的训词》，1947年12月。

目前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政治的继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顾中国人民的生死、中华民族的存亡，诉诸武力，发动全面内战。蒋介石声言：“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中国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管仲说，“军之败也，生于不义”。蒋介石战争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反抗，也必然激起国民党军广大士兵和下层指挥官不满与反对。其军心当然不振，士气当然下降。

为改变这三种状况，国民党当局在1947年3月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撤回延安，从而宣告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可能被国民党最后消灭了，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心用武力解决问题。所谓一面打仗，一面谈判的形势就不存在了。蒋介石还决定“今后军队不再缩编”，这第二个原因也不存在了，所剩下的就是要不要明令“讨伐”共产党，蒋介石一时难作决定，请求美国主子拿出主意。

6月19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想听听这位大使的意见。在蒋介石召见的前一天，即6月18日，司徒雷登在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说，在目前危机中，蒋介石“或者使共产党赞成重新和谈；或者宣布共产党实际上是武装反叛，危害民族利益。”司徒雷登说：“我一直希望他以激动人心的革命性手段来为民族奋斗，重新燃起人民的希望之光。”^①19日下午司徒雷登向蒋介石陈述了他的想法。事后，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说，对于蒋介石来讲，“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刻可能已经到来”。他敦促蒋介石采取如下措施：（一）“向人民发布宣言，如果共产党拒绝最近的和平建议，应让他们对中国人民负责；如果共产党希望维护在立宪政府下刚刚出现的民主生活方式，他们就应一起工作，从危险

^① 《被逃亡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06页。

中解救国家。”即是说，如果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那么，不要和平而要战争的责任就推到了中国共产党一方。（二）“政府应尊重公民的自由，危机时期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以“赢得民众支持。否则，政府将不得人心，为人民所唾弃”。（三）蒋介石本人“应游历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团结在新的运动周围”。司徒雷登说，“有人民的支持”，蒋介石就“不必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或其他行动而担惊受怕”。司徒雷登说，如果蒋介石采纳他的方案，“将赢得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充分同情。”¹

蒋介石感谢司徒雷登，愉快地采纳了司徒雷登的意见，及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6月28日，南京政府最高法院发布“采取紧急措施”训令，宣布了一项穷极无聊的措施，即悍然“通缉”中国人民领袖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企图以此挽救国民党党员及军队人员已普遍绝望的情绪。

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联合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报告。他提出，现在对共产党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方式是明令讨伐”。认为“目前如果中央正式颁布讨伐令，国内国外都没有什么可顾虑地方。而参加政府的友党²只要与之切实磋商，也可能同意”；“另一种方式是下讨伐令而采取全国总动员的方式，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以加强剿匪军事的力量。我们如能发布动员令，在事实上动员全国实力以对付共匪，并使共产党无法潜伏后方，阴谋活动，则不用讨伐明令，当然也可以达到讨伐的目的”。蒋介石指出，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害，应如何抉择”？他叫出席此次会议的人“详细研究。”据此，会议决定对中共“极应明令剿办，戡

1. 《被逃亡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08—110页。

2. “友党”，指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

平内乱”，并由主管部门“详拟办法，提候决定。”^①

7月4日，国民党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所谓《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方针案》。并以政府名义颁布“励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训令”。7月18日，国务会议又通过了《立即实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大纲》。《大纲》共18条，其中，第3条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之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行为，均应依法惩处”。第4条规定，“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或妨碍征购征用及囤集居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第5条规定，“凡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行为，均应依法惩处”。第16条规定，“违反本纲要第3条至第5条，或依据各该条所定办法应行制裁或限制之行为者，依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惩处之”。第17条还规定，“除本纲要已有规定者外，为达成戡乱目的，行政院得依总动员法之规定，随时发布必要之命令”。随后，国民党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办法》、《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条例。

7月5日，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张群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戡乱总动员是“政府加强建国进程而采取的重大措施”，“望全国同胞拥护政府的国策，拿出一切的力量，共同奋斗。”7月7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扬言要“一致奋起，肃清匪患”。国民党的高级官吏纷纷登台叫嚣反共，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民社党和青年党的政客们，也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各省、市、县的国民党党部、参议会，争相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的决策，并召开所谓“戡乱建国动员大会”，组织游行示威。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的“反共”波浪。

蒋介石声称，实行“戡乱总动员”的“最重大目的与意义是

^① 《史料初编》(7)，第2册，台湾党史会编，第906页。

唤起全国人民的警觉，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一方面加强剿匪军事力量，加速消灭共产党”，“另一方面，还要加紧从事建设工作，以期建国大业得以早日完成”。其实，蒋介石只“戡乱”，不建设。蒋介石申言，“参加其‘第二战线’的工作而有扰乱秩序危害治安的行为”，“必须负责取缔，依照法纪予以处治。”^①即是说不但要“剿匪”，还要镇压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国民党统治区伟大的人民运动。蒋介石认为，“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②从此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工作“就简单得多，对于民众的号召更是便利得多了”，对于战死战伤的国民党军官兵可以明令抚恤了。一句话，实行“戡乱总动员”，就可以振奋民心士气，挽救国民党的失败。

对此，当时的国内外舆论发出了许多评论，均表怀疑。美联社在《总动员令》通过之次日即发表上海部分观察家的意见，认为“该命令之实际意义不如象征的意义为多”。美联社8日北平电讯认为，“南京之总动员颇为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公开承认政府军事处于严重态势，反共战争毫无效果。……对动员令得出自然的结论是：由于战争的损失，此一庞大机器仍不足达其目标”。

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这以前他只做不讲。现在他为何要颁布总动员令呢？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1947年7月13日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题为《总动员与总崩溃》社论作了彻底地揭露。社论说这个“总动员令”，“它象征蒋管区的人民将要遭受更大的压迫”。“它象征蒋管区的人民将要遭受更严重的征兵、征粮、征税、派款、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破产和饥饿的灾难”。“它象征蒋介石将要进一步卖国，以取得美国

① 蒋介石：《抗战十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1947年7月7日。

② 《蒋总统秘录》第14册，《日本产经新闻》连载，台湾《中央日报》译印，第77页。

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援助”。社论指出，“最重要的，它是象征着蒋介石的统治将要总崩溃。”蒋介石的总动员就是蒋介石的总崩溃的开始，总动员不会挽救蒋介石的军事、经济与政治危机，相反的恰恰只能加剧这些危机，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二、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

毛泽东曾说：“蒋介石不是完全不懂得战略的，多少懂的一点”^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他的战略就是进攻解放区，摧毁解放区的人力、物力，消灭人民解放军。蒋介石说：“古今中外的战事，凡战略上取守势者未有不败之理。我们剿匪战争的原则是：‘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②。他就是按照这种战略实行全面进攻的。他的正规军 248 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已陆续增加到 227 个旅。其全面攻势受挫后，蒋介石仍坚持这个战略。他说，共产党在关内有三个重要的根据地：一个是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一个是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一个是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③。要打垮共产党，就要摧毁上述三个根据地。因此，蒋介石从 1947 年 3 月起，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即所谓“双矛攻势”。到 1947 年 6 月，国民党军虽然攻占延安，但是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目的却没有实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沂蒙山区和胶东仍控制在人民解放军手中。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对山东、陕北解放区的攻势，力求迅速解决这两区问题，然后，转移兵力于华北、东北。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控制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军事、交

① 转引自陈毅：《必须首先从战略上看问题》，1948 年 8 月。

② 蒋介石：《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 年 4 月 15 日。

③ 蒋介石：《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 年 10 月 6 日。

通三个根据地后，“进一步目标，即在断绝其兵源补充，占领其粮食产区。”蒋介石说：“现在匪军占领区内，人力粮弹最丰富的地区在那里呢？晋东、晋西和陕北都不是产粮食的地区，而且人烟稀少，上次我到延安，当地就很少壮丁，所以他的人力粮弹可以说全靠冀中冀南和鲁北这三个地区。如果我们派遣军队，犁庭扫穴，占领这几个地区，他就真正成了流寇。一成流寇，只要我们军队穷追猛打，绝不放松，就没有不被我们消灭的。”^①

把战争继续扭在解放区打，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彻底破坏解放区的经济，使人民解放军失去依托，而不得不四处流动，同时又保持国民党军队的大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战争的速战速决。这是蒋介石从事长期反革命战争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蒋介石说，“我过去主张剿匪必须摧毁他的巢穴者，即因为匪的一切物资粮食都储备在老巢里而，一个老巢被捣之后，他在短期内必无力重建；所有重要老巢捣毁之后，他就成为流寇了。”^② 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内战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各个红军根据地进行一次又一次“围剿”时，其方针就是把战争扭在根据地边沿或根据地内打。例如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5次围剿，蒋介石的计划是，“在军事上实施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的战法”，“在经济与交通上，对匪区彻底封锁，杜绝消息，不使其向外钻隙，超越渗透，和发展其宣传与组织的间隙，更不使其获得有外援接济的机会，以充实其战力。”^③ 蒋介石重新挑起全面内战后，仍企图用对付红军的办法来对付人民解放军。但是，吸取了红军战争经验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变得聪明了，他们识破了蒋介石的图谋，实行了远远高于蒋介石的战略。正像邓小平指出的，“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

① 蒋介石：《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1947年10月20日。

② 蒋介石：《国军战术上所犯之错误及其改进》，1947年7月10日。

③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11页。

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这一点。”^①

三、撤换高层指挥官，制定对付解放军的战法

（一）撤换高层指挥官，统一作战思想

因为战败，蒋介石先后撤换了许多前线高级指挥官，这里有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副主任吴奇伟，第1兵团司令官汤恩伯等等。全面内战开始后一段时期，蒋介石把作战指挥权交给参谋总长陈诚。陈诚自信，“五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然而，战场上较量的结果，用蒋介石的话讲，“我们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蒋介石认为这是陈诚指挥无能的结果。于是，蒋介石决定将作战指挥权收回来，由他自己亲自指挥，即从1947年5月起，“重要战役都由我来亲自指挥”，并“集中全部的精神，来研究我们的一般将领失败的原因。”^②

鉴于东北军政失败，8月16日，蒋介石决定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并入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实行东北军政统一。8月28日，免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和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之职，派陈诚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由指挥全局的大员，降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官。为使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能集中精力于陆军总部徐州指挥部，指挥45万人的大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8月6日，蒋介石派孙立人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对蒋介石这种做法，国民党军官是不满的，当时，在军官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7页。

^② 蒋介石：《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

中流行一种耳语，认为第一个应该被撤职的应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而又不肯改正。

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对全局战略方针原本就存在分歧。据司徒雷登说，参谋总长陈诚“鼓吹大范围围剿，迫使共产党人退到山区，一旦他们突围到平原地带寻找粮食和供应，那时就可以摧毁或击溃他们。”国防部长白崇禧则“坚持另一种战略，即把中共军队分割成小部队，限制在不同的地区，并一块一块地吃掉他们。”^①但是，战争进程表明，不论国民党实行何种战略方针，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讲都不灵。前方将领越来越对蒋介石的战略指导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为了统一战略思想，解决各战区的具体问题，蒋介石于1947年7月1日飞到北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19日飞到开封。21日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8月6日，蒋介石飞到延安，并在那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亲自指挥”，并飞至这里，飞至那里，到底产生了何种作用呢？后来的战事表明，蒋介石到什么地方，那里就要打败仗，这成了一条规则。

（二）加紧训练军官，研究对付人民解放军的战法

蒋介石原以为他的将领都是经过“现代训练”的，其作战技术和经验都比人民解放军将领强。但是，在战争中国国民党军将领却一个个成了解放军的手下败将。于是蒋介石下决心重新训练国民党军官。从1947年4月开始至1948年3月，在南京举办了7期军官训练团，召集前方团以上军官到南京轮流受训。每期约一个月左右。蒋介石自任训练团团长，并讲授“剿匪”的战略战术。蒋介石在1947年4月15日军官训练团第1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举办训练团，其目的就是要使大家“聚合一堂，根据过去一年来剿匪的实地经验，来研究共军的特点，检讨我们自己的缺点，从而改进我们的战略战术，以期今后剿匪的军事能顺利完成。”

^① 《被逃亡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91页。

蒋介石非常重视研究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他认为，“我们要打败敌人，首先要学习敌人的优点，而不仅仅看到敌人的缺点”。为此，他要求并奖励部队“务须设法找到共军最机密的文件或电码”，“夺取敌人的作战计划，战斗教令等机密文件；尤其是与战略战术有关的作战方略”。1947年5月，从东北战场获得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编印的战斗手册，蒋介石如获至宝，将其“看得比任何兵书都宝贵”。他声称，“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的细心玩味”，一口气读了5遍。他要求他的部下也要像他那样，“必须逐字逐句细心的研读。”“如果不加研究，从这里想出良好的办法来打击敌人，就不能算做一个有志气的革命军人，你们如不把握这个机会来战胜敌人，将来恐怕不会再有这样良好的时机了”^①。

通过研究解放军的战术和检讨国民党军历次战役战斗失败原因后，蒋介石发现，他那些前方将领被俘，作战受挫，是因为高级将领碰到解放军的“特种战术”而束手无策。什么叫解放军的特种战术呢？蒋介石回答说，就是人民解放军“能专找我们高级司令部和高级指挥官的所在地。凡是我们的主力的调动，团长以上官长的行动，几乎都被他们发觉。结果我们前方的高级司令部，往往遭受袭击，高级指挥官往往被他们俘获。这是他们八年以来，处心积虑，聚精会神所研究出来对付我们的特种战术。”蒋介石承认，“事实上一年以来我们最吃亏，最损失的地方也确实在于这一点。”^② 蒋介石经过“劳心焦思”提出了对付这种战术的办法，他称之为“秘诀”。即：军、师、旅、团各司令部，要尽可能多设假司令部，司令官白天住一处，夜晚住一处，或者住在营、连里指挥；行军时，司令官切不可骑马、坐轿，“一切生活行动、服饰态

^① 蒋介石：《对于匪军战术的研究与军队作战的要领》，1947年5月19日。

^② 蒋介石：《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

度，要和士兵一样”，这样解放军“就不知道谁是指挥官了”；如果被包围，“绝对不能退却”，“否则，一退必乱，一乱必被共军消灭”^①；如果被包围，“切不可发出无线电报或电话向上级报告自己部队死伤多少，粮食只剩下多少”，因为共军已经掌握了我方的密电码，“他在三五个小时内都可以翻译出来”^②；各级官长要“重节操尚廉耻”，不成功，便成仁，绝对不能当俘虏^③。

1947年7月17日，蒋介石制定《剿匪作战四大守则与六项要目》。四大守则是：“第一，必须取积极攻势；第二，必须行动秘密与迅速，故应时时设法加强机动性；第三，无论攻守须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第四，必须奖励夜间行动与夜战方法能发挥机动性。”六项要目是：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蒋介石说，这些原则“是我们打匪的基本战术，也是我们剿匪战术的具体条目”。按照这些原则办，“一切行动部署皆能准备周到，毫无弱点，使匪无隙可乘，则彼匪就将处处避战，立于被动地位，如此即可任我痛剿，贯彻我预定之计划”。

四、乞求美握与魏德迈来华“考察”

自1947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就通过多条渠道争取美国政府增加援助，帮助它摆脱经济的军事的危机，实现用武力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这年1月底、2月初，宋子文几次向美方告急，“乞求”美国立即给予援助。5月8日，驻美大使顾维钧会晤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声称“我受命提出10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美国的器材和设备，另一半政府建议用于三类规划：1. 恢复和发展交通；2. 建立发电厂和某些小型工业；3. 恢复农业、特别注重水利和生产化肥。”^④5月27日，顾维钧将国民党政府拟议贷款的正式

① 蒋介石：《对匪军阴谋诡计与战略战术之分析》，1948年3月13日。

② 蒋介石：《剿匪期间攻防作战之要领》，1948年2月5日。

③ 蒋介石：《神秘性与心理战对剿匪作战之重要及其方法》，1948年2月6日。

④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2页。

备忘录交给美国国务卿，“申请进出口银行预付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贷款，以便为列举的产品购买设备和器材提供资金，并且要求国会另外拨给五亿美元，用以购买棉花、小麦和石油等商品在中国出售，为中国政府提供通货来支付国内建设的费用。”^① 蒋介石认为有 10 亿美元援助，他可以渡过难关。

美国政府是一直积极援助蒋介石政府的。1947 年 4 月 25 日，杜鲁门发布命令授权海军部长，根据 1946 年通过的“第 512 号公法”，将不超过 271 艘海军舰只和相应的船坞以及其他物资移让给中国国民党政府。5 月 26 日，马歇尔宣布取消 1946 年 7 月 29 日向中国运送军火的“禁令”，允许中方在美国市场采购武器。马上执行的具体项目有 1.3 亿发“7.92”毫米步枪的子弹和建立八又三分之一大队空军项目下的一切飞机及零件^②。1947 年 6 月 26 日，马歇尔主持召开“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会议，研究“武装”中国国民党军问题，陆、海军部长强烈主张痛痛快快地公开予以援助。马歇尔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情况“确是危急”，他“感到有迫切必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看看我们继续对华采取的行动应有什么改变。”^③ 在这种背景下，7 月 11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遣魏德迈“即刻前赴中国，就中国现在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估量”，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魏德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 年至 1945 年，曾担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的参谋长兼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同蒋介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向主张积极援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听到魏德迈将作为杜鲁门的特使来华抱有很大期望。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告诉魏德迈：“委员长和中国其他人士得知他的使命后，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 6 分册，第 144 页。

^② 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7、148 页。

^③ 转引自《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 152 页。

非常殷切地期待他的莅临，他将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他被任命的消息已在中国舆论界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顾维钧认为，魏德迈率团出访，“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可能有所改变的迹象。”^①

自7月22日至8月24日，魏德迈使团在中国逗留了1个月，到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汉口、青岛、济南、沈阳、抚顺、台湾等地。8月22日，魏德迈应邀在国民党“国府委员会”和政府全体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他历数国民党军队、政府、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弊端：贪污腐化、秘密警察横行、滥捕滥杀、滥用刑罚，等等；指责国民党失去了人心，而助长了共产党的势力。他告诉在座的国民党人在每一方面应该如何改革，并要他们“奋起，作任何牺牲，必要时生命也在牺牲之列。”^②

对魏德迈的演说，蒋介石十分“恼怒”，“十分反感”，因为有损于蒋介石本人和他政府的“威信”。他“要求魏德迈开列他怀疑有贪污行为的人员名单，并答应他将依法惩处这些人。”蒋介石逝世后，魏德迈在一次回忆蒋介石的谈话里又重提此事，他说，“那年我在中国实地调查后，由于委员长和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一再要求……当时我勉强去讲那番话，用意是希望能激励中国政府和人民，用更积极的行动，去抵抗共产党。”^③

9月19日，魏德迈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长篇的全面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报告。该报告从美国对付苏联的全球战略出发，提出了援助的具体计划。他认为：“中国如为苏联所控制，或者成立一个亲苏的政权，则将使许多不冻港和空军基地供作敌用。……反之，一个与美国友好或结盟的统一的中國，不但可供给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而且从它的幅员与人力来看，也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而中国目前的情景，国民党已失去人心，军事上“战略主动权操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71页。

② 转引自《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157页。

③ 《总统蒋公纪念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年4月版，第311页。

在共产党之手”，“最后有建立起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中国的可能”。魏德迈报告，就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援蒋的设想和方案。其中军事援助方案最具体。报告中写道：“对华军事的支援和协助主要的通过三种方式，或三种方式的同时采用：即物资的援助，顾问的援助或由美国人员直接参加作战”。物资援助，包括完或 1.6 万辆汽车零件计划，增购军需装备；补充弹药；完成八又三分之一的空军大队的飞机和零件；无代价的供给 137 艘船舶及浮坞，帮助国民党政府建设一支海军。顾问的援助，1945 年 9 月初，蒋介石要求美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他建军。1946 年 3 月 19 日，美国军事顾问团成立，在南京办公。魏德迈报告提出：“军事顾问和监督的范围加以扩大，包括野战部队、训练所、尤其是后勤机构。”关于美国人直接参加中国作战，魏德迈则认为“有背于美国现行政策故不能采取。”

魏德迈还在报告里向杜鲁门提出了“劝告中国请求联合国立即设法促使满洲战争停止，并请求将满洲置于五强监护制度之下，如或不成，则按照联合国宪章置于托管制度之下。”魏德迈在东北考察后，深感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军事形势“非常危急，勉强支撑，虚弱不堪，补给线既长，又无掩护”。人民解放军随时可以占领整个东北。魏德迈认为中国政府请求联合国托管或美、英、法、苏、中“五强”监护，可以缚住苏联的手脚，阻止人民解放军占领全东北。把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是魏德迈一贯的主张，他在 1945 年就“曾计划由中国提请五强监护东北”。两年后“他仍然相信，对于挽救东北，这种办法比打仗更有效。”^① 蒋介石不敢在“九·一八”以后再来进行一次出卖东北，因而没有接受魏德迈的“建议”。美国政府也直到 1949 年 8 月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时，才敢对外公布。

魏德迈大规模援华的建议大多为美国政府所采纳。他回美面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 6 分册，第 199 页。

后约2个月，即1947年10月27日，美国通过中美救济协定，以2700万美元物资援助蒋介石打内战。1947年11月，马歇尔在国会两院听证会上提出要求国会通过援华拨款的建议，金额3亿美元，自1948年4月开始，为期15个月，在此之前即拨款6000万美元救急。

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一九四八年援华法》，作为《一九四八年援外法》的一部分，为期12个月，总数4.63亿美元，其中1.25亿美元为“特别增款”，由“中国政府自行规定其使用”。美国国会《一九四八年援华法》，表明美国政府希望用这些钱去阻止趋于崩溃的国民党经济，阻止国民党统治的垮台。

第三节 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与战略方针

一、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提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①8月11日，中共中央指出：战争第二年“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②1947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③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9页。

^③ 同上，第226--227页。

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①

“内线部队”渡淮南进，就是指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分别向豫东和津浦铁路徐（州）蚌（埠）段进击；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进击津浦铁路蚌（埠）浦（口）段以为策应。尔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山东野战军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②

194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征询“内线作战，歼灭敌人一半左右，失地大部收复之后，应照前计划以主力向中原出动。此计划约在何时可以实现？”1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回电中说：“如果我们能消灭川军两个旅、王仲廉^③两个旅、王敬久^④两个旅，就可打开局面，收复大部失地，三四月实现此计划是可能的，届时当可向南发展。”同年11月3日，中央军委致电晋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王宏坤，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及副司令员滕代远，告知“来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击”，要求他们“须先密筹经费，主要是衣服、油、盐、小菜钱。”^⑤1947年1月2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薄、滕：“根据现在情形，打退敌战略进攻和自己的必要准备，战略出击须在今年六月或更迟一点”^⑥。然而，半个月后，即1月18日，中央军委要求刘邓大军提前于5月间以主力向中原出动。因为“我五师在陕南、豫西、鄂西非常困难，如你们出动过迟即有失败之危险。”^⑦中原军区部队突围至豫鄂陕边和鄂西北地区后，由于国民党仍以重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3—284页。

③ 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26军军长。

④ 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27军军长。

⑤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⑥ 同上，第212页。

⑦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26页。

兵进行“围剿”，1月24日，中共中央电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①2月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致电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政治委员汪锋：在你们处于困难的条件下，留在陇海路以南坚持或撤回黄河以北两个方针，我们都可以同意。但两种利害相权，需要你们自己下决心。中共豫鄂陕边区党委经再三研究讨论后于2月5日报告中原局并中共中央，一致认为主力应撤至黄河以北休整，暂留地方武装坚持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共鄂西北区党委也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有关指示精神于2月4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鄂西北军区主力分路转入外线作战，与敌人打大圈子。二三月间，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分批北渡黄河，开往山西晋城休整，鄂西北军区主力也分路转移。由于中原军区部队已经转出豫鄂陕和鄂西北，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因此，3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刘邓大军推迟转入外线作战时间。要求刘邓大军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其下一步行动，似以打黄河以北之王仲廉孙震^②两部，与华东作远距离之配合较为适宜。在一般情形下（特殊情况除外），刘邓大军须在黄河以北，基本上解决王孙两部，并调动吴绍周^③指挥之两个师到黄河以北给以歼灭，然后南下陇海较为有利，因黄河已放水，过去与现在情形已不相同。”^④

由于国民党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两解放区形势十分严峻，出现了中央军委3月6日电中提到的“特殊情况”，需要刘邓大军尽快转入外线作战，配合西北、华东解放军反击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因此，4月27日，中央军委电询陈毅、粟裕：“你们对刘邓下一步行动意见如何？（一）出鲁西南及豫东较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38页。

② 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5绥靖区司令官。

③ 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85师师长。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2页。

近地协同你们作战？（二）出中原较远一点配合你们作战，由你们出一部出鲁西南，互相联系？以上两项何者最为有利，盼告。”经过几天磋商，5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德怀、习仲勋，认为“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已东（6月1日）以前完毕，已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①。5月8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粟：“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5月4日）电争取于已东前休整完毕，已灰（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②5月9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要求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③。6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和刘少奇、朱德，电报说，根据目前的敌情和部队的情况，部队于6月10日出动实来不及，为避免仓卒行动，影响今后任务，建议推迟于月底准时渡河。6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④

（二）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确立

关于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中央军委先是决定将其加入陕北作战，后又改为挺进中原。

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0页。

^② 同上，第64页。

^③ 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88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91页。

故称陈谢纵队)由晋西南渡黄河加入陕北作战,一直是中央军委为粉碎国民党军进攻,保卫延安,发展西北战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6年10月底,蒋介石在继续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决定偷袭延安,企图消灭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11月上旬,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1、第90师共4个旅经禹门口西渡黄河入陕,会同原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为粉碎国民党军偷袭延安的企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了充分的准备。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决定调陈谢纵队和其他纵队,驰援延安。11月10日,中央军委令陈谢纵队到吕梁地区后看情况,“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①11月20日至1947年1月1日,陈谢纵队与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举行吕梁战役,接着又于1947年1月17日至29日,举行汾(阳)孝(义)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万余人,推迟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行动。

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西北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为发展胜利,5月4日,中共中央确定“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②5月8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中共中央,认为“边区与陈谢两军合力消灭胡宗南主力,至为重要。”他们满怀信心地说,两军合力“六个月可能完成”消灭胡军主力的任务。

继5月4日确定陈谢纵队协助西北人民解放军击溃胡宗南夺取大西北之任务后,中央军委又就该纵西进作战的准备,渡河时间及进至陕北后的作战等问题做了指示。5月14日电报说,“在目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59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0页。

前短期内，陈谢部除以一部扫清吕梁顽敌开辟西进道路外，主力休整待命渡河。陈谢兵团过河后，或与边区兵团分开作战一时期，再集中作战；或开始即集中作战，依当时情况酌定。”^① 5月24日电告陈赓、谢富治等，“你们纵队六月内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工作（包括肃清吕梁，打开通路），准备于七月上旬由大宁、军渡之间渡河，先至陕北作战，再至宁夏、甘肃广大区域作战，以歼灭胡军及其他顽部，夺取大西北为目标，即借此以保卫山西。”^② 6月12日电告陈谢纵队先转至洪洞、赵城、霍县以东地区集结补整；陈赓在部队补整期间先来中央军委面谈一切，部队交谢富治率领渡河。6月25日，陈赓动身赶赴中共中央驻地。

在陈赓赶赴陕北途中，南线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举行鲁西南战役，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战局发生迅速变化。中共中央对陈谢纵队的使用做了新的考虑。7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后提出了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的两个方案。方案确定后由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习仲勋。这两个方案是：“（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毛泽东强调指出，“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71页。

^② 同上，第83页。

^③ 边区集团，指西北野战兵团。

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并约彭、习和贺龙^①来中共中央驻地靖边县小河村，会商一次，“时间大约可定在十三日。”^②

在毛泽东、周恩来重新考虑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时候，谢富治和第4纵队副司令员韩钧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于7月5日致电中央军委和陈赓，提出：“在目前形势下，我部出潼洛^③与陕北两着何者更有力和有利？请考虑指示。”他们同时表示“我部七月中旬可完成一切出动准备，干部对出陕北均有决心与信心。”8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全局我已转入反攻。”并告“陈赓约十九日可抵中央开会讨论行动。”

7月19日，陈赓到达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当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听取了陈赓的汇报后，做出决定，并于当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将决定内容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郑位三、李先念，谢富治、韩钧。决定称：“（一）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④，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二）提议赵基梅纵队（五师主力）、秦基伟纵队及孔汪三十八军^⑤与陈谢纵队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三）上述陈赵秦孔四部统于电到二十天内完成一切政治、军事、经费、干部等项准备工作，未皓（8月19日）以前渡河。”^⑥

① 贺龙，当时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25页。

③ 潼洛，指陕西潼关和河南洛阳。

④ 潼洛郑段，指潼关、洛阳至郑州的铁路，即陇海铁路一段。

⑤ 孔汪三十八军，指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军长孔从周、政治委员汪锋。

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43页。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小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研究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针，研究了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及各战场的配合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时说：“原先计划陈赓率部西渡黄河集中在陕北打胡宗南，现在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协助西北我军打胡宗南，在战略上、粮食供应上都有利。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7月以造成消灭胡宗南的条件。”^①会议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陈谢纵队不到陕北，而从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决策。

陈赓在《挺进豫西》一文回顾赴陕北晋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情况时写道：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说明了当时全国形势、陕北面临的困难，党中央关于以主力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和改变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决策后，“对于挺进豫西的行动，毛主席给了极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刘、邓率领我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接着，“主席还向我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并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将要渡河的地方，要我们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②

（三）陈粟大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决策过程

如前所述，早在1946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了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渡淮河向南夺取信阳、大别山、

^①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② 陈赓：《挺进豫西》，《人民日报》，1961年1月1日。

安庆、浦口之线，在外线歼灭国民党军粉碎蒋介石的战略计划的构想。后来决定先在内线作战，打几个胜仗，看出国民党军的弱点，然后再转入外线。194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电示刘伯承、邓小平缩短内线作战时间，准备5月开始向中原出动转为外线作战的同时，电告陈毅、饶漱石（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及中共华东局，“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①亦即要求华东野战军提早转入外线作战。1947年3月4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等致电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等，对今后作战提出两个方案：第一，集中山东及刘邓军于津浦线之兖（州）济（南）间与敌决战，如此能歼敌四五个军，不仅胶济及兖济段仍为我控制，且可迫敌向济南、临城（今薛城）收缩，甚至转入全面守势，利于我提早反攻转入外线。第二，华东主力转鲁南线歼敌，建议刘邓军向东南进击，截断陇海路，与华东部队形成对徐州之钳形攻击，迫津浦敌南返，而后我再全力于运动中歼灭南下之敌。但辗转南北需时较长，对转入外线作战时间亦需推迟。3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等人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转入外线之时间不必顾虑，因为李先念部一部已北渡黄河到达太岳解放区，一部南渡长江去湘西。“因此，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五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②要求华东人民解放军在今后10个月内，平均每月歼敌4个至5个旅，共歼敌40至50个旅。

为着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陕北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5月4日、5月8日对南线作战做了通盘计划，其中确定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直接指挥的徐州司令部所部军队。为达此目的，要求刘邓大军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38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页。

争取于6月10日前渡黄河，转入外线作战，向中原出动；陈粟大军在6月10日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已灰（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①中共中央还就刘邓、陈粟两军协力作战的指挥关系作了规定，“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②但是不久，这一计划与部署又做了重大改变。促使中央军委作出改变的主要因素是孟良崮战役的巨大胜利。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东南之孟良崮地区，以1.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等部3.2万余人，击毙师长张灵甫，迫使顾祝同暂时转入守势。5月22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为此决定，华东野战军“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同时指出，刘邓军下个月出击及其他战场的攻势作战，其作用“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③5月22日的部署，表明中央军委改变了原定的战略出击计划与部署，由刘邓、陈粟两军转入外线作战，改为刘邓大军转入外线，挺进中原，陈粟大军继续在内线作战，主要战场在山东，刘邓大军外线出击也是为着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对山东的进攻。

华东野战军孟良崮战役胜利后全军进行了休整。陈毅、粟裕、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64页。

② 同上，第50页。

③ 同上，第81页。

谭震林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集中主力在山东战场各个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争取战局转变。从1947年6月25日开始，蒋介石集中9个整编师25个旅的兵力，再次向鲁中解放区发起了进攻。由于国民党军兵力集中、密集，华东野战军一时难以捕捉战机，分割歼灭。6月29日12时，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考虑到刘邓大军即将转入战略进攻，形势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为使华东野战军能够配合刘邓大军作战，并彻底打破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请陈毅等考虑分兵出击的问题。电报说：“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面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①很明显，上述新方针又改变了中央军委5月22日要求华东野战军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面应采取两路转入外线作战，一路坚持内线作战，在其他战场配合下，内外线结合，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6月30日，陈、粟、谭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对分兵出击做了全盘部署：第1、第4纵队当夜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出击；第3、第8、第10纵队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首先集结于博山地区，尔后向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第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13页。

2、第6、第7、第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由陈、粟、谭直接指挥，集结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地区，坚持内线斗争。

8月初，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3、第8、第10等5个纵队进入鲁西南地区，同刘邓大军会合。这时，中央军委要求刘伯承、邓小平至少一星期内不移动，帮助上述5个纵队休整，然后南进；在刘邓大军南进时，陈、粟应到鲁西南地区指挥这5个纵队从内线即在陇海路以北地区，箝制敌人，这对刘邓大军南出最为有利。“目前主要任务是从侧面，将来则从反面（将来邱欧^①可能南进）钳制邱欧，如邱欧由陇海线向南，陈粟则尾随之。总之，陈粟从反面钳制敌人最为有力。”^②8月10日，中央军委指出，华东野战军的这5个纵队应照刘邓7日电，部署在豫皖苏边区“活动一时期，掩护刘邓南进，尔后即活动于陇海南北地区。”^③

8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询问进入鲁西南地区部队的态势及今后作战行动。这时，陈毅已去渤海军区“料理一下后方的工作”^④未归。率部正在向鲁西南行进途中的粟裕于18日将自己对今后作战的意见报告中央军委。他说：“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因此，西兵团^⑤目前应位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并寻机歼灭薄弱之敌。此计划如能有效实施，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鲁中、胶济线抽一部分敌西来。如是，则又会减轻我鲁中及胶济线负担，并使敌人进犯胶东

①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5师师长；欧，指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3兵团司令官。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73页。

③ 同上，第183页。

④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⑤ 西兵团，即华东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组成的外线兵团。

腹地及烟台之可能性更减少。”^①8月19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并刘伯承、邓小平，号召华东野战军指战员，“学习刘邓向外线英勇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区域行动”。毛泽东收到粟裕扩大华东野战军机动范围的电报后，于8月24日致电陈、粟并告刘、邓，华东局，指出：“粟裕同志巧（18日）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②华东野战军西兵团作战范围的扩大，由在内线积极作战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改变为挺进豫皖苏边区和刘邓大军、陈谢集团一起经略中原，这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三军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就形成了。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是刺入蒋介石胸膛的三把尖刀。三军以“品”字形阵势配合作战，机动歼敌，创建中原解放区，调动重点进攻陕北、山东的国民党军主力回援，以此策应内线解放军作战，改变整个战局。

二、以一部分主力继续在内线作战，收复失地，巩固解放区

以一部分主力继续在内线作战，是指除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陈谢集团、陈粟大军三军外的其他人民解放军，即南线的西北解放军和山东、苏北解放军，北线的东北民主联军和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军。

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把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胡宗南集团箝制在西北战场并将其吸引至陕北，消耗它，歼灭它，配合刘邓大军、陈谢集团挺进大别山、挺进豫陕鄂边区；山东解放军的任务是将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箝制在山东战场，并将其吸引到胶东半岛，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边区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苏北解放军坚持苏北地区斗争，吸引国民党军。

晋冀鲁豫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冀鲁豫、豫北和晋西南发展攻势，

^① 《粟裕军事文集》第318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07页。

消灭蒋介石、阎锡山的军队，配合野战军主力挺进中原。

为完成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的任务，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东北、晋察冀人民解放军制定了协同作战计划。

1947年7月3日，中央军委就晋察冀野战军下半年的行动部署电告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的朱德、刘少奇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并即转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同时并告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晋察冀野战军应进至石家庄以东地区休整1个月（8月）。9月进行石家庄战役。打石家庄以后休整一时期，即应移至平绥平汉两铁路之间，对该两路之敌作战，计时约在10月半以后，准备用三四个月时间，将该两路之敌充分削弱，然后与东北民主联军配合夺取平绥路；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后休整1个多月，尔后即以一半兵力向北宁路及热河、冀东进击，1948年春向平绥路进击，以占领整个平绥路，打通华北与东北联系为目标。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按照这个方向进行部署。”^①

7月10日，毛泽东就北线人民解放军第二年的任务与计划电告林彪、罗荣桓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高岗：“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上述任务应以东北民主联军为主力，晋察冀、晋绥人民解放军辅助完成之。毛泽东指出，“东北我军目前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约于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至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如能顺利达成上述任务，约在明春即须以东北有力兵团，配合五台（即晋察冀）、晋绥进攻平绥路。待战争发展平绥附近时，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21页。

五台、晋绥我军统一归林罗指挥作战。”^①

因为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北线作战计划的具体步骤后来有所改变，但是基本意图没有变。在一个时间内，晋察冀野战军根据本战区情况，独立地遂行了各次战役，东北民主联军也主要是在本战区作战，两大战略区的部队着重从战略上互相配合。

三、全力准备战略进攻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开始后的一个时期内称“战略反攻”或“大反攻”，而不称“战略进攻”。乃至现今有的专著、文章、讲话仍习惯将“战略进攻”叫做“战略反攻”。当时称“战略反攻”，其意是表明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战争仍然是自卫的防御的。其实，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及随后的迅速发展，已经超越了战略防御的范畴。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47年12月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讲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1948年1月，毛泽东同陈毅谈话中又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是带着防御的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是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自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人心愈失。同时全国举行革命进攻（不是自卫防御），把蒋介石的进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进攻’更适合。”^②

战略进攻是战争中最富决战性质的行动，其胜败关系战争结局，因此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确定与完善战略进攻计划的同时，十分重视战略进攻的准备。这种准备还在战略防御阶段就着手进行部署，并贯穿于战略进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34—135页。

^② 转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第274—275页。

的全过程。

第一，思想准备。1947年5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全力准备大反攻》。社论指出：战争的形势“由蒋军的局部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局部反攻，改变到蒋军的全面防御与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社论认为，“这个反攻将是长期的，因此速胜的观念是不对的；不论在军事方面和经济方面，都要作长期的打算，在长期的全面的艰苦奋斗中取得胜利。这个反攻可能会有某些曲折，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必然加强对蒋介石卖国贼、法西斯集团的援助。”社论强调说，“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和发生某些曲折的可能性，来准备全面的反攻。我们的最后胜利是肯定的。”^①7月1日，新华社又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年》社论。社论指出：“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作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但是无论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社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我们敢于胜利，我们就一定胜利！”^②

正视困难，强调多从困难方面着想，尽一切努力克服困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里指出，“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③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在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小河会议上又一次强调全党全军必须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并对解放战争胜利时间作了估计。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从一九四

① 《人民日报》，1947年5月3日。

② 《人民日报》，1947年7月1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7页。

六年七月算起)，但不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毛泽东强调，“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①

第二，组织准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再建晋察冀野战军，成立陈谢集团党的前委会，成立西北野战军党的前委会，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的领导等（具体情况将在各有关章节中叙述）。除这些外，组织准备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中共中央1947年8月30日决定，因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现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特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仍由叶剑英担任。自彭德怀1947年3月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后，周恩来即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整个解放战争。

第三，财政经济准备。只有增加解放区的财富，才能支持战略进攻，才是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节。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分局应全力去组织动员群众的生产运动，达到增产粮食、棉花、油料及其他日用必需品。1947年5月9日，新华社发表《同打胜仗一样要紧的事情》的社论，指出“春耕，这是与打胜仗一样重要的事情。”春播一粒种，秋收万石粮。1947年的春耕是全面战争爆发以后的第一次春耕，因而对于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坚持长期战争的胜利，意义特别重大。社论要求“解放区各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要亲自动手来进行这个春耕。争取时间抢耕、抢种，那怕种上一点点也比不种好，多种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07—208页。

一点点也比少种一点点好”^①。

为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董必武任办事处主任。其任务是“调整各地贸易关系，统一各区经济政策和对敌经济斗争，调剂贫富有无，平衡各地人民负担，统一规定各地供给标准，统一计划掌握各地货币发行，稳定各种货币兑换比率，并在这些基础上，逐渐达到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进一步的统一，其它具体工作则完全由各地机动处理。”^②

1947年5、6月间召开了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做出了《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决议指出，“目前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保障战争供给。只要保证了部队的必要供给（衣服、粮食、菜金、弹药、医药、通讯器材及炮兵、工兵的建设费用）及必要的生产建设费用，就算是完成了财政任务。”财政工作不能仅从几百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计出发，而必须从解放区1.9亿人民的生计出发，民富即国富，这是我们与国民党不同之点。决议规定，实行精兵简政，首先精简地方机关人员，充实部队。“在战争期间，部队可占脱离生产总人数的四分之三，地方占四分之一。军费开支可占财政开支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地方费占百分之十五。部队要精简后方机关人员，充实前方”，保证野战部队要占部队总人数的1/2到2/3（能集中起来机动作战的）。要调整战勤。要求战斗部队精确计算，科学使用民力，“做到平时不超过三兵一夫，战时不超过一兵一夫。”

由于交通运输困难，决议指出，执行外线作战任务部队的粮食供给，“主要依靠战争缴获和就地筹措，不应单靠后方补给。”实现“我们的后方是在前线”的口号^③。

① 《人民日报》，1947年5月9日。

② 《华北财政经济会议决议》，1947年6月5日。

③ 同上，1947年6月5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财经机关“坚决实行”华北财政经济会议的决议，结合当地情形，具体检讨和布置今后的工作。1947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就减轻人民负担问题致电各中央局、各战略区首长，指出，“目前群众负担已达最高点，实在不能再加重人民负担了。”“务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不能只顾目前忘记将来，只顾军队忘记人民，是为至要。”^①

第四，军事准备。中央军委要求各野战军，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经费、粮食等物资准备外，强调全体指战员必须“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学习阵地战，学习迂回战术，勇敢的围歼敌人”^②；“必须大力加强炮兵与工兵”^③；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多生产炮弹、子弹、手榴弹、炸药；根据各解放区财政状况和人力状况，编组新的野战纵队和军区地方部队。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分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② 《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对时局口号》，1947年7月7日。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35页。

第二章 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转入战略进攻

第一节 刘邓大军举行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进攻序幕

一、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与鲁西南地区的兵力部署

1947年3月，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南线战场，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地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两翼，面联结这两翼的中央地带晋冀鲁豫战场则兵力比较薄弱，形成两头粗，中间细，像一只哑铃式的战略态势。蒋介石为弥补这个地区兵力不足的缺陷，于3月15日下令在黄河花园口堵口合龙放水，使黄河水复归故道。其目的就是利用黄河的滔滔之水作为他的所谓“四十万大军”，阻挡解放军的南进，实行所谓“黄河战略”。

“黄河防线”被国民党军吹嘘为铜墙铁壁，但由于防线漫长（西起风陵渡东至济南段长约千公里）、兵力有限，加上工事构筑仓促（多野战工事、少永久性工事），形不成坚固的防线。其中，与冀鲁豫解放区相接的沿黄河防线，东起东阿西至开封，长约250公里，仅有第4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2个整编师及地方团队。其部署是：整编第55师师部率第29旅位于郟城、里姑庵地区，第74旅位于郟城以北之肖皮口、蔡家庄、师家集地区，第181旅位于鄆城、临濮集地区。整编第68师师部位于菏泽，第81旅位于东明及其以西地区，第143旅位于菏泽东北之杜集、白庄、刘集

地区，第119旅位于菏泽西南之毕砦地区。其整个部署重点于郓城、菏泽两点。归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顾祝同直接指挥的整编第70师位于嘉祥、济宁地区担任机动。此外，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整编第12师位于运河以东东阿经平阴至长清一线防守；整编第58师另两个旅及地方保安团队在豫皖苏区担任守备；整编第26军等部9个半旅在郑州和豫北地区防守。顾祝同鉴于其主力正用于鲁中地区，被华东解放军缠住，而鲁西南地区及其周围大多是战斗力较弱的杂牌部队，遂确定实施所谓“游击防御”，巩固东阿至开封段黄河防线，并在陇海铁路沿线配置若干机动部队，随时出动。

二、刘邓大军外线作战的准备

人民解放军由在解放区内线作战转至国民党区域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困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以前，困难将是不不少的。”^①为保障战略进攻的顺利实施，中央军委要求担任外线作战的野战军，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准备工作，并就此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1947年1月2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指出，“战略出击须在今年六月或更迟一点，但各项准备工作即须分别轻重缓急开始进行。”该电提出要着重解决以下3个问题：1、提高地方兵团战斗力，以便于能和野战部队一起出击；2、准备大量手榴弹（30万至50万枚）、炸药、炮弹；3、准备15万人3个月以上粮食，“愈多愈好”，其他经费须准备半年至1年，供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0页。

给出击部队^①。2月10日，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凡离开老解放区作战的军队，团以上政治机关皆须添设民运工作部门及宣传队，以便宣传组织群众，检查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建立政权与武装，迅速创造根据地。5月8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刘邓野战军为着能在冀鲁豫、豫皖苏和中原地区“长期立足，全军应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对中央二一时局与任务指示（按：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应作普遍传达。”^②6月3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③

为适应挺进中原的需要，中共中央1947年5月16日批准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建议，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为常委，邓小平兼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李先念为刘伯承的副司令员，随刘、邓一起工作。为加强晋冀鲁豫军区的领导，中央军委于6月13日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原第一、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改任第二、第三副司令员。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仍为刘伯承与邓小平，在刘、邓率野战军主力南征后，军区工作则由徐向前、滕代远、王宏坤和军区副政治委员薄一波主持。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好出征准备的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北、晋南作战后，立即转入休整。5月15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河北武安县冶陶镇召开会议，讨论部署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问题。6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安阳石林村召集各纵队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212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64页。

③ 同上，第91页。

指挥员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出击中原的指示和中央局治陶会议精神，并具体讨论和部署出击中原的各项工作。会议确定由刘、邓率领第1、第2、第3、第6纵队共4个纵队11个旅12.4万余人实施南下作战。

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外线出击的动员报告。他着重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反攻时机问题。报告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反攻时机到了”，这是有根据的。经过一年作战，战局已经起了基本变化。蒋介石统治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蒋管区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变运动，闹得轰轰烈烈。蒋介石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转入战略反攻的条件。

关于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的问题。报告说，在蒋介石采取把战争继续扭在解放区内打，借以保持其统治区人力、物力、财力的战略方针下，人民解放军是让蒋介石巩固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自己，还是人民解放军打到国民党区域去，先剥夺他的兵员、财力，借以扩大解放区充实自己的力量？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摆着的。现在好像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败，你却偏要歇一歇，让他喘口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保守主义的危险性就在这里。

关于出去后能否站稳脚的问题。报告指出，反攻出去，有没有困难，能不能站住脚？有困难，但一定能站住脚。要站住脚，关键要看“三大任务”完成得好不好。三大任务：即打仗的任务，执行财经政策的任务，执行群众工作与土地改革的任务。如果三大任务有任何一项完成不好，都是站不住脚的；三大任务完成了，不要多久就站住脚了，新区很快就会变成解放区。要完成三大任务，首先要在思想上下决心不向后看，即回头看着晋冀鲁豫解放区，要讲战法，要讲政策。

关于美国出兵干涉的问题。报告指出，第一，要明确树立一

个思想，即今天中国人民能够打倒蒋介石，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第二，要敢于鄙视美帝国主义，它是外强中干，20个手指足趾，到处扯起，千疮百孔，漏洞太多。第三，美国出兵援助蒋介石的可能性，确实是有的，但从今天形势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退一万步说，美国政府要那样做，你怕，又有什么用？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整训中，指战员广泛深入地学习了毛泽东撰写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党内指示，新华社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和《全力准备反攻》，以及邓小平的报告，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与此同时，开展了老战士、新战士、解放战士^①三结合的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练兵运动，指挥员则主要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自卫战争以来的作战经验。出征的4个纵队，根据外线作战的要求，整顿了编制；充实了炮兵和汽车运输部队；每个纵队平均补充了8000名翻身青年农民和经过教育、训练的被俘国民党军士兵；筹备了比较充足的武器弹药；收集、绘制、印刷了一批中原地区的地图；加紧了军事训练。

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掀起了支援战争的热潮。工人开展了增产节约竞赛，军事工厂加紧生产炮弹等军用物资，农民抢收抢种，妇女展开了突击织布运动。据晋冀鲁豫军区统计，1947年刘邓野战军出征时，携带的经费、被服、弹药、装具、通讯器材，折合小米，共5731万公斤。全区各级政府还动员组织了8万民兵、民工准备随军南征，抽调千余名地方干部准备随军南下开辟新区工作。

为支援刘邓大军顺利地渡过黄河，1947年2月，冀鲁豫区党委成立了黄河河防指挥部，着手下面的工作：集中黄河沿岸第2、第5、第6军分区武装，守护濮县至东阿河段黄河北岸的堤坝，负责黄河南北交通和河防安全，加紧修复黄河大堤；在沿河设立船

^① 解放战士，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管所，共修理旧船、营造新船约 300 艘大小木船（大船可载 2 辆 10 轮大卡车，小船可载二三十人）；征调、训练了 7 个县的约 3000 名船工和水手。

晋冀鲁豫军区除第 1 纵队（辖第 1、第 2、第 19、第 20 旅），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第 2 纵队（辖第 4、第 5、第 6 旅），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王维刚；第 3 纵队（辖第 7、第 8、第 9 旅），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第 4 纵队（辖第 10、第 11、第 12、第 13 旅），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第 6 纵队（辖第 16、第 17、第 18 旅），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杜义德；第 38 军（辖第 17、第 55 师），军长孔从周、政治委员汪锋等 6 个纵队 1 个军外，为适应外线出击与内线作战的要求，晋冀鲁豫中央局与军区 7 月 2 日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主力及撤至晋冀鲁豫军区的原中原军区部队，依次编成第 8、第 9、第 10、第 11、第 12 等 5 个纵队。第 8 纵队（辖第 22、第 23、第 24 旅），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第 9 纵队（辖第 25、第 26、第 27 旅），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第 10 纵队（辖第 28、第 29、第 30 旅），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刘志坚；第 11 纵队（辖第 31、第 32、第 33 旅），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霖芝；第 12 纵队（辖第 34、第 35 旅），司令员赵其梅、政治委员文建武。全野战军 11 个纵队又 1 个军，共计 28 万人。另有军区部队 14 万人，民兵 90 余万人。

三、突破“黄河防线”，夺取郭城、定陶

黄河是中国历史上一条最不驯服的大河，是横断神州南北交通的拦路虎，如今又成为刘邓大军南下必须克服的第一个大障碍。为保证南下首战、即强渡黄河的成功，6 月 22 日，野战军司令部发布由刘伯承亲自拟制的《敌前渡河战术指导》，指出：此次渡河实施前的情况是，“一、处于夏汛前的水势；二、处于敌人刘汝明部（曾屡被我击败者）在南岸宽达三百多华里上组织河防封锁状况之下；三、处于南岸老解放区游击战争有力掩护之下；四、处

于我早经准备渡河器材状况之下。”即是说，客观条件有利于强渡黄河。为确保渡河的成功，《指导》要求“一切准备工作，以便于登陆作战为主眼”。具体是：察明南岸敌人河防体系、河之两岸地形，具体计算各渡口船只数量、容量、每船往返时间和部队上船登陆要多久等。在北岸（我岸），清查户口，肃清敌人间谍，封锁消息。规定渡河规则，普遍教育人人遵守。关于渡河的战术，《指导》要求：“我南岸部队（包括地方武装及民兵）应背击河防之敌，先肃清妨碍我渡河点河岸之敌，以掩护我军主力渡河登陆。而我军主力应遵照战斗命令，力求先头秘密渡河，为使敌人防不胜防，各纵队尤应乘夜间黑暗，突然同时实行宽大正面的渡河（每纵队有两三个渡河点最好），务期抓住敌人之弱点，突破其纵深而贯穿之，再由敌侧背力求由南向北果敢兜击敌人，压迫敌人于河岸，各个歼灭敌人大部或一部。”为加强渡河的组织工作，《指导》规定：“纵队及旅为单位，各设渡河指挥机关，并指定渡河司令员，专司部队渡河事宜”，“各部队首长，必须亲自临场，在渡河司令员指导下，亲自指挥自己部队，遵守秩序的渡河。”^①

《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下达后，刘邓大军从野司到纵队、旅迅速成立了各级渡河指挥部，并依据《敌前渡河战术指导》规定的原则和措施，组织部队进行渡河作战的思想、组织和技术战术等准备工作，并对预定渡河点的地形、交通、气象、敌情、民情等作了详细的调查，制定出具体的对策。

6月20日、26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鲁西南作战基本命令》和《补充命令》，决心以第1、第2、第3、第6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从东起张秋镇西至临濮集地段上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作战。其部署是：全军分3路渡河。东路，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旅先期秘密渡河，尔后会同郓城地区地方武装进至戴庙至孙口段黄河南岸地区隐蔽，掩护第1纵队渡河；以第1纵队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5—379页。

分由魏山、张堂、林楼诸渡口渡河，尔后向郓城以东以南地区急进，会同独立第1旅割歼郓城之国民党军。西路，以原在黄河南岸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2旅结合鄄城地区地方武装，先期围歼皇姑庵之国民党军，尔后进至旧城集至临濮集地段隐蔽，掩护第6纵队渡河；以第6纵队分由濮县东南之李家桥、于庄、大张村诸渡口渡河，尔后会同独立第2旅割歼鄄城及其以北地区国民党军。中路，以第2纵队分由孙口、林楼渡河，协同第1纵队兜歼郓城守军，防其向西南逃窜。第3纵队为战役总预备队，视情况尾第6纵队或第2纵队渡河扩张战果。战役计划于6月30日夜发起。

为保障渡河作战的秘密性、突然性，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在豫北伪装主力发起攻势作战；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出击，转移国民党军事当局的视线，麻痹当面之敌。

6月23日，刘邓大军由安阳地区相继出发，隐蔽、迅速地向150公里外的鲁西南渡河地点开进。30日，野战军指挥部抵达山东寿张。

这时，国民党军统帅部对刘邓大军可能南下之举有所察觉，但对其南进的时间和方向判断不明。当刘邓大军南进时，蒋介石却命令王仲廉集团由滑县北进安阳，恰好与刘邓大军南辕北辙，越高越远。担任鲁西南河防重任的整编第55、第68师，也沉醉在“黄河防线”牢不可破的美梦里，戒备松懈。指挥官刘汝明则到了郑州。

6月30日夜，刘邓大军第1、第2、第3、第6纵队的8个旅，在21个炮兵连，山炮、野炮、榴弹炮62门支援下，从魏山、张家堂、林家楼、孙口、林楼、李桥、于庄、大张庄8个渡口同时强渡黄河。这时，黄河尚未进入汛期，但河宽仍有500至1000米，水深达四五米，水流湍急。首批渡河部队，在北岸炮火的掩护和南岸部队的接应下，乘守敌猝不及防，乘风破浪，直指南岸，最快者仅用了5分钟。当晚即渡过6个旅，在接敌正面一举取得了

兵力优势。

刘汝明接到刘邓大军已过河南进的报告后，即令整编第55师收缩兵力，死守郟城，等待援军。至7月1日凌晨，该师第74、第29旅全部缩入郟城。整编第68师主力、整编第55师第181旅放弃郟城，退守菏泽。号称能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一个夜晚就被刘邓野战军从中央突破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顷刻间灰飞烟灭。

刘邓大军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之势，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标志着胜利地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朝野上下受到强烈震撼。7月11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对记者说：“共军刘伯承回窜鲁西，对战局稍有影响”^①。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在日记中写道：“余月来最担心之情况，今日出现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其为“六卅事件”，认为“六卅事件决非好兆头”^②。蒋介石为迅速堵塞南线战场中央出现的缺口，拱卫战略要地徐州、郑州，匆忙向鲁西南地区增兵：从豫北调整编第32、第66师，从碭山调整编第63师第153旅，从豫皖苏地区调整编第58师2个旅，并将第2兵团司令官王敬久由鲁中战场的泗水调来，统率上述部队及嘉祥地区的整编第70师。并以其主力由陇海铁路黄口、碭山之线分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同时，令刘汝明部死守郟城、菏泽。

7月4日，整编第63师第153旅进抵定陶，与准备退守菏泽的刘汝明部组成西路军（左路）。同日，整编第32、第66师主力进抵单县以南地区，经金乡会同整编第70师组成东路军（右路）。与此同时，整编第58师进至金乡会同整编第66师第199旅担任后应。蒋介石的企图是：以一部死守郟城、定陶，吸引刘邓大军

① 《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7月12日。

② 董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页。

屯兵城下，陷于久攻不克、进退维谷之险境；而后以其主力东路军从巨野地区向西拊击刘邓大军侧背，与西路军合拢，造成东西两路钳击刘邓大军于陇海路、黄河、运河三角地带的态势，迫使刘邓大军背水作战，或退回黄河北岸。

7月4日夜，在黄河北岸指挥渡河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野司和后勤部队从孙口渡过黄河。刘、邓冷静地分析当面敌情，识破了蒋介石的企图，认为：西路国民党军具有明显弱势，因恐被歼，不会主动出击；在定陶的第153旅立足未稳。东路国民党军实力较强。据此，刘、邓决定乘东路援军未到之际，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①，首先歼灭西路援敌，夺取郓城、定陶、曹县。尔后，集中主力伺机各个击破东路援敌。其具体部署是：以第1纵队4个旅围攻郓城；以第2、第6纵队从郓城、菏泽之间向西南猛插，其中以第6纵队和第2纵队1个旅取定陶，以第2纵队2个旅夺取曹县，割断王敬久东西两军之联系；以第3纵队经皇姑庵、沙土集直插定陶东南的冉固集、汶上集地区，威胁东路援敌侧背，策应郓城和定陶作战；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2旅进至郓城、巨野之间地区待机。

郓城是鲁西南地区的一座古城，是国民党军的重要据点。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后，郓城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对刘邓大军而言，攻打郓城可吸引国民党军主力来援，伺机各个击破；对国民党军来说，守住郓城，可吸引刘邓大军于城下，有利于东西两路援军的钳击。防守郓城的整编第55师是西北军旧部，战斗力不强。但郓城的城防工事较坚固：有一道环城砖质城墙，高7米、宽3米；城墙下有一道3至5米宽、2至3米深的护城壕；壕外主要地段，每隔3至5米设一道鹿砦；城内构筑有地堡、暗堡。第29旅守城东南，第74旅守城西北。

第1纵队针对郓城守军防御特点，采取“收其外围，剪其羽

① 《刘伯承军事文集》第584页。

翼；诱敌深入，适时攻势”的战法。7月4日黄昏，第20旅在炮火掩护下，向南关发起攻击。不到30分钟，即歼第29旅1个团。同时，第1旅攻占西关。此时，奉命来援的整编第70师因受阻，滞留于巨野附近。6日晨，第2纵队第6旅收复曹县。至此，郟城守军获援无望。

7日18时，第1纵队借夜幕发起总攻。经一夜激战，至8日5时许，全歼整编第55师师部及2个旅1.1万人。其中，俘中将副师长理明亚以下8300余人，毙伤2500余人，另俘虏地方团队2000余人。该师师长曹福林率2个旅长百余人由地道逃往嘉祥。第1纵队伤亡1928人。12日，刘伯承、邓小平通令嘉奖第1纵队的突出战绩，称赞其“争取了大反攻中的第一个光荣和重大的胜利”^①。并指出这次战斗取胜原因是：敌军士气低，炮火弱，我军士气高，炮火强；敌因散乱撤回守城，防御体系残缺，我军攻城准备充分；突击点选在敌人不意之处；步炮协同较好。

在第1纵队进攻郟城的同时，第6纵队向定陶发起了进攻。定陶是国民党军在鲁西南地区的又一重要据点，防守该城的是刚从豫北调来的整编第63师第153旅，属粤系，战斗力不强。但其依托城垣和城外土堤构筑起多道工事和障碍，企图负隅顽抗。5日拂晓，第6纵队第16、第18旅抵达并袭占了定陶城外四关，至9日，肃清定陶外围之敌。10日19时，发起总攻。在炮火的支援下，第16旅从东门、第18旅从北门迅速登上城墙，突入城内，将守军分割成数块。经5小时激战，攻占定陶，全歼守军。是役，第6纵队伤亡397人；俘虏国民党军3130人，毙伤200余人，共3300余人。

定陶战斗中，人民解放军著名战斗英雄、带兵模范、第6纵队第18旅52团排长王克勤英勇牺牲。王克勤，1939年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1945年10月被解放参加人民解放军，1946年加

^① 《鲁西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入中国共产党，他创立了思想、技术、生活三互助的带兵方法，对带领新战士，团结改造解放战士起了很大作用。人民解放军全军开展了学习王克勤运动。7月18日，刘伯承发表《悼念王克勤同志》一文，赞扬：“王克勤同志一年来建立了很多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的崇敬。”为了永远纪念这位英雄，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授予王克勤生前所在排为“王克勤排”、所在班为“王克勤班”的光荣称号。号召晋冀鲁豫野战军全军“学习王克勤同志，并为继续开展王克勤运动而奋斗，一直到歼灭全部进犯军。”^①

自7月1日至10日，刘邓大军在渡河后10天内，连续取得郟城、定陶等战斗的胜利，开辟了北起黄河南岸的郟城、鄆城，南抵陇海铁路北面定陶、曹县的广阔战场，摆脱了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四、激战六营集、羊山集

郟城、定陶失守后，顾祝同判断刘邓大军下一步可能东越运河，策应华东野战军进攻鲁中，或南进陇海路直趋徐州，他连电督促王敬久速赴鲁西南指挥作战。王敬久赶到鱼台后，判断刘邓大军将西取菏泽，或东取济宁，遂令整编第70师开到六营集（位于巨野东南15公里），整编第32师开到独山集（位于巨野以南、金乡西北七八公里），整编第66师（欠第199旅）开到羊山集（位于金乡西北15公里）集结待命，他自己率司令部及炮兵营进驻金乡指挥，并令第199旅在金乡城北万福河南岸防守，归其直接指挥。这样，王敬久兵团主力3个师在巨野东南约50公里地段上，自北向南摆成了一条长蛇阵。

7月10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如能歼灭七十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80页。

陇海作战，似属有利。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①刘、邓根据上述指示，对当面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认为，王敬久兵团主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短时间内难于对我形成强大攻势；王部各师原属不同单位，作战配合不易，除整编第66师是蒋介石嫡系、战斗力较强外，其他均属杂牌、战斗力不强；而且集结位置不佳，除羊山集外，都是野外小村镇，地窄兵多，施展不开，不利其发挥装备优势；鲁西南是老解放区，人民群众拥护解放军，国民党军在此得不到情报；更重要的是王敬久对我情况不明，心怀恐惧，指挥犹豫不决，行动畏首畏尾，队势配置大逆常理，长蛇阵首尾难于兼顾，进退不便，便于我各个击破。据此，刘伯承、邓小平于10日下午报告中央军委：“拟打现在金乡嘉祥间野外之六十六师，三十二师，七十师。”11日，刘、邓下达歼灭王敬久兵团的命令，并决定采取“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的战法。其部署是：第1纵队由郛城地区经巨野以东南下，楔入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之间，切断整编第70、第32、第66师的联系，割歼独山集整编第32师；尔后进攻整编第70师。第6纵队由定陶经张凤集向东，与第1纵队对进，协同第1纵队歼灭整编第32师。第2纵队由曹县地区向东，首先歼灭谢家集的守敌1个团，尔后协同第3纵队割歼羊山集之整编第66师。第3纵队从汶上集地区插至羊山集以南、以东地区，割歼整编第66师主力。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2旅进至万柳河北岸，阻击金乡之整编第58师等部北援。

7月12日3时，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纵队进抵巨野、嘉祥之间地区。该纵以第19旅进至核桃园及其西南地区，控制羊山集至独山集的公路，割断整编第32师与整编第66师的联系；第2旅进至曹楼、鹿湾、狼山屯地区，截断六营集和薛扶集至独山集的交通，割断整编第32师和整编第70师的联系；第1旅进至陶官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31页。

屯、张家庄、油房、三官庙地区，由西向东协同第2旅包围歼灭六营集之敌；第20旅（欠第59团）进至十里铺、马官屯地区，截断敌退路，并阻击可能从济宁方向来援之敌；第59团、纵队骑兵团经何庄、卞庄、姚楼进至杨刘桥地区。

12日夜，各旅从整编第70师翼侧实施穿插、分割。整编第70师发现处在解放军包围后即龟缩于六营集内。这时，尚在老家金乡庆贺新居落成的王敬久觉察出形势不妙，急令在六营集的整编第70师立即南撤与独山集的整编第32师靠拢，避免被各个击破。整编第70师向六营集南面突围受阻后，改由整编第32师由独山集、鹿湾向西北突围，靠拢六营集，并拟从嘉祥、济宁方向撤退。

7月13日，整编第32师一出独山集，第1纵队即对其展开猛烈的追击、侧击、兜击。但由于兵力不足，使得该师师部和第141旅沿鹿湾、郝庄西侧，于傍晚进入六营集，和整编第70师会合。该师第139旅经五桥、宋楼北窜途中，于14日晨被第1纵队第19旅、纵队骑兵团和第6纵队第18旅歼灭。至此，整编第70、32师2个师部3个半旅被包围于六营集内。

六营集是一个仅有200余户居民的村子，缺粮少水，房屋多为土筑、不堪炮击；时值盛夏酷暑，数万国民党军麇集于此，人、马、车挤作一团，加上争粮抢水，未战先乱，陷入困境。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紧急命令，指定整编第32师师长唐永良统率守军，向羊山集突围。14日，整编第70、第32师由六营集东南方向突围未逞，蒋介石改令其死守待援。

第1纵队决定采用“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的战法。因为如果包围圈过紧、过死，守敌将作困兽之斗，如将四面围攻改为“围三阙一”，则可纵其突围，于运动中歼灭之，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胜利。据此，第1纵队主力在六营集以东通往济宁纸坊街以西的陶官屯、王庄、夹营一块约5平方公里的开阙洼地，布成口袋阵地，准备围歼突围之敌。第1纵队一部和第6纵队主力从北、西、南3面强攻六营集，敞开东面，诱迫其向东突围。7月

14日20时，第1、第6纵队从北、西、南3面同时向六营集实施猛烈攻击。1小时后，守军果然利用夜幕和青纱帐作掩护，以整编第32师为左路、整编第70师为右路，由六营集东面冲出，向济宁方向突围，钻进了第1纵队预设的口袋，遭到迎头痛击，顿时竞相逃命，溃不成军。至15日8时，仅整编第32师师长唐永良率一部逃往济宁，其余全部被歼。

六营集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1.9万人。其中，击毙第139旅旅长唐化南以下3500余人，俘虏整编第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少将副师长罗哲东以下1.5万余人。

六营集战斗后，蒋介石认为，刘邓大军虽屡胜，但连日作战，已是强弩之末，只要整编第66师在羊山集顶住，等各路援军一到，即可一举将其击败。因此，蒋介石把固守住羊山集作为扭转鲁西南战局的希望，遂一面令整编第66师师长宋瑞珂死守羊山集，一面敦促各路援军加速向羊山集增援。陆军总部徐州司令参谋长郭汝瑰在日记中写道：“羊山集命运决于此数日内，如共军不能将其攻下，则鲁西会战共军即系失败。”羊山集战斗胜败，对刘邓野战军关系甚大。如能迅速攻下羊山集，则可继续掌握战场主动权。反之，如羊山集打不下来，必将处于应战的被动地位。因此，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集中兵力，迅速夺取羊山集。

鲁西南地区基本上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独在金乡、嘉祥间耸起数处小高地，羊山即是其中之一。因其形状像一只坐西北、面东南昂头蜷卧的大公羊，故得此名。其中，东面是“羊头”，北面（即山的中央）是“羊身”，西面是“羊尾”。羊山集是位于山南脚下一条东西长约2.5公里的上千户人家的大庄子。周围是明末时筑成的寨墙，寨墙东、南、西三面有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留下的丈余深的壕沟。自6月以来，这一地区多大雨，壕沟被雨水灌满。7月8日，整编第66师进抵羊山集，即利用羊山集三面环水、一面临山的有利地形，赶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其部署是：第185旅守备羊山集，第13旅配置在羊山集西北侧葛岭以南的小村庄担

任机动。宋瑞珂日夜加修工事。因连日大雨，交通沟内水深齐腰，严重影响解放军的行动。

从7月15日开始，刘邓大军第2、第3纵队攻击羊山集，至17日乃未奏效，且伤亡不小。19日，第6纵队第16旅赶到羊山集以北地区参战。就在这一天，蒋介石飞赴开封督战。他严令宋瑞珂死守待援，严令王敬久立即率尚在金乡的整编第58师和第66师第199旅北渡万福河解羊山集之围；同时，他还从西安、潼关抽调整编第10师、骑兵第1旅，从洛阳抽调青年军第206师，从豫北抽调整编第40师，从武汉抽调整编第52师第82旅，从鲁中抽调整编第5、第7、第48、第85师，驰援鲁西南。

刘伯承、邓小平决以第2、第3纵队和第6纵队第16旅，围攻羊山集；以第1纵队第19旅和冀鲁豫军区部队，首先在万福河北岸阻击由金乡北援之整编第58师和第66师第199旅，尔后在正面放开一缺口，诱使第199旅过河，切断其与整编第58师的联系，集中第1纵队和第6纵队第17、第18旅将其歼灭。

20日3时，刘邓大军对羊山集再次发起进攻。第3纵队第8旅占领羊头；第9旅一度攻入庄内，接近庄子正北面的羊身，拂晓时，遭守军的强大火力猛烈反击被迫撤出。第6纵队第16旅2个团于19日夜一度攻占羊山东北2个小山头，旋遭守军反击，退至山腰。20日夜，该旅继续进攻，占领了山脚几座碉堡，并就地赶筑工事，作为再次进攻的依托。第2纵队稳扎稳打，向羊身和庄内徐徐推进。

眼看刘邓大军愈聚愈多，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宋瑞珂再也沉不住气了，连连向徐州方面呼救。顾祝同和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先后派飞机到羊山集上空投掷救援物资。20日，王敬久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下，令整编第58师、第66师第199旅，从金乡出发北援羊山集。当其进到万福河南岸的时家店时，遭到第3纵队 and 冀鲁豫军区部队的阻击。22日，王敬久限令第199旅旅长王仕翘于当晚进入羊山集，否则即以军法从事。王仕翘率所部5000

余人于当日渡过万福河北进。宋瑞珂闻讯，派出 1 个团南下接应。这时，正值大雨，战地泥泞。当王仕翘部进到羊山集南韩楼、前刘庄地区时，即遭到第 3 纵队等部围攻，经 2 个小时激战被全歼。王仕翘被俘后说：“昨晚我算了卦，知道今天不吉利！”^①万福河南岸正准备渡河北上的整编第 58 师见第 199 旅被围攻，惧于被歼，连忙缩回金乡。

羊山集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原来只携带 6 天粮食，到此时粮弹均竭，赖吃马肉维持，内部十分慌乱；各路援军人数虽多，但或被阻挡，或尚在途中，或消极观望。刘邓大军则连战皆捷，士气高涨，而且可以集中全部主力于一个方向作战，完全有速歼羊山集守敌的把握。据此，刘、邓决定以第 2 纵队第 6 旅由西向东；以第 3 纵队第 7 旅、第 6 纵队第 16 旅由北向南；以第 3 纵队第 8 旅由东向西，从三面发起攻击。并调野战军榴炮营和第 1 纵队炮兵团加强火力。兵力上达到了 10 : 3 的优势。7 月 25 日，蒋介石发电报给深陷绝境的宋瑞珂，“羊山集苦战，中正闻之，忧心如焚，望吾弟转告部下官兵及诸同僚，目前虽处于危急之际，亦应固守到底，希吾弟赖上帝庇佑，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利。”但是，“上帝”也保佑不了宋瑞珂。27 日 18 时 30 分，刘邓大军对羊山集发动总攻，至 28 日夜，攻克羊山集，俘虏中将师长宋瑞珂以下 9228 人，毙伤 5000 余人，共 1.4 万余人。

羊山集战斗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宋瑞珂。他感叹道：“你们包围得太紧了，简直是无路可走。炮火猛烈得使我们抬不起头来。”他抱怨，蒋介石的援兵“不过最一纸空文”，并指责王敬久“指挥无能”^②。郭汝瑰无限感慨，他在 28 日日记里写道：“宋瑞珂在此支持两星期之久可谓难能。王敬久以两师距宋 10 公里面不能救，王仲廉 22 日即已集中完毕开始前进，徘徊于冉垌

①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5 页。

②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 年 8 月 10 日。

集数日，如两王均于 24 日以后真面目攻击，则局面必大异于今日，余深知国民党腐败，王仲廉等均只知弄钱。”^① 为了推卸责任，平息朝野上下对鲁西南战局失利的不满，同时杀鸡给猴看，蒋介石将“增援不力”的第 4 兵团司令官王仲廉撤职查办，遗职由罗广文接替。此外，还将从六营集逃出的整编第 32 师师长唐永良以“临阵脱逃”罪，关进监狱。

在鲁西南战役期间，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豫北地区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 5000 余人；豫皖苏军区部队在豫皖苏地区发动攻势，歼灭国民党军 6000 余人；华东野战军一部在津浦路泰安、滕县间及其以西地区发动攻势，牵制了山东战场之国民党军。这些均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的作战。

鲁西南战役历时 28 天。刘伯承、邓小平巧妙调动国民党军，适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共歼灭国民党军 4 个整编师师部及 9 个半旅约 5.6 万人，击落飞机 4 架，缴获坦克 2 辆、炮 827 门（内野炮 12 门、山炮 52 门）、机枪 1483 挺、手提机枪 404 挺、长短枪 1.3619 万枝、子弹 100 余万发、汽车 56 辆、电台 44 部、骡马 2168 匹^②。此外，还收复了黄河南岸大片地区，解放了数百万群众。

鲁西南战役，是刘邓大军外线出击、进军中原的首战。它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迫使其从陕北、山东、豫北各地抽调 8 个整编师驰援鲁西南，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山东两战场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作战，提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并为刘邓大军下一步跃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7 月 29 日，中共中央对刘邓大军的辉煌战绩，予以通令嘉奖。毛泽东指出，这个伟大的胜利，“足与今年二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歼敌四个师部十二个整旅的记录及今年五六月东北人民解放军

① 《郭汝瑰日记》。

②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7 年 8 月 4 日。

在中长路吉沈路等处歼敌八万的记录相比美。”^①

鲁西南战役的主要经验是：1. 强渡黄河后，乘鲁西南敌人兵力薄弱，迅速夺取了郓城、定陶、曹县，开辟了有利战场；2. 紧紧抓住并利用敌人逐次增兵的弱点，组织连续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来援之敌；3. 采用“围三阙一”战法，力求于运动中歼敌，在攻城时，做好充分准备，发挥步炮协同的威力。

第二节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一、跃进大别山的决策和部署

中共中央 1947 年 5 月 4 日提出，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以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津浦路以西，潼关、南阳之线以东为机动地区，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有依托地逐渐向中原地区推进。7 月 10 日和 13 日，中央军委要求刘邓大军在陇海路北多打几仗后，“举行陇海作战”，并“准备向陇海路以南发展。”争取在内线多歼敌人，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此后，刘邓大军久战羊山集不下，而国民党援军从多路扑向鲁西南，对刘邓大军呈合击态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当时整个战局，为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作出了历史上少见的决策，即不要后方，实行跃进式进军。7 月 23 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华东野战军 2 个纵队（叶飞

^① 《胡乔木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05 页。

纵队、陶勇纵队)南渡长江,到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①。7月27日,又致电刘、邓,“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电(指7月23日电)任务。”并提议刘邓大军8月15日左右南进,陈谢集团8月20日前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如此,“可能取得几个星期时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②

对上述意见,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均做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与建议。7月27日,陈、粟致电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电文称:目前国民党在华东、晋冀鲁豫两战略区能机动作战的有16个整编师,其中还要留下4至6个整编师担任第一线守备,真正能机动者为10至13个整编师约30个旅左右,“如果我们能在内线再歼其机动旅十至二十个,将对外线歼敌有极大之便利。而要求得在内线歼敌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捕捉战机。此次刘邓大军在鲁西南歼敌,即完全证明在内线大量歼敌完全可能”。陈、粟认为,迅速插入敌后作大发展能够逼敌迅速回头,减轻正面的压力及解放区人民的痛苦,但完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在目前之大规模作战是困难太大。基于这些理由,他们建议,再在内线作战1个月至雨季过去,解决了棉衣,然后南进便利较多。在大军未南下前,派出若干先遣队进入大别山及闽浙赣。

7月28日,刘邓大军攻克羊山集的当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二十三日电奉悉。因作战未即复。我们完全拥护所示方针,唯有如下困难。”第一,南渡后连续作战,“战果不小,但消耗甚大”,炮弹消耗殆尽,无法补充,新兵没有,俘虏多,争取补充至少需要20天。第二,原打算第一步依托豫皖苏区尚能保持后方接济,故所带经费只有法币十数亿元,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冬衣难发。刘、邓分析战场情况后说:“我们当前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47—148页。

② 同上,第152页。

有敌十几个旅，战力均不强，山东敌难西调鲁西南，因此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再消灭其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

陈、粟，刘、邓均主张仍在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推进。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十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7月29日致电刘、邓、陈、粟、谭、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并告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但同时强调指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①

7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并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东局等：“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电方针，确好顷奉艳电（即7月29日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为确保南下行动，刘、邓请求在8月15日前由山东渤海区调给1000发山炮弹，由晋冀鲁豫区设法安排1万名伤员并拨给一部分经费。同时，建议在鲁西南地区的华东野战军拖住该区域之国民党军，并从山东抽调原中原军区皮定均旅到大别山^②。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鲁西南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58页。

^② 《从延安到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歼敌 9 个半旅后，下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①“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②

中央军委在 7 月 30 日酉时（17~19 时）复电中指出，“午陷电悉。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四）如皮定均旅一时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纵（按，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12 纵队，纵队司令员赵基梅）使用于大别山。”^③

从 7 月 23 日中央军委提出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的建议，到 7 月 30 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直趋大别山”，实行宽大机动的无后方作战，这一关系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就定下来了。

8 月 2 日^④，刘伯承、邓小平在郟城以南赵家楼野战军司令部召集各纵队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南进问题。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9 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60 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162 页。

④ 关于这一时间，有多种说法：时任第 3 纵队司令员的陈锡联说是 8 月 1 日至 2 日，时任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张生华说是 8 月 6 日，李曼村等主编的《刘伯承传》说是 8 月 2 日，第 1 纵队 1947 年 9 月 10 日致中原军区报告称：8 月 3 日，“由野司领回中原五十分之一图五十七份，”令部队“于三日内完成行动准备”。“8 月 2 日说”可能较大。

李达参谋长介绍了战场总态势，并通报了华东野战军的5个纵队已到达郟城、巨野地区。他指出，这5个纵队虽已进抵鲁西南，但因连续行军、作战月余，部队疲劳急须休整，立即与我军联手打大仗困难较多；鲁西南地区近口多雨，黄河水涨，可能决堤。因此，必须迅速决断是继续留在鲁西南还是立即南下大别山。刘伯承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因此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当前敌集重兵于鲁西南和陇海路，企图与我决战。我们也曾考虑在鲁西南再打一仗，再歼灭它几万人。但当前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是我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所以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以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效。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党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①

会议研究了跃进大别山的具体部署，确定部队分3路南进：第1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右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周家口、上蔡之线以西直奔豫南；第3纵队为东路（左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以东直奔皖西；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率第2、第6纵队为中路，沿单县、虞城、亳县、界首、临泉之线以西南进；南下工作团的千余名地方干部分随各纵队行进。此外，第11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造成刘邓大军北渡假象，以迷惑、吸引国民党军。

为保证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行动的成功，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第1、第3、第4、第8、第10等5个纵队，暂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同时，令陈毅、粟裕率第6纵队及特种兵纵队，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上述各纵队，箝制鲁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毛泽

^① 《刘伯承传》第390页。

东强调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该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陈唐叶陶应在郢巨地区从速休整，待刘邓出动时即积极动作，勿误时机。”^①

8月6日，中央军委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抓紧时间休整，争取在8月15日以后出动。“你们南出前不要企图再打一仗，南出后在沙河以北亦以避免打大仗为宜。”^②同时，对刘邓大军出动后可能遇到的敌情作了分析，指出：“你们对于出动后敌之可能对策估计如何？我们觉得敌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估计可用于进攻者约十二个旅（或较多）左右，……敌此种办法的基本缺点，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敌很怕此着）。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除上述十二个旅（或较多）外，并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共二十几个旅，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中央军委要求刘伯承、邓小平，“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中央军委指出，如果南出的刘邓、陈谢两军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那么，这次战略出击“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

^① 《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0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73页。

价更加值得。”^① 对上述估计，刘伯承在1948年4月17日《关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问题》报告里作了如下概括，他说：“跃进的任务是一个险关，毛主席当时就给我们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内围打转转；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②

在刘邓大军加紧进行南进准备之际，鲁西南战场形势发生了对刘邓大军的不利变化。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虽在鲁西南一战损失惨重，但大部均非他的嫡系主力，而刘邓大军损失不小，且久战疲惫不堪，一时难于再战，必定要在郓城、定陶、巨野地区休整。因此，他决定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歼刘邓大军于上述地区。8月6日，张淦纵队（整编第7、第48师）由民权进至定陶、曹县之间地区；罗广文兵团（整编第3、第40师及骑兵第1旅）由定陶进至红船口、临濮集地区；第4绥靖区刘汝明整编第68师由菏泽进至鄄城以南地区；王敬久兵团整编第58师由金乡北进至巨野以南地区；整编第85师由汶上、济宁间渡运河西进；整编第5、第84师由袁口西渡运河，构成钳击的态势。

这时正值雨季，黄河水猛涨（8月2日黄河深口水位由2米增至30.3米，每秒流量达2034立方米），黄河南岸老堤随时有决堤危险。有关决堤的流言四起，闹得鲁西南地区数百万人民一日数惊，人心不宁。蒋介石在部署合围刘邓大军的同时，确曾令其空军准备随时轰炸鲁西南黄河大堤，令整编第68师师长刘汝珍在危急时掘开开封附近河堤，企图以当年对付日本人的方法对付自己同胞，水淹刘邓大军。

军情紧，水情急。刘伯承、邓小平断然决定结束休整，立即南进。8月7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邱清泉、欧震主力昨日已过运河以西，罗广文兵团同日占临濮集东北之郑家营，其目的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70—171页。

^②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02页。

为郟城，估计明日可到达。我已以宋时轮王秉璋两纵队与敌保持小接触，迷惑敌人。我两主力已向南转移，宋王两纵亦适时转至敌侧背或外线。我们即顺此态势南下。”^①此时此刻的心情，40多年后邓小平对其亲属说：“我这一生，这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②

中央军委收到刘、邓8月7日电报后，于8月9日2时复电指出，“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③8月10日，又致电刘、邓指出，“在敌主力东迫郟城、西迫鄆城情况下，我在郟巨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④并要求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所部照刘邓7日电，第一步在陇海路两侧，第二步在陇海路南，第三步转到鲁西南内线活动，掩护刘邓大军南进。

二、千里跃进大别山

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乘各路国民党军合围圈将拢未拢之际，兵分3路，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一）跨越陇海路

左路，第3纵队出发时正处于北进之罗广文、王敬久两兵团之间。为免于纠缠，该纵先向西南避开独山集、羊山集之国民党军，尔后向南经成武、单县间南下，于11日晨进抵陇海路以北之郭村。是夜，先遣队第7旅攻占陇海路马牧集车站，并破坏了该站东西段铁路和桥梁，掩护纵队主力于12日越过陇海路。

右路，第1纵队、中原独立旅7日19时，从马楼和孟庄间约8公里宽的地段上，乘隙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线，8日拂晓进至定陶、成武之间地区宿营。10日，纵队主力进至陇海路北之胡集、龙门寨、褚庙店地区，11日夜由柳河镇、民权间越过陇海路，进

① 转引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4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第560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17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3页。

至睢县东北之和楼及其附近地区。

中路，第6纵队一部，于8日在成武以西九女集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1个营。11日，中原局、野直、第2纵队，在虞城古心集附近越过陇海路。12日，第6纵队也顺利越过陇海路。

刘邓大军在北有滔滔黄河横断，东、南、西三面有国民党军10几个旅重兵围堵的险恶环境下，金蝉脱壳，突然南进，这大大出乎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意料。8月7日，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错误判断：“共军主力似已北渡黄河，如未能渡过，则明日必在郟城一带发生战斗”，如此，“山东战事似已接近尾声。”^①8日，获悉刘邓大军向南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之行动，“已甚明朗”，顾祝同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慌忙下令，“邱清泉部仍向郟城以北、罗广文部向郟城、吴绍周纵队南下与王敬久兵团向西南攻击，张淦部向东南进攻”^②，企图将刘邓大军消灭于郟城、定陶之间。当刘邓大军已经迫近陇海路时，顾祝同于10日把王敬久、吴绍周、罗广文等部均用于正面追击，而令张淦部及骑兵第1旅在野鸡岗、民权一带堵击，令第6绥区司令官周晷指挥整编第66师残部、暂编第24师及伞兵总队在陇海路附近伏击。这个部署不谓不佳，可是已时过境迁，刘邓大军已经越过陇海路奔驰南下了。国民党军统帅部未能及时判断刘邓大军南下行动的主要原因，一是对刘邓大军在鲁西南作战月余后未及充分休整、未与后方建立巩固联络的情况下，会做出大胆南进的决心估计不足；二是由于刘邓野战军对南下行动严格保密，使其毫无党察。当时，国民党军曾派几十部电台侦听刘邓大军电台讯号。但刘、邓对此早有防备，令所有电台一律停止使用，致使国民党军两眼漆黑、两耳失聪。

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后，马不停蹄，兼程向南疾进。途经的

① 《郭汝瑰日记》，1947年8月7日。

②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3册，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89年编印，第631页。

黄淮平原，河道纵横，几乎没有像样的公路。时值盛夏，暴雨频频，河溢渠溢，路毁堤垮，行人一步一趔，装备屡屡陷入淤泥；白日骄阳似火、酷暑炎炎，傍晚大雨倾盆、凉风嗖嗖，一热一凉，使人易病；国民党军紧追不舍。恶劣的环境，给刘邓大军能否顺利南下蒙上了一层阴云。

8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①14日，刘、邓根据上述指示和部队已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解放区，而国民党军尚在陇海路北的情况，遂决定全军在大牛岭、吴台庙、杨蔡园地区休整1天。14日下午，刘、邓到达豫皖苏军区司令部驻地吴台庙，邓小平主持召开军直首长会议，检讨了行军一周来的情况，并对下一阶段行军任务作了布置。为改善生活、减少病号，降低减员，加快行军速度，会议规定全军增加每日的菜金和粮秣；成立军直指挥部，加强对军直行军的组织指挥。同日，刘、邓发布命令，16日11时30分，向黄泛区开进。

当刘邓大军在豫皖苏区作短暂休整时，国民党军统帅部误认刘邓大军过陇海线是所谓“北渡不成向南窜”，企图“越平汉路西窜”，因此，以第8绥区整编第46师一部自蚌埠西进太和，纠合地方团队在沙河布防堵截；以主力罗广文兵团、张淦纵队等12个旅为第一梯队，以王敬久兵团8个旅为第二梯队，分路南追；以整编第52、第56、第15师和第206师各1个旅在平汉路侧击。企图阻止刘邓大军西越平汉路进入豫西广大地区，将其一举歼灭在黄泛区。另以整编第5、第57、第68、第84、第88师及第55、第66、第70师残部，对付在鲁西南地区的华东野战军。

（二）过黄泛区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93页。

黄泛区并非古来有之。1938年6月，蒋介石为阻止侵华日军南下，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河改道，夺贾鲁河、颍河河道，在皖东颖上注入淮河，沿线泛滥成灾。1947年3月15日，蒋介石下令将黄河复归故道。结果大水一退，形成鹿邑以南至项城间宽约20公里的黄泛区。区内淤泥遍地，积水浅者没膝、深处齐腰，路无人罕。又逢盛夏多雨，黄泛区内平日可行入处现在已是泥泞一片，难于下足，车辆通行更难。这给刘邓大军的行军和食宿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自8月17日晨起，刘邓大军在豫皖苏解放区政府派的向导引导下，开始了黄泛区的艰苦行军。步兵、骑兵、炮兵、辎重、担架、大车一齐下了淤滩，为防止陷入淤泥，各纵队派出会游泳的指战员组成小组，拿着木棍在前探路，后边人员手挽手地前进。走不多一会，人人成了“泥菩萨”。最艰苦的是炮兵部队，原先野炮是用车拉的，最重的美制榴弹炮是用10轮大卡车牵引的。但在黄泛区，车子载重过量，常常陷于淤泥中，无法挪动。只好将炮从大车、卡车上卸下拆散，一部分用人扛着、抬着、推着、拉着，一部分巨大、沉重的榴弹炮和卡车被迫就地埋藏或炸毁；从远路运来的太行山的小米、山西的陈醋、山东的蔬菜大都被扔下，从而减轻了负重，加快了行军速度。刘邓大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黄泛区的重重险阻，冒着国民党空军战斗机、轰炸机的扫射轰炸，至18日夜全部胜利地走出黄泛区，直趋沙河。

当刘邓大军中路部队通过黄泛区时，其左路、右路部队已先行奔赴沙河渡口。沙河平均宽约70米，水深流急，是刘邓大军南征中遇到的第一条大河。18日，第3纵队利用船只和浮桥从旧县集渡口渡过沙河。第1纵队在跨越黄泛区前已派侦察兵、工兵分队和前卫第1旅先行至沙河北岸，勘察水情，筹集船只和架桥器材，选定渡口。21日夜，该纵从祝湾等渡口全部渡过沙河。刘、邓亲率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第2、第6纵队及南下干部团一部，自18日夜至19日晨，从豫皖苏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预先架好的

浮桥渡过沙河。

刘邓大军渡过沙河后，蒋介石如梦方醒，省悟到刘邓大军是有预谋地向大别山挺进。因此，急忙改变部署，令整编第 85 师迅速乘火车到确山，然后徒步赶到汝河南岸，占领渡口，毁掉民船，阻刘邓大军南渡；令整编第 65 师乘火车运长台关，阻刘邓大军越平汉路西进；令罗广文兵团经郾城、汝南向正阳方向速击；令张淦纵队经柘城、项城，向新蔡方向追击；令王敬久兵团经亳县、界首向临泉方向追击。妄图在沙河以南，平汉路以东、汝河以北地区歼灭刘邓大军。并令顾祝同由徐州移郑州指挥。

（三）强渡汝河

8 月 17 日，刘伯承、邓小平就全军渡过沙河后下一步行动，作了如下部署：第 1 纵队占领商水，主力集结商水以东、以西休息两三天，派一先头旅占领上蔡，第二步主力占领汝南，派 1 个旅占领正阳，尔后该旅即在上蔡、汝南、正阳之线待机。并应以骑兵团、中原独立旅进至平汉线西平至驻马店段破路。第 6 纵队占领项城，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洪河，尔后全部南下占领息县、罗山、经扶（今新集），主力位于罗山以南，并派 1 个旅占领黄安（今红安）、麻城。第 2 纵队占领沈丘，休息两天，以先头旅占领新蔡，控制洪河，尔后留置 1 个旅在新蔡及其以南，派 1 个营附电台留沈丘东西地区游击警戒，主力奋进占领潢川、光山、商城 3 城待机。第 3 纵队在颍州（阜阳）以西地区，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三河尖东西地区，尔后除留置 1 个营附电台在三河尖游击侦察警戒外，全部自择道路迅速占领六安、霍山、立煌（今金寨）3 城。

刘邓大军胜利渡过沙河后，全军休整了 1 天，刘伯承、邓小平才正式向全军指战员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提出“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响亮口号。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部队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了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20 日，全军直奔汝河。

8 月 22 日、23 日，第 3、第 1、第 2 纵队相继渡过汝河，第

3 纵队并进抵淮河。

汝河位于河南省中部，属淮河支流，平均宽 60 米，水流平缓，但河槽深陷，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无法徒涉。23 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第 6 纵队抵达汝河北岸时，发现汝河南岸汝南埠已驻有国民党军部队，河北各渡口不见船影。汝河两岸为浅丘陵，地势平坦，唯河南岸汝南埠地势较高，是绝好的制高点。24 日，国民党军飞机出现在汝河上空，整编第 85 师等部约 3 万人已沿汝河南岸之油房店、汝南埠一带完成部署。尾追刘邓大军的张淦纵队、罗广文兵团，已进抵新蔡县城北孙召乡，距刘邓大军中路后卫不足 30 公里。

前有阻师，后有追兵，中有汝河横卧，空中有飞机威胁，对刘邓大军来说，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能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跃进行动的成败，从而也关系到整个战局。”^①刘伯承、邓小平处险不惊，沉着冷静来到汝河前线，指挥部队强渡。他们要求全体指战员要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魄，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24 日中午，担任突击任务的第 6 纵队第 18 旅第 52 团，集中全团火器掩护第 1 营紧急抢渡。该营凭借一条小木船和用木头、高粱秆赶制的一批筏子，一举渡过汝河，攻克南岸两个桥头堡大、小雷岗。与此同时，第 18、第 16 旅各 1 个工兵连，在当地群众协助下，从河上游找来几条木船和一些木头、门板，选择河道较窄、与南岸大雷岗相望的北岸黄刘营附近的杨湾村，迅速架起一座浮桥，作为全军的渡河通道。黄昏前，第 52 团由浮桥全部抵达南岸。据此第 6 纵队决心以第 18 旅从大、小雷岗向南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中央，打开一条通路，并以第 16 旅接替第 52 团防务，固守大、小雷岗，阻止国民党军反扑，保护浮桥，掩护全军渡河。为完成任务，第 6 纵队的纵队和旅的干部亲自下到团、营、连，指挥作战。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588 页。

25日2时许，第18旅前卫第52、第53团，由大、小雷岗并肩向南打，战至天明，相继攻克了王庄、车桓庄、大王庄、彭庄、贺砦、冯庄、张王店等10多个村庄，打开了一条长约5公里、宽约3公里的通道。3时左右，第16旅第47、第48团接替了大、小雷岗的防御；天亮后，第18旅后卫第54团赶到大雷岗加入战斗。该两部从左、右两翼保护浮桥的安全。整编第85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对大、小雷岗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均被打退。激战至13时，整编第85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什么也没有捞到，不得不放弃进攻。第6纵队指战员为掩护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突破敌人的堵击，作出了巨大贡献。16时左右，刘邓大军4万人马全部渡过汝河，直扑最后一道险关——淮河。

（四）徒涉淮河

淮河源于豫南桐柏山，流经豫、皖、苏3省，是中原一条大河。25日14时许，刘、邓率指挥部进抵淮河以北息县彭店。是夜，第6纵队全部进到息县、临河一线。26日2时许，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在一间独立小屋里研究渡淮河问题。为确保全军顺利到达大别山，邓小平提议将指挥部兵分两路，他和李达留下，由他指挥后卫部队阻击尾追之国民党军，由李达指挥渡河；刘伯承和张际春先期过河，指挥主力直插大别山。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

会后，李达率第18旅赶到渡口。此处，原测出可以徒涉。不料，在第18旅到达前夕，上游河水陡涨，徒涉已不可能。渡口仅10来只小木船，一夜仅可渡过小部。而这时，国民党军的追兵已向淮河一线压来，其先头部队已到离渡口不足20公里的彭店，同刘邓大军后卫接上了火。刘邓大军如不能迅速渡河，将陷入被迫背水作战。在这紧急关头，刘伯承赶到渡口，一手拄着一个细长竹竿，一手提着马灯，亲自踩踏，调查水情，发现上游有人牵马徒涉，即令部队放弃架桥，由上游徒涉。27日，部队浩浩荡荡地徒涉过了淮河。“就这样，我军以锐不可当之势，粉碎了敌人数十

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了陇海路、涡河、黄泛区、沙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终于在八月末先后进入大别山。”^①

当刘邓大军最后一批人马渡过淮河后，罗广文、张淦两部始追抵淮河北岸。这时的淮河水暴涨，无法徒涉，又无船可乘，他们只能望河兴叹。整编第85师师长吴绍周无奈道：“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8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中央军委，“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②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壮举，是解放战争中最困难和最具关键作用的一项任务。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0日回顾第二野战军的历史时，深情地说：“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③

三、关于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方针

大别山源于河南桐柏山，西连伏牛山，东延霍山，绵亘、雄峙于鄂、豫、皖3省边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南方北方气候的分界线。大别山地区对国共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58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0页。

重镇武汉，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窥盱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区，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顾祝同、胡宗南部的重点进攻。对此，邓小平于1948年4月25日讲话里指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伏牛山，一个是大别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① 蒋介石在1947年11月初的一次讲话里也说，如果刘伯承“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② 正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因此它成了战略进攻阶段交战双方在南线战场角逐的关键点、主战场。

大别山地区，“山脉重叠、绵亘，其在英山东西延线地区，南向斜面较缓，多属丛林，茨蔓杂生，故多阴蔽地，部队通视与运动均困难”；“其在立煌东西延线，属山脉之山峰地区，北向斜面急峻，大都荒山僻地，通视较易，攀登困难”；“至潜山、霍山、立煌、英山间地区，均属崇岭深谷，人烟稀少，近似不毛之地”；“麻城、光山间以西迄平汉铁路地区，多属起伏绵亘之高岗，通路较多，部队运动较易”。该区周围28县，共1180余万人口。其中，南部人口较密，平均每平方公里130至260人；北部次之，约65至130人；中部人最稀少，仅1至2人。境内水系，山北有淮河，山南有长江，山东有巢湖，另有多条溪流，雨季易涝，旱季易涸。境内交通，西部以汴汉公路为主干线，由汉口至潢川段约246公里，又由潢川北上开封，衔接陇海铁路；此外，平汉铁路纵穿南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9页。

② 蒋介石：《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1947年11月3日。

北，在汉口船渡江南，连接粤汉铁路。北面，由南京至陕西的京陕公路横贯境内，其信阳至合肥段约 387 公里。南部，由南京至四川黔江的京川公路横贯境内。该区气候，属山区型，变化悬殊，尤为春秋两季，乍雨乍晴，时雾时风；深秋至翌年初夏，比平原地区寒冷。该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森林较密，藏有多种矿产，其中皖境煤资源在江淮数省中最为丰富。大别山区物产也较北方多数地方富足，除英山、光山、经扶、罗山、霍山 5 县较贫瘠外，其余各县盛产五谷杂粮，其中年产量：大米 1905.2 万担，小麦 459.7 万担，高粱 25.8 万担，小米 1.4 万担，大麦 225.8 万担^①。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地区，富有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人董必武等就在此活动，传播马列主义、创建中共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诞生了全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建立了鄂豫皖苏区；抗日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中原解放区的一部分；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原中原军区主力撤出该区，但仍留下小部坚持游击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到 1947 年 8 月，中共鄂豫边中心县委指挥的游击队约 500 人，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指挥的游击队约 100 人，黄岗中心县委的手枪队及游击队 50 人，皖西人民自卫军约 4000 人。此外，大别山大部分地区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无正规部队驻扎，仅有少量地方团队。

大别山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相对丰富的物产，比较稠密的人口，强悍朴实的民风，悠久的革命传统，薄弱的反动统治力量，为刘邓大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然而，要在大别山区真正立足生根并非易事，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大别山区虽曾是革命根据地，但人民军队先后四次撤出：第一次，1932 年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西征至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第二次，1934 年 10 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 25 军长征

^① 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大别山区兵要简志》，1947 年 12 月 30 日。

到达陕北；第三次，1938年冬高敬亭率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第四次，1946年6月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向西突围。这些部队撤出后，根据地受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人民群众受过国民党的残酷压迫，不敢轻易起来同反动派作斗争。当刘邓大军回到大别山时，虽然少数地方还有一些分散的武装在坚持斗争，但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共产党组织和活动。要动员、组织人民需要时间。老解放区远在千里之外，刘邓大军原先内线作战具备的优势已不存在，而外线作战尤其是无后方作战的诸多不便则纷至沓来。千里跃进虽取得出奇不意之成功，但长途南征使部队付出了重装备大量丢失、伤病员增多、广大官兵心力憔悴的代价，全军急需休整、补充；更重要的是刘邓大军虽有陈粟、陈谢两军东西策应，但毕竟其身悬最南端，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数十个国民党整编旅，正源源不断地向大别山扑来。刘邓大军能否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关系到人民解放军南线战略进攻、乃至整个战略进攻能否成功。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刘邓大军南征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之前，对如何创造根据地等问题发出了指示。关于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指出：“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关于作战问题，毛泽东指出，“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①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第二天即8月28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及其他战区指挥员，指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93页。

出：“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军，方能奏效。“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即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现在顾祝同系统尚有三十二至三十五个战略性野战机动旅，分散使用于胶东、鲁西南、皖西及河南，若我能依情分别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在短期内给其十个至十五个机动旅以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则局势可以迅速改变。”^①

9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你们行动方向有三：（一）照原计划，以大别山为中心寻机歼敌，建立根据地；（二）在江河之间打圈子，逐步歼敌，建立根据地；（三）至必要时机，请考虑南渡长江是否可能，是否有利。”^②同日，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里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外线作战的一系列指示，结合所部的具体情况，决定照原定计划，创造大别山根据地。

8月27日，邓小平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并以中原局名义下发各纵队。30日，刘、邓将此指示内容上报中央军委。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16页。

② 同上，第225页。

《指示》规定全军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指示》分析了实现这一历史任务的有利条件。一是“有陈谢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二是“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三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四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指示》告诫全体指战员，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全军“应切勿骄傲，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关于军事斗争策略，《指示》指出：“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指示》强调，“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

《指示》要求各纵队官兵：“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指示》指出：“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5页。

为便于各纵队展开，刘伯承、邓小平将大别山区周围各县划分为4个区，即鄂东区，包括黄安、麻城、黄陂、黄冈、浠水、蕲春、罗田等7县，由第6纵队负责；鄂皖区，包括立煌、英山、广济、黄梅、宿松、太湖、潜山、望江等8县，由第2纵队负责；皖西区，包括桐城、芦江、舒城、霍山、六安、无为、寿县、霍丘等8县，由第3纵队负责；豫东南区，包括固始、商城、潢川、光山、经扶、罗山、礼山等7县，由第1纵队负责。

8月31日，邓小平在河南省光山县北向店，向野战军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邓小平指出：“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员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关于目前的任务及其完成任务的方法，邓小平说：“（一）歼灭一定数量的敌人。只要我们把地形搞好，练习山地战，有准备，有信心，有战斗意志，反对怕死鬼，歼敌不成问题。（二）在一定时期内要完成初步土地改革。发动群众要充分走群众路线，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只有过了这一关，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三）熟悉风俗习惯，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调查风俗人情，编成教材向战士讲。”^①

四、迅速实施战略展开

（一）在大别山北麓展开

自8月底起，刘邓大军乘国民党军被甩在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极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各纵队按既定部署迅速分遣展开。第1、第2纵队和原中原独立旅及第6纵队1个旅共9个旅在大别山北麓鄂豫边的商城、罗山地区，一面钳制国民党军主力，掩护主力向皖西鄂东展开，一面就地展开，开展地方工作。第1纵队控制

^① 《刘伯承传》，第412页。《中原解放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页。

于罗山以南、光山和经扶（今新县）以西地区；中原独立旅迫近平汉铁路，兵临信阳；第2纵队继占潢川后，又迅速推进至固始、商城一线。

担任进军鄂东任务的第6纵队2个旅，于8月28日至31日先后攻克经扶，解放麻城及其西南重镇宋埠。

担任进军皖西的第3纵队于8月30日分两路由固始出发，向六安、霍山地区挺进，在皖西人民自卫军等游击队配合下，以旅、团为单位分多路向皖西境内各县展开。9月3日，第7旅一部袭占霍山县城；第8旅于9月2日至15日，先后攻占立煌、舒城、桐城、庐江、潜山等县城。第9旅于9月2日晨，攻占六安县城，缴获1个修械所，得子弹30余万发。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实施战略展开时，蒋介石慌忙部署追击、堵击。8月27日，蒋介石致电指责顾祝同：“各部队行动，迟缓不前，屡失良机，任匪军平安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此为我革命军人之最大耻辱。各级司令官、部队长只知稳扎稳打，猬集一团，未能区分数纵队，不敢超越追击匪军，旬来无显著战果，何能弭除匪患，挽救危亡。兹特严令申诫：如再任匪军逃遁而至平汉路以西，各级部队长、指挥官决以纵匪、祸国害民论罪。”9月初，国民党军23个旅陆续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其态势是：整编第46师进到六安、霍山地区，整编第58师进到固始、商城地区；整编第85师进到罗山、信阳地区；整编第10师和整编第40师经宣化店沿公路向黄安、麻城前进；整编第65师经平汉路进到黄安；整编第52、第56师在信阳以南的平汉路和武汉外围地区；整编第7师、第48师，沿经（扶）麻（城）公路南进。企图乘刘邓大军立足未稳，予以歼灭，或迫其“流窜”。

中央军委对刘邓大军周围国民党军态势进行慎重分析后，于9月11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免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因七师较强，不易俘缴，四十八师情况不明，似和七师相差不多，而

中央系各部及滇军五十八师则在运动中，易于歼俘。”^① 遵照中央军委“避桂打滇”的指示，刘、邓决定：首先打态势孤立、战斗力较弱的滇军整编第 58 师，牵制战斗力较强、擅长山地作战的桂系整编第 7、第 48 师，掩护战略展开。

9 月上旬，第 1、第 2 纵队和第 6 纵队 1 个旅在商城以北的河凤集，9 月 19 日在商城以西中铺地区，进行了两次战斗，歼灭整编第 58 师 1 个团。9 月 25 日，在光山附近又给整编第 85 师以打击。这几次战斗，由于部队刚从北方转到南方，不谙山地和水网作战，加上兵力不够集中、协同不好，又缺少重型武器，致使战果小。但是达到了把整编第 48、第 10 师等部队牵制在大别山北麓，掩护了第 3、第 6 纵队在皖西、鄂东地区展开的预定目的。

至 9 月底，刘邓大军经过艰苦征战，共解放县城 23 座，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6000 余人、地方团队 800 余人，在豫东南的商城、光山、罗山、经扶、潢川和皖西的霍山、岳西、六安、舒城、潜山、太湖、庐江以及鄂东的罗田等县建立了 17 个民主县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威震了大江南北。曾经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的司徒雷登，在 9 月 20 日报告美国国务院说，目前，蒋介石政府“最严重关心的是刘伯承势如破竹地大举入侵安徽和豫南，这次攻势始于 8 月 12 日前后，此后便声势日增。对于刘伯承的最终目标有许多猜测，有的说是将在芜湖与汉口之间一处渡过长江，南进福建或广东建立共产党根据地，或甚至与越南的胡志明建立联系。看起来刘伯承除去骚扰更大的地区以便进一步困窘政府，并使政府从一些重要地区撤出军队去追击他以外，似乎还没有其他具体目标。”^② 司徒雷登号称蒋介石的“谋士”、“中国通”，但他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目标只看到了一点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242 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41 页。

点，即迫使蒋介石从其他战场抽兵于大别山地区，而不明白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一个决定性的战略步骤。

（二）向大别山南麓展开

1947年10月初，蒋介石从皖西调整编第48、第46师，从鄂东调整编第7、第40师，加上原在大别山北麓的整编第85、第58、第52师共7个师的兵力，对位于光山、经扶地区的刘邓大军进行合击。而在大别山南麓仅留下整编第88、第202、第52、第65师各一部守备，兵力相对薄弱，防地纵深空虚。

9月底，中央军委就电告刘伯承、邓小平，“鄂东北极端空虚，你们如能乘机迅速派兵攻占大别山以南长江以北各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

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光山以南的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反对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完成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光荣任务。邓小平在讲话里要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错误思想情绪。高级干部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以身作则，带领部队勇敢作战。刘伯承在讲话中说，创立大别山根据地是我党我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确定不移的政治任务。为此，必须打胜仗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这两个轮子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推动这两个轮子转动的原动力，则是提高信心，加强斗志^①。会后，各部队立即进行了传达学习，对右倾情绪和违纪行动展开了斗争。王大湾会议，对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起了重大的作用。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并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以第1纵队第20旅、第2纵队第5旅，留在大别山北麓商城、罗山地区，伪装主力，牵制和迷惑国民党军主力，并开展

^① 《刘伯承传》第415页。

地方工作；以第1、第2纵队主力和第6纵队1个旅、中原独立旅，南下鄂东，会合已在该区的第6纵队主力，沿长江北岸展开，调动敌人，寻机歼敌。以第3纵队继续在皖西展开。并决定在黄冈、蕲春、广济、黄梅、宿松、太湖、潜山一带富庶地区，发动和依靠群众，解决全军的冬装困难。

10月1日，第1纵队主力和中原独立旅率先南下。当晚，占领经扶县城，第二天，攻克黄安县城，随后又攻占宋埠，歼灭国民党地方团队及乡保武装800余人。

国民党军合围刘邓大军于大别山北麓的企图落空后，一时未能察明刘邓大军主力的动向，仍以整编第85、第58师留在商城、经扶、潢川，进行“清剿”，以整编第48、第7师进至六安地区，会同原在六安的整编第46师和从合肥调来舒城、桐城地区的整编第88师之第62旅，企图围歼皖西地区的解放军，收复皖西失地。

留在皖西坚持斗争的第3纵队第8旅向刘、邓建议，集中第3纵队全力歼灭第62旅。这一建议被刘、邓采纳。10月1日，第3纵队主力第7、第9旅由商城、固始冒雨东进，同时第8旅则尾随第62旅。第62旅虽屡遭尾随，但未能引起警觉，继续西进。

10月7日，第3纵队第7、第9旅经7昼夜急行军，赶到六安、霍山之间地区。第62旅面对新出现的敌情，预感不妙，迅速退缩毛坦厂西北的抱儿岭、落马岭、三保墩一线，并继续北缩，企图与位于六安城的整编第46师会合。第3纵队第8旅等部紧追不放。8日夜，第62旅因怕夜间战斗不利，猥集于六安东南30公里处的张家店地区。

张家店位于霍山至六安公路旁，是一个东西走向、长约500多米的小集镇，有200多户人家。四周遍布池塘、水沟、稻田，再往外则横亘着一些长满松树的山坡。镇内房屋大多是泥墙茅顶。9日拂晓，第62旅发现已陷入解放军严密包围之中，即利用镇周围的池塘、水田和处长满小松树的土丘、山坡，赶筑外围工事；利用镇内寨墙、水沟，加固成镇内工事，指挥部设在镇西北一座小

庙内。

第3纵队乘第62旅立足未稳和合肥、六安方面来不及增援的有利时机，于9日22时以第9旅由西南面对张家店发起主攻，以第7旅由北面、第8旅由东面担任助攻。各旅炮火猛轰达1小时，镇内火光四起。各旅乘势向心猛攻。激战至10日拂晓，歼灭第62旅4000余人。

当第62旅在张家店告急时，六安城内的整编第46师以3个团来援，但被第3纵队第7旅第21团阻止在张家店北15公里的中店、槐树岗一带，眼睁睁地看着第62旅被歼。

张家店战斗，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首次歼灭国民党军1个正规旅的重大胜利。它大大振奋了全军士气，打开了皖西斗争的新局面。

在张家店战斗的同时，第1纵队和第2纵队一部，于10月8日、10日，在岐亭、柳子巷、李家集等处歼灭整编第56师新17旅大部及整编第52师1个营。

10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祝贺他们在张家店、岐亭、李家集等处作战的胜利。并指示，“尚望各同志在刘、邓正确领导下，继续努力，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完成伟大战略任务。”^①

10月12日，中原局为继续完成战略展开，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号召部队和地方干部积极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大胆分遣部队和大量抽调干部从事地方工作。并决定建立鄂豫和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由每个旅抽出1个团（共13个团）为两军区及军分区的基干武装，每个纵队抽调干部和老战士1000至2000人归各县委领导，参加地方工作。11月，鄂豫、皖西两军区正式成立。鄂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治委员段君毅；皖西军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44页。

区司令员曾绍山，政治委员彭涛。

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以半个月的时间分散长江沿岸，主要解决棉衣，尔后集中全力作战，寻机歼敌。”第1纵队出蕲春、广济地区，第2纵队出黄梅、宿松地区，第6纵队出黄冈、蕲春地区，第3纵队向潜山、桐城、庐江、望江地区。

国民党军虽然发现刘邓大军主力已转向大别山山南，但由于自己的主力尚在山北，无奈山南兵力不足，难于与刘邓大军决战。因此，刘邓大军南下鄂东、鄂南的各纵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横扫了沿途分散孤立之据点和反动地方团队，连克长江北岸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诸城镇。与此同时，第3纵队连下舒城、庐江、桐城、潜山、望江诸城，进至长江北岸望江以东的华阳镇。至此，刘邓大军控制了长江北岸东西宽约150公里的地带，为解决全军棉衣提供了条件。

刘邓大军兵临长江北岸，所控制的黄冈至望江地段，犹如一个肚兜，向南凸出于南京、武汉之间，是国民党军长江防线战略敏感地区和要害。国民党军统帅部担心刘邓大军乘势南渡，威胁南京，遂宣布汉口至九江间沿江口岸同时戒严，令海军代总司令桂永清上将亲赴九江指挥军舰护航；另以青年军第203师一部从九江北渡至蕲春、黄梅，以新编第17旅在海军配合下进攻武穴；令位于鄂东北的整编第40师和第52师第82旅共6个团经浠水向广济疾进，攻击刘邓大军侧背。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乘大别山区国民党军主力滞留山北，抓住整编第40师孤军前进处于运动中之有利战机，集中第1、第2、第3、第6纵队主力和中原独立旅共10个旅，在地势险要、而敌必经的蕲春以东高山铺地区，设伏歼灭之。

高山铺位于浠（水）广（济）公路云山谷段，东临清水河，当面是这片山脉的最高峰洪武墙和界岭，背后是李家砦，一前一后紧锁着浠广公路两端；它南北有绵延陡立的茅庵山、大寨山和蚂蚁山耸立，形成两道天然的屏障，牢牢箍住狭窄的公路。由东西

南北7座山峰怀抱而呈狭长盆地地形的高山铺，是理想的伏击战场。

24日、25日，刘、邓令尚在广济、武穴、蕲春等地的第1纵队和中原独立旅兼程回师高山铺，占领南、东、北3面制高点，布成袋状阵地候敌；令攻克团风的第6纵队尾敌向东，在团风东北、关口以西地区待命，俟敌进入伏击圈后，封锁其退路，同时占领大路铺、十里铺一线，从背后插入割裂歼敌；以第2纵队为第二梯队，进至广济以西机动，担任保障任务；以第3纵队4个团进到广济以东待机，该纵主力留在皖西钳制整编第48、第7师，阻其东援。

26日早晨，高山铺地区大雾弥漫。整编第40师等部继续沿浠广公路向广济方向前进。9时许，进到高山铺东南。第1纵队立即发起攻击。至26日夜，双方在浠广公路两侧的洪武垸和界岭反复争夺。整编第40师及第82旅伤亡惨重，第1纵队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控制了洪武垸、界岭要点。自26日深夜至27日早晨，天降大雨，整编第40师和第82旅为摆脱被歼命运，分别从清水河、高山铺谷地向四周的子女山、蜈蚣山、洪武垸、界岭、蚂蚁山、大王砦发动连续进攻，但均未成功。这时，第6纵队第17、第18旅赶到立即加入战斗。

27日9时整，刘邓大军发起总攻。至14时，战斗结束。共歼国民党军1.26万人，其中俘虏9500余人，缴获炮33门、机枪375挺、子弹40余万发和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刘邓大军在高山铺“歼灭四十师及八十二旅之大胜利。”^①

高山铺战斗，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刘伯承在《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文中指出：“张家店、高山铺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几次作战，都是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削弱了的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49页。

第三节 陈谢集团挺进豫陕鄂边区

一、陈谢集团的编成与出征前的准备

7月27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第9纵队、第38军及第8纵队第22旅计2个纵队、1个军又1个旅，共29个团8万余人，组成一个集团，通称“陈谢集团”。其中，第9纵队、第38军和第22旅及第4纵队的第12旅是比较新的部队，装备相对差些（如第9纵队仅有旧山炮3门），战斗力也弱些；第4纵队的第10、第11、第13旅是老部队，兵员足，装备好，打过硬仗，战斗力较强。为统一指挥，陈谢集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党的前线委员会，陈赓、谢富治、韩钧3人为常委，陈赓任书记，谢富治任副书记。这个集团属战斗序列，不是建制单位，因此，未单设指挥机构，而是由第4纵队指挥机关兼任。该集团归刘伯承、邓小平直接指挥。后因刘、邓全力指挥部队南进转战大别山，中央军委又根据刘、邓的意见，决定陈谢集团归军委直接指挥。

中央军委于7月19日决定将第4纵队使用方向改为南渡黄河进军豫西后，要求陈谢集团从7月20日开始的20天内，“完成一切政治、军事、经费、干部等项准备工作”^①。后来又指示陈赓、谢富治，应建立不要后方，一切取之前线的决心。

陈赓参加中共中央小河会议返回驻地晋南翼城后，即部署和指挥全军投入紧张的南下作战准备工作。首先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对战局的分析和转入外线作战的方针任务；在各纵队进行广泛深入的诉苦教育，破除保家、保田的狭隘地域观念，激发起广大指战员为解放全中国的阶级兄弟，勇于“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以野战军主力——刘邓大军已经打到外线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43页。

的事实教育部队，增强指战员的信心，并号召向主力学习，跟着打出去。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以团为单位，分期分批地集训干部，进行连排攻防战术的演习；战士则普遍开展以射击、投弹、爆破、架梯子、搭跳板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训练。8月初，在第10旅举行了步、炮、工协同攻城的实弹战术演习。此外，陈赓还派人赴黄河岸边侦察对岸国民党军的情况及两岸地形。

在陈谢集团紧张地进行渡河南征准备的同时，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广泛动员起来，全力支援大军南下。8月15日，在第9纵队正式成立并出发南征的大会上，代表太行区600百万人民心愿的一面写着“太行子弟结长纆，跨河南征缚苍龙”的红旗庄重地交给秦基伟司令员。太岳、太行两区的政府还动员、组织了3万民兵、民工随军作战，太岳区的阳城、晋城、沁水、赵城、安泽等县均组成了民兵远征营。

二、强渡黄河，转战陇海路潼洛段

（一）强渡黄河，截断陇海路

陈赓、谢富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部于8月11日分由晋南浮山、翼城和豫北的博爱等地出发。此时正值雨季，连日大雨，山洪爆发，交通全断，加之路远，他们担心8月15日前不能渡河。就此，陈、谢报告中央军委，表示“甚焦急”、“非常焦急”。中央军委于8月12日致电陈、谢，指出：“现敌大军向刘邓追击，若你们于刘邓出陇海线后半个月之久方能渡河完毕，则对刘邓援助过于迟缓。又胡宗南主力正向榆林增援，三十六师两个旅本日到横山、榆林间，刘戡五个旅本日到石湾。彭习亦甚盼你们早日渡河，变动局势。”^①中央军委也考虑到陈谢集团面临的实际困难，又于14日电告陈、谢，“可于二十日开始渡河，二十五日以前渡河完毕。”陈谢集团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于8月20日进抵邵源、平陆等渡河位置。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95页。

这时，由于沙家店战役大捷，胡宗南集团主力深陷陕北米脂地区；又由于顾祝同集团被牵制在鲁西南战场和追堵刘邓大军，因此，胡、顾无力顾及豫西、陕南地区。而豫西地区国民党军的兵力比较薄弱，其部署是：以5个保安团沿孟津至潼关段黄河南岸约250公里正而上担任第一线防御；以整编第15师、青年军第206师各一部及整编第76师新编第1旅等部配置于洛阳、陕县、灵宝、潼关诸地，依托陇海铁路进行机动防御；陇海路以南豫陕鄂边广大地区，仅有各县的保安团队守备。黄河豫西段北岸都是山地，便于陈谢集团隐蔽行动和进行各种准备，加上是老区，群众条件也较好。可以说，敌情、地利，均便于陈谢集团突过黄河、挺进豫陕鄂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

关于渡河作战部署，陈赓、谢富治于8月上旬在阳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以第4纵队4个旅为左路，从垣曲、济源间的官阳至青河口和大教至马湾段实施渡河，尔后以主力迅速向陇海路突击，攻占新安、渑池，并相机夺取洛阳；以第38军2个师和第22旅为右路，从茅津渡以东渡河，尔后以一部向东奔袭张茅镇和观音堂车站，策应左路作战，其主力向西南发展，威逼陕县，并向西迂回大营车站，切断灵宝、陕县之联系，并准备抗击由陕西东援的国民党军；以第9纵队3个旅为第二梯队，尾随第4纵队渡河，尔后主力向东南发展。为迷惑国民党军，保障渡河作战的胜利，以太岳军区的第23旅及各分区武装，积极向运城、临汾、同蒲路沿线展开攻势，造成打运城、临汾的假象，配合主力南渡行动。

陈谢集团南渡黄河的孟津至潼关段，地势险峻，两岸多山地，陡壁峭峡林立，沟壑纵横，河道蜿蜒狭窄，水流湍急，河底皆沙石，暗礁险滩密布。时值雨季，连日霪雨，山洪爆发，河水横溢。此外，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这一带筑有河防工事；内战打响后，又加筑了不少工事；刘邓大军成功突破“黄河防线”鲁西南段之举，令黄河豫西段国民党军提高了警惕，他们根据蒋介石

石的命令，星夜赶修堡垒和交通沟，强迫当地居民组织“河防队”、“听水队”，并以“狗兵”（军犬），日夜在数百米宽的河边望风、警戒，以防解放军南渡。进入8月，霖雨连日，河水暴涨，水流湍急。北有汹涌黄河，南有坚固工事，豫西国民党军自认为“河防万无一失”。

8月22日20时，陈谢集团左路首先发起偷渡，第一梯队第10旅避开原有渡口，另辟牛湾、李河口、下关阳几个渡河点，实施偷渡，一举包围了对岸石头山，控制了滩头阵地；23日拂晓，第13旅从大教至马湾地段渡河，迅速突破南岸孟津保安队一部及新安自卫队担任的防线，攻占了滩头阵地，保障了后续部队顺利渡河。右路于23日拂晓，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从平陆茅津渡渡河。

第10旅主力，于23日攻击洛阳西北30公里的横水镇，原以为守军是地方团队，实为由洛阳北援之整编第15师1个团及洛阳、孟津2个保安团，依据坚固工事顽抗。攻击部队因火力组织欠周，以致攻击受挫。陈、谢改以一部兵力包围横水，以1个旅袭扰洛阳，以2个旅进攻新安、澠池、铁门等城镇，以第38军、第22旅奔袭张茅镇、观音堂车站。至31日，各部连克观音堂车站、新安、澠池、宜阳、洛宁、铁门等城镇，共歼国民党军4800余人，自己伤亡约1000余人，腰斩陇海铁路，在洛阳至陕县间广大地区开辟了战场。

（二）转战潼洛之间，歼敌有生力量

陈谢集团南渡黄河，完全出乎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意料。蒋介石急令胡宗南于8月27日开始将整编第1、第29军从陕北米脂、绥德南撤，拱卫西安，增援豫西；另以尾追刘邓大军的整编第3和第15师、第41师、第206师各1个旅西援，连同原在洛阳地区的4个旅，共8个旅组成第5兵团，由李铁军任兵团司令官；以分布在陕东、灵宝、陕县地区的新编第1旅、第135旅、第27旅、第167旅等共4个半旅组成陕东兵团，由西安绥靖公署陕东指挥官谢甫三指挥，企图东西夹击陈谢集团。

针对渡河后敌情的迅速变化，8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陈赓、谢富治，“主力攻占新安、渑池、陕县、灵宝、阌乡^①，相机夺取潼关；以一部攻占宜阳、洛宁、卢氏、嵩县，另以一部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切断西荆公路^②，迫使胡军一部向陕南布防。”^③30日，又致电陈、谢，“（一）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二）速以四纵全力、三十八军及二十二旅抢占陕县、灵宝、阌乡、洛宁、卢氏，相机抢占洛南、商县、商南。秦纵位于新孟洛地区，牵制洛阳之敌，以一部攻占宜阳、嵩县。（三）避开强固设防据点，专打守备薄弱据点，并力求运动战，求达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之目的。（四）你们现在作战比在晋南时环境大不相同，每一大的行动计划必须事前报告军委，必须经常迅速报告敌情、我情、民情，我们方能及时帮助你们。”^④

9月2日，中央军委对陈谢集团的作战范围、作战原则，以及下步作战目标，均作了规定。关于作战范围：“包括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应使干部熟习这一地区地理、敌情、民情，准备以至少半年时间，在这一地区东西南北往来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关于作战原则：“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必须准备经过一个困难时期，逐步建立根据地。”关于下步作战目标：“目前停攻横水，以一部监视洛阳之敌，主力西进，相机夺取陕县、灵宝、阌乡、卢氏、洛南、商县、商南七城或七城中之几城，着重扫除七县乡村中之反动武装。你们第二步机动方向是东向平汉路或南向

① 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② 西荆公路，指陕西西安至河南荆紫关的公路。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12页。

④ 同上，第222页。

汉水以北，临时酌定。”^①对于陈谢集团渡河后将主攻方向放在东面，中央军委指出是不恰当的，“丧失几天宝贵时间，给了胡宗南在西面完成其部署的机会，极为可惜。”^②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9月2日，陈赓、谢富治放弃了对横水的围攻，率主力第4纵队和第38军、第22旅挥戈西进；留第9纵队在新安、孟津、洛阳地区阻击第5兵团西援，巩固黄河渡口，保障前后方联系，同时以一部向伏牛山的北麓展开。中央军委在9月4日电中强调指出，陈谢集团“应将占领县城与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敌地主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③9月7日陈谢集团主力进到陕县东南地区。

这时，东援的陕东兵团一部已到达潼关及其以东地区。其兵力部署是：第135旅及2个保安团重点守陕县；新编第1旅和第206师1个团分别在灵宝东南大营、温堂、张汴、岳庙之线防守；第27旅1个团由潼关增强阌乡、灵宝地区防务，该旅另一部和第167旅1个团分向洛南和朱阳镇地区布防；整编第36师1个营及保安团守备卢氏。

灵宝、陕县，位于秦岭余脉崤山以北，地当河南与山西、陕西之交，古时称函谷关，因其山势险峻，徒如壁立，道路多在谷中，深险逼窄，形似信封而得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9月9日，陈赓、谢富治根据灵陕一带地势和蒋军陕东兵团的部署特点，决心以第38军第55师监视陕县，以第22旅奔袭虢略镇，以第12旅攻取卢氏，以集团主力绕过陕县，直趋灵宝、阌乡，割断潼关、陕县、卢氏之联系，然后视情况各个攻取之。9日、10日，第22旅击溃新编第1旅，占领虢略镇并进至阌乡以南。10日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32页。

② 同上，第222页。

③ 同上，第238页。

夜，第12旅等部攻占卢氏，全歼守军1个营。

9月11日，第4纵队主力围攻灵宝，第11旅担任主攻，第13旅位于祖师庙机动。守敌误判攻城者兵力不多，乃离城出击。第11旅等部乘机突然发起反击，至24时予以全歼，夺取灵宝，生俘新编第1旅旅长黄永赞以下5600余人，缴获4门榴弹炮。灵宝作战的同时，第10、第22旅及第38军第17师，抢占了阌乡，并在阌乡东南歼国民党军1个团。

灵宝、阌乡、卢氏国民党军被歼后，陈谢集团乘胜扩大战果。第10、第22旅及第17师，在潼关东南阌底镇地区歼蒋军第27旅1个团，逼近潼关。第12旅歼灭卢氏地区地方团队一部。第11旅、第13旅冒雨向陕县急进与第55师会合，次日包围陕县并肃清了外围据点。17日18时，发起攻城至22时，攻占陕县，全歼守敌共5000余人。其中，俘敌4700余人，缴获野炮12门。至此，国民党军陕东兵团大部被歼。战后，陈谢集团以缴获的物资组建了榴弹炮团和通信教导队，并广泛开展破坏陇海路的活动。

当陈谢集团主力激战西线之时，在东边的第9纵队除留第26旅于陇海路以北，监视洛阳之敌，并保护渡口外，主力迅速南渡洛河，直插伏牛山腹地，解放了宜阳、伊川、伊阳（今汝阳）、嵩县、栾川、洛宁等城镇，歼国民党军7000余人，牵制了李铁军指挥的第5兵团的西援，保障了主力在潼关、陕县间的作战。

陈谢集团经半个月连续作战，除歼灭大量保安部队外，共歼国民党正规军3万余人，解放了宜阳、伊川、嵩县、伊阳、新安、渑池、灵宝、阌乡、洛宁、卢氏等9座县城。矛头不但直指关中威胁西安，而且可利用渭水、黄河以南，汉水以北，平汉以西广大地区国民党军空虚之弱点，迅速展开。9月15日，中央军委致电陈赓、谢富治，指出：第9纵队应以1个旅留在新安以东监视洛阳之敌，以2个旅向洛阳东南机动，相机攻占临汝、郟县、襄城、叶县、宝丰、鲁山、方城、南召诸城，威胁平汉路，迫使整编第3、第10师等部向洛阳东南各县救援。同时，应令位于卢氏

的第4纵队第12旅于扫除当地地主武装后，迅即南进，相机攻占荆紫关、商南、龙驹寨3点，然后转向西北，相机攻占商县、山阳，威胁西安侧翼，吸引西安敌人注意该方面。陈谢集团主力在陕县作战结束后，休整数日，留第38军1个师于陕县、灵宝、阌乡地区，陈、谢亲率第4纵队及第38军1个师，于商县、潼关间进入渭南、华阴以南和商县、洛南以北地区，然后相机攻占临潼、渭南、华阴、华县、潼关、蓝田、洛南诸城^①。17日，中央军委电告陈、谢：“在十五天至二十天内，胡军主力尚不能向你们攻击。你们必须很好利用这十五至二十天时间，打开陕东及陕南局面，这是有决定重要性的。如不能在陕东、陕南建立根据地，则将妨碍你们在豫西及鄂西北建立根据地。”^②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陈、谢率主力6个旅，于9月20日开始向西安方向前进，计划首先夺取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蓝田、商县、洛南、商南、山阳等10县，建立陕东南根据地。但此时，情况发生变化。由于陈谢集团威逼西安，胡宗南于9月19日从陕北赶回西安，次日蒋介石也飞抵西安，蒋声称要在“三个月内彻底肃清陕北共匪，半个月彻底打通陇海路”^③，并急令刚调往大别山的整编第65师和晋南运城的整编第10师第83旅及整编第17师第84旅1个团、驻榆林的整编第36师第28旅等空运西安。数日内，在西安、潼关一线可聚集优势兵力；鉴于谢甫三指挥不力，改由裴昌会任陕东指挥官。与此同时，郑州、洛阳间的李铁军部正向新安、洛宁进犯。

9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告陈赓、谢富治，改变部署，东打李铁军兵团。指出，“因西潼线已到及于数日内可到之敌共有十个半旅，难于得手；汉水流域无敌正规军，可留待一个月后去占；郑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48—249页。

② 同上，第258页。

③ 陈赓：《挺进豫西》，《人民日报》，1961年1月1日。

洛区李铁军部六个旅较弱，故改变部署如下：（一）于二十六日前以三十八军一部开文底，逼近潼关佯动，迷惑敌人。（二）刘旅（第12旅）附三十八军一部，除留小部控制卢氏剿匪外，立即西进，相机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山阳诸县，肃清反动，发动群众，援助陕南游击队。（三）三十八军主力位于陕灵阆三县剿匪。（四）你们率主力四个旅，协同秦纵向旅（第9纵队第26旅），于二十六日开始荫蔽东进，突然包围六十四旅及武庭麟师（整编第15师）部（可能在磁涧），相机歼灭之，收复新安。（五）在打六十四旅期间，秦纵主力可继续休整。（六）歼灭六十四旅后，协同秦纵歼击李铁军主力，并相机攻占郑、洛以南，平汉以西十余县。（七）准备一个月时间，完成上述任务，然后留秦纵位于上述地区，四纵向汉水流域。”^① 25日电告陈、谢，东打李铁军如能成功，“不但对你们有利，对陈粟、刘邓亦有利”。“在你们打李铁军期间，胡宗南可能集中三四个旅向陕、灵、阆、卢进扰，援助李铁军。故在打李铁军之后，你们还要准备回头打可能进至陕、灵、卢之敌，以期在几个月内，歼灭几万敌人，控制新、潼、陕、灵、阆、宁、卢数县于我手。此数县群众，看见我军歼敌这样多，胜利这样大，加上你们的群众工作，就会敢于起来向地主斗争，并援助你们（群众最快要几个月内才能广大发动起来，不要企图在几星期内就能发动）。那时你们就可以一部留在北面，主力南进，攻占豫西南及汉水流域，把局面向前开展一大步。”^② 26日，又要求陈、谢“东进主力应以神速动作，迂回至新安以东，切断六十四旅退路，然后攻城。同时，要以重兵在新安以东设伏，准备打援敌。”^③

陈赓、谢富治遵照中央军委求歼李铁军兵团的指示，率第4纵队和第22旅于9月26日隐蔽向东急进。这一招，出李铁军意料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68页。

② 同上，第272页。

③ 同上，第275页。

之外，他判定陈谢军主力仍在潼关附近，遂“乘虚”西进，以整编第15师师部及第64旅占领铁门等地，以整编第3师占领宜阳。10月1日，陈谢集团第13旅在新安以西的铁门附近同第64旅遭遇，后者毫无准备，一片惊恐，当夜即被歼灭一部。第11旅赶到参加战斗。2日凌晨，攻占铁门。除整编第15师师长武庭麟率小部南逃外，其余被歼（被俘2100人）。整编第3师慌忙由洛宁撤回洛阳。至此，陈谢集团潼洛间作战结束。

当陈谢集团主力集中作战时，第9纵队分遣一部在嵩县、栾川地区建立了豫陕鄂第3军分区，另一部配合太岳军区在新安、渑池地区建立了太岳第5军分区。第38军在卢氏、灵宝地区建立了豫陕鄂第1军分区。3个军分区的建立，为豫陕鄂边根据地的建立和尔后的大量歼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陈谢集团经过1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近4万人，控制了陇海路250多公里，并在伏牛山北麓展开，割断了胡宗南与顾祝同东西两大集团的联系，调动了进攻大别山之国民党军一部回援。毛泽东在10月4日电报中称赞陈赓、谢富治用兵灵活机动，指出：“陈谢十个旅分散五个旅于豫西、陕南十余县，打民团、土匪、保甲及一团一营之正规军，集中五个旅打中等规模之仗，甚有效力。”^①

三、向伏牛山东麓展开

蒋介石为了重占陇海路，恢复郑州、西安间陆上联系，于10月中旬又从山东战场调整编第20师到洛阳，与原在该地区的部队，共有10个旅的兵力；另在潼关地区集结整编第1、第36师等部共8个旅，实行东西对进。10月下旬，潼关方向的先头第27旅进至阌乡，洛阳方向的整编第20师进占新安。由于主力集中潼洛之间，因而在伏牛山以东，平汉路以西，陇海路以南，南阳以北广大地区的兵力就比较空虚。除临汝、郟县地区有正在整补的整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83页。

编第 15 师外，其余各县均为保安团与土杂武装。

10 月上旬至 10 月中旬，陈谢集团争取了半个月的时间进行休整。各部队总结了工作，认真学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检查了思想，整顿了纪律，并进行了组织调整、精简后方等工作，为执行新任务做了准备。

在部队休整期间，中央军委就陈谢集团下一步行动致电陈赓、谢富治，指出休整完毕后，（一）拟以 1 个旅破平汉路。这个旅在 1 个月至 2 个月内专任破路，不作别事。（二）1 个旅位于新安、宜阳、伊川、嵩县，剿匪、分财、分田，与卢氏打通并监视洛敌。（三）主力 5 个旅，第一步分数路同时出动，相机攻占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方城、南召、舞阳之线以北诸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发动群众，分地主粮食、财物。第二步看形势集结兵力，歼击由洛（阳）郑（州）漯（河）许（昌）可能向我前进之敌，但遇 5 师主力则避开之，遇 3 师、10 师等部则各个歼灭之。如洛、郑、漯、许之敌取守势，则延长第一步作战方案之时间。此外，第 12 旅及第 17 师亦休整至月底为止，下月初除留一部于卢氏及西荆公路以东剿匪、分粮、分财、分田以外，主力下月初西进，分几个步骤攻占陕南七八个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建立根据地。中央军委强调，“陕南较贫，但建立根据地有战略意义，要说服指战员具有艰苦奋斗之决心。”^①随后，又致电陈、谢，要不怕丧失陇海路。好好将群众中积根分子撤出，加以保护，让敌置于无用之地^②。应准备陕县、灵宝、阌乡、渑池、洛宁诸城全部失去，黄河南北交通暂时断绝，而只坚持乡村。只要能在东面及南而打开局面，并寻机歼灭李铁军兵团一部或数部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309--310 页。

② 中央军委 1947 年 10 月 21 日致陈赓、谢富治电。

后，即可找到歼灭胡宗南军重占陇海路之机会^①。

遵照这些指示，陈赓、谢富治决定发起伏牛山东麓战役，其部署是：西线，以第55师在陇海路牵制潼关方向国民党军；以第12旅和第17师沿伏牛山和秦岭脊峰南下进军陕南。东线，以主力于10月下旬向平汉路西侧，北起登封、南迄南召间广大地区开展攻势。

10月底，第9纵队向鲁山、南召、方城、叶县出击；第4纵队向临汝、郑县、登封出击。11月1日，第10旅一部偷袭临汝得手，歼敌600余人。11月3日，第10旅主力包围郑县，并攻克西关。这时郑县有国民党军整编第15师师部及第64旅第190、第191团和整编第47师第125旅1个营，共3000人。为解郑县之围，李铁军率5个旅由洛阳向郑县齐头并进，前锋已抵伊川以南。李铁军通告整编第15师师长武庭麟，援军将于4日抵达郑县，令武部固守待援。第10旅处在李、武两军前后夹攻不利态势。陈、谢即令第11旅进到郑县南山布防以掩护第10旅万一形势不利时能顺利撤退，并要求第10旅速战速决攻克郑县。第10旅于3日夜发起攻击，激战至4日15时，全歼郑县守军，俘整编第15师师长豫西土霸王武庭麟，以及副师长杨天明、姚北辰。

至5日，陈谢集团连克临汝、郑县、登封、鲁山、宝丰、叶县、南召、方城等8座县城，共歼灭国民党军5700余人，破坏了李铁军兵团西进之企图，打开了豫西的局面。

这时，李铁军以其主力整编第3、第20师赶赴宝丰、郑县；以整编第41师第124旅指向临汝；以整编第47师第125旅乘火车经郑州、许昌急驰襄城，企图在临汝、鲁山、宝丰地区与陈谢集团主力决战。胡宗南部8个旅也已由潼关等地东进至卢氏、陕县以东地区。

郑县战斗后，陈谢集团主力集结在鲁山以南地区及南召、方

^① 中央军委1947年11月4日致陈赓、谢富治电。

城间休整。11月8日，陈赓、谢富治在南召店召开党的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对付尾追之李铁军兵团的办法。会议上，有的主张立即歼灭李铁军兵团，有的主张西进在伏牛山的牛背上创立根据地。陈赓说：“我们能够集中作战的兵力也不过五个旅，又在新区，并无立即歼灭这股敌人的把握。但是，我们却能扯散它，消耗它，而当它被扯散、消耗了以后，就能集中优势兵力乘机各个歼灭。同时，从中原的全局着眼，我们的主力绝不能向西钻到大山里去，而要在平汉路以西的广大地区展开，以便于更有力地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①会议最后决定：暂时避免与尾追之敌决战，以第13旅、第25旅伪装主力，采取“牵牛战术”，西向镇平、内乡、西峡口，斩断西荆公路，与南下陕南的部队呼应，引诱李铁军兵团主力西援，将其拖疲拖瘦；以主力东进，在伏牛山麓广大地区展开。南召店会议，对开创豫西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担任“牵牛”任务的第13、第25旅不足6000人，伪装成主力，采取虚张声势等疑兵手段，于11月9日离开南召向内乡、西峡口前进。跟踪而来的李铁军兵团仅1个旅，兵团主力则在临汝、郟县、宝丰地区徘徊不前。这时陈谢集团主力正向方城、叶县一带移动，如不能迅速将李铁军部西牵，下一仗就难打了。陈、谢电令第13旅等部，坚决打下镇平。镇平位于南阳西面，是南阳通往内乡、西峡口的孔道。攻下镇平可以直接威胁军事要地南阳，迫使李铁军西进增援。11月16日夜，第13旅迅速包围了镇平县城，第25旅包围了镇南西北的石佛寺。战至17日晨，分别攻占镇平县城及石佛寺，歼灭2个保安团，俘敌1000余人。镇平失守，李铁军确认陈谢集团主力已进入南阳以西，遂以整编第3师和第47师第125旅放胆西追，落入陈赓设下的圈套。为了把“牛”牵得更紧，第13、第25旅于19日包围内乡，得悉整编第3师等部正向内乡扑来时，遂主动撤围。这时，李铁军发觉进入南阳以西的

^① 陈赓：《挺进豫西》，《人民日报》，1961年1月1日。

并非陈谢集团主力，而伏牛山麓各县频频告急，乃留兵团部和整编第20师于南阳担任机动，以整编第3师继续西进西峡口、夏馆山区。李铁军兵团就这样被扯散了。

在第13、第25旅浩浩荡荡牵“牛”西去的同时，第4、第9纵队主力以旅为单位展开，连克城镇，歼灭土顽、小股国民党正规军，迅速开辟豫西根据地。11月11日，攻克山阳城，再克方城、临汝城。19日，攻克泌阳。20日，袭占南召，攻克唐河。23日，再克鲁山、宝丰、郟县等城。迫使李铁军于11月23日急令整编第20师离开南阳向方城开进。

截至1947年11月底，陈谢集团在豫西、陕南地区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团队5万余人，解放和一度解放了禹县、舞阳、桐柏、镇平、镇安等10余座县城，在全区普遍地发动群众，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8个专署和39个县政权，成立了豫陕鄂军区（亦称后方司令部）和8个军分区，军区司令员韩钧、政治委员裴孟飞。其分工是前委随野战军行动，指挥作战和全局工作，行署和军区驻鲁山，负责领导政府和地方部队的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在豫陕鄂地区的战略展开，在伏牛山区站稳了脚。

第四节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

一、华东野战军分兵与西兵团的任务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实行了分兵，第1、第4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第3、第8、第10纵队由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领向鲁西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第2、第6、第7、第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由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在鲁中地区同国民党军周旋。

在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举行鲁西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第1、第3、第4、第8、第10纵队在津浦铁路泰安至临城（今薛城）段发起了攻势。7月7日，向鲁南挺进的第1、第4纵队全歼费县守

敌第3绥靖区1个旅6000余人，击溃来援的1个旅。9日，第1纵队乘胜收复峰县、枣庄，迫使第3绥靖区部队退守运河沿线。向鲁西挺进的第3、第8、第10纵队，7月7日，攻占津浦铁路大汶口至大万德镇段的一些据点，守敌大部撤退。8日攻克泰安。13日再克大汶口，并渡过汶河，向宁阳、曲阜前进。由于后方基地兖州、徐州受到解放军的严重威胁，国民党军统帅部不得不从鲁中山区抽出整编第5、第7、第48、第57、第65、第75、第85等7个师西援津浦路，企图配合其后方各要点守备部队，夹击华东野战军外线各纵队于鲁南及兖州、曲阜地区，然后再救援鲁西南。利用国民党军后撤西援尚未迫近时机，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于7月14日围攻滕县，第10纵队于15日攻击汶上，第3、第8纵队于16日攻击济宁，第4纵队于17日围攻邹县，均未克。8月1日，这5个纵队在济宁附近会师转移至鲁西南地区。

内线部队则进行了南麻、临朐战役。7月17日，第2、第6、第7、第9纵队围攻态势比较孤立的整编第11师于南麻地区。整编第11师（辖3个旅）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于6月底占领南麻地区后，即以南麻为中心构筑了密密层层的地堡群。华东野战军冒大雨，苦战4天4夜，仅歼守敌1个团，因援敌迫近，于21日撤出战斗。接着又冒雨于7月24日转攻临朐。临朐守敌为整编第8师，凭借工事顽强抵抗。苦战5昼夜，仅歼守敌1个营，亦因援敌迫近于30日撤出战斗，分别转向胶济路以及诸城地区。南麻、临朐两仗，华东野战军伤亡2.1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在鲁南、鲁西、鲁中3个方向的作战，从战略上说是成功的，因为调动、分散了国民党军，打乱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部署，有力地策应了刘邓大军的战略进攻；从战役战斗说，打的多是消耗战，未能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给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增加了困难。就其原因是分兵出击考虑不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缺乏准备，在具体战役战斗的组织上存在轻敌急躁

情绪，兵力使用分散，加之对天时地理可能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

鉴于华东野战军 5 个纵队已经转至鲁西南地区，另 5 个纵队仍在山东内线，为便于指挥，1947 年 8 月 3 日，陈毅、粟裕、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提议组成“西兵团司令部”，以陈士榘为司令员，唐亮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在鲁西南的 5 个纵队。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成立西兵团，但“西兵团指挥机构，提议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陈士榘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亮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指挥西面五个纵队。”8 月 5 日，中央军委又致电陈、粟、谭：陈毅率第 6、第 9 纵队应迅速转至东面与谭震林及第 2、第 7 纵队会合，“从反面箝制敌人，不使敌达到驱我军到黄河之目的。”“你们速派粟裕西去，统一指挥五纵，将全军供给重心经渤海转至鲁西南，争取在鲁西南立足，协助刘邓作战”^①。陈、粟认真研究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将意见于当日 24 时上报：“宜陈、粟率华野及六纵渡河，经聊城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汇合，集中六个纵队执行西线方针。”陈毅去外线，这是粟裕的意见。粟裕认为，“华野今后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是在外线”。同时，“惟因人事关系及指挥便利”，故请陈毅司令员一同西去较为适宜^②。陈、粟 5 日 24 时电又称：“另组东兵团司令部，以谭为司令员，许世友为副司令员，黎玉兼政委，统一第二、第七、第九各纵的指挥。”8 月 6 日，中共中央同意陈、粟的意见，“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去鲁西南，谭、黎、许组织东兵团”，要求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

西兵团，亦称外线兵团，包括华东野战军第 1 纵队（辖第 1、第 2、第 3 师），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第 3 纵队（辖第 7、第 8、第 9 师），司令员何以祥、政治委员丁秋生；第 4 纵队（辖第 10、第 11、第 12 师），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王集成；第 6 纵队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168 页。

^② 粟裕 1947 年 8 月 6 日午时（11—13 时）致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电。

留在苏鲁皖边区一带活动。”8月19日，中央军委在复电中认为，陈、粟15日提出的意见“极为正确”，同时指出：“陈、唐、叶、陶必须克服部队中转回内线之情绪，学习刘、邓向外线英勇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区域行动，绝对不可有渡黄河北返或运河东返老根据地长期休整之思想。”^①要求陈毅、粟裕立即渡河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大军，因为，现在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大军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

陈毅、粟裕率野战军指挥部及第6纵队，特种兵纵队于1947年8月9日由胶济路北桓台、广饶地区出发，15日陈毅去渤海军区检查工作，粟裕率指挥部继续前进。8月26日晨，陈、粟由惠民出发，27日晨抵达聊城，与第10纵队（8月上旬由鲁西南北渡黄河）会合。

这时，外线兵团官兵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多数指战员对进入鲁西南后一直受国民党军尾追，未能摆脱被动，憋了一肚子气，求战心情甚切。但有的干部发牢骚，说：“运动战、运动战，只运不战。我走弧形，敌走直线，敌人走一，我们走三，昼夜不停，疲劳不堪。”还说：“这样下去，只有拖死；与其拖死，不如打死。”还有的干部说：“鲁西南水多，泥鳅成了龙。吴化文（整编第84师师长）过去是我们手下败将，现在居然敢跟着我们屁股追。”各纵队指挥员中，多数人主张打。有的说：“我们和敌人所处的天候、气象、地形条件是一样的，敌人能打，我们为什么不能打！”有的说：“曾几何时，我们在雨雪交加的鲁南，消灭了配属快速纵队的整编第26师，活捉了马励武；在沂蒙山区消灭了蒋军王牌军整编第74师，打死了张灵甫，如今反被我们手下的败将，追得东奔西跑，真是窝囊。”^②有的指挥员对能否在鲁西南打歼灭战，有很大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20页。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21—522页。

顾虑，认为敌人多路尾追，密集靠拢，战机难寻；时值雨季，积水甚深，不便我军机动；没有后方，伤员安置困难；特别是部队减员多，消耗大，未得补充，实力大减，因此，主张休整一下，作较多的补充后再战。

对于华东野战军在近一时期作战遇到的困难和官兵们表现出来的思想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关注。8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粟裕和饶漱石，指出：“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①8月2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指出：“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多，无损大局。”并要求他们：“应当提倡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猛攻猛打之作风。”“必须使全兵团一切部队，从上到下（一切指战员）明确了解自己任务。”使各级干部完全明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与战略方针，“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部分任务是在内线歼灭敌人”，借以破坏国民党之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破坏解放区，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计划^②。9月3日毛泽东又致电陈毅、粟裕，指出：“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军中要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89页。

② 同上，第208页。

禁绝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①

陈、粟根据上述指示，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于9月3日上午召开机关干部大会。粟裕在会上作了《认清战局，改进工作，争取胜利》的报告。粟裕说：“目前整个形势要求我们继续加强作战，充实作战部队，并改进所有的工作，因为今后几个月正是由敌强我弱转变为敌弱我强的关键时间。转得好，反攻可以顺利开展；转得不好，则反攻会多走一些弯路，这就要求我全体同志，认清战局，澄清思想，更好的来改进自己的工作。”谈到7月份作战，他说：“七月份的作战，特别是南麻、临朐战役，有人认为是打了败仗，有人认为反攻会因此推迟，也有人反映：‘反攻反攻，丢掉山东！’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不是的。七月份的作战不是败仗，也不能算胜仗，只是打了个平手仗、消耗仗。”“我们几路分兵，迷惑了敌人，破坏了他的计划，打乱了他的部署，尤其是我西路、南路兵团（指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能阻住敌人的增援，策应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全歼敌人九个半旅。这是协同作战的结果，也是我们的胜利。”“我军在进行南麻、临朐战役的同时，进攻了滕县、峄县、汶上、济宁、大汶口、泰安等据点，消灭敌三万多”，这也是胜利。不能因南麻、临朐战役未打好，就得出悲观失望的结论。关于今后的任务，粟裕说：“我们不是集中兵力先吃敌人的大股，而是在广大的地区内来回周旋，不断歼灭蒋军的分散力量，打乱他的全部部署，打乱他的统治秩序，到处发动群众，开展人民翻身运动。这样不断歼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争取我军的完全优势，不断扩大解放区，缩小蒋占区，建立新解放区，最后达到全部歼灭敌人，完全取得革命胜利的目的。”^②6日晚，陈、粟召集纵队领导干部会议，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粟裕在会上明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36页。

^② 《粟裕军事文集》第321--327页。

确指出：“只有打，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只有打，才能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有打，才能得到补充；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休整；打好了，鲁西南根据地就能重建起来。”^① 经过政治动员和军事民主会议，指战员的思想统一了，他们决心打好外线出击的第一仗。

二、沙土集战役，歼灭整编第 57 师

鲁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虽然在泥泞道路中转来转去，疲惫不堪，但仍十分骄狂，认为华东野战军“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在鲁西南“已陷入绝境，南有陇海路，东有津浦路，北面和西南有黄河，四面被围，无路可走。”因此，一改以往谨慎小心稳步齐头并进之策，而竟敢分路轻进，有时 1 个团也敢单独尾追前进。这给华东野战军捕捉战机创造了条件。

根据当面敌情，陈毅、粟裕为着出敌不意，迅速打开局面，于 8 月 30 日下达“西字第一号令”：第 10 纵队于 9 月 3 日晚由孙口（寿张南）、马庄（张秋镇西南）南渡黄河，4 日晚完成对郓城之包围而攻占之；第 6 纵队于 9 月 3 日晚在张秋镇东南十里并和阿城东南魏山渡河，4 日晚进入梁山以南地区；第 1、第 3 纵队于 8 月 31 日自成武、定陶地区北移，引诱整编第 5、第 57 师等部北进，并在沙土集、龙而集、钜野以北地区进行积极的运动防御，掩护黄河以北部队南渡；第 4、第 8 纵队及晋冀鲁豫第 11 纵队，由成武以南尾整编第 5 师等部北进，割裂整编第 5 师与第 57 师之连系，从侧背发起攻击，配合正面部队作战。野战军指挥部于 3 日晚随第 10 纵队渡河，拟于 6 日进至郓城西南 15 公里之王楼。

8 月 31 日，第 1、第 3 纵队自定陶、成武地区北进。9 月 3 日，陈、粟率指挥机构及第 6、第 10 纵队南渡黄河，5 日与第 1、第 3 纵队会合于郓城、红船口地区。至此，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兵力集中，形成了有利的战役布局。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524 页。

这时，整编第5军军长邱清泉误认为，第1、第3纵队担任后卫，掩护第4、第8纵队“北逃”。遂即令整编第5、第84师沿张凤集、钜野，向鄆城追击；令整编第57师沿沙土集、皇姑庵，向红船口追击；并协调第4绥靖区整编第68师同时由菏泽向北追击，策应主力方面作战。9月5日，整编第5师进至鄆城以南之雪家庄、富官屯、王老虎一线；整编第57师第60旅进到鄆城西南贾敬屯、耿家庄、徐家垓一线，第117旅位于第60旅之右侧。9月7日，北犯的整编第5、第57师分别进达随官屯、贾敬屯之线，两师间隔达20余公里。整编第84师刻已达钜野附近。整编第57师已处在华东野战军南北夹击不利态势之中。

陈毅、粟裕抓住此一有利战机，决心歼整编第57师。该师辖2个旅，共1万余人，武器装备较陈旧，战斗力较弱。其具体部署是：第3纵队一部箝制整编第5师，切断其与整编第57师的连系，主力向徐家垓、耿家庄、新兴集地区攻击；第6纵队（欠第17师）于战役开始后，即从第3纵队右侧经王家楼、吕公堂向徐家垓、贾敬屯、任家桥、新兴集地区攻击；第8纵队由南向沙土集突击；第1纵队集结于皇姑庵以西地区待令参战，并以一部对鄆城警戒；第10纵队（并指挥第6纵队第17师）以全力控制鄆城及其以南之吴家庙、富官屯、丁里长线阵地，坚决阻击整编第5师北犯，并随时箝制其转师西援；第4纵队进入龙固集，坚决阻止整编第5、第84师西援；晋冀鲁豫第11纵队位于辛集、陈集地区，对菏泽方向整编第68师进行警戒。

9月7日，第4、第8纵队由南向北攻击前进。整编第57师惧歼，迅速南撤，集结于沙土集附近既筑之村落工事内实施防御，并以1个团分散防守马庄、精良寺、徐家庄、董家楼等外围村庄，主力龟缩于沙土集土圈内。

沙土集是鲁西南菏（泽）巨（野）公路上的一个村庄，东西长约1公里，南北宽约0.5公里，四周筑有土墙，墙外有壕沟，东、南、西3面靠水，北面是一片大沙地，地势较高，壕中无水。

7日黄昏，陈粟大军达成对沙土集的合围。8日，发起总攻。经半小时炮火准备，第3纵队首先从北面突破村寨，进入村内展开巷战。9日2时，第8纵队从东南方向突入，第6纵队从西北角突入。3个纵队逐步缩小合围圈，一面猛攻，一面展开政治攻势。整编第57师师长段霖茂率100余人化装逃跑，出村寨不远就被俘虏，其余守敌纷纷放下武器。至3时，全歼整编第57师师部及2个旅9000余人。

在围歼整编第57师的同时，第10纵队等部依托野战阵地抗击整编第5师等部的进攻，并歼灭其2个连，有力地保障了沙土集围歼战的胜利。

沙土集战役计毙伤国民党军6000余人，俘师长段霖茂以下7600余人，共1.3万余人，缴获榴弹炮、野炮、山炮107门，轻重机枪480余挺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华东野战军伤亡、失踪3900余人。

沙土集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后，在天候、地利均不甚理想的条件下，紧紧抓住并利用鲁西南国民党军的骄狂失慎，轻视对手，各路军之间动作不整齐划一，距离不等的弱点，选择相对较弱的整编第57师，集中优势兵力，南北夹击，坚决果断地加以围歼，这是战役速胜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军检讨失败原因时也说：“本作战，国军在各战场抽调兵力，逐次投入鲁西南地区……但因协调联络不足，多次形成孤立，遭匪袭击，整五十七师更因友军救援不及，在沙土集覆没。”^①这一战，是华东野战军转入进攻后的第一个胜仗，不但鼓舞了全军士气，为恢复和重建鲁西南解放区创造了条件，而且迫使国民党军从山东战场和大别山战场抽调4个整编师驰援鲁西南，从面对在山东作战的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和在大别山区作战的刘邓大军均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因此，获得了中共中央的称颂与慰问。毛泽东在9月11日电中指出：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3册，第643页。

“郟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①。

三、挺进豫皖苏边区

9月9日，陈毅、粟裕报告中央军委，全歼整编第57师后，“我军士气旺盛，决迅速转移攻势予五军（整编第5师）以歼灭性打击。”并定于10日晚开始行动。11日，中共中央就歼灭整编第57师后的作战部署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黎玉等，指出：“根据来电我军士气甚旺，决迅速转移攻势，给五军以歼灭性打击等语，果能再歼五军一部或大部，使该军失去战斗力，则鲁西南局势大为开展。俟对五军战斗结束后，你们应迅速全军南下，相机攻占成武、定陶、曹县、单县、民权、虞城诸薄弱点，完成下一次作战的机动态势。”要求陈、粟调整部队组织，充实连队，“只要西兵团有六万至八万精干部队，就是很有力量的野战军。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采取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军纪，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②

整编第57师被歼后，鲁西南地区国民党军转入防御，其中整编第5师微缩于钜野、郟城间之丁里长、郭官屯、随官屯、王老虎地区；整编第84师主力集结钜野，一部防御嘉祥；整编第68师等部防御菏泽、鄆城、东明地区；整编第88师之新编第21旅在曹县，暂编第24师及第88师师部率第62旅在商丘东西地区；整编第75师在济宁、汶上地区；整编第70师残部在鱼台。由于整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40页。

^② 同上，第240—241页。

编第5师与整编第84师已靠拢，且已据守村落筑工防守，陈粟大军失去战机，故改变决心，除以第10纵队保持原阵地，阻击整编第5师外，主力则进至菏泽、钜野公路两侧地区集结休整。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已渡过黄河与陈粟大军会师。该纵的任务是挺进大别山。

陈粟大军刚抵达定陶、成武地区，由山东来援的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欠1个旅）已于9月19日进抵商丘，正向曹县前进；整编第10师由信阳经郑州，运抵豫东。陈、粟决心集中主力第1、第3、第4、第6、第8纵队分割歼灭整编第11师于曹县以南地区；第10及晋冀鲁豫第11纵队箝制整编第5师于成武、定陶以北地区；晋冀鲁豫第12纵队控制颜庄、旧考城地区，阻击可能由兰封、民权、柳河集方向来援之整编第10师。

9月22日晚，陈粟大军将整编第11师包围于土山集地区。土山集是位于曹县、商丘公路上的一个村镇，四周原有土墙，外有水壕（无水）。整编第11师利用土山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兵力配备除前沿有雄厚的兵力火力外，纵深则隐蔽集结有较充足和精干的战术预备队。陈粟大军经两昼夜急攻未能奏效。此时，整编第10师自兰封、民权向曹县前进，整编第5、第75师亦已进至成武以北地区。陈、粟认为，继续进攻整编第11师将于全局不利，遂于24日主动撤出战斗。是役，陈粟大军歼整编第11师4000余人，歼灭整编第5、第75师等部3000余人。

由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和陈粟大军转战鲁西南，整个南线国民党军机动兵力大部被吸引于这两个区域。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豫皖苏广大地区，面积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2000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第4师就在睢县、杞县、太康和萧县、永城、夏邑、砀山建立了两块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该区被国民党军占领。1946年12月，人民解放军在此建立了豫皖苏军区，隶属晋冀鲁豫军区，但大部地方仍为国民党军控制。不过除有各省、县保安团队及一些土杂武装外，几无一

国民党正规军。这就为陈粟大军发展战略进攻，恢复与扩建豫皖苏解放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9月24日24时，陈毅、粟裕发布向豫皖苏进军的命令。25日，他们将此行动报告中共中央并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饶漱石、黎玉。电报说为了保持主动，决定全军大部越陇海路南移，发展豫皖苏广大地区。他们率第3、第4、第6各纵队，于26日晚经砀山附近南移，一部破击津浦路，大部袭占永城、蒙城、涡阳、亳县等地。陈士榘率第1、第8、第12纵队，由民权附近南移，先到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尔后以第12纵队沿平汉路南下，必要时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活动，第1、第8纵队进至淮阳、鹿邑、太和地区，求得与陈粟会合于涡阳以南。命令要求各路军应放手消灭土顽，攻占薄弱县城，发动群众，了解战场并求得部分物资补充。同时，令第10、晋冀鲁豫第11纵队在陇海路北箝制整编第5、第75师，掩护主力向豫皖苏边区进军。

9月26日夜，陈士榘率第1、第8、第12纵队经民权两侧越过陇海铁路后，第1、第12纵队沿内黄、杞县、通许、尉氏、扶沟、鄆陵、洧川展开；第8纵队沿柳河、睢县、太康、淮阳、西华、周家口、商水展开。陈毅、粟裕率第3、第4、第6纵队由砀山、马牧集段跨越陇海路后，第3纵队经睢溪口、宿县越津浦路向灵璧进击；第4纵队沿夏邑、永城、涡阳、蒙城展开；第6纵队沿马牧集、亳县、太和、阜阳、临泉、沈丘展开。

9月28日，陈毅、粟裕就进入豫皖苏地区后的工作部署报告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等：“我们自即日起拟以半月至二十天时间，分路辗转活动于陇海、平汉、津浦与沙河之间，以歼灭该区内之保安团队、反动地方武装，并破击铁路为主要任务，以分散敌人，以及布置地方工作，了解地方情形，并准备予尾追之敌以歼灭性打击。似此半月行动完成后，拟再集中打较大之歼灭战。”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战略格局即形成了。

对如何迅速恢复与发展豫皖苏解放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9月30日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一）你们分两路前进方针很好。至少一个月内专打分散薄弱之敌，发动群众，了解情况，然后看情形再集中相当兵力，打有把握有准备的较大规模的仗，半个月时间太短。（二）士渠所部第一步相机攻占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第二步应向南相机攻占商水、项城、沈丘、临泉、上蔡、汝南、新蔡，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与刘邓衔接。（三）你们则在夏邑、永城、宿县、亳县、涡阳、蒙城、怀远、凤台、阜阳、太和地区建立根据地。（四）你们与士渠所部暂时分开建立根据地，将来看情形，各留一个纵队在当地发展根据地，集中三个纵队打较大规模的仗，如此方可迫使敌人分得很散，造成好打之条件。（五）各纵辗转活动，破击三条铁路，歼灭分散之敌，极为重要。”^① 10月3日，又电告陈、粟：“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每县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你们五个纵队范围，不但包括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而且可以一部渡淮南进，直达寿县、合肥、巢县之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与刘邓区域、苏中、苏北完全衔接。如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酌量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② 10月4日电报里又强调指出：“陈粟目前情况，则宜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歼敌，过一时期后，再集中六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77页。

② 同上，第281页。

至七个旅往来机动，打中等规模之仗。”^①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区后，在鲁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也跟踪而来，企图阻止陈粟大军在该区立足生根或继续南进。陈粟大军则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以机动灵活的作战行动，摆脱敌主力纠缠，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横扫国民党军的土杂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在开辟豫皖苏边区的斗争中，部队一度存在“只愿打大仗，不愿打民团”，“只管打土豪，不愿深入发展群众”，以及不愿下“本钱”抽派干部、抽派部队参加建设新解放区工作，不适当地实行了“开仓济贫”和“分浮财”，使社会财富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在对待城市工商业政策上，也产生了一些混乱和破坏纪律的现象。

为了克服这些不良倾向，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指示，迅速开展豫皖苏新解放区的工作，华东野战军前委于11月22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吸收各纵队领导干部参加。因陈毅奉命于这个月上旬离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前往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会议由粟裕主持。前委扩大会议初步检讨与批判了上述不良倾向，并作出了克服这些倾向的决定：

1. 加强部队的土改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纠正不愿打小仗，不愿打保安团队的现象。

2. 大力协助在豫皖苏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发动部队普遍参加群众工作，帮助群众进行土改。

3. 除已由各纵队调出的千余干部外，再从各纵队抽出约2000名干部，分配到地方工作，另从各纵队再抽出共3个主力团和4个团的整套干部（班长以上）分配到地方武装中作骨干。

4. 将豫皖苏军区划为6个军分区，组建分区武装，规定每个纵队与1个军分区建立联系，并负有提供该分区党、政、军、民各级干部及武器装备等的义务，各纵队及师的领导干部应参加地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83页。

委工作，并有指导该军分区工作之权力。同时，还确定各纵队联系区即为本纵队的补充区（如需补充应得野战军前委批准）。

各纵队依据这一决定，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打中原、定中原、以中原为家”的思想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动员全体官兵继续清剿保安团队和土杂武装，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广泛宣传中共中央的政策，争取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抽调去地方工作的大批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在各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更细致、更踏实地从事于发动、组织群众和扩建人民武装的工作。

至10月下旬，豫皖苏区出现了一个新局面。陈粟大军攻克县城24座，解放广大乡村，歼敌1万余人。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政权被基本摧毁，封建反动势力受到重大打击，革命秩序初步建立，除原有的3个地委、专署、军分区得到进一步加强外，在沙河以南又新建了3个地委、专署、军分区，解放区的面积大大扩大，地方武装由9月下旬的2.5万人发展到6万人。

四、陇海路破击战

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后，国民党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即以整编第5、第11师等为骨干，集中6个整编师，分别组成机动兵团，利用陇海、平汉、津浦3条铁路，机动转用兵力，尾陈粟大军纠缠。为削弱敌人的机动能力，迫使其分兵守护交通线及要点，以利于自己开展群众工作，陈毅、粟裕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破击铁路的指示，决定集中7个纵队，编成3个集团，分两步，对陇海路、津浦路实行大破击。

其具体部署是：第一步，以第4、第10纵队编成第1集团，破击陇海路砀山至朱集段，拔除沿线据点，相机攻占虞城，朱集；以第1、第11纵队编成第2集团，并配属冀鲁豫解放区民工7500人，破击砀山至郝寨段，拔除沿线据点，相机攻占砀山；以第3、第6纵队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编成第3集团，进至砀山以南韩道口、夏邑城至沙岗店之线及以南地区，准备歼击可能由徐州来援的国民党军，并以一部进至津浦路徐（州）蚌（埠）段，炸桥、破

路；以第8纵队破坏陇海路兰封至商丘段，并准备对付由开封来援的国民党军。第二步，以第2集团沿陇海路南北向徐州进迫，相机袭占飞机场、炮击徐州；第4纵队加入第3集团，全力向东破击徐蚌段；以第10、第8纵队编成第1集团，位于商丘及其南侧，担任阻击由西面及西南面来援的国民党军。

中央军委极为重视交通破击战，早在10月24日就致电陈毅、粟裕：要“精密研究破路技术（东北铁路大翻身办法又快又彻底，你们应采用），很好地组织破路战役，求达彻底破路与大量歼敌两项目的”^①。11月6日，又致电陈、粟：“望以彻底破毁陇海汴徐段为目标，进行充分准备工作，尤其要研究破路技术”^②。

11月8日，陇海路破击战开始，至17日，历时10天，彻底破坏了商丘至郝寨段150余公里，歼灭暂编第24师之第7旅等部1万余人，攻克城镇9座，车站17个，威逼徐州，迫使国民党军匆忙调集15个旅的兵力应援，其中包括准备用于大别山区的8个旅，从而推迟了国民党军围攻大别山的时间。中共中央于11月19日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各首长，“庆祝你们破击陇海路之大胜利。”

第五节 中原三军粉碎国民党军 对大别山区的“围攻”

一、国民党军“围攻”大别山的计划和部署

1947年夏秋之交，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指挥下，在内线野战军、野战兵团和军区部队有力配合下，胜利地挺进大别山、豫皖苏、豫陕鄂3个地区，并迅速展开，至同年秋冬已初步建立3块新解放区，在中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17页。

^② 同上，第323页。

原形成“品”字形互为犄角的有利战略态势。逐鹿中原的第一个回合，人民解放军方面赢得了胜利，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战略计划宣告破产。

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之后，蒋介石坐卧不宁。他既怕解放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担心解放军直接渡江南进或西越大巴山入川。为避免和防范出现上述前景，1947年11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部举行的作战会议上，发表了《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决心乘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立足未稳，根基未固之际，“造成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一举全歼刘邓大军。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由国防部长白崇禧统一指挥，对大别山实行“围剿”。

11月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兹为彻底肃清大别山匪军：（一）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贵官（指白崇禧）坐镇九江担任指挥。（二）九江指挥部所有作战地境、战斗序列及大别山区围剿计划，随电颁发。（三）九江指挥部即按绥靖公署编制编组成立，人员以向国防部有关单位调用为原则，并酌给津贴。”九江指挥部“统辖辖区内军事，指导豫、皖、赣、湘、鄂等五省省政府，并指挥各该省之保安团队、水陆警察，彻底戡平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大别山区匪乱，巩固治安。”^①

11月22日，“九江指挥部”在南京成立，参谋长徐祖诒，副参谋长赵援，秘书长邱昌渭。23日，徐祖诒率“九江指挥部”大队人马分乘“永绥”、“永益”两舰离开南京，24日15时到达九江。与此同时，白崇禧为熟悉战区情况，“率要员七人由京飞蚌埠、合肥、汉口视察各部队情形及指示进剿机宜”，于27日抵达九江。“九江指挥部”从27日正式开始运转。12月4日，“为指挥便利起见”，白崇禧率一部人员由九江赴汉口指挥^②。

11月27日，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策定大别山进剿计划，其主要

① 国民党《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卅六年度工作报告》。

② 同上。

内容为：

“（一）方针：本部为彻底围歼窜踞大别山区之刘匪，并摧毁其建立之地方组织，即依现有态势，各以有力部队，分由豫、皖、鄂，向大别山区清剿，一举规复东部核心地带，将匪主力击散，然后分区围歼之。

（二）部署概要：（1）第三兵团（辖整七、整四十八师）并统一指挥随后到达之整二十五师，为本部西进主力兵力；整七、整二十五、整四十八师，在六安、霍山一带整四十六师之策应下，应尽速夺取英山、岳西、立煌，先期摧毁匪大别山东部核心地带，并准备续向西攻击前进。（2）第八绥区（辖整第四十六师），以整四十六师控制于六安、霍山各附近地区，策应第三兵团之作战。（3）第五绥区（辖新五、新十纵队，交警第四总队，整五十二师第三十三旅），确保平汉路交通畅通，统一指挥整十、整十一、整八十五师，阻止匪之西窜及北窜。（4）整二十八师师长李良荣，统一指挥整二十八师及第一四五旅（整二十一师），由广济进占罗田，掩护第三兵团左翼安全；其第一四五旅控制于广济、黄梅附近，尔后随整二十八师进展，推进浠水。（5）整五十八师仍控制于商城、固始附近策应，连系两侧及友军整十、整四十六师，掩护第三兵团右翼安全。（6）整十、整十一师，先分别控制于潢川、罗山附近，阻止刘匪之北窜与陈匪之南窜，受第五绥区指挥。（7）整八十五师仍在黄陂一带，掩护武汉安全，并准备随时出击，以策应各方面之作战，受第五绥区指挥。（8）整二十、整九师于车（船）运到达战场后，分别先于信阳、汉口附近集结，为本部总预备队。（9）第二〇二师第一旅及第二〇三师第二旅，分别于望江、九江以北占领掩护阵地，掩护长江航运及安庆、九江之安全。（10）攻击开始时间，预定为十二月一日。”^①

总计 33 个旅 80 个团。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 5 部第 5 册，第 343—344 页。

为支援地面部队行动，空军第4军区在汉口设立指挥所，由徐州调空军第1大队第1、第4中队共B—25型机8架，由南京调第5大队第26中队P—51型机8架驻汉口，驻徐州之空军第3大队所属各机，亦相继参战^①。白崇禧还请出高级“顾问”、前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采纳了冈村宁次设计的“三网”和“三光”政策，即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杀光、抢光、烧光；采取两种手段：一是利用正规军重兵稳进、分进合击；一是利用地方团队，恢复和加强保甲制度，抓丁、抢粮、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制造“无人区”，企图利用这种“总体战”手段，一举摧毁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和武装，使刘邓大军失去生存空间，借势歼灭之或逐出大别山区。

蒋介石告诉他的将领们说：“现在‘围剿’大别山的匪军，比‘进剿’陕北、沂蒙山区和胶东半岛的匪巢实在容易得多了。大家知道：陕北地区，山陵起伏，交通阻塞，国军进剿的时候，不仅海军不能参战，而且陆军也不能发挥威力，完全依赖陆空配合，用空军接济陆军的粮弹，军事进展的困难可以想见。沂蒙山区的情形也是如此，国军的运输接济，往往依赖空军，而我们的空军根据地最近的如徐州、济南、青岛等地，离沂蒙山区的目的地多半在数百里以外，要向匪军进攻，空军尚且不便，陆军困难更多。所以陕北和沂蒙山区的地势，对我们最不利，对匪军最有利。大别山区却与此相反，东面有津浦路，西面有平汉路，北面有淮河，南面有长江，这些交通线都在我们控制之中，我们可以自由运动，匪军却不易超越。”“我们可以随时派遣空军直捣他的心脏，也可以派遣海军向匪军攻击，可以说大别山区是我们陆海空联合作战最理想的环境。”蒋介石说，“只要我们一般将领大家同心一德，而且能明断果决，勇往直前，则此次大别山的会战就没有不成功的

^① 《戡乱简史》，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第337页。

道理，而且我可以保证决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困难。”^① 蒋介石历来对自己的指挥能力，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量估计过高；对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与其指挥能力估计过低，这次也不例外。

二、中共中央军委反“围攻”的方针

面对国民党军集中 33 个旅 80 个团优势兵力的围攻，刘伯承、邓小平认为，这是转入战略进攻后对刘邓大军之最大考验，其处境确有困难，但全体指战员士气很高，决心同敌人周旋，坚持大别山区斗争，尽可能多吸引敌人于自己周围，担子“背重些”；但同时也向中央军委提议，“须有友邻有力配合，拖散一部敌人”，方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中原战场战局的发展十分关注，尤其是对刘邓大军能否建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极为关心。为加强刘邓大军力量，多次敦促晋冀鲁豫军区尽可能地给刘邓大军补充兵员、装备。敦促陈粟、陈谢两军更多吸引国民党军于自己周围，减轻刘邓方面的压力。同时，提出了粉碎国民党军“围剿”大别山区的总体构想：

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陈粟、陈谢两军在外线积极作战，寻歼敌军主力，迫使敌人不能不从大别山抽兵回援。为此，明确规定：（一）陈粟及陈谢“两部长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②（二）鉴于正在建立根据地之鄂豫皖边区，豫陕鄂边区及即将派部队开辟之鄂豫边，互相联系配合的需要及交换经验的需要日益迫切，刘邓、陈谢两军在作战方面亦须有更多配合行动，因此，陈谢区域应划归中原局管辖。区域内一切地方工作应受中原局领导，陈谢兵团应即交还刘邓指挥。在陈谢兵团配合彭德怀、张宗逊向胡宗南系统作战时，凡属配合作

^① 蒋介石：《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1947 年 11 月 3 日。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344 页。

战之兵力则归军委指挥^①。(三)刘邓“全军(除陈谢)明年八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完成创造大别山、桐柏山及江汉区根据地,并与陈谢、陈粟两区联成一片之任务。”^②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令第10、第12纵队迅速南下大别山;第11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则奉命护送晋冀鲁豫军区征集、返队的新兵和伤病痊愈的官兵及携带的大批弹药、药品、银元到大别山。

中央军委对刘邓大军的关怀,以及晋冀鲁豫军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各方面的大力援助,对于奋战在大别山区艰苦环境、周旋于国民党军数十万人马围攻中的刘邓大军全体指战员来说,犹如雪中送炭、沙漠送水,鼓舞和坚定了他们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粉碎敌人“围攻”的指示精神,并针对国民党军发动“围攻”以来大别山区的形势变化,和根据地新建立,中心区山高路陡,回旋余地狭小,粮食困难,不利于大兵团宽大机动,决定实行分兵:以主力部队结合军区武装,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争;同时分兵乘虚向桐柏、江汉、淮西实施战略再展开。并将野战军指挥机构一分为二,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简称“前指”)及第2、第3、第6纵队,在大别山区坚持;刘伯承、张际春率中共中原局、野战军后方指挥所(简称“后指”)及第1纵队,向淮西地区(指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展开。第10纵队向桐柏区、第12纵队向江汉区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

12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鄂东黄安县周家墩发出关于粉碎国民党军“围攻”给全军的指示信,指出: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各纵队及鄂豫、皖西两军区部队反“围攻”作战要领是:

① 《中共中央文件汇集》1947年(下),第235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38页。

“（一）主动宽大机动，待敌疲困时，寻机歼敌一路；（二）以一部主力（二纵），在外线分散活动，坚决打敌弱点；（三）军区、分区以一部适时转移至外线，大肆活动，特别是断敌补给线，留适当兵力在内线，以积极进行的游击战术，疲困敌人，保护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反清剿，侦察敌情；（四）各部各区深入动员，敌是垂死挣扎，并不可怕，反对右倾，坚决打敌，特别在决战时，不怕伤亡。只有粉碎敌人之进攻，才有巩固的根据地。”

中原局和野战军前委号召大别山根据地军民立足全局、多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拖住“围剿”军主力在大别山几个月，便于陈粟、陈谢两军大量歼敌，并掩护第1、第10、第12纵队向淮西、桐柏、江汉地区战略再展开。刘伯承、邓小平指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拚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它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上则完全相反。过去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防御，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而只是敌人垂死前的回光反照。”“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在全国各兄弟战略区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攻，把大别山根据地巩固起来。”^①

三、刘邓大军主力转战大别山

11月下旬，国民党军发起“围剿”前数日，刘邓大军第2、第3、第6纵队相继由英山、罗田、黄梅、广济、浠水间地区渡巴河西进经扶、黄安、麻城间地区；第10纵队进至光山何家畈地区，第12纵队进至黄安七里坪地区，第1纵队进至定远店、宣化店地区。

11月27日，白崇禧下达作战令，令各部：“乘匪北移之际，乘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595页。

隙扫清大别山区东部匪巢，预期在亥江（12月3日）以前占领立煌滕家堡、罗田巨巴河之线，控制匪巢。”

12月7日，整编第48、第58师到达商城及沙窝，整编第10、第11师到达光山、经扶，整编第7、第28师到达罗田。其信阳至汉口段铁路线之守备兵力为整编第52师及交警第4总队。

12月1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湖北礼山县（今大悟）东北的黄陂车站正式分兵。刘伯承等率“后指”、中原局900多人和第1纵队，由此北上；邓小平等率“前指”500余人由此向东南进。第2、第3、第6纵队在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兵分数路，跳出“围剿”军合围圈，转到外线——大别山区边缘，在军区、分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分散、疲惫敌人，伺机歼灭零星分散、骄狂冒进之国民党军。

第2纵队于12月3日奉命由文殊寺地区出发向固始一带转移，8日围攻固始城。守敌整编第58师1个营，依托坚固工事固守，整编第48、第58师由商城北上增援。第2纵队乃放弃攻城向固始东南转移。这一行动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嘉奖。刘、邓指出，奔袭固始吸引敌回援，证明我军在外线机动已收效，望鼓励所属发扬之。12月15日，第2纵队在六安至叶集公路上的姚李庙、挥手店地区同整编第46师1个团激战，歼灭其200余人后主动转移，进至商城、潢川、固始间活动。这时，国民党军集中整编第58、第11、第48师企图将第2纵队围歼在曲河、史河间的商城、固始、叶集三角地区内。第2纵队司令部率第4旅适时向西北转至期思集、张庄地区，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12月30日北渡淮河。当尾追的国民党军被吸引至淮河以北后，第4旅又于1948年1月3日南渡淮河，接着收复光山县城。与此同时，该纵第6旅转至光山以北地区。1月15日，第2纵队决定后方机关转至淮河以北，部队则活动于淮河以南地区。

第3纵队于11月底集结在麻城以南白果、夫子河地区。12月上旬进至福田河地区。这时，整编第58、第48师等从商城、潢川

等地赶来企图合围歼灭第3纵队。12月13日，刘邓大军“前指”致电该纵队，指出目前我军宜分不宜合，因此应于当夜转至商城西北，第二步转向商城东北，第三步转至皖西，或经经扶、立煌向南插，作宽大机动，本此原则机动处置，不必请示报告位置。据此，第3纵队决定以旅为单位，相继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转向皖西。1948年1月5日，第3纵队第8旅转至英山县以东罗家铺，第7旅转至六合、舒城、桐城间地区，第9旅转至潜山、太湖间地区。1月6日，第9旅在太湖西北李杜店与清剿店前河一带的整编第25师第108旅4个营接触。当时该旅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战斗打响后，第108旅主力从太湖赶来增援。激战至黄昏，第9旅撤出战斗。这一仗歼灭国民党军500余人，自己也伤亡579人。1月13日，第3纵队司令部及第9旅进至英山东赵家铺、罗家铺，第8旅进至英山北金家铺、峡铺，第7旅进至雷家店、红花埠。在上述地区休整待机。此后，第3纵队即在英山、太湖、岳西地区机动。

第6纵队反围攻开始后，部队适时作了分遣，第16旅活动于罗田、英山、麻城等中心地区，第17、第18旅辗转机动于大别山南麓各县。12月3日，第18旅和第17旅1个团乘整编第85师西移，宋埠空虚之际，突然围攻宋埠，歼灭麻城县县长以下地方团队2250人。4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该纵队，指出全歼麻城县县长及2个保安大队，其意义绝不减于歼敌1个旅，特电嘉奖。12月24日，正在英山坚持内线斗争的第16旅，抓住青年军第202师第2旅第6团孤守广济县城之机，从英山急行军100多公里，奔袭该城，一举歼灭守敌1800余人。当整编第7师闻讯赶来增援时，第16旅早已转移，使其扑空。1948年1月8日，第17旅奔袭黄陂长轩岭，全歼保安团1个中队。

在野战部队实施机动作战的同时，鄂豫、皖西两军区部队及各军分区、各县区干队，也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在内线进行了艰苦的反“清剿”斗争。他们伪装主力不断袭扰、扭击所在地之国

国民党军；捕捉战机歼灭小股正规军与地方保安团队；掌握敌情动向，主动向野战部队报告；以一切努力破路、割电线，断敌交通联络；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反抓丁、反抢粮、反掠夺的斗争；摧毁敌人的乡保政权，保护人民的利益。

皖西军区部队，在1947年12月1个月内，歼灭国民党军1900余人。在1948年1月，作战75次，歼灭敌军约1300人，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170余枝。

鄂豫军区部队，1947年12月下旬奔袭黄冈以东之上巴河，歼灭4个保安中队及摧毁7个乡公所，共400余人，缴轻机枪7挺。随后又在浠水以北之关口、钱家寨，广济东南之濯港，黄梅以南之蕲春等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团队千余人。

自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第2、第3、第6纵队和鄂豫、皖西军区地方武装，在大别山根据地人民群众支持下，内外线密切配合，游击战与运动战灵活运用，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团队1.5万余人，收复太湖、英山、立煌、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等12座县城。

刘邓大军主力在大别山险恶的环境中，能够立于主动，不被国民党“围剿”军歼灭，反而给“围剿”军以沉重的打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李达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分遣与集中相结合的机动歼敌方针。其主要内容，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在当时就作了科学的总结。

关于斗争方针：“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展新区，吸敌回顾，配合内线反‘清剿’斗争，抓紧空隙，执行与深入土改。”“（一）以必要兵力坚持内线反‘清剿’斗争任务，适时分遣集结，力争打小歼灭战（一个班也好）。（二）乘虚奔袭敌纵深薄弱地带，除可开辟新区工作外，迫使敌回顾。凡所有部队，均应主动地机动与休整，避免被迫的退却，不厌转移。强化情报通讯，确实掌握情况，争取出敌不意，抓空开展工作。（三）发扬高度进攻精神，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

夜袭、火攻、捕捉、破线、破路等，才能杀伤敌方人马、破坏交通、物资，消耗疲敌。”

关于行动要旨：“甲、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向外。主要应在外线拉敌。乙、以小对大，以大打小。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队远离敌主力。丙、不打消耗仗。丁、积极找敌弱点，在进退时都取进攻姿态。戊、应组织对敌有力的伏击。己、应酌情埋藏笨重东西，使运动轻便。庚、极端注意休息及巩固部队，避免不应有的减员。辛、有计划地协同地方工作。”^①

四、刘邓大军一部向桐柏、江汉、淮西展开

桐柏、江汉、淮西均为中原战略要地。桐柏区位于豫西南和鄂西北交界处，东隔平汉路与大别山相邻，西、北傍伏牛山与豫陕解放区呼应，南临汉水与江汉地区相接。江汉区位于鄂北，东临武汉，南连长江，西依巴山，北接桐柏，是长江中游重镇武汉的屏障和西进四川的门户。淮西区位于淮河西北岸至沙河一带，是鄂豫、皖西、桐柏、豫皖苏和豫西解放区的结合部。桐柏、江汉、淮西三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著名的粮仓。由于国民党军主力被吸引在大别山，这三区兵力薄弱，为解放军乘势而入、建立根据地提供了机会。

（一）开辟桐柏区

12月5日，第10纵队司令员王宏坤率纵直、第28旅、第29旅第87团、第30旅第89团为北路；第29旅第85、第86团和第30旅第88团、第90团为南路，准备在平汉路信阳以南、广水以北地段西进桐柏山区。国民党军发觉后，一面以交警第4总队、整编第52师第98团、补充第1团，整编第56师第163旅等部在西双河、谭家河间地区堵截；一面利用信阳地区方便的交通，迅速调来整编第20、第10师，企图合围第10纵队。12月6日晚，第10纵队北路部队冒雨从柳林西越平汉路，7日在谭家河地区落入

^① 《从延安到北京》第276—278页。

国民党军合围圈内。北路部队主力向西双河猛扑，一部向谭家河南侧突击。经3昼夜激战，至9日晚，终于突破重围进入了桐柏山区。与此同时，南路部队在武胜关以南篁店地区越过平汉路也到达桐柏山区。蒋介石宣称：“第十纵队窜到柳林附近，遭受国军歼灭性的打击，伤亡殆尽。”^①国民党报纸大登活捉王宏坤的假消息。其实，这都是为着刺激国民党军官兵的士气罢了。据第10纵队1948年1月5日报告，过平汉路损失兵力1539人，各种枪500余枝，各种炮11门，各种炮弹213发，以及银元1739枚，冀钞262万元，中州钞30万元。

12月13日，中共桐柏区党委、军区、行署在湖北应山县成立。徐子荣任区党委书记（未到任，刘志坚代），王宏坤任军区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许子威任行署主任。

桐柏军区组建后，第10纵队改为桐柏军区部队。12月15日，第28旅第84团袭占桐柏城，全歼保安团700余人，取得进军桐柏的第一个胜仗。1948年1月11日，桐柏军区部队攻克豫西重镇邓县县城，全歼集聚于此地的11个保安团，共1万余人。经过1个多月作战，先后解放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邓县等6座县城，建立了4个军分区和22个县级人民政权，形成了拥有150万人口的桐柏解放区。

（二）开辟江汉区

在第10纵队挺进桐柏地区的同时，担任开辟江汉区的第12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于12月6日在黄安华家河会合，组成江汉军区，同时成立中共江汉区党委和江汉区行署。刘建勋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赵基梅任军区司令员，郑绍文任行署主任。

江汉军区成立后，在李先念主持下，军区党委在湖北礼山（今大悟）以南的陈家湾召开会议，研究军区的划分、各级编制和作战部署。李先念在会上宣布了中原局的决定：江汉军区辖区，东

^① 蒋介石：《清剿大别山区匪军之方针》，1947年12月29日。

接鄂豫军区，以平汉路为界；北连桐柏军区，以襄（阳）花（园）公路为界，含应山和随县两城，不含枣阳和襄阳两城；西至巴山、宜昌；南界长江。第12纵队改为江汉军区部队。

12月14日，刘建勋、赵基梅率江汉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共1.2万余人，由陈家湾地区出发西进。15日，在广水、花园之间分3路西越平汉铁路，进入江汉平原。

12月20日，军区独立旅进攻京山县城，守敌弃城而逃。23日，独立旅日行75公里奔袭钟祥，全歼湖北保安第2总队1300余人。1948年1月7日夜，独立旅攻占鄂北重镇随县，歼保安第4总队1400余人。1月8日，江汉军区组织襄西支队，挺进襄河以西，开辟荆门、当阳、远安地区。经过1个多月作战，先后解放京山、天门、应山、随县等5座县城，建立了4个军分区、12个县政权，开辟了以大洪山为中心，纵横350公里，拥有300万人口的江汉解放区。

至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再展开的艰巨任务。邓小平在1948年1月15日致中央军委电报中说：“两纵过路后，因吸收了大别山经验，先配好了干部，配好了各分区各县武装，故展开极为迅速，情绪很好。各占五座县城，仗也打得很好。”1948年8月24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里写道：“对于展开，也应尽可能做到预有准备，大别山因无准备，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才展开完毕，江汉、桐柏两区吸取了大别山的经验，预先配好分区、地委、专署及县级党政军的一套机构和部队，故十天半月就大体完成了展开的任务。”^①

（三）开辟淮西区

早在1947年2月中旬以前，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率部与原第1纵队留在淮西的骑兵团，即在淮西剿除土匪4000余人，开始分浮财，并收编了地方土匪、保甲武装6000多人。刘邓大军千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25页。

里跃进大别山时，曾经过此地。刘邓大军走后，当地地主即将财产、粮食隐藏起来或转移，并利用三青团、特务、保甲势力组成反动地方武装，同人民解放军对抗。

12月11日，刘伯承率中原局、野战军“后指”，在第1纵队第20旅掩护下经宣化店、定远店等地北上。

16日，顶着暴风雪从河南息县东南的潘寨西侧徒涉北渡淮河，进入淮西，22日与豫皖苏军区部队会合。24日，第1纵队攻克汝南县城，俘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副司令温汉卿以下1800人。此后，该纵队向西发展，积极配合了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并同他们会师平汉路。

12月28日，中原局发出指示，强调指出：“为了变淮河为内河，使平汉路东西地区衔接成面，并使豫皖苏与鄂豫皖确实联接，以便我军在淮河南北及平汉路东西地区之机动起见，加强淮北、沙南地区（即淮西区）的工作非常必要。”为此，野战军“后指”与豫皖苏军区作出决定：首先由第1纵队和军区部队解决前一时期收编的武装，经整顿后编入解放军建制。同时，由第1纵队抽出3个团，进入息县、汝南、正阳、确山等县活动，建立根据地；派军区独立旅等部队到其他县活动；由野战军“后指”、第1纵队和豫皖苏军区抽调200余名干部，加上当地干部，共约400人，组成3个工委的工作队，深入各县，组织贫农团，开展土改斗争。由于淮西区的开辟，填补了大别山的鄂豫、皖西解放区与豫皖苏解放区之间的空白，使这些解放区连成一片。

五、陈粟、陈谢两军举行平汉、陇海路破击战

为实现中原三军密切配合，粉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区的“围攻”，陈粟大军和陈谢集团均表示，要用全力配合刘邓大军。采取什么方针，什么行动，方能最快、最有力地支援刘邓大军呢？中央军委、毛泽东和中原前线指挥员进行了深入研究。国民党军能够迅速调集几十个旅的兵力，大举“围剿”大别山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条件，就是它控制了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线。正如蒋介石

所说，能够“用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以高速度输送兵力于目的地”，“简单地说，就是要用我军的速度来压制共军的速度。”^①因此，剥夺国民党军机动转用兵力的能力，能够有效地破坏国民党军的进攻。

11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刘邓、陈粟、陈谢三军联合破击平汉路的方案。旋因白崇禧大举围攻大别山，大别山地区情况紧急，刘、邓认为他们破平汉路的计划必须推迟，“以后再找良机，破击平汉路。”^②并认为，陈粟、陈谢两军可按本身情况行动。

12月8日，粟裕、陈赓、谢富治，均同时提出了破击平汉路的方案。粟裕8时电称：“现为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起见，决即转向平汉线许（昌）郑（州）段，或攻开封，以调动南线之敌。”^③陈赓、谢富治12时电称：“我们建议陈粟主力及我纵即刻出动，破坏平汉郑州、信阳段……以配合刘邓作战。”同日12时，毛泽东也致电刘、邓、陈、谢并告粟裕，指出：“因为敌人向大别山进攻，刘、邓已停止破平汉计划，这是对的。请陈、谢考虑是否仍有单独破击许信段铁路之必要，如陈、谢以五个旅破该段，第一可使该路暂时切断，第二可将李铁军调至东边，以利下一步向西行动，但是否可行望按实情决定。”^④刘伯承、邓小平收到粟裕8日8时电后，致电陈、谢，告其“华野拟于元日（13日）左右对开封或平汉路郑许段发动攻势（似以对平汉线为有力）以配合大别山。陈谢应集结现有部队同时破击平汉路许昌确山段。”9日14时，中央军委批准了陈粟、陈谢两军联合举行平汉路破击战的计划，指出：“（一）如无重大不便，粟部以攻击平汉郑许段以配合陈谢攻击许

① 蒋介石：《快速纵队之特性及其使用之方法》，1948年3月10日。

② 刘伯承、邓小平1947年12月4日致中央军委，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电。

③ 《粟裕军事文集》第336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57页。

信段为宜。郑许战役结束后，再打开封，并彻底平毁陇海郑州、兰封段似亦方便。（二）如粟定于十三日攻郑许段，则陈谢攻许信段时间，可与粟同时举行，亦可提早几天举行。”^①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决定全军分3个方向，以第1、第3、第4纵队为一个方向，破击平汉路郑州至许昌段和陇海路郑州至开封段，相机攻占一些城镇；以第6、第8纵队为一个方向，在睢县、柘城地区抗击整编第5师和第75师的增援；以第10、第11纵队为一个方向，负责破击柳河至开封段铁路，相机攻克兰封、民权等城镇。陈赓决定以第4、第9纵队主力，由方城、宝丰地区东进，破击平汉路许昌至驻马店段，并以一部兵力监视、阻击整编第3师之东援。

12月13日，陈粟、陈谢两军按计划对平汉、陇海路展开了宽正面的大破击。至22日，共破路420余公里，歼沿线国民党军2万余人，攻克平汉路上的新郑、长葛、许昌、临颍、漯河、遂平、驻马店、确山，包围郾城；陇海路上的中牟、兰封、民权、柳河等城镇、车站，共23座。21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祝贺你们两大军团统一行动破击平汉、陇海两路之伟大胜利。”

陈粟、陈谢两军破击平汉、陇海路，其主要意图是要调动进攻大别山之国民党军回援，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但这时，国民党军方面仍继续坚持以其主力“围剿”大别山，仅以南阳地区的第5兵团司令官李铁军率整编第3师，经明港沿铁路北上；以信阳地区的整编第20师杨干才部，经正阳北上，以郑州地区的整编第41、第47师南进，企图恢复平汉路交通，并解郾城之围。因此，如不再给国民党军沉重打击，是难减轻大别山方面压力的。12月19日，粟裕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中央军委说：“至此刻为止，平汉路已破坏。但敌对大别山之‘清剿’计划，迄未改变。似拟集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41页。

中全力，弄垮我大别山后，再转移兵力，以对付其他地区。因此，我们及陈谢必须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请陈谢提出配合意见。并请军委、刘邓予以指示。”^① 12月20日16时，中央军委致电粟裕、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完全同意”粟裕19日意见。并提出“配合方法：除八、十及十一纵照粟电转至民权，相机歼灭吴化文及新二十一旅，攻占商丘，再东向破击津浦外，主力三、四、六、一等四个纵队，提议由粟亲率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沿途节节破路，攻克一切可能攻克之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之敌军。尔后看情况，或与刘邓配合夹击大别山之敌，或回师向北打各分散之敌。”中央军委认为，“如此行动，可保证粉碎敌人进攻大别山之计划，又可全部破坏平汉路。”^②

整编第3师原被陈谢集团第4纵队第13旅牵往南阳以西，复又被该纵第11旅牵到平汉路明港。12月19日，该师奉陆军总部郑州指挥部电令，着与整编第20师星夜兼程沿平汉路齐头北上，迅速解郾城之围。至22日，该师进占确山、驻马店、遂平。

在整编第3师占领确山的当日，即12月20日10时，粟裕致电陈赓、谢富治并报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我为继续配合刘邓，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是否可让敌整三师等部北来，我们协同作战，择敌而歼之”^③。同日14时，陈赓、谢富治也致电中央军委、刘、邓、粟裕，为配合刘、邓，“我们意见，必须给敌以直接与有力的打击”。他们建议，“粟部主力和我们由平汉线及平汉两侧齐头并进，首先消灭正在确山以南集结之整三师，然后直迫信阳。”中央军委收到陈、谢20日14时电后，于24时致电粟裕：“如你们同意向南，即可部署行动。似此，你们应不为从前

① 《粟裕军事文集》第337—338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44页。

③ 《粟裕军事文集》第338页。

划定之界线所束缚，而向整个平汉路及其两侧机动，以破坏平汉路及歼灭敌若干个旅为目标（希望能歼敌五六个旅）。”^①

粟裕决定以华东野战军第1、第3、第6纵队和陈谢集团第4纵队主力及第9纵队1个旅，南下求歼整编第3师、第20师，尔后视情况再向南扩大战果。李铁军发觉解放军南下有被围歼危险，乃于24日率整编第3师进至遂平、西平间的金刚寺、祝王砦等地，转入防御，固守待援。25日晨解放军发起攻击。第3纵队对退守金刚寺的整编第3师第20旅发起攻击，26日拂晓将其歼灭。陈谢集团第4纵队等部对据守祝王寨的第5兵团部及整编第3师师部、第3旅发起攻击，至26日19时，除李铁军率少数人员逃跑外，其余全部就歼。

整编第3师失败如此之快，其原因，国民党军方面检讨说：一是蒋介石及陆军总部郑州指挥部“所示之战略情报错误甚大”。认为进犯郑州许昌间的陈粟大军已被击溃东撤，平汉铁路以东已无“匪踪”，因此“着师前进，可勿顾虑。”二是整编第3师师长李楚瀛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他认为陈赓的第4、第9纵队，“前在豫西一带屡经我师痛击，其九纵队已溃不成军，四纵亦曾受重创”，如果当面仅为陈赓部，“则以我师单独北进亦可击破该匪，达成解救郾城之围任务。”由此，“遂至孤军深入，陷入陈、刘、陈三匪之重围，致无法补救之失败，至为遗痛。”^②

26日，抵达确山以北吴桂桥地区的整编第20师得悉整编第3师被歼，即于27日夜退回确山。陈粟、陈谢两军乘胜南下，急行军近百公里，包围了确山城。这时，蒋介石命令第20师师长杨干才“全力固守确山”，令整编第10师、第9师“即向正阳、明港急进，解确山之围”；令整编第11师主力经息县“向确山方面驰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46页。

② 《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三师李楚瀛部西平祝王砦之役战斗要报》，1947年12月。

援”；令汉口空军第4军区“以全力支援二十师在确山之战斗”^①。12月28日23时，解放军向确山车站及东关等处猛攻。但由于是陈粟、陈谢两大部队联合作战，在区分任务时，是按照缴获的国民党军用地图划的界限，地图将位于城南的全城制高点——V形阵地漏画，双方都没打。整编第20师在空军支援下、凭借V形阵地，顽强抵抗。31日，由大别山来援的整编第11师先头第118旅已抵达正阳西宋店，同从大别山跳出转至淮西地区的刘邓大军第1纵队发生战斗。鉴于部队连续作战，甚为疲劳，伤亡较大，且调动了大别山“围剿”军回援平汉路，粟裕决定于31日晚撤出战斗。陈谢集团转至襄城、繁城一带，陈粟大军转至沙河以北地区进行休整。平汉路战役即告结束。

陈粟、陈谢两军举行平汉路破击战，自12月13日至31日历时22天，歼灭国民党军共4.5万余人，解放县城50余座，破坏铁路420余公里，迫使国民党军先后由大别山抽调13个旅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并且因国民党军辗转机动之有利条件被剥夺，兵力不足，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之弱点更加暴露，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创造了大规模歼敌的有利条件。

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集团三军内外线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经过1个多月紧张、艰苦的斗争，共歼灭国民党军6.9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剿”。刘伯承在《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文里写道：白崇禧“本来是想抓住大别山不放的，开始，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赓兵团在平汉线上几乎打烂了敌人的屁股，敌人还是咬着牙忍着痛不肯回师救援。但是，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月，敌人不但在大别山碰得焦头烂额，丧师减员，毫无所得，而且丢掉了桐柏、江汉和淮西广大地区，使他们的长江防线、武汉重镇和信阳基地直接暴露在我军的攻击面前。平汉、陇海两线又连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赓兵团的严重破击，蒋介石眼看中

^① 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大别山清剿作战总结报告书》之五。

原不保，就不得不放弃对大别山的一点围攻，从大别山的周围先后调走十三个旅的兵力去巩固中原地区的铁道线和大中城市，采取全面防御中的中原重点防御。这样，国民党便只得退守据点，从而陷入线线被动、点点被包围的态势。敌人在中原的全面防御体系遭到了粉碎、被迫转为分区防御，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① 合众社上海 1947 年 12 月 29 日写道：“白崇禧华中指挥部对大别山为时几达两个月的集中进攻，所得结果不过是：一、刘伯承部分成若干小股，互相呼应；二、刘军回到大别山基地；三、共军在鄂北大洪山建立了新基地；四、另一路共军包括一部分刘军，在汉口宜昌公路沿线建立了基地。”白崇禧不得不承认，他虽然占领了大别山各县城和重要据点，“不过匪的全部主力尚未击溃”。他说，“按过去鄂豫皖三省剿匪当时我们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尚费时三四年，今天要清剿大别山区匪患，必须假以时日，才能完成清剿的全功。”^②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反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围攻”的胜利，标志着刘邓大军已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指出的挺进大别山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正如邓小平在 1948 年 1 月 15 日致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③

至此，三军挺进中原，密切配合，机动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 19 万余人，解放县城 100 余座，在 4500 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解放区。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 160 多个旅中约 90 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④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 597—598 页。

② 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纪实》。

③ 转引自《从延安到北京》第 288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93 页。

第三章 内线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反攻和进攻

第一节 西北野战军成立与举行战略反攻

一、西北野战军成立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1947年7月31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电，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为司令兼政委。”^①同时，批准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由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组成，彭德怀为书记。至此，人民解放军就形成了五大野战军，即西北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

西北野战军，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兼任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副参谋长王政柱，后勤司令员刘景范，辖3个纵队另2个旅、1个山炮营。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廖汉生，辖独立第1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第358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辖独立第4旅，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第359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李铨。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辖独立第2旅，旅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独立第5旅，

^① 中央军委1947年7月31日致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电。

旅长李夫克，政治委员王亦军；独立第3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留在山西作战，1949年6月归建）。另2个旅是：新编第4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黄振棠；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这时，除独立第3旅外，全军共8个旅，约4.5万人^①。“野战军除作战指挥上属于野司外，建制上归联司。”^②

根据中共中央1947年7月小河会议的决定，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其他领导成员是：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

二、一打榆林，诱调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

1947年夏，西北战场战局的发展，同全国其它战场一样，对国民党军也不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战略集团，虽攻占延安，占领了陕甘宁解放区的所有县城，但要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歼灭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的企图未能实现，且因作战地区扩大，兵力分散，补给困难，而埋怨增多，士气下降，悲观失望。西北行辕所属的马鸿逵、马步芳部在陇东和定边、安边（今安边堡）、靖边地区遭到沉重打击，行动谨慎。北平行辕张垣绥靖公署所属之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兵力不足，正忙于加强榆林地区的守备。马鸿逵、马步芳、邓宝珊均非蒋介石嫡系，同胡宗南亦有矛盾。他们为保存实力，在反共作战方面存有异心。

西北人民解放军以数万人对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几十万人的压力，处境困难，但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

① 关于西北野战军总兵力，还有一说是5万人，见《毛泽东年谱》第213页。

② 《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页。

③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指挥，连续打了许多胜仗。全军“信心甚高，士气甚壮。”在此情况下，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为将胡宗南的主力牵制在陕北，以保障陈谢大军南渡黄河、进军豫西和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遂决定主动出击，攻击榆林。

夺取榆林，中央军委早有考虑。1947年5月，毛泽东曾确定把陈赓纵队由晋南调入陕北，在彭德怀指挥下，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歼灭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队，以夺取大西北为目标。6月13日，中央军委预计陈赓纵队到达陕北后，第一个作战就是在独立第5旅配合下打榆林。7月，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陈赓纵队不到陕北，西北野战军独立担任攻打榆林之任务。27日，中央军委在电报中，要求陕甘宁边区部队于8月8日左右“开始攻击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主力北援”^①，以利刘邓大军南进。

榆林地处陕西、绥远、山西省之要冲。北依长城，西隔榆溪河（今榆林河）为广阔的沙漠，其它三面环山。山上高地多为沙丘，城垣为砖石结构，尚称坚实，城南凌霄塔及9.18高地不仅可俯瞰城区，而且是控制机场之要点。这里是陕北与晋西北逃亡地主的集中地，也是国民党军包围、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国民党方面认为，榆林一旦失陷，“不仅晋、绥、陕边区之匪可连成一气；且将予匪囊括河套，直接沟通俄、蒙国际通路之利。于是榆林成为匪我必争之要点。”^② 为确保榆林，蒋介石在此设立“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由邓宝珊任总司令，指挥陆军第22军（辖第86师及新编第11旅）驻守。1946年11月和1947年春，胡宗南将其嫡系整编第36师第28旅2个团6000余人，次第空运榆林，以加强榆林的防务，并监视邓宝珊部。这样，到1947年7月，归邓宝珊指挥的部队计有1个军及1个整编旅，连同地方部队，共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册，第152页。

^②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下），第222页。

1.5 万余人^①。其部署是：第 86 师第 256 团团部率第 2、第 3 营、补训第 1 营驻高家堡、乔岔滩，第 1 营驻响水堡；第 257 团及补训第 2 营分守青云山、古庙梁、店河峁、流泉河、双山堡地区；第 258 团及补训第 3 营驻神木、府谷。第 28 旅 2 个团分驻归德堡、米家园子、刘官寨、鱼河堡地区。新编第 11 旅第 1 团驻守榆林城内及五里墩、三义庙；第 2 团驻三岔湾。陕西保安第 5 团驻横山。

根据榆林地区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彭德怀决定：以第 2 纵队、新编第 4 旅、教导旅经镇川堡进攻鱼河堡、归德堡、三岔湾等地，尔后第 2 纵队包围城北及城西北，新编第 4 旅包围城东南，教导旅为预备队；以第 1 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第 4、第 6 团围攻响水堡，掩护第 2 纵队北渡无定河，协同歼灭三岔湾守敌后，包围城南及城西南；以第 3 纵队、独立第 5 旅进攻流泉河、青云山，独立第 2 旅进攻高家堡、乔岔滩，歼灭上述各据点守敌后，包围城东。参战兵力计 8 个旅，连同绥德军分区 2 个团，共 4.5 万人，三倍于榆林守军。彭德怀在作战会议上讲到进攻榆林的意义时说，“毛主席说过，这里是战略牵制区，要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把敌人拖住在陕北，不让他走。我们拖他，毛主席、党中央也在这里拖住他，胡宗南的部队就走不了。”^② 他号召全体指战员打好这一仗。

7 月 30 日，西北野战军轻装后由大、小理河地区的双湖峪、周家岭等地向榆林攻击前进。8 月 4 日晚，邓宝珊得悉西北野战军已到通秦寨、镇川堡、响水堡之线，于 5 日上午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他采纳部下意见，决定除神木外，放弃所有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榆林城郊。其指挥部亦于 7 日晨由城外金刚寺移城内，并作了如下守城部署：以第 28 旅第 83 团（欠 1 个营）守南城，第 82 团（欠 1 个营）守南门外凌霄塔高地及三义庙据点；以总部特

① 关于榆林守军，国民党军方面资料为约 2.5 万人。

②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7 页。

务营一部和第22军之工兵、辎重、补充等营守西城；以第86师炮兵营、工兵连及军通讯营大部守北城；以第257团及第86师直属队一部守东城。在其调整部署过程中，守卫三岔湾的新编第11旅第2团和守备高家堡的第22军第256团被解放军歼灭。

至8月6日，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攻占城南之南桥、五里墩和飞机场。第2纵队攻克城北的镇北台、北岳庙、观音滩等阵地。新编第4旅占领归德堡、青云山、金刚寺。独立第5旅攻克流泉河、店河峁，及城东无量殿高地。独立第2旅6日攻占高家堡、乔岔滩。7日9时，西北野战军已四面逼近榆林城。

榆林被西北野战军围攻后，蒋介石急忙于8月7日上午经西安飞抵延安，17时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增援榆林方案。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决定要点是：

“（一）榆林守军必须坚强固守，以待援军之到达。

“（二）整三十六师即驰援榆林。

“（三）驰援时，应以迂为直，避开绥德、横山正面匪之阻援，改循保安（今志丹）、靖边，出长城，沿伊盟南端边缘挺进，出敌不意，一举进出榆林。

“（四）进抵榆林周边后，应与守城友军切取联系，合力内外夹击而捕歼之。

“（五）整三十六师前进时之补给，由空军逐日投送粮弹支援。”^①并限令该师于11日进抵榆林。

胡宗南集团主力整编第1军第1、第90师及第76师第144旅，整编第29军第36师、整编第17师之第12旅及第38师之第55旅计10个半旅共6.3万余人，由安塞、志丹地区分两路向绥德、米脂和横山方向急进。8月7日晚，蒋介石召集胡宗南再次研讨榆林战况，并拟致邓宝珊、第22军军长左世允、第28旅旅长徐保的书函。翌日空投榆林，要其坚守待援。蒋介石还在接见整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下），第226页。

编第 27 师军官时说：“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八月底定须肃清。”^① 在榆林作战期间，国民党空军共出动飞机 165 架次，空投粮秣 258 吨、弹药约 4 吨。

中央军委非常关心西北野战军榆林之作战。在获悉胡宗南主力北进和整编第 36 师钟松部组成援榆快速兵团，绕道横山西北，星夜兼程，进逼榆林时，于 8 月 7 日致电彭德怀，速派部队在横山地区阻滞援榆之胡军。9 日又电告彭德怀：胡宗南“令钟松率五个团，以三至四天行程，由靖边经横山赶至榆林近郊增援，望立即派有力部队封锁无定河，阻其前进，至急至要。”^② 据此，彭德怀令教导旅并指挥绥德军分区 2 个团，由鱼河堡、响水堡进至波罗堡、横山地区，阻击整编第 36 师。

8 月 10 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开始攻城。第 2、第 3 纵队进攻北门和东门，强攻与爆破均未奏效。第 1 纵队一部炸开小西门，攻入城内，因后续部队未及时跟进，战至翌日拂晓，被迫退到城外。11 日 4 时 30 分，彭德怀接第 2 纵队司令员王震报告：“昨晚城墙作业及运动中略有伤亡，攻城器材未消耗”，“我已明令改至今晚登城。”^③ 彭德怀于同日卯时（5—7 时），致电中央军委，如董钊、刘戡两军徘徊不进，11 日晚再攻城；如在 13、14 日可到，“决围城打援。”^④ 11 日晚，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攻城，因攻城部队爆破准备不充分，第 1、第 2 纵队 6 个爆破口均未炸开；独立第 2 旅刚至城郊，准备不足，仓促参战，加之爆破药量不够，攻城亦未成功。

8 月 11 日，中央军委收到彭德怀当日卯时电后于午时（11—13 时）致电彭德怀：“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

①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版，第 204 页。

② 中央军委 1947 年 8 月 9 日 2 时致彭德怀电。

③ 王震 1947 年 8 月 11 日 4 时半致彭德怀电。

④ 彭德怀 1947 年 8 月 11 日卯时（5—7 时）致中共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电。

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部队，准备于十二日夜或十三日打钟松。”要求西北野战军“宜准备于钟松到达白家涧、古城见之当夜，乘其立足未稳，立即攻击之。”^①这一指示，西北野战军还未来得及执行。因为，这时钟松率领的整编第36师已绕过西北野战军的阻援阵地，先头部队进抵榆林城。

彭德怀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攻榆林未克”，钟松部将进榆林，刘戡部正北进，“我军即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钟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谢行动”^②的指示，决定于12日黄昏主动撤离榆林，第2纵队向榆林东北长乐堡转移，诱敌北进；第1纵队转至归德堡以东万家寺一线山区；其他各部队移到榆林东南归德堡、响水堡、鱼河堡地区，准备再战。一打榆林作战遂告结束。榆林未克的原因，从客观条件看，榆林城高且厚，工事坚固，守军顽强抵抗，援军绕道迅速直逼榆林城，使西北野战军没有获得充裕的攻城时间；西北野战军缺乏攻城兵器，弹药奇缺。从主观上分析，主要是指战员尚缺乏攻坚作战经验，出现第二梯队与第一梯队失去联系的情况；对敌援军增援之快估计不够，阻援举措不力。

西北野战军一打榆林未克，但却实现了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谢集团南渡黄河的战略目的。此役，西北野战军伤1465人，亡395人，失踪30人，共1890人，毙伤国民党军2000人，俘3200人，共5200人，缴获汽车2辆、迫击炮13门、重机枪17挺、轻机枪122挺、马步枪1800枝。从而削弱了陕甘宁边区北线邓宝珊的军事力量，并收复和占领了横山、响水堡、鱼河堡、归德堡、高家堡等城镇及广大地区，使陕甘宁边区北线得以巩固。

在战役过程中，西北野战军个别部队曾发生了破坏纪律的行为。第3纵队攻占高家堡后，该纵接产委员会没收了国民党军大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91页。

② 中央军委1947年8月12日9时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

部官佐以至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对商人及摊贩财物也大部没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1948年1月2日，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就此事报告中共中央。1月9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① 这个批示，不但对西北野战军，而且对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

三、沙家店战役，扭转西北战局

西北野战军撤围榆林后，胡宗南之整编第36师主力于8月14日14时进入榆林城；整编第1、第29军主力继续向绥德、米脂前进。毛泽东分析了南面敌情后指出，该路胡军可能于16、17日进占绥德、义合，为使在无定河、黄河之间“我各后方机关及医院”免遭损失，毛泽东要求彭德怀“率主力控制归德堡至镇川堡一线之无定河两岸，准备七天携带的粮食，以利必要时机动”；要求贺龙、习仲勋立即部署后方机关及医院，“于五日内分路渡过河东，俟敌情变化再回来。”^② 根据上述指示，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在野战军主力一部掩护下，冒着狂风暴雨，沿螭蜊峪大川东行，于8月18日渡过黄河。这一行动，给国民党军指挥上造成了错觉。

胡宗南依据电台测向、空军和地面侦察所得情报，判断西北野战军攻榆林不克，“损失”巨大，“仓皇逃窜”，势将东渡黄河，因而定下“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的决心。8月15日，整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68页。

^② 中央军委1947年8月12日24时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

编第1、第29军在绥德会合。胡宗南即以整编第1军军部指挥整编第1师3个旅守绥德，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指挥该军及整编第1军之整编第90师共5个旅，向葭县（今佳县）急进；令整编第36师由榆林向镇川堡方向前进，“协同整29军压迫彭匪主力于葭县附近黄河地障而歼灭之”^①，或者将西北野战军赶到黄河以东，实现蒋介石的8月底必须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肃清陕北解放军的既定目标。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为“胜利”冲昏头脑，自认为援榆有功，又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十分骄横，到达榆林的第2天，除留下辎重部队等待补充外，率2个旅4个团南下，妄图与刘戡主力会合，再立战功。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将被国民党军挤压在葭县、米脂、榆林3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内，不仅西北野战军回旋余地很小，而且中共中央领导的处境亦异常危险严峻。为保障中共中央的安全，彭德怀派许光达率第3纵队到乌龙铺、曹庄一带接应，掩护中央机关转移，后又急电中央军委，请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向葭县西北移动，与野战军主力靠近。同时，加强侦察，准备粉碎胡宗南的合围计划。

榆林战役刚结束，彭德怀即就下个歼击目标请示毛泽东。8月13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认为“不怕胡军北进，愈深入于我有利。”^②一则有利于陈谢集团行动，二则西北野战军可以寻找到歼击良机。彭德怀打算，“野战军争取三至四天休息，准备歼击五十五旅、十二旅或第一师。”^③就是说，歼灭北进的刘戡军一部。毛泽东也考虑打南面敌人，曾在8月14日1时致电彭德怀：“目前情况下宜集中八个旅准备迎击刘戡。”^④毛泽东还于同日8时电告彭德怀，提出是否可先打北面整编第36师。他指出：“钟松本早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下），第228页。

② 彭德怀1947年8月13日致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电。

③ 同上。

④ 中央军委1947年8月14日1时致彭德怀电。

在榆林接受投粮，估计本下午可能向南走二三十里，明日必向镇川前进，其目的是占米脂。刘戡五个旅十六（日）上午可到绥德。明日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归德、镇川线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不知部署来得及否。”^① 这时，西北野战军集结在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该地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军，侧水侧敌，回旋余地狭小，但正处在整编第36师南下米脂的道路上，利于部队隐蔽机动。彭德怀接到上述电报后，于当日未时（13～15时）将作战部署报告中央军委，“我们准备歼击”整编第36师，“总的意图，集中二、三两纵，教、新两旅，由西北向东南歼击三十六师于李家沟、鱼河堡、上盐湾及其以北地区。”^② 中央军委“完全同意”彭德怀上述部署，并提请彭德怀“注意分割该敌为几部分，逐一歼灭之”。因为刘戡16日进占绥德，17日补粮，“18（日）才能开始北进，故南面顾虑甚小”^③。即是说，可以集全力打钟松。

8月15日，整编第36师沿无定河南岸行进，没有走鱼河堡至镇川堡公路，因而避开了西北野战军预设阵地。西北野战军鉴于隔河出击不利，主力乃转至镇川堡东北之石窑坪、柏树堰地区待机。整编第36师侥幸躲开了在李家沟、鱼河堡、上盐湾遭合击的厄运，但仍孤军冒进。

8月17日，刘戡部进到米脂东南的吉征店（今吉镇）以南地区；钟松以第123旅附第165旅第493团为前梯队，由镇川堡绕过沙家店向乌龙铺前进，师部率第165旅（欠第493团）为后梯队，在沙家店以西地区跟进。预定刘、钟两部在乌龙铺会合，以期消灭西北野战军于黄河边。

彭德怀判断，整编第36师主力必将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因此

① 中央军委1947年8月14日8时致彭德怀电。

② 彭德怀1947年8月14日未时（13—15时）致中央军委电。

③ 中央军委1947年8月15日2时致彭德怀电。

决心集中主力在刘戡、钟松两部夹击之势尚未形成之前，利用整编第36师一字摆开，孤军前进的有利时机，以伏击手段在沙家店地区歼灭钟松部，粉碎胡宗南的企图。其部署是：第3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进至当川寺南北高地，牵制钟松的前梯队并准备阻击刘戡部增援；第2纵队及教导旅、新编第4旅进到东沟、高家圪塔、宋家井地区集结，待第3纵队与钟松前梯队接触和第1纵队切断该梯队退路后，向钟松的后梯队发动猛烈攻击；第1纵队集结于高柏山、老虎圪塔地区，待第3纵队打响后，主力绕至沙家店东南地区，由西南向东北攻击，配合第2纵队等部先歼灭钟松的后梯队，尔后集中兵力再打他的前梯队。

8月18日晨，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向集结地开进，先于钟松部赶到预定地区隐蔽。19日，钟松部后梯队从镇川堡出发，当日下午进到沙家店附近地区。

8月19日，彭德怀报告中央军委，现在钟松部已进入我预设阵地，“拟于明日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灭之。”^①20日3时，中央军委复电彭德怀，“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②。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已转到葭县梁家岔，并与彭德怀指挥部（位刘全塔）架通了电话。

19日晚，整编第36师后梯队刚通过沙家店，钟松即发现附近有西北野战军主力，乃一面令部队在泥沟则以北、张家坪以东占领阵地，抢筑工事；一面急电前梯队速向沙家店靠拢。但前梯队指挥官第123旅旅长刘子奇害怕夜间行动遭到伏击，仅派配属其指挥的第493团连夜向师部前进。天明后，第123旅再行动。

8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对仓促转入防御的整编第36师发起攻击。当彭德怀通过电话向毛泽东报告围歼整编第36师情况

^① 彭德怀1947年8月19日戌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电。

^② 中央军委1947年8月20日3时致彭德怀电。

时，毛泽东大声地说：“好，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①彭德怀发布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英勇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②

8月21日，贺龙、习仲勋、林伯渠等就配合主力作战给各军分区及地方兵团发出指示，指出：“我军主力在葭、米间地区歼敌三十六师，现正激战中。蒋军之后方交通线上兵力异常单薄。”命令各军分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应根据本地区当前情况，“积极的打击敌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可能歼灭的反动武装，摧毁反动政权，策应北线主力作战，及准备配合主力反攻。”要求延属军分区，要“彻底破坏咸榆公路、断敌运输”；绥德军分区，“目前主要的任务，应尽一切力量服从前总指挥，配合主力军作战”，“并尽可能的动员和各分区人力物力，解决野战军之担架、运输、粮食、军鞋等困难，并将已集中之新兵迅速补充野战军。”

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向整编第36师展开猛烈冲杀。第1、第2纵队向其师部及第165旅阵地冲击，至17时，除钟松和第165旅旅长李日基化装，带少数人乘黑夜逃脱外，其余均被歼灭。新4旅和教导旅向第123旅发起攻击，至当日黄昏将其歼灭。

歼击第123旅是全天战役中关键一仗。教导旅原来的任务是配合第2纵队歼击整编第36师主力，但当该旅进至常家高山附近

^① 转引自阎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② 《彭德怀传》第332页。

时，正值第123旅与新4旅争夺常家高山制高点。该高地如被第123旅占领，不仅严重威胁第2纵队翼侧，而且会使已被分割两处的整编第36师各部会合一处，直接影响战役任务的完成。教导旅指挥员当即决定协同新4旅歼灭第123旅。这一行动不仅对取得沙家店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人民解放军指挥员胸怀全局，灵活机动，主动密切配合的协作精神和积极求战的作风。

整编第36师遭围攻后，曾不断向胡宗南呼救。坐镇西安的胡宗南对此束手无策。他在20日日记里记载：“本夜作战会报判断匪以全力攻三十六师师部，其对五十五、一二三、一六五各旅皆为牵制隔绝，使眩惑于眼前形势，不敢奋进，使三十六师师部陷于孤立而被消灭，夜不能睡。”^①胡宗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主力部队被歼，而无可奈何！

沙家店战役，西北野战军毙伤胡宗南的主力师之一、半美械装备的整编第36师2000余人，俘少将旅长刘子奇以下4017人，共计6000余人，缴获山炮7门、各种迫击炮55门、重机枪30挺、轻机枪168挺、其它各种枪2093枝、炮弹956发、子弹20万发。西北野战军伤1435人，亡379人，失踪25人，共计1839人。双方兵力损失为3.27：1。

沙家店战役既扭转了西北战局，也为中共中央机关久住葭县地区创造了安全环境。彭德怀说：这“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②。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胡宗南的猖獗时期也从此过去。8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克服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沙家店战役对西北对全国战局的重大意义。电报指出：“经此一战，

①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206页。

② 转引自《彭德怀传》第333页。

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谢南进。”^① 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骑马由梁家岔到达西北野战军指挥部驻地葭县前东原村，向参加沙家店战役总结会的旅以上干部祝贺胜利，并同彭德怀等指挥员研究部署新的作战。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② 毛泽东又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会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彭德怀陪同下，视察了在沙家店歼灭整编第36师的阵地。沙家店战役的巨大胜利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临祝贺，极大地鼓舞了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使他们增强了继续在现地区作战和敢打必胜、多打胜仗的信心与勇气。

西北野战军侧水侧敌而能取得如此胜利，从战役指挥上总结，主要经验是：第一，严密隐蔽自己的企图，有意造成错觉，争取主动，待机歼敌；第二，充分利用钟松骄横失慎、孤军冒进的弱点，在必经之沙家店附近预伏兵力，待其进入时，集中力量，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第三，教导旅积极机断行事，主动协同新编第4旅围歼了第123旅，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成为夺取胜利的一个关键；第四，发挥英勇顽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使战役获得了全胜。

四、关庄、岔口追击战

在西北野战军沙家店大捷、胡宗南集团主力深陷陕北时，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野战集团于8月下旬从山西南部南渡黄河，转战陇海路潼关至洛阳段，占领了新安、灵宝、阌乡，直逼潼关，使胡宗南的战略基地西安和关中地区受到严重威胁。国民党军统帅部令胡宗南派兵增援豫西。于是，胡宗南为拱卫西安，并维护西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01页。

② 转引自《周恩来传》第697页。

安、洛阳、郑州之联系，急令绥德以北的主力，立即南撤，并决定在陕北战场以保住延安为重点转入战略防御。

8月27日，胡宗南主力6个半旅由米脂以北35公里地区沿咸（阳）榆（林）公路南撤。为避免撤退途中遭西北野战军袭击，南撤部队分成4个梯队，紧密靠拢，前、后、左、右搜索警戒，梯形交替掩护撤退。规定日行10至15公里，集团宿营。如某一个梯队遭袭击，该梯队立即紧缩一团，固守待援。这同它猖狂进攻陕甘宁边区时采取的“小米碾子式”战法，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一个是进攻时采用，一个是撤退时采用。

为继续拖住胡宗南的主力不使南下，有力地配合陈谢集团开辟豫陕鄂解放区，中央军委于8月28日21时致电彭德怀：“望率全军立即转至敌之先头（米脂、绥德之间或直出清涧），阻敌南进”。29日23时又致电彭德怀：“请率全军以三天至四天急行军赶到石咀峰、九里山之线，夺取先机，制敌死命。是为至盼。”^① 30日13时，再致电彭德怀：“敌已确定全军南撤，九十师可能以一部向东佯动吸引我军，以利其主力迅速向南。我军务宜摆脱当面之敌，以三天急行军先敌抢占绥、清^②一段，阻敌南进，然后以一部节节阻敌，主力大举沿公路南下（不要脱离公路），直指咸阳，制敌死命，有力地配合刘邓、陈谢。”^③

8月31日，彭德怀于高家沟发布追击南撤胡宗南军的命令：“为争取战略先机，迟敌南退，野战军决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向关中平原进军，与陈谢纵队呼应，击灭胡军，解放大西北。”9月1日至17日，西北野战军对胡宗南部展开追击。其中，第2纵队绕无定河西沿咸榆公路西侧进行侧击和堵击，第1、第3纵队和新编第4旅、教导旅由米脂沿咸榆公路东侧追击。由于胡军是有计划

① 中央军委1947年8月29日23时致彭德怀电。

② 绥、清，指绥德、清涧。

③ 中央军委1947年8月30日13时致彭德怀电。

的集团滚进式撤退，加之雨季道路泥泞，运动不便，西北野战军仅在九里山（绥德南）、岔口、关庄（延川西），歼灭胡军 4000 余人，其中毙伤 3300 余人，俘 700 人，缴获重机枪 38 挺、轻机枪 5 挺、步马枪 257 枝、汽车 22 辆、坦克 5 辆。西北野战军伤 1261 人，亡 242 人^①。关庄、岔口追击战，迟滞了胡宗南部队的行动，使其迅速抽兵东顾潼关、豫西的计划破产，策应了陈谢集团转战豫西。对这次作战，彭德怀于 1948 年 1 月上旬，在米脂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作的《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指出：沙家店歼灭了整编第 36 师，“接着追击，岔口一仗，开始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结果越打越多，打出来五个旅。二纵队又想一口吞，生怕敌人跑了，把敌人出路一堵，结果啃不动，只好放开一个缺口，让他跑掉。”^②

五、出击黄龙，攻克清涧

（一）西北野战军内外线分兵，组建第 4、第 6 纵队

从米脂以北地区南撤的胡宗南主力，到 9 月 20 日已至延安、鄜县（今富县）地区。延安以东、以北的绥德、子长、清涧、延川、延长 100 公里的交通线上，仅留下整编第 76 师师部、第 24 旅及第 165 旅残部等不足 2 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西安东北的黄龙山地区，仅有 6 个团的兵力分散驻守。胡宗南为拱卫西安，防止陈谢集团突入，不得不将第 28 旅从榆林、第 167 旅（属整编第 1 师）1 个团从延安、第 83 旅（属整编第 10 师）和第 84 旅（属整编第 17 师）1 个团从运城空运西安，并将刚调到大别山的整编第 65 师 2 个旅、临汾整编第 30 师 3 个团以及陇东骑兵第 2 旅、关中暂编第 2 旅调到西安、潼关地区。这样，胡宗南集团的部队主要集结在延安、西安两个地区，其他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有利于西北野战军发动新的进攻。

^①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编：《逐次战斗战绩及我军伤亡统计表》。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234 页。

根据以上情况，中央军委于9月23日致电彭德怀并告王震：“王纵在劳山阻敌几天后，即可向甘、酃、洛、中、宜逐步前进，与王世泰会合，调动敌人一部南撤，利我主力内线歼敌。”^①同日，彭德怀在延长西北之安家渠召集纵队、旅主要指挥员开会，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陕北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决定分兵，以第1、第3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继续在陕北内线作战，各个歼灭延川、延长、清涧等孤立据点之国民党军；以第2纵队，南下转入外线，与王世泰部合力开辟黄龙山区，扩大解放区，解决粮食困难，配合主力在内线歼敌。是日20时，彭德怀将作战计划报告中央军委：“准备二十六日攻延川、延长，同时准备打援。得手后，再攻清涧、瓦市，准备半月至二十天完成战斗任务。”^②当天24时，中央军委复电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一）决定你军主力（六个旅）在内线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完成歼敌休整补充三项任务，然后打出去。望按此部署一切，主要是筹粮一万五千大担。（二）王震两个旅相机攻占劳山、甘泉等地，阻敌数天后，即可先出渭北。”^③

9月24日，彭德怀将经中央军委批准的分兵内外线作战的决定，通告在前方的王震、王世泰并告贺龙、习仲勋。10月3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组成黄龙行动委员会，以王震为书记，王世泰为副书记，统一指挥开辟黄龙山区的行动。

为增强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力量，根据中央军委9月17日的提议，贺龙、习仲勋于9月29日发表通令：奉军委令，决以警备第1、第3旅及骑兵第6师组成西北人民解放军第4纵队，归前总指挥，王世泰为司令员，张仲良为政治委员。第4纵队辖警备第1旅，旅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警备第3旅，旅长黄罗斌，政治委

① 中央军委1947年9月23日致彭德怀并告王震电。

② 彭德怀1947年9月23日20时致中央军委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70页。

员高维嵩；骑兵第6师（实为步兵），师长胡景铎，副师长杨拯民。该纵队在陕西省柃邑（今旬邑）成立，共1.1万余人。

9月19日，彭德怀致电贺龙、习仲勋并报中央军委：教导旅、新编第4旅合组为西北人民解放军第6纵队。中央军委批准后，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于10月11日发布成立命令。第6纵队在清涧东南的梁家岔、双庙河地区正式编成，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辖新编第4旅，旅长陈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教导旅，旅长陈海涵，政治委员关盛志。全纵队约1.2万人。

为加强西北野战军领导力量，经中央军委批准，甘泗淇于9月26日任野战军政治部主任。9月30日，中央军委又批准彭德怀的提议，任命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为野战军副司令员，第1纵队副司令员贺炳炎任该纵队司令员。

为统一西北野战军各旅之团的番号，贺龙司令员发布命令，独立第1旅第714、第2、第35团，依次改为第1、第2、第3团；独立第2旅第17、第36、第21团，依次改为第4、第5、第6团；独立第3旅第27、特务团、第9团，依次改为第7、第8、第9团；独立第4旅第13、第14、第12团，依次改为第10、第11、第12团，独立第5旅第19、第1、第3团，依次改为第13、第14、第15团；独立第6旅第16、第17、第18团番号不变；第358旅第8团改为第714团，第715、第716团番号不变；第359旅第717、第718、第719团番号不变。各团新番号从9月15日起使用。

（二）开辟黄龙新解放区

根据西北野战军的战略计划与部署，9月下旬，第2、第4纵队分别由大小劳山、柃邑东南之土桥地区出发，向黄龙山区进军，其任务是创建黄龙山区根据地。

黄龙山区位于洛川、宜川以南，白水、澄城、合阳以北，咸榆公路铜川至延安段以东，黄河以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陕甘宁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军占领。到1947年秋时，黄龙地区国民党军分布情况是：新编第9旅（欠第

27团)及陕西保安第3、第7团守备铜川、耀县;整编第1旅第3团守备澄城、合阳;整编第53旅第158团及整编第90师野炮营守备韩城;整编第167旅第501团守备宜君、中部(今黄陵);整编第61旅第182团及新编第9旅第27团守备宜川;白水、石堡(今黄龙)等城镇由地方武装守备。兵力分散,利于西北人民解放军各个歼灭。

9月25日,第4纵队在黄龙山游击队的配合下占领白水县城。10月4日,第2纵队攻占石堡,与第4纵队会师于石堡东南地区。10月10日拂晓,第2、第4纵队在王震指挥下包围韩城,当晚发起总攻。守军弃城逃跑。第2、第4纵队展开追击,至次日上午解放韩城,全歼守敌,缴获野炮6门、汽车3辆、各种炮弹1700余发、各式枪弹数万发。禹门及芝川等黄河重要渡口,也为第2、第4纵队控制。

韩城战斗后,王震、王世泰决定以一部兵力守备韩城、石堡、冯原镇,发动群众,开展建设黄龙山区根据地的工作;以第2、第4纵队主力北进。10月19日,包围宜川县城。宜川东距黄河约20公里,是国民党军封锁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据点。针对宜川守敌部署与地形条件,王震、王世泰决定,独立第4旅攻城西南之七郎山主阵地;第359旅攻城北老虎山、虎头山;警备第1、第3旅攻城东南凤翅山。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攻城部队于10月21日拂晓发起总攻。守敌弃城向东北方向突围,被全部追歼,宜川宣告解放。这次战斗,第2、第4纵队俘敌军中将指挥官许用修、少将县长徐沛,共毙伤俘4000余人,缴获各种炮28门、轻重机枪110余挺、步枪1500枝、各种弹药100余吨。

西北野战军挺进黄龙山区,给延安、西安地区之国民党军以严重威胁。10月22日,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率5个旅,由延安、甘泉地区出发向宜川增援。为保持主动,王震、王世泰决定于10月23日撤出宜川,第4纵队撤向固临地区,第2纵队东渡黄河,进行休整。

出击黄龙山区，是西北野战军首次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由于胡宗南出动重兵展开争夺，第2、第4纵队被迫退出，没有完全达到预定的作战目的。但是，这依然是一次成功的胜利出击，消灭胡宗南集团一部，打开了黄龙山区的斗争局面；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补充了自己；获得了在国民党军控治区作战的初步经验。

（三）延清战役

在西北野战军第2、第4纵队南下黄龙山区作战的同时，留在陕北内线的野战军主力从10月1日开始，对守备延长、延川、清涧地区的国民党军展开攻击。第3纵队和教导旅攻占延川、延长两城，歼灭守敌2个营。第1纵队攻占清涧以南三十里铺，歼灭整编第76师辎重营一部。至4日，第1、第3纵队完成了对清涧的包围。

清涧城位于延安、绥德间的九里山以南，扼咸榆公路之要冲，四面环山，清涧河由北向南沿城西笔架山下通过。城墙一半在沟底，一半建在东山腰上，周围地形险要。整编第76师第24旅第70团任清涧外围守备，师部、旅部及其余部队担任城垣及南北关守备。城周防区内修筑了大小52个地堡工事，设鹿砦、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以交通壕相连，妄图凭险坚守。

为迅速夺取清涧城，彭德怀于10月3日在延川县马家店召开野战军前委会，决定第1、第3纵队夺取清涧；新编第4旅进到青化砭、甘谷驿以北，准备阻击从延安方向来的援军；教导旅进至清涧以北的九里山，准备抗击从绥德方向来的援军；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监视和围困子长守敌。彭德怀要求参战部队，“必须准备数日的连续战斗，要不怕疲劳，发扬高度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攻击每一据点事先要有充分准备，隐蔽运动，突然攻击与短促火力相结合”；“各兵团必须协同动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争取在敌人援兵到达之前歼灭守敌。”^①6日16时，第1、

^① 《彭德怀传》第335页。

第3纵队从西、东两面分数路同时向清涧发起攻击，至7日，攻克外围据点10余处。

困守清涧城的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不断向胡宗南呼救。在呼救电中还引用了司马公的“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①，以表其对援兵迟迟不到的不满心情。廖昂被俘后说：“清涧工事虽多而坚固，但胡宗南竟拿我一个整编师部和一个旅部来守据点，简直是和我开玩笑。”^②怨埋胡宗南指挥不当。其实，胡宗南已令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派兵增援。10月8日，刘戡指挥5个半旅的兵力，由延安出动增援清涧，9日到达永坪，距清涧仅一日行程。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西北野战军作战的兵力使用，于10月8日24时致电彭德怀，“如绥德敌没有动，可使用教、新两旅于西南方向阻击一师、九十师，争取数天时间，歼灭廖昂。”^③9日16时又致彭德怀，“估计刘戡在无阻碍条件下，也要十一日上午才能到清涧附近，如果我用新四旅及四、六两团于远距离阻击，又用教导旅于近距离阻击，则可能使刘戡再要一天甚至两、三天才能到清涧附近，可以取得歼灭廖昂的时间。”^④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及刘戡援军前进速度，调整阻援部署，令教导旅主力协同新编第4旅抗击援敌，同时命令攻城部队做好准备，争取11日拂晓前结束战斗。

10日21时，第1、第3纵队攻城，以连续爆破手段炸开东门，接着又炸开北门。攻城部队由东、北两个突破口进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迄11日6时，攻克该城，全歼守敌。刘戡率领的增援部队，直到廖昂被俘，还尚在距清涧20公里的地方。当日下午，

① 转引自《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② 转引自《彭德怀传》第337页。

③ 中央军委1947年10月8日24时致彭德怀电。

④ 中央军委1947年10月9日16时致彭德怀电。

西北野战军主力撤出清涧。

延清战役，西北野战军歼国民党军 8082 人，其中俘中将师长廖昂以下 6622 人。缴获山炮 4 门、各种迫击炮 50 门、重机枪 29 挺、轻机枪 212 挺、其他各种枪 2281 枝、汽车 1 辆及弹药物资一批。西北野战军伤 1646 人，亡 253 人，失踪 16 人，共计 1915 人。

延清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连续攻坚作战的成功范例。其经验是：第一，针对敌人兵力少，兵力与防区不相称的弱点，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作战原则。首先攻占敌军守备薄弱的延川、延长，孤立守备较强的清涧，尔后攻清涧。第二，攻城与阻援相互配合，集中优势兵力 4 个旅进攻清涧，以 2 个旅在军区部队配合下，利用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援敌。第三，进行充分准备，和指挥员深入前沿指挥。战前进行了攻坚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和物资准备。攻击准备时，各级指挥员实地进行敌情、地形详细侦察，并据此拟定作战计划，战斗过程中，发扬军事民主，改进战术。

西北人民解放军自 1947 年 3 月开始至攻克清涧，在历时 7 个月作战期间，不但消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壮大了自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作战与建军经验。1947 年 10 月 11 日，中央军委发出了由毛泽东拟稿的《西北战场情况与经验》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指出：西北我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包括 3 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 10 个旅，每旅大者 5000 余人，小者 3000 余人，全军共计 4 万余人，“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各战略区首长，学习西北的这些经验，

并总结自己的经验，“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①

六、二打榆林，激战元大滩

（一）二打榆林决心的形成

延清战役开始后不久，彭德怀就下一个作战请示中央军委。1947年10月6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等：“清涧得手后，拟以新四旅与警区四、六两团攻占瓦市^②（为争取时间亦可不攻瓦市，均攻绥、榆）。以教旅及一、三两纵攻取绥德，得手后即北取榆林。”^③提出了下步先取绥德，再攻榆林的设想。10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刘戡开石咀驿接绥德敌南退，瓦市之敌亦可能退走。我军休息数日，恢复疲劳后有三个方案：“（一）现地寻机打刘戡，如能歼其一二个旅，意义很大，但不知能寻得机会否，粮食有办法否？（二）以两个纵队打榆、神、府，一个纵队南下会合二王^④开辟渭北；（三）不打现地之敌，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中、宜、铜。以上三个方案，何者为宜，请考虑电告。”

这时，陕北国民党军分布情况是：胡宗南的整编第29军军部位于延安，整编第17、第27师，整编第38师第55旅及第76师残部，分散守备延安、甘泉、鄜县地区。榆林地区，胡宗南的整编第28旅已空运西安，邓宝珊手中只有第22军军部及其第86师、新编第11旅及陕西保安第5团，共9000余人，已处于孤军孤城之势。彭德怀权衡南北敌情，认为南进夺取延安之条件尚不具备，北上再攻榆林条件成熟，并估计：这时打榆林，“马军^⑤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有多少机会来打；打开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02—303页。

② 瓦市，指瓦窑堡，今子长县。

③ 彭德怀1947年10月6日午时（11—13时）致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电。

④ 二王，指王震、王世泰。

⑤ 马军，指宁夏马鸿逵部。

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①因此，彭德怀于10月13日报告中央军委：在军委所示三个方案中，“全体同意打榆、神方案，夺取两城，巩固后方，主力可得物资、人力补充。”为着求得攻城全胜，“提议主力不南进渭北，暂让两王一万二千人进行游击战。如同意，请贺、习准备粮草，全军休息五天，十八日北进。妥否盼示。”^②同一天16时，中央军委复电：“同意集中六个旅北上打榆、神。行动时间，须待刘戡南下到达延安附近时，我军开始北进为有利。如刘戡在现地徘徊，则似宜先打宜川引其南退，然后打榆、神。”^③14日16时，彭德怀、张宗逊致电所属各部并报中央军委：“野战军主力以夺取榆、神之目的，十八日由现地出发，二十日集结绥德城周附近。”同日22时，毛泽东复电：“十八日全军北上很好”。

西北野战军主力从10月20日起，集结绥德地区进行整顿组织，补充兵员，换发冬装；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作战经验，明确再打榆林的意义与条件。为支援西北野战军，中央军委从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调来一批炸药、手榴弹和粮食等作战物资，从晋绥调来1个野炮排（2门野炮）支援作战。

（二）强攻榆林

邓宝珊为固守榆林，在第一次榆林作战后，作了如下部署：第22军军部（含辎重、工兵营）、第86师师部、新编第11旅旅部及陕西保安第5团坚守榆林城；第86师第257团守备城南之五里墩、三义庙、九一八高地和青云山之线；第258团及山炮营守备神木、府谷；新编第11旅第1团守备刘官寨、三岔湾、赵庄之线。此外，归德堡、店河峁、长乐堡等地均派地方武装加紧活动，侦察西北野战军的动向。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234页。

② 彭德怀1947年10月13日午时（11--13时）致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电。

③ 中央军委1947年10月13日16时致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

10月24日，西北野战军第1、第3、第6纵队和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先后由绥德地区向榆林前进。其部署是：第1纵队取道无定河西岸，由下盐湾、西岔北渡无定河，于27日分别围歼赵庄、三岔湾、刘官寨、魏家楼、花月楼等据点守敌后，迅速逼近榆林城南；第3纵队经米脂、石窑坪开进，在围歼店河峁、长乐堡及其附近守敌后，主力逼近榆林城北；第6纵队于25日经石窑坪、雪水湾隐蔽集结于赵家峁，27日以主力逼近榆林城东。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及神府支队，于攻击榆林的同时围困神木。

10月27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外围据点发起攻击，至30日除城南之三义庙、凌霄塔两个坚固据点外全部攻占。30日17时，第1纵队2个旅和第6纵队1个团，采取对壕作业接近守敌阵地，以爆破、火力、突击相结合的战法，分别对三义庙和凌霄塔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于31日15时夺取两据点。守敌一部被歼，一部撤回城内。

11月2日黄昏，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城发起第一次强攻。第1、第6纵队从城南、城东南利用有利地形实行主攻，第3纵队从城东和城北助攻。由于一打榆林后守军加强和改进了城防工事，增修了一批明暗火力点，对这些情况西北野战军没有发现，加之压制火力太弱，所带云梯长度又不够等，因此，战至3日晨，各部均未突破城垣，遂停止强攻。

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攻城受阻后，改用坑道作业，准备以坑道爆破手段攻城。至11月8日上午，挖成了城东南角魁星楼附近长达60米及120米的坑道各一条。23时，第二次发起强攻。第1纵队独立第1旅坑道爆破成功，炸开城墙宽约20米之缺口，部队本可从这个缺口突入城内，但“由于没有领导干部掌握突破口情况，攻城的第一梯队未能乘爆破瞬间即发起攻击，到发觉的确炸开了缺口，要发起冲击时，敌人已用火力网封锁了缺口”^①。新4旅爆

^①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

炸的另一个坑道，由于测量不准，挖到城墙外三四米处就爆破，结果城墙完好无损，等于放了个空炮。第二次强攻又告失败。

（三）激战元大滩

西北野战军再攻榆林，国民党军统帅部“鉴于若榆林万一有失，则不但绥、包难保，且影响华北、华中战局。”蒋介石遂令胡宗南“空运一旅增援榆林”^①，并令宁夏马鸿逵率部驰援。同时令“空军全力出击，以迟滞匪军行动，并支援守军应战。”^②在榆林作战期间，国民党空军共出动各型飞机 509 架次，“对榆林空投粮食 104 吨、弹药 49 吨，对宁夏兵团空投粮秣 13 吨、弹药 46 吨。”^③此时，邓宝珊不在榆林，当他得知榆林再度被围攻即向他的上司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请示援榆事项。傅作义决定邓宝珊率第 35 军暂编第 17 师 1 个加强团约 6000 余人，乘汽车由包头出发从北面增援榆林；傅作义本人则飞宁夏请求马鸿逵派兵援救。11 月 7 日 1 时，傅作义还飞临榆林上空巡视，并投下亲笔慰问书：“援军已到，正计划包围匪军。我们不仅要保卫榆林，并要将匪歼灭。此次榆林军民英勇坚决，固守名城，作义谨向诸君致深切慰问，并祝成功。”^④傅作义的言行，再次表明其决心不惜一切保住榆林。

在蒋介石严令、傅作义当面请求下，马鸿逵从维护自己势力范围着想，又见有利可图，遂令其次子整编第 18 师师长马敦静率该师（辖暂编第 9 旅、第 168 旅）、骑兵第 10 旅、宁夏保安第 1 总队（辖第 4、第 6 团）以及炮兵、工兵等共 3.5 万人，11 月 7 日从定边、盐边地区出发东进增援榆林。

由于国民党军各路援兵扑向榆林，促使西北野战军不能不考虑攻城与打援问题。早在 11 月 2 日，中央军委就致电彭德怀、张宗逊：“邓宝珊东（1 日）晚八时抵扎萨克，据称援兵陆续赶到。你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 5 部第 5 册（下），第 232 页。

② 《戡乱简史》第 345 页。

③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 5 部第 5 册（下），第 235 页。

④ 转引自《大公报》（天津版），1947 年 11 月 8 日。

们除以主力攻城外，必须以主力兵团准备打邓援兵，务不使入城。”^① 4日又告彭德怀、张宗逊：邓宝珊所率援兵“六日或七日可迫近榆城，你们须准备于六七两日歼灭该敌。”“你们能于八日以前歼灭北面援军，则可于十日以后再打马部。你们应将重心放在打援方面，只要援敌歼灭，榆城可从容解决。”^② 5日，再次指出：“如十个团打邓，八个团攻城确有把握，并于灰日（10日）以前取得打邓、攻城两项胜利，则可照你们原定计划执行不变；否则应改变计划，停止攻城，集中全力先打邓、再打马，然后攻城。究应如何，望酌情处理。”^③

彭德怀、张宗逊在两次攻城不克的情况下，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先于11月6日令第4纵队进至横山附近，准备协同主力消灭马部，后于9日电告中央军委等，决定攻打榆林的“三个纵队均集结榆城周围，待北西两路援军进至距榆城一天行程内，集主力首先击破一路，再捕他路。”^④ 中央军委即同意上述部署，并“望精心准备打援兵一路。”10日，西北野战军获悉整编第17师已进至五道河子、孟家湾一带，遂决定留少数部队继续围城，第1、第3、第6纵队于11日拂晓北进，先歼灭北面援敌。但随后发现上述敌情不确，面西路马鸿逵部已进到那泥河及其以东，并继续东进。于是，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2日黄昏西移，向榆林西北约30公里的元大滩地区开进，准备歼击宁马援军。部队经过连续两次攻城和北上打援已较疲劳，兵员也不充实，现再由此折向西，而且元大滩地处沙漠，部队疲劳加重，粮食供应也非常困难。在这样条件下作战，其困难可想而知。

13日上午，宁马援军在飞机掩护下向第1纵队第358旅阵地

① 中央军委1947年11月2日致彭德怀、张宗逊电。

② 中央军委1947年11月4日14时致彭德怀、张宗逊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50页。

④ 彭德怀、张宗逊1947年11月9日11时致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电。

冲击，被击退。14日17时，西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攻击元大滩，激战彻夜，给宁马援军以沉重打击。宁马援军不支，于15日9时西撤巴拉素。元大滩之战，共歼灭宁马援军4326人。

11月16日，西北野战军主力由元大滩地区东调三岔湾、归德堡、响水堡地区，准备再攻榆林城。但这时，宁马援军改变援榆路线，绕经乌拉尔林、大吉汗、庙咀，向三道林前进。20日，在榆林守军一部接应下与北路援军相继进入榆林城。彭德怀、张宗逊因再攻榆林已无可能，遂报中央军委同意，“放弃打榆林”^①，将主力移至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之线休整。

榆围虽解，余悸未尽。邓宝珊等犹恐西北野战军再攻，同马敦静共谋守城良策。但是，对马部的走与留，在国民党军内部，以及马鸿逵集团内部均争吵不休。蒋介石、胡宗南、邓宝珊、左世允（第22军军长）主张马部留在榆林，以观后变；马鸿逵以宁夏空虚、三边告急为由要求立即回师宁夏。邓、左为滞留马部，以控发给养等手段阻其回宁，马敦静亦想得到蒋、胡、邓同意后再走，以取宠于蒋、胡。马鸿逵盼子不归，三边守军又日日告急，遂用报话机对马敦静说：“你们要是我的儿子，就马上返宁。他们不发给养也要走，沿路可以宰骆驼吃，宰马吃，征蒙民的牛羊吃”，“如果父命不受，咱们就从此断绝关系，我再不管你们了。”^②马敦静在其父的要挟下，留骑兵第20团协同邓宝珊部队守卫榆林，自己率主力于23日从榆林城出发西撤，28日返回盐池。第4纵队和三边兵团追歼不及，仅攻克宁条梁、安边堡等地。

二打榆林是在胡宗南的第28旅从榆城调走的情况下进行的。西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吃大苦耐大劳，在作战中虽伤3333人，亡团长诸汉元以下668人，失踪334人，共

^① 中央军委1947年11月28日24时致彭德怀、张宗逊，并贺龙、习仲勋电。

^② 转引自《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第234页。

计 4335 人，却取得了毙伤邓宝珊、马鸿逵部队 5000 人，俘 1806 人，共 6806 人，击毁飞机 4 架，缴获炮 15 门、轻重机枪 110 挺、其他枪 1059 枝^①，以及收复宁条梁、安边堡等地的胜利，对北线国民党军起了巨大威慑作用，使其再也不敢侵犯陕甘宁边区。

西北野战军再次攻打榆林未下，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对马鸿逵部队援榆的可能性估计不足，过分强调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忽略了他们在利害攸关时的一致性，造成打援仓促，既未能全歼援军，也没有攻克榆林；二是对榆林城缺乏缜密侦察，对守敌增强防御估计不足，思想轻敌麻痹，攻城准备不充分；三是攻城力量不够，尽管西北野战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然而缺少重炮及炸药，火力不强，坚城难下；四是缺少攻打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尤其是步炮协同、爆破与突击、掩护与爬城、主攻与助攻等方面结合不好，以致失去了战机。彭德怀检讨说，“第二次打榆林，只是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向。”^②1948 年 1 月 11 日，彭德怀在陕北米脂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又说：“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休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③彭德怀的自责，说明下决心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诸多因素。实战证明，西北野战军在当时条件下，要攻克坚固设防城市榆林尚不可能。

第二节 华东人民解放军保卫胶东与坚持华中

一、国民党陆、海、空三军进攻胶东解放区的“九月攻势”

蒋介石从 1947 年 3 月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到这年 8 月，攻占了沂蒙山区，为“贯彻统帅部第三个战略目的——截断

^①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逐次战斗战绩及我军伤亡统计表》。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6 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234 页。

共军的国际交通线”，蒋介石“决定以胶东为作战目标”^①，集中兵力，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

国民党军统帅部以整编第8、第9、第25、第45、第54、第64师共6个整编师20个旅，并配属重炮第13团、工兵第2、第15团、装甲炮营、战车营、宪兵第17团及4个保安总队，组成第1兵团（通称胶东兵团），由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兼兵团司令官，采取所谓“锥形突进，分段攻击；并在海、空军密切支援下，求匪主力于胶东半岛尖端，予以歼灭”的方针^②，力争1个月内结束胶东战事。

“海军鉴于配合陆军第一兵团扫荡胶东残匪之目的，爰于三十六年（1947年）九月初旬，即以海防各舰队主力加强胶东封锁，断匪海上运输及退路；并自十三日起，将永积、永顺、长治等舰先后集结莱州湾”^③，协同陆军作战。

“空军为配合此次行动，仍以青岛、济南及徐州为基地，分驻作战部队，支援我陆、海军战斗。”^④其中，青岛基地：空军第5大队第27中队P—51型机12架，空军第1大队第4中队B—25型机6架，空军第2大队C—46型机8架，空军第1大队C—48型机1架、PT—19型机2架。济南基地：空军第3大队第28中队P—51型机12架。徐州基地：空军第1大队第1中队P—52型机4架，空军第3大队第7及第8中队P—51型机24架。总计各型飞机69架。另空军总部直辖之空军第12中队，负责将山东半岛各重要点线，实施侦察照相。

另以整编第73、第12师，防御济南及其周围地区；第11、第75师集结莱芜、济南，准备持援中原战场；第83师及第65师之第187旅，“清剿”鲁中山区；第20、第59、第72、第77师，防

① 蒋介石：《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1947年10月20日。

② 《戡乱简史》第115页。

③ 《戡乱简史》（海军戡乱作战），第238页。

④ 《戡乱简史》（空军戡乱作战），第331—332页。

守兖州、徐州线并清剿鲁南山区；第28师防御临沂及陇海路徐州、海州段。

二、华东野战军东兵团作战方针的确立

华东野战军分兵后，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率第9纵队及刚由胶东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第13纵队，集结于掖县（今莱州市）、平度、招远之间的郭家店、夏甸一带；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率第2、第7纵队和第1纵队独立师、第4纵队第10师，位于胶济线以南的诸城地区休整。

胶东地区位于渤海、黄海之滨，胶河以东，东、北、南3面环海，胶济铁路贯通其间，成“牛角形”，全区由南部之胶东平原与北部之丘陵地区两大部分构成。胶东平原包括高密至胶县以东，延伸至平度、莱阳、即墨、胶州湾间地区。幅员东西约120公里，南北约90公里。境内平坦开阔，胶河及其支流横贯其间。村落密布，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交通便利。

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讲，胶东必须保卫，因为它是华东全军重要军事供应基地之一；同时也有条件保卫，因为总的形势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了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对胶东的进攻，不过是一种绝望挣扎的表现；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可以取得胶东、滨海、渤海人民群众和广大地方武装、民兵的直接支援，并可得到外线兵团（西兵团）的有力配合。对于如何有效地坚持胶东、保卫胶东，中央军委、华东野战军领导人和中共华东局领导人，以及东兵团指挥员，进行了反复商讨，形成了一致的决心。

指挥外线兵团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主张集中兵力在胶东内线各个歼灭进犯之范汉杰部。8月23日，他们致电谭震林、许世友等并华东局，指出：“胶东为我全军军事供应之主要基地，冀鲁豫亦部分供给。如果敌向胶东腹地进犯，对我战争供应影响甚大，因此我东兵团四个纵队及胶东、滨北之地方所有地武应立即紧急动员，齐心协力，单独负起保卫胶东基地光荣任务，以彻底粉碎敌人进攻。”陈、粟提议，第2、第

7、第9、第13纵队应即靠拢于铁路附近，集中力量，先求得干脆歼灭敌之薄弱一部（整编第25或第64师之一部或大部），以打开胜利之序幕。他们强调，“此战关系甚大，务求必胜，以利全局，鼓励全体，克服疲劳与困难，努力争取胜利。”

谭震林主张，通过外线的进攻战来打破国民党军对胶东的进攻。8月24日，他致电陈毅、粟裕并华东局饶漱石、黎玉等，建议东兵团主力第2、第7、第9纵队先打滨海地区的整编第83、第28师，以第13纵队及8个地方团担任胶东地区之阻击战。因为，1. 在地形上，“在胶东地区作战我难打歼灭战”。现国民党军只知9纵在胶东，第2、第7纵队北移必然暴露，“顽一般都很慎重的，尤其是范（汉杰）指挥更为慎重，如顽集中几个师成一路，我就很难下手，结果可能是正面之消耗。”2. 打整编第28、第83两师，“顽援军来不及，能求得歼灭战”。3. 经南麻、临朐等战役，“我军本身均已伤元气”，不能再找敌主力作战，更不能打消耗战而需要打一二个歼灭战。4. 第13纵队及8个地方团如果执行积极筑堡，步步抵抗，以胶东现有之炮弹子弹，“可以达到阻击一个月以上，那时形势可能发生变化，万一胶东不保，只要我主力存在而能逐步歼灭敌之有生力量，当能重建胶东；如果主力大消耗，胶东虽争取一二月以上保卫，结果使胶东仍难保”。25日，谭震林又致电饶漱石、黎玉，认为，“我们仍感在胶东内线作战对我极为不利，不仅处于被动，而且不能依靠自己力量打败敌人，改变战局。”现在国民党军在胶济线布置了9个整编师，而胶济路以南地区则兵力较薄弱。因此，“我们仍坚持打南区敌人对我们有利。”

陈毅、粟裕收到谭震林25日电后，于当日致电谭震林并报中央军委及饶漱石、黎玉、张云逸、邓子恢、许世友、林浩等，指出，胶东为现仅存之唯一军火、医药、电料及各种军需器材补给地，兵员亦较他区丰富，“如胶东被破坏迄今战争供应影响至大，且东兵团四个纵队是胶东兵，如任其家乡被蹂躏而将队伍南调，对士气更不利，且南下打二十八师及八十三师不一定能打好，亦不

易调动胶东之敌，更不易调动第五军等部。”因此，陈、粟“仍坚决主张”东兵团集全力于胶东内线作战，“争取先歼灭冒进之二十五师之一部或大部。”“如万一敌人封锁，以东兵团十万之众，杀开一条血路也不成问题，何况胶东地区尚大。望坚决执行集中力量在胶东歼敌之方针，并立即行动，勿再延时机。”

25日，中共华东局就集中兵力于胶东内线作战与集中兵力在胶东外线作战两种方案的利弊，报告毛泽东：“如我集中四个纵队在胶东内线作战，则群众补给条件均好，且可直接保卫胶东补给基地，我们对此有信心，但最大顾虑是如敌采取齐头并进，如果万一打得不很好，则三面背水，机动困难，有被迫决战与最后拚命之危险；如我只留十三纵在胶东内线阻击敌人，而集中二、七、九三个纵队到胶济路南诸城山区机动位置，采取外线歼敌，那末待敌深入胶东腹地时再从敌后寻机歼敌，拉住敌人或首先歼灭八十三师或二十八师，打开鲁中局面，故此好处是主力机动，比较稳重且可直接配合西兵团行动打开局面，坏处是不能正面阻击敌人向胶东进攻，胶东有弄糜烂之危险。”电报说，华东局领导人与谭震林、许世友讨论之后，主张“采取比较稳重方针”，面陈、粟主张“集中四个纵队在胶东内线作战”。华东局的电报最后说，“从全面而论，以何者为有利”，即请毛泽东电示。26日，饶漱石等人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央军委，第9纵因雨天阻止，二三天后恐无法南越胶济路与第2、第7纵队会合，因此，他们提议取消第9纵南下计划，并于27日晚开始向第13纵队靠拢，“立即进行胶东内线作战准备。”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十分关心胶东地区的战事，对东兵团的作战方针、方法，作了重要规定。毛泽东8月25日致电饶漱石，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指出，“蒋介石似乎判断我主力必守胶东，企图以四五个师向胶东进攻，吸引我主力进入内线后，即在背岛、平度、掖县线建筑坚固工事加以封锁，以两个师左右守备该线，然后以三四个师向东攻击。彼似希望此计迅速成功，以

便抽出两三个师用于他处。目前彼在临沂以北使用了二十个旅，与向大别山对付刘邓之兵力约略相等，而在鲁西南对付陈粟之兵力则甚薄弱，在陕北对付彭习之兵力，自三十六师被歼后已甚感不足（仅有七个机动旅），在豫西对付我陈赓之兵力则完全没有。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必在胶东方面力求速决，以便抽兵。因此，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以一部位于内线，以主力（二、七、九纵）位于外线，以利持久之方针。只要许谭率三个纵队位于外线（诸城一带），寻机打一二个胜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即不敢向胶东深入，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即可保全。”^① 获悉第9纵队因天雨被迫留在胶东，谭震林率第2、第7纵队在诸城，事实上已形成南北分兵的态势后，中央军委在8月29日电中说，“这样，实际上比饶黎许率九纵到诸城或震林率二、七纵到胶东都要好些。这样，胶东有九纵、十三纵及广大地方部队，可以逐步形成有力的内线作战兵团，直接保卫胶东，可以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之作战方针（即对敌一个或二个旅，以歼灭其一部、击溃一部为目标而部署战役作战，注意多打小胜仗）。震林在诸城应完全遵照饶黎指示休整待机，在胶东外线直接配合内线，目前不要南下临沂或陇海。作战时应注意打小规模歼灭战，每次以歼敌一团一旅为目标，不打无把握之仗。”^② 31日，陈毅、粟裕电告东兵团，完全同意第2、第7纵队暂不南下，仍在诸城附近待机。

至此，经过多次电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保卫胶东解放区的方针确立了。

中共华东局号召山东全党全军，正确认识整个战局发展和当面的严重形势，熬过和战胜暂时困难，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争取保卫胶东的胜利。中共胶东区党委发出了《应付当前情况，进行战争动员与坚持斗争的指示》。指出，“凡在我党我军力量所及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10页。

② 同上，第218页。

之处，仍应一面备战，一面全力按华东局新指示及此次区党委会议之方针，坚决进行土改复查，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应付当前情况，坚持战争与支援战争的中心环节”；“应即开展普遍地雷战游击战争的准备，进行深入坚持斗争的动员”；“各地应具体进行空舍清野的准备，迅速分散与保存物资，及创造有效保存办法，可能用的武器均应切实掌握与装备起来，打击敌人，防止为敌利用，重要战争物资应进行妥善安置埋伏。敌情紧张地区，粮食应动员群众分散掩护，动员壮丁武装起来转移，参加游击战争”。华东局还就后方机关、学校、工厂、医院转移，做了具体规定。

三、胶东阻击战

9月1日，范汉杰各部按预定计划由胶济路东段北犯。范汉杰的部署是：以整编第8师之一部固守沙河，主力集结昌邑、柞山间地区，尔后担任左翼；以整编第54师（欠第198旅）集结于胶县、高密地区，尔后担任右翼；以整编第25、第9师为中央纵队，分置于高密、柞山间地区；以整编第64师控置于平度、高密附近，相机策应主力军之作战；以第198旅集结于蓝村附近，归第1兵团部直辖。沿路洗劫一空，狂杀解放区人民。自9月3日至28日，仅在昌邑南部就屠杀干部、群众3467人，其中全家被杀绝的达125户，杀入手段多达40余种。同月，国民党平度县长李德元率还乡团返回平度，以刀砍、斧剁等残忍手段，杀害干部、群众5000余人。在潍县北，还乡团杀害共产党员、军属及普通群众494人，其中妇女131人，60岁以上老人50人，12岁以下儿童29人^①。国民党军和还乡团的罪行，激起了解放区军民的无比仇恨与强力抵抗。西海军分区独立团，将沿昌邑东犯的整编第25师阻击于亭口。胶东军区新7师（后编入第13纵队），在文王山、武王山、凤凰

^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3—476页。

山、菊花山、龙山、紫荆山、望高山、水沟头等地，大量地消耗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闻名山东的于建国爆炸队，在平度以东纵横 20 公里的地区，巧妙地布置了地雷网，国民党军进入平度县地境不到 3 公里，即连遭 26 颗地雷的袭击。整编第 9 师进犯平度时，于建国爆炸队在兰底村埋设了 300 余枚地雷，给该师很大杀伤。任俊华、孙玉亭的随军阵前爆炸队，配合第 13 纵队及地方武装，以 600 多枚地雷歼灭国民党军 500 余人。村村阻击，处处布雷。人民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军作战。

9 月 6 日，整编第 25 师由南、第 9 师由西进犯平度，第 8 师一部进至平度北昌邑配合作战。第 13 纵队第 39 师实施运动防御，经 3 昼夜节节阻击，毙伤进犯军 1748 人，自身伤亡 343 人。8 日，阻击部队放弃平度县城转移至莱阳西之水沟头。13 日，整编第 8 师占掖县。整编第 54 师于 15 日进占灵山，16 日，该师第 198 旅和整编第 25 师第 40 旅，渡过小沽河，由西、南两面向莱阳西南的水沟头、大野头进犯。第 13 纵队第 39 师进行顽强抗击，以伤亡 926 人的代价歼其 2546 人。18 日，整编第 25 师占领胶东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莱阳。整编第 9 师进占夏甸，整编第 8 师进占道头镇。许世友决定，以第 13 纵队第 39 师阻击第 9 师，以第 9 纵队歼击道头镇的整编第 8 师第 166 旅第 498 团。战斗自 18 日夜打响，激战至 19 日晨，歼灭第 498 团大半、第 496 团第 3 营全部共 2300 人。这是华东野战军东兵团胶东阻击战中，首次集中主力进行的一次反击作战。

因未受到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范汉杰部气焰仍十分嚣张，继续向胶东内地及沿海进攻，9 月 26 日攻占龙口，30 日占领蓬莱、烟台。“九月攻势”，范汉杰兵团损失 1.47 万余人，占领了胶县、高密、平度、昌邑、掖县、荣成、栖霞、招远、龙口、黄县、蓬莱、福山、烟台、牟平、诸城等 15 座城镇。

范汉杰以主力进攻胶东的同时，以整编第 64 师之第 156 旅南犯诸城，配合整编第 83 师进攻日照。9 月 9 日，该部占领诸城。

为策应胶东作战，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南线指挥所决心首先歼灭诸城地区第156旅。中共华东局于9月10日致电谭震林，同意歼灭诸城之敌，战斗后转至诸（城）、莒（县）公路两侧休整待机。9月9日晚，第2、第7纵队对诸城之敌发起反击。至11日，共歼国民党军1700余人，后因整编第64师主力增援，主动撤出战斗。

四、胶河战役

在胶东阻击战期间，中央军委、毛泽东以及陈毅、粟裕等，对华东野战军东兵团的行动，不断予以指导。9月15日，中央军委就《目前各战区的作战情况》致电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饶漱石、黎玉、谭震林等，指出，在整个南线战场，“目前只有胶东方面敌尚维持十五个旅左右的攻势，该区尚有一个时期是困难的，但估计只要陈粟、刘邓、陈谢三方面再打几个胜仗，中原及长江发生更大震动之后，胶东敌军将被迫大批南撤。只要我军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战均能歼敌一部（不论多少），就能改变该区形势。”^①关于处在胶东外线的第2、第7纵队行动问题，9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陈、粟，饶、黎，许、谭：“我们认为震林所率二、七两纵目前不宜离开滨海，只要该区有粮食，就应留在该区打些小胜仗，即使一二个月不打胜仗，只要不打败仗就好。如地区狭小，不便集中行动，则以纵队或以旅为单位，暂时分散在诸城、莒县、沂水、临朐、日照等县广大乡村也有利，一可钳制八十三师、二十八师、四十五师等部，二可策应胶东内线。大约坚持一个月至多两个月，局势就会变化。如二、七纵出鲁南或苏北，则八十三师、二十八师等部必跟去，亦不见得容易歼灭，对于胶东则减少直接配合作用。胶东方面敌至多使用十二个旅进攻，而在占领平度、掖县、莱阳、龙口、招远、蓬莱、黄县诸城，留出大量守备兵力之后，其机动兵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52页。

力就不多了，利于我军各个歼敌。一个月后，敌有很大可能调走一部兵力，故该方面只要我军不打败仗，局势亦可能好转。”^①9月20日，饶漱石、黎玉等致电谭震林和第2纵队司令员韦国清，提出：“胶东同志均希望能在敌深入莱阳、栖霞、招远和敌后方空虚时，你们主力能挺入胶东，进到胶（县）高（密）一带作战，牵制并打乱敌人部署，便利前后夹击。”22日，陈毅、粟裕致电谭震林、韦国清，也指出，“如能集中二、七纵及独师、十师等共八个师（二十二个团）全力向胶东敌后进击，作用更大。”望遵中央指示及华东局饶、黎20日电精神，“依据当前敌情坚决向胶东敌侧后进军。”据此，谭震林率第2、第7纵队于9月24日由诸城五莲山区北上。

关于处在胶东内线的第9、第13纵队行动问题，饶漱石、黎玉、许世友等于9月24日报告中共中央，“我们本拟继续在内线作战一个时期，但因牙山以东伤员、家属五六万，无法回旋，前面又有大批难民拥到主力与指挥机关附近，影响作战，如继续在内线作战吸敌向东既不便作战，又增加以后困难，且主力转移有困难，故我乘道头胜利及敌向招霞前进时，出其不意向敌后转移。”据此，第9纵队于25日晚进至掖县东南的大泽山区；第13纵队2个师于25日进抵掖县东北朱桥镇，26日晚南下与第9纵队会合。第13纵队另1个师则留在莱（阳）烟（台）公路继续同范汉杰部周旋。第9、第13纵队主力在大泽山停留4天后，第13纵队继续留在大泽山区，第9纵队则取道胶河潍河间南下。10月1日，东兵团第2、第7、第9纵队在胶济路北朱阳会师。

范汉杰发现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内线主力西转后，判断为“避战溃逃”，胶东战事已经“顺利结束”。即分兵轻进，以整编第9师尾第9、第13纵队追向大泽山区；以整编第64师（欠守备诸城的第156旅）由高密向北堵截。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56页。

许世友、谭震林针对范汉杰兵团分兵据城、多路出击的态势，决定集中第2、第9纵队歼灭脱离高密、孤军北进的整编第64师于胶河西岸的昌邑县饮马镇地区，以调动继续东进胶东解放区腹地的国民党军回援，减轻胶东腹地的损失。其兵力部署是：以第2、第9纵队担任主攻；以第7纵队和独立师、第10师等阻援；以第13纵队由大泽山北攻掖县，策应主力胶河作战。

10月2日，整编第9师进至亭口；整编第64师主力进至范家集、流河一带，其先头进至饮马镇。东兵团将该师先头误为主力，即全线出击。整编第64师迅速收缩至胶河东岸范家集、三户山地区，依托山地和周围村落固守待援。东兵团虽失去了在运动中分割歼敌的战机，但于当日晚达成了合围。

范汉杰立即调兵增援。蒋介石也于10月9日从北平赶到青岛指挥。东路援军整编第9师在空军配合下，由亭口对红石山阵地及其东南牛栏一带东兵团第10师、第20师阵地发起轮番攻击，至9日止，整编第9师尽管付出了伤亡副旅长以下约1000人的代价，仍无法突破解放军的阵地，还受到了蒋介石的“指挥官决心太慢，行动迟缓”的训斥^①。南路援军高密之整编第45师第212旅、诸城之整编第64师第156旅，6日晨沿胶济路两侧向朱阳进犯，遭到东兵团第7纵队主力和独立师1个团的阻击。7日，第212旅在东、第156旅在西，分沿五龙河两岸向范家集前进。激战中第156旅1个营被歼，其余主力被分割包围于郑家庄、官庄、薛家集3点。8日，郑家庄第156旅2个营突围被歼。同日，第7纵队主力攻击官庄，形成相持。西路援军整编第45师第211旅，由潍县东渡潍河，增援三户山。5日，乘解放军西海分区1个团未能按时进占山阳庄之机占领该地，对东兵团侧背安全形成严重威胁。许世友、谭震林即以第2纵队大部南下向山阳庄东圩进攻。8日，

^① 蒋介石：《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21日。

第 211 旅慌忙向西北、西南方向突围，在山阳庄西被歼灭 8000 余人，仅 300 余人在潍县援军接应下，窜回潍县。

范汉杰见西路援军大部被歼，东路、南路援军受阻，困在范家集的整编第 64 师难于脱身，遂急调整编第 8、第 54 师，由蓬莱、牟平经莱阳兼程回援。许世友、谭震林鉴于全歼范家集守敌尚需时日，而援敌又已迫近，为争取主动，遂于 10 月 10 日撤范家集之围，将部队转移至安丘、诸城间的景芝镇以南地区休整。第 13 纵队于 10 月 5 日攻克掖县，全歼整编第 8 师预备第 1 旅第 5 团及地方团队共 2700 余人。此后，转移栖霞以南地区休整。

胶河战役重创国民党军 8 个旅，歼灭其 1.2 万人，其中俘敌 8000 余人。这是改变胶东战局的重要一战。经此一战，华东野战军东兵团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进犯胶东的国民党军则陷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胶河战役后，第 1 纵队独立师向河北邯郸地区转移，改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第 4 纵队第 10 师转至渤海地区休整，准备回归第 4 纵队建制。

五、胶（县）高（密）追击战

国民党军占领胶东解放区的城镇，特别是占领烟台等沿海港口后，蒋介石认为，胶东半岛的作战已经结束。为了总结这次作战的教训，“使国军今后在作战上能有一番彻底的改进”，他带着联勤副总司令、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第三厅厅长到青岛召开“胶东军事检讨会议。”10 月 19 日，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发表讲话。20 日，作《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的报告。21 日，作《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讲话。蒋介石说，“这次胶东半岛的作战，可以说是我们国军第一次大规模作战，参加战场的有陆军、空军、海军。”“在整个剿匪战事中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占极其重要的地位。”蒋介石声称，从 6 月 25 日开始向鲁中沂蒙山区进攻以来，到这次克复烟台为止，“这三个月零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国家转危为安，革命事业转败为胜的关键。”“这次胶东作战是决定我们剿匪胜利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确定的 3 个

战略目标，即占领延安、占领沂蒙山区和封锁解放军的海上交通路线，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们剿匪的军事亦随之而告一段落；从明天（10月21日）开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其实，在蒋介石集中兵力进攻胶东解放区时，国民党军在其他战场上连吃败仗，损兵折将，战局恶化。蒋介石遂决定从胶东战场抽出整编第9师集结胶（县）高（密）地区，拟经坊子机场空运徐州或石家庄；整编第25师集结烟台，拟海运上海后转用于大别山战场。据此，范汉杰制定了全面防御部署：以整编第8师守备烟台、蓬莱、龙口；以整编第54师第198旅守平度，以1个加强团守莱阳，以该师主力于胶县西北之南村一带休整；以整编第64师集结蓝村、马山一带；整编第45师退回潍县、坊子地区。

东兵团取得胶河战役胜利后，谭震林、许世友拟率部进入胶东内线，寻机歼灭整编第8、第54师，以达到“基本上巩固胶东内地后，则转入其他方向开展攻势。”^①11月10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指出，“我攻石家庄及陇海线，敌苦于无兵增援，九师、六十四师拟集结济南，不向石家庄即向陇海，望令许谭尽可能以寻机歼其一部之方法，阻止该两个师一个时期。至二十五师调长江，则可不加阻止，对八师、五十四师目前不忙去打。”同日，华东局致电许世友、谭震林，指出，“敌九师、六十四师既均有开往济南转至鲁西，加重陈粟负担之可能，因此你们停止执行进入胶东内线作战计划。你们应集中二、七、九纵在九师向西运动中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如敌行动谨慎无法歼灭，则应给予适当打击和杀伤，并尽力以延其西进的时间。望本此精神，提出作战计划和部署。”据此，许世友、谭震林“决心拖住”整编第9师。

这时，东兵团第2、第7、第9纵队已在安邱、诸城之间地区休整近1个月，粮食、弹药、装备各方面得到了补充。11月4日，许世友、谭震林率第2、第7、第9纵队进至胶济路南、潍河西岸

^① 许世友、谭震林 1947年11月9日致中共华东局电。

及其以东地区，待机迎击西开潍县的整编第9师。第13纵队在大泽山区，牵制平度整编第54师。

11月6日，整编第9师由高密进抵朱阳镇、丈岭地区。东兵团由于侦察有误，以为只是运送棉衣的2个团，便令第9纵队由西南、第7纵队由南遽然出击，结果未能将该师分割包围，整编第9师得以有组织地占领大小麻湾、丈岭、刘河埠、塔耳埠、朱佛、万家屯、尹家屯等村落据守。11日，在整编第64师由高密沿胶济路西援接应下，整编第9师“交替掩护”地掉头东返，向胶县、城阳撤退。东兵团在大岭、塔耳埠歼整编第9师1000余人。

鉴于当面敌情的变化，许世友和谭震林决定采取“一打二追”的方针，由堵击改为追击，令第2纵队围攻高密，令第7、第9纵队沿胶济路以北跟踪追击整编第9师等部。19日，第2纵队包围高密城。经过充分准备，于26日21时发起总攻，至27日4时攻克高密县城，全歼整编第64师1个团及保安队等共2300余人。向东追击的第7、第9纵队于22日收复胶县，控制了胶济路东段的交通枢纽。

担任牵制整编第54师任务的第13纵队，于11月8日包围了由莱阳东犯海阳的整编第54师主力。范汉杰于22日令该师位于平度的第198旅经灵山增援。这时，整编第9师已靠近青岛，面第198旅孤军前进，许世友、谭震林抓住这个有利战机，遂决定舍整编第9师而围歼第198旅。24日，第198旅进至上下仙游、现子湾一线，被第9纵队包围。27日，范汉杰又调青岛的整编第9师第76旅及第57旅驰援。第7纵队将第76旅包围于南阡地区，阻第57旅于灵山一线。28日夜，第7、第9纵队各1个师会攻南阡，未解决战斗。

范汉杰见海阳之围未解，又有2个旅被围，便急调大沽河以东蓝村、马山一带的整编第64师赶来增援；并调整编第8师第42旅2个团、第103旅1个团，由烟台海运青岛北援。为争取更有利的战机，许、谭决定撤出战斗，于30日北移莱阳以南五龙河两

岸待机。11月底，整编第25师由烟台，整编第9师师部率第9旅由城阳先后海运至上海，以后转用于中原战场。

胶高追击战，历时1个月，东兵团以伤亡5000余人的代价，共歼国民党军约1万余人，滞迟了整编第9、第25师他调的行动，解放了高密、胶县、平度等广大地区，收复了胶济路东段100余公里，迫使范汉杰兵团困守青岛、莱阳、即墨、烟台、福山、蓬莱、龙口等孤立据点，使胶东、滨海、鲁中解放区连成一片。

六、解放莱阳

胶高追击战后，范汉杰兵团除整编第8师尚保有龙口、蓬莱、福山、烟台、威海卫一线的沿海狭长地带外，其在广袤的胶东腹地仅占有莱阳一地，由整编第54师第36旅第106团，另配属第108团第1营、75山炮及105榴炮各1个连，计4000人，地方部队5000人，共约万人驻守。由于莱阳城是胶东半岛的交通枢纽和国民党军在胶东内地的补给站，对胶东解放区的安全和交通运输威胁很大。

12月1日，中共华东局致电许世友、谭震林，指出，“今后作战方针不在到处包围拖住敌人，而在很好寻找和创造运动战之机会歼灭敌人。”并同意许、谭提出的第7、第9纵队“一面休整，一面寻机歼敌或以包围莱阳姿态集中主力求得打援。”第2纵队则返回胶济路南，准备执行新任务。2日，许、谭提出：“为了基本上解决胶东问题，我们提议二纵暂不南返，仍配合七、九纵打下莱阳。”这一方案得到中共华东局的同意。许世友、谭震林决定以第7纵队攻城；以第2纵队位于水沟头一线，第9纵队位于莱阳南边的左村地区，以第13纵队一部监视海阳之整编第54师，主力位于左村地区，准备阻击青岛、即墨来援之国民党军；以胶东地区及北海、东海军分区部队，阻击烟台可能来援的整编第8师。

12月4日，第7纵队向莱阳城发起攻击。战至7日，将莱阳城外围的马山、东亭儿山、吴格庄的守军全部扫清。8日，占领四面城关。残敌第106团1个营困守城皇庙核心据点顽抗，该处工

事坚固。自9日2时起，第7纵队两次攻城均未成功。主攻莱阳是第7纵队自成立以来首次单独攻坚，虽已取得重大战果，但伤亡相当大，部队也感疲劳。为赶在援敌到达前攻克莱阳，许、谭令第13纵队第37师接替第7纵队的攻城任务。13日，第37师把攻击重点改在守敌自恃有大水塘阻隔的东北角。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于当日21时发起总攻，23时30分解放莱阳城。守敌5000余人仅团长率17人逃脱^①。第7、第13纵队共伤亡7000余人。

当莱阳激战正酣时，范汉杰调集整编第54、第64、第8师等部共8个旅分前后两个梯队，在飞机、坦克配合下，由青岛经灵山分批北援。自12月6日起，第一梯队4个旅，沿姜山集、保驾山、尧岚岭北进。12日，猛扑莱阳南约15公里之水沟头一带阵地，遭到第2纵队的顽强阻击，伤亡达3000余人。第二梯队4个旅，在第一梯队后跟进，12月13日到达水沟头南的林泉店一带。14日占领水沟头后，范汉杰以整编第54师3个旅及整编第8师第1个旅沿公路两侧向莱阳正面进犯，企图收复莱阳城。许世友、谭震林调整部署，以第9、第13纵队正面阻击；以第7纵队移至莱阳、招远交界的夏甸，向国民党军侧背突击。自19日起，第9、第13纵队先后击退整编第54师等部多次进攻。第7纵队向该师侧后进行突击。26日，整编第54师在付出伤亡4000余人的惨重代价后，被迫南撤灵山固守。范汉杰重占莱阳的计划被粉碎。

莱阳战役，共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4、第64师各一部及地方团队共约1.7万余人，其中俘虏7000余人。

蒋介石因东北冬季战事紧张，调范汉杰率整编第54师赴援锦州；另将整编第64师南撤青岛外围，仅留整编第8师守龙口、烟台、威海卫。12月11日，在舰艇掩护商轮5艘及小艇驳运下，依次将整编第54师1.5万余人从海阳运至葫芦岛。第13纵队收复海阳。至此，胶东解放区除了青岛、烟台、威海、福山、蓬莱、龙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下），第30页。

口等孤立据点尚控制在国民党军手中外，已恢复了胶东保卫战开始前的绝大部分地区。

在胶东保卫战中，胶东解放区各级地方党政部门共动员民工34.1万余人，其中胶河战役动用民工约25万人，莱阳战役动用民工约10万人，这一切极大地支援和保障了东兵团的正面作战的胜利。

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和胶东解放区地方武装，在历时5个月的胶东保卫战中，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节节抗击、杀伤进犯的国民党军，主力避其锋芒，时分时合，创造战机，选择孤立冒进、突出无援敌之一路或一部，加以歼击，并结合围点打援，共歼国民党军6.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开创中原解放区的作战。

七、坚持华中解放区的斗争

在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后，华中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人民解放军南线战场的重要翼侧。国民党军为加强对华中占领区的控制，在调兵回援中原和对胶东发动“九月攻势”的同时，集中20个旅的兵力，对苏中、苏北解放区进行“清剿”，企图摧毁解放区，消灭或驱逐坚持苏北、苏中斗争的人民解放军。

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向敌后军民指出：虽然当前全国形势发展极为有利，但由于敌后战场上敌人尚占很大优势，斗争仍是十分艰苦、十分紧张的，我们仍有许多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必须本着“一面坚持阵地、一面举行反攻”的方针，继续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逐步开展局面。当时在苏中坚持斗争的是第11纵队（兼苏中军区，辖第31、第32旅），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吉洛（即姬鹏飞）；坚持苏北斗争的是第12纵队（兼苏北军区，辖第34、第35、第36旅），司令员陈庆先、政治委员曹荻秋。统归中共华中工委指挥。

自1947年8月初起，国民党军在苏北、苏中调整部署：整编

第49师3个旅分别在如皋、南通、海门地区集结，准备海运东北；另以防御淮阴、淮安、宝应、高邮一线的正编第4师之第59旅由两淮南开高邮、宝应，第90旅集结高邮、兴化地区，第102旅东开如皋、海安、如东地区接替正编第49师的防务；第42集团军残部（后改编为暂编第23师）防御盐城南北一线；正编第44师分住大伊山、涟水、阜宁；暂编第24师（原保1总队）防御宿迁、睢宁、泗阳地区；正编第28师集结阿湖、新安镇地区准备他调。

第11、第12纵队决定乘国民党军调动换防之际，发起南（通）（赣）榆公路中段攻势作战。自8月6日晚起，第11纵队由南、第12纵队由北发起进攻。激战至12日，先后攻克盐城、伍佑、卞仓、大团、南洋岸、岗门、上冈、新兴场等18处据点，歼灭国民党军7000余人。缴获机枪69挺、长短枪3000余枝、卡车33辆、炮弹1万发、子弹30万发；控制了通榆公路南至间庄、北至阜宁长达120公里的地段，进一步沟通了苏中、苏北两解放区的联系。

国民党军遭此攻势打击后，仓促将“清剿”苏中之正编第4、第44师调往通榆线，分别由海安、阜宁等地南北对进，于8月23日重占盐城，并企图寻求解放军决战。第11、第12纵队避其锋芒，分别向淮海地区及沿江地区进击。到10月上旬，收复泰兴、靖江、海门、如皋等县的大部地区，再次切断南榆公路。盐城国民党军恐孤军被歼，被迫弃城南窜。

10月中、下旬，为配合华东野战军西兵团挺进豫皖苏，第3纵队出击淮北地区的作战，第11、第12纵队再次在苏北发动攻势。10月17日，第11纵队攻克东新安镇，歼国民党军正编第44师第150旅500余人；第12纵队攻克淮（阴）沐（阳）公路上之五里庄、丁集等据点，歼灭国民党军1700余人。

11月上旬，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华中指挥部，以管文蔚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华中各部队的作战。11月11日，中共华中工委决定成立两淮军政委员会，饶子健任书记，领导淮

南、淮北斗争。

11月下旬，第11、第12纵队再度挥戈南下，会同地方武装，向李堡、栟茶一线发起攻势。至12月3日，攻占李堡，栟茶、角斜、丁家所等据点，歼灭国民党军3400余人。与此同时，苏皖边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也广泛出击，接连拔除国民党军据点70余处。

李堡、栟茶线作战后，第11、第12纵队集结东台以北地区休整。12月下旬，国民党军第1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急调整编第51师2个团、整编第4师第90旅3个团、整编第21师2个团共7个团、1.3万余人，由东台沿通榆公路北犯，企图乘华中人民解放军疲惫之际进行决战，或将华中解放军主力逐出苏中，以减轻其江防压力。根据当面情况，华中指挥部决定诱敌北上，在盐南伍佑地区歼其一部。12月24日，国民党军开始北进。第11纵队在第12纵队协同下，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将国民党军诱至伍佑地区事先布置好的袋形阵地，突然进行反击。经4昼夜激战，歼其过半，其中毙伤2000余人、俘1440余人，其余退守东台。

在此期间，淮北支队积极出击，于11、12月间，先后歼灭国民党军1700余人，攻占据点数十处，恢复了灵璧、泗县、睢宁、宿迁等7个县的人民政权。淮南支队巩固了淮宝地区和高宝区，插入天长地区，并经反复争夺收复了盱眙、凤阳、嘉山3县交界地区。

1947年8月至12月，华东敌后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收复了许多失地，有力地策应了主要战场的作战。

第三节 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清风店战役与解放石家庄

一、晋察冀地区军事情况与晋察冀野战军的任务

晋察冀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至1947年8月，已歼灭国民党正规军近20万人，收复县城39座。其中，自1947年4月转入战略反攻以来，相继取得了正太、青沧、保北3个战役的胜利，共消灭国民党军5.2万余人，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为建立一支精悍的野战军，1947年6月2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工委朱德、刘少奇5月31日的建议，决定重建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重建的晋察冀野战军，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飏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辖第2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第3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胡耀邦；第4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同时还成立了由野炮、山炮、迫炮团等3个团编成的炮兵旅。

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的二级军区也作了调整：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辖4个军分区和3个独立旅；冀晋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王平，辖4个军分区和2个独立旅；察哈尔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兼），政治委员刘杰，辖3个军分区和1个独立旅。

在过去的一年中，晋察冀解放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其他战区相比仍有差距，这主要是整师、整旅的歼灭战打得少。周恩来在1947年7月21日的小河会议的讲话中说，我军各区成绩次第为：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和陕甘宁、晋察冀。晋察冀战绩不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作战而言是对中央军委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领会不深刻，运用不得法。正像聂荣臻指出的，战争爆发后，“军事指导上犯了一些错误，执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的方针不够大胆。那时有一种保守性，‘怕失地盘’”。“在这样的思想下，主动性不足，集中主力主动进攻敌人，大量歼灭敌人，这种指导思想不明确，因而运动战的思想就不能很好贯彻。这使得我们的自卫战争，在这一年中胜利是很不足的。”

“比起晋冀鲁豫等友邻区来，我们还是落后的。”^①经过实践锻炼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几次会议的认真总结，指挥员进一步领会了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指挥上积极主动，随之胜利一个接一个。保北战役后，全军集中在无极、深县、任丘地区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整训。进行了形势和任务教育，进一步明确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道理，树立了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胜利信心与勇气；健全了组织，调配了干部，取消了纵队和旅的后方机构，充实了连队；在进行射击、刺杀、投弹和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的基础上，着重训练了攻坚战术与组织指挥能力。经过整训，野战军各部队都渴望能像其他友邻战区一样，打大歼灭战，整师、整旅地消灭国民党军，以自己积极有力的行动，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削弱、箝制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配合东北民主联军消灭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任务。

这时，晋察冀野战军面对的主要对手，一个是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集团4个军11个师及整编第62师、青年军第208师等，其主力分布于平、津、保三角地区；一个是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集团8个师又3个旅，分布于平绥铁路沿线。为保守华北阵地，蒋介石于1947年7月1日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各绥靖公署主任、副主任等，均参加会议，确定重点守备平、津，并对平、津、保三角地区主动出击。以第3军守石家庄，以保定绥署主力编成机动兵团，利用铁路公路往来机动。

二、围攻涞水，出击大清河北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在野战军休整期间，反复研究了各种作战方案。1947年8月19日10时，他们致电中央工委、军区并中央军委，上报了两个作战方案，其第2方案是：“为调动敌人寻其弱点歼敌，建议配置以三纵（熟习）向涞水、涿县、定兴地区进攻，目的调动敌人主力西

^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260页。

援；我主力（二、四两纵队）进至任丘西南及东南地区待敌调动后，即进至大清河北歼敌。如敌主力不动时，三纵即将涞水攻下”^①。23日9时，朱德、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等，“以遵照军委过去指示”，逐渐削弱北平行辕李宗仁集团，“以利尔后配合东北作战之目的，我们同意杨罗杨19日10时之第二方案行动（三纵去西面涞水一带行动）。可否请军委批示。”^②2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以一个纵队攻涞水一带，主力至大清河北机动之方案。”8月30日，朱德、刘少奇致电杨得志等：“你们应寻求运动中消灭敌人。”“部队行军宿营都要紧缩，灵敏，避免笨重累赘，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及地形熟悉的条件。即能寻求在运动中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好机会，去消灭敌人。如数次布置无效亦不必灰心，下级亦不宜说怪话，能长此灵活使用，一年内能一二次收效亦可算成功，或可大量歼灭敌人。”^③

9月2日至6日，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攻占了涞水外围据点及东、南两关，虽被迫撤出战斗，却调动了国民党军西援。第2、第4纵队及冀中军区部队乘此于10日晨向大清河北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在管岗、板家窝、吴家台、开口、霸县城等地给国民党军第16军和保安第7团以沉重打击，但在敌人大量出动增援的情况下，被迫于24日先后撤离战场。

大清河北作战与进攻涞水，共歼敌5278人，自己伤亡6778人，没有达到预定目标，打了个消耗战。究其原因，军区领导人聂荣臻等在9月15日致中央军委、中央工委的报告认为：决“心太厚，包围敌过多，因而兵力分散，因而不能速决，故不得不撤退”。杨得志等野战军领导人16日的检讨报告认为，主要原因是

① 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飏1947年8月19日10时致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萧克、黄敬、赵尔陆、曾勇泉并中央军委电。

② 朱德、刘少奇1947年8月23日致中央军委并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聂荣臻、萧克等电。

③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4页。

侦察工作与情况研究不够，以及对国民党军的新式工事和火力加强估计不足。朱德、刘少奇认为：“野战军大清河战役，因围敌过多，不能最后解决”，“但此次士气极望，干部大有牺牲精神，较以前不同。”^① 9月24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此次大清河战役，歼敌一部，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伤亡较多并不要紧。休整若干天，按照该区具体条件部署新作战，只要有胜利，无论大小，都是好的。一切按自己条件独立部署作战或休整，不要顾虑东北或别区配合问题。”^② 这一指示，既指明了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又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三、攻击保北徐水，调动国民党军增援

9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国民党军统帅部先后调第92军第21师、第13军第54师、第94军第43师出关增援。这样，国民党军在华北机动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暴露。为消灭当面国民党军，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作战，晋察冀野战军于10月3日召开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对下一步作战提出两个作战方向：一是再出大河北。认为，敌军虽不多，但“仍须攻坚，为背水战，进退不便”，“如三、四天不能打开战场，则援军到来，仍须被动撤出战斗，发展前途不大”。二是出击保北。认为，“主力进展完全集中（独七旅按时参战），可以创造打援条件，有发展前途，进退可以自如，牵制敌人，配合东北有利。”^③ 野战军领导人还同时向中央军委、中工委和军区报了出击保北的3个作战方案：（1）以第2、第4纵队及独立第7旅，向东向西，第3纵队由西向东，攻克徐水、容城；扫清固城、保定间点碉，开辟打援战场；尔后，以一部由北向保定外围佯攻，引敌来援，以一部扼守徐水，主力准备于徐水附近歼灭援敌。（2）扫清固城、徐水、保定间小据

^① 朱德、刘少奇1947年9月23日致中央军委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36页。

^③ 杨得志、杨成武、耿飏1947年10月3日致中央军委，朱德、刘少奇，聂荣臻、萧克等电。

点，孤立固、徐、保3点；然后采取围城打援，如援敌多，则西转荫蔽于遂城、姚村以西，诱敌向遂城或姚村追击，而各个歼灭之。(3)以一部围攻涑水，争取于涑水、高碑店间打援。认为以第1、第2案为适宜。10月5日，朱德、刘少奇复电同意“出击保北并仍以寻求打运动战为主之方针。”^①

10月4日，晋察冀野战军发布作战命令：决心“乘东北我军大举出击，敌北平行辕为应援东北，在我区采取守势之际，我决再度发动保北战役”。以第2纵队配属独立第7旅围攻徐水，破坏徐水至徐河桥间的铁路，扫清沿线敌人点碉，吸引国民党军出援；以第3、第4纵队在徐水以北和以东地区集结，准备在运动中歼灭从北、东方面来的援军；以独立第8旅监视石门第3军。

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获悉解放军将再战保北，急忙向统帅部报告，求取应付方策。10月6日，蒋介石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行辕主任、绥署主任、副主任和各军军长、各师师长等40余人到会。各军长在轮流报告情况时，都“诉述粮食被服的困难”，请求统帅部解决，而对作战中屡遭挫折的原因避而不提。蒋介石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只顾到遭遇的困难而忘记了我们根本的任务”。他要求会议“应该着重于剿匪的经验，要指出匪军的长处，检讨自己的缺点，并研究如何制胜匪军的方法。”对如何解决部队粮食困难，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法：一是“对于本地的粮食物资要能切实控制”，二是“对于附近二三百里匪区以内的粮食，亦要派军队去挫集”。蒋介石说，“第三军现在驻石家庄，四面为匪军所包围，交通阻绝，真是孤军远戍，试问中央有什么办法来接济你们？”^②示意其部下，用他所提的抢粮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

蒋介石对石家庄尤为重视。会后他召见第3军军长罗历戎时，

^① 《朱德传》第576页。

^② 蒋介石：《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

指出：“石家庄应该固守，可将第三军抽调一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①罗历戎深感既要守石家庄，又要减少石家庄防守兵力，其下场是不会好的。因此，他乘蒋介石询问“北调部队由谁率领？”时，即自告奋勇地说，“由我带他们北开。”“这样，就作出抽调第三军主力增援保定的决定，不久保北战役发生，孙连仲即命令我军主力北上。”^②蒋介石这一决策，导致了第3军主力的迅速覆灭。

按照预定计划，晋察冀野战军从1947年10月11日开始在保定以北地区发起进攻，至次日晨扫清北河店至徐水间敌之据点，13日围攻徐水。

徐水告急。孙连仲令第94军2个师及独立第95师各一部共6个团，在战车第3团配合下，由高碑店、定兴经固城南下；第16军2个师的4个团由新城、霸县出发，经容城驰援徐水。同时，孙连仲还急令第3军立即做好出动准备，以4日行程由石家庄赶到保定，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围攻徐水的晋察冀野战军。

晋察冀野战军以一部继续围攻徐水，以主力拦击北路援军。经4天激战，至17日，与援敌在徐水、固城、容城之间形成对峙局面。为打破僵局，晋察冀野战军领导人决定向平汉铁路以西的遂城、姚村地区转进，引诱北路援敌西进，待其分散后寻机于运动中歼灭一部。17日黄昏，平汉铁路以东各纵队向路西开始行动。

四、当机立断，清风店地区歼灭第3军主力

当晋察冀野战军主力西进时，战场出现了新情况。罗历戎接到孙连仲的命令后，即以第32师留守石家庄，自己率军部、第7师和第16军第22师第66团，携带4天粮秣，“于十月十五日午后一时由石家庄出发，连续三日行进没有发生情况。”^③正在完县参加土地会议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得知这一情

① 罗历戎：《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56页。

② 同上，第156页。

③ 《文史资料选集》第20集，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57页。

报后，于10月17日下午电告杨得志等人，“石门敌七师并六十六团由罗历戎率领于昨（十六日）晚渡河北进，当晚停止于正定东北之蒲城一带。今（十七日）续向北进，上午在拐角铺一带休息。”^①同日，聂荣臻等命令野战军主力急速南下打敌，“勿失良机”。并告“已令冀晋、冀中用一切努力阻滞该敌。”^②

由驻地容城东马村西进途中的杨得志、杨成武、耿飏，接到上述敌情通报与军区命令后，喜出望外。他们决定，改变原定西进诱歼敌军的计划，“尽快抓住罗历戎，打掉他，歼灭他！这个敌人是送上门的，战机确实难得！”^③决心一定，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战场的选择，在哪里打掉罗历戎呢？杨、杨、耿经过分析后认为，“清风店以北是望都、保定，以南是定县、新乐（罗历戎当时的驻地），对我们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战场。”^④但这时罗历戎距清风店地区只有约45公里，而晋察冀野战军主力离清风店最近者约75公里，最远者约125公里。“所以，能不能打上和打好这一仗，关键是我军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在罗历戎的前边，到达清风店。”^⑤

17日18时杨得志等下达口头命令，并作如下部署：以第2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统一指挥第2纵队第5旅，第3纵队第7、第8旅，独立第7旅，在徐水地区坚决阻击南下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以第4纵队3个旅、第2纵队第4、第6旅，第3纵队第9旅，经保定东西两侧，用一天时间，赶到清风店地区，围歼第3军。晋察冀军区命令独立第8旅和冀中、冀晋军区部队，以及该地区的广大民兵，袭扰北进的第3军，迟滞其前进，阻止其后退，为主力南下聚歼该敌创造有利条件。

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65页。

② 同上，第266页。

③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④ 同上，第396页。

⑤ 同上，第396页。

10月18日晨，晋察冀野战军先头部队从东西两面绕过保定，全体指战员决心不顾一切伤亡、消耗、疲劳，坚决完成任务，活捉罗历戎！各部队于是日24时前后，按时或提前4至6小时达到了指定地区。

罗历戎在孙连仲的催促下兼程北进，18日晨由定县出发途中，两次接到国民党空军投下的“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你们很近，请第三军急急作战斗准备”^①的信袋。罗历戎阅后，放弃到望都宿营的计划，改在清风店附近的东南合及南北合等几个村庄宿营，并令部队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同时，请求“北平行辕”派兵接应。国民党空军为掩护第3军北上和迟滞晋察冀野战军行动，自17日至19日，曾出动各型飞机30架次，轰炸扫射行进中的解放军，但未能帮助第3军摆脱困境。19日晚，第3军即被包围。

20日拂晓，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攻击。杨得志、杨成武、耿飚发布命令：北面阻援兵团应“用一切有效手段，求得在敌前进中歼灭其一部，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坚决阻敌南援。”待我南面将第3军4个团歼灭后，“再放敌南来”；“南面各兵团，坚决歼灭北进之敌，集中兵力、火力，发扬三猛战术。对北面不要顾虑，即使北面之敌进到望都，我仍要继续打下去，一直歼灭这股敌人为止。”由于第3军集中在以西南合村为中心的几个村子里，形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兵力、火力均较集中，因此，激战一天战果不大。20日晚，杨得志等决心先将守敌分割，予以各个歼灭。以第10旅并指挥第11旅之31团夺取南合营；第11旅主力攻击东、西同房；第9旅攻击高家佐；第4、第6旅攻击第3军军部和第7师主力据守的西南合。经21日一天激战，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攻占了南合营、高家佐、东西同房，巩固了西南合村东北面和西南面突破口，为最后歼灭第3军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① 《文史资料选集》第20集，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57页。

在 21 日战斗时，国民党军出动飞机 10 余架次，在解放军阵地和后方的上空低空盘旋扫射轰炸，被解放军的轻重武器击落、击伤各 1 架，有 6 名飞行员被俘。此后，飞机就再也不敢低飞了，所投的粮食和弹药也大部分落在解放军阵地上。

22 日 3 时 40 分，晋察冀野战军集中 5 个多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退守西南合的罗历戎部发起总攻。罗历戎久盼援军未到，见大势已去，令副军长杨光钰和副参谋长吴铁铮在军部指挥，自己跑到第 7 师指挥所与师长李用章组织部队向北突围。冲击多次，均被击退。8 时许，罗历戎、李用章等被俘，其余各部也先后放下武器。22 日 11 时 30 分，战斗结束。

与围歼第 3 军的同时，晋察冀野战军阻援部队在保定以北地区与国民党援军展开了激烈战斗。10 月 18 日，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得知当面解放军主力已经南下，第 3 军陷入重围之后，立即指挥 5 个师 19 个团的兵力，企图绕过徐水，进到保定以南解围。阻击部队在“挡住敌人，保证保南决战的胜利”的口号鼓舞下，从 19 日拂晓开始至 22 日上午，和援敌展开了白刃肉搏，英勇地击退了李文集团的多次猛攻，将其阻止在保定附近地区，有力地保证了清风店决战的胜利。

清风店战役，晋察冀野战军以损失 9192 人之代价，取得俘虏罗历戎以下 1.1098 万人，毙伤 6155 人，共计 1.7253 万人，缴获各种炮 72 门、轻重机枪 489 挺、长短枪 4512 枝及许多弹药物资的胜利。这次战役，是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性作用，并为尔后夺取石家庄创造了有利条件。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在嘉奖电中称赞这一胜利。在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的电报中指出：“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虏军长罗历戎，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极

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忱。”^①聂荣臻称这一仗，是晋察冀军区军事上的“翻身仗”。朱德赋诗祝贺：“南合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为援保定三军灭，错渡滹沱九月槎。卸甲威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②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中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以及刘伯承、邓小平等，亦发电祝贺清风店大捷。

获得这次大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晋察冀野战军作战指导思想明确，即坚持运动战、歼灭战思想，在“动”和“变化”中调动敌人，及时捕捉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第二，广大指战员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在保定以北连续三昼夜激战之后，立即转入急行军，创造了一昼夜步行100至125公里的运动速度，从而赢得了围歼敌人的时间。接着在围歼作战时，又大胆实施穿插分割，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选择弱点进行突击。第三，地方党政军民的有力支援，晋察冀解放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组织了民兵、民工9.8万余人，牲口9600余头，大车3400余辆，担架1万副，支援前方。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同朱德总司令的直接指导分不开。对这一点，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罗瑞卿在一篇回忆清风店战役的文章里写道：“朱总司令对战役的指导是非常具体的。为了使指挥方法适应打大歼灭战的要求，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指示我们成立了前线指挥机构。他鼓励我们一定要树立打大歼灭战的信心和决心，并且明确指出，善于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是夺取战役胜利的关键。他从战略指导原则，战役指导思想到具体指挥方法，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为我们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清风店歼灭战是我们贯彻毛主席运动战思想的一个生动体现，也是实践朱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47页。

② 《朱德传》第576—577页。

总司令关于学会调动敌人的指示的一个成功的尝试。”^①

五、攻克石门，开创华北解放军夺取重要城市之先例

清风店战役后，守备石门的国民党军更加孤立，当时仅 2.4 万余人，且军心不稳，而晋察冀野战军战斗力空前提高。因此，乘胜夺取石门，对晋察冀野战军来讲已是势所必然。1947 年 10 月 22 日，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等立即向中央军委、中央工委提出，“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即复”^②的意见。第二天，朱德、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石门无城墙，守兵仅三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管官被俘，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亦可能引起平、保敌人南援，在保、石间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机会。你们意见如何，望速复。”^③同日，朱德、刘少奇致电聂荣臻等，“我们同意乘胜打石门。有可能打开。即不能打开，亦可能引起李文、袁朴^④等南移，在石、保间可能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对我有利。请你们预为准备各种补充。待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⑤10 月 23 日 12 时，中央军委复电聂荣臻等并告朱德、刘少奇，批准了攻打石门的建议。电文称：“二十二日十二时电悉。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

① 《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97—298 页。

② 《聂荣臻军事文选》第 267 页。

③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1 页。

④ 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袁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 16 军军长。

⑤ 《朱德选集》第 211--212 页。

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① 25日，朱德赶到驻河北省安国县南关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同野战军领导人一起，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动员和攻坚准备。

石门市，1925年由石家庄与休门庄合称，平汉铁路纵贯其间，路东原为休门庄，路西原为石家庄。至1947年冬，辖区面积为121.8万平方公里，人口28万，而城区人口仅有三四万。是平汉、石德、正太铁路的枢纽，扼平原与山地之陲，是华北战略要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嫡系第3军从日军手中接管了该城。长期以来，国民党军大力修筑工事，虽无城墙，但建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防线为日军挖的经济封锁沟，深2.3米多，宽2米，周长30余公里；沟外辅设地雷群、铁丝网、鹿砦等副防御设施，并在外围村庄构筑工事，最坚固者为东西三教、大郭村飞机场、云盘山和大北翟营诸点；沟内侧设围墙、电网，每隔数十米筑一地堡，以交通壕与地堡、暗堡、散兵坑相联结。第二防线以环市区的大建筑物和北兵营为依托构成周长18公里的内市沟，宽、深各5米，环内市沟修筑碉堡、地堡和副防御设施组成的工事体系。在内外市沟间大量修筑碉堡和交通壕、暗沟，使点与点、碉与碉、村与村相互贯通。此外，在内外市沟间，修筑一条周长25公里的铁路，危急时铁甲列车昼夜巡逻，为活动地堡。第三防线以市区之正太饭店、大石桥、铁路工厂、电灯厂和火车站等构成核心阵地。名目繁多的碉堡达6000个以上，真可谓：深沟层层，碉堡林立。国民党军得意地扬言：“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国军凭着工事可以坐打三年！”^②

第3军主力北上后，留守石门的总兵力约2.5万人，由第32师师长刘英统一指挥。第3军直属坦克2个连、山炮1个连、汽车1个连、野炮1个营和第32师配置于第二、第三防线。石门外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15页。

② 《杨得志回忆录》第416页。

围 19 个县的地主和流氓分子等组成的武装，坚守第一防线及其前沿阵地。河北省保安第 5、第 9、第 10 团分别防守元氏、获鹿及大郭村飞机场和西、北焦诸要点。后来，保定绥署还从保定空运 1 个步兵团和 1 个炮兵排及 7.8 吨弹药至石门，以增加防守力量。

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的指示，晋察冀野战军前委于 10 月 25 日，在安国驻地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攻打石门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朱德出席了会议。

会议研究了打石门的方案。野战军决定，乘石门空虚之时发起进攻。如国民党抽调主力从平汉路北段南下增援，预期于保、石间首先歼灭援军一部，或击溃其援军后继续攻城；如国民党军不南援，则采取长围手段，力争攻克石门。为此，决定集中第 3、第 4 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 7、第 8 旅，冀晋军区独立第 1、第 2 旅以及军区炮兵旅共 5.6 万余人攻打石门；以第 2 纵队及独立第 9 旅，第 3、第 9 军分区部队展开于定县南北地区，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多道防御阵地，抗击从保定方向来援的国民党军队。

攻击石门的具体部署是：第 3 纵队从西南、第 4 纵队从东北担任主攻；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担任助攻。炮兵旅和从华东军区调来的 1 个榴炮营，编成 4 个炮兵群。第一炮兵群，山炮、野炮、迫击炮 24 门，支援第 3 纵队作战；第二炮兵群，山炮、野炮、战防炮、重迫击炮、榴弹炮 17 门，支援第 4 纵队作战；第三炮兵群，野炮、迫击炮 15 门，配属第 7 旅作战；第四炮兵群，山炮、野炮 12 门，为炮兵指挥所的机动火力。

夺取像石门这样设防坚固的城市，在解放战争中还是第一次。朱德对打石门格外重视。他出席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听取各级指挥员的情况汇报；深入基层同指战员交谈，了解情况，发现问题，给予指示；还同炮兵、工兵部队研究技术问题。“他提出‘勇敢加技术’的口号，要求各部队在作战中，加强党的领导，精心计划，大搞军事民主，认真钻研战术、技术，严格入城纪律，做

好入城教育工作。”^①11月1日，朱德致电聂荣臻等，“我到此已去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技术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石门计划，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②朱德要求晋察冀军区领导人：物资必须准备充足，特别是炸药、炮弹，并准备攻石门后的大量补充；迅速医治好伤兵，伤兵出院后必须归队；对军队干部家属、子弟不能自给者，必须发给生活费。年过六旬的朱德总司令亲临指导，给晋察冀野战军增添了巨大的力量，大大地激发了指战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为保证石门战役的胜利，晋察冀解放区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以极大力量投入支前工作。参战民兵达1.1万余人，民工8.2万余人，担架万余副，大车4000余辆，牲口1万余头。在战役期间，为部队运送炮弹8万余发，各种枪弹150万发，炸药6万斤，攻坚器材20万斤，主副食24万余斤。

为加速石门守敌的分化瓦解，晋察冀军区还把清风店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约960余人，经教育后分批释放回石门。

1947年11月6日晨，晋察冀野战军对石门发起攻击，至8日，全部肃清外围据点。其中大郭村飞机场与石门东北郊制高点云盘山的争夺战最为激烈。战斗打响后不久，冀晋军区部队就包围了飞机场。守敌为保障这唯一空中通道，于当日8时组织保安第9团主力，在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扑。7日拂晓，冀晋军区独立第1、第2旅分别从东北、西北两面出击，清**灭**保安第9团1个营，占领飞机场。云盘山是距外市沟约600米的一个制高点，高约15米，面积240平方米，为石门东北的唯一屏障。守敌为警备大队1个加强连，以山上的一座庙宇为核心修筑了永久性**或**半永久性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62页。

^② 《朱德选集》第212页。

的防御工事，配置了4挺重机枪、9挺轻机枪、4门六〇炮，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网，自诩为“铁打的云盘山”。第4纵队第10旅第30团第3营第8连，在全团炮火掩护下，以坑道爆破与地面爆破相结合的战法，于8日6时发起攻击，仅经10分钟战斗即占领了云盘山。

在外围战斗的同时，各攻击部队从6日夜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至8日晨，交通壕伸至距外市沟百米以内，坑道挖至外市沟的外沿。

11月8日16时，晋察冀野战军对外市沟发起总攻。各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结合坑道爆破，迅速突破外市沟。至9日晨，内外市沟之间除几个据点外，其余均被攻占。

内市沟为守敌的第二道防线，也是其主要防线。9日晚，攻击部队展开土工作业，改造地形，枪修交通壕和坑道，拂晓前完成了突击准备。10日16时，晋察冀野战军对守敌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第3纵队第8旅第23团的爆破队利用坑道爆破首先突入内市沟，仅6分钟即开辟了通道，至18时，全旅攻入第二防线，占领东里村、西南兵营。第7旅由西里村突击，至17日上午，大部攻入市区，占领中华路、复兴路，并向北兵营发展。第4纵队第10、第12旅自东面并肩突入市沟，占领休门及中正路东侧市区。冀晋军区部队11日攻克北焦村，接着突入内市沟，向北兵营逼近。冀中军区部队除一部围攻元村、彭村外，主力自东南突入，占领大兴纱厂，向北发展进攻。至11日12时，攻城部队全部进入市街战斗。

11月12日晨，晋察冀野战军对大石桥地区之火车站、正太饭店等核心阵地展开攻击。守敌第32师师长刘英指挥残部，据守核心工事，负隅顽抗，妄图固守待援。国民党空军出动轰炸机、战斗机对解放军阵地实施空中打击。为加速进攻速度，第4纵队将预备队第11旅投入市街战斗。该旅奉命攻击火车站和正太饭店。经过激烈战斗，第11旅攻占了这两个核心据点。是日8时，第3

纵队从西面和南面，第4纵队从东面和东北面，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向守敌指挥中心大石桥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至11时，敌军停止抵抗，刘英等被俘。历时6昼夜的石门攻坚战，胜利结束。

石门解放后，冀中军区独立第7、第8旅乘胜南进，在太行军区第34、第35团配合下和华东军区榴炮营、晋察冀军区野炮营和第3纵队工兵营支援下，对元氏县城发起攻击。11月17日，攻占元氏四关，随即进行了13个昼夜的土工作业，挖成坑道24条，每条装药3000公斤以上。12月3日15时，发起总攻，至19时战斗结束。全歼河北保安第5团等5000余人，击毙团长魏永和。至此，石门及其附近地区获得解放。石门市解放后，改称石家庄市。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电，“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敌二万余人之大胜利。”号召“团结全军，继续寻机歼敌，争取冬季作战之大胜利。”

石家庄战役，是晋察冀人民解放军清风店战役胜利之后又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此役共毙伤国民党军3156人，俘刘英以下2.1132万人，合计2.4288万人，缴获各种炮133门、轻重机枪745挺、长短枪1.3122万枝及许多弹药物资。晋察冀野战军和军区部队伤5090人，亡988人，失踪69人，共计6147人。从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这不但是晋察冀野战军而且也是全体人民解放军自战略进攻以来攻克的第一个较大城市。朱德称之为“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① 蒋介石供认“这是我们重要都市第一次的失陷。当然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损失！”^②

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讲是十分宝贵的。其攻坚经验，朱德在1947年12月1日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朱德说：“这次胜利，缴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究竟有哪些经验呢？朱德指出，

① 《朱德选集》第212页。

② 蒋介石1948年4月9日讲话。

“一、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打石家庄准备了一年，对敌情作了详细的调查；准备了充足的兵力，为敌军的4倍，既准备攻坚，又准备打援；物质条件的准备也很充分。“二、这次动员工作做得很好”。“三、讲究战术。这次作战，战士们很勇敢，不但勇敢，还做到了勇敢加技术。”冲锋前，在冲击出发位置上挖了工事；炸药使用很好；炮兵起了很大作用，采取集中几十门炮打一个突破口的办法，炮、炸协同，炮、炸、步协同；集中火力突破一点，随即向两边扩张；1个班分为3个战斗小组，互相掩护，分散前进；巷战中充分使用手榴弹、炸药。“四、善于利用俘虏。”战前，将清风店战役中的一批俘虏放回石家庄，对动摇敌人军心起了作用；战中，动员俘虏为我所用，一个连“缴获了敌人一辆坦克，马上把俘虏争取过来，利用坦克里的炮和炮手打敌人的阵地。”^①

六、平汉铁路北段破击战，重创傅作义主力第35军

（一）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傅作义采用新战法

石家庄失守后，华北战局对国民党军更加不利。蒋介石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②加之，在东北战场上也节节失利，“间接对华北民心士气之影响及对侧背之顾虑，亦使华北指挥阶层，备受纷扰。”^③蒋介石及其身边的谋士认为，论兵力论装备，北平行辕所属部队均超过聂荣臻的部队，但为何总打败仗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指挥机构不统一。北平行辕之下，虽有张垣、保定两个绥署，但不听指挥，互相之间也难合作。一年多来战争实践表明，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缺乏指挥能力，而傅作义则颇有才干，曾给晋察冀人民解放军以不小的损失。蒋介石决心统一华北军事指挥机构，重用傅作义。1947年11月26日，蒋介石再次飞抵北平。28日，蒋介石宣布统一华北指挥机构。

① 《朱德选集》第220—223页。

② 《蒋总统秘录》第3075页。

③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4册（上），第306页。

12月2日，发出手令：“保定、张垣两绥署即行撤销，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傅作义、孙连仲兼北平行辕副主任，并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晋、冀、察、热、绥五省军队归华北剿匪总司令管制指挥。”^①12月6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傅作义在张家口就职，12月26日将总部迁至北平西郊的“新北京”。关于华北“剿总”与北平行辕的关系、华北“剿总”与太原绥署的关系，北平行辕参谋长徐启明于12月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如下说明：“总部辖区包括冀、晋、热、察、绥五省，惟太原绥署仍保留。晋省战区之划分，系太原绥署指挥太原附近军队作战，华北总部指挥雁北军区。至于行辕与总部之关系，为总部负责指挥军事，行辕负责军政，对总部亦有监督之权。”^②

用傅作义指挥华北地区的“戡乱”战争，是蒋介石企图挽救华北危局的一项重要措施。马歇尔对蒋介石重用傅作义，“感到满意”，但认为为时晚了一年。^③李宗仁称“傅作义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④

傅作义一上台，就立即实行许多新措施。大量扩编地方武装，把各地杂牌部队、地主武装，统一编成保安团、保安旅，或守护团、守护旅，以代替主力部队担任地方守备，增加机动作战兵力。强化保甲制度和特务控制，实行所谓军事、政治、思想、经济的“总体战”。利用华北地区铁路、公路交通便利条件，推行所谓“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新战略。将正规军编为机动兵团，以蒋系李文的第34集团军为平汉兵团，以侯镜如指挥的第92军、第62军（整编第62师改称）为津浦兵团；以傅系各军为平绥兵团，分别在这三个方向实行“机动防御”。按照这一战略，

① 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台湾1979年出版。

② 《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12月4日。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82页。

④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第608页。

傅作义一面派第 16、第 62、第 94 军各一部连续扫荡大清河北地区，一面到处推广“王风岗式”的工事（即在平原开阔地区修筑荫蔽，小型堡垒群），企图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带。傅作义在 12 月 4 日接见中外记者时声称：“过去，国军处于被动地位”，“今后将改取主动，决定反守为攻，不仅要收复点线，而且要将匪区全面收复，消灭共匪武力”。一时间，气焰颇为嚣张。

（二）晋察冀军区加强军队建设和开展交通破击战

为适应作战任务的需要，晋察冀军区决定加强野战军、地方军的建设。1947 年 11 月 14 日，聂荣臻等军区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提出了调整二级军区，组建新纵队的方案。16 日，中央军委复电：“扩编方案电完全同意。但扩编后，全军实际人数不宜较现有人数增加太多，以利持久。”17 日，晋察冀军区命令冀晋军区与察哈尔军区合并为北岳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王平，辖 5 个军分区、8 个独立团、1 个补训团、11 个独立营，共 2.1 万余人。同月，原冀晋军区独立第 1、第 2 旅和原察哈尔军区独立第 4 旅编成第 1（北岳）纵队，纵队及纵直各部门领导均由北岳军区领导兼任，辖第 1、第 2、第 3 旅。12 月 6 日，冀中军区独立第 7、第 8 旅和原察哈尔军区，冀晋军区的 3 个独立团、5 个独立营编为第 6 纵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辖第 16、第 17、第 18 旅，全纵队 1.7 万余人。以冀中军区独立第 9 旅及军区所属各军分区的 6 个独立团编成第 7（冀中）纵队，司令员孙毅兼，政治委员林铁兼。上述 3 个纵队中，第 6 纵队隶属晋察冀野战军建制，第 1、第 7 纵队为地方纵队，仍属军区建制。各军分区则编组新的独立团、营。炮兵旅补充了新缴获的火炮，并将迫击炮团改为自造的 15 厘米重迫击炮团。

经过扩编，晋察冀军区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已有 4 个纵队、2 个地方纵队、1 个炮兵旅，共 12.9 万余人，较之 1947 年 7 月 8.5 万余人，增加了近 4.5 万人，另有地方军 4.4 万余人，连同后方机关、学校，全军区总兵力达 21 万余人。当然，这仍然是不够的。

正如聂荣臻 1947 年 12 月在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所说,扩编了纵队,“这样就把分散的小拳头握成几个大拳头。分属北岳、冀中的纵队,必要时也都集中使用。但还不够,我们的力量还要不断生长。这也要大家负责,你们不断打胜仗,缴到的装备大量上交,加上土改搞好,兵源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扩编和装备新的纵队,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强。”^①

石家庄作战结束后,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前委于 1947 年 12 月 2 日开始,在晋县周家庄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总结作战经验,传达贯彻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土地会议精神,布置新的作战任务。朱德、聂荣臻和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帮助与指导晋察冀工作的彭真到了会。朱德、聂荣臻做了重要讲话。朱德说,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很大,使敌人失去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并且把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接着又就打石家庄的经验做了分析总结。他号召指战员认真学习战术。“战术对你们万分需要,是你们的‘补药’”。聂荣臻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边区过去在军事上,也没有翻身,经过清风店、石家庄两大胜利,翻了一下,今后更好翻了。”现在“形势给了我们严冬作战的任务。我们就要行动了,希望大家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不避艰苦,再接再厉求得新的更大的胜利。”^②

关于下步作战,晋察冀野战军于 12 月 6 日致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等:“预定下一个战役行动,仍集中力量向平、保段击敌,以削弱敌人,孤立保定,抓住三角区之敌,配合东北为目的。”^③中央军委 7 日复电,“同意你们六日十时电所提下一步作战方针,以歼灭敌人原则,至于何时在何地打及如何打法统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东北方面冬季作战本月中旬可打响,你们二十日以后开始

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第 275 页。

② 同上,第 269、277 页。

③ 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飏 1947 年 12 月 6 日 10 时致中央军委、中央工委、晋察冀军区电。

打甚为适宜。”^① 据此，晋察冀野战军决定发动平汉铁路之平保段和平绥铁路东段之大破击作战，创造打援条件，此为第一步骤；第二步依情况再作决定。

1947年12月27日，晋察冀野战军第2、第3、第4纵队及第1纵队和地方部队，分别对平汉铁路保定至涿县段，北宁铁路黄村至魏善庄段，津浦铁路静海至唐官屯段，平绥铁路南口至青龙桥、聂乐堡至天镇段，展开破击。至29日，共破坏铁路400余公里，攻克沿线辛庄、白阳城、羊坊、唐官屯、流河、白塔铺、漕河头、徐河桥等10数个据点，使北平东、西、南面的铁路线完全瘫痪。第一阶段破击任务完成后，主力适当靠拢位于易县地区待命，第1纵队集结于青白口、斋堂线待机。

（三）围攻涿水，重创第35军

傅作义为确保铁路安全，急调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和第16军，推进至平汉路北段之涿县、涿水、定兴、徐水、高碑店地区。为调动敌人分散，寻机各个歼灭，第6纵队和独立第9旅于1948年1月7日佯攻保定。傅作义唯恐保定有失，急以第16、第94军和新编骑兵第4师沿平汉铁路西侧，第35军和暂编第3军沿铁路南下。9日，进抵保定、满城地区。

敌虽出援，但仍较集中，不利求歼。为继续调动敌分散兵力，晋察冀野战军领导人决定以第3纵队主力攻涿水；第2纵队位于涿水、定兴间准备打援；第1纵队再次破击琉璃河至松林店铁路和松林店至涿水公路，并向北警戒；第6纵队停攻保定，转至保定西南牵制并吸引进到保定的国民党军队；第4纵队出击大清河北。

涿水守敌为新编第2军第31师1个团及保安部队。城周设塹壕、地堡、两层鹿砦、一道铁丝网和外壕，由交通壕连结成野战工事。第3纵队以第7旅配属由各团迫炮连临时组成的迫击炮团，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57页。

从南门至西南实施主要突出；第8旅第22团从东、北面助攻；第8旅主力在涑水东北拒马河西岸，准备阻击从涿县方向来的援军；第9旅为第二梯队，在涑水东南拒马河西岸义安、史姑庄、庄町占领阵地。11日20时，第3纵队对涑水城发起攻击。至翌日晨攻占东、西、南、北关，守敌大部就歼，部分逃入城内。第7旅随即准备攻城。第8旅第22团战至12日14时30分，攻克城外据点蚂蚱庙，歼敌1个连。

傅作义为救援涑水，命令他的王牌第35军驰援。12日拂晓，第35军军长鲁英麟率新编第32师（欠1个营）由保定乘汽车直奔涑水。进至拒马河边时，留1个团保护设在桥头堡附近的军临时指挥所，新编第32师师长李铭鼎率师主力利用晨雾掩护过桥搜索前进，攻入庄町村。当日16时被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第9旅包围于庄町村内。在定兴的第35军第101师接到增援命令后，乘汽车过拒马河即被第2纵队阻于庄町东南的南北高洛和吴村地区。从北平郊区南下驰援的暂编第17师，亦被第1纵队阻于涿县以南的松林店地区。

杨得志、罗瑞卿等根据以上情况，决心首先集中主力攻歼来援的第35军于庄町等地，尔后视情况继续围攻涑水，乃以第2纵队攻击并牵制南北高洛、吴村地区的第101师；第3纵队一部监视涑水，主力围歼进入庄町地区的新编第32师；第1纵队在涿县南北继续破路和阻击由涿县、高碑店方向来的援敌；第4、第6纵队仍执行原任务。

第35军军长鲁英麟见战局险恶，忙于12日14时率军指挥所及2个营向温辛庄撤退，当即遭到第1纵队第1旅的截击，军参谋长少将田世举以下200余人被击毙，430余官兵被俘虏。第1旅还缴获满载弹药的汽车80多辆、美式105榴弹炮3门。鲁英麟从前来增援的新编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手里要了些马匹，带少数亲信逃到高碑店。次日晨，鲁英麟慑于兵败，在高碑店火车站的一节空车箱内开枪自杀身亡。第35军军部的覆灭，使该军失去

了统一指挥。

与此同时，第3纵队以第7旅一部继续监视涑水，第8旅主力、第7旅一部，会同第9旅进攻庄町。1月12日23时发起攻击，激战半小时，从西、西北、西南突破村沿，并巩固了突破口。这时第8旅（欠第24团第2、第3营）从北面加入战斗，13日1时发起总攻。守敌拼死顽抗，战斗成胶着状态。第3纵队为迅速解决战斗，组织10个步兵营在纵队迫击炮团和山炮营火力掩护下，从四固进行向心突击，至6时30分，从西北面、西南和南面攻入村内，与守敌展开逐屋争夺。9时许，逼近第32师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将庄町守敌分割为两块。守敌纷纷向东溃逃，师长李铭鼎被炮火击毙，其余悉数被歼。

在围歼新编第32师的同时，第2纵队也于12日17时向退守吴村、高洛之第35军第101师发起攻击，激战至次日15时，攻入吴村，歼灭该师600余人，其余部逃回定兴城。傅作义起家的第35军遭受如此重大打击，对他真是当头一棒。该军政工处长刁可成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确是“几声凄厉，几声抽泣！”^①

在第35军被围攻的时候，傅作义急令第16、第94军和暂编第3军及新编骑兵第4师从保定地区出发解围。为保持主动，避免同傅作义援军决战，晋察冀野战军适时放弃围攻涑水，撤出战斗。

铁路破击战和围攻涑水，从1947年12月27日开始至1948年1月21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1.4万余人，解放了大清河北广大地区，重创傅作义起家的“王牌军”第35军，给刚上台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一个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

^① 蒋曙晨：《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

第四节 东北民主联军举行秋季攻势

一、东北夏季作战后的战场情况

1947年，国民党军在东北“采取内线作战，行持久之战略守势”^①，以图巩固占据的地区。然而，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到东北民主联军春、夏季攻势的巨大打击，战争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方面。这时，东北解放区的总人口已达2655万余，解放区土地面积达78.3万余平方公里，东北铁路也有2/3以上为解放军控制。老解放区日臻巩固，新解放区猛烈扩大，增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作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已达51.8万余人，装备也大大改善。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在致林彪、高岗的电报里对东北形势做了如下概括：“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②

国民党军在东北损兵折将，占据地区面积缩小到不足10万平方公里，只占东北总面积88.355万平方公里的11.3%左右，人口剩下1360余万，仅占东北（包括热河）总人口4020.5万的33.8%，控制的铁路只有锦、沈周围不远地段上的1647公里，占东北铁路总里程1.1336万公里中的14.5%，联结沈阳、四平、长春的中长铁路很久不能通车，通关内之北宁铁路（今沈阳至北京）时通时断，其依赖铁路交通线作战的机动性完全丧失，“战略主动权已由政府手中转入共军手中”。官兵厌战，士气极度低落。1947年5月30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就此呈报美国国务院：“过去两月，政府军的士气已加速衰颓”^③。许多方面（包括与各种中国人的接

① 《戡乱简史》第96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78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57页。

触、联总职员、刚从吉林返沈的美国人以及间接地从东北作战指挥部所获消息）已向我们证实他们士气衰颓的严重情势，并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和谈话的题材。它反映在军事防卫部队的惴惴不安，力图避免征调。从国军地区（包括距离现在作战地区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可靠情报中得知：“处于惊惶失措中的国军正狂热地在各处构筑壕堑，心目中图以仅有的‘马奇诺’式的战略防御自卫。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冷淡、怨愤和失败主义情绪正在国军士兵中迅速扩展中，造成投降与逃亡现象。”“国军既遭损失又感精疲力竭、国军军官的豪华与士兵饷金和生活菲薄，待遇间的不均引起的愤恨日增，以及他们毫无兴趣在远离乡井的异乡与不友好的人民为伍作战。”该报告的结论是：“这并不是说满洲即将崩溃。可是，它却确实意味着：国军士气已经低落到这样的地步，即无论何时共军欲攻取满洲，整个满洲可能突然的溃败，任由共军占取。”^①

二、蒋介石、陈诚扭转东北战局的措施

国民党在东北的连连失败，蒋介石将其责任归咎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之无能。熊、杜也很不受美国当权者的欢迎。魏德迈认为：“熊式辉工作不得力，不能指挥所辖的军队”^②；“杜聿明将军是中国东北部队的总指挥，可是他完全不能胜任”^③。马歇尔也不喜欢熊式辉、杜聿明。他认为早就应当免职，现在免了，但太晚了。“危害已经造成，而且无法挽回。”^④蒋介石“为纾解东北戡乱军事之困局，不得不作必要之更张：一、缩小光复后控制之地区，以迁就现有之兵力。二、归并东北地区之军政指挥机构，以统一权责。”^⑤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57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97页。

③ 同上，第172页。

④ 同上，第257页。

⑤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4册（上），第21页。

“缩小控制区”，就是在东北民主联军进攻面前，步步收缩，主动放弃一些地区，或者被迫放弃一些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中城市和战略要点。这样一来，“致使永吉（吉林）、长春、四平、沈阳、锦州等要地，从此各别陷于孤立。”^①

所谓归并东北指挥机构，蒋介石考虑很久了。起先，蒋介石想叫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兼东北行辕主任，将华北、东北两个战区统起来。陈诚为此曾数度衔蒋介石之命来北平“促驾”。李宗仁则竭力婉拒。李宗仁不愿干，蒋介石自然想到身边的一位大将，那就是自己的亲信、参谋总长陈诚。此时，陈诚虽为参谋长，但已不指挥军队了，因为从1947年5月以后，蒋介石直接指挥作战。陈诚实际上变成了“闲人”。

1947年8月1日，国民党政府明令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使其与东北行辕合并。16日，“东北军政统一，保安司令部并入行辕，杜聿明、郑洞国升任（行辕）副主任。”^②29日，国民党政府明令陈诚兼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被撤职。

陈诚抱着“闯创东北戡乱军事之新貌”的雄心，于1947年9月1日偕楚溪春等人抵沈阳就职，宣称：“整饰内部，安裕民生，培养战力”，为当务之急，并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紧肃政、整军。陈诚一到东北，先后撤换了国民党政府辽宁省主席徐箴、第52军军长梁恺，查办汽车团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俘侨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并取缔散兵游勇。同时，安插心腹，重用亲信，如任命楚溪春为东北行辕总参议兼沈阳城防司令。这些做法，在国民党军将领中播下了不和与对陈诚的不满情绪。

第二，调整组织机构，大肆扩充部队。东北蒋军的扩编，在1947年7月业已开始，陈诚到后加紧完成。将9个保安区的52个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4册（上），第21页。

② 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台湾1979年出版。

保安团和保安支队等相继编成 10 个暂编师：第 1、第 12 保安区部队合编为暂编第 50 师；第 2 保安区部队编为暂编第 51 师；第 4 保安区部队编为暂编第 52 师；第 5 保安区部队编为暂编第 53 师；第 7 保安区部队编为暂编第 54 师；第 8、第 10 保安区部队合编为暂编第 55 师；第 11 保安区部队编为暂编第 56 师；第 13 保安区部队编为暂编第 58 师；保安第 12 支队改编为暂编第 61 师。同时，将青年军第 207 师扩编为 3 旅制，战力等同 1 个军；将整编第 49 师改编为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尔后，又将承德保安部队编为暂编第 1 师。整理地方零杂武装为 10 个支队、4 个骑兵旅和 1 个骑兵军。调整 13 个特种兵独立团。重划控制区为 3 个师管区和 7 个团管区。大力抓捕壮丁，加之从关内强征的新兵，使正规军之兵额一般均告满员。同时，撤销原 5 个绥靖区，重新划分为沈阳、长春、松北 3 个绥靖区，组建第 1 至第 4 兵团部，每个兵团相对固定一定部队归其指挥。第 1 兵团司令官孙渡，辖第 93、第 60 军和秦葫港口司令部、保安第 2 支队（假称第 172 师）、保安第 4 支队（假称第 174 师）、东北保安独立第 1 师、热北骑兵第 9 支队、交警第 3 总队、骑兵第 3 军等；第 2 兵团司令官陈明仁，辖第 71、新 1 军和保安第 3 支队（假称第 173 师）、骑兵独立第 4 支队（假称骑兵第 10 师）、保安第 1、第 2 旅等；第 3 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辖第 52、第 53 军及保安第 1 支队（假称第 171 师）、保安第 7 支队（假称第 177 师）；第 4 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辖新编第 6 军、第 207 师及保安第 5 支队（假称第 175 师）、保安第 8 支队（假称第 178 师）和暂归其指挥的骑兵第 2 军；以及行辕直辖的第 13、第 49 军及保安第 6 支队、暂编第 54 师、第 6 补给区司令部和炮、装、通、辎等部队，共 9 个军、38 个师、3 个旅、8 个支队、骑兵 6 个支队（旅）约 50 万人。^①

^①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二部分附表第 24，东北军区司令部 1949 年印。

第三，调整战略，积极整备。陈诚的幕僚，针对东北军事情势，曾提出两个方案供陈诚抉择：

“第一案：由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增援东北，打破现在僵局，形成优势，争取主动，寻求匪主力而击破之，以贯彻收复东北之初衷。

“第二案：就现有兵力，维持东北局面，断然缩短战线，集结兵力，以沈阳为核心。确实掌握辽西、辽南走廊；辽西确保北宁路，辽南掌握营口，依战略持久，阻匪入关，以待关内战场之胜利。”^①

陈诚采纳第一案，但是关内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乃酌加变通，决心使东北战场，暂维现状，一方面在不影响关内之军事状况下”，请求蒋介石抽兵增援东北；同时，“在东北就地培养战力，以沈阳、锦州为基地，由关内大量运补兵员及装备，全面整编地方团队，使之正规化，一俟整训至相当程度，再大规模发起攻势。”^②

兵力部署是：第 60 军主力驻守长春外围之吉林、九台；新编第 1 军驻守长春、德惠、农安、公主岭（今怀德）地区；新编第 6 军驻守铁岭、沈阳、抚顺；第 71 军驻守四平地区；第 52 军第 195 师驻守四平外围的梨树、八面城；第 52 军驻守营口、辽阳、本溪；第 53 军驻守昌图、西丰、开原；第 207 师驻守沈阳东侧抚顺、营盘间；第 49 军驻守锦州；第 93 军驻守义县、朝阳、北票、阜新；第 184 师驻守沟邦子、大虎山；第 13 军驻守承德、平泉、隆化、丰宁地区。

陈诚一到东北，就决心大干，确曾在国民党党、政、军界，引起一阵“兴奋”。美国人魏德迈访问中国东北后亦评论说：“陈诚很好，无畏而正直。”“是能干而廉洁的将军，可惜去晚了，一年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 5 部第 4 册（上），第 23--24 页。

② 同上，第 24 页。

前就该把他派去”^①。当然，也有头脑清醒者，如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他就看到了“东北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不能起死回生，陈诚更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材。”^②

在东北国民党军整备尚未完成之际，东北人民解放军又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东北战局骤起巨大变化。

三、东北民主联军秋季作战任务与扩编野战军

解放战争第二年，东北民主联军的任务，毛泽东在1947年7月10日致林彪、罗荣桓、高岗的电报里作了原则规定：“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东北我军目前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约于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至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③8月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等电告所属各部：“下次全东北的大攻势时间，大约在九月底，目前各部队一切整训皆须为了发动下次攻势。各部队须在此时间内，进行有计划的加紧整训，吸收夏季作战中的经验教训，特别要发扬四平攻坚战中的连续日夜英勇善战的精神，发扬一切攻坚战的经验教训，发扬山地和平地运动战的经验教训，发扬强行军与连续作战的精神”。他们强调：目前部队中须将我刘邓大军在鲁西南“二十天内歼敌九个半旅之胜利广为宣传。”18日，林、罗就下步作战计划报告中央军委。8月29日17时，毛泽东致电林、罗：“未巧（8月18日）电悉。（一）计划甚好，甚慰。（二）希望你们能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三）新的作战，似宜以有力兵团进攻山海关、沈阳线上之敌，以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02页。

^②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第614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34-135页。

另一有力兵团进攻中长线上之敌，以求分散敌人，各个击破，重点放在中长路或山沈路，由你们酌定。”^①毛泽东如此强调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下旬开始新的作战，那是因为国民党军的主力集中在南线。在南线作战的刘邓大军、陈谢集团、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等均处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东北民主联军抓紧有利时机进行新的作战，就有可能将南线的国民党军调走一部分，从而减轻南线人民解放军的负担。

为配合南线作战，林彪、罗荣桓等于1947年9月25日上报并下发了“秋季攻势作战之方针部署”。作战方针，先在南面开始攻击，以达歼灭兵力薄弱地区之敌，并迫使北面敌主力向南分散，以造成我北面部队进击敌人之有利机会。作战步骤：第一步，以第8、第9纵队出击锦州至山海关之线，“歼灭敌有生力量，引沈阳敌南下增援，以便减弱中长路敌人守备兵力，破坏北宁路”，“烧毁锦州至山海关线之枕木”，“阻止关内增援之敌。”第二步，“以第七纵队全部歼灭彰武之敌，并继续歼新立屯、阜新、黑山、北镇、义县地区分散之敌。”“配合八、九纵队作战，并引中长路之敌南调，以减中长路敌之兵力，以便我主力歼灭敌人。”第4纵队之第11师及留在本溪、辽阳以南之各部于辽阳、鞍山、海城、大石桥之线，“袭歼分散之敌，烧毁铁路枕木，调中长路之敌南下，以便造成我主力作战机会。”第三步，“我主力在沈阳、长春中间地区展开攻击，达到歼灭守敌与增援部队，相机夺取能夺取之城市，烧毁此线铁路全部枕木，并诱吉林、长春之敌南出，以便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再突然包围吉林。”第四步，“准备在辽河结冰后，我军主力在沈阳、锦州、营口之线歼敌，而以小部在锦州、山海关之线歼敌和中长路上歼敌。”^②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20页。

^② 林彪、罗荣桓等1947年9月25日关于秋季攻势之方针部署致各部并报中共中央电。

为夺取秋季攻势作战的胜利，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简称东总）在夏季攻势结束后，相继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

第一，调整组织机构。以1947年4月20日划归东北民主联军领导的冀察热辽军区机关一部组成军区前方作战指挥部（简称热前指，又称南线野战司令部），司令员程子华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兼，参谋长黄志勇，指挥第8、第9纵队及热河地区的作战部队；以辽东军区机关一部组成军区前方指挥所（简称辽前指），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副司令员陈伯钧，参谋长解方，指挥第3、第4纵队及辽东3个独立师作战。将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改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钟赤兵，政治委员周桓兼，副政治委员杨至诚，参谋长李聚奎。同时，对兵站运输线进行调整和加强，以原后勤兵站部及西满、南满军区后勤部为基础，分别组成东、西线后勤司令部。东线后勤司令部驻吉林省朝阳镇，西线后勤司令部驻辽宁省郑家屯，担任由北满到南满作战部队的运输、补给任务。撤销西满军区，所属之龙江、嫩江、辽吉军区归东总直辖，并撤销骑兵纵队，所属合编为1个骑兵师，由东总直接指挥。

第二，扩充主力。1947年7月9日，黄克诚致电东总，建议迅速组成冀东、热河两纵队，求得在秋季靠拢在一块作战。8月5日，林彪、罗荣桓、高岗致电各纵队、各军区并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邓华纵队编为野战军第七纵队，热河纵队编为第八纵队，冀东纵队编为第九纵队。”^①第7纵队由西满军区部队组成，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副政治委员吴富善，参谋长高体乾，政治部主任袁升平，辖保安第1旅编成的第19师，师长徐绍华，政治委员邓东哲；保安第2旅编成的第20师，师长刘述刚，政治委员罗友荣；西满独立师编成的第21师，师长李化民，政治委员朱民亲。第8纵队由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旅组成，司令员黄永

^①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48页。

胜，政治委员刘道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辖独立第13旅编成的第22师，师长吴烈，政治委员陈仁麒；独立第16旅编成的第23师，师长张德发，代政治委员曹德连；独立第18旅编成的第24师，师长丁盛，政治委员韦祖珍。第9纵队由冀东军区3个独立旅编成，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中叔，参谋长彭寿生，辖独立第10旅编成的第25师，师长曾雍雅，政治委员艾萍；独立第11旅编成的第26师，师长萧全夫，政治委员李振声；独立第9旅编成的第27师，师长任昌辉，政治委员王文。

8月20日，林彪、彭真、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发布命令：以独立第1、第3师和东满独立师编成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型，参谋长黄炜华，辖独立第1师编成的第28师，师长贺庆积，政治委员晏福生；独立第3师编成的第29师，代师长刘转连，政治委员伍晋南（后为卓雄）；东满独立师编成的第30师，师长方强，政治委员孔石泉。

经过扩编，东北民主联军拥有第1、第2、第3、第4、第6、第7、第8、第9、第10等9个野战纵队、27个师，另8个独立师（其中东总直属独立第2、第4、第5师，辽东军区所属独立第1、第2、第3师，冀察热辽军区所属独立第1、第5师）、2个骑兵师（东总和冀察热辽军区各1个）、5个炮兵团（其中炮兵司令部所属4个，热前指1个），计29.0677万人。3个二级军区及13个三级军区所属地方武装22.734万人。共计51.8万余人，长短枪24.8万余枝，轻、重机枪1.0595万挺，其他枪4205枝，各种炮1891门（其中山、野炮275门），马5.6318万匹^①。

第三，组织训练二线兵团。东北主力部队过去之补充，主要

^①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二部分附表第12，东北军区司令部1949年10月印。

利用战役间隙，靠地方政权临时动员及从地方武装大批抽调，由前方部队负责经过政治审查和军事训练，方能参战。这种补充办法，不适应作战需要，也增加了前方部队的负担。随着东北战局的胜利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减少领导层次，节省人力和物力，迅速组织新的力量充实前线，不但非常迫切，而且有条件完成。为此，东北局于1947年7月27日作出《关于减少领导层次、合并单位、提调干部、加强下层与新区之决定》，要求在11月前共组织38个独立团。每团补足2000人，进行3个月训练，准备明年初，陆续开赴前方，充实主力，并分工罗荣桓负责组织此项工作。7月下旬至8月初，在哈尔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除总结夏季攻势作战经验、讨论进攻大城市、建立党委制等问题外，也讨论了组织和训练二线兵团问题。讨论后决定在9月底前编成48个独立团，其中吉林军区12个、龙江军区3个、牡丹江军区5个、辽东军区（包括辽宁、安东、辽南军区）8个、东总直属1个。每团定额2500人。辽吉军区成立新兵团，补充第7纵队。至1948年春，辽东军区除原定8个团外，又陆续编成22个独立团，冀察热辽军区于同期编成18个独立团，使第一期编成的独立团达88个，计22万人。独立团相继编成后，立即开始教育训练。政治教育时间占30%，军事教育时间占70%。第一期组建的独立团于翌年2月训练结束后，除编成5个独立师外，其余各团于同年3月中下旬全部补充主力部队。

第四，休整部队。夏季攻势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7月2日决定，从四平地区后移，以战备姿态进行休整。第1纵队集结于西安，第2纵队集结于双山，第3纵队集结于东丰与西丰间，第4纵队集结于本溪、抚顺东，第6纵队集结于双河镇地区，邓华纵队集结于郑家屯一线，热河纵队集结于朝阳附近，冀东纵队集结于建昌东南。

各纵队在东北军委分会和东总的组织领导下，以近2个月时间进行“诉苦复仇”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夏

季攻势的经验教训，开庆功会，进行战术训练和兵员、物资补充。撤销军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按古田会议决议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实行集体领导。新建纵队还进行形势与任务、克服乡土观念、参加机动作战的教育，从而激发了斗志，掀起了求战求荣的热潮。

第五，成立东北财经委员会。为加强东北地区财经工作领导，以利支援前线，东北行政委员会于8月11日在哈尔滨召开各省政府主席、财政厅及各有关部门共百余人参加的东北解放区财经会议。李富春代表东北局作报告，王首道、叶季壮发了言，各省汇报了情况。会议期间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的东北财经委员会，通过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筹规划，分工负责，精密计算，结成整体”的东北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制定了东北行政区1948年发展经济计划及财政计划。10月10日，东北局发布《加强财经工作决定》，批准了8月会议制定的各项计划。

东北财经委员会的成立，实现了对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对调集财力、物力支援大规模军事行动，特别是对秋季攻势行动和尔后的作战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四、秋季攻势第一阶段，辽四三战

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从1947年9月14日开始，首先在辽西走廊展开。

辽西走廊，指辽西丘陵东南的沿海狭长地带，是连结东北与华北的枢纽，为国共两军争占的重要地区。穿越辽西之北宁路和锦承线是东北入关的主要通道。陈诚为打通锦承线，确保北宁线，拓展东北与华北的联系，1947年9月6日，集中3个师的兵力，由绥中、锦西、义县分3路向建昌方向进攻，以保护北宁路锦榆段。暂编第50师（欠1个团）为左路，由绥中出动，7日进至绥中西北的梨树沟门；第93军暂编第22师（欠1个团）为中路，7日从锦州出发，9日进占锦西西北的新台边门；暂编第60师为右路。

东北民主联军热前指程子华、黄克诚等根据东总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指示，决以第8纵队歼灭暂编第50师和暂编第22师，吸引锦州地区的第93军主力来援，再投入第9纵队，合力攻歼之。

第8纵队并指挥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1师，奉命于9日从赤峰、凌源地区出发，以急行军兼程前进。

13日夜，第24师与进至梨树沟门的左路暂编第50师一部遭遇，战至次日17时，歼灭据守梨树沟门南山、东山的暂编第50师第2团，共1000人，取得了首战梨树沟门的胜利。

梨树沟门战斗后，暂编第22师惧怕被歼，由新台边门仓皇东逃。第8纵队第23师跟踪追击，于9月15日19时将其堵在杨家杖子、毛祁屯一线。在第22师和独立第1师配合下，于16日14时发起攻击，激战2小时，将其大部歼灭。突围南逃的余部，被从梨树沟门乘胜东进的第8纵队第24师堵住，前后夹攻，除少数逃脱外，均被歼灭，并逼退右路暂编第60师。此战俘暂编第22师少将副师长苏景泰以下2560人，毙伤1000余人，取得了一战杨家杖子的胜利。

陈诚“为确保辽西走廊之安全，彻底解除北宁铁路之威胁，电令锦州之第一兵团，指挥第四十九军，即向北宁路以西之匪攻击。”^①第49军是1947年8月上旬从苏北陆续船运抵葫芦岛的，除第26师尚在海运途中外，其主力第79、第105师已在锦州附近集结。9月17日晨，军长王铁汉率第79师（欠第235团）及军直属部队一部，自锦州沿锦、江（家屯）大道，向江家屯附近前进，进驻红螺岬及其以西之团山子。第105师及第235团，自红螺岬西进，进占江家屯。程子华为诱敌深入，以利围歼，令第8纵队向新台边门转移，第9纵队向杨家杖子以东急进，阻击可能由锦西、兴城出援之敌。19日第49军出援部队进到杨家杖子地区时，第8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4册（上），第24—25页。

纵队主力及独立第1师，立即将其包围，并连夜冒雨猛攻。至当日夜，第23师攻占323高地和黑鱼沟西北高地；第22师攻占杨家杖子北面2个碉堡及附近地区，突入杨家杖子；独立第1师攻占杨家杖子东南284高地及石湖南山。战至翌日10时，歼灭第105师团长以下2000余人。

22日上午，后续到达锦州的第49军第26师与暂编第60师2个团和第93军暂编第18、第22师各1个团出动增援，被第8纵队第24师和第9纵队第26师分别阻于锦州西南20公里的虹螺岬和连山、老边、五岭山一线。当日16时，王铁汉率部从杨家杖子向南突围。第8纵队紧追不舍，歼其大部，俘第105师师长于泽霖。残部逃至旧门、杂木沟地区，为第9纵队围歼。王铁汉化妆潜逃。

二战杨家杖子，东北民主联军取得歼灭国民党军第49军军部和第79、第105师师部及5个团1.2万余人的胜利。

2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电嘉奖辽西前线将士。嘉奖电说：“庆祝你们在两次杨家杖子战斗中，歼灭蒋匪49军主力的伟大胜利，望继续努力，争取新的胜利，并嘉奖此次战斗中有功的部队和指战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冀察热辽军区也致电祝贺辽西大捷：“揭开了冀察热辽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的序幕，影响了东北战局的发展”，“望再接再厉，服从命令，英勇善战，更多歼灭敌人，有力配合全国攻势”。

杨家杖子战斗后，第8、第9纵队奉令乘胜进击北宁路锦州至山海关段，在民兵2.63万人和热河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从9月28日至30日作战两昼夜，彻底破坏了该段铁路线，使北宁铁路交通陷于瘫痪。陈诚为保护东北至华北的陆上通道，急调中长线之机动兵力新编第6军第14师、新编第22师从铁岭南下，增援护路。

辽西梨树沟门战斗、一战杨家杖子、二战杨家杖子三战三捷和北宁路的破袭战，不仅给辽西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而且实现

了调动北线国民党军南下的作战目的。

五、秋季攻势第二阶段，出击中长路

中长路是哈尔滨向西至满洲里、向东至绥芬河、向南至大连铁路之总称，为东北的主要铁路交通干线，其松花江上游（今第二松花江）以南的哈大线为国民党军重点守备地区，但因兵力不足，防御薄弱。新编第6军主力从铁岭调锦州后，四平至铁岭段仅有第53军分别守卫伊通、昌图、西丰、开原地区。在陈诚机动防御的方针下，有随时收缩的可能。

林彪、罗荣桓为歼灭第53军和扩大解放区，决心以远距离奔袭包围的手段，各个歼灭四平至铁岭铁路沿线地区的国民党军。其具体部署：第3纵队自东丰、西丰间渗入威远堡、西丰地区，歼击第53军之第116师；第4纵队（欠第11师）由抚顺以东地区向开原以东的八棵树、貂皮屯之第130师奔袭；第6纵队自双阳以东地区迂回奔袭伊通、伊巴丹站之暂编第56师；第1、第2纵队分别由西安、双山向昌图、八面城等地奔袭，并在四平南北地区箝制新编第1军和第71军；第10纵队（欠第28师）和独立第4师奔袭长春西南北大屯、范家屯，箝制和阻击长春之敌南援；第28师奔袭开原南侧之中固，截断开原与铁岭的联系；第4纵队第11师和辽南独立师向沈阳以南之中长路积极活动，牵制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

为配合主要方向之作战，令第7纵队向新民、黑山出击，阻止新编第6军主力从锦州北返，并相机歼灭彰武、法库地区的国民党军；热前指指挥第8、第9纵队继续破击北宁线。

陈诚发觉东北民主联军企图后，立即调整部署：令新编第1军第50师、新编第38师和第71军等部由长春等地南进；令第53军放弃西丰、莲花街等要点，向开原及其附近地区收缩。新1军主力于28日由长春出发，29日进至四平以北郭家店、杨木林一线。

1947年10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力，突然向四平以南、铁岭以北第53军防区发动攻击。“位于威远堡之第116师，仓卒应

战”，“损失惨重”。驻守貂皮屯等地的第130师，“亦同时遭受攻击，该师之第390团，于1日10时顷，由貂皮屯突围西撤途中，到达红花甸，复陷入重围”^①。激战至2日18时，全团覆灭。东北民主联军计全歼第53军第116师和第130师第390团共约万人，矛头直逼开原、铁岭。

向沈阳西北及北宁路新民地段出击的第7纵队第21师，经80公里强行军于10月1日袭占法库，歼灭了保安第7支队（假称177师），俘敌1700余人，创奔袭作战的模范战例。该纵第19师于7日攻克彰武，全歼暂编第57师1个团。与此同时，第4纵队第11师和南满独立师，攻占了大石桥、海城，威逼鞍山、辽阳。第1纵队奔袭叶赫站、莲花街，因守敌先行撤走而扑空，即奉命破击四平至铁岭间铁路。第2纵队奔袭梨树、三江口、榆树台、八面城，接着奉命由四平西北南下，向双庙子一线前进，协同第1纵队侧击由四平南下增援昌图、开原的新1军。第6纵队由伊通地区攻击公主岭（今怀德），进逼郭家店，牵制新1军。独立第2师包围昌图，并阻击新1军于昌图以北。

陈诚为加强四平地区防御，令长春新编第1军主力乘汽车南下四平，新编第6军主力从锦州返铁岭。林彪原定攻取开原车站（今开原），因部队未能按时完成准备，以及国民党援军来到，遂停止执行，令所有部队破袭中长路和北宁路：独立第5师于长春以北；第30师、独立第4师、骑兵师和第6纵队主力于长春、四平间；第1、第2、第3纵队和第16师于四平、铁岭间；第28师与第4纵队主力于铁岭以南；第11师与辽南独立第1师于营口、辽阳段；第21师、蒙骑第1师向黑山、新民段；第8、第9纵队向锦州以西地段。各部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猛烈破击战，经过近3天时间，即将国民党军抢修3个月即将通车的中长路全线彻底破坏，北宁路则更加支离破碎。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4册（上），第28—29页。

对此次破击战的情况与经验，东总于10月17日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根据不完全材料，先后将农安至铁岭（除长春、四平、开原车站三据点外）、山海关至锦州（除锦西、绥中、兴城外）间全长约315公里之铁路彻底破坏，总计炸毁大小桥梁84座，烧毁枕木78.8万余根，毁铁轨3.3万余根。在这些铁路线上，已没有一根枕木及电线杆，没有一座桥梁。其主要做法是，（1）针对东北敌军据守据点，不敢轻易出援，利用作战间隙，有计划、有步骤、又有严密分工，将一切可能破坏之铁路，实行毁灭性破击。（2）将枕木、电线杆烧毁或搬走，因东北产木材区全为东北民主联军控制，国民党要修复铁路，全依赖关内及美国枕木；一切大小桥梁均炸毁，一切车站水塔毁掉。（3）铁路大翻身办法，破路效果又快又好，一个连（130—150人），每小时可翻铁路3公里。中央军委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推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破路办法，指出这种办法既快又彻底。

秋季攻势第二阶段作战，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1个整师、1个支队和3个整团，以及彻底破坏了中长、北宁两路的重大胜利。陈诚“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计划，宣告彻底破产。

六、秋季攻势第三阶段，北围吉林，南击华北出援的国民党军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的胜利发展，震惊了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于10月4日飞北平，次日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增援东北问题。8日，蒋介石飞到沈阳，与陈诚商定实行紧急措施。从华北地区急调第92军第21师、第94军第43师、暂编第3军之暂编第10、第11师及位于平承路的第13军第54师，驰援东北。这时，在四平、铁岭地区，除第53军残部和第71军外，又增加了新编第1、第6军主力，守备力量明显增强，而龙安、德惠和长春等地只有新编第1军之新编第30师、暂编第53和暂编第56师等3.5万人坚守；吉林及其外围九台、乌拉街、口前地区，也只有第60军第182师、暂编第21、暂编第52师和地方武装共3.8

万人，且暂编第 52 师系由保安区部队编成，人员、装备均不足，训练差，士气低。吉林地区的守备力量相当薄弱。

10 月 12 日 10 时，林彪就下步行动致电中共中央：“目前，在主力所在地区，敌完全采取守势，并以较多兵力防守。因此，我不易直接求得运动战。现我军拟进攻吉林，力求攻占之，并求得打增援。”对“有些分散的敌人，拟以次要力量歼灭之。”^①

13 日，东总将作战重点由铁岭地区转到吉林、长春地区，采取“围城打援”战法集中 6 个纵队奔袭长、吉外围各据点，围攻吉林，吸引新编第 1、第 6 军出援而予以各个歼灭。其中以第 6、第 10 纵队（欠第 28 师）及独立第 4、第 5 师等 7 个师的兵力袭占长、吉外围各据点后，围攻吉林；第 1、第 2 纵队进至四平以北，准备歼灭由四平出援之新编第 1 军；第 3、第 4 纵队首先在开原附近破路和佯动，尔后第 3 纵队北上打援，第 4 纵队与辽东各独立师在沈阳东、南寻机作战，并准备破击沈阳至抚顺、本溪、营口的铁路线；骑兵师在公主岭以北、第 28 师在铁岭地区，牵制该地守敌。另以第 7、第 8、第 9 纵队在辽西地区展开攻势，钳制北宁路敌军，策应北线主力作战。

（一）歼击华北出援的国民党军

由于从华北来援的国民党军行动甚快，秋季攻势第三阶段作战首先从辽西开始。正当东总调整部署时，华北援军先头第 13 军第 54 师于 10 月 9 日进到兴城，后续各师乘汽车向锦州急进。热前指率第 8、第 9 纵队一部在锦州至山海关间破路，牵制锦州守敌，主力集结北票、朝阳、义县地区待机；第 7 纵队出击阜新、新立屯、黑山。

· 10 月 9 日，第 7 纵队从彰武西侧出发奔袭新立屯，次日上午发起攻击，仅 1 个半小时，即全歼第 93 军暂编第 57 师 2 个团（欠 1 个营）及保安队一部。与此同时，第 8、第 9 纵队等共 7 个

^① 林彪 1947 年 10 月 12 日 10 时致中共中央电。

师展开于锦州至兴城间长 60 公里地段上破路，至 10 月 12 日攻占了除锦西以外的全部据点，并一度袭入锦州机场，击毁飞机 1 架，歼敌 1200 余人。

12 日，国民党军第 92 军第 21 师、第 94 军第 43 师在侯镜如指挥下，攻占黑山、新民，继向新立屯、阜新和彰武进击。第 8、第 9 纵队奉令出击义县、北票、朝阳。15 日，第 8 纵队包围义县，第 9 纵队进至义县以南完成了打援准备。17 日，第 7 纵队攻克阜新，歼灭暂编第 51 师师部及 1 个团。

18 日，侯镜如指挥第 21、第 43 师调头驰援义县。第 8、第 9 纵队立即放弃围攻义县，转兵热东。第 9 纵队攻取朝阳，引义县守敌出援，第 8 纵队则准备打援。朝阳守敌为骑兵第 3 军及暂编第 50 师第 3 团等 4000 余人，工事坚固，防御体系完整。第 9 纵队从 10 月 21 日开始攻击，苦战至 23 日晨，战斗结束，全歼未及逃跑的暂编第 50 师第 3 团及 2 个保警大队共 2100 余人。这是东北民主联军首次取得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县城的胜利。与此同时，第 8 纵队围攻北票。

由新立屯西援的侯镜如部，于 10 月 28 日抵达义县。林彪于 28 日 11 时令程子华指挥 8 个师，引诱侯镜如部深入义县以西，予以歼灭，尔后转入新民至大虎山地段，牵制在铁岭的新编第 6 军使其不能北上增援，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北线作战。29 日，侯镜如部进到义县西北 20 公里处与第 8 纵队警戒部队接触，即退缩至代官堡、朝阳寺、九台关门、金凤山地区采取守势。程子华以第 9 纵队从南面进攻金凤山、二道河子地区的第 43 师，第 8 纵队主力和独立第 1 师从西、北两面进攻九台关门的第 21 师。

11 月 1 日 3 时，战斗开始。第 8、第 9 纵队等部不顾敌飞机轰炸，炮火轰击，勇猛进攻，顽强搏击，战至翌日 16 时，歼灭第 21 师大部、第 43 师一部共 6500 余人。义县守敌保安第 4 支队闻讯于 11 月 2 日南逃，热河骑兵师奉命追击，于 4 日将其 2 个团全歼。接着，乘胜解放义县。

至此，东北民主联军南线部队打击从华北增援的国民党军取得了很大胜利。

（二）奔袭长春、吉林外围，围攻吉林

南线阻歼华北国民党援军作战胜利发展时，东北民主联军北线各纵队奔袭长春、吉林外围，围攻吉林的作战于10月16日开始。第6纵队从赫尔苏门、大南屯地区出发，强行军六七十公里，分别奔袭吉林西、南面的桦皮厂、九站和口前。桦皮厂守敌闻讯逃跑。九站守敌暂编第52师第2团一部被歼，大部沿公路逃到吉林。19日，第6纵队歼灭口前第60军第182师1个步兵营，逼近吉林近郊。

与此同时，独立第5师攻占农安后，配合第10纵队第30师攻打德惠。德惠守敌为暂编第53师1个团及保安队共1800人，因工事坚固，号称“铁打的德惠”。20日下午，第30师在炮火掩护下，经2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占领德惠。至此，长春、吉林外围主要据点，被东北民主联军基本肃清。

从10月20日开始，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配属第2纵队第5师、第10纵队第29师、独立第4师及特种兵所属炮兵全部、战车一部，对吉林展开围攻。

吉林市在长春以东松花江（今第二松花江）畔，与长春有铁路公路相连，但在军事上难行有效支援。“第六十军戍守永吉（今吉林），除屏障长春，更须维护攸关民生经济之小丰满发电厂。在兵力配备上，以一部确保西北方铁路线上之哈达湾，与正西方唯一之制高点二道岭子，作外围之支撑，主力配置于市区，凭河川地障及工事家屋，构成坚固之防御阵地，以行持久。”^①吉林北面是桃园山、炮台山，通称北山。南面是龙潭山，由欢喜岭、团山子、小白山拱卫。团山子高50米，是全市的制高点。第60军的具体兵力部署是：以战力最强的第182师守龙潭山；暂编第21师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4册（上），第31页。

守西面的铁路沿线，维护至长春之交通；暂编第 52 师守北山及小丰满。指挥部设在北山。

10 月 29 日晨，第 6 纵队第 17 师在 16 门野、榴、山炮支援下，攻击团山子，至 11 月 1 日，先后歼灭第 182 师 4 个加强连。与此同时，第 29 师对下大屯至小丰满一线高地发起攻击，歼灭暂编第 52 师一部，迫使该师主力缩回吉林城内。经 5 天外围和近郊作战，共歼敌 5000 余人，直逼吉林城下。

第 60 军军长曾泽生急忙调整部署：以暂编第 52 师（欠 2 个团）并指挥交警 2 个大队，仍任哈达湾及二道河子的守备；以第 182 师守卫市区东、南两面；以暂编第 21 师 1 个团守小丰满，主力守卫市区北面。全部守城兵力 2.3 万余人。同时，向陈诚发报，请求派兵增援。陈诚被迫以新编第 1 军由四平地区向长春疾进，增援吉林。11 月 1 日，该军先头已到郭家店，并于当夜开始以 200 辆汽车往返运输部队北进，2 日进入长春。

因为吉林守敌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防御，且长春国民党军必将大举出援，加之严冬将至，部队需要休整和做防寒准备，林彪认为“硬攻无把握”^①，故决定于 11 月 5 日结束秋季攻势作战。

历时 50 天的秋季攻势，是东北民主联军进行的又一次重大战役。此役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3 个师部、2 个师、9 个团 4.7 万余人，非正规军 1 个师部、2 个师、10 个团、3 个营 2.2 万余人，共计约 6.9 万余人。缴获各种炮 1051 门、各种枪 7.7529 万枝（挺）、各种枪弹 275.9669 万发、炮弹 10.1316 万发、手榴弹 11.2461 万枚、汽车 311 辆、战马 4718 匹，以及装甲车、坦克各 2 辆，击毁飞机 2 架。扩大解放区 3.84 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260 余万，收复和一度攻克城市 15 座，切断长春至四平铁路交通线，彻底粉碎了陈诚的机动防御计划。

秋季攻势，是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反攻转为战略进攻的第一

① 林彪 1947 年 11 月 8 日致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电。

个大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体中的一部分。在各战场的胜利策应下，东北民主联军完成了本身肩负的作战任务，并在某种程度上也配合了关内各战场的作战。攻势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从关内战场上抽调 6 个师的兵力出援东北。

秋季攻势能取得如此巨大胜利：第一，坚持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调动国民党军分散而歼之；第二，在兵力、火力总体上尚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拣弱的打，每战集中 2 倍、3 倍，甚至 5 倍、6 倍的兵力攻击一点，得手后再及其他，各个击破；第三，远距离奔袭，出其不意，使国民党军时时被动挨打，处处防不胜防；第四，果断指挥，临机应变，能打则打，不能打不硬拼，因而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第四章 国民党实行“总体战”，共产党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第一节 转入战略进攻后的全国形势

一、军事形势根本转变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即194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刘少奇及各战略区领导人的电报里指出：9、10、11、12“四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号召全党全军“一致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①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开始转入全国规模进攻，经过半年英勇作战，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个整编师（军）、54个旅（师），非正规军100个团，共75万余人。“这样，就使我军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②从此，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军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一个辐射江淮河汉广阔地区的中原解放区已经初具规模。西北、华北、东北、山东、苏北等战场的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也连连得手，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这时，对人民解放军特别有利形势的战场依次是，东北，山东，西北，苏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平汉铁路郑州汉口段以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军仅在大别山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202页。

^② 同上，第353页。

和淮河以北地区，尚有 26 个机动旅，可以举行战役性的进攻，其余一切战场的国民党军，全是被动挨打。

毛泽东在 1947 年 12 月评价中国军事形势的这个根本变化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①

二、人民解放军继续壮大，国民党军进一步削弱

（一）人民解放军壮大

首先是兵力数量迅速发展。到 1947 年 11 月底，野战军：40 个纵队（38 个步兵纵队、2 个特种兵纵队），124 个旅（121 个步兵旅、2 个骑兵旅、1 个炮兵旅），415 个团（353 个步兵团、10 个骑兵团、22 个炮兵团、2 个工兵团、1 个战车团、16 个教导团、11 个补充团），共计 107.2 万余人。军区正规部队：5 个步兵纵队，24 个旅（22 个步兵旅、2 个骑兵旅），70 个团（61 个步兵团、7 个骑兵团、1 个教导团、1 个补充团），共 11.4 万余人。军区非正规军：330 个团（218 个步兵团、13 个骑兵团、5 个炮兵团、13 个教导团、81 个补充团），共 103.4 万人。华南游击队 1.6 万余人。全军 45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44 页。

个纵队、148个旅、821个团，共223.7万余人。在这些部队里，南线（黄河以南），野战军26个纵队、74个旅、253个团，共64.5万余人；军区正规部队：3个纵队、12个旅、35个团，共6.6万余人；军区非正规部队：142个团，共56.3万余人。北线（黄河以北的华北及东北）：野战军14个纵队、50个旅、162个团，共42.6万余人；军区正规部队：2个纵队、12个师（旅）、35个团，约4.7万人；军区非正规部队：190个团，共47万余人^①。

至1948年2月，总兵力发展到249.1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32.2万余人，平均每个旅（3个团）8000人左右；非正规军（包括地方兵团、部队、游击队、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共116.8万人，其中作战部队80万人。同转入战略进攻时相比，总兵力增加54万人，正规军增加32.2万人，非正规军增加21.8万余人。

第二，装备进一步改善。到1947年11月底，全军武器装备情况是：长短枪63.179万枝（步马枪55.9367万枝、卡宾枪800枝、短枪7.1579万枝、战防枪44枝），机枪4.6323万挺（重机枪4821挺、轻机枪2.9682万挺、冲锋枪8073挺、汤姆枪3720挺、高射机枪27挺），火炮9338门（榴弹炮105门、野炮159门、战防炮117门、山炮444门、平射炮72门、步兵炮102门、火箭炮348门、速射炮35门、机关炮51门、化学炮105门、重迫击炮64门、轻迫击炮2193门、六〇炮2619门、小炮2850门、高射炮58门），掷弹筒8913具，枪榴筒895具，坦克32辆。较之战略进攻开始时，又有很大改善。

在这些装备中，东北野战军，长短枪13.2507万枝，机枪1.3007万挺，炮1968门，掷弹筒2010具，坦克32辆。东北军区部队，长短枪13.2304万枝，机枪3789挺，炮306门，掷弹筒1113具。晋察冀野战军，长短枪2.9297万枝，机枪2662挺，炮423门，掷弹筒721具，枪榴筒96具。晋察冀军区部队，长短枪4.2295万

^① 中央军委一局：《关于野战军地方军序列实力表》，1948年1月。

枝，机枪 1749 挺，炮 88 门，掷弹筒 577 具，枪榴筒 224 具。西北野战军，长短枪 1.9608 万枝，机枪 1626 挺，炮 300 门，掷弹筒 236 具。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长短枪 3.3739 万枝，机枪 1448 挺，炮 154 门，掷弹筒 702 具，枪榴筒 22 具。刘邓大军，长短枪 3.3273 万枝，机枪 3600 挺，炮 1510 门。陈谢集团，长短枪 2.2652 万枝，机枪 2156 挺，炮 951 门，掷弹筒 26 具。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长短枪 7.2402 万枝，机枪 2912 挺，炮 1137 门，掷弹筒 210 具。陈粟大军，长短枪 5.6087 万枝，机枪 8178 挺，炮 1747 门，掷弹筒 1385 具。山东兵团，长短枪 2.9513 万枝，机枪 3818 挺，炮 562 门，掷弹筒 1832 具，枪榴筒 58 具。华东军区部队，长短枪 2.8113 万枝，机枪 1378 挺，炮 192 门，掷弹筒 101 具，枪榴筒 495 具^①。

从 1947 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利用战争间隙，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第三，建立健全了各大军区军政、军民结合的后勤体制，统一了全区供给标准。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保障体制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解放区经济发展而逐渐形成起来的。到这时，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总后勤部依然主要只在方针政策上对各大区进行指导，同时，并调配各大区之间的武器弹药、兵员的相互支援。各大军区形成了独立的后勤组织系统，大军区下辖二级军区后勤司令部、军分区后勤司令部、县后勤指挥部、区后勤指挥部。大军区设一套后勤机构。野战军也有自己的后勤系统。在全区范围内，供给标准是统一的。

地方支前机构也由临时性的转变为常设性的。1947 年以前，每次战役前成立各级支前机构，筹划支前工作，战役结束支前机构撤销，支前民工返回原地。再举行战役，又得重新动员、组织人民支前，因此这种机制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此后，各大区成立了由地方、军队联合组成的各级长期、固定的支前机构。组成

^① 中央军委一局：《关于野战军地方军序列实力表》，1948 年 1 月。

了常设民工队伍，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就可以支援到哪里。

（二）国民党军战斗力继续下降

第一、总兵力减少。根据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统计，到1948年2月，国民党的总兵力为365万人。其中，正规部队104个整编师（军），279个旅（师），181万人；非正规部队、特种部队、海空军等103万人；后方军事机关非战斗人员81万人。与1947年7月时相比较，正规部队增加了31个旅的番号 and 31万人，非战斗人员减少19万人，总兵力减少8万人。这是经过不断补充后方能维持的数量。

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根据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写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提供的数字，1947年12月，陆军武器数量为：步枪72.0317万枝，轻机枪6.1399万挺，重机枪1.1949万挺，高射机枪48挺，手提机枪6.7855万挺，手枪4.0077万枝，中口径迫击炮7506门，六〇炮9600门，战防（车）炮1474门，步兵炮260门，山炮1257门，野炮503门，榴弹炮401门，战防枪1058枝，掷弹筒38364具，火箭筒1191具，信号枪3476枝。

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虽然增加了番号与人数，但其战斗力并未增强。因为所增加的旅番号中，有的只有空番号，尚未来得及重建或补充，属这类情况的有29个，故实有旅为250个。在这250个旅中，只有118个旅未受到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其余132个旅，或者被解放军歼灭过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然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受过解放军一次、二次、甚至三次歼灭性打击的。未受过歼灭性打击的118个旅中，有一部分是在第二线训练的新兵，有一部分是从地方部队升级编成的，其战斗力很弱。每个旅的编制人数也由战争初期的8000人左右缩减为6500人左右，而且实有数字还少于此数。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普遍存在长官吃空额喝兵血的恶习。

第二，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进一步低落。这可以从美国驻华大

使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和蒋介石的一些内部讲话里反映出来。1947年11月24日，司徒雷登“对中国内战中的若干精神上的和人情上的因素加以评论”说：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日益颓丧、悲观失望、终而至于无精打彩，或无所顾忌地营私自利……其至于高级官员亦开始失望。对军队士气的影响，更不堪设想。”^① 1948年2月5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报告中写道：“中国高级文武人员对于经济、政治和军事情形之日趋恶化悲观与绝望与日俱增，这是很久以来就很明显的事。”^② 3月17日，司徒雷登又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说：“政治与军事的崩溃现在正迅速的接近期待已久的高潮。这方面的最显著的证据就是：军队士气的涣散，不仅在无精打彩和消极漠不关心上面看出来，而且也在拒绝服从命令或者甚至做出违反命令的行动等上面看出来。”“文武人员，不论上下，都在贪污或者打算逃跑。”^③ 蒋介石在1947年12月22日对中央训练团讲话时称，“我们国民革命军到今天变成这样畏缩不前，懦弱无能，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而被舆论讥笑的无用之军队了。

第三，国民党军的后方守备兵力更薄弱。在西北（包括兰州以西地区）、西南（包括川、康、滇、黔诸省）、东南（包括长江以南诸省）及台湾省，只有正规部队9个整编师、28个旅、19.6万人。与1947年6月时相比，留在后方的正规部队增加了3个旅，但这些部队大多是在前线受到解放军歼灭性打击后调到后方去休整补充的，因此战斗力很低。其中有9个旅远在新疆，由于国民党当局推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导致同各民族的矛盾日益加深，新疆民旅军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的进一步发展，使这些国民党军很难调回内地去对付人民解放军。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14页。

② 同上，第852页。

③ 同上，第854页。

三、解放区土地制度彻底改革，国民党区经济危机加重

(一) 解放区土地制度彻底改革

根据中共中央 1946 年的《五四指示》，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到 1947 年下半年已在 2/3 的地区完成了，1/3 的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发展生产与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日渐巩固。但是，这一阶段的土地改革不彻底。原因之一是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五四指示》没有宣布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是规定通过有偿转移的方式使农民获得土地。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农民群众对土地的要求更进了一步。为推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发展，中共中央于 1947 年 10 月 10 日批准并正式公布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农民土地革命经验的基本总结，是一个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革命纲领。毛泽东指出，“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①

全国土地会议后，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等老解放区农民，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豫皖苏、豫陕鄂等新区的农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己解放自己的气魄，向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0 页。

封建地主阶级展开斗争。到1948年秋，完成了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伟大社会变革。土地改革在拥有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胜利完成，不但为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将来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它完全符合全中国农民及其他广大人民的要求，又为整个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解放区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彻底翻身，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空前提高，就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源泉。毛泽东谈到土地改革与解放全中国的关系时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①

与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解放区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地开展了整党运动，其主要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整党，克服了党内的地主富农思想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一些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流氓分子被清除出党，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土改与整党运动中，一大批积极分子和村区干部获得了锻炼与培养，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骨干，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样，民主政权更加健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与发展，从而为人民解放军发展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二）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加重

据统计，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为14064383百万元（法币），总支出为43393895百万元，赤字为29329512百万元；1948年上半年财政总收入为220905475百万元，总支出为655471087百万元，财政赤字高达431565612百万元^②。1947年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页。

^② 转引自《为什么失去大陆》，台湾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415页。

内债为 1.85 亿多美元，外债为 8.57 亿余美元；1948 年度内债为 1.75 亿多美元，外债为 8.66 多亿美元^①。

导致巨大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还是军费开支猛增。国民党当局采取宁可听任通货膨胀，也要全力支持军事行动的政策。1947 年军费开支占全部收入的 55%，1948 年上半年军费预计占总收入的 64%。巨额财富投入了军事，不但未能挽回败势，反而由于军事行动的节节失败，又加深了财政经济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在财政经济局势急转直下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重对统治区人民的盘剥，增加税收。1947 年度的货物税、关税、盐税、直接税共收入 106317 亿元。与此同时，加重对土地税的征收，实施强迫征粮的政策。二是大量发行钞票。1947 年发行法币 33188500 百万元，差不多为 1946 年发行额的 10 倍；1948 年上半年发行法币 374762200 百万元，又差不多为 1947 年发行额的 10 倍。

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工商业倒闭。到 1948 年初，天津工厂已倒闭 70--80%，青岛 700 余家民营工业全部歇业，沈阳 3000 多家商号仅存 1000 家，上海 3000 多家大工厂，开工者仅有 20%，广东 400 家工厂剩下不足 100 家。大批工人失业，生活贫困。1947 年 12 月的物价指数已升至 100630 倍，比 1946 年同期上涨 14.7 倍。上海市的批发物价指数，1947 年 12 月已较 1946 年 12 月增加 15 倍。1948 年 2 月上海大米每担限价 198 万元，黑市为 215 万元。南京黑市米价 250 万元，汉口为 230 万元。国民党当局承认，“物价狂涨已推翻了社会秩序和政治信心。”^②

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蒋介石集团完全孤立

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

^① 《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检送有关内、外债表》（1949 年 4 月），中国第二档案馆藏。

^② 转引自《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0 页。

宝之一。当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阐明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政策。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①

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实行“戡乱总动员”，给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残酷剥削与血腥镇压，各阶层人民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反动面貌，他们把自己的解放，把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希望于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迅速胜利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更加坚定、积极地投入到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之中。

青年学生运动继续蓬勃发展，他们把“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口号，改为“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不再提反对“内战”的口号。这表明他们对解放战争的拥护。1947年10月，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并加以杀害。这一暴行，激起了广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强烈抗议。杭州、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昆明、福州、武汉、长沙、西安等大中城市的大、中学生10万余人，掀起了“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公然宣布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北大、清华等10所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

大学学生进行了“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很快形成罢课、罢教、罢职、罢工、罢研、罢诊的“四月风暴”。五六月间，又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随即社会各阶层人民响应的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运动。5月4日，上海120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发起组织“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当众焚毁美国侵略者和中国独裁者的画像。22日，又发起10万民众“反美扶日”的签名运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昆明、杭州、福州、重庆、成都、西安、长沙、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学生、教授、社会名流、工商业者，先后加入这一运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惊呼：中国“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提醒我们，假如给予（国民党政府）支援而不顾其他因素结果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①

曾经由于对美国和蒋介石存在某种幻想，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具有足以战胜有美国政府大力支援的蒋介石的力量表示怀疑，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新的形势下也迅速觉醒。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被迫宣告“自动解散”。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②。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抛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转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寄希望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关，并发表宣言，提出粉碎蒋介石政权、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及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民主统一战线等四项主张。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告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决裂，提出“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中

① 《被逃亡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30页。

② 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1947年11月6日。

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反对蒋介石之独裁政治体制，否认其伪造的国民大会，伪制的宪法、伪定的政府组织”；“反对美国反动派干涉中国内政”等主张。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1948年8月起，民主党派、民主阶层人士的代表便陆续到达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蒋介石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迫不急待地于1948年3月29日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围绕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国民党内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蒋介石宣布他不参加竞选，而愿意“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并提议推举“一名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并称，“我将以军人之身，鞠躬尽瘁，为国效劳。”^①对此，国民党内有的人主张尊重蒋介石的意见；有的人拥护蒋介石当总统候选人，理由是如蒋介石不当总统，“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将因而削弱”。张群深知蒋介石不愿当总统的原因，因为“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他认为如果能想出一个办法，赋予总统一种特权，那么蒋介石“还是愿意当候选人的”^②。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授予总统采取紧急措施之权力。果然，19日，蒋介石被选为“总统”。

^①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4日。

^②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

围绕副总统的竞选，各派争斗更激烈。主要竞争者，一个是李宗仁，一个是孙科。李宗仁是国民党桂（广西）系的主要人物，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称，这是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空职。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为李宗仁提供了“沾天着地”的良机。李宗仁自知他当时的实力还不敌蒋介石，因此决定竞选副总统而不竞选总统。

李宗仁之所以敢于同孙科竞争（实为同蒋介石竞争），不但有桂系的实力作依靠，而且还有美国的扶持。1947年9月8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马歇尔说：一切迹象表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统治的象征已光辉大减。坦率地说，在多数学生看来，蒋时代已告结束。”而“李宗仁将军正博得舆论信任。关于他对国民政府无足轻重的谣传不足置信。”^①1948年3月11日，李宗仁在北平发表竞选谈话，提出，“肃清贪污、改革政治、实行民主主义、铲除豪门资本”的竞选口号，蛊惑人心。3月31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说：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局势险恶，“现在需要的是能感召人的领袖，而这似乎是蒋委员长所不能作到的。”^②美国政府已在考虑必要时由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充当“感召人的领袖”了。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国民党人称他为“阿斗”。蒋介石竭力支持孙科出来竞选副总统。

4月3日，蒋介石召见孙科、李宗仁，说副总统候选人已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孙科，要李宗仁退出竞选。李宗仁当即表示反对，申言若党内不被提名，就“决定在党外独立竞选”^③。他并同参加副总统竞选的程潜、于佑任结成联盟。4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否决了蒋介石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中央提名的建议。

① 《被逃亡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22—123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55页。

③ 同上，第859页。

经过4月23日、24日、28日、29日四次激烈较量，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李宗仁“胜利”了，但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却更加速了。

整个形势，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会议上分析的那样：“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个问题在长时期没有解决。十年内战时期我们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仍未能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并且我们主力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走上了轨道。”“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潮。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①

1948年1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谈话时，又对时局做了精辟阐述。毛泽东说：“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军事上，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经济方面，蒋介石的经济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也有问题，但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恢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了，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将更加困难。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讲，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61—262页。

到手’。”^①

第二节 国民党实行“总体战”

一、“总体战”的提出

国民党军队，论装备比解放军精良，论补给比解放军充足，论兵力也比解放军多，可是一同解放军交手，就如蒋介石所言，“常遭失败，甚至将领被俘，造成革命军前所未有的耻辱”^②。蒋介石看到解放军总打胜仗，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打的是“人民战争”，而国民党军只是单纯的“军事戡乱”，没有发挥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和军事的总体威力。参谋总长顾祝同在1948年5月的绥靖政务研究会议上说：“戡乱军事，进行已近两年，而匪祸蔓延，匪势仍甚猖獗，检讨我们所以不能迅速消灭共匪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共匪组织严密，能够控制其占领区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竭泽而渔，从事全面叛乱，并深入我后方，大肆破坏活动，秘密传播毒化思想，瓦解人民战意；一方面由于我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配合不够，未能将全体人力物力动员起来，以致不能发挥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力量。”^③顾祝同所说的“一方面”，只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深受解放区人民的拥护，也深受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拥护；另“一方面”，则多少看到了他们失败的原因。

怎样挽回颓势呢？蒋介石认为，要挽回颓势，必须实行“总体战”。1947年11月4日，他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指出，解放军有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保密，“这四个长处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决不是单凭武器和物质所能做到。我们要赶上他，压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74-275页。

② 蒋介石：《政工人员负责尽职之要道》，1947年12月7日。

③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新闻局编印：《总体战》，1948年11月。

倒他，也要从精神方面努力，也就是先要从政治工作做起，我以前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行政与军事相配合，同样也适用于军中政治工作与作战业务相配合。”^①他说，江西“剿匪”时代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应成为今日戡乱战争中的指导方针。

1947年11月，苏、豫、皖、鄂、湘、赣“六省主席剿匪检讨会议”在南京召开，具体研究所谓“总体战”问题，会议“决定了民众组训，实施六省联防，建立省防军，加紧完成六省绥靖地方设计工作。”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政治攻势所采取的“初步重要行动”^②。

1948年1月15日，豫、鄂、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在九江召开，进一步把“六省剿匪检讨会议”的决议具体化了。“如六省会议第三案加强省保安团队及自卫团队办法，这次又详尽的加以研讨，制成‘豫鄂皖赣湘民众组训实施纲领’，建立地方武力。”^③同年1月28日，在徐州云龙山畔举行苏、鲁、豫、皖“四省绥靖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戡乱工作，政治重于军事，绥靖重于清剿，刷新政治，机动联防，确立征兵征粮制度，巩固经济金融等问题”的训示，会议决定五项方案：“（一）各绥靖区与省府职权划分方案，（二）加强组织四省地方武力方案，（三）省与省间，绥区与绥区间，县与县间联防方案，（四）省难民救济方案，（五）军粮民食统筹方案。”^④

3月18日，“华中绥靖会议”在南京召开。在这个会议前几天，即3月10日，指挥几十个整编旅“围剿”大别山，对大别山区实行“总体战”的白崇禧，在中央政治大学发表讲演，系统地讲述他实施“总体战”的“经验”。白崇禧说，共产党有很强的组织能

① 蒋介石：《国军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1月4日。

② 同上，第12页。

③ 同上，第12—13页。

④ 同上，第13页。

力，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军事，“可称是党政军一元化”。解放区的男女老少都是战斗员，少壮参军，壮丁都是民兵，由民兵升入军区部队，再由军区部队升入野战军；采用囤粮于民，使用粮券，就地给养。在行动时并不需要辎重补给。“因此我们剿匪，单凭军事的力量，仍感不够，必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军队与民众协同一致，全面动员起来，才能发挥总体战的力量，应用全面战术，争取广大面的控制，始可彻底剿灭匪患。”白崇禧说，现在他对大别山就是这样做的，“正分区清剿，一面积极修复大路，架设通信网择定战略要点构筑工事，分派兵力固守，同时积极组训民众，配合军队清剿。”“不过用军事的力量击溃匪的主力，还须要政治的力量，配合军事，肃清地下散匪，所以必须以军事的力量来掩护政治经济，以政治经济的力量来健全基层组织，充实民众自卫力量，发挥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的综合力量，以收军政等配合的功效。”^①

“华中绥靖会议”详细研讨了白崇禧的那一套，并且综合前几次绥靖剿匪会议的意见，决定了“总体战”的整个方案。

二、“总体战”的内容

国民党方面宣称，“总体战”，就是“今后绥靖剿匪的总路线”，“簇新”的战略，“作战新制度”，从而“能有效的加速的戡平匪乱。”^②

“总体战”的主要内容，分为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四个部分。

军事战。建立绥靖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制度。这是实行总体战之中枢。绥靖区司令官，统一指挥辖区内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发挥总体战战力，绥靖地方，举办清乡，并协同主力进剿部队之作战。各绥靖区实行自卫自给自足政策，彻底控制辖区内

^① 南京《和平日报》，1948年3月13日。

^② 《总体战》第1、13页。

兵员粮食等物资，实行连保连坐。各绥靖区司令官督练辖区内之保安团、自卫队。各绥靖司令官兼绥靖区行政长官。培植地方武装是绥靖区司令官一项重要工作。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分为三种：（一）保安团。1947年为180个团，1948年上半年增加40个团，下半年拟再建60个团，总计将近300个团。规定凡“清剿”2000人以上的人民武装，由正规军负责，凡“清剿”1000人以内的人民武装，由保安团负责。（二）警察。（三）自卫队。自卫队又分常备自卫队和民众自卫队。自卫队的任务，除对付小股人民武装外，负责清查户口，实行联防，构组情报网等。规定，1个县编1个自卫总队，1个乡镇编1个大队，1个保编1个中队。

政治战。白崇禧说，政治战，“则须组训民众，使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分力量。”其目的就是严密各种组织，掌握辖区内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征兵、征粮，枯竭解放军的兵源，粮源。其办法，第一是建立保安城寨，将物资、壮丁，集中于保安城寨内；第二是强化地方组织，严密保甲组织，确实控制民众。政治战另一个内容，就是所谓“整饬纲纪，严惩贪污，及惩治土劣。”因为国民党军队无论到什么地方，军纪败坏，闹得老百姓不得安宁。贪污腐败更是光怪陆离。

经济战。所谓经济战，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土地政策。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非常害怕，他说，“如果共产党真正能够实行其土地政策，我们社会民生的基础，也一定会被他破坏。”^①因此，蒋介石决定要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的土地政策，就是由国民党政府贷款给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而成为自耕农。蒋介石说，“这个办法，地主与佃农双方都可以接受本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这种政策不受农民欢迎，蒋介石政府也不是真正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蒋介石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蒋

^① 蒋介石：《坚定志向，力行主义》，1947年10月25日。

家王朝，到 1949 年被赶到台湾省的 22 年，蒋介石不但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的政策，反而使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占农村人口不到 10% 的地主富农，占有约 70-80% 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 90% 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约 20-30% 的土地。所以，蒋介石说，由于“我们没有实行总理的土地政策，无异于表示我们没有实行三民主义的能力，这是人民对于政府不能真正拥护，对于本党不能真正信任的最大原因。”^① 二是经济管制。规定，凡战区重要军用物资，由绥靖区严格管制；绥靖区之粮食，统筹管理。除每户按人口计算，予以保留所需数量自行收藏外，所有粮食或集中于保安城寨保管，或征借。绥靖区内之商店行栈工厂，一律登记管理。后方区域之粮食及军需物资，严行管制封锁。

思想战。就是以所谓的三民主义，来打击共产主义，以宣传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的宣传。思想战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造国民党军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恢复斗志。

三、实行分区防御，调整指挥机构

为便于实行所谓“总体战”，国民党军统帅部把西北、中原、华东战场，重新划分为 20 个绥靖区。第 1 绥靖区（扬州），司令官李默庵；第 2 绥靖区（济南），司令官王耀武；第 3 绥靖区（贾汪），司令官冯治安；第 4 绥靖区（开封），司令官刘汝明；第 5 绥靖区（信阳），司令官张轸；第 6 绥靖区（商丘），司令官周碧；第 7 绥靖区（淮阴），司令官张雪中；第 8 绥靖区（合肥），司令官夏威；第 9 绥靖区（海州），司令官李延年；第 10 绥靖区（兖州），司令官李玉堂；第 11 绥靖区（青岛），司令官刘安琪；第 12 绥靖区（新乡），司令官陈鼎勋；第 13 绥靖区（南阳），司令官王凌云；第 14 绥靖区（阜阳），司令官李觉；第 15 绥靖区（襄阳），司令官康泽；第 16 绥靖区（咸宁），司令官霍揆章；第 17 绥靖区（常

^① 蒋介石：《坚定志向，力行主义》，1947 年 10 月 25 日。

德)，司令官刘膺古；第 18 绥靖区（宝鸡），司令官董钊；第 19 绥靖区（商县），司令官谢辅三；第 21 绥靖区（宜昌），司令官潘文华。每个绥靖区直接掌握 3 至 5 个旅的兵力，作为本绥靖区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编成若个机动兵团或整编军，由统帅部直接指挥，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具体编组在各有关章节中叙述。

为保住现有区域和阻止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挺进，蒋介石被迫确定分区防御，决心尽可能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华中，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即：“对东北方面，持久消耗打击匪军，使其战力不能成长；对华北方面，采取主动攻势，使东北之匪陷于孤悬分离，截断其补给；在华中方面，为匪我作战重心，首以建立封锁，阻止匪继续扩大窜扰。次为划建绥区，控制战场，争取人力、物力，使匪无法生存活动。三为编组有力而机动之兵团，穷追猛打，以击灭匪军主力。四为挺进匪区，捣其巢穴，以断绝匪之生力。”^① 1948 年 4 月 9 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作施政报告，讲到“各战场形势”时强调，在东北“必须守据几个重要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在今后 6 个月内，要消灭黄河以南的解放军，“决不让他们有整个师或整个旅的存在。”

调整指挥机构与撤销战区指挥官，是蒋介石每日每时考虑的问题，因为他认为战争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指挥机构不适应作战需要，或者指挥官失职，用人不当。继 1947 年年底撤销保定、张垣两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部之后，又于 1948 年 1 月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取代陈诚，统揽东北全权。5 月 13 日，免除陈诚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职务，任命原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参谋总长，余汉谋为陆军总司令。5 月 19 日，将各地行

^① 《戡乱简史》第 143 页。

辕改为绥靖公署。31日，任命原国防部长白崇禧为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匪总部总司令，由何应钦接任国防部长。曾经因指挥定陶地区作战失利而被撤职的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6月9日，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徐州剿匪总部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内对刘峙的任职议论纷纷：“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①

“总体战”及其他一切重要措施，能拯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垮台吗？蒋介石念念不忘第5次“围剿”中央红军的胜利，认为那是实行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总体战的胜利。其实，众所周知，国民党第5次“围剿”的胜利，毋宁说是得助于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者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②历史是不会重现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战略指导的竞赛中，已经是无可争辩的胜利者。“总体战”，就像1947年7月的“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一样，“总体战”只等着一个总失败。

第三节 中共中央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一、打倒蒋介石口号的提出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中共中央依据时局的发展，进一步提出与阐明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纲领。

^① 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51页。

^② 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

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到陕北佳县神泉堡。在这里，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表。第一次以宣言形式，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一天，新华社又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一是“颁布解放军口号”，共67条。二是“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就必须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枣园谈话时，毛泽东说，“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他回答说：“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①接着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现在尚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②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今天对待蒋介石同抗战时期不同。”现在不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③周恩来分析当时形势之后说：“现在看，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传上要有保留，要使人民知道只有从自卫战争中才能得到生存和独立。”^④9月11日，毛泽东修改《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一文时，加写了“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常识了。”^⑤以新华社社论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宣布打倒蒋介石。9月28日，周恩来在神泉堡对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做《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他说：“自卫战争是从去年大打起来的，为什么那时不提出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51页。

② 《周恩来年谱》第706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68页。

④ 《周恩来年谱》第718页。

⑤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30页。

大反攻，不提出打倒蒋介石，现在才提？”周恩来回答说，“在去年七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行不行？还不行。当时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还不能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因为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经过一年自卫作战之后，现在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因为，“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周恩来还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去。他指出，光在解放区内作战消灭不了蒋介石，“因为在全国他还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三分之二的人口。只有战略进攻，才能彻底消灭他。口号一提出，战争行动就要配合，就是全国性反攻，就是打出去，突破解放区的界线，我们的行动完全是为实现这个口号的。”^①

为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伟大的目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项基本政策：“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內战罪犯。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2、276、278页。

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进行，提高人民解放军的整体战斗力，《宣言》提出：“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解放区人民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据点，支援前线作战。”《宣言》号召全军指战员：“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①

二、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著名的十二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陕甘宁晋绥解放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几个部、局的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了会议。在会议正式举行之前，12月7日至24日召开了预备会议，分政治、军事、土改3个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

毛泽东在正式开会的第二天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并就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报告》总结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5—1239页。

事原则；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并指出，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革命和胜利是不可能的。《报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①

周恩来在会议的第二天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他说：“战争的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转入主动。开始于七月的刘邓渡河，使南线形势根本改变。现在，南线不但是大别山，就是江汉、桐枣地区也已站住了脚。比小河会议时不同，敌已完全被动。敌二百四十八个旅中，受过歼灭或歼灭性打击的达到一百四十五个旅。地区则发展得更快。停战令时原有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现已恢复，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二。解放区人口现有一亿五千万。”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斗争“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农村游击战，在粤、闽、浙、皖有很大发展”^②。“我军到十月份已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以上。而敌人作战部队下降到二百五十六万。国民党现在在东北取守势，华北傅作义在挣扎，南线由顾祝同、白崇禧、胡宗南负责，是蒋的军事斗争中心。”^③

中共中央会议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④并要求全党全军应将这个文件联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进行深人学习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② 转引自《周恩来传》第702-703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75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3页。

这次中共中央会议，还就人民解放军下一步战略方针做出决定，即“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机（和谈）获得休整时间。”^①1948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规定：“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根据两年来歼灭国民党军的数字及交战双方兵力对比的变化，中共中央认为，“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②

毛泽东的报告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人民从报告中更加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人民的敌人，则感到今后日子更不好过。美国驻华大使馆获得毛泽东报告全文后，立即空邮呈送美国国务院。司徒雷登并在1948年1月9日写信给马歇尔国务卿，说大使馆看了这个报告，“获得二显著印象：（一）胜利信心的语调，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已经获得，虽然毛氏小心地指出还需要更大的牺牲。（二）继续与讥讽地攻击美国是世界的大敌人，是对中国连续不断的内战负责者。毛氏无尽地重复申述此点，说反动的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大敌人。虽然近数月来，都看到了日渐增多的对美攻击，但这是头一次该党最高领袖之一，公开参加这种叫嚣。”^③

12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时刻召开的，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作了充分准备。正如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所说的那样，“这次会议是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是一次成功的会。20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局而开展，胜利可期。对

① 《周恩来年谱》第7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02—1303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850—851页。

于胜利的前途，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感觉到了。虽然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困难还很多，但都是可以解决的。”^①

三、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

在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已经大大改善之后，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决定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陕北转移到华北。

3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杨家沟出发，到绥德县吉镇。22日到佳县刘家坪。23日，从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

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中共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山西兴县城西7.5公里的蔡家崖村。4月13日，毛泽东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同原在这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5月27日，毛泽东到达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前。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西柏坡后，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中央已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随即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也撤销。

从此，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周恩来1973年2月在一个批示中曾写道：“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②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指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四、十大军事原则

(一) 十大军事原则是打倒蒋介石的军事纲领，是人民解放军

^①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767页。

^② 《周恩来传》第718页。

长期作战经验的科学总结

1958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时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①

1927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同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联盟为基础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了10年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红军的战略战术。1936年12月，毛泽东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阐述了红军作战原则的产生和形成。

1937年7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毛泽东依据抗日战争的特点与规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作战原则，并且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军事著作，系统地论述了这些作战原则。

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虽然是不同性质的两次战争，但就其作战的基本原则来说是相同的。毛泽东在1937年10月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②

1946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指挥下，在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下，奋起自卫。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运用以往的作战原则，并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75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05页。

从解放战争的实际出发，又提出了许多新的作战原则。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对第一年作战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6条军事原则。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对第一年作战做了全面总结，提出了指导尔后作战的9条作战方针，即九大作战原则。

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后，毛泽东根据战略进攻以来的新形势和人民解放军创造的新的作战方法，对原有的作战原则进行了充实、提炼和概括，使其更系统，更科学。并于1947年12月25日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二）十大军事原则的内容与精神实质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军事原则是”：

1.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4.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上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5.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 “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 “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十大军事原则高度概括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内容极其丰富，每一条都有它的独立意义，但各条之间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精神实质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每条原则都贯彻了歼灭战的思想。如第1条，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第3条，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第4条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第5条，打力求有准备和力求有把握之仗；第6条，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第7条，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等，都是为着实现歼灭战的。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因素之一。毛泽东指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①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毛泽东要求人民解放军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必须学会、掌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当战争已进行3个月，歼灭国民党军25个整编旅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三个月总结》对党内的指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7页。

示，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 25 个整编旅，“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毛泽东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①此后，毛泽东指出，为了实现在 5 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军“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共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②人民解放军只有全部歼灭了国民党的军队，才能完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使命。

（三）十大军事原则的作用

把自己的战略战术公开地告诉自己的对手，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阅读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后报告国务卿马歇尔说：“就大使馆所能断定的来说，毛氏的详尽分析共产党战术与战略是对共产党军队确定如何作战的一个非常率直的解释。共产党毫不迟疑地说明他们的战略，也许是表示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思想与情报之鄙视，应该承认这种战略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没有成功的。”^③为寻找对付人民解放军的战法的方法，蒋介石多次集训他的将校，研究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蒋介石的美国军事顾问也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国民党军的失败。毛泽东指出，“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④

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继续打败国民党军的主要方法。1948 年 3 月 7 日，毛泽东总结各战场胜利情况后说，“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06 页。

② 同上，第 1345—1346 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850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48 页。

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①邓小平在1948年3月的一次讲话里也指出，要打仗，军事方针是什么？就是毛主席的十条军事原则，这是今后革命战争的指导方向。凡是打得好的，都是依靠了这十条，不依靠这十条，就一定不会打好。

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武装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战略战术思想水平和作战能力。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下，运用十大军事原则，不断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伟大胜利，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1294页。

第五章 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第一节 人民解放军需要整军

一、整军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战争已经主要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广大农村和一大批中小城镇相继获得解放；拥有 1 亿多人口的老解放区已在某种程度上联成一片；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时期。

为着加速革命形势的发展，加快战争胜利进程，中共中央决定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中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在国内外反响很大。不但得到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群众也渴望早日解放，获得自己的土地。

为了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并保障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决定整编党的队伍，就是说要整党。全国土地会议之前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土地改革不彻底。之所以如此，除了指导土地改革的政策不彻底外，还由于共产党党内不纯与官僚主义。其情况，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报告里作了全面分析。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但是，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

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二百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共产党党内不纯情况不改变，新的土地法也是不能顺利实施的。所以，毛泽东强调说：“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①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一个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内容的整党运动，在各解放区陆续展开。

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与整党运动的全面展开，一方面，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提高军事艺术，提高阶级觉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战斗力，更加英勇地作战；必须更加自觉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和各项政策；必须坚决拥护土地改革，支援解放区农民的翻身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给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适应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除要求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继承与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外，还要努力克服部队中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组织不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1253页。

人民解放军绝大部分部队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生长起来的。在大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林彪、罗荣桓、谭政对东北部队进行调查之后，将部队的成分不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子弟，每个连队都有，有的多至10个左右，其中多数已进步，少数在土改教育中与贫雇农家庭出身的战士有思想上的对抗，对土地改革不满；第二类为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他们来自俘虏及敌占较久地区，其中有特务、变节分子，多数出身贫苦；第三类为国民党军下级军官，因审查不严，混进人民军队，有的纵队就混入30余人；第四类为流氓分子，系旧社会流氓、兵痞，这些人流氓成性^①。这种情况，在人民解放军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人民解放军内部组织不纯，还反映在部队大发展时补充了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大多数连队补充的俘虏兵达一半左右，有的连队多达70—80%。他们大都出身穷苦家庭，当兵前受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被国民党强征入伍后，受国民党军官的压迫，但也程度不同地染上了反动军队的恶习，接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他们被俘虏补入人民解放军后，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获得了新生，许多人很快有了转变和进步，有的甚至被提拔担任班、排长职务，但不少人仍然存在旧社会、旧军队的一些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不少解放战士不懂得为谁打仗，存在着“吃谁家粮就当谁家兵”的雇佣思想。许多人还分不清解放战争的性质，说：“打内战是不应该的，其责任国民党蒋介石要负，共产党毛泽东也要负。”

一批出身于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参加人民解放军后，经过党的教育和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思想已经逐渐无产阶级化了，他们的思想和作风已经符合人民军队的要求，但也有极少数人进步较慢，个别人甚至仍然站在其剥

^① 林彪、罗荣桓、谭政：《关于部队整军运动致毛泽东的报告》，1948年7月1日。

削阶级家庭的立场上。

一些雇农、贫农或工人家庭出身的指战员，因受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较深，由于不注意改造，在思想政治上有的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个别的忘了本，反对农民、工人阶级的利益，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

（二）思想不纯

首先表现在战争问题上。一些人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认不清敌我力量的消长，看不到胜利即将到来，右倾情绪比较严重，害怕到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尤其怕打过长江去。有的甚至认为，在国民党区域作战会碰到许多不能克服的困难，即使进去了最终还要被赶回来。如，西北野战军中有的人对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怕走“王震道路”。所谓“王震道路”，是指抗日战争后期，王震、王首道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创造五岭抗日根据地的决策，率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组成的南下支队，于1944年11月从延安出发，1945年8月到达粤北南雄地区。这时因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形势迅速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军为抢占胜利果实，集中兵力向王震部扑来。南下支队处境危殆，无法立足，被迫北返中原解放区。这次远征，历时一年。一些在大别山战斗过的人，对于重返大别山，顾虑重重。有的人看到有的战场形势呈胶着状态，大城市与主要交通线还都控制在国民党军手里，因而怀疑中国革命战争高潮的到来，认为“大反攻”的口号提早了。有的人对战争残酷性表示害怕，对战争表示厌倦，想方设法转到后方去，转业到地方工作去。

在战争问题上，有的人对美国帝国主义缺乏本质的认识，表现为惧怕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帮助蒋介石。认为，美国政府给蒋介石几亿美元的枪炮弹药、飞机大炮，已没有多大用途了，现在就是担心美国出兵中国，认为中国内战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没完没了，惧怕长期战争。

其次表现对待土地改革问题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积极拥

护土地改革的，但是不少人对于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了解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的关系，不了解土地改革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不了解土地改革与打倒蒋介石的关系，因此，对于土地改革运动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和行动。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谈到新式整军运动前，华东人民解放军对待土地改革的态度时说：“在土改学习和三查三整之前，部队对于土改的态度常常是不明确的，甚至在一部分干部与战士之间反映着非阶级的或者地主富农的观点立场，当农民与地主进行生死斗争的时候，不是坚决站在雇贫农与中农的立场上去，支持他们的正义行为与正当要求，彻底消灭封建与半封建的剥削制度，而是或者动摇两者之间，或者屁股还放在地主富农那方面。一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分子，不是坚决的牺牲自己原来的反动的阶级利益，将土地浮财让给农民平分，或者于劝导家庭无效之后，完全割断其固有的联系，而是把军队作为他的防空洞，藉以逃避斗争，或者假公济私，仗势凌人，压制农民，袒护地主富农家庭，甚至个别的武装镇压（如赵寄舟等^①）。”不是对农民土地革命斗争表示无限同情与关心，积极参加驻地土改工作，随时注意农民运动发展过程，而是采取漠不关心的冷漠态度，甚至采取反对态度。“即使出身雇贫农的成分，也由于有个别阶级立场的模糊而存在着动摇以致忘本的倾向。许多部队机关占有大量土地，不愿意迅速拿出，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求，而是自私自利，垄断居奇。许多军工烈属及荣誉军人，不是以平等的态度与农民分得同样一份土地，而是要

^① 赵寄舟：当时任华东军区渤海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1947年7月5日，他私带骑兵11名，闯入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报庄子区沈家营村，替其姐夫妹夫封建势力撑腰，指使其部属枪杀村党支部书记，捆打其他群众11名，破坏土改，影响极为恶劣。华东军区责成渤海军区根据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对赵寄舟予以严惩，对被害群众给予抚恤。

求在土地问题上特别多得。”^① 这些情况，在其他军区、野战军里也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

（三）违反政策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执行命令不坚决，不彻底。有的人阳奉阴违。缴获不完全归公，私打埋伏，虚报冒领。执行规章制度不坚决，强调自己的特殊。搜俘虏腰包，个别人员还杀害俘虏。违背工商业政策、城市政策，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旗号，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厂和商店；个别侵犯中农利益。在解放城市之后，争抓物资，甚至破坏工厂及市政设备。

（四）在内外关系问题上

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以及军队与人民之间，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一致的。但有的部队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没有搞好。有些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他们把军队内部的关系当成是“大人”与“跟班”的关系一样，对下级干部，对士兵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和平等思想，生活上不关心，领导方式上简单粗暴，开口处分，闭口杀头，打骂体罚士兵现象比较普遍。在同级关系上表现为本位主义，在物资和缴获处理方面，没有整体观念，全局观念，各自为政。有的干部斤斤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威信，追求享受。个别人竞私作生意，投机倒把，贪污腐化。有的人争功诿过。在战士中存在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不尊重干部，不服从指挥的现象也不少。在军政军民关系上，由于军阀主义思想作怪，不尊重地方政府，不爱护人民群众的人力物力，随便浪费，有的甚至打骂老百姓，打骂政府干部，搞所谓枪杆子主义。

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存在着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严重情况。不解决这些问题，人民解放军要

^① 舒同：《在华东军区第一届政工会议上关于新式整军运动的总结报告》，1948年7月18日。

完成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赋予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①因此，整军就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当务之急。邓小平后来谈到为什么要整军时指出：“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而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一部分同志有消极失望的情绪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前进。”^②

二、新式整军运动是解决军队内部不良现象的有效方式

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领导机关与主官，极为重视其部队在前进中出现的这些不良倾向，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进行了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形势教育，收到了不小的成效。但因战斗频繁，没有时间集中整顿部队，清理思想，加之各级政治机关抓得还不够紧，措施也不够有力，有的教育方式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讲理论，上大课，因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要求人民解放军能够在短时间内，采取最有效方式，克服各种不良倾向，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

关于如何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有成功的历史经验的。1929年，毛泽东为解决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党内存在着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依靠群众，发扬民主，召开各种座谈会，深入调查并和指战员共同研究党内产生错误思想的根源和纠正的办法，然后召开红军第4军党的前委扩大会议与党代表大会，统一全党全军认识，作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如何从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51—152页。

强党的思想工作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在运动中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及随后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奠定了基础。经验证明，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事物的能力，为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矛盾的一种最好的方式。解放战争中，从1947年冬开始的农村整党运动，“在党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①并且及时推广河北平山县整党经验，使整党工作顺利开展，效果很好。所谓平山县经验，就是采取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的会议整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经验。周恩来称此“为最健全的方法”，“应为各地所取法。”^②

以上这些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无疑是完全适合于人民解放军整军的。所以，在全国土地会议研究部署整顿党的队伍的时候，朱德在讲话中就指出：“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③他明确提出了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即用整风方式，来解决军队内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

开展大规模的整军运动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在1947年冬和1948年春夏已基本具备。这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把胡宗南的军队赶至延川以南，为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使他们可以久驻一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95页。

③ 朱德：《整军问题》，1947年9月7日。

地方，集中时间、集中精力，研究解决全党全军建设上的许多重大问题。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转战8个月后进驻米脂县东20公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杨家沟。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他们一直住到1948年3月20日才离开。关于整军运动的许多指示就是从这里发向全军的。如：毛泽东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周恩来的《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等。1947年7月，刘少奇与朱德、董必武在平山县会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即就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并决定与指导整党运动和土改运动，以及直接指导解决“晋察冀军事问题”。

这时，全国战争形势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集中时间整军。因为国民党军除在大别山战场仍可维持进攻外，其他战场均转入防守，只能集中兵力守备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没有力量主动发起进攻。人民解放军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作战或休息时间。

人民解放军的整军运动，因为各战略区情况不同，全军没有一个统一开始时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束时间。大体都是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展开的。运动开展早的为华东军区驻渤海地区的机关、部队，1947年秋就开展了整军运动。华东野战军的整军从1948年1月开始至5月中旬结束。西北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12月开始至第二年2月中旬结束，因为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其经验迅速向全军推广。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西北人民解放军是整军运动经验的首创者。晋察冀人民解放军是从1947年11月开始至第二年3月结束整军运动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整军是在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之后展开的，于1948年4月下旬结束。中原人民解放军因为中原战场敌情严重，作战频繁，整军运动持续时间较长，大体上从1948年1月开始至9月结束。华南各地的游击部队的整军运动，大体在1947年年底至1949年秋。

之所以称为新式整军运动，是因为在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

这是第一次。“这种整训，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整军方法新。其次，结合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展开诉苦运动和针对部队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进行全面整顿，整军的内容新。第三，整军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正如陈毅在1948年4月5日一次讲话里所说，称之为新式整军，因为旧式整军只整下面不整上面，领导者认为自己是没有什么病的，新式整军主要是整顿领导，整顿各级干部。

第二节 新式整军运动的内容与做法

新式整军运动的内容，一是“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二是“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是“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一般分为四个阶段：一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进行土地改革教育；二发动群众，开展诉苦运动；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三查”、“三整”；四把整军运动同部队群众性的练兵、杀敌立功运动结合起来，运动告一段落后，掀起了练兵热潮。

一、土改教育

人民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首先是从土地改革教育和诉苦运动开始的。有的部队先集中一段时间学习土改政策，进行土改教育，然后转入诉苦；有的部队土改教育与诉苦运动同时进行。

早在1946年《五四指示》颁布，土地改革在解放区农村实行后，人民解放军即进行了以土改为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阶级教育和土地政策学习不深入，只满足于一时的、简单的鼓动工作，忽视了系统的、深刻的土地政策教育，因此，不少官兵对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仍认识不够，对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也知之甚少。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农村普遍深入展开。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更加

深刻地、敏锐地反映到人民军队里面来。因此，也就出现了解放军内部对待土地改革的种种认识上和行动上的错误。毛泽东曾经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①不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认识，不纠正错误倾向，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官兵面对土改这个“关”，就过不去。因此对军队进行深入的系统的土地改革的再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1947年7月17日，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时的讲话》，强调了军队学习土改政策的重要性。他说：“军队是革命的主力，要认真学习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这点一定要使军队中的同志都知道，负责的同志更要弄明白。因为一打出去，首先和农民见面的就是军队。军队要帮助农民分得土地。军队把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学会了，土地分配就比较迅速、容易。”^②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8月3日《关于进行土地改革教育的措施》，同时强调指出，“进行土地改革思想教育，对于我军实为当前极其重要的工作。”要求各中央局、各军区政治部，参照晋冀鲁豫军区土改教育的做法，“依照部队具体情况，指示部队进行该项工作为要。”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的指示认为，“我军全体人员对于土地改革尽力支持、参加，首先必须彻底消除封建地主的思想残余，坚决站在农民立场，毫不犹豫地消灭地主阶级而斗争。”为此“决定全军在八月内普遍进行土地改革的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应针对“部队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具体的解答和解决”，面不要“进行抽象的讲授”。指示还认为，土改教育，是一项巨大工程，各部队应尽力争取时间，认真、切实完成之。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军区、各野战军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做出了进行土改教育的工作安排。彭德怀在关于西北野战军1947年冬季整训计划里规定，各纵队、各旅，要“普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页。

② 《朱德选集》第206页。

遍深入地展开诉苦运动与土改纪律教育”。晋察冀军区决定，“必须在全军，特别首先在干部，加强土地改革的思想教育。”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在1947年8月22日《关于贯彻土改教育的指示》指出：“在我军所有部队中，无论干部和战士，都应普遍进行关于土地改革的教育，从思想上贯彻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势力之认识，打跨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树立起坚强的阶级观念。”12月12日又发出《关于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及深入土地教育的指示》，要求“区别干部与战士，干部中又区分程度高低，采取不同方法，不同份量，把土地教育深入到部队，并依此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于1947年12月15日发布《关于全军坚决拥护土改的命令》，命令规定，“全体人员立即加紧土改学习，正确认识和掌握中央土改新方针与全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实质……务求打通思想，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不准有任何人站在这个学习运动之外。”

土改教育，一般是首先学习文件；由部队首长作报告，讲解土地法；请地方政府干部介绍土改运动情况；让土改后参军的战士介绍农村土改情况，以及分配土地后他们家庭经济情况；发动全体人员开会，宣誓拥护土地改革运动等。其次，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引导指战员初步检查有无损害贫雇农利益、包庇地主富农，干涉土地改革的言行，为尔后整顿思想作准备。其中学习文件是主要的。学习的主要文件是，《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学习毛泽东的有关报告和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等。在学习中引导指战员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统一认识，提高认识。

（一）土地制度改革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关系

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为解决土地

问题而进行的战争。当时正在胜利进行的解放战争，它的基本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不打倒封建主义，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不能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因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及其统治的基础。广大指战员从回顾中国的历史中，深深懂得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中国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中国近百年来，不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来转去，中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他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是这次革命还是失败了，其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中山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他没有分配土地，使中国农民翻身。后来，他觉悟了，主张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作为平均地权的实际内容，企图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诞生之日起，十几年来，经常同几倍、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其间打过许多败仗，包括从南方各根据地转移到陕甘宁根据地，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2万余人，但是没有被打垮，为什么呢？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开幕时的讲话里回答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土地革命，我们帮助农民得到土地，或者实行减租减息。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斗争果实，拥护和支持我们。”^② 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同正在进行的战争关系非常紧密。正如邓小平1948年4月，在河南鲁山召开的中共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系会议上所说的，“什么叫做革命？革命就要反帝反封建，而帝国主义的支柱是封建主义。不反对封建主义，不进行土改，就不能支持长期战争，革命也不会成功。就是把南京占领，不进行土改，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5页。

② 《朱德选集》第204页。

在，也是不行的。所以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①

（二）人民军队与土地制度改革的关系

毛泽东早就指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这时，就是集中力量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要做许多工作，归纳起来是两项，一是消灭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因为军队是蒋介石政权的支柱；二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因为封建主义是蒋介石政权的根基。人民解放军肩负这两项任务，在英勇作战的同时，还要像解放区人民支援战争那样来支援土地改革运动，保卫土地改革，参加土地改革。为了端正全体指战员对待土地改革的态度，各军区、各野战军在抓学习提高认识的同时，还规定了严明的纪律。要求指战员不仅在思想上而且要在实际行动上坚决站在农民群众一边，积极支持农民的一切正义要求，关心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并给予各种可能的必要的援助。要求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保持其阶级的纯洁性，随时随地不要忘本。要求军属、烈属、荣誉军人在土地问题上不得用任何借口，要求分配土地时有所特殊，只能与基本群众一样分得同等土地。要求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干部战士，应当坚决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劝导家庭拿出土地财产交给农民处理，或者劝导其家庭接受农民的合理要求，遵守政府的法令；在劝导无效之后，应同家庭断绝一切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的联系，彻底站在农民群众一边；凡保持与地主家庭联系的，或者干涉土改的，经教育不改变者，要开除军籍。总之，要求全体人员，一切有利于土改的东西，必须发扬；一切不利于土改的东西，必须肃清。军队为农民撑腰，就是对土地改革的极大促进。军队人多，力量大，军队里边有许多好作风，地方可以学习，军民关系搞好了，就增加了战胜蒋介石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1页。

的力量，同样，军队打了胜仗，也增加了地方的力量。

（三）学习掌握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

对于土地改革运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单单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坚决拥护，而且还必须亲身参加，这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因此学习掌握中共中央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只有懂得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增强支持拥护土地改革的自觉性。故土改政策的学习就成为全军土改教育的中心课题。在学习中，要求全体指战员明确以下几点：（1）认识土地改革的对象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同时也不许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2）了解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①。（3）懂得土地改革的主要的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土地要求，同时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允许一部分中农在保有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4）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5）土地改革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雇农。（6）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②通过学习，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二、普遍开展诉苦

诉苦运动是土地改革教育的深入发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八

^① 《中国土地法大纲》。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

路军、新四军的一些部队就多次进行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以此提高广大官兵打败侵略者的决心和胜利信心。抗日战争结束后，针对新形势、新任务与部队中产生的新问题，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单位陆续采取诉苦的方式对部队进行教育。事实证明，这是阶级教育的一种好形式。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许多部队在普遍进行土改教育的同时或者在土改教育之后，又开展了诉苦教育。这次诉苦教育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土地改革运动进行的、以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端正对土地改革运动的立场为目的。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非常重视用诉苦的方法教育部队。1947年9月7日，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的讲话里强调指出：我们的军队一定要进行诉苦教育，“时间紧张也要想法抽出一点来搞。这也是政治教育中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收到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1947年9月28日《关于辽东军区第三纵队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报告》后，对该报告亲自作了修改，并批转全军参照实行。

经毛泽东修改的辽东军区第3纵队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是：“（一）以提发封建压迫为主。如若是由于被民族压迫及其他压迫者，应联系到封建压迫上去，进一步引导到土地政策的学习。（二）发动干部诉苦。经验证明，这是可能的。因为全军干部，大多数皆工农成分。而且已证明干部诉苦，可以提高阶级觉悟。有时比战士诉苦作用大，更能影响群众。（三）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应派人参加地方诉苦大会或邀请群众典型到部队诉苦。部队同志亦可到地方上诉苦，以发动群众，使工农兵血肉相连，体验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四）发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提发反动社会制度的没落与黑暗，从反面来教育群众，使群众知道封建阶级的本质及没落的前途。现已有个别进行控诉自己家庭的黑暗，压迫贫苦人民的罪恶者。这是进步表现，应受表扬，不应歧视。（五）诉苦后，号召团结部队。阶级教育的目的，是使工农分子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应彻底抛弃自己出身的阶级立场，站

到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①

毛泽东批示的第3纵队诉苦经验转发到全军后，诉苦运动就在人民解放军全军相继普遍展开了，并且被作为新式整军运动的中心内容之一。各军区、各野战军对此十分重视，分别发出一系列指导诉苦运动的文件。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在整党整军及执行土地改革任务的决定里要求，“在全军内开展诉苦运动并参加地方群众的清算诉苦会”，通过这种教育，“启发与提高阶级觉悟，认清压迫的总根源是封建势力，并由此认识今天战争与土地改革内容目的的一致性。”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于1947年12月15日和25日发出指示，要求部队“积极参加诉苦复仇运动”，并制定了《连队诉苦运动实施方案》，“把开展诉苦运动，作为连队贯彻阶级路线建军方针的第一步工作，以此打开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贯彻阶级路线建军方针的基础。”西北野战军的诉苦运动是在彭德怀亲自指导下开展的。他参加了第1纵队第358旅的诉苦大会，并总结经验及时推广。他说，“进行诉苦与发动诉苦运动，又从诉苦中找出问题，展开讨论。这样反复的来解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问题，这种方法一般情况是成功的。”^②晋冀鲁豫野战军前委1948年2月21日发出指示，部队进行三查之前，“一般的应进行诉苦运动，土改教育，以提高阶级觉悟，打下三查基础。”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于1947年9月28日发出指示，要求“普遍的开展诉苦运动，增加阶级仇恨心”。

诉苦运动的过程，有的部队分为三个步骤，如华东解放军：“第一步是引苦（有的叫思想论战），即从生活上、政治上、思想上，以致技术上引起苦的感觉，接触到苦的深处，以至情不自禁的掉下泪来。第二步是诉苦，即依情况的发展，组织一定形式的集体诉苦（班、排、连，最好是班、排为单位），准备典型，或在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37—238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261页。

冤喊冤，有仇报仇”的正义性，懂得诉苦是为了提高觉悟，认识真理，分清敌我，报仇解放的道理，从而自觉地要求诉苦。

二是发现、培养诉苦典型。各部队通过访贫问苦，拉话谈心，调查了解下部战士家庭情况和本人思想状态，有目的地发现与培养诉苦典型。所谓典型，一般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苦最深；二是政治觉悟较高；三是比较老的干部或战士。在选择典型时，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做法，“除了特别注意培养受剥削压迫最甚、身世最苦、仇恨最深、反抗性最强的作为主要典型之外，还应注意培养不同类型的各种典型：如诉旧社会地主封建剥削压迫的苦，诉蒋管区征粮、抓丁、特务横行、民不聊生的苦，诉蒋军内部黑暗、吃空额喝兵血、官长打骂侮辱士兵的苦，诉厂主老财奴役剥削工人、压榨工人血汗的苦，诉家庭父母遭蒋伪杀害、逼散流离失所之苦等。”^① 这样，使不同内容的诉苦，起不同的教育作用，并从多方面来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行。从全军范围来看，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诉苦典型有，东北的房天静，西北的刘四虎，华东的魏来国，华北的王鸿禧，中原的王克勤。他们中，有的当时就是战斗英雄模范，有的后来成为战斗英雄模范。典型的力量极大地促进了诉苦运动的展开。

三是普遍开展诉苦。其形式有：（1）官兵同诉。干部带头诉苦对战士启发很大。例如，东北第3纵队第8师炮兵营长带头诉苦后，当即全营战士深受感动，纷纷根据个人及家庭受苦情况进行诉苦。（2）三种战士同诉苦。即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他们政治觉悟高，是部队的骨干；经过土地改革后参军的翻身农民战士；被俘虏的经过教育后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即“解放战士”。把这三种战士编在一起，开诉苦会，效果很好。“你说是怎样的苦，我说是怎样的苦，他又说是怎样的苦，

^① 尹肇之：《目前连队开展诉苦复仇运动中的几个问题》，1947年12月13日。

三方面这样一讲就都合拢来了。同时，解放区是怎么搞土改的知道了，蒋管区农民的苦处怎么样也知道了，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也知道了。这种会开它一天两天，一班人的阶级觉悟就会大大地提高。”^①（3）组织不同出身的干部战士诉苦。即不但发动贫雇农家庭出身者诉苦，还要发动中农和其他劳动家庭出身者诉苦，对于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也发动他们诉苦，要他们揭露地主富农是如何剥削发家的，从反面来教育干部战士，使他们知道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及没落的前途。同时也教育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战士，使他们同家庭划清界线，彻底地站在劳动人民一边。（4）军民同诉。即组织部队参加地方群众的诉苦会、或请地方群众诉苦典型到部队诉苦。（5）大会诉与小会诉相结合，以班、排诉苦会为主。

四是论苦追根。追究苦中何来？普遍采取以下方法：（一）讨论的方法。针对一些认识还不清楚的问题，如：知道穷但不知道为何穷的问题，组织大家讨论，穷人的苦究竟是哪里来的？地主是人，穷人也是人，为什么地主能剥削穷人？穷人怎样才能不受剥削？遍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大家认识到地主所以富，地主所以能够剥削压迫穷人，就在于他们手里掌握了生产资料，并有旧社会统治阶级的一套统治机器，如军队、警察、保甲制度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农民手中无地、无生产工具，又没有保护自己利益的国家政权，当然要受剥削，受压迫；为了翻身解放，只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参加人民解放军。（二）算剥削帐的方法。根据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做法，算帐方法分两种：“一般的都是不承认地主的地权，即一个长工一年种多少地，打多少粮，除去成本（包括长工吃的，牛作租价，种子消耗，农具消耗四项），就是长工劳动所应得的。但实际上长工所得的仅为应得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被地主剥削去了。这叫做土地还家算法，因为东北地主的发家，

^① 《朱德选集》第209页。

多是从开荒占草，谋财害命，勾结敌伪来的。”“另一种算法，即承认地主当时的地权，在算成本时，把地主的土地应得的收入也算在内（算法是：假定地主的土地拿来出卖，把卖价放在银行生息，一年能得多少利息，这就作为地主应得的），这样，地主也剥削了农民的三分之二以上。”^①通过清算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使大家恍然大悟，是农民养活了地主，根本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三）比较的方法。将土改前与土改后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对比，将蒋管区与解放区对比，将自己过去的的生活、社会地位与现在的生活、社会地位对比，“忆苦思甜”。经过对比，使大家认识到要翻身，旧的社会制度必须推翻，必须建立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制度。

论苦追根这是诉苦运动最要紧的一步，追根越深收效越大。通过挖苦根，使全体指战员的认识发生了飞跃。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经济的认识提高到政治的认识；由个人苦归结到整个阶级的苦；由地主恶霸的罪恶归结到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罪恶；最后得出“总苦根是老蒋”，只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劳动人民才能翻身。

用诉苦的方式教育部队，这是任何其他军队没有也不敢采用的方法，只有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性质的军队才能采用，才敢采用。当时，一位美国人谈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印象时说：“这里我还要谈一谈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过的政治手段——部队中的诉苦大会。……这样的集体诉苦比指挥员或是政委的任何说话都更有感染力，这样的教育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更是任何人也模仿不到的，倘若蒋介石也让他的士兵起来诉苦，士兵恐怕定会起来反抗他们的长官。”^②诉苦教育，不仅提高了人民解放军

^① 《东北野战部队整军运动总结》。

^② 〔美〕贾克·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年版。

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加强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团结，为取得解放战争胜利起了巨大作用，而且成为人民解放军尔后继续提高战斗力的一个很好的经常采用的方法。

三、进行三查三整

在经过土改教育和普遍开展诉苦，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新式整军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即三查三整阶段，这是整军的关键阶段。由于各军区、各野战军的具体情况不同，三查三整的重点及作法也略有差别，因此，为完整的反映各军区、各野战军整军情况，分别予以叙述。

（一）西北解放军的查整情况

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整军运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47年冬季的以诉苦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训；第二阶段是1948年夏季的以评斗志、评智慧、评政策的“三评运动”。

第二次榆林战役后，第1、第3、第4、第6纵队集中在米脂、绥德、清涧、靖边地区休整。第2纵队于黄龙战役后，东渡黄河进入晋南曲沃地区休整。经过普遍深入的动员，消除顾虑之后，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有的还自觉查工作、查经济、查纪律、查领导。七查八查，形成了党内党外，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群众称“三查”是“过秤”，看你够不够共产党员的标准、符不符合于部的条件；三查是“照镜子”，照出自己的缺点与错误。

1948年1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前委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对前一段整军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了西北野战军前委会。各纵队领导人汇报了开展三查运动情况。周恩来在讲话里充分肯定了西北野战军整军运动的成绩与做法。他说：“经过土改三查运动，大家做得有成绩，做得很好，清查出了很多坏分子，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今后回去更加认真的动员会有更好的成绩。”针对西北野战军的扩大主要靠俘虏兵，周恩来指出，“这使你们的发动民主与诉苦运动更重

要。”“以诉苦运动启发阶级觉悟是很好的教育方式，不但反对封建可如此，反帝反蒋政权亦可如此，但土改、三查是应以反封建为主的。”^① 15日，毛泽东在讲话时，对西北野战军各级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给予了表扬，并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② 毛泽东还邀请来中央汇报工作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参加了这次西北野战军前委会。据陈毅后来说，“我去参加了十天，听了许多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他们的自我批评精神都很好，特别有些同志严格的检讨了和平时期的许多缺点，过去打城市时不注意政策等。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鼓励了他们的自我批评精神，使这个会议取得更大的效果。”^③

前委扩大会议后，贺龙赴第2纵队指导整军运动。他先同纵队主要领导人亲切交谈，对该纵队战争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同时，对纵队指挥员“思想、作风、掌握政策上的各种错误，以严格批评”。随后他又召集了纵队党委开会，各旅长、政委均到会，一共开了6天。“会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很好，揭露思想、掌握政策，与团结同志上的错误”。纵队主要领导人虚心听取了批评并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某些同志不敢揭发错误之自由主义态度，亦受到批评”^④。在贺龙指导下，第2纵队的整军运动发展较好。该纵队司令员王震后来说：“贺司令员在宜川战役前专门到二纵队来抓遵守政策、遵守纪律，对二纵队此后的建设作用很大。”^⑤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2年1月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227页。

② 余秋里：《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传家宝》，《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1日。

③ 陈毅1948年4月5日在华东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④ 贺龙1948年2月25日致中共西北局转前委电。

⑤ 转引自《贺龙传》第399页。

西北野战军 1947 年冬季整军，“重心是战士与下层干部，而不是机关与上层干部。”^① 为了解决部队中某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着斗志不高、阶级责任心不强、自由主义比较严重的倾向问题，野战军前委于 1948 年 7 月下旬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进行夏季整训，主要内容为“三评”，即评斗志、评智慧、评政策。会议号召全体干部、战士，发扬高度的阶级责任心，对某些缺乏阶级责任心的人，甚至高级干部，进行严肃批评。各纵队针对自己的情况，在党委领导下，以支部为核心，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 1 纵队评斗志，评思想，进行“阶级教育”；第 2 纵队进行“四评一查”，即评斗志、评政策、评工作、评作风，查功过；第 6 纵队评斗志、评指挥、评工作；第 3、第 4 纵队均以评斗志为主。因为吸取了冬季整军的经验教训，因此，夏季“三评”运动发展比较顺利，成绩显著。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各地方部队的整军运动，也是从 1947 年下半年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始的，各部队分别参加了地方的土地改革。1948 年春，军区部队进行了整编，划分为 7 个军分区，直属于联防军。将分散的游击队编为支队、大队，将独立营、团编为较正规的地方兵团。在整编的同时，对部队进行了整训。训练时间从 10 天、半月到 2 个月不等。整训分军事与政治两方面，以政治整训为重点，进行三查。其中，三边军分区为五查，警备区为七查。

（二）中原解放军的查整情况

中原人民解放军的整军运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 1948 年 1 月至 5 月，进行三查三整，以营以下部队及中下级干部为重点；第二阶段，从 1948 年 7 月至 9 月，以团以上干部为重点。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战斗在中原的人民解放军的整军运动

^① 西北野战军政治部 1948 年 10 月 18 日关于夏季三评整军运动致总政、军委的报告。

十分关心。1948年1月14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粟裕、陈赓等人：刘邓、陈粟、陈谢三军“争取休整一个月，从正式开始休整之日算起，本月不足可延至下月……普遍实行诉苦运动，三查运动，整顿纪律，研究城市政策及城乡群众工作各项策略与方法，研究中央文件。”30日又致电指出：“为了彻底完成部队的三查三整，大大提高战斗力的目的”，粟陈唐、陈谢全军休整时间可以延长至2月20日止，“刘邓主力则在打小仗及补兵后打中等仗之三个月总方针下，尽量求得休整。”遵照上述指示并结合战场形势与部队实际情况，从1948年1月开始，陈谢集团集中时间进行了休整，刘邓大军各纵队及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则紧密结合战斗任务，利用行军作战间隙的短暂时间，分散地进行了休整。4月中旬，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局和野战军领导机关进入豫西，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们抓紧这个有利时机，部署了新式整军运动。

1948年2月9日，邓小平就部队三查运动的初步情况与下步实施步骤报告毛泽东。他说：“近来各地展开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运动极端重要，如做得好可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但如操之过急也很危险。”他认为，“整党方法应首先着重于查纪律、查思想作风、查工作，不宜首先着重于查阶级（成分），尔后在查纪律、思想作风之中，其实际结果会达到阶级出身的本质。”2月21日，野战军前委发出《关于三查工作指示》，要求根据部队情况，向“一切干涉土改、包庇地主及军阀主义、本位山头主义、享乐思想猛烈攻击。”并规定，“三查的基本方针仍是治病救人，发扬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为了报复、打击或造成分裂，而是为了纠正错误思想。”“全军每个同志都要经过三查，不仅地富出身的要查，工农出身的亦同样要查。”3月6日，邓小平向野战军直属机关干部作整党整军动员报告，指出：“这次整党，查四种东西，就是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查工作。你过去站在什么立场？合不合毛主席思想？有没有蜕化思想？作风是民主的呢，还是官僚主义的呢？工作是不是负责？对工作岗位采取什么态度？”邓小平

说，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必须痛切反省自己，割掉自己的尾巴，蜕化的老干部，更要痛切反省，不能窜山头，不能钻空子，那只能表现自己不好而已。“中国只有两个山头，一个是毛泽东山头，一个是蒋介石山头。七大以后，我们的党是毛泽东同志统一的党，不能有任何山头存在，任何金字招牌都不行，老资格是摆不得的。”

根据上述指示，各部队继续开展了整军运动。其重点是营以下部队及中下级干部。具体做法是，连以下干部、战士，在党支部领导下，在班排或连的大会上检查；营以上干部则采取在上级党委领导下，下一级干部及本单位支部代表的会议上检查；团以上机关则在团党委领导下，就本单位划分若干小组进行。运动中，战士纷纷自动检查，并积极帮助各级领导干部和支部检讨缺点、错误。团、营还集中连、排干部，对团、营领导展开批评。第1、第4、第6、第9纵队进行了旅和纵队领导的初步检查。陈谢集团党的前委于1948年1月，在河南叶县旧县镇召开会议。会议认真检查了自战争以来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方针政策方面的情况及部队政治思想状况，批判了某些领导人的右倾思想，对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进行了批判，统一了对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认识。

从1948年5月起，中原野战军先后进行了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新式整军运动暂告一段落。7月下旬，中原野战军和军区的整军运动继续进行，其重点为检查团以上机关和领导干部。这时，邓小平已启程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报告工作，整党整军工作由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和司令员刘伯承主持。8月1日至7日，中原局、中原军区在宝丰召开县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第1、第3、第4、第9纵队汇报了前一阶段整军情况。刘伯承做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整党首先克服地富和小资自私自利，和表现怕死等个人主义思想，必须从主要干部人手，坚决的整干部，愈

高愈要整。”^①8月7日，中原军区召开整军动员大会。刘伯承作动员报告，他再次强调，“要整，首先从头整，从主要负责的领导干部整，尤其军人，如不进步危险甚大。现在我们部队的干部中有些人脑子里存在着孤王与万岁，什么人亦不敢惹他。”他要求大家以延安整风为榜样，通过整党整军，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在革命局势发展，特别是在艰苦环境下的紧要关头，加强党的领导；二是把整党与士兵诉苦、三大民主相结合，抓好整军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三是在思想统一、组织保障、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提高军事素养，进行军队建设^②。

8月13日，刘伯承、陈毅前往第2纵队驻地地方城县竹园庄，给第2纵队及桐柏、江汉、陕南军区团以上干部作整党整军动员报告，因为这几个单位驻地分散，干部没有参加宝丰会议。随后，刘、陈参加了第2纵队的党委扩大会，指导该纵队的整党整军工作。

宝丰会议后，中原军区团以上干部以纵队为单位，进行了半个月至20天的整训。采取上级、同级、下级“三层亮”的办法，按照纵、旅、团的顺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纵队主官带头作自我批评。第1纵队查出“背上了：一方面军基础的金字招牌；在平汉、在热河及南下鲁西南、及蕲春等地作战有功，自认能打；干部多面老等三个包袱，阻碍了进步。好的传统未被发扬，打骂与违犯纪律现象严重。”第3纵队查出，“干部中，部分的对于在大别山付出代价所获得的成绩不了解，斗志和情绪受到损害，以致丧失若干歼敌良机”。第4纵队查出，“干部中，有的背了与陈粟、刘邓并列的所谓陈谢大军的包袱，要求单独活动，不认识毛主席中原大军共同配合作战大量歼敌战略思想。指战员中对于过长江发生疑惧”。第6纵队查出，“打胜仗就骄傲，碰了钉子就消

^① 刘伯承、陈毅、邓子恢、李达：《关于中原野战军整训工作致中央的报告》，1948年8月11日。

^② 《刘伯承传》第449页。

沉，干部常从局部看问题，对全局迷失方向，在大别山严重的违犯政策”。第9纵队查出，“军阀主义，贪污腐化、干部不团结，反上压下等现象”^①。第2纵队查出，党委思想斗争不开展，集体领导不够，工作不协调，工作作风简单生硬以及狭隘经验主义^②。

这次整军运动历时40余天，于9月上旬结束。

（三）华东解放军的查整情况

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整军运动是分散于几个地区进行的。1947年底至1948年上半年形成整军运动高潮。

最早开始整军的是驻渤海地区的华东军区直属单位、特种兵纵队、两广纵队、渤海军区部队及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在渤海地区的留守单位。

胶济铁路西段以北，津浦铁路北段以东，渤海湾和潍河以西，天津、塘沽以南的渤海地区，是华东解放区唯一未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因此，这里成了华东人民解放军的后方。从华中、鲁南、鲁中撤退的机关、工厂、学校、医院、残废军人、家属及其他地方工作人员，均云集于此地区。据1947年9月的统计，脱产人数达41万人。由于这些机构、人员来自各方，没有统一的领导，比较杂乱，急需整顿。

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于1947年9月8日发出《关于整顿后方机关的指示》，10月30日制定了精简整编、调整供给标准，清理资财三大方案，作为三查三整的一项具体内容。驻该地区的机关、部队按照统一要求与部署，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揭发与批判了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官僚主义、地主富农思想和贪污浪费的恶劣作风，并对个别坚持错误的严重贪污浪费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整顿了组织。运动于1948年3月底结束。

^① 刘伯承、陈毅、邓子恢、李达：《关于中原野战军整训工作致中央报告》，1948年8月11日。

^② 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关于查整情况向刘伯承、陈毅等的报告》，1948年9月12日。

内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的整军，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后逐渐展开的。1948年1月1日，兵团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建军阶级路线的指示》，指出，贯彻建军路线，必须采取打通思想，调整组织，执行纪律，以思想建设为主的方针。1月9日兵团在山东掖县大台头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动员部署三查三整。这次会议开展了纵队与师两级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了许多不良倾向。随后，部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开展了三查运动，至2月下旬结束。

苏北兵团的整军是从1948年4月中旬开始的。4月12日，苏北军区与兵团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整党整军展开三查三整运动的指示》，指出，经过1年9个月的战斗，苏北军民已胜利地渡过了最艰苦最危急的阶段，迫使敌人不得不收缩据点，转入防御。“然而，这不等于说明我们就毫无缺点了，相反的我们部队的缺点还相当多，而且表现十分严重”。因此，“全军各部队，必须展开全面的三查三整运动”。运动大体上经过三个步骤。首先是进行思想动员，揭高指战员对新式整军的认识，揭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清除顾虑；接着全面展开三查三整，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干部重于战士，高级干部重于中下级干部，党内重于党外；第三步进行组织整顿。运动历时月余。

野战军领率机关和外线兵团的整军是从1948年1月开始的。1月8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河南临颖召开扩大会议，布置三查三整。2月上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外线兵团调整部署，第3、第8、第10纵队分别移到河南襄城、禹县及淮阳地区进行整军，继续执行在中原战场的作战任务，其三查三整至3月初基本结束。

野战军领率机关和第1、第4、第6纵队北移，于3月12日进抵河南濮阳地区，继续开展三查三整，并准备执行渡江南进创建闽浙赣根据地的任务。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非常关心华东野战军的整军运动。根据多

方反映第1、第4、第6纵队“纪律坏，不注意政策”的情况，于1948年3月12日致电粟裕和陈士榘、唐亮，指出，“不论反映与事实有无出入，其基本精神必须成为华东野战军整训时的重要根据，尤其部队与群众关系、城市政策、部队纪律、生活制度等，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教育，严格整饬，做出决定，使各级领导干部及各级党委直到支部认识此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负起责任，教育和领导全体指战员保证出动后，不仅在作战上而且在执行党的一切政策上树立人民解放军的模范。”在这个指示之前的1月间，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听取陈毅的工作汇报时就指出，华东野战军仗打得很好，中央是可以放心的，但是部队存在缺点，特别是纪律不好。陈毅返回部队后说：毛主席讲，“这些缺点都要教育克服，要分清懂得与不懂得，分清讲明了或是未讲明，好好的教育”，“各级干部要重视政策，不要胡来。”^①

这次整训大体安排是：“从3月15日开始，用一周左右时间，先召开纵队级会议，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发扬民主，找出部队带倾向性的问题。从24日起，召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深入讨论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十大军事原则，检讨战术技术和部队作风纪律上的主要问题。部队在3月25日前进行三查三整，尔后转入战术与技术训练，4月20日前结束整训。”“按照先干部后战士，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通过典型报告，号召坦白反省，启发自觉检查，围绕战斗、工作表现，从对土改斗争的立场、态度着手，逐渐深入重点检查地富思想、右倾保命、军阀残余、腐化堕落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而找出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最后通过‘三交’（交待本人历史、交待家庭经济情况、交待社会关系），对照农村土地改革中划分阶级成分的指示，评定每个同志的阶级出身和本入成分。”^②

^① 陈毅：《在华野团以上干部会议的讲话》，1948年5月。

^② 张震：《忆濮阳整训》，《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2期。

在对部队进行整顿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前委对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检查。1948年3月中旬至5月下旬，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濮阳会议。会议的主要宗旨是，以开展反军阀主义倾向为中心，检查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任务和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情况，吸取经验教训，研究改进办法，达到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改进领导思想作风，加强军内外、党内外团结的目的。

前委扩大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月14日至4月9日，为准备会议及有纵队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第二阶段从4月10日至4月26日，为纵队委扩大会议及前委扩大会议总结。第三阶段为5月12日朱总司令到达濮阳后，进行作战动员以及围绕中央战略行动方案改变后进行的一系列准备会议。”^①

4月5日，陈毅向团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针对华东部队的实际情况，提出三条重要意见：第一个意见，树立一个新观念。“就是师、团不仅是一个军事单位，战役战斗单位，而且是一个政策单位，纪律单位。这个新观念一定要装进每个师团干部的脑子中去。”第二个意见，关于自我批评问题。“自我批评首先是政策上的自我批评。因为政策本身是反映人民利益的，我党根据人民的要求提出各种政策，执行得好，便是对人民有帮助，而取得人民的拥护；反之，政策执行得不好，不仅对人民无益，必致有损害，人民必然要起来反对。”第三个意见，纪律问题。“我们部队纪律确实很坏，主要是对地方对群众的关系很恶劣，枪杆子第一。”接着召开了兵团与纵队联席会议，历时24天，之后又召开了纵、师联系会议，历时12天。粟裕带头作自我批评。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第4纵队司令员陶勇、第6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濮阳整军行将结束之际，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关于暂不渡江

^① 张震：《忆濮阳整军》，《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2期。

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作战的建议。5月12日至18日，朱德到濮阳对华东野战军的工作进行指导。在此期间，朱德听取了叶飞、王必成和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关于军事情况的汇报，并与兵团师以上干部逐个谈话，还先后出席了兵团直属部队的欢迎会、兵团团以上干部欢迎会，以及兵团连、排、班及士兵代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朱德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蒋介石，消灭封建势力，消灭官僚资本，使中国人民获得彻底的解放。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央经过反复讨论，已制定了各种政策，我们全体党员、解放军全体指战员都要很好地去执行。我们不但要拿枪去消灭敌人，也要用政策去消灭敌人，使敌人很快地瓦解和投降。要保证政策的执行，就要有良好的纪律。纪律是我们的命脉，纪律遵守得好，胜利可以更快地到来。”^①“要有坚强的整体观念、全局观念。过去的那些山头主义、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军阀主义倾向等，今天都要去掉。”^②

前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了朱德的讲话，进一步提高了对整党整军的认识和明确了今后作战任务。5月29日会议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对第一兵团部队工作开展反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决议指出，部队内存在着的军阀主义倾向，是各种不良倾向的总根源。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党的前委，“对军阀主义倾向缺乏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很明确的斗争方针，是使军阀主义倾向存在并发展的重大原因。”为了肃清军阀主义倾向，决议指出，必须把部队的政治建设放在兵团工作的第一位，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列为干部教育的首要工作；必须加强军事建设，克服某些干部中的单纯军事观点；必须加强后勤建设；必须加强党委建设。

濮阳整军，是华东野战军建军史上的划时代的思想整顿，具

^①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13页。

^② 《朱德选集》第237页。

有深远的重要意义。

（四）东北解放军的查整情况

1948年2月2日至3月7日东北军区召开了有纵队、军区及师级干部参加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在说明成绩的同时，严正的指出部队中存在着作风不纯与成分不纯的倾向。会议决定开展以整思想、整作风为主的“五整一查”运动。对干部，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与查成分；对战士，继续进行土改教育和民主运动。3月15日，林彪、罗荣桓、谭政（政治部主任）发出指示，强调“五整一查”的“重点应放在整顿干部及检讨领导上面”。3月25日，他们又就运动的步骤、方法作了规定。第一步，传达讨论中共中央文件，学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报告，“使干部体会正确的思想，去掉糊涂的思想”；然后“方可深入思想作风之检讨”。第二步，“领导机关先作检讨，并研究部队的思想组织状况，研究进行的严格方法，以便自觉的来指导这个工作”。第三步，在取得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展开“五整一查”运动。

从3月15日开始，东北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查整运动。其中，有的部队进行了1个月，有的部队进行了40天。一般采取党委扩大会议形式，按从上而下顺序，分为三级进行。首先是纵队党委扩大会，纵队、师的干部参加；接着召开师党委扩大会，师、团干部参加；最后召开团党委扩大会，团、营干部参加。各级党委扩大会，先是下级批评上级，继而上级作自我批评，再就是下级作自我批评。其间均间有互相批评，最后进行总结。林彪、罗荣桓、谭政总结上述作法时说：“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一）由于关系直接，便于检讨和便于解决问题。（二）可以避免领导机关不作检查，只要下级作检查，或使下级人员借口上级没有讨论，而拒绝自我检讨。（三）经过上一级会议充分检讨之后，对全般问题可得出集中一致的意见，便于为下一级的会议，使各级会议有所遵

循，不致失却领导。”^①

各级党委扩大会议着重检讨、批判与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第一、右倾情绪。其主要表现：一是有些干部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立场不稳，同情或者包庇地主、富农；二是战争观念不强，初到东北时，不少干部有浓厚的和平思想，在战争进入全面胜利时候，又害怕战争的残酷性、长期性。第二、斗志不强。第三、本位主义，违犯政策纪律。第四、军阀主义。第五、享乐思想、名誉地位观念。第六、工作作风不深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些不良倾向，除右倾情绪比较普遍外，有的是这个部队较重，有的是那个部队较重，有的则只存在于一部分干部中。

经过五整和土改教育，干部、战士普遍提高了觉悟，在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政策的基础上，采取群众民主评定和领导审查相结合的方法查成分。其原则是，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对干部从严，对战士略从宽；对基础弱的部队从严，对基础强的部队略从宽。“五整一查”运动，大体上于1948年5月初基本结束。

（五）华北解放军的查整情况

华北人民解放军的整军先是两个地区的部队分别进行，一个是晋察冀军区部队，一个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1948年5月两区合并华北军区成立后，华北人民解放军又进行了整觉整军的学习运动。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精神，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作出了《关于贯彻整觉整军及执行土地改革任务的决定（草案）》。指出要“进行军队全党全军查阶级、查思想立场、查作风运动，揭发阶级异己分子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觉悟，整理组织。由于军队干部战士绝大多数系工农成分，和

^① 林彪、罗荣桓、谭政1948年7月1日关于东北部队整军运动致毛泽东的电报。

军队组织的更大的集中性，应以思想上整党整军为重点。”《决定》认为，所谓思想上整党整军，就是要“确立党员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提高阶级觉悟，学习与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以便利于同党内军内一切地主、富农、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军队的思想作风作坚决无情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确立人民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依靠人民、爱护士兵，以便利于同党内军内军阀主义思想作风作坚决无情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确立遵守党纪军纪，坚决执行命令与政府法令的观念，以便利于同党内军内一切宗派主义、盲目山头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作风作坚决无情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1948年1月下旬，平汉路北段作战结束后，晋察冀野战军即转人休整，开展新式整军。在干部中进行三查。营、团以上干部一般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进行；连、排干部在支委扩大会议上进行。采取个人检查与群众揭发相结合，普遍检查与重点批判相结合的方法。至2月上旬，三查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把三查运动引向深入，野战军前委又于2月12日在定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目前全军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继续深入三查，彻底破坏地主富农思想及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毛泽东思想”。并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三整——即整顿纪律、整顿制度、整顿作风。整顿纪律，就是要强调服从命令和更加提高军队的集中性、统一性、组织性，以适应今后更大规模的作战要求。因此，“目前部队中所一再发生过的违抗命令，或执行命令不坚决、不彻底，贪生怕死、临阵不打、打滑头仗、遇急不救、延误时间、谎报情况、欺骗上级、遗失机密、泄露军情、贪污腐化、情犯群众利益、违反俘虏政策、丢失或损坏武器、变卖或破坏公物、殴打谩骂战友、破坏政府法令等等违反纪律行为，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为整顿制度，军区与野战军对供给、民工动员与使用、处理俘虏、战地救护、报告与汇报、军械工作、收容、人员调动、干部工作、点名与点验等，制定了十项制度，要求全军上下必须仔细研究，无条件遵守并认

真执行。整顿作风，在查思想中深入查作风，反过来又从作风中追查思想。经过查作风之后，要求全军必须广泛的确立与发扬一种优良的作风，就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切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晋察冀野战军的整军运动于3月上旬结束。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整军情况。自刘伯承、邓小平和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南渡黄河挺进中原后，晋冀鲁豫军区除第8纵队外，又建立了第13纵队，统由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指挥在晋南、晋中地区作战。这些部队是由地方部队升级编成的，“各部队存在怕编纵队、怕过黄河、怕打大仗、怕攻坚的情绪。”有的还怕“上山”。有的部队“干部打骂士兵，打埋伏，贪污现象相当普遍。造成部队上下脱节，直接影响作战。”因此，徐向前“决心整训一时期”^①。整训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解决部队各种不良思想倾向，二是提高攻坚战能力与信心。为达到第一个目的，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民主运动，进行土地改革教育，进行三查。经过临汾战役前的1个月左右的整训，“部队情绪大大提高，各种工作都有进步”，逃亡现象减少，官兵关系大为改善。1948年3月25日，徐向前就这次整军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4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近来各区均有新升级的部队成立，向前同志这个报告，对于新升级部队（八纵两个旅除外）的政治军事训练中心均放在发扬民主与土改三查相结合上，遂使部队的团结和作战，立见成效，现特将此报告转发各地作参考。”

华北军区成立后，军区政治部于1948年8月5日发出了《关于贯彻整党与学习政策的指示》。根据军区的部署，在各兵团、地方军区党委的领导下，各部队从这年8月开始，开展了整党与学习运动。运动重点是团以上领导干部。凡有阅读与理解能力的团

^① 徐向前1948年3月25日关于部队整训情况向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报告。

以上干部，按规定都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①、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古田会议决议案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发出的有关指示。通过学习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级干部就掌握政策与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工作作风、工作制度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反省检查。这次学习运动持续时间较长，巩固与发展了三查三整的成绩。

（六）南方游击队的整军简况

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省边界地区的游击队，在游击战争环境下，也相继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整军运动。

闽粤赣边纵队自1947年冬季起，进行了诉苦和三查三整。闽浙赣边区的党和游击队从1948年2月上旬开始至3月上旬止，开展了诉苦教育和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的“四查”运动。粤赣湘边纵队从1948年4月开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开展了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查工作和整顿制度、整顿纪律、整顿作风的“五查”、“三整”运动，这一运动至12月方结束。粤桂边纵队于1948年6、7月间进行了“三查”、“三整”。琼崖纵队于1949年秋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分三个步骤：诉苦教育；查阶级成分，查工作、查斗志，以查斗志为主；整顿制度、整顿纪律、整顿作风，以整顿纪律为重点。这些游击队在查整过程中，对混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国民党党员、特务、三青团员、流氓、地痞，一一进行了清洗。

^① 两个文件，指毛泽东：1933年10月《怎样分析阶级》；1933年《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第三节 新式整军运动的作用与经验

一、新式整军运动的作用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那篇著名的评论中指出：“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改，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①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里说：这个运动，“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教好了或清除了一部分军队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或坏分子，提高了纪律，讲明了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对待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扬了军队中的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这样就使得我军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②4月1日，毛泽东又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一切解放区进行整党与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差不多一切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最近几个月内，都利用了战争的空隙，实行了大规模的整训。这种整训，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由此，激发了广大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群众的革命热情，明确地认识了战争的目的，清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9—1300页。

除了存在于军队中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上的倾向和不良现象，教育了干部和战士，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① 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又一次对新式整军运动作了评述。他指出：“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在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②

1948年5月14日，朱德在《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中说：“自从开展土改运动，特别是经过三查运动以后，部队在各方面都有了进步，面貌焕然一新。”^③

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里说，人民解放军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了新式整军运动。他说：“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二十二年的锻炼，已经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坚强的战斗力、成熟的战略战术。尤其最近三年来，人民解放军又经过了一次改造。我为什么要用改造这两个字呢？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战士，不久以前还是俘虏兵，不经过改造就不能遵守解放军的纪律。最有效的改造武器，就是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行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评干部、评党员、评战功的三评运动，使他们感觉到大家的出身都是劳动人民，都曾经受过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1页。

③ 《朱德选集》第239页。

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为自己的利益，向曾经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仇人作战。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但是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内部实施了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制度，在部队外部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拥政爱民工作和地方群众工作，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战斗员得以密切地联系群众，使得他们的觉悟程度不断地提高，使得人民解放军获得无上的战斗力量。”^①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对新式整军运动的评价与总结，仍然是研究这个运动的最基本根据。

从上述论述里可以看到，新式整军运动的巨大成效，就是使人民解放军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空前提高。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与政策水平大大提高

如果说，在新式整军之前，不少战士对为何而战、为谁面战的战争目的还不明确的话，那么经过整军之后，他们都说：“以前受苦受难一直以为是穷人命不好，现在知道了根在哪里，知道手里的枪该指向谁了”。一些原来抱着为个人报仇，为家庭雪恨的战士，觉悟到要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一些家在解放区的指战员表示，“我们分了土地，牛羊，但还有很多人没有解放，咱们要帮助他们求解放，叫大家都有吃有穿”，决心为推翻蒋介石政权而奋斗到底。许多解放战士，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后，也逐渐认清了人民解放军的本质，认清了解放战争的性质，克服了吃粮当兵的雇佣思想。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彻底改变土地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农民有了土地才能翻身，人民解放军的后方才能巩固，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才能获得。即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7—348页。

是说，“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①蒋介石靠美国，人民解放军靠中国的老百姓。广大官兵还认识到，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不单是消灭蒋介石的军队，而且还要同农民群众一道，消灭地主阶级。只有如此，才能最终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实现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基于认识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对土地改革运动表现了空前的坚决的拥护和积极支持，成为土地改革运动的强大动力。例如，华东人民解放军经过整军，不少干部响应“一封信运动”^②，支持农会平分土地的办法，机关部队所保留的土地也迅速分给了农民，军工属烈荣军人也不再强调自己的特殊地位了，出身地富的子弟不再公开袒护自己家庭而干涉土改了。指战员对驻村工作及群众工作的热情大大提高了，阻碍群众运动或浪费斗争果实的现象大大减少。其他军区、野战军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人民解放军以自己的行动支持了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的胜利，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对此，毛泽东后来做了充分肯定。他说：约有1.6亿人口的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③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政策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现于政策观念的增强，他们懂得政策对于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2页。

② “一封信运动”，指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主要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干部战士，给自己家庭所在村农会写信，表示拥护群众分田斗争，向贫农团或当地民主政府报告自己家中的浮财；向自己的家中亲属写信，劝他们服从政府，自动交出多余土地，交出浮财。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页。

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①广大指战员经过学习和联系实际，体会到现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已制定的关于战争、整党、土改、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等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就是要提高自觉性，坚决的正确的贯彻这些方针、政策，成为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如果不能正确地实行政策，就要脱离群众，孤立自己；如果不能正确实行政策，作战就要受挫。

通过学习，广大指战员对中共中央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如上地改革中的路线与各项政策，对待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城市政策，统一战线政策，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就拿对待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来说，他们懂得了这些政策同战争的关系，懂得保护工商业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关系，乃至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因而树立了爱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思想。认识到在现阶段，不是打倒一切，而只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保护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们从思想上、理论上提高了认识，行动上就比较能自觉地执行中共中央规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了。以前那些破坏政策、违犯纪律的行为大大减少。有的部队还发起遵守政策纪律的竞赛活动，出现了许多遵守纪律的模范连队。

（二）部队纯洁了，军内外的团结增强了

在新式整军运动之前，在部队内部存在着若干不正确的思想上的倾向和各种不良现象。如地富思想，忘本思想，军阀主义，享乐思想，以及贪生怕死，贪污腐化等严重情况。这些在运动中受到了揭露与批判，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教育，从思想上提高了认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

增强了防腐的抵抗能力。同时，查出了混入部队内部的各种坏分子，使部队组织纯洁了。例如，西北野战军检举出暗藏在部队中的国民党军军官、组织逃跑的奸细分子共有百余入。部队纯洁性的提高，还表现在改造了一大批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到战争第二年结束时，大约溶化了80余万俘虏兵，使他们懂得为劳动人民而战，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蒋介石。他们之中许多人还被提拔为人民解放军的班长、排长、连长，技术兵还格外受到重用。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部队的团结空气越来越浓。干部普遍关心战士，同甘共苦，出现了干部为战士背枪，马给伤病员骑，行军中到群众中去做工作等过去少见的现象。干部还从战士身上学到了许多好东西，例如“天真活泼的情绪，艰苦朴实的作风，阶级友爱的精神，严肃负责的态度，要求进步的欲望，大公无私的品质等。”^①战士“感觉现在干部好了作风好了”。他们说，“毛主席真有办法，几查几整，干部都变了样，把干部评好了，把党员评好了，现在也得评评我们自己了”。战士更加爱护干部，服从管理，听从指挥，“许多干部感觉现在兵好带了，仗好打了”。干部制定爱兵公约，战士制定拥干公约，出现了尊干爱兵的新气象。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了存在于同级干部间、上下级间的矛盾，军事干部与政治干部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起来了。正像彭德怀所说，“过去长期存在着军事工作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相互争时间，以致闹成不团结者，现在一致认为政治思想搞不好，其它一切工作也搞不好”^②。经过新式整军，解放战士、老战士、新战士融成一片。以往解放战士不受信任，受歧视，现在，子弟兵（即老战士、新战士）从生活上、政治思想上关怀他们，信任他们，帮

^① 《华东野战军前委对西兵团土改学习三查运动的总结（草稿）》，1948年11月。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265页。

助他们改掉旧军队的恶习，熟悉人民解放军的规章制度。因此，解放兵深受感动，他们体会到革命军队的温暖，认为“被俘不是仇人相见，而是兄弟团圆”。

由于阶级觉悟提高，政策纪律观念加强，特别是军阀主义倾向的被纠正，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普遍得到改善。随便拉夫派夫，打骂群众，打骂地方干部，侵占群众利益的现象大大减少，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已日益成为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晋察冀军区以往动用民力支援前线，为一兵一夫，新式整军后，部队爱民观念增强了，注意节省民力，兵民比例下降为1.8：1，低于规定标准。不少部队建立了纪律检查制度，经常检查军民关系，群众纪律，有的部队看到群众遭灾，生活困难，就自动发起节省一两米运动，救济遭灾的群众。部队每到一地，就宣传群众，为群众做好事。军队尊重人民，人民拥护军队。

（三）战斗意志增强，练兵热情高涨

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认识到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了，它的灭亡只是时间的早迟而已，因此有理由轻视它，有把握、有信心战胜它。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乃至直接出兵中国，帮助蒋介石打人民解放军，这曾经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最担心的一个问题，经过学习之后，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中国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不能惧怕，也不应该惧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武装了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以前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的指战员，现在认识到只有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才能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在解放区是不能打倒蒋介石的。他们表示，“领导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在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全军上下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练兵运动。其景况是空前的，感人的。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描写西北野战军的练兵情况时写道：“不论干

部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均卷入大运动的浪潮。当练兵时，许多同志早起晚睡，不睡午觉，拚命的练，有的被炎热的太阳晒得脊背脱了两三层皮，也不甘休；有的因病而劝他休息，也不愿意。有些干部说：我们不是下命令给战士练，而是下命令给战士停止练；我们不是把战士从屋里督促到操场，而是从操场督促到屋里。”^①

在练兵中，充分地贯彻了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开展了军事民主。战士，苦练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针对攻坚战增多，炮兵不足，还加强了爆破技术的演练，创造了许多攻坚器材。干部，以提高战术为主。各部队均提出了“勇猛与智慧结合”、“技术与战术结合”、“学习战术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等口号。各级干部专心研究战术，战士们也纷纷提出意见，使战术学习形成了群众运动。因为各战略区敌我情况不同，因此学习战术的重点也有差别。经过冬季战役后，东北国民党军据守几个大城市和一些重要据点，因此东北人民解放军提出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练兵口号，着重练大兵团城市攻坚战术。西北野战军依战争由高原作战走向平原作战，着重练习平原村落攻坚战战术。中原野战军加强了大兵团运动战和提高攻坚作战的战术练习。华东野战军着重练习大兵团运动战、攻坚战等战术。华北人民解放军也以练习运动战与城市攻坚战战术为主。高级指挥员还着重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十大军事原则。

经过练兵，部队的军事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有的纵队 87% 的人射击弹弹中靶，手榴弹投掷一般都在 30 米以上。有的纵队投弹水平，原来平均二十六七米，练兵中提高到三十二三米，有的连队一周之内平均每人提高 1.5 米。迫击炮的抵进、连续平射也得到普遍熟练，创造了迫击炮抵进射击、连续爆破、拔雷等多种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优势装备的技术、战术新方法。人民解放军过去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是经过战争的实践锻炼

① 甘泗淇：《新式整军运动经验》，1948 年 11 月。

与军事训练，不但已经解决夺取中等城市的战术，而且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独特的攻坚战术。

新式整军运动所焕发出来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大练兵运动中，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随后的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崭新的精神面貌，熟练的战术、技术本领，对国民党军发起了一个又一个打击，取得了一个比一个大的胜利。正像朱德所说：“全国解放军经过三查，出去打仗，都打得很好，到处打胜仗。”充分显示了新式整军的巨大威力。

如同历史上的各次大的政治运动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若干缺点错误一样，新式整军运动也出现了若干偏差，但是偏差一出现，立即就被运动的指导者发觉并迅速地纠正了。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各军区、各野战军在总结新式整军运动情况时，就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运动的成绩，也恰如其分地检讨了缺点错误。例如，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在《关于三查运动的总结》里指出，“依靠贫雇农战士、紧紧团结中农战士，是三查运动的正确方针。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普遍的忽视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团结中农战士的工作，并且在很多单位存在着严重排斥中农的倾向”。此外，“还存在着其它若干偏向”。如，吊打和逼供信，就是“这次运动中一个比较普遍的偏向”；“不论大小问题，都喜欢往政治问题上追，开口就是‘谁派你来的’”；运动中还提出一些不正确的口号，什么“贫雇农团结起来！搞好咱们的连队，打倒蒋介石！”“贫雇农是部队的主人翁！”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里也写道：“三查运动中有某些过火的行为：隐藏在部队中的恶霸地主、俘虏军官、组织叛变的奸细分子以及严重贪污分子，一经查出即行捆、吊、打，以致打死人，甚至有个别逼供信的错误。”^①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在《关于新式整军运动的总结报告》中说：三查三整的主要偏向是，“建军（整军）与农村土改的性质没有严格分清，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266 页。

因而在方法上也就混同起来，不适当的搬用农村土改经验。”所谓农村土改“经验”，是指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过的扩大打击面的“左”倾错误。如，侵犯中农的利益，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错误口号；错误地将政治态度、思想作风、生活水平等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用同样方式进行斗争，有的一度发生乱打乱绑乱杀的现象，等等。这些“左”的现象给新式整军运动一度带来不良影响。如整顿组织，有的部队“以成分出身为主，忽视了思想和其他条件，甚至有全只看成分出身的。”对地主富农成分或其他非劳动家庭出身的，“一般偏于洗刷，干部则大部调训。”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在《关于部队新式整军情况的报告》里说：“三查中有不着重思想而过分强调近乎唯成分论的偏向，个别单位机械搬运农村整党一套，组织贫农团，并实行吊人打人捆人。”致使有的团政治处主任自杀、团长自杀。中原野战军查整运动初期，个别单位也一度发生过唯成分论、贫雇农当家，忽视党的领导的偏差；经过反“左”，反对唯成分论后，在一些干部的思想里又有“不注重成分的观念存在。”^①

从人民解放军全军范围来看，新式整军运动中发生的偏差，总政治部1948年春《新式整军初步总结》指出，在运动初期，“个别发生过放松领导作用而尾随群众偏‘左’情绪倾向，以为不如此就不民主，致个别连队机械仿效农村土改斗争，建立贫雇农组织，搬连队石头等不适当做法。同时发生的另一种偏向，则又是怕揭露自己缺点、错误，或是怕群众起来不好掌握，因而不敢采用民主方法，使运动缺乏生气。”^②

整军中为何发生右的和“左”的偏向，面主要是“左”的偏

① 刘伯承、陈毅：《关于中原野战军整训工作致中共中央的报告》，1948年8月11日。

② 《新式整军运动》，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向呢？周恩来指出：“如果运动中尚有若干错误与偏向，大多由于领导者没能很好地掌握三查运动的正确方向，开始时不敢放手发动，发动后又未能预见一些‘左’的偏向加以防止。”^①总政《新式整军初步总结》也指出，“这都是由于缺乏运用民主的集中制的原则去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不了解部队实行民主，应该是在部队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及连队支部领导下，在平时工作及作战前后的战斗准备与战斗检查中，采取民主方法，将领导思想变为群众思想，集中群众的智慧及启发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既需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同时也要防止民主运动中可能发生的极端民主的倾向以及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二、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

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它的经验乃至它的教训，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均是宝贵的财富。因此，自然受到重视。不少研究单位，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出发，探讨了新式整军运动的经验。然而，最有权威性、最有史料价值的，还是当时的经验总结。现列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总结材料于此。

（一）西北野战军

1948年11月，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就西北野战军新式整军运动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认为，第一个经验，就是必须从提高阶级觉悟入手。“每一运动（包括军事学习在内），必须贯彻深厚的阶级教育内容。有了这一中心内容，则在运动中，就可逐渐提高全体军人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能从阶级利益出发，认识这一运动的重要性，自觉的振奋起来，参加这一运动。”“如果运动中没有贯穿着阶级教育的内容，那末，尽管表现一时的轰轰烈烈，必然是空洞，不深入，命令主义、形式主义随之而生，收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03页。

效并不大。”第二个经验，必须放手发扬民主。“掌握部队中的群众运动，必须领导机关、干部本身，有绝不存丝毫个人主义，彻底的群众观点与工作中采取彻底的群众路线。部队中经过三查及近半年来各个运动，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如果要把领导的意图，变成群众的意志与群众的行动，就非有放手的民主不行；只有领导与群众真正的结合，通过大多数人的反复思维、反复讨论，才能使真理为群众所认识，心甘情愿的干下去。”“不深信群众力量的伟大，就不能有彻底的群众观点；没有彻底的群众观点，就会不敢大胆的发动群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群众运动。”第三个经验，领导者对运动必须要有预见性。“领导机关要根据当前军事政治任务，与本部的具体情况，能提出肯定的主见与工作方针。……根据这一时期的经验，部队各级领导机关，在每一运动中，必须自始至终，起着带头作用”。其督促检查表现在（1）“负责人在发动运动前，根据部队当前的总任务，有过深思熟虑，提出运动的方针与任务，使运动有其明确的方向。否则会变成自流，反导向紊乱无头绪。”（2）“运动的方针确定了，就须毫无顾忌的干下去，不要畏首畏尾，但工作的细致，组织的严密，是非常需要的，这就是所谓‘酝酿要成熟’、‘暴露要彻底’、‘不泼冷水’、‘不作尾巴’。”（3）“运动中，曾发生过若干偏差，就是显示着干部预见与主动能力的不够。”第四个经验，必须实行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的掌握，一定要集中，要统一，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这一点，在我军中，大体上是做到了的。由于各级党委都吸收了军政后勤负责同志参加，只要党委一成决议，所有各机关都能齐心合意的为共同任务而努力。所以这次运动都能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很快就造成热烈的空气，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样力量就可集中，在一定时期内，大家致全力解决一个主要问题，主要问题解决了，许多其他问题也随之而解决了（如阶级觉悟提高

了), 违反纪律与政策的现象也减少了。”^①

(二) 中原野战军

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 1948年5月就整党工作与展开战士中的诉苦民主运动相结合做了总结。他指出, 要完全改变和纠正干部中、党员中存在的不良现象, “必须一方面依靠党的正确领导, 自上而下的号召我们自觉的揭发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以完全符合于党与人民的立场; 另一方面还必须启发战士群众的阶级觉悟, 并发扬战士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积极性, 来关心和监督、检查我们每个干部和党员的工作和行为。”“这样即可以扫除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党员群众之间军阀官僚主义的障碍, 达到官兵之间、党与群众之间密切联系, 又足以使得广大战士群众一经与党的正确领导取得联系之后, 而把他们的积极性、智慧与力量得到发扬和提高。”^②

(三) 华东军区

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从多方面总结了华东部队整军运动基本经验。其中主要的有: (1) “新式整军运动不仅是有领导有秩序的, 而且还应该是有准备有分别的民主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与内容, “总的方面即是按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路线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与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在这个总目的总内容之下, 还应该按照各个部队的具体情况(内部情况, 外部情况)、具体任务, 提出可能的与必须的、一定时期的整军目的和内容, 力求明确而具体, 并须分清阶段, 确定步骤(如思想、组织、作风各有重点, 不同时间, 不同要求), 并依据不同内容给以一定形式(如几查几整或几评等)。如果不是这样, 就会使运动失去明确目标, 不是要求过高, 就是陷于盲目被动。”(2) 在干部缺乏经验时, 应先试点, “创造典型, 然

① 《新式整军运动》第377—382页。

② 同上, 第274页。

后波浪式的逐步推广，不要一开始普遍号召和发动”，“更不要企图在短时间提出许多要求，否则就容易犯主观急性病。”（3）“实行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方法是发扬三大民主，走群众路线，并贯穿着阶级教育的基本内容；而其关键就在于掌握由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由下而上的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因为这是一切团结进步的原动力。同时着重于从领导上解决问题，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因为许多问题是从领导上发生的，领导上健全与否，对于整个工作有决定影响的。”（4）“应当从实际出发，通过各个部队的不同特点，来决定他们方法和方式。例如主力部队须注意他们的集中性、纪律性与战斗性；地方武装须注意它的地方性及由农村反映的封建性、落后性；基于兵团则应注意它的许多过渡的东西；……但不管采用何种方法、方式，其目的都在于达到团结内部，改善领导，加强战力，发展生产与提高技术。”（5）“必须把党外与党内加以区别，军队与地方加以区别，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加以区别，切忌一般化机械搬用农村经验，或者把这些问题混为一谈”。（6）“新式整军运动包含着两大部分：一为领导干部，一为连队（或机关等），两者各有重点而又体现为统一的群众运动”。运动进行的步骤，“一般应先干部而后战士，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先战士而后干部，或者由干部示范到战士，再由战士回到整个干部。”“应当着重打破两种顾虑与预防两种偏向：一种顾虑就是干部害怕发扬民主、害怕群众起来，害怕检讨；另一种顾虑就是战士不大相信民主，害怕领导干部报复。”^①

（四）东北野战军

《东北野战部队整军运动总结》指出，这次整军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由下而上的批评和由上而下的自我批评，是检查缺点、改正缺点、团结干部、提高干部的基本方法，而民主作风的发扬，定期召开民主会议（团约三个月一次，师约半年一次），则

^① 《新式整军运动》第 323--325 页。

是一个重要的关键。”^①

（五）华北军区

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1948年5月就华北军区部队整军运动中的三查与民主做了总结。他指出，三查，“是洗涤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非毛泽东思想，求得思想上升、工作进步、作风改善、团结加强、战斗力提高的有效办法，因此今后在军队中一年进行一次到两次有计划、有重点的三查是必要的。”罗瑞卿强调三查必须掌握以下几点：要着重查思想、查立场、查工作、查对敌斗争的表现；查成分，既不能忽视成分又不过多伤害一切出身不好、但确愿改造确可改造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对成分不好者要分别对待。打、骂、捆、吊、关等行为，既伤害了人，又障碍真正的思想打通，必须严禁。要反对轻视军队中的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战士，但又不能不适当的过分的强调什么建军中的贫雇农路线。罗瑞卿还指出，“在军队中实行正确的民主，对打破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官兵团结，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证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谓正确民主就是要对民主有领导，这样既发扬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与责任心，又不致与军队的集中统一、纪律、尊干等等相抵触，反而使这些方面更加得到巩固和保证。”^②

综上所述，新式整军运动的基本经验大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运动的基本目的，是以毛泽东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为指导，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全面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第二，解决军队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严重不良倾向，必须充分发动全体官兵，大搞群众运动，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但是，这样的群众运动又必须是有准备的、有领导的、有秩序的民主运动。

^① 《新式整军运动》第299页。

^② 同上，第287—289页。

第三，从根本上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是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中心环节，而进行阶级教育，开展诉苦运动是提高指战员政治觉悟的最好的教育方式。

第四，由上而下的自我批评与由下而上的相互批评相结合，以整顿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为主，着重从思想教育方面解决问题。

第四节 发扬三大民主，加强军队党的建设

一、广泛深入开展民主运动

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是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一项原则，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新式整军运动中和运动开展以后，这种民主生活有了重大发展，民主的领域扩大，内容丰富，方式方法灵活多样。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是由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决定的。远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这样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①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案》决定，在中国工农红军内部要坚决废除肉刑，禁止辱骂，让士兵有说话的权利。红军依靠实行民主主义，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和管理教育制度。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②八路军、新四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运用整风的方法，召开民主会议，检查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纠正新军阀主义倾向，开展尊干爱兵活动，部队的民主生活有了进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9页。

步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式整军运动之前，许多部队已相当普遍地开展了民主的评功、评过，接着又出现了评伤亡、评技术等创造，部队民主空气日渐浓厚。新式整军运动中，民主运动更进一步展开。毛泽东及时总结了开展民主运动的经验，于1948年1月30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第一次把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他说：“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①

政治民主。在新式整军运动中，着重解决了官兵关系与党群关系，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团结。解决的主要方法，是在各级党委和党支部领导下，开展评干部、评党员的活动。

评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检查干部、推荐干部与建议撤换不称职的干部。一般通过士兵委员会和军人大会，群众根据干部条件对干部开展“评”与“比”。各部队对干部条件作了具体规定。例如，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提出的干部标准有5条，即是：“为人民服务，有高度决心；作战勇敢，能完成任务；工作负责，积极肯干；联系群众，虚心学习，有上进心；能执行政策纪律。”^② 干部根据干部条件对照检查自己，群众根据干部标准来评判干部。在评干部活动中，各级干部大都能自觉地作自我批评，并以诚恳的态度欢迎战士和下级批评，决心改正缺点、错误，做好工作。通过评比，一方面深刻地教育了干部，暴露了不称职的干部，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新的积极分子，他们之中许多人可以提升当干部；干部的威信提高了，责任心加强了，因而更受到战士的拥戴。另一方面，教育了广大战士，对解放战士的教育尤大。解放战士感到部队实行民主，是他们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从自己的经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② 甘泗淇：《新式整军运动经验》，1948年11月。

中体会到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说，“要是在国民党军队那边，他们那样多的丑事，是不敢让大家来批评的。”

评党员。为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1948年2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决定将长期处于秘密状态的连队党支部公开，使支部能更好地联系群众，使党员随时能接受群众的监督。评党员的做法是，邀请非党群众参加党支部大会或党小组会，听取他们对党员与对支部的批评，并由支部负责人和被批评的党员公开作自我批评；参加审查和推荐新党员；参加审查候补党员的转正，等等。评党员，对党员与非党员都是一次生动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教育。通过这个活动，共产党的威信提高了，人们感到做一名共产党员是无尚光荣的。因此，群众推荐入党，自己申请入党，火线要求入党，以及提出如牺牲了请求党组织追认自己为中共党员，甚至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奄奄一息，还念念不忘请求党组织承认自己为共产党员，这些情况在各个部队均屡见不鲜。经过评党员活动之后，一批作风好，原则性强，深受群众拥护的党员被选到支部领导岗位上，一大批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被吸收入党，一些丧失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共产党的队伍更纯洁、战斗力更提高了。

经济民主。实行经济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善部队的经济生活。在战争年代，保证吃好饭，是关系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大问题。解放战争时期，由士兵参与管理连队经济开支的制度虽然坚持下来了，但很不健全，有的部队实行的很不好，经济委员成了形式，经济帐目不公开，连队经济也不公开。针对部队经济民主开展不够和存在的问题，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①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基层连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75页。

建立和健全了经济委员会（凡建立士兵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隶属于士兵委员会），每排选出1名经济委员，另外每班选出1名经济代表（或叫经济委员）。实行经济民主，士兵参加管理伙食，不但改善了连队的经济生活，而且是防止干部贪污浪费及军阀主义的最有力的措施之一。

军事民主。从红军时候起，军事民主就有了。到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民主又有新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民主更加发扬，新创造也更多了。华中和山东解放军首创立功运动，经《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在全军普遍推行，“作为争取全面抵抗胜利的有力武器。”^①接着，晋冀鲁豫解放军创造“评定伤亡”，后发展为评战术、评技术的战评运动，并在全军推广。东北民主联军《自卫报》在题为《广泛开展战评运动》社论里指出，战评运动“是群众路线见之于技术战术学习的又一次运用。”“过去在练兵运动中创造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官’的方法，这是一种群众路线，这是在比较和平的环境下的练兵运动中，而且主要的是以学习技术为主的要求下创造出来的。现在战斗评论会，也同样是一种群众路线，而这则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而且主要的是以学习战术为主的要求下创造出来的。”^②

军事民主的开展，提高了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成为人民解放军取得作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有少数指挥员对开展军事民主仍存顾虑或有不正确的认识。例如，有的说，军队可以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但军事上不能实行民主，军事上应该高度集权。有的高级指挥员认为自己久经战争锻炼，有经验，以为军事民主会增加麻烦，浪费时间。有的连排干部看到战士提出好主意、想出好办法，比自己还高一筹，因而顾虑自己的威信，担心战士不听指挥。有的认为，指挥员能力强的部队不需要实行军

① 《广泛开展立功运动》，《解放日报》评论，1946年11月11日。

② 《广泛开展战评运动》，《自卫报》社论，1947年11月11日。

事民主，等等。

为着把军事民主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克服一切不利于军事民主开展的言论和行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发出了许多指示和讲话，强调开展军事民主的重要性并及时总结与推广部队实行军事民主的新经验。

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对军事民主作了集中概括：“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①31日，毛泽东向全军各大战区领导人转发了朱德1947年12月10日《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毛泽东说：朱总司令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②朱总司令信中提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待遇。

朱德极为关怀部队开展军事民主。除上面已提到的这封信外，1947年9月7日，他在全国土地会议上作整军问题报告，讲到军队里边的群众路线问题时说：“首先，军事教育要走群众路线。我们实行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办法，使指战员的军事技术大大地提高了。”“其次，战术运用要走群众路线。每一个战役结束后，从组织一个班的战士检讨作战的优缺点，一直到全部队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73页。

来检讨战术，这就能大大地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①1948年5月15日，朱德在华东野战军第1兵团连、排、班长及战士代表会议上又讲道：“军事技术好了，自己就会打仗，再加上连排长平时研究、战士平常提意见，发挥战士群众的创造性，仗就打得更好。”“军事民主搞得好，连队里天天有创造。”

周恩来1949年4月17日说：“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我们有时甚至还准许士兵讨论作战命令。每个战斗小组都开‘诸葛亮会’，取‘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之意。上级命令不可能很具体，下到连队后，战斗小组就开‘诸葛亮会’讨论如何具体执行，这样充分发挥了士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在短兵相接的今天，更是特别需要。”^②

经过认真学习中央军委领导人关于开展军事民主的讲话，经过总结开展军事民主就打胜仗，不搞军事民主作战时就要吃亏，正反两方面的战例教育，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开展军事民主的自觉性、积极性提高了。经过不断总结，军事民主的形式也比较固定了下来。其主要内容包括：在军事训练中，实行官兵互教的方法，发起练兵竞赛，开展教学互助。在作战时，发动干部战士出主意，想办法，解决战术、技术难点，讨论如何执行作战命令、作战计划；评指挥、评伤亡、评执行政策纪律，总结战役战斗经验教训，实行打一仗进一步。如此，就使训练和作战都成了广泛的自觉的群众运动，充分发挥了群众的力量，集中了干部、战士的智慧，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二、连队士兵委员会的成立

人民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民主，部队民主生活空前活泼。如何使这种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能够巩固与发扬，使其成为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各战略区的

① 《朱德选集》第208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16页。

领导人与政治机关，均在探索解决的方法。在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就是在这种需要下产生的。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并且对连队的建设起过积极作用。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时，在团、营、连三级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委员由民主选举产生。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正式颁布了《红军士兵会章程》。章程规定：“团以下均得有士兵会的组织。各级直属部队亦得组织士兵会。”红军士兵委员会的建立，对于荡涤旧军队的残余，实行民主制度，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它的职权过大，在一些部队中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因此，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就再没有提出成立士兵委员会，1932年这一制度就被错误地取消了。

新式整军运动开展后，一些战略区又自动在连队恢复了士兵委员会。例如，晋察冀军区于1947年底决定在“连队与伙食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给予士兵以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并对士兵委员会的职能做了规定，“凡属群众性运动均可由行政提出，通过士兵会讨论执行。士兵委员会按时审查伙食帐目，讨论改善生活，并进行对干部的批评与审查鉴定。”士兵委员会的成员“应以工人、贫雇农的优秀分子为骨干，经由民主选举之。”渤海军区在整军中，也在连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名为学习委员会），“此种士兵委员会，即成为经常制度。由士委会自己管伙食、管娱乐、管学习，自己维持纪律。一切连排班长之升降，都通过士委会。党员之吸收与洗刷，亦征求士委会与军人大会之意见。”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在1948年1月20日向中央报告说，“这种制度是加强部队团结，防止军阀主义，提高战斗力的最好制度。”西北野战军在三查运动中也采取了类似士兵委员会性质的办法。

士兵委员会的恢复，或者更确切说士兵委员会重新建立，是一件新生事物，是新式整军运动的产物。它一出现，就使连队工

作为之一新。毛泽东、周恩来都充分肯定了指战员的这种创造精神，先后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文件，指示全军普遍建立士兵委员会的组织。1948年1月28日，毛泽东指出，“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①2月5日和17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的通知》，为了使部队的民主生活“能经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当作一个制度建立起来，并经常发挥它的作用起见，有些部队已组成了经常的士兵委员会”。“我军各部队似都可在连队中普遍成立士兵委员会的组织。”《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接此通知后，斟酌情形，在各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以几个月作为试办时期，以便在试办期中产生办法、工作范围及内容等。”

3月3日，陈士榘、唐亮就部队组织士兵委员会向中央军委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名称问题。他们认为，“士兵委员会名义，因易误解士兵对付干部的一种组织，且士兵名词为战士不欢迎，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较好”；二是具体权利问题。他们说，“因于部民主作风未很好养成，且能力经验均较差，我们部队中俘虏成分太多，觉悟程度仍有限，又在残酷的战争情况下，故对其具体权利，开始须稍约束，加强民主教育，视上述情况改变，逐渐放手。”

根据陈、唐建议及其他单位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情况，3月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中强调，“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我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都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为巩固和发扬新式整军的成果，“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78页。

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究用士兵会与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大会与革命军人委员会，可由各部酌定，主要的是其权限及其工作方式究应如何方为适当。”周恩来认为，“进行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大致是：（一）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中，在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二）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三）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由其行政首长提交讨论这一命令中的实施办法；（四）这一组织如欲对其行政上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五）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与自我批评，亦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①《指示》要求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应于最近数月内选择一些单位试行士兵委员组织，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规定最后办法。

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各野战军、各军区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渐在各连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华东军区政治部还制定了《关于革命军人委员会（即战委会）条例草案》。这个条例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于1948年10月25日下发华东人民解放军先行公布试行。《条例》认为，“这个组织的名称，以能适用包括干部在内的全体人员，并适用所有机关学校，应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简称为军人委员会）。”《条例》对革命军人委员会的“性质与工作”，“组织、制度”，“革命军人委员会与各方面的关系”，都做了明确规定。

连队士兵委员会（革命军人委员会），是人民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的极可宝贵的产物。它不仅仅是红军时代士兵委员会简单的恢复，而且是在新的条件下的更高级的发展。1949年12月，中央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03页。

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人委员会条例（草案）》，革命军人委员会就成为人民解放军连队建立的全体军人的群众性组织。

三、健全党委制，加强党支部建设

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党对军队的领导进一步加强了。其主要体现在，一是人民解放军各级陆续恢复与健全了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党的委员会；二是加强了党的基层工作建设，使党的支部成为连队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

人民解放军中的党委制，远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就开始建立。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奠定了党委制的基础，使红军的党委制走上了健全的道路。1931年11月，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决定取消红军中这一实行有效的各级党委员会，党委制从此中断。单纯强调个人作用的首长负责制，在红军中及尔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实行。这曾给革命战争以很大损害。正如彭德怀所说，“首长制代替党委制，对军队的损失是很大的，它阻碍党的水准的提高。”^①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则决定，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恢复军队中的各级党委会，以避免首长制所产生的弊端。然而由于条件限制，当时还没有制定出一个军队中党委会的工作条例。

由于“七大”后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上述决定未及在八路军、新四军落实，抗日战争就胜利了。为适应新形势，1945年8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是领导全党的军事工作、统率人民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机关，人民解放军的统帅部。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285页。

根据“七大”的原则决定，最先试行建立党委制的是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1945年11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峰峰会议决定，在纵队和旅两级逐步建立党委制。1946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颁发了《党的团委员会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在步、骑、炮各建制团中，均须成立一领导全团军事政治工作的一元化的党的委员会，简称‘团委’”。12月25日，晋冀鲁豫军区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部队中党委的组织与领导》的报告。中共中央很重视晋冀鲁豫军区的经验，在1947年2月27日给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并转中央局、分局的电报里说：“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七大时已有原则决定”，“根据晋冀鲁豫执行这种改组的经验，证明这种改组是正确的。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理应由首长担任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现中央正在草拟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在中央条例尚未发布前，你们可根据晋冀鲁豫经验及其文件实行改组，并将你们经验电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经验，华东军区及野战军于1947年1月下旬，晋察冀军区于3月，晋绥军区于7月，东北民主联军于8月，西北野战军于10月以后，各级党委制逐步建立。

党委制逐步恢复与建立后，各部队普遍反映作用很大。例如，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1947年12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一元化的党委半年来在部队中实施有什么好处呢？主要的可以看到的是：（一）党的政治领导加强了，部队中许多重要的军事政治措施，经过党委民主讨论确定，然后贯彻到部队中去，使全党与部队在一定时期内有着奋斗的中心目标和方向，不至涣散。（二）党委许多重要决定实行民主讨论的结果，领导上既发扬了党委与干部的积极性，同时又比较广泛的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能够保

证决定问题较全面，较正确，较少的发生错误。……（三）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的结果，随时有着明确的中心和注意领导集团之间的以及部队的思想领导，能够保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更加团结及军事政治机关工作协同配合一致，军政对立的现象能够减少和避免。”当然，由于党委制还处在逐渐恢复阶段，因此党委制的建设还不健全。其表现如下：

一是各野战军和军区虽然都做出了恢复党委制的决定，但因部队历史或工作进展不同，有的恢复快些，有的恢复慢些，有的纵队、师（旅）、直属党委是1948年夏，营一级党委是1949年春方才建立。军区、军分区及野战军营一级设党委的问题，有的主张分散出去作游击活动的营，须设营的党委会，集中行动进行正规作战的建制团中的营则不必设党委会。有的认为因为有地委和分区党委，因此军区与军分区可以不再成立党委会。二是对党委制的重要意义还认识不足。有的认为，把过去的军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取消，设置党委会，是“名词”的改变，“形式变了内容不变”。三是党委书记、党委委员还不熟悉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们熟悉的是政治委员的“全权代表制”，不懂得不熟悉党的民主集中制。四是有的部队形式上建立了党委制，实际工作上仍是首长领导，把军队中的首长制搬进党内来，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五是有的单位把党委会与行政会混同起来，事无大小，都拿到党委会来研究决定，形成党委代替军政机关工作。六是党委委员大都是上级党委指定的，有的纵队、师（旅）的党委成员中没有下级干部参加。

为健全党委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47年7月28日制定了全军第一个党委会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12月10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将这个《条例》送交“各级党委员会同志”，“请你们采取有效办法如举行座谈会等交换意见，搜集你们的自建立党委工作以来所获得的经验，用书面寄给我们以便研究再加修改。”《条例》草案分总则另4章

共 41 条。

《条例》规定，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其组织形式就是“在军队中设置各级党委员会，而以党委员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在军区、军分区，野司、纵队、师、旅、团、营及地方部队团各级设置党委员会。军区后勤部门，纵队至团的各级供给卫生等部门，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党委员会。各级军区所举办之军事学校设党委员会。各级党委委员，平时由各级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军事行动不可能召开代表大会时，得由上级党委指定名单成立临时党委员会。党委员会内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毛泽东总结各战区实行党委制的情况后，于 1948 年 9 月 20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他在批评有些领导机关或个人，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后，强调，“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①1956 年 9 月 16 日，邓小平指出：“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说：“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像这个决定所说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长期以来就实行着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或者说得完全些，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经验，证明这个制度对于部队工作是有利的，它并没有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40—1341 页。

碍部队的军事指挥。”^①

关于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支部建在连上”，是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光荣传统，是艰难奋战打败一个又一个敌人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支部建设加强了。长期处在秘密状态的党支部与共产党员，公开了。这就使支部能更密切地联系群众，使党员能够时刻接受群众的监督。支部经过整顿，一批党性强、作风正派、深得群众信任的党员被选为支委委员，或支部书记；一大批符合共产党员标准的优秀分子被吸收入党；一些丧失共产党员称号的人被清除出党。共产党的队伍纯洁了，共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了。

1947年7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党支部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中规定：“军队中党的组织基础，是党的支部”，“支部委员会为全连之最高领导机关。连长及政治指导员对支部委员会之一切决定，须负责执行，并按时向支部委员会报告其工作之执行程度。连长及政治指导员对支部书记得按时进行党的工作之汇报。”“支部应随时发动全体党员带领群众，上下一体积极地完成全连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措施。并领导连队一切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1948年10月，经总政治部批准的《关于支部工作的条例草案》，先行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公布试行。这个《条例》，对支部的性质、支部委员会的任务，组织制度，职权关系，支委与小组长工作，都做了明文规定。这样，连队支部工作走上了健全发展轨道，党支部成为战斗堡垒。

第五节 加强纪律性，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

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任务的加重，要求人民解放军大大提高其正规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执行严格统一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29、230页。

纪律。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但是，在人民解放军中，违犯纪律，违背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相当普遍严重。这些东西同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是不相容的。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纠正这些不良倾向。其中有两项措施最重要，对夺取战争胜利影响也最大。

一、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统一的革命纪律。它是在战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1927年9月，毛泽东要求秋收起义部队的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提出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同年4月，部队到达湖南桂东县沙田村时，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1929年，工农红军进军赣南、闽西，在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从而形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战争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行为规范。抗日战争胜利后，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从本战区情况和部队实际出发，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容，提出了不同要求。例如，晋察冀军区通用的三条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收缴获要归公；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八项注意是：尊重群众风俗，爱护地方人员，驻地打扫清洁，退出注意宣传，说话态度和气，买卖东西公平，损坏一定赔偿，借物负责送还^①。晋冀鲁豫军区在上党战役时，就重新规定三大纪律，内容是：不拿群众一点东西，缴获敌人资财要归公，一切行动要

^① 聂荣臻、萧克、赵尔陆 1947年10月1日《关于三条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向军委的报告》。

听指挥。八项注意是：上门板，扫地，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调戏群众的妇女，不拿俘虏私人东西^①。战斗在晋西南和豫陕鄂地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他们实行的三大纪律是：服从命令，不拿群众一点东西，缴获敌人物资归公。八项注意是：上门板，扫地，损物赔偿，借物要还，买卖公平，不调戏妇女，不随意大小便，不搜俘虏腰包^②。这表明，虽然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内容、内容排列顺序及文字表述方面，均没有统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几路野战军、几个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区作战，需要有统一的纪律规范部队的行动。

为了重新统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22日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萧克、徐向前、滕代远，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彭德怀，贺龙、李井泉并告朱德、刘少奇：“中央拟于最近重新统一公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望于九月底以前电告你处现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并提出意见。”接此通知后，刘伯承、邓小平即于9月25日向中央报告了本区现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思想不应再改变。因为它与我军打仗、生产（或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是相适应的，只是文字上有些不同。为了更切合实际情况，应有所改变。”聂荣臻、肖克，陈赓、谢富治也分别于1947年10月1日和2日将本区现实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报告中央。毛泽东充分吸收了全军的意见，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亲自作了修改。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全文如下：

① 刘伯承、邓小平1947年9月25日《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及意见向中央的报告》。

② 陈赓、谢富治1947年10月2日《关于现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及意见向中央的报告》。

“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

“二、三大纪律如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三、八项注意如下：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①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讲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过程时说：“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曾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不同要求。开始规定了三项纪律，接着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三项纪律的内容后来也有变化，把‘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到一九四七年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上也有修改，‘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② 这就是说，随着情况的变化，在今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还可能有某些改变，但其精神实质则是不会改变的。

重行公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件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0页。

大事，从此，全军有了统一的纪律。这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以及对于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具有伟大作用。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极其重视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教育部队。因为纪律是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必备条件。毛泽东要求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① 1948年3月23日，邓小平指出，“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三大任务的集中体现，它“把打仗集中成为一切行动听指挥，把群众工作集中成为不拿人民一针一线，把经济集中成为一切缴获都归公。把我们的任务和政策具体到八项注意中去，如对人要和气是反对军阀主义，买卖公平是工商政策，不搜俘虏腰包是俘虏政策等。”邓小平指出，“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简单的规定，只看成是群众纪律问题，应知道，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够了格，只靠冲两个锋，是不够格的。”

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坚决地自觉地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嘹亮歌声响彻各个兵营。统一的纪律，成了人民解放军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二、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加强集中统一指挥

如果说，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对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的话，那么，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加强集中统一，就主要是对各级主官的要求。建立报告制度，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一个发展，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9页。

于迅速克服党内军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集中统一,具有重要作用。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严肃地指出了作报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作报告对革命的危险性。“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即: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月就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情况,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执行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同时还规定,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①。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为使中央充分明了情况起见,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须严格遵守外”,兹规定:(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上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4—1266页。

意见的义务及权利。“以上三项规定为制度，从本年卯（4）月起实施。”^①同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②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各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首长，开始遵照中央的规定，向中央或中央主席毛泽东作综合报告。处在大别山那样严重环境下的邓小平，从1948年1月起就按制度向毛泽东作综合报告。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成立后，分工由邓小平向毛泽东作综合报告，由刘伯承向中央军委作野战军工作报告，由陈毅向中央军委作军区工作报告，由邓子恢向中央作地方群众及财政工作报告。邓小平等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作报告，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赞赏，其报告也被批转各野战军、军区领导人阅读。有的战略单位或领导人自中共中央规定下达后半年内未向中央主席作报告，也未声明理由请准延缓或免作报告。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严肃的批评，要求他们作自我批评。指出，在向中央做不做综合报告这件事上，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③并再次强调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

③ 中共中央1948年8月15日关于东北局不向中央作报告的第二次批评和指示。

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极端重要性，“这一问题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日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①此后，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决议》规定，关于军事方面的战略方针及战略计划；野战军或兵团的作战计划；军区及野战军或兵团的整训计划；师以上军队的编组，野战军和兵团的组成及一二级军区的划分；军制的建立及军事教育方针的决定；地方动员、扩兵、补俘的计划，及后备兵制度的建立；机要通信制度的统一规定，特种情报机构的建立及调度；后勤系统的建立，兵工生产计划的确定等8项，“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军委，但各地各军区野战军或兵团得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决议》同时还规定其他方面8项，“由各军区、野战军或兵团提建议，请示中央军委批准执行。”^②这个决议对于适应当时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保证全党全军所执行的各种政策的完全统一、及军事计划的完满实施，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具有深远的意义与重大作用。

实践表明，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了请示报告制度，和毛泽东关于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一系列指示，全军实现了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与统一纪律，从而保证了军事计划的实现，取得了战争新的伟大胜利。

^① 中共中央1948年8月22日对东北局关于执行报告制度的检讨的批示。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年），第356—367页。

第六章 南线战局重大发展，中原军区暨野战军的成立

第一节 “中原三军”联合作战计划 与主力一部跃进江南的方案

一、国民党军加强“清剿”，妄图彻底摧毁大别山解放区

蒋介石、白崇禧从1947年11月27日开始对大别山解放区实行第一期大规模“围剿”，到12月28日止，历时1个月零2天，虽然占领了大别山区的县城和主要村镇，但是消灭或者驱逐刘邓大军的的目的并未实现。刘邓大军虽然失去了城镇，分散了兵力，也未能给国民党军以歼灭性打击，但是保存了有生力量，仍在大别山坚持。这是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也是他最不甘心和害怕的。

对大别山区第一期“围剿”刚一结束，蒋介石、白崇禧就于12月29日在汉口召开了“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汉口。他说，此行目的，“是要听取大家对于第一期作战经过的报告和意见，作为统帅部决定第二期作战计划的张本。”^①白崇禧对整个战局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对大别山区实行第二期作战计划。他说：“现在清剿期间我们应当在僧塔寺、滕家堡、宣化店等要点构筑工事，架设铁丝网，每一要点，分派兵力固守，先将太湖、英山、罗田、麻城以南接近长江方面的匪军肃清压迫往北，然后积极修复交通公路，如商城到麻城，黄陂到河口，宣化店到

^① 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纪实》。

罗山，中馆驿到经扶，黄陂到李家集，各线南北东西的公路，大别山外围由桐城通舒城安庆，六安到商城潢川的公路，分别修复，一面加强通信无线电以外，将有线电随国军进展架设，凡我军到达一处，即协助民众组训，建立地方自卫武力，来配合军队实施清剿。”^①

在研究今后大别山区“剿匪”计划时，蒋介石说：“据我近来研究的结果，认为有一个方法绝对可以打败匪军占‘面’的阴谋。这个方法就是古人所谓‘筑寨并村’的方法。即就地理形势，选择重要的地区，将其中已有的一个村落加以扩大，并构筑防御工事，然后将其附近十里或二十里的村落并入，而形成中心寨，其他的村落并不必拆毁……不过要将粮食物资，集中于中心寨，加以严格的管理。一旦匪军窜入，则附近村落的人民，必须进入中心寨，共同防御。这就是并村筑寨的大意。”蒋介石还认为，“要实行筑寨并村，必须注意培养地方自卫武力”，“着手组织民众自卫队”，“今后大别山区各县城，皆须留正规部队驻扎。在目前尚有大股匪军流窜之际，每县驻军应以团为单位。将来匪军主力击破，实行追剿之时，应视为第二期。第二期中，各县驻军以营为单位。到了匪军主力已被消灭，实行清剿散匪，则为第三期。第三期应以连为单位。”^②

参加会议的武汉行辕、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以及第5绥靖区和各整编师，均提出了许多对付人民解放军的方法。归纳起来有如下几项：

其一，应针对刘邓大军的“分遣与集中”，“彻底实施分合战法，匪分则我分头穷追猛打，匪合则我应集结二三个师以上兵力，讲求相互连系，以期彻底打击匪军”，寻求局部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其二，本军“不宜孤军急进，宜可步步为营，免为所算

^① 《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记实》。

^② 同上。

以争主动。”其三，“交通剿匪为目前唯一要途，倘铁路一经破坏，不仅修复不易，转用兵力更为困难”。因此，必须“保持平汉线以期转用容易，争取战机”，“完成大别山公路网以利清剿”。其四，鉴于“目前江南空虚不可轻忽”，应加强长江防御。“虽长江天堑，但有不可越的山，无不可渡之水，漫长江防，未有不可乘隙而渡者”。其口号应是，“剿匪第一阻匪南渡长江更为第一”。其五，培植地方武力，组训民众，迅速建立第三线兵团，“编成劲旅以应战机”。其六，“武汉为全国交通经济文化军事之中心枢纽”，应抢筑必要防御工事。

蒋介石要求他的将校们，“按照统帅部预定的计划”和他在检讨会议上的“指示”，“同心一德，加紧努力”，“使流窜大别山区的匪军，完全消灭。”^①

为着实施总体战的新战略与彻底消灭刘邓大军，国民党军统帅部还对整个华中（即中原）战区重新作了部署。

第一，将华中战区划分为 8 个绥靖区，即属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的第 4 绥靖区（开封），辖整编第 55、第 68 师；第 6 绥靖区（商丘），辖整编第 24、第 74 师；第 14 绥靖区（阜阳），辖整编第 58 师。属武汉行辕的第 15 绥靖区（襄樊）；第 21 绥靖区（宜昌）。属陆军总部郑州指挥部的第 13 绥靖区（南阳），辖整编第 9 师。属九江指挥部的第 5 绥靖区（信阳），辖整编第 28 师；第 8 绥靖区（合肥），辖整编第 46 师。

第二，将主力部队编成 6 个机动兵团，即属国防部徐州指挥部的邱清泉兵团（亦称整编第 5 军），辖整编第 5、第 70 师。属国防部郑州指挥部的孙元良兵团（亦称整编第 47 军），辖整编第 41、第 47、第 38 师。属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的张淦兵团（亦称第 3 兵团），辖整编第 7、第 48 师；张轸兵团，辖整编第 10、第 20、第 85 师；胡璉兵团（亦称整编第 18 军），辖整编第 11、第 3 师。属

① 《大别山区剿匪检讨会议记实》。

西安绥靖公署的裴昌会兵团（亦称第5兵团），辖整编第1、第30、第36、第65师、第206师^①。

全部兵力为37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军共86个旅，66万余人，为其全国各战场中兵力最多的一个战场。

国民党军的上述部署表明，其作战要旨是：保持津浦路，以平汉、陇海路作为分割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十字架”和伺机进攻中原解放军的依托，仍置作战重点于大别山区，企图使解放军不能在大别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巩固其长江防线，确保江南基本统治区的安全。

二、“中原三军”联合作战计划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对大别山区的“围剿”，迫使其从大别山区抽走13个旅之兵力，但是，白崇禧彻底摧毁大别山解放区的决心未变，他仍以重兵压在大别山区。整个中原战场形势是交战双方处在拉锯状态，而大别山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正像毛泽东所说，“现在南线最紧战场是大别山，该区是否能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②而“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③

改变战局的关键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只有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协力，在一二个月内歼灭国民党军数个旅，“方能开辟胜利解决之道路。”^④也正如刘伯承、邓小平多次所说，“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与巩固，必须取得几次带决定性之胜利。”^⑤“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必须歼击桂系至少一个师才行。”^⑥因为，“桂系对我危害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附件：《国军作战序列概要表》，1948年1月。

② 毛泽东、陈毅1948年1月27日致中共华东局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60页。

④ 同上，第360页。

⑤ 邓小平1948年1月15日致毛泽东电。

⑥ 刘伯承、邓小平1948年1月19日致毛泽东电。

最深。”^①“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②只有打歼灭战，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才能粉碎其“围剿”、“追剿”、“清剿”，发展壮大自己，建立巩固根据地。

要想取得几次带决定性的胜利，就不是靠打小仗能获得的，必须打中等的或较大规模的歼灭战，而要打中等以上规模歼灭战之首要条件是集中兵力。单以刘邓、陈粟、陈谢三军中之某一军的力量是难求得的，必须三军联合，发挥整体力量。为此，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经过反复磋商，制定了“三军”联合作战计划。

1948年1月2日，中央军委首次提出“三军协力”，打歼灭战的意见：甲、刘邓在内线于本月内开始集中相当兵力以寻机歼敌2个至3个旅为目标。乙、刘邓之第1纵队仍在淮河以北执行钳制任务，必要时配合粟（裕）陈（士榘）、陈（赓）谢（富治）作战。丙、粟陈、陈谢已会合之各部统在确山、许昌之间集结休整若干天，吸引敌人于自己周围，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准备寻机歼敌一路。如南面无好打之仗，许昌之敌好打则打许昌之敌；如许昌之敌不好打，则考虑以粟陈部攻占南阳，陈谢部攻占襄樊，吸引白崇禧部向西，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寻机歼灭向西之敌一部。同时让敌重占许昌、确山段，以利尔后粟陈回师歼其一部。陈谢占襄樊后与占郟阳之刘金轩旅（第4纵队第12旅）打通联系，在汉水中段建立自己的巩固后方，以利尔后向渭南之行动（在大别山困难已获初步克服之后），并协助王宏坤、赵基梅两纵开辟桐柏江汉两区。如果我军采取此项行动，还可能分散白崇禧一部向宜昌一带布防。丁、华东野战军第8、10纵队及晋冀鲁豫第11纵队于攻克菏泽后休整若干天即举行徐蚌段破击战役，该三纵在两个月内即

① 邓小平1948年1月15日致毛泽东电。

② 刘伯承、邓小平1948年1月26日致粟裕等电。

在徐蚌东西、郑徐南北地区单独作战，不要盼望主力向东^①。毛泽东估计，粟陈、陈谢两军向南阳、襄樊行动时，可能把整编第10、第20、第9师等部共5个旅吸引到西边去。

1月9日中央军委就中原地区今后二三个月的作战部署，致电刘、邓，粟、陈、唐，陈、谢等：“为着在两至三个月内歼敌十个旅左右，协助刘邓建立大别山、桐柏山、江汉等处根据地，协助陈谢建立豫西南、鄂西北、陕东南及豫西根据地，协助彭张^②建立渭北根据地，并破坏津浦路，扩大豫皖苏根据地，协助苏北、苏中作战之目的”，部署如下：甲、第一阶段，（一）刘邓集结相当力量，粟裕3个纵队（4纵不在内），陈谢不少于5个旅于25日以前休息整训完毕，25日以后，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相机攻占南阳、镇平、内乡、淅川、邓县、新野、襄阳、樊城、宜城、南漳、光化、老河口、谷城、均县、郧阳、西坪、卢氏、商南、商县诸城镇，相机歼灭该区敌人，并吸引白崇禧军一部西进相机歼灭之。（二）刘邓在大别山、淮北各部集结相当力量相机歼敌。（三）陈粟第8、第10、第11纵及第4纵分别在陇海汴徐线以北及沙河流域休整1个整月，然后以3个纵队在徐蚌线东西、郑徐线南北相机歼敌，并大破该两路。（四）彭张主力（8个旅）于本月休整完毕，下月初开始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为目的。乙、第二阶段，陈粟部及陈谢部在豫鄂陕边地区休整一时期，然后陈谢部向渭南行动，陈粟3个纵队并加入1个纵队向北行动，相机攻占郑州、潼关间各城镇，歼灭该线敌人。刘邓在现地相机休整及作战；陈粟之第8、第10、第11纵仍服原任务，准备从山东调第2、第7两纵队至苏北作战，待华中分局成立后，该两纵归陈粟指挥。丙、第三阶段，陈粟部准备在郑潼线上休整1个月至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60—361页。

^② 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

2个月，然后向平汉线上及平汉、津浦之间作战^①。

毛泽东强调指出，上述“西南十余县是一个宽大机动区域。有山地，亦有平地，有缺粮区域，亦有富足区域。敌情不甚严重。分几个步骤，争取攻占南阳、淅川、西坪、卢氏、襄樊、老河口等城，争取歼灭六十五师及其他敌人及地主武装。”同时，“要准备打九师、十师、二十师等部的增援。增援到了看形势，好打就打，不好打就机动，临机决定。”毛泽东要求粟裕、陈士榘，“应当放胆指挥”，对不大之敌，粟陈、陈谢两军分区行动，对较大之敌（仍然只打中等规模之仗），则合同行动。“总之一切由你们相机处理。”^②在粟陈、陈谢两军向西南行动前，刘邓大军仍以原态势分遣休整，待两军1月25日西进，并作战一时期，确实调动相当多的敌人向西，刘邓大军确有歼敌良机之时，即集中兵力作战，时间大约在2月10日前后。

这时，敌情稍有变化。白崇禧1月9日致电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奉蒋介石令，郟阳被陷，老河口为战略要地必须坚守，该处兵力单薄，岌岌可危。白崇禧命令张淦于3日内抽调整编第56师之第163旅、新17旅等部开均县；令整编第85师之第23旅开襄阳。毛泽东获悉上述情况，于1月12日24时致电粟裕、陈士榘、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整编第85师23旅主力由应城开襄阳距离甚近，数日内可到；整编第56师主力由麻城、汉口之间开均县，距离甚远，似要10天以上才能到达老河口一带。因此，请粟裕、陈赓考虑，“你们两军是否缩短休整时间，由现地取捷径，先机包围襄樊、老河口，并准备于野战中歼灭五十六师（暂时不打南阳）；或者让五十六师占领均县，你们仍按原计划休整至二十五日，然后逐步西进，先打南阳，再打汉水中段。二者以何为宜，望考虑决定。”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69—370页。

② 同上，第372—373页。

粟裕于1月13日20时回电中央军委说：“我们部队现在许昌、临颖以东及鄢陵之线休整，由此至南阳需六天，至襄阳则须十一天或十二天，时间来不及而敌已先到，同时部队炮弹炸药手榴弹等尚未补充（已在途中），该区地图全无（我们正赶印中），最快尚须一星期才能行动。”因此，建议以陈谢部先向西南活动，“吸引敌人西去，我们于准备工作完毕后，即向信阳进击，以吸引敌人来援而歼灭之，并相机攻占信阳及其以南之线，以威胁武汉。总之，以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之。”中央军委同意粟裕的意见，指示应“充分准备然后出动，让敌先占均县一带不要紧，粟及陈谢两军仍休整至二十五日，陈谢不要先出动。”还指出，“既然决定不去抢占汉水中段，敌情又不紧张，如果粮食条件能解决，刘邓、粟陈唐、陈谢三军应争取休息一个整月”，“按照我们三个月三军配合作战方针想好并确定下步作战计划。”^①

遵照中央军委“想好下步作战计划”的指示，粟裕在1月22日向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提出了“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关于作战，他说，现在国民党军“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因此，粟裕提议，刘邓、陈谢和粟陈三军，“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的歼灭敌人一路……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管见是否有当，请示知。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关于建军，粟裕建议提高部队攻坚技术与攻坚炮火，训练大批技术兵种，“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

^① 毛泽东1948年1月14日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并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小平电。

界限之分，减少与消除指挥者及被指挥者相互间之顾虑与打破本位主义，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效能。”^①

为着配合粟裕、陈赓两军的行动，刘伯承、邓小平令部队集结休整，待粟、陈两军2月初行动，“敌人略有调动，即向敌弱点进攻，打开战局。”但是，白崇禧发现刘邓大军集结后，又部署5个整编师主力寻找作战。其时，粟陈两军改变出击计划，先向潼关、郑州段作战，故暂时不能减轻大别山之负担。而在敌几个强师压迫下，刘邓大军是无法集中兵力作战的。因此，刘、邓提出如下意见：（一）粟陈两军按原计划，或直沿平汉路南下，调动敌人，“以便我们集结”。（二）或按新计划，粟陈两军出郑潼线，“尔后再支援我们，但时间千万不宜过长，以一个月为期。”（三）或三军各自寻机歼敌，“我们野战军采取宽大机动，或出淮北，或出汉江、桐柏，其利得多，但大别山要受到很大摧残。”^②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前线指挥员的报告和建议，于1月26日确立了“南线三军三个月作战的方针”^③，其要点：（一）粟裕陈赓两军于2月开始新的作战，2、3、4月内可举行三次至四次较大战役，歼灭大批敌人，即可有力地帮助刘邓。（二）刘、邓在3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3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3个月内，粟陈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国民党军队，首先配合大别山为原则。（四）西北野战军于2月8日以前从清涧以北开始南进。（五）山东兵团第7、第9两纵休整完毕后，由胶济线向苏北出动。“今后苏北、苏中可形成一重要战

① 《粟裕军事文集》第344—346页。

② 刘伯承、邓小平1948年1月26日致中央军委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75—376页。

场，威胁京沪。”^①

上述三军联合作战方针与部署，有这样的特点：一是为着确保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与巩固，中原三军实行联合作战，仍保持1947年11月间确立的格局，内外线配合。二是刘邓大军主力在大别山区内线，先分散打小仗，根据敌情变化，逐步集中兵力打中等规模之仗。三是粟裕、陈赓两军在外线，密切协同，以配合刘邓大军为作战第一任务，其机动范围包括长江以北，平汉路以西，秦岭以南，仍打中等规模之仗。四是开辟两个新战场，一个是山东兵团以一二个纵队南下苏北，同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2个纵队会合，形成苏北战场；一个是西北野战军南下渭北，开辟渭河以北，洛河以东战场，从两翼配合中原战场。毛泽东预计，实行上述计划，可以将进攻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调动一部向西、向东。

三、以一部分主力跃进江南的方案

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在确立南线三军联合作战计划之后又做出由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第1、第4、第6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创建闽浙赣根据地的决策。同时提出了为执行该项任务的3个方案：（一）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粟裕率叶飞、王必成、陶勇3个纵队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士榘、唐亮指挥第3、第8纵队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打整编第85师等部，掩护粟裕军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二）2、3、4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山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铁路以西地区。除作战外，粟裕率叶、王、陶3个纵队在该地区争取休整1个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第3、第8纵队及陈赓主力在江北任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点是敌人可作准备。”（三）2、3、4月至伏牛山、长江之间作战，5月全军北返，粟裕率叶、王、陶3纵队择地休整二三个月，秋季渡江。“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75页。

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粟裕“熟筹见复”^①。这个决策，是毛泽东与陈毅研究后作出的。

毛泽东认为，以主力一部跃进江南，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远后方，“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同时指出，粟兵团“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②

关于渡江地点，中央军委提出以下几处供粟裕考虑：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

粟裕经与陈士榘、唐亮详细研究中央军委指示后，于1月31日致电中央军委，坚决拥护以主力一部渡江南进的方针，同时就如何执行提出了建议并积极进行准备。关于渡江时间：根据华东野战军目前状况，即行出动渡江南进比较困难，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将叶、王、陶3个纵队调到陇海路附近继续休整1个半月，到3月下旬出动；二是叶、王、陶3个纵队仍照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二个战役，3月中旬起休整1个半月或2个月，到5月中旬出动。关于渡江路线，也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由武汉以西渡江，好处是江面狭小，易于渡过，易于阻击蒋军兵舰，缺点是到闽浙赣远，一路去要减员一半。二是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南京至江阴之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缺点是江面宽敌防御严，好处是江南江北我群众基础好，叶、王、陶纵的干部对江南江北地区均较熟悉，渡江后主力向闽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亦可调动敌人^③。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71—272页。

② 同上，第272页。

③ 《粟裕军事文集》第350—353页。

2月1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一）“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即叶、王、陶3个纵队开陇海路附近再休整1个半月，5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取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二）“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三）请饶漱石、邓子恢“帮助粟裕解决南进有关诸问题。”^①

2月4日，来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的陈毅，告别住了1个月的杨家沟东返，行前，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个手令面交他。其内容是，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东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兼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为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1兵团辖第1、第4、第6纵队。第3、第8、第10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2兵团，兵团领导人选另定，准备1949年二三月出发。同时决定，粟裕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金明为副书记。

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华东局、邯郸局（晋冀鲁豫中央局）电：邯郸局已筹白洋100万给粟裕，请再拨200万。指出，粟裕手中有300万白洋、5000两黄金，一方面可给各单位作过江及必要时的开支，另一方面可作发行军用流通券的基金。粟裕过江后，应准备成立东南银行，俟根据地建立后再印正式钞票，回收军用券。这样，就能够克服无后方作战的困难，解决部队供应问题。

派野战军主力纵队跃进江南作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就有所考虑。

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电报里，除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外，还令叶飞、陶勇2个纵队（第1、第4纵队）“出闽浙赣，创立闽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85页。

浙赣根据地。”^①其步骤，第一步，出鲁西南；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但是，9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半年内，不拟派一、四纵去江南。”^②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中原呈品字形展开。毛泽东判断“战局可能发展得快”，于10月15日致电陈毅、粟裕，“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③11月20日，陈、粟向中央军委如实汇报了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区的情况：“部队南下后，脱离后方，无休息整顿，连续作战，艰苦疲劳，情绪受影响，打了几个胜仗后逐渐好转。但部队水土不服，患南方疾病多，且缺乏药物治疗，伤病员安置无安全保障等困难，严重存在，从而影响指战员决心与信心。有的部队风闻要南渡长江也有不安心现地工作的。”^④表明派部队南进有困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华东部队的情况，和白崇禧集中兵力围攻大别山区，于11月28日致电粟裕（陈毅已去中央工委），“在明年八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⑤12月4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你们全军（除陈谢）明年八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明年八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147页。

② 《陈毅传》第400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07—308页。

④ 《陈毅传》第401页。

⑤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56页。

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①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粟裕率3个纵队跃进闽浙赣边区，这已经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第三次作出跃进江南、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远后方的战略决策了。这也是对南线三军联合作战计划的发展。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和钟爱向江南作战略再跃进的主要原因是：其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成功，一举扭转了全国战局，使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由被动转入主动，证明跃进战略有其独特战略价值；其二，1948年春，中原战局呈相持态势，刘邓大军主力在大别山的处境仍相当困难，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减轻大别山方面的压力，如大别山根据地不能建立与巩固，战略进攻以来获得的成就将半途而废；其三，中共中央预定用5年左右时间打倒蒋介石，要实现此目标，需要再来一次大的战略机动。据此，中央军委认为以主力一部向江南跃进，一可迫使国民党军将其中原精锐一部抽回江南，减轻中原三军特别是刘邓大军的压力，在中原造成打较大歼灭战佳机，打破僵局；二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区腹地，动摇国民党军心，鼓励、加速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蒋斗争，加快蒋介石统治集团走向崩溃；三可为日后主力挺进江南打下基础，加速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进程。

第二节 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粟裕兵团转至黄河以北，洛阳战役

一、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

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如果尚在大别山，似宜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你们三个纵队、陈唐四个纵队、陈谢一个半纵队，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38页。

共八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这是因为：（一）粟裕准备机动；（二）你们准备派两部机动；（三）将敌人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等机动，并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放手发展；（四）北面缺乏指挥中心；（五）北面有巩固后方，可为依托，利于打歼灭战；（六）必须打歼灭战才能解决问题。”要求刘、邓“统筹见复。”^①刘邓大军指挥部，自白崇禧大举“围剿”大别山区后，分成前方和后方两个指挥所。2月8日，后方指挥所刘伯承、张际春等致电中央军委和在大别山前线的邓小平，建议将中原领导机关转移到豫西。电报说：“最近中央把渠唐、陈谢一并划归我们指挥，领导分散，不集中”，“为了全面领导指挥的便利，是否可以考虑把中原领导机关转移至豫西和桐柏。”邓小平收到中央军委2月7日电后于9日复电，赞成将指挥所转出大别山。他说：“我野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行动，实属必要。”但主力兵团不宜过早转出大别山，须再在大别山打1个月圈子。“我们指挥所，则拟相机移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②

为了保持大别山根据地已经打开的局面，使皖西、鄂豫两军区部队做好独立坚持斗争的准备，防止主力抽走后可能引起波动，2月22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2个月来，军区及地方部队配合主力反敌“清剿”、“扫荡”，坚持大别山阵地，获得不少成绩。但为了大量歼敌，野战军主力不能长期分散，必须适时集中，出入大别山外围与内部机动。这就要求“军区部队、地方与人民武装，今后独立自主的强化更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分散之敌人”，保护群众，并配合主力运动战，大量歼敌。为此，军区及地方武装必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88页。

② 《从延安到北京》第278--279页。

甲、提高全体军民的胜利信心与顽强斗志；批评和反对那些软弱无能、依赖主力、不积极歼灭敌人、消极等待敌人退走的右倾思想及和平建设根据地的思想。

乙、敌人必会恢复并依托保甲统治之基础，强化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或游击网，在短时间内，敌情可能有一度紧张，因此，要在思想上、组织上预有准备。

丙、健全各区各级党、政、军、民一元化游击集团的组织，首先是县级及其以下的基层组织。

丁、使游击战争（摧毁保甲）与土改密切配合。

戊、在游击战术中要发扬：（1）好击必击，不好击就游。而击，必采取进攻的伏击、袭击、急袭，并无防御。游，必须采取以弯为直的行动，不可老走一路，不可老驻一地。（2）以分耗集，以集灭分，声东击西，攻敌不备。（3）查明敌情，研究规律，扑灭弱敌，防逃断援。（4）大胆依靠群众，武装他们，带领和教育他们游击。（5）强化侦察，清除谍报网、便衣特务，号召群众破坏公路网和碉堡网。（6）断绝敌人补给线，夺辎重，捉俘虏^①。

邓小平等布置好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之后，即率前方指挥所离开大别山。2月19日，报告中央军委说：“我们即过淮河”。22日由淮南抵达长岭集地区，并继续北进。与此同时，刘伯承等率后方指挥所由沈丘东北之梁营移临泉以南之韦寨地区。24日，刘、邓胜利会师于韦寨。邓小平关切地询问刘伯承的健康状况，刘伯承幽默地说：“没啥子事，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②25日，刘邓大军指挥部移驻临泉以南之吴营。3月10日又移驻临泉东南之油房庄，在此地驻至4月初。4月4日开始向西转移，13日进至叶县以东10公里之郭店，23日移住郭店以西之姚寨。5月下旬，中原局、中原军区移驻宝丰县赵官营、

^① 《从延安到北京》第280-281页。

^② 《刘伯承传》第427页。

北张庄等地。

刘邓大军指挥机关进入豫西，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豫西地区虽然比较贫瘠，但不像大别山那么动荡，也不像淮西那么容易遭到国民党军的袭扰，且同黄河以北的华北解放区相连，后勤供应比较有利。刘、邓在此指挥中原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个比一个更大的胜利。

刘邓大军指挥部转出大别山后，留在大别山区的第2、第3、第6纵队也相继转至淮河以北。

1948年2月中旬，这3个纵队均以旅为单位，分散活动。第2纵队，在河南省东南部的固始、商城、经扶（今新县）之间地区；第3纵队，在鄂东的英山，皖西的桐城、舒城、霍山之间地区；第6纵队在鄂东麻城、罗田、浠水之间地区。从2月下旬开始，第2、第3、第6纵队开始集结，准备北渡淮河。2月25日，第2纵队进至固始以北地区。28日，第6旅由泉河铺附近，纵直与第4旅由地理城以南渡过淮河，与在河北的第1纵队会合，3月4日到达新蔡东南之谢家集。这是继第1纵队之后第二个转出大别山的野战纵队。

正当第3、第6纵队集结之际，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沙河以北的华东野战军发起攻击。淮河之南的国民党军也有北渡协同进犯沙河以北解放军的征候；淮河、沙河之间地形多河流，且粮食困难，不利于大兵团集结作战；白崇禧发现第3、第6纵队集结，即以其主力整编第7、第48师扫荡皖西、鄂东。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第3、第6纵队暂时留在大别山区一个时期与敌周旋，并指定浠水、罗田、立煌、固始以东为第3纵队机动区域，以西为第6纵队机动区域，要求这2个纵队按具体敌情、粮食状况，适当分遣集结，寻机打有把握的小歼灭战，并牵制淮河沿岸之敌，策应北面之作战^①。3月6日，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致电

^① 刘伯承、邓小平1948年3月5日致第3、第6纵队电。

刘、邓，提议第3、第6纵队适时集中，协同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个旅以下之兵力。刘、邓“完全同意”这个建议并决定第3、第6纵队协同作战时，由陈锡联统一指挥。同时指出，第6纵队及第3纵队第9旅应稍北移，准备可能时跨淮河补整，第3纵队应控制1个旅于滕家堡、三河口线以北，准备可能时向固始、商城间转移补整。据此，第3、第6纵队一面战斗，一面逐渐向北转移。3月27日，第6纵队全部和第3纵队第9旅渡过淮河，进至王化集、五花集、龙王庙一带。28日，第3纵队司令部及第7、第8旅北渡淮河，进至张老庄、薛集、白果园、双碑湖地区。

至此，刘邓大军从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又全部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转战大别山、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伟大战略任务。为完成这项任务，刘邓大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出征时，全军（辖第1、第2、第3、第6纵队）共12.4万余人，其中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第1纵队3.3357万人，第2纵队3.1万人，第3纵队2.6468万人，第6纵队2.6322万人。转出大别山后，据1948年3月统计，人员方面：野直属部队1938人，第1纵队1.7042万人，第2纵队1.2418万人，第3纵队1.3208万人，第6纵队1.4016万人。共计5.86万人（不包括各纵队留在大别山转为军区武装的人员）。武器装备方面：轻重机枪1518挺、山炮23门、炮弹1089发，重迫击炮2门、迫击炮74门、炮弹5698发。山、野、榴等重炮均损失了。全体指战员非常疲劳，极需休整补充，恢复战力。“一些后来在豫西见到邓小平的老同志回忆道：刚从大别山转出来的邓小平衣着黄旧，又黑又瘦，唯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①

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来到淮河以北地区后，指战员中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情绪，集中表现在对以下三个问题上：一是对

① 《从延安到北京》第289页。

全国战略形势的看法，认为战略反攻（当时均如此称谓）早了，胜利小了。二是对跃进大别山、坚持大别山斗争意义的认识，说什么“前进了一千里，后退了五百里”，南进失败了。三是担心、害怕美国政府直接出兵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这些问题，如不迅速解决，刘邓大军继续完成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经略中原的伟大战略任务将受影响。为此，中原局和刘伯承、邓小平用很大精力，教育部队，端正全体人员的认识。1948年3月6日，邓小平在临泉县韦寨向野战军直属队干部作了《关于反攻形势和整党问题的报告》。3月11日，刘伯承到第2纵队驻地临泉县东南老集，向该纵队连以上干部作了《关于整党与新式整军的动员报告》。4月17日，刘伯承在野战军直属队及第3、第6纵队干部会上作了《关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问题》的讲话。4月25日，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召开的中共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作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这些“报告”、“讲话”，深入浅出地集中地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

针对第一个问题，邓小平指出，首先应当从战略意义上看，我们从内线防御转到外线进攻，解放了4500万人民的中原地区，全部打破了蒋介石反革命的战略阴谋，迫使他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战争第一年在解放区里打是必要的，一方面是为了歼灭敌人，同时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战斗力，但当我们大量歼灭了敌人，并已经取得了丰富经验的时候，就一定要转到外线去，不如此，就不能粉碎蒋介石的战略进攻，也不能扭转战争的车轮。我们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面打出来了，完成了这个战略任务，胜利是多么伟大呢！邓小平说，其次从胜利战果方面来看，第一年全军歼灭国民党军队112万人，从1947年7月至1948年2月的仅仅8个月中全军就已经消灭国民党军90万人，第二年歼灭敌人的数目，一定会超过第一年。因此，又有什么根据说，反攻出来胜利不如去年大了呢？邓小平强调，从战略意义上和胜利战果上看，就会承认反攻一点也不过早，恰恰正是时候，有什么理由把反攻推迟，让

解放区再消耗一年，让蒋介石仍保持完整的后方呢？即使拖迟代价还是一样要付的，那时可能还付得大些^①。

刘伯承也指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就是要扭在我们解放区里打，消耗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趋于枯竭，走向失败。”“毛主席的战略指示：开始第一年是内线作战，也必须在内线作战，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以后，转入外线作战，也必须是转入外线作战，步骤是明显的。”^②刘伯承认为，1947年6月30日南渡黄河，实行战略的中央突破“不是过早，而是一定要突破。于是三支大军一同出动，即陈粟、陈谢和我们摆成一个鼎足的形势。古人说‘中原逐鹿’，现在中原就是逐鹿场。”^③

针对第二个问题，邓小平指出，有的同志认为部队来到淮河以北，是“前进一千里后退了五百里”，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甚正确的。我的说法是“前进了一千里，又前进了五百里”。因为大别山仍然在坚持，并没有放弃，而且今后还更要坚持。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不是在大别山站不住，而是说明大别山的斗争已经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前进到主力已经可以逐步抽出集结机动作战^④。邓小平在4月25日报告里又指出，“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布置，留下的军队散布在每个角落，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站住了脚，敌人无论如何打不走我们了。”^⑤

① 邓小平：《关于反攻形势和整党问题的报告》，1948年3月6日。

②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00页。

③ 同上，第401—402页。

④ 邓小平：《关于反攻形势和整党问题的报告》，1948年3月6日。

⑤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9页。

刘伯承教导指战员，“我们要从全局来看大别山，全局的胜利，我们是其中的一份。打仗有的吃肉，有的啃骨头，过去山东啃骨头，我们在冀鲁豫就吃肉，这次我们也啃一次骨头，就好像输不起一样，这是什么思想方法？”^①

针对第三个问题，即关于美国直接出兵帮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的问题，邓小平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报告里说：“最近，恐美病似乎有发展。有的人说，给蒋介石几万万美元和枪炮，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多大用处了，现在就是怕美国出兵，怕美国的原子弹。很多同志不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以为美国出兵凶得很，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要不得的。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革命纲领、革命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怕帝国主义？不要说美国出兵不是那样容易，就是出兵，我要反问：你还革命不革命？还要不要反帝这个纲领？还够不够得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②

刘伯承、邓小平强调指出，在一些指战员的头脑里之所以产生上述错误认识，“这确实确实是思想方法不对。”^③具体说，就是不能全面看问题，从本质上看问题。只“凭自己的直觉，从一个角落，一个局部来看问题”，“只看到我们这一块”^④。“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面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⑤

刘伯承、邓小平的报告，极大地教育了全体指战员，使他们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0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4页。

③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06页。

④ 邓小平：《关于反攻形势和整党问题的报告》，1948年3月6日。

⑤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99—100页。

增强了斗志和胜利信心。通过听报告和举办集训班等形式的深入学习活 动，全体指战员认清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认清了大举进攻后在全中原地区取得的伟大胜利；懂得了从本质上看，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害恐美病是可耻的。

二、粟裕兵团转至黄河以北

1948年2月4日，粟裕电告陈赓、谢富治，“我奉军委令另有任务，已率一、四、六各纵开陇海路北地区，三、八纵仍留漯河、许昌休整，由渠唐^①统率。今后你们及渠唐兵团奉军委令统归刘邓指挥。”

国民党军陆军总部兼徐州司令部总司令顾祝同，发现华东野战军一部在陇海路北休整，即令邱清泉指挥整编第5、第75、第84、第70师及第1快速纵队（新编成的）向陇海路北进扰，企图寻找解放军决战。为着不影响部队休整，以利尔后行动，粟裕于2月16日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等，“令一、四、六纵队避免作战”，并令第10纵队及晋冀鲁豫第11纵队“即向南转入豫皖苏地区，以求调转敌人，并与陈唐会合，以便接受刘、邓之作战。”19日，中央军委指示粟裕：“如鲁西南被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纵等三个纵队可考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粟裕遂遵中央军委电示，将第1、第4、第6纵队渡黄河至濮阳周围地区休整，留两广纵队于鲁西南地区。3月16日，第1、第4、第6纵队全部达到指定地区。

第1、第4、第6纵队北渡黄河后，第3、第8纵队则转至平汉铁路以西，于3月6日分别进至登封、临汝、宜阳以南地区集结，准备与陈谢集团执行郑潼线作战攻克洛阳的任务。第10纵队及晋冀鲁豫第11纵队，于2月底进至淮阳以东地区，改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

^① 渠唐，指陈士榘、唐亮。

华东野战军领率机关与第1、第4、第6纵队到达濮阳地区后，即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三、洛阳战役

蒋介石围歼刘邓大军主力于大别山区的计划，因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移至沙河、淮河间地区而破产了。然而，蒋介石并不罢休，他即以胡琏兵团一部自漯河向东，进行袭扰，企图破坏刘邓大军主力休整；以张轸兵团并配属整编第48师，进驻固始、潢川一带，控制淮河南北，隔断刘邓大军与大别山的联系，并以重兵继续“清剿”大别山区。这时西北战场情况发生了不利于国民党军的重大变化，西北野战军在宜川、洛川地区发动强大攻势，使蒋介石、胡宗南坐卧不安。

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掩护刘邓大军休整，中央军委于1948年2月20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决定“陈唐率三、八两纵至平汉路西与陈谢主力靠拢，陈谢受陈唐指挥，在平汉以西，郑潼以南地区集中十一个旅以上兵力，主动寻求作战机会。”同时还规定，“在刘邓集中整补完毕，并和陈唐、陈谢靠拢，确实建立战役指挥关系以前”，陈唐（包括陈谢）仍受中央军委指挥^①。并要陈、唐，陈、谢提出今后作战计划。21日，陈、唐，陈、谢对今后两个月作战行动提出如下方案：第一步，仍以向郑、潼线行动为好，破击郑潼段铁路，袭占密县、荥阳、巩县、汜水、偃师，威胁郑州，调动裴昌会兵团增援，于运动中歼灭之，相机攻占洛阳。他们认为，此方案好处是，（一）目前可配合彭德怀、徐向前在陕北，晋南的行动；（二）接护陈谢集团补充新兵、弹药、经费，特别是掩护地方干部开展豫陕鄂区工作，再经几次行动后，豫陕鄂区即可与黄河以北老解放区取得密切联系。第二步，南下南阳、裴樊。22日，中央军委复电陈、唐，陈、谢，指出，目前两星期内你们的任务是箝制整编第11师及其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7页。

他平汉线郑州信阳段之敌，使其不能威胁刘邓主力在淮河沙河间集结及补充新兵，如刘、邓同意你们执行郑潼战役，则可照你们意见，以现有兵力先打郑潼线。3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同意举行郑潼战役，指出，现在邱清泉兵团在菏泽地区清剿，“此为我陈唐、陈谢作战之良机，而我们集结尚须时日，久等会失战机，如陈唐、陈谢先在郑潼段作战，亦可牵制十一师，粟部一、六两纵可牵制五军”，“因此，陈唐、陈谢于三月五日前后即可自行机动作战，不宜再迟。”

西北野战军宜川大捷之后，即向澄城、白水、洛川、中部（今黄陵）、宜君、铜官（今铜川市）进攻；徐向前部正举行临汾战役。胡宗南为保住西安，令裴昌会兵团由潼洛段的新安、潼池、宜阳、洛宁、陕县、灵宝地区全部缩回陕西，以一部守潼关，大部回至西安一带。这样，在郑州、潼关间400公里地段上，只剩下了第206师据守洛阳。洛阳成了一座孤城。根据这种形势，3月7日2时，中央军委致电陈、唐，陈、谢并告刘、邓：“你们率三、四、八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①同日24时，又对洛阳战役的部署作了规定，指出：“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决不会不增援。你们占领黑石关、偃师、新安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敌援兵可能主要是孙元良，十一师亦可能来一部。请刘邓令十一纵速向十一师佯攻以钳制之。”^②

洛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黄河中游、河南省的西部，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地扼秦、晋、豫三省要冲，是陇海铁路中段的重镇，被古人誉为“九州腹地”，“天下之中”，“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为历代兵家所必争之地。洛阳城高壕深，土质坚硬。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15页。

^② 同上，第417页。

国民党军利用该地形特点经过较长时期的准备，构筑了许多不易被炮火摧毁、爆破也极为困难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低平隐蔽工事。这时，困守洛阳的为第206师（辖2个旅、6个团）和郑州指挥部配属的榴弹炮兵连、战防炮兵连、野战炮兵连和重迫击炮兵连。此外，还有河南省保安第4旅和洛阳、沁阳、济源等反动地方武装，总兵力2万余人，统由第206师师长邱行湘指挥。

邱行湘吸取了国民党军在东北四平和山西运城作战失利的教训，进一步完善了守备设施和火力配系。他认为，战斗开始后，各据点之间的联系必会被隔断，因此，在外围要冲地段上的东大寺、潞泽会馆、九龙台、福音堂、东西车站、周公庙和西宫发电厂、上清宫、大王庙等地，利用原有地形和建筑物加以改造，形成“小而坚”能独立支撑、相互策应的“三角阵地”。每个据点配置1个加强排至1个营，屯集充足的粮弹、医药，使其具备独立坚守的能力。城垣主阵地则以城门的瓮城和城四角及两侧为重点，由城垣上众多的地堡、高堡及城墙外设置的中间集团三角堡构成纵横交织的绵密火网。在城西北角的洛阳中学校址，修筑了长宽各100米的核心阵地。工事完成后，邱行湘组织军官进行试射验收，自吹为“金城汤池”。邱行湘在《保卫洛阳告将士书》中说：“洛阳的安危关系整个战局的成败”，要他的官兵“不是成功，即是成仁”。

国民党军统帅部发现人民解放军向洛阳迫近，“有进犯洛阳企图”后，除令第206师“固守洛阳既设阵地，协同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外，3月6日，令胡璉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归陆军总部郑州指挥部主任孙震指挥，“妥为部署确保洛阳。”^① 据此，孙元良以1个旅又1个团加强汜水、巩县和黑石关的防守，兵团主力逐渐向郑州集中；胡璉兵团主力向许昌集结。孙元良一向以保存自己力量为主，在胡璉兵团未靠拢之前，他是不会单独增援洛阳的，而

^①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洛阳战役作战详报》。

胡璉兵团要赶到洛阳前线尚需若干时日。这就为人民解放军夺取洛阳提供了良好战机。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面敌情，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决心以速战速决的手段，争取在援敌未赶到之前，夺取洛阳，尔后再视机歼击援敌之一路。战役决心以夺取洛阳为主，以打援为辅。

3月5日，第3、第8纵队及第4纵队分由禹县、襄城地区向洛阳逼进。

3月7日，战役指挥员陈士榘、唐亮发布洛阳战役的部署命令：“陈谢第四、第九纵队除以一部兵力配合太岳第五军分区地方武装，控制新安、宜阳，扫荡歼灭新安、澠池顽地方武装，并分别向陕州、洛宁地区伸展游击侦察，掌握陕潼方向情况外，其主力于9日24时前完成对洛阳西宫及飞机场及西关、南关之敌的包围，应首先切断西宫与洛阳城之间联系，或首先解决西宫及西关之敌，使其不能退缩城内。”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应于9日24时前完成对洛阳车站、北关、东关之敌包围，力求首先解决洛阳北站和东关之敌，以便主力迫近攻城”；“第八纵队除以一部夺取并控制黑石关至偃师之间两侧阵地外，主力于8日黄昏前进至回郭镇，堤东、府店镇、候氏镇之间地区作预备队，负责阻击可能由郑州西援洛阳之敌。”命令规定“10日开始攻击，力求于12日午前全部解决战斗。”

8日，第8纵队袭占偃师，控制嵩山隘路；第9纵队及太岳第5军分区武装，攻克新安、澠池、宜阳等地。

9日黄昏，担负攻城任务的第3、第4纵队以奔袭手段多路向洛阳逼进。第3纵队从东北两面包围洛阳；第4纵队从西南两面包围洛阳。当夜，第3纵队第8师第23团袭占东关，并以火力控制了东门外护城桥，为尔后迫近城下，突破城门，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10日，第8、第9师相继攻占北关、东北关、和东西车站。第4纵队主力9日夜对西关发动奇袭。攻城部队战至11日，

夺取了洛阳守军大部外围阵地。

洛阳外围作战打响后，国民党军统帅部虽令孙元良、胡璉迅速增援洛阳，但胡璉兵团迟迟未达登封，孙元良兵团不敢单独冒进。据此，陈、唐，陈、谢于3月9日报告中央军委，决心不待外围之敌全部肃清，即于11日黄昏开始对洛阳城垣发起总攻。中央军委在次日复电里指出：“即照你们的决心实行。你们如能在三四天内攻克洛阳，十一师增援是赶不到的。”11师即胡璉兵团主力整编第11师。

11日19时，第3、第4纵队从四关同时发起攻城。担任东门突击任务的第3纵队第8师第23团，根据东门工事较强，防御障碍较多的情况，以第1营为突击营，实施分段连续突击。

为了使东门突击更加有力，该师决定配属给第23团山炮、战防炮各2门，连同团营属步兵炮、迫击炮、六〇炮，共计大小火炮32门，组成2个火力队，直接抵近掩护第1营突击。此外，第3纵队还以3门野炮和第24团的炮兵分队，担任突击前后的火力支援。

第23团突击营第1突击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经过半小时连续突击爆破，炸毁敌人6道防御工事，迅速扫清了城门外的所有障碍，接近瓮城门；紧接着，第2突击队的13名爆破员，实施爆破，炸开了3米宽的缺口，随即和团特务连突入瓮城，于12日0时30分攻占瓮城。

瓮城突破后，邱行湘万分焦急，认为，“这是洛阳战役中成败所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①，他严令第1旅旅长要不顾一切进行反击，夺回瓮城。并亲自指挥重炮对东门行拦阻射击。同时，连电南京向蒋介石告急。然而，邱行湘的防御体系已被冲垮，反击也未奏效。第二道城门又被炸开。至12日2时许，第23团主力

^① 邱行湘：《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4页。

全部攻入城内。整个东门突破战斗，历时7个半小时。1948年7月7日，这个营被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授予“洛阳营”的光荣称号。营长张明被第3纵队评为“甲等战斗英雄”。第8、第9师攻击北门、东北门受阻的部队，立即改由东门突破口突入城内，向北发展攻势。

负责西门和南门攻击的第4纵队第10、第11旅，由于炮兵数量较少，未能有效压制守军的火力，攻城前后又遭守敌火力袭击，伤亡较大，致使11日夜的突击未获成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12日12时，第11旅及第13旅1个团发起第2次攻击，在第3纵队入城部队的策应下突破南门，迅速向城西、城北扩张战果。13时，第10旅突破西门。在夺取西门战斗中，担任第1突击连的第4纵队第10旅第28团2营5连，在弹药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仍然顽强战斗，战后被授予“洛阳英雄连”称号。

战至12日黄昏，除邱行湘指挥残部5000人退守西北运动场核心阵地，以待援兵外，全城已为攻城部队控制。当晚，因彻夜大雨，攻城部队决定暂停攻击，进行整顿。

11日20时，蒋介石致电孙震：“洛阳守军士气旺盛，匪军伤亡惨重，希督饬十八军、四十七军星夜驰援，击灭洛阳附近之匪。”并提醒：“注意匪军围城打援，中途伏击。”孙震接电后，唯恐洛阳失陷后遭受蒋介石加罪，次日复电申述不能及时赴援的原因：“我四十七军自三十八师临时奉命西调后，仅有四个团兵力，黑石关守备至少需一个团，尚余三个团，实无力出击；十八军（附第二快速纵队）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十一日由许昌到禹县，已行九十里，十二日可抵登封附近。至速须十三日可到府店镇附近，与孙军会师，发生策应作用。”蒋介石接电后当即批示：“三十八师即停止空运，车运黑石关归四十七军孙军长指挥，与胡兵团并肩向洛阳急进。”^①并电告邱行湘：“已饬外围兵团兼程驰援，希鼓

^①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洛阳战役作战详报》。

励三军，坚守阵地……。”孙震令孙元良不待整编第38师到达，即积极行动；令胡璉兵团及第2快速纵队于13日向登封附近进击，控制萁林口隘路两侧之地，主力逐次向洛阳跃进。

13日晚，攻城部队对洛阳西北运动场核心阵地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战斗，虽歼灭邱部2000余人，但因协调不够紧密，致使攻击未达目的。14日，陈士榘、陈赓在国民党各路援军逼近洛阳的紧急情况下，令第8纵队继续沿偃师、缙氏镇、府店地区顽强阻击孙元良、胡璉兵团，令第9纵队主力迅速沿洛阳龙门间渡过伊河东进，与第8纵队并肩阻击援敌。经重新调整部署后，攻击部队从16时30分开始对核心阵地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集火急袭。17时，第3纵队第8师与第4纵队第10旅各一部密切协同发起突击，仅经1个小时战斗即告结束。邱行湘在黑暗的坑道里被俘。洛阳外围据点的潞泽会馆和九龙台守军，在解放军政治攻势下放下武器投降，拒绝投降的西宫发电厂守军1个营被歼。

至此，历时7昼夜的洛阳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第206师师部、2个旅、5个整团另4个营和4个炮兵连，以及孟津、偃师等保安团队，共2万余人，缴获美式榴弹炮3门、野炮6门、战防炮10门、化学迫击炮3门、火焰喷射器2个、火箭筒4个，及其它武器弹药军用物资。解放军伤亡6129人。

洛阳战役的胜利，切断了国民党在中原与西北的铁路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掩护了刘邓大军主力的休整，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作战，同时取得了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即是在正确判断敌情的基础上，适时将围城打援改为攻城阻援；采取远距离奔袭与强攻相结合的战法；不等完全扫清外围就集中兵力、火力攻城；攻城时又分多梯队、连续突击，使敌军无喘息之机。

3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庆祝解放洛阳，“尚望继续努力，为解放整个江淮河汉地区而战。”

3月17日，鉴于国民党援军已逼近洛阳，人民解放军在打扫

完战场，将洛阳工事彻底破坏后，主动撤至新安、宜阳、洛宁、渑池地区休整待机。翌日晨，整编第38、第11师及第124旅等部共6个旅的兵力，进入洛阳空城。不久，整编第38师又东调郑州，第11师月底返回许昌，第124旅驻守洛阳至黑石关一线。4月3日，第124旅又率第370、第372团开赴偃师，洛阳城仅剩第371团和洛阳保安团驻守。陈赓、谢富治抓住战机，决心再打洛阳。

4月4日，第4纵队主力进至偃师以西地区，箝制第124旅并相机攻占黑石关。第9纵队第26旅进抵洛阳以东张胡同、十里铺、田家村地域，准备截击洛阳逃敌并由东向西攻击洛阳。5日凌晨，第9纵队第27旅占领上下清宫及洛阳西关。守军十分恐慌，弃城东逃，遭解放军的东西夹击。11时，国民党军被全歼。洛阳从此为人民解放军控制。与此同时，偃师、黑石关、巩县、汜水、荥阳等城镇也相继解放。第3、第8纵队，于4月7日、9日收复许昌、新郑。第二次洛阳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600余人。

解放洛阳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在南线夺取的第一个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为永久地掌握这个城市，毛泽东于4月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提出了管理好新解放城市的具体政策，主要内容是：（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解决。（七）一切作长期打算，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等^①。这些政策，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3--1324页。

第三节 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的成立，粟裕兵团加入中原作战，宛西、宛东战役

一、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的成立

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后由于条件不成熟，未能形成统一的指挥。在中央军委指挥下，三军各自遂行作战任务。但是，到1948年初已经初具条件改变这种状况。此时，刘邓大军主力已转出大别山，三军准备在平汉路以西，汉水以北，陇海路郑州潼关段以南广大区域机动作战。为加强三军作战的指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三军。对于如何开展中原地区的工作，刘、邓作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1948年2月，刘、邓鉴于中原广大地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严重，如豫皖苏地区，“至今毫无建树，也没有干部，对今后大军供应已无办法。而沙河北岸已有灾民二百余万。”国民党的“法币”不断贬值，而解放区发行的钞票与“法币”的比值还不断下降，农民损失惨重。部队的供给纷乱，浪费严重。这些困难如不迅速克服，“则军队供应与人民生活均将产生严重危机。”因此，刘、邓希望中央调一位对土地改革与财政工作富有经验的大员到中原。他们“建议邓子恢同志统一主持中原各区、首先是三部分野战军的财经事宜。”^①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分管地方工作和支前工作。

3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工委并中原局，同意“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并决定，陈毅、邓子恢“加入中原局。”^②

^① 《陈毅传》第415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97页。

陈、邓因为要领导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的工作，用粟裕的话讲，“华东离不开陈军长”，尚难确定是否赴中原局工作。因此，4月2日，刘、邓再致电中央并陈毅、粟裕，“仍切望子恢同志来加强中原局领导，主持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①4月27日，中央军委电告刘、邓，“陈粟二人日内可到阜平和我们会商行动问题，及你们提出的中原机构组织问题。”刘、邓马上又给中央发电，提出了中原机构的人选。他们说：“中原局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三部分野战军在20万人以上，如粟裕迟出，则达30万。军区武装约为20万人，亦须统一指挥及供应。因此，建议：（一）以陈毅同志为中原局第一副书记。（二）组织中原军区。刘、邓对陈毅到中原后的军队职务，提出了3个方案：（一）以陈毅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原野战军司令员；（二）陈毅为军区与野战军第二政委；（三）陈毅作军区第二政委兼野战军政委。”刘、邓还建议：“不管那种形式，陈毅同志华野职务不变。”^②5月5日，刘、邓又一次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原局面太大，情况复杂。现在中原局的能力实难胜任，因此再作如下建议：“（一）请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陈毅、小平分任第二、第三书记。（二）陈毅兼军区第二司令员兼野战军司令员。（三）粟裕如暂留中原，则兼军区副司令员及野战军副司令员。”^③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充分研究了刘、邓，陈、粟等的建议，决定再建中原军区与编组中原野战军。1948年5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华北、中原两解放区的辖区和人选》的通知电中，对中原的决定事项如下：（一）“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均属中原解放区。”（二）“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

① 《陈毅传》第415—416页。

② 同上，第416页。

③ 同上，第418页。

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十二同志为委员。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为分局书记。”（三）“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苏北兵团仍属华东军区建制，但在作战上受华东野战军指挥。”^①

6月26日，中央军委指出，“为使中原局便于经常集中掌握各项重大问题”，中原局应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张际春、李雪峰六人组成常委。并同意邓子恢任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张际春任第二副政委。同意成立中原军政大学，刘伯承兼校长。7月2日，中原局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定和批准的中原局、中原军区各级组织通告所属。除上述各电中人员分工外，还有：张际春兼政治部主任；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际春“四人组成军事指导小组，陈毅为组长”；“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仍任副司令员，陈离职期所兼军政职务由粟裕代理，宋任穷任华野第二副政委”^②；李达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曾希圣为副参谋长。

中原军区下辖：鄂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治委员段君毅；皖西军区，司令员曾绍山，政治委员彭涛；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吴芝圃；豫西军区，司令员曾希圣（兼），政治委员张玺；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刘志坚；江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干，政治委员刘建勋；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政治委员汪锋。

中原野战军由刘邓大军和陈谢集团编成。下辖第1纵队、第2纵队、第3纵队、第4纵队、第6纵队、第9纵队、第11纵队。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卷，第152—153页。

^② 《中原解放区》第93—94页。

第10、第12纵队已于1947年12月分别改为桐柏、江汉军区部队，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后来改为陕南军区部队。中原野战军拟分两个兵团，以原属刘邓大军的四个纵队（第1、第2、第3、第6纵队）成立第4兵团，李先念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锡联为第一副司令员，陈再道为第二副司令员，苏振华为副政治委员；以原陈谢集团的两个纵队（第4、第9纵队）成立第3兵团，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①。第11纵队仍归华东野战军序列。

中原局的加强和中原军区的重建，中原野战军的编成，即形成了南线的指挥中心，刘、陈、邓不但可以指挥中原野战军，而且也可以指挥华东野战军。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协同配合进入更高的阶段。

二、宛西战役

洛阳战役行将结束之际，3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陈士榘、唐亮（转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对下一步行动提出如下方案：“如洛阳以东及东南有作战机会，应在这一带再打一仗；如无作战机会，应准备打南阳，得手后出汉水。”指出，陈、唐率第3、第4（陈赓纵队）、第8纵队等部共10个旅，应独立作战，不要刘邓大军配合。刘、邓休整完毕后，或者率第1、第2纵队过平汉路西，配合陈、唐歼灭援敌；或者独力作战，率第1、第2纵队过沙河，会合第10（宋时轮纵）、第11纵队寻打整编第74、第75、第84师。以上方案何者适宜，请刘、邓酌定^②。3月21日，刘、邓认为：陈、唐、陈、谢应位于临汝、伊阳（今汝阳）地区，就粮休整数日，“尔后攻占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四城，相机攻取南阳，而我两支大军，一在平汉路东，一在平汉路西，宽大机动，互相声援，独立作战，必要时可以一部协同作战。”22日，中央军委对刘邓、陈唐两部的作战部署如下：（一）陈唐（指挥陈谢），率

^① 中共中央1948年6月26日致中原局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26页。

第3、第4、第8纵队休整至4月5日止（后改为从3月28日起休整至4月10日或15日）。4月5日至10日间开始向南阳方向行动，“或先打南阳，后打宛西四县，或先打宛西四县，后打南阳，临机决定。”（二）刘、邓率第1、第2、第10、第11纵队及其他可能集中之兵力，“在沙河、淮河及平汉线之间机动作战。”（三）两军互相声援，独立作战，必要时由刘、邓决定以一部或全部配合作战，“在配合作战及互相策应时，陈唐受刘邓指挥。”^①

在陈唐、陈谢两部准备休整时，刘、邓决定集中第1、第2、第3、第6、第11纵队及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第二次攻打阜阳（第一次是3月上旬）。战斗于3月29日打响。阜阳为国民党第14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由整编第74师第58旅守备。国民党军统帅部急令整编第74师主力由蒙城向阜阳，令邱清泉兵团（整编第5军）主力经商丘、亳县（先头第96旅及新21旅分别由宿县、永城于4月3日到达蒙城），向阜阳前进，上述部队统由整编第74师师长丘维达指挥。同时，令张轸兵团（辖整编第10、第20、第58师）由平汉路确山、驻马店地区向新蔡西南赶进，令整编第18军（胡璉兵团）主力经鄢陵向西华前进。其兵力有20个旅，企图合围刘邓大军于沈丘、临泉地区。鉴于国民党军兵力集中，又处水网地带，不利作战，4月3日，刘、邓决定停攻阜阳，撤出战斗。第1、第11纵队向太康、柘城方向转移，第2、第10、第3、第6纵队向平汉路以西转移。

4月13日，蒋介石令整编第18军集结郾城、西平、舞阳、叶县，令张轸兵团集结驻马店、确山，令整编第47军向密县、禹县集结。这样国民党军虽然在平汉线上及以西地区集中了兵力，但在豫西南，只有整编第9师驻守南阳，其他地区均为保安部队。“为分散敌人”，“便于忽集忽蔽”歼敌，刘、邓于4月15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陈唐所部应立即出路东，沙（河）北”，“并指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46页。

挥已在陇海路东的第十一纵队（王秉璋纵队）”，“独立作战”，寻歼弱敌。“陈谢之一部对郑州佯动，主力即移集襄城西南，准备配合二、三、六、十各纵，进歼宛西弱敌及调动张轸而打击之，或再独自向南机动。”“一纵转到项城去策应陈唐或路西作战。桐柏主力两个旅，在可能时配合宛西及打张轸之作战。”中央军委“完全同意刘邓十五日部署。”并在4月16日的电报中指出，你们“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鄂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以西，以利粟裕行动。”^①

宛西地区，主要包括邓县、镇平、内乡、淅川4县，地处秦岭东延余脉伏牛山南麓，三面环山，南连江汉平原，是“南控荆襄、北连宛洛、西通巴蜀、东际淮海”的交通孔道。汉水、唐河、白河、潦河、赵河等纵贯境内，为河南省主要产粮区之一。该地区封建统治势力极强，历史上素称多匪之乡，形成三里一豪、五里一霸。到宛西战役发起前，该地区反动地方武装共有28个保安团，成为人民解放军发展、巩固豫陕鄂根据地和进一步向汉水流域发展的一大障碍。

4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兵团首长研究了战役的行动计划，并于20日下达《关于宛西战役的部署》，确定：“（一）陈赓统一指挥四纵主力五个旅，及二纵、十纵全部与桐柏军区主力进行宛西作战，捕歼邓县、镇平、内乡、淅川与西峡口等地之敌，并打南阳、襄（阳）樊（城）、老河口各地之援敌，得手后相机向有利方面扩张战果，预计二十八日开始战斗。”“（二）二纵、十纵及桐柏主力，统由宋时轮指挥，准备以桐柏主力围歼邓县之敌，以二、十纵，控制于邓县东北地区待机。”“（三）江汉地区主力准备乘宛西作战之良机，就近相机歼敌。（四）陈唐现部及三、六两纵准备在张轸、胡璉等部西援时，在运动中打击或牵制之。”

针对宛西地区敌情和地形条件，陈赓、谢富治对此次作战具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52页。

体部署如下：（一）以宋时轮指挥第2、第10纵队及桐柏军区主力为南路军，桐柏军区部队于5月3日取突然动作包围邓县，第2、第10纵队控制邓县东北之穰东、青华镇，准备歼击由襄樊、老河口及南阳可能出援之敌。（二）以第4纵队4个旅和第38军之第17师以及豫西军区第1、第2、第6军分区部队为北路军，由陈赓直接指挥，其任务是围歼西峡口、内乡、镇平等地之敌，5月3日完成对上述各点的包围。（三）以第12旅及陕南地方部队为西支队，于5月3日晚以突然动作包围浙川、荆紫关，如情况许可应坚决歼灭守敌，若兵力不足则严密包围，以待主力到达后共同歼灭之。

4月27日，南路军之第2纵队由社旗镇、第10纵队由泌阳秘密集结唐河以北及其西北地区，5月1日开始西进。2日，第10纵队以迅猛的动作袭占吴集、潦河、黑龙集等地，并以一部兵力向南阳警戒；第2纵队袭占琢头、卅里铺、陆官营、禹王店，主力控制南阳以南地区。与此同时，桐柏军区第28旅及第3军分区共5个团的兵力，以奔袭手段包围邓县。

北路军，5月1日分别进至南阳西北和内乡以北地区后，为使行动具有突然性，提前于2日以奔袭手段，包围了内乡、镇平、侯集，逼近西峡口。3日拂晓，西支队强渡丹江，包围了浙川。3日黄昏，内乡守敌乘暮色突围时被追歼。内乡解放。

5月4日，蒋介石得知宛西告急后，令张轸兵团整编第20师、第58师向泌阳、唐河间地区出击，整编第10师进击随县，策应南北作战；令整编第9师及豫西民团迅速与上述各部取得联络，确保南阳及以西各要点。

5日晨，镇平解放。战至7日，北路军和西支队，先后攻克内乡、浙川、西峡口、侯集、大城镇等地。由于守敌大都为当地民团土匪，为保存实力，他们一般均不死守城镇，求援无着后均大部潜逃。

南路军之桐柏军区主力在肃清邓县外围守军后，为尽快攻克

邓县并吸引南阳、老河口之敌来援，宋时轮将第10纵队第28师加入攻城作战。经两昼夜充分准备后，9日19时发起总攻，仅半个小时即突破城垣攻入城内。23时，全歼整编第9师1个团又3个保安团。

为扩大战果，南路军决定乘胜夺取光化、老河口，以吸引张轸兵团西援于运动中各个歼灭。老河口，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水陆交通方便，借汉水上可通陕西，下可达武汉；取陆路西通川陕，北达河南，向称“四省通衢”，历为兵家必争之地。第15绥靖区副司令官郭勋祺率第104旅2个团和第163旅1个团及宛西几县逃到该地的民团，约1.5万余人担任守备。针对老河口守敌及工事情况，宋时轮以第2纵队由北向南，第10纵队由东、南两面同时发起攻击，桐柏军区部队除以一部位于南阳、邓县间地区担任警戒外，主力袭击襄樊。

15日夜，第2纵队第4旅攻占光化县城。16日拂晓，第6旅攻占老河口北关。当晚，第10纵队袭占南关。守敌从外围向城内收缩，18日凌晨，乘船西渡汉水窜逃，南路军一部沿河追击，主力对老河口发起总攻。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守敌2个团，收复老河口。

与此同时，担任牵制任务的陈唐兵团（第3、第8纵队），在豫皖苏军区部队配合下，再渡收复许昌，歼灭国民党军1个旅；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和豫西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收复荥阳、密县，歼灭整编第47军第127旅大部。

宛西战役从5月2日至18日，历时16天，先后攻克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及西峡口、侯集、大城镇、光化城和老河口镇，总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个团、1个新编独立旅、5个保安团和13个保安团的大部，计2.1万余人（正规军9700余人，保安团1.2万余人），解放了南阳以西的大片地区，使豫陕鄂解放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关于宛西战役的特点，中原野战军在1948年6月29日《宛

西战役总结报告》中指出有两个：一是针对国民党军实行“大的使我吃不消，小的使我吃不着”与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守备主要补给要点的所谓新战法，“我们采用优势兵力，突然袭击敌纵深薄弱分散的宛西四县的土蒋，而不打南阳，避免了敌人向心集中增援”；我强大的保障兵团又“迫使敌人援兵不敢轻进，使主作战兵团取得了从容时间，完满达成任务”。二是“本战役主要敌人是上蒋，其在宛西有相当的反动社会基础与统治经验，情报灵通，人地熟悉，且在‘小的使我吃不着’的作战指导方针下，一经发现我主力和企图，即会逃窜”。针对这个特点“我们采取了隐蔽秘密运动，由远距离突然奔袭包围即发起战斗，对溃散之敌实行猛追、穷追、搜剿等办法，以求得彻底消灭之。”

三、粟裕兵团加入中原作战

粟裕率第1、第4、第6纵队进至濮阳地区后，他一方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积极作渡江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集中精力分析当时中原战场和全国战局形势的发展，“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①经过2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他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以3个纵队渡江南进，开创闽浙赣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产生了不同看法。

粟裕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那样的大歼灭战，以3个纵队南渡长江，在江南地区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但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正在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城市，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得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37页。

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相对减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灭敌军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持，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奋斗，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①。

粟裕认为，以3个纵队渡江南进，到国民党军的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他指出主要有两个不利因素，一是“我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十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二是“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37—538页。

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①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预期的行动目的。”

粟裕还认为，“再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再则，我三个纵队在渡江后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约五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代价可以歼敌三至五个整编师。两者对比，我三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②

粟裕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就将自己的全部想法同兵团几位主要领导人进行交换、磋商，获得了叶飞、金明、张震等人的“同意和支持”^③。4月初，陈毅到达濮阳，向粟裕、张震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跃进江南战略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

① 整编第5军，指整编第5师，由第5军改称。

②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38—541页。

③ 张震：《忆濮阳整训》，《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2期。

原，变中原为华北。”^①粟裕则向陈毅汇报了自己的想法。陈毅听后大感意外，他也一时难以接受，认为若采纳粟裕的方案，就要改变中央跃进江南的战略决策，这是牵动全局之举。但陈毅认为粟裕的建议很重要，他鼓励粟裕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华东中央局领导人饶漱石、康生也鼓励粟裕向中央报告。

4月16日，粟裕将“对近来中原及豫皖苏战局”的“认识与意见”，首先向刘伯承、邓小平做了报告。报告最后说：“根据上述各点考虑，拟向中央提出今后作战意见，以中原华野各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利大量歼灭敌人以推进战局。”粟裕慎重表示：“以上是尚未考虑成熟的意见，最近奉命赴中央接受任务拟提出，但是否正确，请钧座予以指正。”

4月18日，粟裕正式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对中原战局的看法和建议。他的构想是：第1、第4和第6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争取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向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派出几个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每路五六百人，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摧毁其基层反动政权，破坏敌人的兵源、粮源和其它战争资源，宣传发动群众，以策应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行动。粟裕在报告最后写道：“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五军来援而歼灭之。”“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及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②

同日，陈毅、粟裕等人会见路过濮阳到中央军委驻地汇报大别山斗争情况的李先念。他们就渡江南进的方针问题，交换了意

① 《陈毅传》第413页。

② 《粟裕军事文集》第356页。

见。张震回忆说：“李先念同志也认为，还是先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然后再行南渡更有利。”^①

在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的同一天（4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及陈毅、粟裕，认为，“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耽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② 他们赞同粟裕的意见。

毛泽东早在离开陕北前的3月10日就致电刘少奇，“约于四月十五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③ 即指粟裕率部南渡长江的计划。4月13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18日收到粟裕电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极为重视。毛泽东于2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陈毅、粟裕的电报：“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4月25日至4月31日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央工委开会为盼。22日电告陈、粟，要他们提前于27日赶到中央工委驻地。

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称城南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一）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打出去以后，敌我都到蒋管区去吃，不能依赖后方，后方要尽量供给前方。（二）我一方面为胜利欣喜，一方面担心人民负担不起。要使后方农业、工业长一寸。土地改革、整党、开人民代表会议，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人民的负担要适当减轻。（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缩小地方权力。”^④ 会议认真研究了

① 张震：《忆濮阳整训》，《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2期。

② 《陈毅传》第414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93页。

④ 同上，第306—307页。

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意见，认为都是战略性的。这三条后来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作为全党的行动方针。

会议在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时，听取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作出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5月5日，中央军委将这一决策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中央军委在该电文内还说：“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①

为配合粟裕歼灭整编第5军，中央军委令山东兵团向津浦线济南、徐州段行动，箝制整编第12、第72师等部；令苏北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令中原野战军歼灭平汉路南段之敌，箝制胡璉兵团等部，并规定粟裕兵团应于5月底渡河作战。

四、宛东战役

宛西战役后，国民党军张轸兵团返回南阳，胡璉兵团进至临颖一带，整编第28师开正阳。中原野战军第2纵队位于师岗，第4纵队位于南阳以北刘村镇地区，第3、第6纵队位于驻马店地区，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位于内乡。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59页。

为保障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歼灭邱清泉兵团（整编第5军），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组织宛东战役。

战役部署分为东西两个兵团，以陈锡联指挥第1、第3、第6纵队为东兵团，佯攻确山，以吸引胡璉兵团南下增援，同时准备歼灭可能由南阳地区东援之张轸兵团；以第2、第4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及桐柏军区主力、豫西第7军分区部队组成西兵团，由陈赓指挥，准备由西向东协同东兵团合击由南阳东援之张轸兵团。刘、邓指出，这次作战的基本意图是：“（甲）我一、三、六纵取稳重、但是积极的动作攻击确山守敌，达到调动二十八师西援、张轸东援之目的，而置重点于先歼二十八师援兵（五个团）。如二十八师主力不敢来援，则一面适时争取歼击确山之敌，一面准备以两个纵队以上兵力适时西进，协同陈赓兵团歼击张轸；（乙）我陈赓兵团应严密监视张轸动态，以四纵及王（宏坤）刘（志坚）部，于张轸一个师或两个师通过唐河、赊旗镇线以东后突然割裂，而后集二、十两纵全力各个歼灭之。在战役上，注意逐渐将张轸向东压迫，以便锡联兵团主力适时赶到夹击歼灭之。（丙）如十八军南援，我协同粟陈唐目的已达到，则视具体情况处置之。”^①以围城打援手段，歼灭张轸兵团于宛东地区。

5月25日，东兵团开始行动，27日包围确山。张轸闻悉后，除令守确山之整编第28师第238团固守外，令胡璉兵团经漯河地区迅速南下，以确保平汉线南段之安全；令整编第28师主力由正阳向确山增援；张轸本人则率整编第10、第20和第58师主力，于27日“以日行百里之速度”由南阳东援。企图在胡璉兵团配合下，夹击中原野战军。

28日夜，西兵团第4纵队在赊旗镇以南之埠口地区将张轸兵团扭住。29日，刘、邓令东兵团之第1、第3、第6纵队和西兵团之第2、第10纵队兼程赶进，参加围歼战。并令华东野战军陈唐

^① 刘伯承、邓小平1948年5月27日致中央军委电。

兵团和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在漯河以南地区，坚决阻截胡璉兵团。张轸兵团遭扭击后，即集结埠口拼其全力连续发起反击，但均被击退。当夜，西兵团指挥员因张轸兵团队形密集，不易分割，且第2、第10纵队尚未赶到，认为迟滞敌人的目的已经实现，为避免伤亡过大，将第4纵队第10、第11旅于29日夜脱离埠口，向北撤退，纵敌东进以待主力到达后，准备于31日歼灭东进之张轸兵团于羊册地区。

31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九江指挥部鉴于张轸兵团将受解放军的围攻，且胡璉兵团南下又受阻，为摆脱不利态势，令“张轸兵团迅速脱离战场，尽量靠近南阳，以南阳为根据，坚工防御；令胡璉兵团迅速向遂平、驻马店进击，会合整编第28、第85师等部，组成一个集团，与张轸兵团行东西夹击；令空军向张轸空投、空运弹药。”^①

张轸接令后，遂向南阳方向回师。31日12时，张轸兵团退至桥头、张八桥、大安庄地域。西兵团全力进行追击堵截。至6月1日，除第2、第10纵队和桐柏军区第28旅，将后卫整编第58师师部及第183旅和第10师搜索营截住，包围于马刘营、连庄地区外，张轸兵团主力均撤至白河东岸大盆窑地区，与前来接应的整编第9师会合。6月2日，张轸为解救第58师，以整编第10、第20师和第9师主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兵分3路对袁庄、杜高庄、刘高庄、番庄等地连续发起10余次攻击，遭第4纵队的坚决阻击。3日拂晓，马刘营第58师师部率第183旅向西突围，西兵团乘势发起突击。经数小时激战，除师长鲁道源只身化装潜入麦地逃跑外，其余6000余人全部被歼。

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在阻击胡璉兵团南进的战斗中，歼灭其2200余人。有力地保障了中原野战军在宛东地区的作战。此后，陈唐兵团经鄢陵向通许、杞县方向急进，改归粟裕

^① 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张兵团南阳附近作战详报》。

指挥。

宛东战役，从5月25日开始至6月3日结束，历时10天，共歼国民党军1.2万余人，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牵制胡璉兵团使之不能东顾，从而策应了粟裕兵团南渡黄河的行动，但是未能达到全歼张轸兵团的战役主要目的。

宛东战役的基本经验教训，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于1948年6月30日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报告说，“战役的基本决心”是东西两兵团对进，围歼张轸兵团于赊旗镇、唐河以东地区。在张轸兵团彷徨于埠口时，“我们判断该敌避战，将向西逃回南阳，乃准此基本情况发展的规律，于三十日令西兵团由西、南、北三面攻击，向东压迫，以使我东兵团参加决战，西兵团尤应防该敌西逃退入南阳。乃因西兵团十、十一两旅顾虑自己部分的伤亡，于二十九日夜脱离埠口之张敌，向赊旗镇北撤退，未将张敌抓住，而西兵团又迷于敌人表面的现象，误认为张敌东进，没有照顾我东面有东兵团，于三十日黄昏将其主力东进到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轸得于三十一日拂晓向西逃走，是日午刻逃到桥头。此为未全歼张敌的重大失着，是未能把握基本情况发展的规律，迷失战役指导方向的重大教训。”^①

五、中原军区部队开展反“清剿”、反“扫荡”斗争

（一）大别山根据地军民的反“清剿”斗争

刘邓大军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后，国民党军为达到彻底摧毁大别山解放区的目的，将该区划分为3个“清剿”区。以立煌、六安、舒城、桐城、潜山、宿松为第1“清剿”区；以信阳、罗山、潢川、商城为第2“清剿”区；以礼山、黄安、麻城、黄陂、黄冈、浠水、罗田、英山、黄梅为第3“清剿”区。使用十几个旅的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遂渐向腹地推进，每占一地，就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21页。

恢复保甲，组建地方团队。以原区乡保长为首领，收罗地痞流氓、逃亡地主、区乡保丁，组成武装，俗称“土顽”、“土蒋”，在大别山区多达3万余人。这种武装虽然战斗力很弱，但它地形熟悉，社会关系复杂，常以小股（百人或数十人）游击活动，政治上极反动，对解放区人民危害极大。

为着坚持大别山根据地，刘邓大军转出时留下了第1纵队第19旅、第2纵队第5旅两个旅部、12个步兵团、4个教导团，共3.3万人。因为斗争形势严峻、条件艰苦，一部分指战员产生了惧怕困难，对坚持大别山缺乏信心，要求返回主力的思想情绪。遵照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鄂豫、皖西两区党委和军区对所属及时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提高了斗争意志，增强了胜利信心。同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组成了大、小游击集团，坚持本县、本区的反“清剿”斗争，军分区部队寻打弱敌，打击敌之后方基地和交通补给线。1948年2、3月不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清剿”、“驻剿”。4月上旬，鄂豫军区部队作战5次，歼国民党正规部队10余人，土顽40余人，俘乡长以下112人。随后又歼灭黄冈保安团400余人。6月间，皖西军区部队歼灭保安第6团800余人。1948年上半年，坚持大别山区斗争的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胜利地渡过了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保存了有生力量。国民党军摧毁大别山根据地的计划，彻底破产。

（二）江汉、桐柏军区的反“扫荡”斗争

江汉、桐柏两军区部队自进入这两个地区后，即乘国民党军兵力薄弱之机，放手发展，歼灭地方反动武装，扩大控制区。1948年2月以后，国民党相继调来正规部队，并成立了信阳、南阳、襄阳3个绥靖区，经常以四五个整编师的兵力，结合地方团队，对桐柏、江汉两解放区实行反复“扫荡”。

桐柏、江汉两军区，遵照中原局的指示，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展开了反“扫荡”斗争，保卫与扩大了解放区，不但消灭了大量反动武装，而且歼灭了国民党的正规部队。4月11日，桐

柏军区部队在泌阳西北之少白寺，全歼泌阳保安团 1900 余人。4 月 15 日 16 时，江汉军区部队在京山东北三阳店，经 2 小时战斗，歼灭整编第 56 师新 17 旅第 1 团（欠第 2 营）。16 日 17 时续攻宋河，激战至 17 日 5 时，歼灭新 17 旅旅部及第 2 团和第 1 团第 2 营。两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 2457 人，缴获迫击炮 17 门、小炮 23 门、轻重机枪 148 挺、炮弹 300 余发、子弹 13 万发，江汉军区部队伤亡 233 人。该军区第 3 分区部队于 16 日在潜江西 30 公里的苏家港，歼灭国民党军 1 个团大部。对这两次战斗，刘伯承、邓小平通令嘉奖，并指出，“此种善于在外线抓紧敌人空隙的弱点，以奔袭手段，互相呼应，各个歼敌如此之多，其斗志之顽强旺盛，战斗动作之果敢顽强，殊堪发扬。”5 月 30 日，江汉军区部队在沙市东南普济观地区歼灭整编第 52 师第 82 旅 1500 余人。6 月 26 日，又在应城以西地区歼灭该师第 33 旅 2100 余人。桐柏军区部队，配合野战军主力进行了宛西、宛东、襄樊等战役。

江汉军区部队至 1948 年 6 月，发展至 2.7 万余人，桐柏军区部队至 1948 年 8 月发展至 2.2 万余人。

（三）陕南、鄂西、豫皖苏军区的对敌斗争

陕南军区成立后，军区部队长期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坚持、巩固、扩大解放区的任务，主要由各军分区部队担负。陕南地瘠民穷，“土蒋”武装较多（系由乡保丁、保安团队、政治化了的土匪组成）。军分区部队，在控制区大力剿灭“土蒋”，巩固民主政权；在游击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据点，逐步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至 1948 年 7 月，军区部队发展到 2.4 万余人，成为保卫人民政权的骨干力量。

豫西区，是中原局、中原野战军指挥机关的驻地，因为野战军主力经常在此活动，解放区比较稳定。豫西原来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土匪多，其中又以南阳地区匪患为最，形成了“官匪一体”的反动统治体制。为把豫西建成巩固的解放区，豫西军区部队在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的同时，还积极开展清剿土匪的斗争。

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6月，消灭土匪近2.4万余人。6月以后又进行了大清剿。军区部队发展到4.8万余人。

豫皖苏区是老解放区，基础较好，军区部队一面积极配合中原、华东两野战军作战，一面进行消灭“土蒋”的斗争。1948年1月至4月，共消灭“土蒋”1万余人。入夏之后，继续大力剿匪，保卫麦收。至7月，盘踞阜阳的整编第74师撤走后，中心区已无国民党军。军区部队发展到4.9万余人。

1948年8月1日，中原军区负责人在《论中原战况》的谈话里，对各军区部队一年来的活动作了如下评述：“各军区军分区建立后，使各级人民的地方革命武力有了初步的成就。例如，江汉区、桐柏区正以独立发展的姿态，向襄河西南开辟新的解放区。陕南区控制了陕南中心腹地，正向川陕鄂边区扩张攻势。大别山的鄂豫区、皖西区一年来完成艰苦游击战争的坚持任务，近来开始取得安定，由山岳地带向平川的扩张。我豫皖苏地区和豫西地区是我中原解放区两大阵地，流动情况开始结束，正进入新的建设。”

第四节 华东野战军举行豫东战役

一、在鲁西南地区歼灭整编第5军的构想与豫东战役决心的形成

（一）求歼整编第5军的构想

中央军委决定粟兵团暂不渡江南进加入中原作战的同时，就赋予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求歼邱清泉整编第5军的任务。粟裕也向中央立下“军令状”。为贯彻中央军委的这个意图，朱德于1948年5月12日到达濮阳，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慰问并指导工作。他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战术，研究敌情。“特别是你们要研究如何对付五军、十一师和七师等敌人主力部队。”对第5军要用钓大鱼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

灭它。你们一定要下决心钓到一两条这样的大鱼”^①。

5月21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并告华东局、许世友、谭震林、刘伯承、邓小平，指出：歼灭第5军是华东野战军“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为保障此目标的实现，“刘、邓担负箝制十八军^②使不能东援”。“许、谭除以九纵休整并作预备队外，主力应立即出动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保证箝制济南及济南徐州线上各敌使不能西援。”同时还决定，“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由“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③22日致电刘、邓，强调指出，中原野战军“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④

5月23日，陈毅、粟裕作出了在鲁西南求歼整编第5军的作战部署。“即先以第三和第八纵队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转移，吸引邱清泉兵团南下；然后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乘机由张秋镇、范县（今旧范县）之间南渡黄河，进抵定陶、成武地区，力求歼灭鲁西南守敌一部，开辟战场，吸引邱兵团回转北上。在邱兵团向北转移时，立即以第三纵队、第八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尾敌北进，协同我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⑤为此，华东野战军前委颁发了“为歼灭五军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指出：蒋介石以第5军为骨干，带着一批小喽罗，拼命来骚扰中原，企图把中原搞烂，再进而来破坏华北解放区的建设。我们要解放中原4000万人民也好，巩固中

① 《朱德选集》第235页。

② 18军，即整编第11师。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10—311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63页。

⑤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45页。

原也好，建设华北也好，南下过江也好，加速蒋介石的死亡也好，都非歼灭第5军不可。为保证胜利，号召全体指战员做到：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争取时间收集敌情，展开广泛的研究；在野战中要发扬“三猛”精神，把勇敢与技术结合起来；全军上下紧密团结起来，协同动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怕跑路，不怕饿肚；严格维护政策，执行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歼灭第5军，为人民立个头等大功！

5月24日，由陈士榘、唐亮指挥的第3、第8纵队，按计划由许昌地区向淮阳方向前进。整编第5师（第5军）及整编第75师果然向太康、淮阳方向行动，企图在胡璉兵团的配合下，歼灭第3、第8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即乘机于5月30日、31日南渡黄河，前出至菏泽、巨野之线，与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会合。

5月30日，陈毅、邓子恢离开濮阳，启程前往中原军区驻地河南省宝丰县。6月14日，陈毅、邓子恢到达宝丰同刘伯承、邓小平会合。

华东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的突然行动，使国民党军统帅部大为震惊。它判断解放军将先取兖州。于是，“即以第五军由柘城、淮阳地区，整编第七十五师和新编第二十一旅由杞县回师向鲁南迎击过河之匪。”令整编第83师由新安镇车运徐州，并速向鲁西推进，归整编第5军军长邱清泉指挥。徐州“剿匪”总部（6月9日蒋介石撤销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改设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以刘峙为总司令）为彻底集结兵力于鲁西方面，于6月12日，“着苏北之整编第二十五、第七十二师集结新安镇车运徐州，参加鲁西作战”。当发现第3、第8纵队经漯河、西华、扶沟进至杞县附近时，“当即判断该两纵队有越陇海路参加陈毅主力决战企图”，乃令在“驻马店之十八军经上蔡、周口、太康北上，适时参加鲁西

之作战。”^① 经过一阵紧急调动，至6月15日，国民党军在鲁西南战场的兵力达9至11个整编师，摆出同华东野战军决战的阵势。

这时，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已进抵通许、杞县之间地区，预计需到6月20日始能到达鲁西南地区参战。

（二）豫东战役决心的形成

粟裕等人分析战场形势后，认为打整编第5军的条件尚未具备。因此，断然改变决心，放弃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寻求新的作战。

其实，粟裕在部署歼灭整编第5军于鲁西南地区的同时，就在反复思考是否有取胜的把握，设想其他作战方案。他认为：“歼灭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当时，整编第5军辖2个整编师4个旅，并指挥1个快速纵队和1个骑兵旅，装备好，兵力、炮火的运用和步炮协同也较好，经常猬集一团。其中整编第5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编制人数为3.7万余人，装备步枪1.2959万支、轻重机枪1200挺、手提机枪3184挺、中口径迫击炮97门、60炮279门、战防炮72门、山炮36门、榴弹炮12门、掷弹筒586具、火箭筒52具。如遭攻击，蒋介石必极力救援。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上有6个主力纵队，其中3个（第3、第8、10纵）远在许昌、确山、南阳地区，短时间难以集中。即使把较近的第3、第8纵队调来，加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全部兵力只有8个纵队，而要歼灭整编第5军，突击集团至少需要用4至5个纵队。这样，就只剩下一二个纵队担任阻援。在平原地区无险可守的情况下，用一二个纵队是难以胜任阻援的。基于这样的分析，粟裕觉得在当时情况下歼灭整编第5军，“并不是很有把握的。搞得不好，还会给我们

^① 南京国防部第三厅：《中原会战战斗经过及检讨》。

自己造成不利局面。”^①

粟裕说，“既然歼整编第五军不能稳操胜券，作为战役指挥员，就应当在部署歼整编第五军的同时，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考虑其他更有把握取胜的作战方案。为此，我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

当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地区集中重兵的时候，对于中原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则未加强兵力。当时驻守开封的为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及2个保安旅等部3万余人，指挥不统一，正规军、地方军之间存在矛盾。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已到通许、睢县、杞县之间地区，距开封仅一日路程，就势转用，可收奇袭之效。这是华东野战军夺取开封的有利战机。粟裕、张震乃于6月15日10时致电中央军委、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华东局，电文称：国民党军寻我在鲁西南决战，刻双方对峙于荷（泽）巨（野）线以南地区。“在上述情况下，我不宜在正面与敌对峙。因此，决定以陈唐兵团于十六日晚包围开封面攻占之。我们率一、四、六纵即于同晚转到曹县及其东南地区，以阻击五军等部西援，掩护陈唐完成攻歼开封守敌任务，尔后待机围击邱清泉之一部，或向南歼击十八军于运动中。”^② 16日午时（11—13时），粟裕、张震又致电中央军委：“为迫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乃以陈唐率三、八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我们除以十一纵于巨野地区佯动，争取时间补充，尔后尾西援之敌侧击，配合正面作战外，本晚即以一纵相机攻占曹县，尔后阻击西援之敌；六纵肃清荷（泽）考（城）线之敌，开辟战场；四纵拟先后攻击五坝岗、考城，尔后到兰封、民权机动；冀鲁豫独立旅攻占东明。求得以上述动作，错乱敌人部署，迫敌分散，于运动中歼其一部。”粟、张在电文中说，“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执行。有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45—546页。

② 《粟裕军事文集》第364页。

何指示，请即赐复。”^① 17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张震并告中原局、华东局：完全同意粟、张的部署，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②

为配合开封作战，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奉命继续在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扩张攻势，包围兖州，调动整编第25师或整编第83师北援；苏北兵团在陇海线新安镇（今新沂县）至海州段发动攻势，牵制当面之敌。

二、攻克中原重镇开封

开封是河南省的省会，位于河南省东部平原，北濒黄河，南倚陇海铁路，人口约40万，交通便利，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开封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有七朝古都之称与十二朝都会之说。开封的城墙，建于明朝洪武元年，周长20余公里，与西安、南京并称中国三大古城墙。共有6门4关，即：大南门，新南门及南关、宋门及宋关，曹门及曹关，西门及西关，北门。其中南关较大，宋、曹、西三关较小，北门至黄河堤为一片沙滩，地区狭窄，不便部队行动。

开封城防经国民党军长期营修，已形成半永久性防御体系，城关为外围支撑点，以城垣为主阵地，以龙亭、西北运动场、省政府为核心阵地。各阵地间构筑了大量的集团堡、地堡，并以堑壕、交通壕相连接，城内各主要街口要冲，均筑有地堡。宋关、曹关均挖有深宽各3米多的外壕，壕土向里翻筑成高约3米的土墙，土墙上每隔10米左右便筑有一个坚固的地堡。宋门、曹门虽无外壕，但城墙用砖石和三合土筑成，高厚各约7米，城外房屋均已拆除，形成了200米的火力封锁地带。各城门楼上，筑有突出高大的碉堡，周围附以用砖石水泥建成的小伏堡；城墙拐角及突出部筑有高炮楼，其下将城墙掏空，修成隐蔽的侧防火力点。城门外20米

^① 《粟裕军事文集》第364—365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16页。

处，修筑了低矮坚固的可容纳 1 个排兵力的大型三角集团堡，并有粮弹水储备，低矮坚固，炮火不易摧毁。

整编第 66 师师部率第 13 旅担任城区和西关、曹关的主要防御，师部位于龙亭；战役发起后，调到开封的整编第 68 师第 119 旅第 335 团作为预备队，置于城南区；河南省保安第 1 旅、第 2 旅以及另 3 个保安团，除以 1 个团守卫省政府外，其余主要担负南关和宋关的防御。除此之外，尚有较多的特种兵和勤杂部队。总指挥是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实际上由整编第 66 师师长李仲辛指挥。

6 月 17 日，陈士榘、唐亮发布攻击开封的部署命令：“（一）第三纵队一部配合八纵，首先肃清南关车站之农林试验场、东闸口、十六营房、苗圃以东及曹门关、宋门关区域之敌，而后由东而、北面实施攻城”；“（二）第八纵队首先肃清南关车站、飞机场、十七营房、七营房及以西区域及西门外之敌，尔后由南面、西面实施攻城”；“（三）八纵榴弹炮应选择适当阵地及时压制敌之炮兵，摧毁敌之主要指挥阵地等重要目标，有力支援三、八纵主要突击动作。”战斗预定 17 日晚发起。

开封之战，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有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的作战，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6 月 19 日，中央军委就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致电粟裕、张震，陈士榘、唐亮并告中原局、华东局，指出攻克开封后，“（一）对蒋伪公营企业、银行、商店、市政机关、医院、学校及私人企业、商店、教堂等应由攻城部队一律加以保护，不要没收。（二）攻城部队可以俘虏的人员，限于敌方武装部队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其他一切敌方党政机关的人员、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警察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加以俘虏和逮捕，面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省政府人员中只有主席刘茂恩一人应加逮捕，其余均不要逮捕。（三）估计到开封此次不能巩固地占领，面在占领后不久我军即将退出，故应采取上述政策以示宽大，而使城市不遭破坏，以

便将来巩固地占领时于我有利，且使此种宽大政策传播出去有利于我将来占领全国大城市。（四）城内公用物资除武器弹药公粮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军队取用以外，一律保护不要破坏。（五）除持枪抵抗者外，不杀一人，即使是特务分子，因为一时很难清理，也不要逮捕和杀害。（六）公安局及警察枪支不要收缴，以便我军离开后由他们维持治安，免遭抢掠破坏。（七）如果省政府、省党部、公安局、市政府等机关业已惊散，再难集合，应设法找出中间人士，例如大学校长等出面组织维持会，维持秩序。”^①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华东野战军前委向各参战部队发出了《关于进入开封城的工作指示》。其主要内容为，（一）以开封工作委员会，为军事占领期间领导该城全部工作与执行政策的党与政府代表机关，各纵委及各地委必须坚决执行该委员会的一切指示。（二）各部进入城内，战斗任务一经完成除留一部分部队扼守要点、维持秩序外，其余部队一律选择适当地点集结。（三）各部队必须组织专人进行城市宣传及居民工作。（四）切实保障党的城市政策的贯彻执行。《指示》特别强调，“一切没收、肃反等问题的处理，必须事先调查报告工委”。

6月17日晨，第3、第8纵队逼近开封城关，在特纵炮兵第2、第3团配合下，随即展开攻击，至18日黄昏攻占外围及四关，守军一部被歼，其余撤至城内。当日22时，第8纵队在南关进行火力准备，24时突破新南门，但城门两侧一个地堡群未摧毁，突破口被守敌火力封锁，致使后续部队未能跟进，已突入的部队就势抢占城楼作依托，顽强坚守。19日1时左右，第3纵队对宋门实施突击，迅速突入城内。9时，第8纵队完全肃清了新南门外地堡群守敌，再度控制突破口，与城内坚持的部队会合，随后又突破了大南门和西门。至20日23时，攻占了除核心阵地龙亭、华北运动场以外的全部市区。这时，粟裕和张震、钟期光赶到陈唐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87页。

兵团指挥所（开封南郊），“督促第三和第八纵队不要留恋开封战场，除留足够的兵力攻击龙亭外，迅速从城内撤出其余部队，把兵力集中起来，准备再歼援敌。”对最后夺取龙亭，粟裕指出：“龙亭是要打下来的，但不要急，迟一点不要紧，有点残敌可以作为钓邱兵团这条‘鱼’的大钩子，你马上打下龙亭，他来援就不积极了，主要是作好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打。”^①

龙亭，坐落在开封城西北角的一个大土墩上，是开封唯一的制高点。国民党军利用龙亭殿宽阁高和四周厚厚的围墙，修筑了很多的碉堡、堑壕和交通壕，筑有巨大的地下室，可供屯兵储物。龙亭的南面为潘家湖和杨家湖，两湖之间仅有一条不宽的土马路与市区大街街接，龙亭的另外三面，均为开阔地。李仲辛率近万部队退守龙亭鼓楼等据点。他向南京国防部报告说，“重武器无损失，官兵士气甚旺，可继续作战。”^②6月21日，蒋介石飞抵郑州，“以亲自指挥该地对共产党威胁河南省会之攻势的作战。”^③国民党空军出动各型飞机473架次，支援所谓“开封保卫战”。

为最后夺取龙亭，根据粟裕的指示，陈士榘、唐亮以第8纵队第65团由西向东攻击，第66团由潘杨二湖间攻击；第3纵队第24、第22团全部及第23团1个营由北向西和由西向东实施攻击。同时，集中第8纵队3个山炮连（9门炮）、2门步兵炮及3个团的迫击炮，炮兵阵地设在省政府以北地区；第3纵队榴弹炮阵地设在大南门下。21日17时，炮兵第1团榴弹炮分队掩护野炮分队将大炮推至敌工事前数百米处，实行抵近射击，彻底摧毁了龙亭工事。突击队发起猛烈攻击，激战至23时，攻占龙亭。据守华北运动场的国民党军陷入混乱，一部投降，一部向西北突围时被歼灭。22日晨，开封解放。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59页。
② 《郭汝瑰日记》。
③ 法新社南京6月21日电。

与攻克开封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阻援部队，同增援开封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有力地保障了攻克开封作战的胜利。6月19日，蒋介石“着孙元良率四至五个团至中牟，沿铁道以北迅速挺进增援开封。”^① 令邱清泉“应以积极行动排除困难，捕捉战机，迅速击破当面之匪，兼程西进，以解开封之围”^②。孙元良奉令即以第122旅、第125旅、交警第16总队，附战车20余辆由郑州向中牟方向攻击前进。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于17日袭占中牟，随后控制中牟以西阻援阵地。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将商丘、开封段铁路破坏。孙元良兵团被阻止在中牟以西白沙地区。邱清泉兵团之整编第5师、整编第75师及新21旅自金乡、成武线转头西援。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两广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实施运动防御，予以重大杀伤，并攻克兰封，至6月23日，将邱清泉部阻止在红庙寨、内黄、野鸡岗以东地区。由驻马店经上蔡北援的胡琏兵团，则被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阻止在上蔡以北地区。

开封之战，连同阻援在内，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约4万人，击毙整编第66师师长李仲辛，活捉参谋长游凌云，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化装潜逃。华东野战军伤亡1.16万余人。攻克开封意义重大，正如粟裕指出的，“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更重要的是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调动和引诱援敌就我范围，使我军进一步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③ 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解放军仅用了5个昼夜就攻占了。在南京的加拿大记者评论说：“开封的攻克，象征着蒋介石已不能防守中国任何部分。”

开封解放之次日，即6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东、中原人

①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开封战役作战经过概要》。
② 南京国防部第三厅：《中原会战战斗经过及检讨》。
③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58页。

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庆祝解放开封省城及歼敌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

三、放弃开封，歼灭区寿年兵团

开封失守，国民党统治集团大为震惊，南京、上海等地舆论大哗。在南京的河南省籍“监察委员”、“立法委员”们，哭哭啼啼，先是到蒋介石官邸请愿，而后又在参谋总长顾祝同住处跪地大闹，还拦着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跪地痛哭”^①。强烈要求蒋介石收复开封并追究开封失守者的责任。6月24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临时会议报告开封失守问题。谈及开封迅速丢失原因时，何应钦说：“参谋部配备开封之兵力，原有国军三团、保安队六团、临时又加入国军一团，共十个团。原期至少能守十天以上，预计我援军击破沿途匪军，到达开封城外，则不需十天。在开封地区之内外夹击，定可形成。不料匪于十七日开始攻城，十八日即突破城垣，发生巷战，此事实出意外。参谋部得此消息后，顾总长即飞往郑州，最高统帅亦飞往巡视，期能使援军早日到达，终以开封城被匪突破太快，援军赶救不及，至二十二日城内电讯中断，情况不明。”^② 先是盲目乐观后是惊慌失措，焉能不败。

为挽回颓势，稳定军心民心，国民党军统帅部严令邱清泉兵团及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加速向开封前进；另以整编第75师（附新编第21旅）及刚由新安镇增援到柳河的整编第72师组成一个兵团，由第6绥靖区副司令官区寿年指挥，由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重占开封，并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决战。

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分析了当前情况后，于24日19时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央军委，提出主动放弃开封，求歼邱、区兵团的方案。认为：“邱、区兵团重占开封后其补给线延长，兵力将被分散，如邱匪再犯尉（氏）、洧（川）、鄆（陵）地

① 刘峙：《我的回忆》，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

② 中央社南京6月25日电。

区时，我们则以伺机歼其左路或后卫，内定二十六日自动放弃开封。”25日，他们提出拟待邱兵团进入开封后，以第3、第8纵队分割邱、区之联系，以第1、第4、第6、第10、第11纵队及特纵、两广纵队，歼灭区兵团于杞县以南。如邱兵团入开封后，区兵团又迟迟不进，则我向北跃进，求得歼灭区兵团一部或大部于民（权）、兰（封）、杞（县）、睢（县）地区^①。

中央军委于26日3时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粟裕、陈士榘、张震，指出，蒋介石、白崇禧均判断华东野战军南进与中原野战军会合打整编第18军等部，故令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从民权、兰封、开封之线向西南急进，以期合击我军，邱军又以一部守开封。在此情形下粟陈张部署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敌指挥官中区寿年和我军作战较少经验。”^②27日9时，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邓说，粟裕军在现地区有随时歼敌机会，故以在现地区寻歼整编第75、第72师或其中之任何一个师为有利。而后或转至商丘、砀山打第74、第51师，或打涡阳、蒙城、蚌埠、宿县，均可机动。只要整编第18军不过黄泛区向东，粟裕军机动地区是宽大的^③。要求中原野战军牢牢钳制胡璉兵团。

27日17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粟裕、陈士榘、张震并报中央军委，同意上述作战方案，为保障华东野战军歼灭区寿年兵团，“我们决以一部监视整编第十八军，主力主动攻击北进之吴绍周兵团，吸引十八军回援。”

粟裕等为实现分割邱、区兵团和求歼区寿年兵团的方案，以第1、第4、第6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组成突击集团，隐

① 《粟裕军事文集》第365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92页。

③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52页。

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准备实施南北夹击，围歼区兵团。以第3、第8纵队先由开封向通许方向行动，引诱邱兵团南下，然后迅速东移，会同由上蔡地区北上归建的第10纵队和位于杞县的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在杞县以西构成阻援阵地，隔离邱区两兵团之联系，阻击邱兵团之东援；以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进至郑州东南地区，阻击可能由郑州东援的孙元良兵团，并从侧后牵制邱兵团。另以华北军区冀鲁豫军区和中原军区豫皖苏军区武装，破击陇海路徐州至民权段，并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

6月26日晨，第3、第8纵队按预定计划，放弃开封向通许方向转移，第1、第4、第6纵队向杞县以南、傅集东西地区转移。当日午后，整编第5师第45旅及整编第68师重占开封。国民党军统帅部判断华东野战军“主力南窜，似无积极企图”，于是以整编第25师及第3快速纵队车运滕县，解兖州之围，并将已到达砀山的整编第74师车运新集镇增防，以区兵团、邱兵团，分向太康、扶沟及陈留、通许、尉氏方面“索匪追剿”。这样，就“使豫东主力战场，兵力形成薄弱”^①，为解放军各个歼灭提供了条件。

骄狂的邱清泉以主力向通许方向前进，尾击第3、第8纵队；区寿年兵团进达睢县西北的铁佛寺、龙王店、榆厢铺地区后徘徊不前。邱、区两兵团形成了40公里间隙。粟裕等抓住战机，不待查明区兵团的具体部署情况，即于27日下达了围歼该兵团的命令。当晚，突击集团各部以尹店集、龙塘岗、榆厢铺地区为目标，进行合围，同时以一部楔入纵深，割裂区兵团部署。至29日晨，将区兵团部及整编第75师包围于龙王店、常郎屯、杨拐、榆厢铺、陈小楼等地，并完成了分割；将整编第72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阻援集团控制了杞县、齐砦、高阳集、王固之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之联系。29日晚，突击集团以一部监视铁佛寺整编第72师，集中主力围攻龙王店，激战至7月2日3时，歼灭区兵团部

^① 南京国防部第三厅：《中原会战战斗经过及检讨》。

和整编第 75 师师部，俘虏区寿年和整编第 75 师师长沈澄年。

区寿年兵团陷入解放军的包围后，国民党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鉴于“我机动部队邱兵团、区兵团处于分离状态；豫南之第五绥区部队尚未行动，深感情势严重”，乃令邱清泉兵团“即向陈留地区集结，尽速向杞县以东进击”；令由整编第 25 师及第 3 快速纵队、第 2 交警总队组成一个兵团，整编第 25 师师长黄百韬任司令官，由滕县地区“改向商邱地区集结，准备向睢县以西进击”；“第五绥区先以已完成集结之部队，即沿上蔡、周家口、淮阳向睢县以北进击”；“区兵团应坚强固守，吸引陈匪主力于现地，准备协同我外线友军，适时出击。”“一举包围陈匪主力于睢县杞县地区歼灭之。”^①

6 月 28 日，整编第 83 师全力向杞县城进攻，15 时，守卫该城的两广纵队和第 4 纵队 1 个师被迫放弃阵地。6 月 29 日晨，邱兵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沿杞睢公路向裴村店、榆厢铺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第 3、第 8、第 10 纵队等部，在杞县以东、以南的过庄、桃林岗、王司砦一线进行了顽强的阵地防御战，坚决守住了阵地，使邱清泉眼看 10 余公里以外的区兵团被歼而无可奈何。黄百韬兵团也被中原野战军第 11 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 1、第 6 纵队各一部，阻挡在距铁佛寺 5 公里以外的帝丘店地区。

四、围歼黄百韬兵团与主动撤出战斗

龙王店失陷，区寿年、沈澄年“若非阵亡，必已被俘”。蒋介石“五中惨裂，不知所止”，深感“中原战局严重万分”。故于 7 月 2 日上午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飞临杞县上空督战。他严令邱清泉急进，“一面救援七十五师在榆厢铺之一旅与铁佛寺之七十二师；一而与西进之二十五师会合，方能挽坠势，亦所以保全弟军不致孤立被歼也。”“如此次中原作战失败，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又在睢杞地区歼灭了区寿年兵团主力，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 5 部第 5 册，第 468—469 页。

已经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这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加上战区久旱无雨，井河干涸，炎热夏季，部队减员较大，十分疲劳。在此情况下，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认为，“我们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组织部队胜利撤出战斗，转入休整。”他们对当面敌情和如何组织部队顺利转移问题再次作了分析研究。认为，“援敌黄邱两个兵团遭我阻击后不甘失败，仍由东西两面向我对攻，胡兵团也正由南向北攻击前进，尤其是黄兵团，增援积极，已进抵帝丘店附近，对我军从战场东部撤出威胁较大，如不对该敌以有力打击，我军携带大批伤员，将难以顺利撤出战斗；即使撤出，各路敌人也会尾追而来，使我军陷于被动。”^①他们决心攻歼黄百韬兵团。

7月2日，粟、陈、唐、张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以第3、第10纵队和第8纵队一部，继续阻击邱清泉兵团；以第8纵队主力及第6纵队1个师围歼榆厢铺、何旗屯之整编第75师第16旅旅部及2个团；以第1、第4、第6纵队和两广纵队东移围歼黄百韬兵团；以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监视铁佛寺整编第72师，并作为战役预备队。为了保证战役全胜，华东野战军首长号召全体指战员，“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不怕伤亡，克服困难”，“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为争取此次战役圆满胜利而战。”

7月2日晚，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攻击。至4日拂晓，将其压缩在帝丘店及其周围10余个村庄内，歼灭近2个团的兵力。同时迅速歼灭了榆厢铺、何旗屯守敌。5日拂晓，黄百韬指挥第40、第108旅各一部，在4辆战车前导和P--51型飞机协力下，由帝丘店向北实施反扑，经7小时激战，被击退。是日黄昏，华东野战军再次发起攻击，激战至6日晨，又歼灭黄兵团1个团另2个营。经此打击之后，黄百韬感到自身难保，将部队踞守帝丘店狭小地区待援。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68页。

为解黄百韬兵团之围，邱清泉以整编第5师之第45旅，整编第83师“合编成左翼迂回兵团，由兰封以南沿尹店、白云寺径趋铁佛寺，先解整72师之围；再合力东进，以解黄兵团之围。”第4绥靖区刘汝明整编第55、第68师主力，“亦以有力部队沿陇海路以南行动，以资策应。”^①7月6日，邱清泉之迂回兵团主力进至尹店东南。与此同时，整编第74师已进到宁陵及其以西地区。胡璉兵团先遣部队正向太康急进中。

在上述形势下，华东野战军何时撤出战斗就成为急待决定的问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十分关注，他们在7月5日致中央军委和粟裕、陈士榘等的电报里就提请他们考虑这个问题。电文称：“我们原订部署是按粟、陈要求，使胡璉在七日前不能超过太康，此着仍属可能。惟全部拉回胡璉，恐已困难，当尽全力争取之。”“粟部已全部使用，无预备队，且颇疲劳，我们认为须保持锐气，才可避免在新情况下陷入被动。此点请军委考虑。”

为保持主动，粟裕等于7月6日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他们在7月6日致中央军委和刘、陈、邓的电报里说，“我们原拟全歼黄百韬兵团，估计要八日晨始能解决战斗。歼灭该敌，均具有信心，惟势将被迫与援敌作战对我不利，故决定放弃歼黄计划，本晚就现态势抢运伤员（伤亡近万，因无担架，堆集一线仍多）与胜利品，七日晚向北转移，争取调整组织与补充弹药，待机。”^②7月7日又致电中央军委说，因国民党军各路援军迫近，“加上我军连续作战，已很疲劳，为应付敌人乘我疲劳后进攻，决放弃对敌二十五师等部之作战，即北撤民权、考城、菏泽、曹县、定陶地区，争取休整。如敌继进，则相机予以歼击。”^③8日，中央军委在复电里指出：“在来电所述各种情况下，你们的撤退是正确的。”^④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第476页。

② 《粟裕军事文集》第366页。

③ 转引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07页。

④ 同上，第506页。

7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撤出战斗，分向睢、杞以南及鲁西南转移。睢杞战役结束，又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

五、豫东战役的伟大胜利

豫东作战，是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会战。国民党军参加豫东地区作战的兵力有4个兵团、两个绥靖区、12个整编师、28个旅，另2个快速纵队、1个骑兵总队、1个交警总队，共约25万人；由平汉铁路以西以南增援豫东作战的有胡琏、吴绍周、杨干才3个兵团。此外，还有空军4个大队和2个中队的作战飞机，在战役期间共出动350余架次，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人民解放军参加豫东作战的有华东野战军7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的第9、第11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2个独立旅、豫皖苏军区1个独立旅，共计10个纵队、23个旅，共约20万人。负责阻击任务的有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第1、第2、第3、第4纵队）。

双方经过从1948年6月17日至7月6日激烈战斗，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师部、4个正规旅、18个正规团及2个保安旅、3个保安团，共计8.5749万人，其中毙伤2.8870万人，俘虏5.6879万人。缴获山野榴炮77门、高射炮20门、步兵炮战防炮10门、轻重迫击炮426门、轻重机枪2363挺、长短枪2.7781万枝、火箭筒36具、汽车262辆、马匹1304匹、电台148部，以及大批弹药；击毁击伤飞机2架、坦克装甲车14辆。华东野战军伤亡3.3272万人，其中阵亡5026人，负伤2.4649万人，其他减员3598人。损耗轻重迫击炮31门、轻重机枪380挺、长短枪3393枝、各种炮弹12万余发，各种子弹522.8万余发、手榴弹9.1364万枚。

担任阻援任务的中原野战军主力，共计歼灭胡琏兵团和吴绍周两兵团7800余人。

豫东战役取得如此巨大战果，其原因正如粟裕指出的，“它是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英勇奋

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以及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参战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协力作战的结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①从作战指导方面来讲，华东野战军正确地解决了以下关键问题。

一是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豫东战场是新解放区，在新区作战条件远不如在老解放区有利，而且在这个战场上国民党军兵力还占优势，它能够集中主力实行战役性进攻。华东野战军原准备在鲁西南地区歼邱清泉兵团，但是由于国民党军立即集中兵力企图迫我“背水决战”，和邱清泉兵团猬集固守难以分割，在鲁西南地区决战的条件不具备，勉强会战于己不利，乃不拘泥于原计划，而改以一部兵力围攻国民党军守备薄弱的开封。这一招完全出乎国民党军所料，错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迫使其不得不仓皇奔驰救援开封，从而求得了有利条件下逐一围歼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的良好战机。对此，国民党军方面事后检讨说，“此次作战之直前，匪军被国军分割于鲁西南、豫东、豫西各地，且鲁西南地区匪之态势不利。但匪军及时另开辟战场，窜犯开封，诱使国军救援，使国军对匪粟裕兵团之攻击，功亏一篑；并创造围歼区兵团及黄兵团之战机，国军则奔驰应援，陷于被动，匪军之指导甚为正明。”^②

二是“攻城”、“打点”与阻援兵力灵活运用。豫东之战，华东野战军“攻城”、“打点”与阻援相互配合，同时进行，其中阻援是次要的，是为着保障“攻城”、“打点”这一战役主要目的。在兵力运用方面，从战场实际出发，其用于阻援方向的兵力，或大于“攻城”、“打点”的兵力，或兵力大体相等。因此，保障了“攻城”、“打点”的胜利。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571 页。

②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 5 部第 5 册，第 483 页。

三是战役包围与战术分割同时实施，在不能速歼围敌且援敌迫近时，果断撤出战斗。求歼区寿年兵团时，从6月27日下午到29日晨即达成了对该兵团的合围，同时割裂了整编第75师的战斗队形，故较快地取得歼灭区兵团部与整编第75师的胜利。打黄百韬兵团时，至7月3日就将该兵团合围，但未能将其战斗队形分割，致使其收缩一团固守，而不能迅速歼灭，在各路援敌迫近时，主动放弃歼黄计划，保持了战场主动权。

豫东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正如中共中央在7月11日的贺电里指出的，“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从此，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完全丧失了战役性进攻的能力。1994年12月25日，刘华清、张震在《追忆粟裕同志》一文里说：“豫东战役的胜利，使中原、华东战场的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大大加快了我军战略进攻的胜利进程，为顺利转入战略决战创造了良好条件。”^①国民党军在战役结束后的《中原会战战斗经过及检讨》中说：“此次豫东会战，共军所表现特异三点：（一）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二）敢攻袭大据点，如开封、兖州、襄樊等。（三）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如桃林岗、许岗、董店等。”^②黄百韬则在《豫东战役战斗要报》中称，共军“气焰高涨，实力雄厚，中原战局遂进入最严重阶段。”^③

豫东战役的胜利连同兖州、襄樊等战役的胜利，说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粟裕的建议，做出集中主力在长江以北作战的战略决策是无比正确的。为继续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于长江以北，1948年7月13日，毛泽东致中原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粟

① 《人民日报》，1994年12月25日。

② 南京国防部第三厅：《中原会战战斗经过及检讨》。

③ 国民党军第7兵团：《豫东战役战斗要报》。

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①正是由于这一重大决策，致有后来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节 中原野战军阻击胡琏、吴绍周等兵团和攻克襄樊

一、襄樊的战略地位与夺取襄樊的作战方案

襄樊，系古城襄阳和古埠樊城合称而得名，位于汉水中游，湖北省的西北部，地当桐柏山、武当山孔道，北通关中、洛阳，东连武汉三镇，西扼川陕大道，南接沙市、宜昌，水陆交通便捷，通连四面八方，向以“南船北马，七省通衢”而著称，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又为文人荟萃之所，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唐代的著名大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白居易、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明代的唐寅、朱祁真等，都曾在这里居住或游历，留下过许多美好传说和墨迹。有人计算过仅罗贯中写的120回《三国演义》，竟有32回的故事发生在这里。

国民党军统帅部对襄樊极为重视。白崇禧认为襄樊是“控川陕豫鄂之门户，握武汉三镇之锁钥”的战略要地，中原重镇，必须面守。1948年3月，蒋介石把襄阳、樊城、枣阳、宜城、南漳、谷城、老河口、光化、竹山、竹溪、房县、均县、郧县、郧西等县划为第15绥靖区，在襄阳设置绥靖区司令部，派其心腹、著名的特务头子康泽任司令官。康泽到任后便着手整顿部队，调整防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6页。

务，赶筑工事。

据守襄樊等地的兵力有第163旅（辖2个团）、第164旅（辖2个团）和第104旅（辖3个团），共2.1914万人。另有地方团队3000人。有步骑枪4711枝、重机枪60挺、轻机枪478挺、82迫击炮71门、47迫击炮136门、近战兵器（包括手枪、冲锋枪）341件、战马168匹、汽车12辆^①。其兵力部署是：以第163旅第487团守老河口，旅部率第488团守谷城；以第164旅旅部率第490、第491团守樊城；以第104旅全部及化学炮连、教导队、特务营等驻守襄阳城。绥靖区司令部设襄阳城东街杨家祠堂内。

康泽利用襄阳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险要地势，构筑了号称“铁打的襄阳”的坚固阵地。“在城周围设外壕3道，深宽各3米。在襄阳城及城南和西南的岷山、凤凰山、虎头山、羊祜山、真武山等制高点上，构筑了以高碉为核心，周围辅以地堡、交通沟的碉堡群；在开阔地带和死角，遍布地雷、鹿寨。”^②

襄樊战役前夕，康泽认为：“目前情况，敌人还不会有很大兵力来攻打襄阳”，“襄阳地势险要，又有汉水之阻，易守难攻，万一战事发生，总统所派的援军很快也就到了，襄阳可无忧虑。”^③蒋介石、白崇禧也判断中原野战军主力东调参加陇海会战（豫东会战），无力攻击襄樊。

其实，夺取汉水流域中段，解放襄阳、樊城，建立战略前进基地，早就列入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预案之中。1948年1月26日，中央军委在制定《南线三军三个月作战的方针》时，即把汉水流域，把南阳、襄樊作为机动方向之一。同年6月5日，宛东战役结束的第3天，刘伯承在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纵队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说，“我们三个较好的战场：一、沙河，二、豫西，

① 国民党军华中“剿总”《襄鄂会战史》。

② 金全敏等主编：《襄樊战役》，第2页。

③ 同上，第273页。

三、豫陕鄂。三个战场中以豫陕鄂为最好，有伏牛山、武当山之依托，有桐柏、江汉的前进阵地，水寨较少，没有大山，适于部队运动和作战。在敌方，因汉水、长江、大巴山之障碍，部队运动困难。”他指出，我们的战场应选择豫陕鄂。基于这种分析，刘伯承提出下步作战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向襄樊、老河口行动，看准时机，突然捕捉守敌一〇四旅、一六三旅围歼之。第二方案，向信阳南北行动，以一部向郑州佯动。”^①

出席这次会议的指挥员认为，“刘伯承兵出襄樊这一着，既有战略眼光，又符合当前战场的实际，确实是个理想的作战方案。”^②都赞同夺取襄樊。

6月13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襄樊战役（亦称老襄战役）作战部署：以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指挥第2、第4纵队组成西兵团，“第一步奔歼老河口、谷城之敌，其主力适时控制汉水西岸，伺机直趋襄、樊。”以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指挥桐柏军区主力，以及开辟汉水西岸新区的部队和第6纵队全部，组成南兵团，“第一步奔歼襄樊之敌，对汉水西岸须以适当兵力兜击可能逃走之敌，对汉水船只须控制之。”战役准备于6月21日开始。以第1、第3纵队组成东兵团，“仍各就现态势休整，派部队向南阳佯动，或尾击可能南犯之王凌云兵团，或侧击可能西犯之张轸兵团或在张轸部到达南阳附近，转到驻（马店）、确（山）地区寻歼弱敌。”^③以策应襄樊作战。刘伯承告诫各级指挥员：“打老河口虽然容易，但应谨慎，打死虎应看作打活虎。”^④

二、缓攻襄樊，集中兵力阻击胡璉等兵团，直接配合豫东战役

正当中原野战军积极准备进行襄樊战役时，华东野战军豫东战役的第1阶段作战攻取开封打响了。国民党军统帅部令“国防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15—416页。

② 《刘伯承传》第440页。

③ 《襄樊战役》第41页。

④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16页。

部九江指挥部转饬信阳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亲率有力兵团由驻马店北趋黄泛区”，策应开封地区之作战^①。白崇禧乃令胡璉兵团（整编第18军），经周家口、淮阳北进增援。

如前所述，中央军委在决定粟裕兵团暂不渡江南进加入中原作战的同时，就赋予中原野战军夏季作战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邱清泉兵团。获悉胡璉兵团北进增援时，中央军委于6月15日和17日两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望刘邓迅以有力兵团尾该敌攻击”，确实钳制之。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除令第9、第11纵队归粟裕指挥，直接参加豫东作战外，决定缓攻襄樊，集中第1、第2、第3、第4纵队位于平汉线西平至确山段以东，担任阻击胡璉兵团任务；将第6纵队配置于唐河地区机动位置，既可东进驰援平汉线，又可南下奔袭襄樊。

为保障华东野战军豫东作战，中原野战军同胡璉兵团等部进行了3次英勇的阻击战。

（一）东、西洪桥阻击战

胡璉兵团辖整编第11、第3师，约5.8万人。主力为整编第11师，该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号称“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全部为美械，兵员充足，有实战经验，而且尚未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故气焰嚣张。据1948年1月资料，该师编制人数为4.0502万人，实有3.4502万人，共装备步枪1.0460万枝、轻机枪957挺、重机枪193挺、手提机枪2564挺、中口径迫击炮74门、60炮254门、战防炮34门、山炮32门、榴弹炮12门。整编第3师编制人数为2.7394万人，实有2.4388万人，定陶战役被歼灭过1次，在确山祝王砦又被歼灭过1次，故士气不高，战斗力较弱。

6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阻击胡璉兵团的部署，令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由舞阳地区出发，“十六日夜赶到西平、上蔡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第464页。

线”；令中原野战军第1、第3纵队，“十八日前到西平东洪桥线”，“坚阻十八军”；令第4、第2纵队，“十七日到方城，尾一、三纵东进”。17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和粟裕、张震：“我们已急用一、二、三、四、十等五个纵队，全力阻击十八军”，“并寻机歼其一部。陈（士榘）、唐（亮）对南面可勿顾虑。”

从6月15日开始，第1、第3纵队和第10纵队在上蔡以北东、西洪桥地区同胡璉兵团展开激战。战斗最激烈之处是在第10纵队阵地上。18日拂晓，整编第11师以优势兵力发起连续突击，激战近8个小时，第10纵队给其重大杀伤后主动转移。据胡璉19日向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的报告说：“昨在上蔡附近将陈毅十纵二十八师击溃，本身亦伤亡六七百人。”^①

19日，陈唐兵团突入开封城内，其时胡璉兵团已进至周家口地区。白崇禧见增援开封已来不及，乃“忽将其南调”^②。胡璉遂率部迅速撤回汝南地区。胡璉兵团突然南撤，令徐州司令部大惑不解。该指挥部参谋长郭汝瑰在6月20日日记里写道：“余不知此是何居心？”他担心这样一来，华东野战军可以集中全力对付邱清泉兵团，豫东之战如失致，“全局皆非矣。”^③

此次阻击战，共歼灭胡璉兵团等部3000人，有力地保障了陈唐兵团攻克开封。

（二）西平阻击战

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后，又抓住战机求歼区寿年兵团。国民党军统帅部“深感局势严重”，决集中优势兵力同华东野战军在睢县、杞县地区会战。第5绥靖区司令官张轸奉令指挥吴绍周兵团（即第4兵团）和胡璉兵团，“先行击破当面匪阻，尔后以第四兵团掩护十八军渡（洪）河北进。”^④

① 《郭汝瑰日记》。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国民党军第5绥靖区：《策应豫东作战经过战斗详报》。

吴绍周兵团，辖整编第10、第28、第85师，共5.8万余人，司令官吴绍周，全为国械装备，多次受过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与消耗，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

6月26日，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我们拟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发起歼灭”区兵团战役，“建议刘陈邓邓指定部队箝制胡、吴之北援。”6月27日，粟、陈、张又致刘、陈、邓并中央军委：“职部明晚于睢杞地区发起对区兵团作战。此间可能集结部队已全部用上，恳请钧座以有力一部箝制十八军之北来。此间各部要分割邱、区连系，又要实施战场分割，故无法抽出部队对付南面。”能否阻止南面胡琏、吴绍周两兵团增援，直接关系豫东战役胜败。

中原野战军主力于上蔡地区阻击胡琏兵团作战结束后，集结于襄城、叶县地区休整。其间，陈毅正传达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接到粟裕等决心求歼区寿年兵团，建议中原野战军“迟滞胡、吴兵团阻其北援”的电报后，当即将报告会变为战斗动员大会。6月27日17时刘、陈、邓致电粟裕、张震和中央军委：为保障你们歼灭区寿年部，“我们决心一部监视十八军，主力主动攻击北进之吴绍周，吸引十八军回援。”28日，刘、陈、邓令第1、第2、第3、第4纵队全部，分向郾城、漯河、西平、遂平前线开进，“预期歼击正由驻马店北进之吴兵团一部，吸引十八军西顾。”^①其具体部署是：以第1、第2、第3纵队组成西兵团，由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统一指挥，从西向东攻击祝王砦（位西平县城以南）、西平之线东、西地区之敌。首先割裂该敌，以求各个歼灭之。以第4纵队为北兵团，由北向南，攻击西平以北及东北地区之敌，逐步割裂之。以豫皖苏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匡斌率4个小团位于东洪桥商水之线，阻滞整编第18军。为保障此次阻击战胜利，刘、陈、邓均亲赴前线指挥。

①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1948年7月15日致中央军委电。

指挥部设在赊旗镇天主堂。

6月29日，吴绍周兵团推进至遂平及其附近；胡璉兵团推进至上蔡及其附近。30日至7月1日，中原野战军“采取诱敌进攻而后施行反突击之方法（有反复八九次者）”，同吴绍周兵团在西平以西地区展开激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①白崇禧深恐吴兵团被歼，30日晚，以整编第18军回头推进至西平附近，策应吴绍周兵团作战。

鉴于胡、胡两兵团已靠拢，兵力高度集中，且兵力过大（共10余万人），中原野战军参战的仅4个纵队，共7万余人，再战不利；而调回胡璉兵团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因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遂决定放弃攻歼吴绍周兵团一部之计划，“为避免持久防御消耗与再吸敌向西增，于东（1日）夜将主力向西收缩，另外遣五个团与敌保持接触，另以匡斌部位于周家口东洪桥之线防敌北进。”^②西平地区阻击战，有力地保障了华东野战军歼灭区寿年兵团作战的胜利。

（三）周家口地区阻击战

华东野战军歼灭区寿年兵团后，又决心围歼从徐州方向赶来增援的黄百韬兵团于帝丘店附近。7月2日，国民党军统帅部令张轸率部“取捷径兼程向豫东急进，参加主力会战。”张轸乃“决心以第四兵团占领西平以西各据点，掩护十八军经上蔡、周口、淮阳北上参加豫东会战，第四兵团则于十八军后，距一日行程跟进。”^③7月2日，在吴绍周兵团占领西平以西以北地区的掩护下，胡璉兵团并指挥整编第28师开始东进。4日，整编第20师主力推进至黄埠。

7月3日，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致电刘伯承、陈毅、邓

①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1948年7月15日致中央军委电。

② 同上。

③ 国民党军第5绥靖区：《策应豫东作战经过战斗详报》。

小平并中央军委：“我们已于今晨完成对二十五师之包围，本日展开攻击，得手后拟再歼七十二师。如此时间将拉长，恐需七日始能结束战斗。恳请以有力一部箝制胡匪，使其八日以前不能到达太康地区。”7月4日12时，中央军委致电刘、陈、邓：“现蒋介石正企图从各方面增援邱、黄两兵团……因此，你们阻止敌胡吴两兵团北援，以保证粟军南面安全，极关重要。”据此，刘、陈、邓令中原野战军主力于7月3日晚，“全力昼夜东进，坚决以全力投入战斗，阻制敌人北进。”^①其具体部署是：第4纵队应于3日夜进至漯河、归村及五沟营中间地区，以小部分兵力监视胡璉兵团动向，主力俟该敌通过后，背靠西北，突然抓住吴绍周兵团而割裂之，待第1、第2、第3纵队赶到后，协同歼灭之，并吸引胡璉兵团回顾；第1、第2、第3纵队应于3日夜进至向十、吴城、合水地区，4日继续尾敌前进，各先头团应紧尾敌人；匡斌部继续在周家口地区阻击。

7月5日，胡璉兵团主力已进抵周家口、商水一带，其后卫在小砦子以东龙潭河附近；整编第28师为左翼部队，已进至杨集一带，并继续向周家口前进。吴绍周兵团先头部队整编第85师进至小砦子及扶台集一带，整编第10师尾整编第85师之后，抵达双合砦、马庄、陈集地区。为阻止胡、吴两兵团继续北进，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向胡、吴兵团之接合部——扶台集、小砦子地区发起攻击。战斗进程是：“六日，胡吴两敌均被抑留于周家口、龙潭河、扶台集一带地区。原定六日夜开始攻击，以四纵攻歼三师一部，以一、二、三纵攻击整编八五师一部，但因敌经我一天打击缩集一堆，又因谍息十八军之三师、二十八师由周家口、商水南返援吴，故停止攻击。七日下午接粟六日酉电告终止对二十五师之歼击于七日晚收兵北移，我以箝制任务已完成亦拟于当晚西移。唯发现胡璉十一师已北进到达淮阳地区，为保障粟部完全收兵休整，故

^①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1948年7月15日致中央军委电。

我全军又在原地夜袭吴兵团，并于八日与之激战整天，至夜始向平汉路西移集结休整。”^①

中原野战军此次阻击战，保障了华东野战军主力歼击黄百韬兵团与顺利撤出战斗。

中原野战军在西平、周家口地区的两次阻击战，“计毙伤敌十师、二八师、五八师、三师、二十师等部共四千八百零五人，俘敌中尉参谋以下三百十九名，缴重机一挺、轻机二七，手提机三三，步马枪二一五，掷弹筒一，各种子弹十五万五千余发，炸弹二二〇，刺刀六，战马二。”连同第一次阻击作战战果（歼灭国民党军 3000 余人）共歼灭国民党军 7800 余人。“我伤一六三二（内团千三、营千十三），亡四一八（内营千二），失联络四九〇，共计二千五百名。”^②

三、袭占老河口、谷城与强攻襄阳

当中原战场上交战双方主力集中于豫东及平汉线许昌、信阳段时，汉水流域的襄樊、老河口一带，国民党军兵力薄弱，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战机，按原定计划发起襄樊作战。

7月2日，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冒滂沱大雨，自新野出发，向老河口奔袭，一昼夜急行军近80公里，当先头部队23时进抵老河口时，守敌第163旅第487团已于当日下午向谷城撤退。第6纵队即渡汉水跟踪追击，3日夜进至谷城以北地区。守军第163旅又放弃谷城南逃。此时，陕南军区第12旅已由均县草店隐蔽东进至谷城以南，截断了第163旅的退路，并一举歼灭其第488团和第487团1个营，俘虏1800余人。桐柏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于7月2日由太平店渡汉水，3日在茨河以北截歼第163旅辎重营。第一阶段作战即告结束。

7月4日，第6纵队及陕南军区部队，沿汉水两岸隐蔽地向襄

①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1948 年 7 月 15 日致中央军委电。

② 同上。

阳、樊城方向逼近。

5日14时，王宏坤发布第二阶段作战命令：由王近山统一指挥第6纵队、陕南第12旅和桐柏第3军分区部队，编成“襄阳集团”，负责攻击襄阳；以桐柏军区第28旅、第1军分区第88团、襄阳独立团，负责攻击樊城。拟定6日黄昏发起攻击，求得12日前占领襄樊。

襄阳城北依汉水，与樊城隔水相望，城东和城南被汉水环绕，西门和南门外群山耸立。历史上攻打襄樊，不乏先例。张献忠、李自成攻占过；孙坚在打襄樊时，夺得樊城，却战死襄阳岷山；名将关羽在夺取襄阳后，在樊城水淹七军，然并没有拿下樊城。

王近山根据上级命令和襄樊守敌布防情况，决定首先包围襄阳，断其水陆退路，攻占城南诸山，而后依山攻城。其具体部署是：“以桐柏三分区五个营经泥咀、尹家集于六日夜进至钱家营、石灰窑地区，主力向铁帽山、文笔峰逼进，另一部伸到汉水西岸构筑工事，严防襄城敌乘船南逃；以陕南十二旅经泥沮、尹家集以北进至七里店以南地区，首先控制尖山、双背梁子、虎头山、凤凰山，向敌稳步推进；以本纵十八旅由太平店渡河，经茨河出南漳歼灭该地土蒋，并准备打援战场；以十七旅经谷城、庙滩、泥咀，进至万山东西地区，直向襄阳城西关逼进；十六旅则随十七旅后跟进，位于泥咀东西地区，作十七旅之第二梯队。”^①

7月6日，“襄阳集团”完成了对襄阳城的合围。同时，第6纵队第18旅袭占南漳、宜城。7日，开始攻击襄阳外围据点，至10日先后攻占了琵琶山、真武山、凤凰山和岷山等。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施用猛烈炮火、毒气顽抗，使解放军伤亡很大，进展缓慢。

7月9日，白崇禧电令康泽，“匪众我寡，守备襄樊则更单薄，着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并告，“已令整

^① 《第6纵队襄樊战役总结》。

编第七、第九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因抽调兵力需时，务须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白崇禧还在7月11日电报里给康泽鼓劲说，“襄城系背水阵，舍死乃能求生，固守必能解困。”^①9日午后，守备樊城的第164旅，在空军掩护下，放弃樊城，向襄阳转进，至16时，渡过汉水。

7月11日，王宏坤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作战情况说，陕南第12旅共5个营的兵力，只有1个团能打；桐柏第3军分区部队在1948年1月打邓县时伤亡过大，此次对攻山头缺乏信心。王宏坤提出，襄阳作战须作重新考虑。野战军司令部于当日夜决定，令王宏坤暂停攻击，研究新的方案。11日，王宏坤在第6纵队驻地召集王近山、刘金轩等开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下襄阳。12日下达“襄阳作战命令”，规定：“（一）六纵除以主力由城西攻击外，应以一分别钳制城南高地及城内之敌，确保西面攻击部队右翼之安全。（二）金轩以五个营由东门及北攻击。（三）二十八旅以两个团由东门（不含）以南东南角（含）以北攻击，并派一部钳制南面高地之敌，保证攻击部队左翼之安全，其另一个团位于东津湾、张家湾一带机动（城东部队由金轩、庆德统一指挥）。（四）张廷发统一指挥八六团及金轩一个团，位于赵家堰、凤凰山、铁帽山、观音阁线钳制凤凰山以北及岷山之敌。（五）方正平指挥八八团（欠4个连）及襄阳独立团，位于樊城及东西地区，防敌过汉水北窜。”^②要求各部务于14日12时完成攻击准备，黄昏发动总攻。

第6纵队由南向北，先攻占南山，尔后依山攻城的计划实施后，虎头山、羊祜山两个主阵地未能拿下，先占南山的计划受挫。王近山适时吸取了经验教训，断然改变计划，一反历代兵家攻襄阳城必先攻山的惯例，将主攻方向指向襄阳城西门。王近山认为：

^① 国民党军华中“剿总”：《襄郢会战有关电报》。

^② 金全敏等主编：《襄樊战役》第51—52页。

“城南高地与汉水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西门，虎头山、羊祜山主峰敌火力不能直接对它造成封锁。由于中隔琵琶山、真武山，敌人也不会倾巢下山反扑。若将攻城重点置于西门，利用已攻占的琵琶、真武二山，切断主峰守敌下山的通路，打通城西走廊，可一举直达襄阳西关。”^①

攻城各部队受领任务后，一面巩固已占阵地，一面积极准备攻城。7月13日，第6纵队控制了攻击西门的唯一通路——西关大石桥；14日黄昏，东、西两面攻城部队采用近迫作业，将突击队、火力队推进至攻击出发位置。

襄阳即将城破之际，蒋介石却认为，“危险期已将过去”。他在7月13日致康泽的电报称：“南北两方援军最迟必于二十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至电中（按指康泽11日致蒋介石电）所述匪部装备与战况，以余判断，认为危险期已将过去。匪逼至襄樊外围各据点，激战恶斗已达数昼夜。匪部攻势之损失，将比我军伤亡更大。而且对方作战皆无后方，弹药之接济，照屡次战役之经验，匪部弹药决不能持久三日至五日时间。尤其各种炮弹之补充更为缺乏。在过去数日之激战，其枪炮攻势虽甚凶猛，但其炮弹必因争夺外围山地消耗殆尽。何况山炮之威力并不能轰破我坚固城墙耶！故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攻之办法，则必能击退匪部，确保安全；有时且可乘机转为攻势，歼灭疲乏之残匪；何况有我空军昼夜来助战，非匪之可能及也。”蒋介石告诫康泽，“只要信赖余言，坚忍镇定，匪虽凶横，其如何乎！”^②

康泽根据蒋介石“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的训示，决定从7月14日13时起，“将山地部队转移城内”，并“誓谨不成功

① 《刘伯承传》第444页。

② 《人民日报》，1948年8月4日。

便成仁之决心，期达固守待援之使命。”^①

15日20时30分，攻城部队对襄阳城实施炮火准备。经30分钟火力袭击，西门及其以北300米地段上的碉楼和地堡大部被摧毁。21时，发起总攻。突击分队在炮火掩护下对西门展开连续爆破，将城墙炸开一个缺口，突击营随即通过外壕石桥，排除重重障碍，冲至城下，进行架梯登城。在第一架木梯被打断、突击队面临敌密集火力杀伤的情况下，第49团1营排长李发科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肩膀搭成人梯将两名战士送上城楼。登上城楼的战士用手榴弹和刺刀打退守敌的反扑，掩护突击排登上城楼，巩固了突破口。后续部队迅速从突破口突入城内。西门被突破，守军完全陷入混乱。从城东北角和东南角攻击的桐柏军区第28旅和陕南军区第12旅，乘机涉壕登城，投入巷战。在解放军强大攻势面前，守军纷纷投降。康泽指挥残部妄图依托司令部的坚固建筑物进行顽抗。他的司令部是一所独立的四进旧式祠堂，四角筑有十分坚固的两层碉楼，祠堂中心筑有一个更为坚固的三层主碉楼，与康泽居室由地道相通。

16日16时，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以迫击炮平射和工兵爆破与步兵攻击相结合的战法，对绥靖区司令部发起最后攻击。战至19时30分，全歼守军。第12旅第34团第3营冲入康泽司令部，当场俘虏第15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郭勋祺；康泽隐藏在尸体堆中装死，后被第6纵队查获。

襄樊战役开始后，华中“剿匪”总部即令整编第7、第20师两部赴援襄阳。因部队调动费时，延至7月9日始由黄陂等地西进。据称：“在天气炎热，山洪阻碍，及匪军之逐次抵抗下，不顾一切，排除万难，兼程前进，每日行程均超出30公里以上，尤其第7师星夜渡过襄河，孤军独进。”^②预计18日可到宜城，但16日

① 《人民日报》，1948年8月4日。

② 华中“剿总”：《襄鄂会战史》。

夜整编第7师先头到达乐乡关时，襄阳已被解放军解放。

为保持作战主动权，中原野战军占领襄阳3天后即撤出。该城遂为整编第20师进占。

襄樊战役自7月2日至16日，历时14昼夜，中原野战军以伤亡37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灭第15绥靖区司令部、第104、第164旅全部，第163旅大部及3个保安团，共约2.1万人，其中俘虏康泽等8名高级军官，解放老河口、光化、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东津湾等城镇的胜利。是役，从战场的选择、战机的捕捉、以及在战役的部署和指挥上，都充分体现了刘伯承、邓小平胸怀全局趋利避害，机动歼敌的军事思想。其意义，正如7月23日中共中央贺电所说：“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9月15日，刘伯承写了《襄樊战役总结》，认为，这一战役的主要经验是：“一、这一战役的胜利，是由于敌我两军对战于豫东、平汉线，将敌主力吸走，襄樊孤立，蒋、白两敌初判断我无力攻襄，襄阳可以固守，发援较迟，一到我攻下，援兵已来不及。这与六月刘邓与胡璉对战，粟裕与邱清泉对战，陈士榘得钻隙攻克开封相类似。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二、攻克老河口、谷城等地，是三个兵团东西对进，配合得宜，使敌一六三旅大部被歼。陕南部队截断谷城起了初战胜利的决定作用。三、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十三日后，我鉴于虎头山、羊祜山永久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划以勋（县）白（河）独立团佯攻该两山之敌，以六纵全力攻襄阳西门，孔庆德全力攻城东南，刘金轩五个营攻城东北，面将三军突击队会合于城内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在攻城中王近山指挥和第六纵起主导

作用。”^①

国民党军检讨襄樊作战失利原因是：“（一）我战略正面过广，须守之点线太多，机动兵团因顾此失彼，此次陇海会战，华中区之机动兵团均调向陇海方面以致襄阳被围，调动援兵不及。”“（二）襄阳城西南各高地能瞰制全城，羊祜山离我城西角仅400公尺，轻重机枪及火炮可以纵射西南城垣，瞰制南城区垣，诚为阵地之锁钥部。自放弃西南各高地之次日晚，匪即突被城防工事，守山地几十日匪攻不下，退守城内一日即被攻陷，足证放弃西南高地之失策。”这实际上是批评蒋介石，因为放弃西南高地入城固守是蒋介石的主张。“（三）我守备石花街谷城各据点之163旅主力，原为撤退至襄阳集结机动作战，惟对老河口至襄河间之船只，事先既未确实控制，临事又不彻底破坏，使匪夺获船只，强渡襄河西岸，侧击截击我163旅，致遭惨重损失，削弱我保卫襄阳之兵力，影响战局甚大。”^②

第六节 山东、苏北解放军发动攻势， 恢复与扩大解放区

一、山东、苏北兵团的成立

1947年秋冬，为配合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边区，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又称东兵团）同继续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收复了胶东广大失地。在苏北地区坚持斗争的华东军区部队，经半年的艰苦作战，改善了斗争形势。1948年初春，内线兵团的第7、第9纵队位于掖县南北，第2纵队位于莱阳附近，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在苏北地区的第11、第12纵队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34—435页。

^② 国民党军华中“剿总”：《襄樊会战史》。

也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国民党军进犯胶东解放区的“九月攻势”失败后，从1948年初开始重新划分了山东战场的绥靖区，除原有的第2、第3绥靖区外，又成立了第9、第10、第11绥靖区，并以部分保安部队编成了第2、第32、第35等3个整编师。其分布：

第2绥靖区司令部驻济南，司令官王耀武，辖整编第2、第45、第73师，共9个旅，防守济南周围地区和胶济路中、西段及莱芜、新泰、蒙阴等地区。

第3绥靖区司令部驻贾汪，司令官冯治安，辖整编第59及第77师第37旅，共3个旅，防守临沂、韩庄、峯县、枣庄、台儿庄、贾汪等地，其整编第77师第132旅驻防徐州。

第9绥靖区司令部驻海州，司令官李良荣，辖整编第83、第44师（欠第162旅），共4个旅，防守临沂、沂水、新安镇、海州、日照等地。

第10绥靖区司令部驻兖州，司令官李玉堂，辖整编第12、第72、第32师第141旅，共6个旅，防守津浦路滕县、兖州、大汶口段。

第11绥靖区司令部驻青岛，司令官丁治磐，辖整编第35、第64师，共5个旅，防守青岛、城阳、即墨等地，第8军两个师防守烟台、威海卫地区。

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共5个绥靖区、13个整编师、26个旅。

在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南的苏中、苏北地区，国民党正规军有5个整编师、10余个旅。其分布为：

第1绥靖区司令部驻南通，司令官李默庵，辖整编第4、第21师和暂编第23师，共6个旅及交警第15总队，防守东台、如皋、南通、靖江、泰兴、海门等地。

第7绥靖区司令部驻淮阴，司令官张雪中，辖整编第51、第44师第162旅和暂编第25师，共5个旅，防守新浦（今连云港）、大伊山（今灌云）、宿迁、沐阳、泗阳、涟水、淮阴、淮安、阜宁、

宝应、兴化等地。

此外，第8绥靖区整编第46师第188旅，防守津浦路明光、滁县段；第203师第2旅，防守蚌埠地区；第6绥靖区整编第24师，防守灵璧、泗县，青阳等地。

上述国民党军的主要任务是防守点线，以巩固其占领区。

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苏北地区的力量，进一步开展该区斗争局面，使之形成一个重要战场，威胁国民党的基本统治区南京、上海，并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调动一部分军队向东和策应山东内线兵团的作战，拟由许世友率第9、第13纵队留在山东，由韦国清、谭震林率第2、第7纵队南下苏北。^①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提出从山东抽兵到苏北的两个方案：（1）许世友、谭震林率第7、第9纵队暂留山东，2、3月协同第2、第13纵队打几个较大的歼灭战，只要在山东能大量歼敌，迟两个月南下是可以的。特别是在胶济线、津浦线徐济段或鲁中地区歼敌四五个旅，对于巩固山东及尔后南下是有利的；（2）由韦国清、谭震林率1个纵队于2月先行南下，与第11、第12纵队会合。毛泽东、陈毅认为，如此，缺点是平分兵力（南北都是3个纵队），但苏北有了1个主力纵队，又有韦、谭统一指挥，局面亦可开展；待北面局面打开，又由地方军形成1个新纵队之时，再行考虑抽1个纵队南下。两案何者为宜，要求华东局与许世友、谭震林酌商见复。^②

根据华东局的意见，中央军委于1948年1月30日决定：“韦国清率二纵于丑（2）月下旬赴苏北，与十一、十二纵队会合，成立苏北兵团，以韦为苏北兵团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但实际仍主持工委工作，吉洛（姬鹏飞）为副政委，与韦国清一起主持军队。”“苏北兵团受陈粟指挥”；“许谭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负山东

^① 中央军委1948年1月9日致华东局电。

^②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28页。

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其作战、休整、补充等计划,经过华东局考虑向军委提出意见,得军委批准然后执行。”^①

1948年2月内线兵团结束整训,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改称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谢友法。辖第7纵队,司令员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辖第19、第20、第21师;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辖第25、第26、第27师;第13纵队,司令员周志坚,政治委员廖海光,辖第37、第38、第39师。全兵团8.1674万人,装备野榴炮15门、山炮27门、轻重迫击炮214门、60炮134门、重机枪315挺、轻机枪1618挺、长短枪2.5740万枝、掷弹筒和枪榴弹筒1253具。

2月17日,第2纵队由诸城以东地区南下,3月上旬,在驼峰、阿湖间越过陇海路,3月14日到达阜宁以西之羊寨地区。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中指挥部撤销,成立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治委员陈丕显,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副参谋长陈玉生。辖第2纵队,司令员滕海清,政治委员康志强,辖第4、第5、第6师;第11纵队,司令员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辖第31、第32旅;第12纵队,司令员陈庆先,政治委员曹获秋,辖第34、第35旅。同时,将苏中、苏北军区合组成苏北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辖第1、第2、第5、第6、第9军分区。苏北兵团共6.3万余人,装备山炮17门、轻重迫击炮123门、60炮68门、重机枪242挺、轻机枪1508挺、长短枪1.7715万枝、掷弹筒和枪榴弹筒286具。地方武装5.6万余人。

二、山东兵团转战胶济路和津浦路

(一) 出击胶济路西段,夺取周村

1948年初,当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集结濮阳地区休整时,王耀武害怕华东野战军内、外线兵团合击津浦路中段,乃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79页。

将胶济路西段之整编第 12 师与在兖州之整编第 32 师第 141 旅对调，将整编第 73 师之新编第 36 旅调归第 32 师，并从潍县调整编第 45 师第 211 旅至泰安，整编第 72 师集结兖州，整编第 2 师集结济南，从而加强了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防御，但却削弱了胶济路西段的防守力量。在东起张店、西至明水、北自齐东、南达博山的地域内，只有整编第 32 师和新编第 36 旅及交警第 1 总队、淄博警备旅和保安部队共约 4 万人，分散守备周村、邹平、桓台、张店、淄川、博山、章邱（今章丘）等地。

1 月 30 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指出山东兵团应争取 2 月以前完成休整，2 月下旬开始新作战行动，“以一部监视胶东之敌，主力向胶济西段机动。”^①31 日又指出：“许谭所部除留十三纵于胶东外，主力七九两纵配合渤海地方兵团，寅（3）月上旬开始向胶济路西段作战。”^②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和胶济路西段守敌的防御部署情况，许世友、谭震林于 2 月 24 日致电华东局，并转中央军委，决定举行胶济路西段战役，以张店（今淄博市）、周村、长山、邹平、章邱为第一步攻击目标。25 日 17 时，华东局复电同意许、谭的布置，并决定在西线作战期间，鲁中军区部队及渤海纵队归山东兵团统一指挥。

许世友、谭震林决定，采取远道奔袭的挖心战术，首先攻克周村，调动各点国民党军出援，尔后力求在运动中歼灭其一部，并乘机夺取周村附近各点。第 7、第 9 纵队从掖县地区出发西进，3 月 7 日进抵广饶西北地区集结。驻守周村的整编第 32 师师长周庆祥慌忙调整部署，令第 141 旅、新编第 36 旅放弃长山、邹平等地，连夜集结周村；令淄博地区守军集中淄川，准备固守。

10 日晚，山东兵团各纵队从集结地冒雨向进攻出发地开进。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4 卷，第 379 页。

^② 同上，第 409 页。

11日拂晓，第7纵队第19师围攻张店，守敌弃城西逃，被迫歼于郊外。12日拂晓，渤海纵队攻占邹平，次日晚夺取章邱县城。担任主攻周村任务的第9纵队因道路泥泞，12日晨才进至进攻出发位置，而这时敌师长周庆祥已将部队收缩到周村固守。

12日清晨，第9纵队第25师从东北面、第26师主力从西面、第27师从东南面向周村发起攻击，相继突入城内。在攻城部队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守敌成连、成营缴械投降。至23时，战斗胜利结束，歼灭守敌1.5万余人，周庆祥化装潜逃。

周村攻克后，胶济路西段之国民党军全线动摇。邹平、桓台、博山、益都、临淄、莱芜、新泰、蒙阴等地守敌，纷纷弃城逃跑。

周村战斗胜利后，山东兵团决定乘胜扩张战果，以第7纵队进攻淄川，以渤海纵队及第9纵队第26师阻击可能由济南来的援敌。第7纵队于14日开始攻击淄川，至17日肃清了四关守敌，进行攻城准备。19日16时30分，在百余门火炮掩护下攻城，激战至21日4时，全歼守敌新编第36旅第106团，淄博警备旅第1、第4团，交警第1总队和保安团等共8000余人。

在淄川危急时，王耀武将从津浦中段调来的整编第73师和从商丘车运来的整编第75师及整编第2师第213旅、保安第4团等共5个多旅分3路从济南出动东援，20日突破渤海纵队坚守的南诸山、章邱一线阵地，进至明水。这时淄川已获解放，加之东阿、肥城又被冀鲁豫军区部队占领，济南感受威胁，王耀武不得不令援军西撤固守济南。

胶济路西段战役，历时12天，计毙敌6920人，俘敌3.2540万人，共3.9万余人，收复周村、张店、临淄、淄川、邹平、桓台、长山、章邱、明水、龙山、齐东、博山、莱芜、蒙阴等14座城镇，扩大解放区面积1.2万余平方公里，使渤海、鲁中两解放区连成一片，将济南与潍县国民党军的陆上联系完全切断，使昌潍地区国民党军陷入被包围状态。

(二) 挥师胶济路中段，攻克潍县

胶济路西段被攻占后，该线除两端的济南、青岛仍为国民党军控制外，在中段仅剩潍县、安邱、昌乐地区，仍由整编第45师共4.6万余人防守。

4月1日，王耀武飞抵潍县，与整编第45师师长陈金城商讨守城策略，决定放弃不重要之据点，彻底实施集中兵力；多筑城脚下地堡，固守潍县。

潍县位于胶济铁路中段，是连接胶东、渤海、鲁南的重要枢纽，号称“鲁中堡垒”。当时拥有10余万人口，为山东省工商业中心之一，同时又是一个坚固的封建据点，周围数十县的地主、土匪等均逃到该城，是蒋介石在山东腹地的重点设防城市。城区分为东西两城，俗称“双城”。西城高出东城5米。白浪河纵贯其间。经多年修筑，已构成以西城为核心、三道防线的半永久性、有点有面，既可独立坚守，又可互相支援的防御体系。配备山炮以下各种火炮、迫击炮113门。陈金城自诩“固若金汤”。王耀武也认为潍县工事坚固，兵力较多，可保无虞。其兵力部署是：陈金城率其师部及第212旅2个团、第214旅2个团及4个保安总队守西城及其四关。第212旅旅部率1个团和1个保安团守东城。1个保安团守坊子，1个自卫总队守寒亭，4个保安团及土杂武装分守田马、昌乐及其附近地区。

1948年3月20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转许世友、谭震林，“庆祝你们周村、张店、邹平、桓台等地的大胜利。”同时指示，胶济全路一切尚存路基、铁轨、车站、桥梁、水塔及其他设备，通令保护，不得再破坏。^①

山东兵团根据中央军委“淄川攻克后略作休息，进攻昌潍”的指示，将主力集结于周村、广饶地区进行了10天休整和补充兵员。3月下旬，第7纵队调至章邱、长白山地区；渤海纵队移到益都地区，逼近潍县；第13纵队集结于莱阳介店地区，准备参加胶济路

^①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39页。

中段作战。经过缜密侦察后，许世友、谭震林决定采取稳扎稳打的战役指导方针，并接受第9纵队建议，集中兵力首先夺取西城，尔后或打援或继续围攻东城。据此，4月6日下达了作战命令：

渤海纵队并指挥鲁中军区4个团、渤海军区3个团和兵团野炮营，协同第9纵队主攻西城。首先以一部兵力包围昌乐、田马、埠庄等地之敌，切断其同潍县的联系，主力担任对潍县城西、南面之包围和夺取西关、南关，伺机攻城。

第9纵队并指挥第13纵队第38师、胶东西海军分区3个团和兵团榴弹炮营、胶东军区重迫击炮营，主攻西城。首先以一部包围东、北面，夺取北关，尔后以主力从西、北门攻城。胶东西海军分区部队切断潍县同坊子联系，占领飞机场，并包围寒亭。

第13纵队（欠第38师）并指挥胶东军区新组建的第5师和南海、滨海军分区4个团，占领沽河、夏格庄、姜山集等阵地，阻击可能由青岛西援或北攻莱阳之敌。

第7纵队并指挥渤海新组建的第13师，集结章邱、长白山地区，以一部控制龙山。如潍县战斗开始前国民党军来援，则以有力一部取运动防御节节抗击，主力转入长白山及以北地区，待机协同兵团主力打击援军；在攻击潍县开始后，则扼守明水、章邱、长白山之线顽强抗击援军。

以上总计兵力54个团，其中攻城23个团，阻援31个团。另有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的炮兵第3团、第1团第3营、第2团第5连和山东兵团炮兵团，连同各纵队、各师所属炮兵，共计各种火炮893门。此为华东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在一个战役中使用炮兵数量最多的一次。

4月2日，各部按预定计划向昌潍地区开进。8日完成了对外围守敌的分割和对潍县的包围，并立即对城关发起攻击。

至18日，相继占领50多处外围据点，并肃清了潍县四关，共歼灭国民党军7000余人。

19日，攻城的各部队暂停攻城，转入敌前练兵，隐蔽地进行

以挖掘地道、交通壕为主的攻城准备。仅第9纵队就挖了交通沟7.2万米、坑道255米、隐蔽洞2.3120万个，修地堡400多个。

陈金诚乘山东兵团做攻城准备时调整了部署：以整编第45师第212旅第635团、第214旅第642团残部及保安第8总队等坚守西城；以第212旅旅部率第634、第636团坚守东城，其他保安团位于西关及东西城之间地区，企图继续固守待援。战役期间，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383架次，轮番向解放军阵地轰炸扫射。

23日17时，第9纵队第25师由西北关，第27师由东北关，渤海纵队1个师由南关，采取炮火、爆破和突击相结合战法向西城发动强攻。24日20时，攻城部队主力相继突入城内，展开巷战。守敌溃退，夺路向东城逃窜。西城获得解放。在解放西城战斗中，第9纵队第27师第79团为巩固突破口，掩护后续部队向纵深发展，在城墙突破口上同守敌战斗了20个小时。战后，该团被华东野战军授予“潍县团”的光荣称号。

26日黄昏，第9纵队依托西城以第25、第27师并肩向东城攻击，鲁中军区部队于城南配合，西海军分区部队在东面堵击。激战至翌日7时，占领东城1/3。10时，守敌残部突围向东逃窜，被部署在东城外之第9纵队第26师和鲁中军区、西海军分区部队悉数追歼。田马守敌1000余人于21日为渤海纵队全歼。昌乐、安邱、寒亭守敌突围逃跑，也大部被追歼于逃窜途中。

潍县作战开始后，国民党军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电令济南王耀武派兵东援，令青岛丁治盘派兵西援。4月5日，丁治盘以5个旅开始西援，被第13纵队和胶东军区部队阻止在大沽河沿岸并被歼4443人。王耀武亲率整编第73、第75师和由鲁西南增调来的整编第84师，于4月16日开始东进，沿途遭到第7纵队和渤海军区部队节节阻击，至27日方进抵益都西北5公里之处，且被歼灭3253人。28日，东西援军分别退回青岛、济南。

中共中央华东局获悉攻克潍县，即于当天发出贺电：“今午全歼陈师，解放潍县捷报传来，后方军民欢腾若狂。我东兵团英勇

善战，连战皆捷。”

胶济路中段战役，历时 37 天，歼灭国民党军 4.5670 万人，俘虏陈金城，收复潍县、昌乐、安邱 3 座县城和坊子、寒亭等一些集镇，扩大解放区 1500 平方公里。山东兵团潍县战斗中消耗炮弹 2.9038 万发、轻重机枪弹 44.8 万余发、炸药 1.8683 万公斤、伤亡 7980 人。美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巴大维对国民党军潍县战役的失败作了如下评论：“当潍县争夺战开始的时候，政府军便奉命自济南与青岛移调军队去解救潍县之围。从济南调去的政府军三个多师，遭遇了劣势的共军，因为无心奋力作战，未能冲到潍县。从青岛调去的政府军没有与敌人作战，就返回青岛了。政府在潍县的失败实足以显示：政府军的不忠、士气低落和缺乏作战意志。”^①

山东兵团解放潍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与政治影响。《大众日报》1948 年 5 月 16 日发表社论，指出：“第一，潍坊的解放，使蒋匪在山东的两个主要战略据点青岛和济南更加孤立，使我山东解放区打破了南北阻隔，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今后我军可以更加机动歼灭敌人”；“第二，在潍坊的解放战役中，不但歼灭了敌人的主力，同时全歼了张天佐、张景月等部反动地方武装和伪组织，这对山东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其意义甚至超过了蒋介石主力的被歼，因为以张天佐、张景月为首的伪地方武装，和当地封建反动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在长期罪恶统治期间，给予山东的灾难是十分深重的”；“第三，潍坊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将大大有利于山东解放区的建设工作，潍坊等城市将成为我山东支援战争的重要经济基地。”

山东兵团能取得胶济路中段战役胜利，一是战前充分准备，反复侦察研究地形。确定采取稳扎稳打的方针，主攻纵队组织师、团、营及攻坚连干部到现地侦察，进行沙盘作业。吸取和运用了石家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360 页。

庄战役及周村战斗的经验，以坑道作业接近外壕城墙。二是集中力量，突破一点。针对潍县守敌部署情况，集中 23 个团的兵力与 269 门火炮首先攻取西城，无论兵力、火力均大大超过守城敌军。三是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据不完全统计，政府与人民准备了门板 4.5 万块，锹、镢 1.8 万件，粮食 450 万斤，大小运输车 922 辆，担架 1722 副。

（三）津浦路中段战役，攻克兖州

昌潍战役后，为增援中原战场，国民党军统帅部又将整编第 75 师调走，这样在山东的兵力进一步减少，只能防守津浦线和济南、青岛、兖州 3 个要点。这时，兵力分布是：第 2 绥靖区整编第 2、第 73、第 84 师防守济南及长清、肥城、龙山等地；第 10 绥靖区整编第 12 师以兖州为中心，防守泰安、新泰、汶上、济宁、泗水、曲阜等地。整编第 45 师残部从昌潍地区撤至滕县整补；第 3 绥靖区整编第 59 师及第 77 师第 37 旅以贾汪为中心防守临城、峰县、枣庄、台儿庄等地。此外，5 个保安旅分属第 2、第 10 绥靖区，驻守津浦线徐济段各点。

4 月 30 日，即攻克潍县后的第 4 天，中央军委就山东兵团新的作战任务致电许世友、谭震林并华东局：“如果七十三师、七十五师在胶济西段不走，则应集中全力歼灭该两师。如果该两师缩回济南，则应全军出津浦路，准备以五六个月时间各个歼灭济南、徐州线上之敌。”5 月 5 日中央军委指出：“当粟裕打五军等部时，许谭兵团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十二师、七十五师、八十四师、七十三师等部。”5 月 7 日，中央军委再电指示：“那时如新泰敌一个旅未退，则以围新泰打援军为第一目标，如该敌已退，则直向济南、徐州间选择某地攻击并打援，以协助粟裕兵团之作战。”^①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许世友、谭震林于 5 月 20 日决定，以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460、461 页。

第7、第13纵队、鲁中军区部队，于5月21日开始运动，26日到达莱芜以东苗山南北集结，30日拂晓以鲁中部队攻略泰安，第7、第13纵队于泰安以南担任打援。渤海纵队控制长白山后，继续向西压缩，以箝制济南之敌。第9纵队因攻潍县伤亡较大，仍留置潍县地区整补。5月29日，中央军委批准山东兵团的具体任务是：第一步占领泰安、泗水、大汶口、曲阜；第二步相机攻占汶上、济宁、兖州三点中之一，并求得调动他点之敌增援而歼灭之，逐次攻占汶、济、兖三点；第三步相机攻占邹、滕、临、韩。中央军委指出，执行这一方针，对于许谭兵团的供应，对于割断津浦孤立济徐，对于打通鲁中与鲁西南交通，对于有力配合粟部作战，均是有利的。如果汶、济、兖三点之敌难攻，而邹、滕、临、韩较为易攻时，亦可先攻邹、滕、临、韩，后攻汶、济、兖，或于汶、济、兖、邹、滕、临、韩七点中选择其较易者先攻，较难者后攻。总之，许、谭任务是逐一攻占七点，准备以四五个月完成此任务。”同时规定，山东兵团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只作战略上的配合，不要企图作战役上之配合，“以免互相牵累依赖，失去独立部署之战机。”并强调指出，“此点甚为重要”，望粟裕、许世友、谭震林预先计及。^①

5月29日晚，津浦路中段战役开始。鲁中军区部队逼近泰安，守敌整编第84师第155旅弃城乘火车北逃。山东兵团即向泰安南北扩张战果。至6月2日，夺取大汶口，占领泗水，两次破击临滕、临韩段铁路。控制泰安南北约50公里的津浦路，沿线守敌退守兖州、曲阜、济宁。

6月9日晚，第7纵队围攻曲阜。11日晚，曲阜守敌突围逃跑，被歼灭4000余人，曲阜解放。15日，第7纵队1个师和鲁南军区部队攻占邹县，歼灭山东保安第3旅旅部及1个团。第13纵队和渤海纵队逼近济南。这样，兖州处在解放军的包围态势下。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67页。

决策不当，“我围兗部队过早松围南下，暴露了打援的意图。”^①国民党军统帅部发觉山东兵团围城打援的意图，且睢县、杞县地区寿年兵团被围求救甚急，乃改调整编第25师增援。该师于29、30两日乘车经徐州赶赴豫东战场。

山东兵团打援不成，决定以第7纵队和鲁中军区部队继续围攻兗州，第9、第13纵队按原计划南下。7月1日至4日，攻占了兗州外围各据点，并向西关、南关、旧关展开进攻。

7月3日辰时（7—9时）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和粟裕、饶漱石：“按目前中原情况，山东兵团行动方针有三：全部南下攻击临韩，威胁徐州为上策；以一个纵队南下，主力继续打兗州为中策；全部打兗州为下策。”他认为以执行上策为有利。同日午时（11—13时），许世友、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就山东兵团行动提出两个方案：一是集中全力打兗州，攻占兗州、济宁、汶上。二是全力南下，相机攻取临城、韩庄，威胁徐州，直接配合中原作战。中央军委在4日回电中同意“集中兵力攻克兗州、济宁”的方案，认为这使许谭兵团无后顾之忧，便利尔后全力南下作战，“这是上策，不是下策。”^②

山东兵团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调整了部署：第7、第13纵队（欠第39师）配属兵团炮兵团，迅速肃清西关守军残部及攻占南关，尔后再积极准备攻取兗州城；鲁中军区部队并指挥第39师，主力攻占东关后选择一点攻城，一部攻占北关，并由北向南佯攻，另一部分分别在泰安以东、兗州东南，准备阻援或阻止兗州守敌逃窜；第9纵队主力集结泗水地区待机，以1个师主力位泗水西北柘沟，监视济南守敌；鲁南军区主力彻底破坏临城、韩庄间铁路；渤海纵队主力集结章邱、邹平间休整，一部活动于龙山附近，监视并打击由龙山东犯之国民党军。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攻城部队

① 《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32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98、499页。

于12日17时发起总攻。至21时，第7纵队第20师1个团首先登城，尔后第7、第13纵队主力相继突入城内，进行巷战。守敌组织多次反扑，均被击退。12日黄昏，守敌残部向东南方向突围，被歼灭于兖州东郊。

是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7万余人，其中俘整编第72师师长霍守义以下2万人，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化装潜逃。

为解兖州之围，王耀武以整编第2、第84师由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指挥南援。7月1日出动，12日占领大汶口，13日先头1个旅渡过汶河占领太平镇、莫庄一线。13日晚，第9纵队冒雨出击。吴化文得知兖州失守，即率部星夜北撤。第9纵队仅歼其后尾整编第84师一部约1万人。缴获野炮7门、山炮8门及一大批弹药。

津浦路中段战役历时50天，取得了攻克兖州，解放肥城、泰安、宁阳、新泰、泗水、曲阜、济宁、邹县、滕县等12座县城，扩大解放区1万余平方公里，控制津浦线200余公里，和歼灭国民党军队6.3万人的胜利，使济南陷入完全孤立。山东兵团伤亡8990人^①。

三、苏北兵团进行益林、涟水诸战役

(一) 攻克益林

第2纵队从山东调苏北，一度引起国民党军方面的错觉，认为苏北解放军有南渡长江企图，遂一面在苏北收缩兵力，撤出阜宁、沐阳等县城，以加强各重要据点的守备；一面从兖州、海州地区抽调整编第72、第83师和从中原战场调整编第25、第63师增加苏北地区的兵力。

韦国清、吉洛等决心利用国民党军尚未判明苏北兵团意图，援兵未全部到达，部署未完全就绪之机，进攻益林。3月14日，第2纵队2个师从羊寨地区出发，15日拂晓对益林完成包围。16日

^① 谭震林1948年7月16日向中央军委、华东局的报告。

18时展开攻击，至17日上午，攻占益林城大部，守敌退到东大圩固守待援。17日黄昏，第2纵队进攻东大圩，因两次架桥未成功和第5师突击队遭毒气袭击而未奏效。这时，整编第72师会同淮阴地区的整编第44、第51师共9个团增援益林。第2纵队第6师主力，于18日黄昏对进至南大许庄的整编第72师发起攻击，由于协同不好，仅歼其1个营。与此同时，第4、第5师再次向东大圩发动进攻，激战彻夜，19日拂晓全歼守敌。援敌闻益林失守，乃迅速西撤。配合作战的第11纵队和第1、第9军分区部队，相继攻克掘港（今如东）、三余镇和石港等7个据点。

益林战役，是苏北兵团成立后进行的首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000人，占领益林，对淮阴、淮安造成威胁，迫使国民党加速从中原和山东抽兵来援。苏北兵团亦付出伤亡2800余人的代价。

（二）分兵出击，粉碎国民党军的“追剿”

益林战役后，国民党军10个整编师22个旅于4月初开始对苏皖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其计划是：第一步，对苏皖解放区实施全面的“扫荡”、“清剿”，重点是苏中、淮南两解放区，将苏北兵团主力逐步压缩至盐（城）阜（宁）地区；第二步集中兵力南北对进，与苏北兵团在盐阜滨海地区决战，或将其压至陇海路以北。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企图，进一步开展战局，苏北兵团除指导各军分区武装进行反“清剿”、反“扫荡”作战外，乘国民党军集中兵力扫荡苏中的时机，以第2、第11纵队从阜宁、东台地区出发，向海安、李堡之线出击；以第12纵队从阜宁出发，北上进攻响水口、陈家港。国民党军发现第2纵队南下，于4月下旬结束分区清剿，收缩加强各点线之防御，并将整编第25师调来苏中。同时，以第7绥靖区部队东犯阜宁。苏北兵团出击海安、李堡线之计划不能实现，唯有第12纵队按计划攻占了响水口、陈家港等地，歼灭守敌1300余人，控制了淮北盐场。战后，以淮海地方武

装 1 个团与第 12 纵队特务团合编为该纵第 36 旅。以苏中军分区武装一部组成第 11 纵队第 33 旅。至此，苏北兵团总兵力达 6.9400 万人。

5 月中旬，国民党军第 7 绥靖区司令官张雪中，指挥整编第 72、第 83 师、第 44 师第 162 旅、第 51 师第 41 旅和第 113 旅共 13 个团组成北兵团，黄百韬指挥整编第 4、第 25 师共 11 个团组成南兵团，采取南北对进的战法，企图于盐城、阜宁间滨海地区合击苏北兵团。16 日，南兵团从东台、李堡、角斜一线齐头北进。19 日，北兵团整编第 83 师主力由淮阴北进，接应由新安镇南下之第 83 师第 19 旅及第 3 快速纵队，攻取沭阳，尔后以兵团主力经涟水以北进犯阜宁、东沟、益林。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合击企图，苏北兵团决心乘北兵团向六塘河行动之际，集中主力在盐城以南公路线两侧以伏击手段求歼南兵团一部。

5 月 23 日，南兵团整编第 25、第 4 师并肩向伍佑进攻时，发觉了苏北兵团主力于其翼侧，当即后撤。苏北兵团立即全线出击，由于距离过远、面过宽、兵力分散，激战 3 昼夜，只歼灭 3000 余人，形成对峙。旋因北兵团占沭阳、阜宁后向南急进，苏北兵团为争取主动，于 25 日晚撤出战斗。

5 月底，国民党军南北两兵团在合德（今射阳）会师，对苏北解放区腹地进行疯狂扫荡和对苏北兵团进行“追剿”。苏北斗争形势相当严峻。韦国清、陈丕显、吉洛于 5 月 30 日致电华东局、粟裕，并请华东局转报中央军委：以兵团性质任务要求，主力应集中作战，不应分散，然而依照目前敌情、地理条件，大部队运动不灵活，主力不能过多过久集中，应分散作战、休整。因此，建议在国民党军集中追剿情况下，采取游击兵团的战略指导方针，以独立自主为主，进行必要的分散游击战；“在敌人集中（两个兵团三个师以上）追剿情况下，转移一部主力（二纵）到陇海路以北，进行外线支援华中内线（十一、十二两纵）作战，等待华中内线情况好转，再插回。”6 月 3 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在目前华中

敌情紧张的情况下，苏北兵团应采取临时分散作战的方针，避开敌人主力追剿，配合地方武装游击，以疲惫敌人，寻求歼灭分散的敌人之战机；此种分散或者全军在苏中、苏北就地分散，或者以一个纵队转至外线，待情况变化后再集中兵力作战，由你们按照当前情况决定，”“苏北兵团的作战方针，应以华中的当前敌情为依据，决定自己的独立作战计划。或休整，或在内线，或在外线；一切均以有利于调动敌人减少自己损失和争取打胜仗为目的。只要你们能达到这种目的，就是对于全国作战的有利配合。”“你们应灵活地结合运动战、攻城战与游击战三种方法，借以争取胜利。”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苏北兵团采取分散作战方针，第 11 纵队南下苏中开展攻势；第 12 纵队向淮阴西北之运河线进击；兵团部率第 2 纵队逐步向陇海路北转移。这一分兵使国民党军“追剿”计划遂告破产。

（三）出击陇海路东段和涟水、众兴战役

6 月中旬，华东野战军主力举行豫东战役和津浦路中段战役。国民党军统帅部为集中兵力同华东野战军在豫东地区会战，将在苏北的整编第 25、第 83 师经新集镇（今新沂）转向徐州集中。为牵制其行动，6 月 15 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张震并韦国清、吉洛：“敌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均由苏北向鲁西南前进，我韦吉兵团主力应即向津浦线徐、蚌段前进，并攻击该线。”因苏北兵团正分散于南、北、西 3 个方向作战，一时难于集中，要牵制西援之国民党军已不可能，中央军委根据这种情况，同意该兵团“集中可能集中之兵力，打敌弱点”，出击津浦线之意见不要执行。此时，在陇海路东段，整编第 44 师主力集结于东海、新浦之线构工坚守，在阿湖驻整编第 83 师 1 个连，在房山街和城头镇驻整编第 44 师的 1 个连，其余广大地区则为地方部队防守。为策应豫东作战，韦国清、吉洛决定以第 2、第 12 纵队各一部，首先在陇海线新集镇以东、海州以西发动攻势，歼灭该线分散之敌一部，待兵团主力集

中后，再向运河线进击。

20日晚，第2、第12纵队共11个团的兵力在淮海和滨海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向陇海铁路东段南侧的阿湖、城头、高流、房山、后张湾、新坝发起攻势，至23日，攻克白塔埠、房山、城头、新坝等据点10余处，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部队共2000余人，开辟了（东）海沐（阳）边广大地区，打通了江苏同山东的联系。

陇海路东段战役结束时，整编第64师第159旅由青岛海运东海，整编第74师率第51旅由砀山车运新安镇，整编第44师第162旅率1个团由涟水增防淮阴，在涟水仅为该师1个团及1个保安团共3000余人，兵力薄弱，且孤立突出。韦国清等决定攻击涟水，得手后向西或向南发动攻势。乃以第11纵队在第5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围攻涟水；以第12纵队位大关以西滞河镇以北阻援；以第2纵队由陇海路南桑墟地区进至涟水以东隐蔽集结，准备打击由淮阴、淮安出动的国民党军。

7月3日下午，第11纵队冒着倾盆大雨进入攻击阵地，涟水守敌亦冒雨抢修工事。次日晨，雨量转小，第11纵队攻占了外围据点并逼近城垣后，随即发起攻城，激战至6日，以伤亡339人之代价取得俘国民党军1369人，缴获火炮20门、轻重机枪122挺、其他枪900余枝和一批军用物资的胜利。

涟水战役发起前夕，华东野战军主力正在围歼区寿年兵团于睢县、杞县地区。增援兖州的整编第25师又奉命西调增援豫东。粟裕、张震于6月30日致电韦国清、吉洛，“你们解决涟水之敌后，应即向运河线攻击，造成会攻徐州之趋势，迫敌分散以利今后作战。”韦、吉回电表示，“我们完全同意你们意见，完成歼灭涟水之敌后，即向运河线发动攻势，以利配合路西大歼灭战。”涟水战役结束后，苏北兵团决定以第2纵队攻取众兴（今泗阳）；以第12纵队攻占渔沟；以第11纵队位王营镇以北，准备打击从淮阴、淮安地区来援之敌，保障第2纵队翼侧安全。

8日下午，第2纵队相继从涟水以西的陈师庵、老张集、悦来

集地区出发，向众兴急进。至10日3时许，除大桥之桥头堡和东北角据点外，攻克众兴全部外围据点。11日13时发动总攻，战至17时许，全歼守敌暂编第25师第1团及4个保安队共3000余人，缴获火炮17门、轻重机枪82挺、长短枪1100余枝、子弹30余万发。尔后，第2纵队乘胜进击宿迁。守敌暂编第25师于12日拂晓放弃宿迁逃往睢宁。第2纵队占领宿迁后跟踪西进，围攻睢宁，第11、第12纵队亦进至睢宁以西布防，准备打击和牵制徐州方向来援的国民党军。14日，第2纵队对睢宁构成合围，并开始了攻城作业。这时，豫东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军调集整编第74、第64、第4师，企图向运河线合击苏北兵团。在这种形势下，韦国清、吉洛决定撤出战斗，令各纵队转至淮海或跨运河两岸休整。

苏北兵团在春夏季攻势中，转战苏北、苏中地区，历经益林、盐南、出击陇海路东段、涟水和众兴诸战役，改善了苏北的斗争局势，开辟了威胁京、沪地区的苏北战场，有力地策应和支援了中原和山东战场的解放军作战。

第七节 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进攻

一、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与作战计划

西北野战军经过3个多月的战略反攻作战，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收复了陕甘宁解放区大片失地，并解放了神木县城及其周围一些地方，开辟了黄龙山新解放区。西北野战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全军发展为5个步兵纵队，7.5万余人。武器装备有所改善，积累了较丰富的作战经验。从1947年冬季起，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部队气象焕然一新。为转入外线作战，从思想上、政治上做了很好的准备。这时，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仍有44个整编旅，31万余人，其中胡宗南集团28个整编旅，其分布是：在陕甘宁解放区周围17个整编旅，在豫西、晋南、陕南地区11个整编旅。交战双方兵力对比，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0：1变为5：1。国

国民党军在数量上虽然还占优势，但士气下降，机动兵力减少。战争主动权已转至西北人民解放军手里。

为贯彻中共中央 12 月会议精神，粉碎胡宗南集团的机动防御，夺取西北解放战争的新胜利，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 1948 年 1 月上旬，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举行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具体研究并决定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的各项政策。11 日，彭德怀作了《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的报告。《报告》回顾了 9 个月作战的一般情况后，对这几个月作战提出几点认识：“（一）指挥者对敌、我、民情及地形要熟悉。了解敌人的一般情形是容易的，了解其具体情形就不容易。了解我情也是一样。敌情、我情、地形是下决心的根据，如果不了解这些，就根据任务来下决心”，这就不会完成任务。“（二）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譬如敌人是希望我们过河东的，我们就将敌人引到榆林、米脂，以便陈赓出击。并在敌迷惑之中歼灭敌人。”“（三）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想一口吞。我们善于战役上的包围，而不善于战术上的包围，元大滩的经验就是如此。”“（四）兵不要太大（就是说相当的大就可），只要齐心（榆林战役一个团长不齐心就没有打开）；要练得好，用得法。”^① 同一天，周恩来在这个会议上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说，我们要继续把战争引到外线。西北野战军也要坚决打到外线去。他强调指出：“把战争引到外线，要在全军动员，说明在边区内部把敌人消灭了很多，配合了全国反攻，十个月来你们负担的任务最重，敌人比任何地方要多，我们能够把敌人消灭，并且能够到外线消灭敌人，这是指挥的正确，大家的努力得来的。我们打出去时会遇到在内线所没有遇到的困难问题，如减员等，我们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要在外线生根，我们不但发展大西北，还要向西南发展，在这点上我们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237 页。

西北野战军当仁不让，后来居上，因为我们参战最晚，而打出去又是最后。”

1月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任弼时陪同下，出席了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西北野战军两个月的整训及这个扩大会，是很有意义的，十个月来前后方的合作及一年战绩都很满意。”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准备力量去迎接全国的胜利，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我军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它、吃它，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

会议期间，任弼时发表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贺龙就后方动员与后勤供应问题作了专题报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介绍了华东人民解放军一年来的作战情况和经验。

会议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结合西北战场的实际，通过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决定》指出，“今后，我军即将打到蒋管区去。也只有打到蒋管区，才能利用其人力物力，达到彻底消灭蒋胡等匪帮，解放大西北之目的。”《决定》规定：“我军进入蒋管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大量消灭敌人；一个是建立根据地。我们对于两者均应作长期打算，不要看得太容易。”关于作战问题，《决定》指出，由于胡宗南有与“二马”（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在数量及技术补给方面仍占有优势，“我军进入敌占区后，必须坚持毛主席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所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灵活地坚决执行，达到歼灭敌人正规部队，强大自己之目的。同时必须坚决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建立人民自己武装，建立有力的武装工作队。”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决定》认为，“必须根据土地法大纲，彻底平分土地。”《决定》还就城市政策及新区政策做了明确规定。

对《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于1948年3月11日批转西北局、晋绥分局，并强调指出，除西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外，“各地方党、各地方部队进入新区及城市工作时，

必须依据这一决定办事，如有违犯，前后方军政机关均有权进行干涉或停止其活动，并须追究责任。”

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是在西北解放战争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因而对统一全党全军思想行动，夺取全面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贯彻前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1月29日在米脂县吕梁山召开旅以上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制定转入外线作战的计划。彭德怀提出转入外线作战有3个方向可供选择：北攻榆林；西出陇东；南进陕中。他要求与会者各抒己见。会议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建议打延安，说收复延安政治影响大；有的说应向陇东出击，打击（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二马’。还有的主张直插关中，插胡宗南的老窝去。”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工事，又有1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还不到火候。向陇东出击，路上缺粮食；同“二马”骑兵打仗，可能打不成歼灭战，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消耗，两头一夹击，我们会打消耗战。现在，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①至于再攻榆林，会议认为不仅粮食困难，气候严寒，对攻坚不利，且榆林邓宝珊已派代表来进行和平谈判，再打于已政治上不利。基于以上分析，这次会议决定从战略全局利益考虑，下步作战应南出陕中，这不仅可以大量歼灭胡宗南集团的有生力量，打开向渭北、陇南进军的门户，又可威胁西安，迫使胡宗南援豫兵团回撤，配合中原人民解放军经略中原。这也是中央军委关于南线作战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开辟渭河以北、洛河以东战场。

会议制定的南下作战计划是：第一阶段，夺取宜川、韩城、石

^① 《彭德怀传》第346页。

堡（今黄龙）等城，调动中部（今黄陵）、洛川地区的整编第29军增援而歼灭之；第二阶段，乘胜扩大战果，解放洛河两岸、黄龙山麓各城镇，孤立延安，调回胡宗南增援豫西之兵力，尔后收复延安，进而解放麟游山区。

1948年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给贺龙、习仲勋、王维舟、张经武，决定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联防军的全名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简称为‘联防军区’，下辖晋绥军区及陕甘宁各直属分区；因此晋绥军区的全名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陕甘宁各直辖分区的全名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第几分区’或‘某某分区’。”同日，中央军委“决定任赵寿山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并参加前线委员会为委员。”赵寿山原为国民党军第3集团军总司令。1942年秘密加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到解放区，并通电反对蒋介石。

二、围攻宜川，诱歼胡宗南援军

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个大仗，就是宜川战役。

宜川是胡宗南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1947年10月21日，西北野战军第2、第4纵队解放宜川，23日又主动放弃宜川。胡宗南重占宜川后，即以整编第76师第24旅2个团守备，兵力较弱，且地处黄龙山脉之中，道路崎岖，如再遭攻击，胡宗南还会出兵增援。因为“宜、洛乃关中屏障，不容有失。”^①西北野战军再打宜川，其有利条件较之前次更多。可以依托陕甘宁解放区，掩护部队行动和后勤供应；第2纵队由晋南西渡黄河，可出奇兵；并能获得晋南解放区的直接支援；可以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伏击增援之敌；时值冬春之交，尚未解冻，胡宗南援军在遭到攻击时不易构筑工事，利于运动中就歼。基于以上这些有利条件，彭德怀决定春季攻势的首仗是围攻宜川，诱歼援敌，用他自己的话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第256页。

说，就是“围城打援，钓大鱼。”^① 彭德怀认为，围攻宜川打援“有八成把握，敌如不援即可打开宜川。”^②

宜川被攻，胡宗南将从何方来增援呢？彭德怀根据侦察的材料分析：胡军将从中部、洛川方向来，其路线有3条：一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但有遭解放军伏击的顾虑；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虽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沿第一条道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③ 经过多次交手，彭德怀对“志大才疏”的胡宗南及其部队的脾气是摸熟了的。他认为，胡宗南“主观成性，对下骄横”，为了要兼顾守军与援军，“必然命令刘戡经第一条道路驰援。”根据这样的判断，彭德怀决定把部署打援的重点放在第一条路线上；同时也准备“如敌不援，则夺取宜川后继续南进，夺取韩城、白水、合阳，大荔等城。”^④

2月12日，西北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纵队，分别由志丹（保安）、绥德、米脂地区向宜川前进；第2纵队于16日由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黄河，参加宜川地区作战。22日，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令第3、第6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令第1、第2、第4纵队和第3、第6纵队主力合力打援。

2月24日，第3、第6纵队完成了对宜川的包围，至27日将守敌压缩于城内。彭德怀电告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第6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⑤ 这时，第1、第4纵队已进至瓦子街以北指定地域待机；第2纵队向

① 《彭德怀传》第348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253页。

③ 《彭德怀传》第348页。

④ 同上，第348页。

⑤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

宜川西南圪台街地区开进。

宜川被围攻后，守城指挥官整编第24旅旅长张汉初连电向胡宗南和刘戡呼救。胡宗南闻讯，“除抽调空军支援外，并即作如下部署：“（一）整二十四旅应坚守待援，吸引匪军主力，以为我攻势之支撑。（二）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即率整二十七、整九十师（实共四个旅十个团）沿洛川、永乡、瓦子街向宜川疾进，歼灭犯匪，并解宜川之围。”^①刘戡援军于2月26日由洛川等地出发，27日进至瓦子街地区。瓦子街是宜（川）洛（川）公路咽喉，距宜川约25公里，东经片石、任家湾、王家湾至铁笼湾的公路两侧，山势险峻，荆棘丛生，是一条长约15公里的狭谷，为理想的天然设伏阵地。西北野战军按既定方案，调整部署：以第3、第6纵队各1个旅继续围攻宜川，集中9个旅的兵力迅速抢占瓦子街至铁龙湾两侧高地，待刘戡进入时一举围歼之。28日，刘戡部被西北野战军诱进瓦子街以东的隘路。这天下午起，天降鹅毛大雪不止。刘戡令全军就地宿营，准备第2天继续东进。

2月29日晨，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进到宜川西南之王家湾、任家湾以南高地。昨晚大雪数寸，本晨敌未动。我无粮不能等待，故决向该敌围攻。”^②是日6时，第1纵队攻占瓦子街，堵塞了刘戡的后路。但这时担任控制瓦子街以南高地的第2纵队，因距离远，雪路难行，尚未到达。该高地如被刘戡部占领，就等于让开一个口子，任其逃窜。在此紧要关头，第1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发现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主动令第358旅一部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该旅第714团和第715团1个营，与前来抢占高地的整编第90师第53旅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第714团团团长任世鸿身先士卒，英勇殉职，参谋长武治安也壮烈牺牲，团政治委员徐文礼继续指挥战斗。广大指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第256页。

② 《彭德怀传》第351页。

战员前仆后继，战至黄昏，将第53旅击溃，占领了阵地，堵住了缺口，为全歼刘戡部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其他各纵队、各旅也相继投入战斗。经29日整日激战，西北野战军将刘戡部压缩于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及其附近高地的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形成了严密的包围。

西北野战军冒着大雪严寒，忍饥挨饿，连夜做好了总攻前的准备。3月1日拂晓，彭德怀等发出总攻命令。9时许，第1纵队沿洛宜公路及其两侧由西向东，第2纵队由南向北，第3纵队独立第5旅由东北向西南，第4纵队由北向南，第6纵队（欠2个团）由东南向西北，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刘戡部虽顽强抵抗，但因连日苦战，部队伤亡很大，空军也因降雪不能出动。激战至17时，西北野战军全歼刘戡援军。刘戡走投无路，以手榴弹自毙。

在刘戡陷于重围之际，西安胡宗南坐卧不安，但他手中又无兵再援了。因为整编第二十九军刘戡部是他的机动部队之一，另一支由绥署副主任裴昌会指挥，共4个整编师，则尚在潼关以东，远水难解近渴。胡宗南除一再电请统帅部增援外，“惟赖整29军自力求生耳！”^①

固守宜川城的整编第24旅见大势已去，遂按胡宗南的命令突围。西北野战军于3月2日晚发起总攻击，至次日8时，全歼守敌5000余人，张汉初逃跑时，翻越城墙，跌伤腰部，隐藏在凤翅山下的岩洞中被俘。至此，宜川战役结束。

宜川战役，西北野战军伤4193人、亡1059人、失踪152人、共损失5404人。^②歼灭胡宗南1个整编军军部、2个整编师师部、5个整编旅10个团，计毙伤7523人、俘2.1962万人、共2.9万余人，缴获汽车19辆、化学迫击炮6门、迫击炮24门、六〇炮139门、重机枪193挺、轻机枪979挺、其他各种枪8383枝。这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第261页。

^②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逐次战斗战绩及我军伤亡统计表》。

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大胜利，创西北人民解放军空前的歼敌记录。毛泽东高度评价宜川战役的意义。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①从此，西北野战军南进渭北，西扣陇东之门户打开了，并为继续在国民党区域作战，消灭、削弱胡宗南集团有生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国民党军方面称，“西安绥署自宜川失利后，精锐耗尽，关中危急，胡主任为挽救当前危局，除抽调临汾整三十师主力空运西安外，并经呈奉统帅部准将进入豫东之整一军，回师关中。统帅部为巩固西北，复特令徐州之整六十五师及开封之整三十八师空运西安，增防关中”。^②这样就为人民解放军打洛阳、打临汾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对于在宜川地区损兵折将，十分心痛。他说“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③蒋介石盛怒之下，把胡宗南撤职留用，把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撤职。并要胡宗南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所告，派人领回刘戡、严明（整编第90师师长）尸体，在西安厚葬，同时追授刘、严2人为陆军上将，以安抚国民党军官兵和死者家属。

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里说：“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④彭德怀在1948年5月26日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中指出：“宜川战役胜利的基本原因是什么？首先是三查与练兵的直接结果。”其次，“在战争指导上，我们应使自己不犯错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1页。

②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第277页。

③ 蒋介石：《对国民大会施政报告》，1948年4月9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4页。

而促使敌人犯错误，最好方法是隐蔽自己实力，使敌估计不足，较易获得胜利。”彭德怀同时又指出，在战役指导上仍有个别缺点，如粮食无准备。^①

三、围困洛川，解放黄龙山区诸城

西北野战军宜川大捷之后，乘胜南下，向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广大地区进军。这时，担任这个地区守备的国民党军队兵力薄弱，有利于西北野战军各个歼灭。黄龙山以西的中部、宜君和黄龙山以南的白水、蒲城、合阳、韩城、石堡地区仅有3个多保安团及各县保警队守备。守备孤城延安的是整编第17师，守备洛川的是新编成的整编第61旅。

宜川战役即将结束之际，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就于3月2日致电中央军委和贺龙、习仲勋：“拟以一、四两纵取中部、宜君，得手后相机攻同官；以二纵队取石堡镇，得手后取澄城、白水，以上到支（四）日出动。三、六两纵继续攻克宜川，得手后取洛川，收复甘、郿^②，准备收复延安各种条件。妥否盼示。”当日下午，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上述作战方案，并指出：“目前数日整顿队势，如粮食有办法，以寅齐（3月8日）前后出动为宜；如粮食困难，则提早出动。”关于俘虏的处理，“建议俘虏随军尾进就粮，俘官将校后送，尉级就地向西南两线各城释放，扩大敌军失败情绪。”中央军委强调指出，“大胜之后干部极易发生骄傲，望谆谆告诫，以利逐步扩大胜利。”^③

宜川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各部队立即进行了短暂休整。彭德怀等鉴于宜川、延长一带粮食奇缺，部队给养面临困难，决定提早南进，围攻洛川，控制黄龙地区，发动群众，筹备粮食。3月4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发布作战命令：本野战军“决继续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239—241页。

^② 甘、郿指甘泉、郿县。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11页。

扩大（战果），切断咸、延路，消灭分散之敌，夺取小城市，扩大解放区之目的。”并作如下部署：1、由张副司令统一指挥第1、第4两纵，5日晨出发，歼灭岷嶮镇守敌2个营后，继续向中部、宜君间挺进，首先袭取宜君，然后以主力围攻中部。2、第2纵队主力于5日晨向石堡攻击前进，歼灭守军陕西保安第1团，相机夺取澄城、白水。3、第3、第6纵队于6日晨向洛川挺进，于9日完成围城部署后，即攻取洛川。

按照上述部署，西北野战军各纵队相继出动。第1、第4纵队在副司令员张宗逊率领下，3月5日分别从瓦子街、张家湾出发，岷嶮镇及石堡守敌惧歼，先机南逃。9日下午，第1、第4纵队分别向宜君、中部发起进攻。驻守宜君的陕西保安第3团一部及保安队，一部被歼，大部逃跑；守备中部的陕西保安第15团1大队，小部被歼，大部投降，一部逃窜。两城均获解放。第2纵队（欠第359旅）5日从宜川西南的屹台街地区出发，向白水、蒲城县城攻击前进。10日拂晓，进占白水县城，并向蒲城前进。第3、第6纵队于3月6日从宜川及其附近出发，沿洛宜公路经旧县镇向洛川前进，9日完成了对洛川的包围。

洛川位于洛河以东的一个黄土梁上，是咸（阳）延（安）公路上一个重镇，是胡宗南集团的重要物资供应基地，曾经是国民党军进犯延安的一个出发地。城周围沟壑纵横，道路多为岷嶮形成的隘路。守敌沿山梁边沿构筑了坚固工事，挖掘了深达几米至10几米的外壕数道，设置了多层铁丝网，埋设了大量地雷，易守难攻。

洛川遭围攻后，守城指挥官整编第61旅旅长杨荫寰既向延安求援，也向西安呼救。胡宗南急令裴昌会第5兵团从豫西回撤，增援洛川。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两次电告彭德怀等人要注意部署打援。一次是3月15日电指出，“你们攻洛川时，必须注意同时部署打援。”一次是21日电示，“不论现在打洛川将来打延安，敌

均有增援可能，望部署打援。”^①

遵照上述指示和胡宗南集团的动态，彭德怀等决定实行“攻城打援”，以第3、第6纵队继续围攻洛川，引诱裴昌会兵团北援；集中第1、第2、第4纵队，位于适当地区，待机打援。第3、第6纵队多次攻城均未成功。从客观上讲，是洛川城坚地险，守敌拼死顽抗。从主观上讲，缺少攻城火器与攻城作战经验，攻城部队协同配合也不好，发生火力与突击队、突击队与后梯队脱节现象。

胡宗南在宜川作战时吃了西北野战军围城打援的亏，送掉其主力5个整编旅。此次增援洛川，他害怕重演刘戡毙命的悲剧，于是令裴昌会兵团谨慎小心。该兵团从4月5日开始，由铜川出发，沿咸延公路北进时，日进15公里，夜退7公里，齐头并进，步步为营，至11日，7天仅前推52公里进至宜君。尽管西北野战军采取了一些诱其深入的行动，裴昌会就是不就范。延安的整编第17师更不敢脱离防御阵地而南援。西北野战军“攻洛打援”计划不能实现。战局陷于对峙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不得不考虑新的作战计划。

西北野战军围攻洛川作战期间，伤亡1848人。毙伤国民党军945人，俘2299人，共计3244人^②，缴获榴弹炮1门、野炮8门、山炮6门、迫击炮3门、六〇炮18门、重机枪76挺、其他各种枪597枝，以及炮弹689发、子弹35万余发和一批军用物资。解放了石堡、中部、宜君、白水、韩城，一度解放了甘泉、合阳、澄城，达到了扩大与巩固黄龙山区根据地的目的，并切断了延安、洛川国民党军同西安的联系，为收复延安创造了条件。在战役中，第1、第2、第4纵队派出大量武装工作队，配合地方政权开展驻地附近的群众工作，宣传群众，模范地执行各项政策，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44页。

②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西北解放战争重要战役一览表》。

四、进军西府，收复延安，转战陇东

(一) 进军西府

西北野战军久攻洛川不下，求歼胡宗南援军亦因裴昌会兵团猥集于铜川、蒲城地区而不能获得战机。几万人马集中在黄龙山区，军民粮食都很困难。西北野战军久驻此地区，于西北战局发展不利，于全国战局发展也不利。因为刚遭受打击的胡宗南集团可以乘此喘息机会，调整部署、整顿部队；中原解放军取得洛阳战役胜利之后，正在部署新的战役；徐向前部正在围攻临汾，他们很需要西北野战军牢牢抓住胡宗南集团，不让他抽兵增援中原和山西。这时，胡宗南将其主力集中于渭河以北、洛河东西地区，在西安以西，泾河和渭河之间这个古称西府的广大地区，除泾阳、耀县、淳化三角地区有暂编第2旅、新编第9旅及骑兵第2旅守备外，千县、枸邑地区有陕西保安第19团，暂编第2旅第5团守备，西安附近为整编第203师外，兴平、麟游、陇县、宝鸡等10余县，十分空虚；胡宗南集团的重要后方基地宝鸡，也仅有整编第76师师部、第144旅第40团及陕西保安第21团等2000余人守备。青海马步芳之整编第82师在甘肃镇原以东地区。这样，西府地区就成为西北野战军发展攻势的有利区域。

彭德怀、张宗逊等人分析研究战场形势之后，决定以野战军主力进军西府。4月6日，彭德怀在致中共中央工委转中央军委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里说：拟以第3纵队继续围攻洛川，集中4个纵队寻机歼灭援敌2个旅，“如不可能时，则吸引敌人深入洛川，我们四个纵队突然夺取枸邑、千县、永寿、长武、醴泉、乾县、麟游，截断川陕及西兰两要道，求得拖疲分散胡匪，各个歼灭之。”根据彭德怀的部署，西北野战军第1、第2、第4、第6纵队于4月7日从黄陵、澄城地区向西移动，13日集结马栏、照金、庙湾、转角地区。14日，彭德怀在马栏镇杨坡头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进军西府的作战计划。张宗逊副司令员回顾这次会议情况时说：“许多同志都认为应该甩开敌人主力，大踏步向敌人后

方挺进，相机夺取胡宗南的后方战略基地宝鸡，并调动延安、洛川守敌和裴昌会兵团，寻找战机消灭敌人。”^①会议决定分左、中、右3路于16日向西府挺进。左路，由第2、第4纵队组成，在张宗逊副司令员指挥下，从高王镇渡泾河，夺取监军镇（今永寿县城）、乾县，得手后以一部相机夺取醴泉、兴平，向咸阳佯动，主力迅速夺取武功、扶风、岐山，相机攻占宝鸡，并彻底破坏兴平附近铁路。中路，由第1纵队担任，夺取栒邑，从张兰镇渡泾河，向千县、麟游、凤翔挺进，协同第2纵队相机夺取宝鸡。右路，由第6纵队担任，夺取取田镇、太峪镇、世店镇等据点后，由亭口、千县间渡泾河，视情况相机使用。

4月20日，彭德怀在进军途中致电中央工委转毛泽东，报告向西府进军的计划，说：黄龙区缺粮；黄陵、宜君打援，敌徘徊不进。“我无粮不能久待，故决提前夺取麟游山脉与陇山脉诸县及断西兰与川陕交通。相机夺取宝鸡。以打击胡宗南为主，站稳脚，建立麟（游）陇（山）两山脉根据地雏形，预计两三个月。第二步入甘肃。求得在广大地区解决给养，减轻老区负担。”^②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周恩来批示：“西北野战军的目前行动计划是好的，但须注意西北须独自对付当前之敌。”26日，毛泽东复电：“你们第一步向泾渭之间，第二步向甘肃，甚好。”^③

4月16日，西北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分3路向西府进军。至18日，中路攻占栒邑。右路攻占取田镇，肃清泾河北岸据点守敌，乘胜渡过泾河。左路攻占常宁镇、监军镇，歼灭守军1600余人，切断西兰公路。

从19日至25日，西北野战军继续攻击前进。右路攻占长武、灵台；中路攻千县、麟游；左路第2纵队攻占扶风和降帐车站及

① 《张宗逊回忆录》第356页。

② 《彭德怀传》第356页。

③ 同上，第356页。

文殊镇，截断西安至宝鸡铁路。接着又攻占岐山和蔡家坡、虢镇。西北野战军矛头指向宝鸡。

宝鸡，是渭河平原西部的工业重镇，是陇海铁路与川陕公路的连接点。胡宗南在这里屯积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修有庞大的军火库。宝鸡城北是高原，城南是秦岭。守军在抗日时期修筑的国防工事的基础上，又加修了许多明碉暗堡。城外军械库、城北飞机场、南关和渭河大桥、车站、东堡子、蟠龙山等，均为防御重点。

4月25日，指挥左路的张宗逊与彭德怀在宝鸡城东会合。按照彭德怀的部署，第6纵队教导旅位于长武、邠县（今彬县）地区抗击由陇东南下长武、亭口的马步芳整编第82师；第4纵队在扶风、岐山之间抗击沿西兰公路北侧西进的整编第30，第65师；第2纵队独立第6旅位于武功以西之午井镇、罗局镇至虢镇地区阻击沿陇海铁路西进的整编第36师和整编第1师。第1和第2纵队主力于25日晚向宝鸡攻击前进。26日拂晓，第1纵队从城西和城北飞机场，第2纵队从正东和东北展开攻击，激战竟日，歼灭守敌，攻占宝鸡。守城指挥官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整编第76师师长徐保，炸伤后被俘，于翌日死亡。

（二）收复延安

西北野战军挺进西府后，胡宗南“为集中兵力，以及改变不利态势，乃决定放弃延安。”^①4月18日，令整编第17师先解洛川之围，然后与洛川守敌一道取捷径加速南撤。4月21日4时，整编第17师师长何文鼎于放弃延安之前，令所部炸毁既设工事和不能带走的军用物品。随后，按第48旅、师部、第12旅之顺序，经甘泉向洛川撤退。是日中午，彭德怀等致电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政治委员李景膺：先以1个团至交口、中部、偏桥线节节阻敌南逃，纵队主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第282页。

力隐蔽集结于偏桥东南，伏击其后尾，得手后不顾一切猛追；延属游击队应尾追至交口河止，交口河南转为正面阻击。整编第17师撤至洛川，会合第61旅于25日改走洛川至白水公路继续南撤。第3纵队立即跟踪追击，在吴庄、徐庄等地给予沉重打击。29日，何文鼎率部进到蒲城。第3纵队在追击、阻击、侧击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2729人，缴获坦克7辆、汽车20辆、各种炮28门、轻重机枪92挺、长短枪600余枝、炮弹1000余发、子弹26万多发。

整编第17师撤逃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立即进入延安。被国民党军占领1年零1个月又3天的延安，4月21日宣告光复。延安的收复是西北人民解放军空前强大与宜川战役和泾渭作战的直接结果。

中共中央于25日发电庆祝西北人民解放“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指出：“去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一切事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断言。”号召西北人民解放军和陕甘宁解放区人民“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胡宗南放弃延安，在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引起一片惊愕。一些外国通讯社纷纷发布评论。合众社南京4月22日电称：“延安的失守，对国民党军说来，是士气上的大失败。因为延安曾是共产党中国的象征几乎有十年，而政府誉去春占领延安为反共战争的转折点。”路透社上海4月23日电称：“延安败走基本上标明了—个事实：国民党永远不能盼望仅靠军事以赢得对共产党的胜利。”

蒋介石占领延安没有挽救他的失败；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则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全面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三）放弃宝鸡，转战陇东

西北野战军进军西府后，蒋介石认为，共军孤军远离解放区，处境不利，是歼灭的良祝。乃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

穷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各部“勿因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急令裴昌会兵团星夜向宝鸡疾进，在青海马步芳整编第82师配合下，夹击西北野战军于宝鸡地区。

在西北野战军主力攻打宝鸡时，整编第82师攻占长武，猛扑亭口。在长武、邠县地区担任阻援任务的第6纵队教导旅缺乏打骑兵的经验，在节节抗击中遭受较大的损失。裴昌会兵团逼进岐山，与在杏林镇地区担任防御任务的第4纵队激战。该纵队兵力部署分散，抗击不力，当阵地被突破时，既不报告上级，又不通知友邻，擅自将部队撤至岐山东北山地，让开道路，任裴昌会兵团长驱直进。27日，该兵团逼近虢镇、凤翔，距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仅10几公里。整编第82师向崔木急进。西北野战军主力处在胡、马两军联合夹击的危险境地。

彭德怀临危不乱，沉着指挥。他命令第2纵队独立第4旅、独立第6旅和第6纵队新编第4旅在凤翔地区阻击裴昌会援军，命令第1纵队及第2纵队第359旅迅速炸毁转运不及的军火物资，迅速撤出宝鸡，向千阳地区集结，准备实施战役第二步计划，寻找歼灭青马军的机会，收复陇东。28日拂晓，西北野战军主力仓促撤出宝鸡，29日进至千阳地区。

胡宗南消灭西北野战军于宝鸡的计划破产后，他判断西北野战军有向陇东转移可能，急忙调整部署：整编第82师主力回守陇东，一部集结长武地区机动；裴昌会兵团以一部位位于邠县、永寿，截断西北野战军东返道路，主力继续进行尾追。5月3日，西北野战军主力从平凉、泾川之间越过西兰公路，渡过泾河，准备夺取荔镇、萧金镇、西峰镇、宁县等地，歼灭青马一部或大部。这时，整编第82师主力自镇原、西峰镇分向屯子镇、南庄李家和萧金镇前进，整编第36师由长武向荔镇、丰台镇前进，整编第65师由泾川向党原镇、玉都庙前进，企图合围西北野战军于党原镇、丰

台镇、南庄李家地区。

5月5日，第6纵队教导旅进抵屯子镇，与青马军4个团展开激战，陷入重围。为解救教导旅并乘机歼灭青马军，彭德怀令教导旅坚守阵地，令第1、第4纵队向屯子镇发起攻击。经过6日一天激战，仅杀伤青马军2000余人，救出教导旅，未达歼灭青马军之预定目的。在屯子镇解围作战同时，第2纵队占领荔镇。彭德怀鉴于情况紧急，处境依然不利，决定以第2、第4纵队担任掩护，野战军直属队和第1、第6纵队于6日夜沿屯子镇、萧金镇公路以南向宁县、正宁方向转移。

7日晨，张宗逊率第2纵队向萧金镇前进，先头独立第4旅进至萧金镇时，发现青马军骑兵第5团和甘肃保安第5团已占领该镇，后卫独立第6旅正同西进之整编第36师在荔镇东发生激战。在当时情况下，如让整编第36师占领荔镇和萧金镇的青马南北会合，不仅西北野战军的东进道路被堵死，且有全军陷在屯子镇、西锋镇、泾川三角地区被围歼的危险。在危急关头，张宗逊采纳独立第6旅建议，以独立第6旅和第359旅在荔镇东南抗击整编第36师；以独立第4旅（欠第11团）围攻萧金镇；以第11团占领三不同，掩护主力东移。该纵各旅奋战一天，以顽强的战斗行动为主力转移赢得了时间。但是，第4纵队没有完成以运动防御阻止屯子镇追兵的任务。该纵警备第3旅因判断失误，将部队撤自萧金镇以东，离开指定地点约50公里处，致使青马军得以乘隙跟踪追击野战军主力，使第6纵队新编第4旅和第1纵队独立第1旅转进中遭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西北野战军摆脱胡、马军在荔镇、萧金镇合击后，又以顽强的战斗精神于5月8日至11日，在三不同、宁县以东的良平镇、柯邑以北的永和镇、职田镇等地给整编第36、第82师数次打击，于12日转到老解放区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乃完全摆脱胡马联军的追击。西府、陇东战役到此结束。

西北野战军撤回解放区后，5月26日至6月1日在黄龙附近

的土基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着重总结西府陇东战役的经验教训，确定部队整训计划和对胡宗南集团的作战方针。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王维舟等野战军和联防军区主要领导人，以及旅以上干部均参加了会议。26日，彭德怀作了《春季攻势总结》的讲话。贺、林、习、王等也相继讲了话。6月1日，彭德怀在前委扩大会议闭幕时作了总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的决定。6月30日，中央军委同意并转发了这个决定。8月10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彭德怀所作的《春季攻势总结》。

西府陇东战役和宜川战役一样，都是西北野战军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战略方针而举行的一次重要战役，因此，正如彭德怀所指出的，这个战役的“行动方针也是正确的”，战役“总的说来……获得了胜利。”^①歼灭了胡、马军有生力量，计毙伤其官兵1.2万人，俘虏9945人，共2.19万余人，缴获野炮4门、山炮21门、迫击炮44门、六〇炮20门、轻重机枪350挺、其他各种枪2.3万余枝、各种炮弹1万余发、子弹69万多发、汽车10辆和一大批军用器材物资。而且，“由于西线我军胜利，便使北线延安、洛川之敌先后于二十一、二十五日仓皇弃城而逃，延安、洛川两城照预定计划为我军收复与解放。”^②

贺龙在讲话里也强调指出战役方针是正确的。他说：“我们原准备围洛川打援，但敌人不北进，使我们没有饭吃，逼得我们非走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出西南。这一行动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被动的。因为敌人集中了十几个旅，只要它变化队形，就可沿公路与我军平行前进，我军则需要爬山、渡河。我们在马栏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250—254页。

② 同上，第242—245页。

也是没有饭吃，故只有往西南行动。”^①

但是，这次战役仅完成了一半任务，“未能完成建立麟干根据地及收复陇东、收复三边的任务。”^②而且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全战役伤亡 6566 人，失踪 8407 人，共 1.49 万余人，有的纵队损伤了元气，这是西北野战军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彭德怀认为，这是由于“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和缺点”。其一，准备不充分。“围洛打援”不成，“遂决心西进。四月十三日我军集结马栏，十四日开会讨论西进部署，十五日传达，十六日即出发，故战役准备仓促。因犹豫于打援与围攻洛川城为时达一周，妨碍了向西府进军的实际准备，这是此次战役的过失之一。”^③其二，对敌人力量估计过低。表现在“对胡、马两军密切配合与马军实力认识不足（青马有正规军骑兵五个团，步兵四个团）”，主观上总想利用胡马之间的矛盾，而事实上，胡马两军在反共反人民这个基本点已完全一致的；“对胡宗南可集中的兵力估计过低”；“对粤军六十五师行动的积极性估计不足”；^④对胡宗南战略战术的改变调查研究不够。其三，“战役配合有很大缺点，个别纵队部署不当，不完全明了敌情，亦不完全明了我情。”“我左翼兵团配置应以二纵当先锋，四纵殿后。我对四纵在十年和平中战斗意志不够认识不足。如将二纵放在前而，歼灭来援之敌青年军二〇三师，乘胜夺取乾县，造成攻取西安的姿态，则对我军麟干攻势完全有利。”^⑤

彭德怀指出，“出动前准备不充分，个别纵队内部情况了解不深刻，对敌人估计不足等三项，战役领导机关与战役直接指导者

① 《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56 页。

②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246 页。

③ 同上，第 242 页。

④ 同上，第 247 页。

⑤ 同上，第 247 页。

应负责任，也就是我个人应负更多的责任。”^① 对此战教训，彭德怀念念不忘。《彭德怀自述》中写到：“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进占陇东、彬州，切断了西兰公路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②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第 254 页。

② 《彭德怀自述》第 365--366 页。

第七章 北线解放军发起强大攻势

第一节 东北人民解放军举行冬季攻势及其发展壮大

一、东北国民党军面临的问题及措施

在1947年秋季作战中，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巨大，不但被歼灭了6万余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其控制区进一步缩小。在东北仅占大、中、小城市24座，连同冀东、热河的21座，共45座，其中不少城市陷于断粮、断煤、断电的困境。尤其是铁路交通线被切断或时断时通，使军队的补给十分困难。由于控制区域面积缩小，兵源枯竭。从关内增援东北，也因各战场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调。弹药补充亦面临困境。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同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谈话时称：“东北的严重局势，原因在于缺乏弹药。（所需的弹药中国不能制造。在东北的中国军队以前是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因此要靠美国补充所需的弹药。）”^① 美械装备、美式训练，曾经是国民党军的一大优势，但曾几何时，由于在战场上被解放军大批缴获，又由于美械装备不能源源及时运到补充，美械装备反成了国民党军的一大弱点。司徒雷登也承认，“在满洲，装备更加奇缺。”^② 这时，陈诚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兵（包括武器）；二是粮；三是财。他一个也解决不了，因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245页。

^② 司徒雷登1948年3月4日致美国国务卿电。

陈诚为维持东北残局，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组编部队。为加强指挥和充实力量，将第1至第4兵团依次改番号为第6至第9兵团，并以新编第6军之14师及暂编第59师为基础，编入第13军之54师，组成新编第3军，龙天武任军长；以第52军之195师为基础，编入第49军之43师及第53军之暂编第54师，组成新编第5军，陈琳达任军长；以新编第1军之38师为基础，编入暂编第56师及由保安第3支队改编的暂编第61师，组成新编第7军，李鸿任军长。将新成立的暂编第62师编入新编第6军；暂编第53师编入新编第1军；暂编第30师编入第53军；暂编第63师编入第13军；承德保安队改编为暂编第1师，归第13军指挥。

总计30个正规师、13个暂编师，连同特种部队及东北各省的保安部队共58万余人。

第二，继续采取集中兵力，固守要点、要线的方针。即以2个至4个师驻守主要战略据点，如吉林、长春、沈阳、锦州，以1至2个师的兵力驻守次要据点，以主力组成机动兵团。具体部署是：第60军3个师守吉林；新编第7军3个师守长春；第71军3个师守四平、昌图、梨树；第207师3个旅守抚顺、本溪；第52军2个师守鞍山、营口；新编第5军2个师守阜新、义县、锦州；第6兵团1个师守大虎山、沟邦子；秦葫港口司令部2个师守锦西至山海关一线要点；第13军3个师守承德、平泉、隆化。在沈阳及其外围开原、法库、铁岭地区，集中新编第6军、新编第1军、新编第3军、第52军1个师、第53军共11个师的兵力作为机动部队，依托交通干线往来应援。

第三，一面加修工事，一面整训部队。陈诚非常重视各要点之防御工事的构筑。他为使“长春不仅为戡乱军事之前进据点，且为国防上之重要战略要塞”，对其防御工事尤为重视。陈诚在1947年秋视察长春工事时，“即承认‘长春防务，坚冠全国’”。然而，长春全部防御工程仅完成一半。从1948年春季开始，又由特种工

程委员会筹划防御工事之材料和动员 10 万人，继续加修工事，到 1947 年 6 月，已使用水泥 6 万袋，钢筋及装甲设备之铁板 1500 余吨，全部工事之抵抗力量大者可抵御 150 毫米口径直射炮射程内之 2 倍力量。国民党军方面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面对如此坚固设防城市，将束手无策。

二、东北民主联军冬季作战方针及部署

1947 年 10 月 12 日，东北秋季攻势尚在进行之中，林彪即致电中共中央说，“目前，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所在地区，敌完全采取守势，并以较多兵力防守。”“依东北现有的敌我形势，关内如再增加四五个军来，敌出战的可能就多些，则能使东北得到更多的打胜仗的机会，同时也可以使关内我军减少负担。因此，敌如向东北增援，对我关内、关外都是有利的。”说明这时林彪唯恐国民党军不出兵增援东北，既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东北战场，同时又注意东北同全国战局的关系，以局部去服从与配合全局。毛泽东于 10 月 13 日 16 时复电林彪，提出秋季攻势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①并指出，在现时国民党军采取战略守势，我集中大军难求运动战的情况下，根据关内各战场经验，今后野战兵团之组成，“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组成一个有九个师左右的头等野战兵团，几个有四个或五个或六个师的二等三等野战兵团，同时在几个区域机动作战。”^②

11 月 8 日，林彪就今后作战方向与部署报告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第一步行动，以 4 个纵队进攻锦州沈阳线；以 2 个纵队担任锦州至山海关之作战；以 2 个纵队担任开原、沈阳、营口一带作战；以 1 个纵队 2 个独立师担任开原、四平、长春、吉林线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4 卷，第 305 页。

② 同上，第 305—306 页。

上作战。第二步行动，以3个纵队进入冀东和平绥线作战。必要时，并准备以4个纵队进入冀东。次日，林彪将冬季攻势行动的具体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并下发各部。其具体部署是：1. 以第1、第2、第10等3个纵队及总部炮兵进至康平、法库地区，配合第7纵队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歼灭法库、康平、彰武、新立屯、阜新、北镇、黑山等地区的敌人和求得歼灭增援部队。2. 进攻康平、法库时，第3纵队即在铁岭、四平线及以东地区歼敌一部，以拖住新编第6军。第3纵队目前应移西安及其周围待机。第4纵队则设法牵制第52军及第207师。今冬明春，第3、第4纵队应担任在开原至营口线上寻求战机。3. 第6纵队应移伊通、双阳地区，待敌在四平、长春间，长春、吉林间地区分散时再进攻敌人。独立第4师、第5师均归第6纵队指挥。独立第5师应在长春以西活动。4. 第8、第9纵队应在现地休整，但如发现有利机会时，即可随时进击敌人，并准备再破锦榆铁路。5. 第10纵队各师，目前须进行新的行动准备，等各师准备完成后，再指定行动路线。6. 第1、第2两纵队，须作西进的行动准备。

各兵团凡遇有利机会，则应单独自动歼灭敌人，如需要其他部配合时，则应报告上级，以求得配合。林彪说：“这一作战是针对着敌人与关内的唯一的陆上联络线和输血管，同时也是敌人素来薄弱的地区”^①，即北宁路沈锦段。首先打中要害，就能够逼使陈诚不得不在不利于他的地区与东北民主联军作战。

13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并告朱德、刘少奇和东北局：“八九两日电悉。”“新部署甚好。”^②

为保证冬季攻势战役计划的实现，东北民主联军在夏季攻势后和进入集结地的休整期间，利用一切时机进行战役准备：

第一，加强侦察。以一部主力和地方部队抵近长春、吉林、四

① 林彪、谭政、刘亚楼1947年11月16日致所属各部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27页。

平外围，积极打击小股出扰抢粮的国民党军，造成有在这一地区作战的假象以迷惑敌人。同时，在地方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运用派遣侦察支队等各种有效手段，查明沈阳和北宁路沿线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以及地形、河流结冰等情况，为战役行动提供依据。

第二，深入动员。11月16日，林彪、谭政、刘亚楼发出《冬季作战指示》，阐述了在冬季集中大兵力举行大运动战的目的和意义。强调指出：“去年冬季，我军曾利用河流失去障碍作用的期间，鼓起全军的艰苦精神，我南北满部队实行了配合作战，结果不仅巩固了南满的根据地，而且大量歼灭了敌人，造成了今年夏季和秋季作战的胜利基础。”“今年冬季是我们最能集中最大兵力作战的良好时机。”“因此，今年冬季我们更必须利用河流失去障碍作用之时，实行更大的集中兵力作战，除北满留个把纵队牵制敌人外，我军可集中七、八个纵队作战，对较大的目标，我们能集中四、五个纵队攻城，还有力量打援，或集中六、七个纵队打运动战，而还有力量监视敌人。”要求“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战斗员，均应发挥高度的作战勇气与积极性，准备在整个冬季中不存和平整顿观念，不怕寒冷、不怕走路、不怕伤亡、不怕扑空、不怕小的挫折，应当把战斗情绪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潮”；指挥员应注意大兵团作战的主动配合与积极的机断专行；全体战斗员须发挥无上的英勇精神和熟练地运用战术；“全体政治工作人员须百倍努力工作，提高全军为人民、为穷人、为民族忠诚服务的自觉性和决心，发扬全军奋勇猛战的英勇气概，令人感佩的吃苦精神和遵守纪律、爱护人民的优良传统。”号召“为人民而战，为民族而战，为打倒万恶的罪魁蒋介石而战。”

第三，抓紧训练。在总结秋季攻势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各部在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条件下，运用军事民主的方法，大力开展军事训练。战斗员除学技术外，着重练三猛战术和三三制战术；营、连、排干部着重学习一点两面战术和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纵、师

和军区干部除研究一点两面战术和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外，还着重学习研究《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的9条作战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规定的在战役、战术部署方面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还介绍和推广了1946年冬季作战防寒、防冻的经验。及时补足棉衣，增添御寒装具。

第四，扩充力量。在休整期间，补充了一大批新兵和解放战士，使各主力部队达到满员，并以冀察热辽军区一部地方武装组成独立第3、第4师和1个骑兵师。战役前夕，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为9个纵队27个师、10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1个炮兵团（3个属纵队）、1个战车团、2个航空兵大队，计34.7851万人，长短枪14.0924万枝、轻重机枪9301挺、各种炮2035门、坦克32辆、飞机37架；地方武装97个步兵团、7个骑兵团、162个县大队，计31.4085万人；总部机关及直属队7.4579万人，共计73.6515万人^①。比秋季攻势时增加21.8498万人，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东北国民党军15.6万余人，且全军士气高涨。林彪、罗荣桓、谭政在1948年1月致中央军委电中说：无论老部队和新组建的部队，“士气都是饱满与旺盛的，一部分部队因四平一仗，元气损伤过大，略见减退，但不久即告恢复，现部队已建立起一种好的斗争意志与战斗作风，在连续作战、远距离的奔袭、气候严寒与大兵团行动、给养、住宿困难等情形下，已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过去顾虑伤亡、喜欢叫苦、不愿走路、不愿待机、不习惯于大踏步进退的心理与现象，现在是一般地消失了。现在没有打上仗或未能担负主攻的部队，常常表示不快意，每一战斗开始，部队争相请命，要求给予艰巨任务，以担负艰巨任务为荣。”

三、战役第一阶段，北宁路和沈阳以西、以北地区的作战

^①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1947年12月29日关于东北实力概况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12月15日，按照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部署，各纵队向第一作战目标北宁路及沈阳以西、以北地区行动。冬季攻势从此开始。

（一）攻克彰武

由朝阳地区东进的第8、第9纵队越过大凌河，向北镇、黑山、新立屯地区前进；第2纵队自公主岭以北地区出发，与由拉法车运南下的第10纵队第29师突然包围法库；第1、第3、第6、第7纵队分别插入法库、新民、铁岭、沈阳间；第10纵队主力自盘石地区出发，进抵昌图、开原地区；第4纵队除留一部于辽南地区监视辽阳之敌外，主力自南向北逼近沈阳。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突然进击法库及其周围地区，使陈诚震惊。他急调驻长春的新编第1军第50师和暂编第53师，四平第71军第87、第91师，开原之第53军第130师、暂编第30师，辽南之第52军第2师，于12月20日前后赶至沈阳、铁岭地区。这样，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增至18个师。陈诚还将锦州地区第43、第54师调到新民地区，以抗击东北民主联军的强大攻势。

林彪为调动国民党军分散，决心以第1纵队第3师佯攻法库，以第2、第7纵队西取彰武。因为法库四面环山，工事坚固，攻克需7至10天，且距铁岭近，国民党军增援较易。彰武距沈阳约90公里，位于郑家屯至大虎山铁路线上，面积约1平方公里，城墙为砖质结构，高5米，厚3米。第49军之79师利用城周起伏地形，构筑了若干外围据点，形成多层防御阵地。但两城相比，彰武比较好打。

12月22日，第2纵队进到城东南和东北，第7纵队进至城西和西北，完成对彰武的合围。23日，发起外围战斗。至27日，攻占南关、北关及火车站，肃清全部外围据点，逼近城垣。28日7时30分，两纵队在炮兵支援下同时发起总攻。第2纵队第5师仅5分钟就从城东南突入城内，接连打垮守敌两次反冲击。第7纵队第21师从城西北突入，会同第5师进行纵深战斗。各部大胆迂回穿插，分割围歼。敌第79师残部退守城中心和平街地堡群顽抗。

第5师从三面猛攻，将其歼灭。12时30分，战斗胜利结束，全歼守军1个师部3个团，9000余人，其中俘少将副师长李佛态以下近7000人。创造了迅速突破，大胆分割，全歼守敌的模范战例，获得了中央军委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嘉奖。

彰武之战，是东北民主联军炮兵首次实施计划射击。参战炮兵为东北炮兵司令部率炮兵第2团、炮兵第4团2个营和炮兵第1团1个营，连同纵队的2个炮兵营，计8个炮兵营72门火炮。战前，东北炮司组织计划火力，以2个营支援助攻方向的第7纵队，以6个营支援主要方向上的第2纵队。“炮兵成功地实施计划射击，不但为步兵进攻打开了突破（口）。以不间断的炮火支援了步兵向纵深发展，而且标志着炮兵在火力运用上，在炮兵射击技术上，有了一个飞跃。”^①

进攻彰武期间，第4纵队一部袭入沈阳市区皇姑屯，第6纵队在沈阳西北万金台歼灭第207师第2旅1个团，使沈阳地区国民党军不敢轻举妄动。

（二）公主屯歼灭新5军

在彰武战斗期间，毛泽东于12月23日24时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结冰期内，你们集中全力在山海关、辽河地区作战是完全正确的。”“现时到解冰尚有三个多月，在此期内，如果我军只在许多战斗之间进行若干短时间的休息补充而不进行大休整，待解冰以后再行大休整，则估计可能利用冰期歼灭大量敌人，可能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等几个大据点之间的中小据点、广大乡村及锦州以西、以北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归于我手。只要办到这一点，尔后就只剩下打大据点的问题了。”^②林、罗、刘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扩大胜利，令第1、第8、第9纵队主力南下，继续向北宁路前进，准备歼灭黑

^① 陈锐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中的炮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48页。

山、大虎山等地区之国民党军，完全切断锦州、沈阳间交通；第2、第7纵队停止于彰武地区，进行休整；第6纵队佯攻法库；第3、第10纵队集结于辽河北岸之蛇子山及其东西地区待命；第4纵队主力在辽阳至沈阳间破路。

12月29日，各部不待休整结束，立即开始新的行动。第8纵队第24师继续围困新立屯，主力南下于30日占领黑山县城，并经台安向沈阳西郊逼近；第9纵队在第1纵队配合下进占大虎山，继占台安。尔后，第1纵队转进辽中地区。

陈诚误认为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已分散，并判断彰武之战民主联军伤亡大，难以再战。“为捕歼匪军主力，乃以第九兵团主力及第七、八兵团各一部，续向法库以南地区推进。”^①其部署是：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新编第3军和新编第6军主力为右路，由沈阳、铁岭一线向西推进；新编第5军军长陈琳达率第43、第195师为左路，由新民出发，沿新民至法库公路向北推进；第7兵团司令官刘安琪指挥第71军和新编第1军主力为中路，由沈阳向西北推进。3路共5个军，东起铁岭，西至新民，沿辽河两岸100公里宽正面呈扇形，于1948年1月1日向沈阳西北出击，企图乘隙寻歼当面之东北人民解放军第3、第6、第10纵队，进而解法库之围。

沈阳国民党军主力出动，造成了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运动中歼灭其一部的有利条件。林、罗、刘遂于1月1日电告第3、第6、第10纵队，“敌有向法库出犯模样，各部须准备作战。”2日即决定迅速集中兵力，首先求歼比较突出、薄弱的左路新编第5军。其部署：第6纵队在新编第5军前进路上节节阻击，诱其深入；第2、第7纵队兼程进到新立屯以北、以西地区集结，待命攻击；第3纵队从辽河北岸插到新编第5军右翼，并迂回切断其向新民的退路；第10纵队进到旧门以南，第1纵队并指挥独立第2师进至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4册（上），第35页。

沈阳西兴隆店车站，第4纵队北进至沈阳西北老边地区，共同切断国民党军右、中两路同左路的联系；第8、第9纵队从辽中地区北返新民以西，待命参战；东北军区骑兵师进到巨流河地区，担任牵制任务。

1月3日，第2、第3、第6、第7纵队及炮兵第1、第2、第4团，按上述部署急速向公主屯地区开进。5日拂晓，新编第5军主力尚未与右、中两路打通联系，即被东北人民解放军合围于公主屯及其西南地区。

陈琳达“见形势危殆，急电求援。”^①陈诚“令该军改取守势，在原地固守三天，以吸引匪军主力；另令第九兵团变更攻击方向，指向公主屯，限六日正午前，进出东西蛇子山南北之线，以解救新五军之危；并令老边之第七十一军，即向西北挺进，支援新五军之作战。”^②

5日下午，第3纵队从南面，第7纵从西和西南，第2、第6纵队从西北和北面对新编第5军展开进攻。激战一夜，将其压缩于公主屯、王道屯、文家台、黄家山等狭小地域内。此时，右、中两路国民党军队在飞机、坦克和炮火支援下，纷纷出动增援。新编第3军和新编第6军主力被第10纵队阻于公主屯东10余公里处，新编第1军和第71军被独立第1、第2师和第1纵队一部阻在辽河东岸，均无法予以直接支援。

6日晨，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猛攻。陈琳达率残部退守公主屯和黄家山。是令新编第5军继续抵抗，还是令其突围，陈诚犹豫不决，一直到6日晚才下决心令陈琳达向沈阳突围，但为时已晚。

7日晨，第2、第7纵队在炮兵支援下，进攻公主屯和黄家山。其战况，国民党军战史作了如下叙述：“七日午前，军长陈琳达中将，亲率第一九五师主力，向南突围，不料行至黄家山以南之艾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4册（上），第35页。

② 同上，第35页。

家屯，又遭匪埋伏截击，增援之国军，亦分别被阻，俱无进展，战至七日正午，新五军竟陷于覆没。”^①

公主屯战斗，东北人民解放军全歼新编第5军军部及2个师共2万余人，其中俘陈琳达以下1.3150万余人，缴获各种炮252门、轻重机枪768挺、其他枪6112枝、骡马1409匹、运输车137辆。

（三）新立屯战斗

公主屯战斗结束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11日致电中央军委等，鉴于“天气已进到‘三九’，过于寒冷，夜间手足冻僵，不便作战”，请示暂停作战，部队作短期休整，大约半月后再继续作战。12日，中央军委复电：“你们暂时停止作战，休息半个月至二十天再打是必要的。”

“三九”过后，气候转暖，沈阳附近早晚气温约在-10℃左右，夜间已可作战。为进一步扩大在沈阳以西的回旋区，林、罗、刘于1月16日10时致电程子华等，“下一步行动歼灭新立屯之敌，和歼灭增援的敌人，由八、九纵队及军区炮兵担任攻新立屯，统归你们指挥，具体行动由你们自定，只要不致于冻死和冻伤人时，即望开始行动。”后改由第1、第8纵队担任主攻任务。

新立屯位于阜新至沈阳和彰武至大虎山铁路交点上，是沈阳以西的一个重要据点。守军为国民党军第49军第26师共9000人，已被第8纵队第25师围困月余，粮弹断绝、冻伤甚众、斗志大降，明知难以坚持，仍依托外围碉堡群与障碍物坚守顽抗。

22日，攻城指挥程子华在长岭子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主攻方向从正东和东南开两个突破口，24日开始扫清主攻方向及城南、城北外围据点。总攻时间定在26日或27日。但是，第8纵队求战心切，22日即开始外围作战。该纵第23师一举攻占新立屯东双山子后，乘胜攻击赵家窑。由于急躁轻率，准备不周，连续苦战

^①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4册（上），第35—36页。

两昼夜，虽攻占了核心工事，但伤亡重大，而守敌大部缩回新立屯，仅被歼灭 40 余人。

这种情况，使程子华等不得不决定提前发起总攻。1 月 25 日拂晓，第 1、第 8 纵队同时发起攻击。第 1 纵队先后攻占兴隆台、小黄金台东南大地堡以及城西北集团碉堡群；独立第 2 师攻占寡妇山制高点；第 8 纵队相继攻占火车站、惠家窑、大八家子，直逼新立屯城下。

26 日晨，第 26 师一部留城继续顽抗，师长彭巩英率部分路向东北、西北、西南突围逃窜。除师长等约 500 人逃抵阜新处，其余被歼灭于逃跑途中。

从 1947 年 12 月 15 日开始的冬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取得了彰武、公主屯、新立屯三战三胜，共歼灭国民党军 5.8 万余人，切断了北宁铁路，使沈阳门户洞开，为下步作战打下了胜利基础。

四、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

蒋介石派陈诚到东北，意在挽救东北危局，没想到陈诚已黔驴技穷，回天无力。更令蒋介石伤心的是，新编第 5 军在公主屯被歼，军长被俘，陈诚非但不承担责任，反而将责任推到下级军官身上，要惩办第 9 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和新编第 6 军军长李涛。陈诚深知自己抵挡不住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就以治病为由请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蒋介石也看到陈诚继续留在东北，只能使局势更糟。这样，更换东北战场主帅就成为当务之急了。

1948 年 1 月 10 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东北人事安排与作战方针，决定将范汉杰及其兵团所属整编第 54 师由山东调往锦州，并设东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回南京后，于 1 月 12 日致电廖耀湘，“惟望吾弟益加振奋自勉，为各军之模范，须知东北国军乃以弟部为骨干”，故应“有难先当，有急必援，先人后己”。同时，致电第 207 师师长罗友伦：“此次在沈相晤，以时间匆促，仍未能面询详情”，“尚望益自奋勉，雪耻灭匪，依照昨日会中指示，努力发扬革命精神，时时以彻底执

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蒋介石在一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形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故分致各军、师长手书，望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九死一生之志冲出一条血路。”^①

1月17日，国民政府明令设置“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特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2月1日，“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在沈阳正式成立。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孙渡相继任副总司令，赵家骥任参谋长，彭杰如任副参谋长。5日，陈诚调回南京。5月13日，国民政府明令免去陈诚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等各职。

蒋介石决定派卫立煌去东北，是因为：卫立煌论资历和声望，能够独挡一面；论人事关系，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是远征军时卫立煌统率过的，或是过去卫的老部下，更重要的是卫立煌在美国军界获得好评，又刚从美国考察归来。派卫立煌去东北，再合适没有了。卫立煌明知去东北是跳火坑，但又感于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和蒋答应调兵增援东北，而且表示“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乃同意“先去看看再说吧！”^②

东北“剿匪”总部成立的第2天，即2月2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分析了蒋介石派卫立煌代替陈诚任东北“剿匪”总司令的直接原因是，陈诚连续失利，与部下不合，胃病重，并介绍了卫立煌的情况。^③

卫立煌到东北后，为实现固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地之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补充兵员，整顿部队；加修加面防御工事；筹

① 《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79页。

②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761页。

集粮草；调整部署等。他告诫其将领说：“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聚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①

五、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1947年11月23日，林彪、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取消东北民主联军番号，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他们说：“李济深所组织的军队亦称民主联军，为了使我国所领导的武装的名义，不与别党武装的名义混淆，和使我国所领导的武装有统一的名义，我们建议将东北民主联军的名称取消，而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如中央同意，即请中央发布党内外的通知，我们拟待接到中央同意的指示后，即将总司令部和总司令的名义取消，而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与司令员的名义。”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局，林、罗并告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首长：中央和军委赞同林、罗这一提议，“望即由东北民主联军经新华社发表通电，声明该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中华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人民民主而奋斗的东北人民军队，兹为与全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取得一致，特向全国人民及各地解放军宣布，自某月某日起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改称司令员。你们照此办理即可，中央不需对外发表公告。”

11月29日，东北局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指挥部，总司令改为总指挥。电文称，东北民主联军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后，为区别东北全军的司令部、政治部与所属各纵司令部、政治部，以称“东总”为好。12月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此答复说，“现时关内各解放区均分前后方，前方以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统率野战兵团，后方以甲级军区（又称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统率地方兵团

^① 彭杰如：《且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8页。

及乙级军区（又称小军区）及军分区，并管理本区范围内的动员、训练、兵工生产与负责供给前方。两者的司令员或政委，依各区情形，有兼的有不兼的。两者隶属关系，一般的是野战军与军区，均直受军委指挥，但在行政上则野战军属于军区。此制在自卫战争中，行之颇称便利，对于今后野战军愈向新区行动和发展，愈需要有此区分。东北野战军今后作战任务扩大，主力将逐步南进，东北甲级军区亦应及时成立，同时并指挥冀察热辽甲级军区。”

12月27日20时，林、罗致电中共中央并告高岗，“我们拟利用元旦日，宣布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目前军区与野战军的组织只作准备，暂不分开成立，待东北局势有进一步发展时再成立。”12月31日17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给所属发出通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于一日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其简称‘东总’亦改为‘东司’。”从1948年1月1日起，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

六、战役第二阶段，转兵辽南与夺取四平

经过第一阶段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将北宁铁路沈阳至锦州段截断，东北国民党军只剩下中长铁路南段和营口的海上通道。为断绝东北国民党军的海上补给线，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决心转兵辽南地区，夺取辽阳、鞍山，扫清沈阳以南各据点，并夺取营口。1月30日22时，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报告说：“目前沈阳西北、北宁路两侧，已无好战（仗）可打。除以一个师监视阜新之敌，及将三、十两纵队留置于法库（以）南地区，寻机歼敌及配合主力作战外，其余全部主力及炮司，已于二十九日开始出动，歼灭辽阳、鞍山、本溪、营口之敌，并求得打援。”

辽南作战的部署是：以第4、第6纵队及辽南独立第1师和军区炮兵主力，在第4纵队司令员吴克华统一指挥下，担任攻克辽阳和鞍山之任务；第1、第2、第7纵队进到辽阳以北四方台至沙河一线，准备阻击从沈阳出援的国民党军；第8、第9纵队及热河独立师、骑兵师在锦州、义县间及沟帮子、盘山地区积极活动，牵

制和打击从锦州来援之国民党军。

（一）攻克辽阳

辽阳城，位于沈阳以南的中长铁路线上，是拱卫沈阳一重要据点。守军为新编第5军暂编第54师及“剿总”、第52军、新编第6军的部分留守人员，连同铁路警察共1.1万余人，统归暂编第54师师长谢代蒸少将指挥。该师依托坚固城墙、外壕和城内重要街口地堡工事坚守待援。

1月31日，第4纵队进抵辽阳城北的萧家夹河和城东的新城、石咀子、峨帽庄。2月2日，第6纵队进至辽阳城西之大营盘、前后石桥子、首山堡地区，完成了对辽阳的包围。至2月4日，已攻占全部外围据点，逼近城垣。

6日7时，第4纵队第11师等7个步兵团在5个炮兵营火力支援下，攻击城东之高力门；第12师在纵队炮兵团和军区3个炮兵连火力支援下，进攻城东南角的小南门；第6纵队第17、第18师在军区炮兵第1团火力支援下，以市政府为目标从城西进行攻击。战至15时30分，全歼守敌1.0781万人，其中俘谢代蒸（后潜逃）、副师长曹济民以下8900余人。

辽阳战斗刚刚结束，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报告毛泽东，“至此，敌新五军军部及三个师全军覆灭。”2月7日20时，毛泽东致电林、罗、刘：“庆祝你们攻克辽阳。”同时强调指出，“你们如能照我前次电报所讲的意见，将大休整（一个月或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时间推迟至解冰以后，而在解冰以前只利用几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作若干次小休息（这种小休息是完全必要的），则尚可利用冰期打两个月仗，歼灭大批敌人，替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①

（二）夺取鞍山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0页。

辽阳战斗时，沈阳国民党军未敢出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林、罗、刘令第4、第6纵队进行短期休整（4天）后，即南进攻取鞍山。2月13日，该两纵队和辽东独立第1师完成了对鞍山的包围。

鞍山四面环山，中长铁路穿城而过，把市区劈为东西两部分。西区为平地，只有日本统治时修的“制钢所”楼房较高；东区有几处小高地，且高楼很多；东南神社山和东北对炉山可鸟瞰市区。守军为第52军第25师和军运输团等1.3万余人。该师是在新开岭被歼灭后重建的，战斗力较弱。调守鞍山后，在市郊之制高点及“制钢所”和市中心广场修筑大量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工事，沿市区加修圩墙、壕沟，附设铁丝网等障碍物，并将神社山筑成能控制全市的核心阵地，形成点面结合的防御体系。第25师师长胡晋生少将以第73团守备对炉山和城北外围据点，第74团和运输团踞守西市区，第75团坚守铁架山、神社山为主阵地的东市区，指挥所位于“制钢所”。

针对鞍山敌军防守情况，第4纵队司令员吴克华等决以第12师及独立第1师配属军区炮兵2个团和纵队炮兵团向神社山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第10师配属军区炮兵1个营攻击西市区；以第11师为预备队。

2月16日8时，开始扫清外围作战。至19日6时，相继攻占铁架山、大石头屯、铁路医院和变电所、吴三台子、二台子等外围据点，逼近城下，并完成了攻城准备。

19日6时30分，开始总攻。胡晋生见势不妙，当即令守备神社山、对炉山和转盘街的部队进行死守，主力由市政府一带向“制钢所”转移。第4纵队乘机加紧攻击，至10时40分，先后攻占神社山和市公署等地，会同第6纵队主力将守敌包围于“制钢所”、转盘街和对炉山、中央银行、市政府诸点。从12时开始，第11师与第6纵队主力向“制钢所”，第12师向市政府、中央银行和转盘街，第10师向对炉山，发起猛攻。激战至24时，共歼灭第25师等部1.3185万人，解放鞍山。

在围攻鞍山时，沈阳第 52 军第 2 师、新编第 3 军第 14 师、新编第 6 军第 22 师和暂编第 55 师，分别向浑河以西和沈阳以南作象征性增援。2 月 17 日夜，法库守军新编第 6 军暂编第 62 师趁机向开原方向突围，第 3、第 10 纵队和 2 个独立师立即进行追击和堵截，战至 19 日将其歼灭于庆云堡、大房身、何家油房地区，并乘胜进逼开原。

（三）北攻开原，南取营口

为继续扩张战果，林、罗、刘决心以第 3、第 10 纵队攻占开原；以第 1、第 2、第 6、第 7、第 8 纵队从沈阳以南地区渡过辽河进到新民地区，包围巨流河、高台山，吸引沈阳国民党军西援，以配合攻击开原；以第 4 纵队和辽东独立第 1 师南下，夺取营口。

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进逼新民地区，卫立煌害怕沈、锦间唯一据点新民失守，急调新编第 6 军第 22 师、新编第 3 军第 14 师和暂编第 59 师等 3 个师由沈阳出动西援。2 月 25 日进至巨流河东 15 公里的兴隆店地区时，遇到东北解放军独立第 2 师的顽强增击。此时，第 3、第 10 纵队进攻开原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乃于 27 日黄昏发起总攻，一举歼灭第 53 军第 130 师第 390 团和清剿总队 1000 余人，逼近铁岭。卫立煌担心铁岭有失，危及沈阳，忙令西援的 3 个师撤回铁岭，以巩固沈阳北部屏障。此时，第 4 纵队与辽东独立第 1 师正南下营口作战。

营口西濒辽东湾，是东北国民党军的重要海上出入口。守敌第 52 军暂编第 58 师是由保安部队改编的，常受国民党嫡系部队的排挤和歧视。师长王家善曾供职于伪满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投靠国民党，先后充任东北行辕少将高参、保安区司令和师长等职。但是，仍被其上司视为异己，不被信任。在战局越来越对国民党当局不利的情况下，王家善萌生了另谋出路之初衷。中共东北局社会部适时地派人对该师进行争取工作。在辽阳、鞍山先后解放，中长铁路南段被切断，营口守军内缺粮草、外无救兵、无路可走的形势下，经过双方代表谈判商定，于 2 月 24 日夜达成该师起义

的协议。

25日，第4纵队进至东西四方台、汤岗子、耿庄、甘泉铺地区，独立第1师向营口东西两线阵地继续加强佯攻。25日19时，王家善率暂编第58师8000余人起义。拒绝起义的第3交警总队和第52军营口前进指挥所警卫连共3000人被独立第1师歼灭，营口又一次获得解放。

26日13时，林彪就如何处理暂编第58师问题请示中央军委。27日24时，中央军委复电林彪，对处理起义部队规定了明确的政策。电文称：“对营口起义部队采取查明情况慎重处理之态度很好。惟整编时，除你们已知之逐步地淘汰坏人提拔好人及加入我们的人进去等项办法以外，应当：（一）废除原称号，改用人民解放军称号，亦不用民主联军等项称号。（二）照我军例，有一师人就称为师，有一团人就称为团，不要名不符实，其师长团长等军官不要升格。（三）给养不要特别优待，宁可初期较差，逐步升至我军水平。总之，以老实态度对待他们，不用虚名笼络方法。”^①不久，营口起义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师，王家善任师长。

（四）攻克战略要地四平

在攻打开原、营口前夕，林彪于2月25日10时就下步作战部署报告毛泽东；东北主力拟于27日起，乘解冻之际迅速渡过辽河，围歼四平之敌并打援。当日24时，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二十五日十时电的部署计划。”

27日，林、罗、刘下达夺取四平的命令：以第1、第3、第7纵队和东北军区4个炮兵团，由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统一指挥，担负攻城任务；以第2、第6、第8、第10纵队和独立第4师等部担负打援任务；另以第9纵队活动于锦、沈铁路线上；第4纵队从营口地区向本溪前进；独立第6、第7、第8、第9师进逼吉林、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06页。

长春，牵制守敌；独立第10师进到长春以南，阻击长春守敌南援，并决定在对四平未发动总攻前，如沈阳国民党军北援，则以主力南下打援；在总攻发动后如沈阳方面来援，打援部队则节节抗击，保障攻克四平。

四平位于长春、沈阳之间，是东北中部的主要交通枢纽，市区面积10平方公里，人口12万。守敌系遭受东北解放军两次歼灭性打击后又重建的第71军第88师及该军和新编第1军留守人员、保安团等共1.9万余人，战力不强，且城大兵少。然而，守敌吸取过去坚守四平的教训，对旧防御工事进一步加修和改造，构成了更加完善的城市筑垒防御体系。

2月28日，担任攻城的3个纵队，相继向预定集结地域开进，至3月2日，第1纵队进至四平西南；第3纵队进至四平东北；第7纵队进至四平西北。担任打援之各部队，亦到达指定地区。

3月4日至8日，第7纵队和第3纵队分别攻克城北三道林子、小红咀和179.1高地，控制了瞰视全城的制高点。在肃清外围据点时，发现守敌防御重点由铁路西移向路东，指挥中心在东北角油化工厂。据此，重新调整攻城部署：第1纵队和独立第2师从城西北和正北两个方向突击；第3纵队从城东南突击；第7纵队从西南突击。同时集中炮兵第1团、第2团和第3团2个连，第4团5个连，共70门火炮参战。

部署调整后，又进行3天攻城准备。四平陷入解放军围攻态势后，卫立煌本其以不变应万变之方策，始终不出兵增援。攻城部队乃于3月12日晨，总攻四平。各纵队在炮火掩护下勇猛攻击，至10时20分，均先后突破，进入纵深战斗。路西守敌节节抵抗，并向路东败退。第7纵队和第1纵队第2师、独立第2师于11时30分在中山大街胜利会师，粉碎了第88师沿铁路组织抵抗线之企图。14时，第1、第7纵队攻占了路西全部市区后，参加围歼路东守敌。敌第88师残部退到晓东中学、万字会据守顽抗。13日拂晓，第1、第3纵队主力向两据点猛烈进攻。战至7时，除师长

彭锷少将率少数人突围逃跑外，其余全部就歼。

四平之战，东北人民解放军由于兵力集中，准备充分，步炮协同好，广大指战员英勇拼杀，仅经 23 小时，即攻克四平。共歼灭守敌 1.9341 万人，缴获各种火炮 199 门、轻重机枪 461 挺、其他枪 9683 枝、汽车 85 辆、骡马 1651 匹及一大批弹药物资。

四平作战期间，吉林守敌第 60 军慑于被歼，于 3 月 9 日弃城撤至长春，东北人民解放军追击中歼灭 3000 余人，收复吉林。至此，东北冬季攻势胜利结束。

东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东北战略要地四平，先后同国民党军展开过 4 次作战。第 1 次是 1946 年 3 月，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及其收编的伪满“铁石部队”3000 余人，解放四平；第 2 次是 1946 年 4 月至 5 月，东北民主联军展开的四平保卫战，四平被国民党军攻占；第 3 次是 1947 年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之第二阶段强攻四平，虽经半个月作战，仍未攻克该城；第 4 次就是冬季攻势再次解放四平。

中共中央获悉解放四平，即于 3 月 15 日发出贺电，庆祝收复四平及在冬季攻势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①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率全体指战员于 3 月 16 日发出贺电，请中共中央工委转林彪司令员、罗荣桓政委。贺电说：“在速战速捷东北战场中，又悉四平街之大捷，创我军攻占现代化永久筑城地带之先声，使反动派胆寒而民主人士欣慰，自此东北全部光复指日可下，除继续捷音外，得与你们并肩作战，为光复全中国而努力并学习你们攻坚战术，彻底粉碎蒋匪乌龟政策。谨驰贺，并向东北解放军全体同志致亲切的敬意。”

七、冬季攻势胜利的意义与经验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 3 集，1949 年版，第 322 页。

冬季攻势历时3个月，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损失4.3940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5.6383万人，其中俘军长陈琳达等将级军官18人、校级军官232人、尉级以下官兵11.5012万人，缴获各种炮1225门、轻重机枪4389挺、其他枪6.4669万枝、汽车304辆、骡马8531匹，击伤击落飞机各1架，收复四平、吉林两省会和昌图、开原、梨树、海城、彰武、北票、黑山、辽中、台安、北镇、盘山、法库、鞍山、辽阳、营口等17座城市及大虎山、沟帮子、新立屯等许多重要集镇，扩大解放区面积10.9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618万，收复铁路490多公里，东、西、南、北满解放区连成一片。冬季攻势的胜利，彻底打破了东北国民党军“固点”、“联线”、“扩面”的防御计划，将其分割于长春、沈阳及北宁路上的锦州、锦西等12个孤立城市中，其控制的面积仅占东北总面积的1%，整个东北战场的形势变得对解放军更加有利，为最后解放全东北奠定了胜利基础。毛泽东对冬季攻势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①

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胜利的原因与主要经验是：

1. 灵活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在冬季攻势时，东北国民党军收缩兵力，集中固守沿北宁、中长线的一些重要城镇据点，除锦州、吉林、长春兵力较多，在沈阳集结重兵，视机应援外，其他各点的守备兵力通常不少于1个师。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人民解放军打运动战的机会减少，面攻取大城市，同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时机又尚不成熟。因此，采取了集中兵力、火力攻取孤立突出、守备薄弱的据点，或围点打援的作战方针。其具体做法：一是，将攻势矛头首先指向东北国民党军防御比较薄弱的沈阳西、北地区和锦、沈铁路沿线，先分割包围，后集中兵力逐一攻克。二是，实行远距离奔袭，从几个方向上出其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3页。

不意地插入国民党军防御纵深，割裂其联系，使其欲逃无路，欲守无援，则集中5倍以上之兵力，攻而取之。三是，在兵力编组上，依据作战需要组成数个野战集团，分别担任打点、阻援和牵制等任务。打点兵力常在5倍以上，阻援兵力少则3个纵队，多则4至5个纵队，牵制兵力雄厚，且战力不弱。四是，在战役部署上，每个作战阶段或打点，或打援，重点明确。打点时，或分兵袭取一批孤立据点，或集中解决一个较大据点，均依战场情况灵活运用。五是，在战术部署上，通常以5个师以上的兵力围攻国民党军1个师守备的城镇。

2. 正确处理攻点与打援的关系。面对国民党军分散兵力守点，集中兵力应援，但又不轻易出援的情况，正确处理攻点和打援的关系极为重要。其做法：一是，攻点和打援依当时情况而定，如果目的是为了打点，打援是为保证攻点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就必须以足够兵力保证攻点必克。在打援方面，仅以相当兵力或阻援或求歼援军一部；反之，如攻点的重点是打援，则以各种手段调动援军出动，再迅速抓住将其歼灭于增援途中。二是，打援的关键在于诱其来援，因此担任攻点的部队必须认真攻城；打援部队切实隐蔽，让援军放胆出援，尔后从几个方向突然出动围歼之。三是，攻点与打援应有两手准备，一般在总攻之前遇援，则以打援为主；在总攻点开始后遇援，则以攻点为主，坚决打下点后再转移兵力打援。最要紧的是要防止犹豫不决，徘徊于攻城与打援之间而丧失时机。

3. 缜密组织攻城战斗。一是，充分做好准备，攻城关键在于准备好了再打。因此，必须给攻城部队充足的时间，查明突破口及其附近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系、工事状况及地形地物等；确定兵力部署和组织协同；准备攻城器材与物资；深入进行战斗动员、编组和尽可能地进行攻城演练，制定步炮协同计划。二是，多点攻击，重点突破，向心发展。三是，充分利用炮兵的强大火力，要使攻城部队的火力大大超过守敌，既有炮兵摧般前沿火力点，又

有强大火力压制守军纵深目标和支援突破城垣。

4. 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东北地处北纬40度以北，冬季冰天雪地，河流结冰，其辽宁、吉林省的最低气温就达-30℃。为保证在冬季严寒条件下连续作战，一是，加强思想教育，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动员和政治教育，使部队打下连续作战的思想基础，发扬不怕寒冷、不怕疲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二是，赶制和配发大批御寒物资和装具，使部队在严寒条件下能昼夜作战。三是，组建和训练几十个补充团，使部队的消耗能够及时得到补充。四是，利用战斗间隙小休整，治疗冻伤、修理枪械、补充物资和兵员。五是，组织部队轮番作战，休整恢复体力，保持持续作战能力。六是，军队协同各级地方党与政府动员支前。据统计，冬季攻势中，仅支前民工即达25万人，运送了作战部队所需的大量物资。

八、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

建设一支强大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央军委东北分委的历史任务。1947年冬季攻势前，东北已有9个步兵纵队，10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1个炮兵司令部，共34万余人。军区武装31万余人。

1947年10月15日，东北局指出，“东北我军今后要准备更多的吸引敌人兵力，争取更多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使关内我军在长江以北之新收复地区能够站稳脚，与减轻华北各老解放区之负担，有其重大的意义。”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增加在东北我军作战力量。”林彪在12月8日向毛泽东报告，深入阐述了扩大东北军队的必要性。他说，在敌人守势日益加重的条件下，我军由战略反攻走向战略进攻，除靠黄河以南三路野战军继续歼灭敌人和扩大根据地外，在根据地内部的部队，则须具备能解决敌之大的守城和大的增援，要解决这种任务，就须增加打援和攻城的兵力，兵力不够则无法打大的增援。林彪认为，我们的目标，应向着能够打据点，打大增援努力，具体内容就是要扩大军队，加强

炮火。

12月18日，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报告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根据东北局组成六十万正规军的方针，明年建军的具体计划”是：1. 野战军组成40个步兵师48万人，12个或13个纵队部，12个炮兵团，5个工兵团，两个骑兵师。2. 北满已组成的40个独立团，其中以25个团补充现有的第1、第2、第6、第7、第10等5个纵队18个师之额数；以15个团重新组成5个步兵师，并再成立1个或2个纵队司令部。3. 南满应以明年2月以前，组成的独立团将现有的2个纵队6个师补充足额（每师1.2万人）外，并将现有的3个独立师补充足额或者以这3个足额的独立师再成立1个新的纵队，或第3、第4两纵队各辖4个师，另1个独立师作为地方性使用。4. 冀察热辽应以明年2月以前组成的独立团将现有的第8、第9两纵6个师补充足额外，并以现有的4个独立师为基础补充足额并成立第3个纵队。5. 炮兵，除充实与提高炮司所属各团外，南满军区及第2、第3、第4纵队所属野炮小团，第1纵队榴弹炮营，统于明年扩充为三三制大团，即1个榴弹炮营，2个野炮营。热河同样建立1个大团。完成第6、第7两纵队野炮营，第8、第9纵队山炮团，充实第3、第4、第7纵队各师与各独立师山炮营，已完成山炮营之各部应逐渐改为4门制。为克服步兵火炮的劣势，明年必须完成在步兵团普遍建立迫击炮及步兵炮（战防炮、平射92炮等）各1个连。完成炮司高射炮团另再建75高射炮8门，在南满建立1高射炮营。6. 工兵，第1步以每个炮兵团配1个工兵营，每个步兵师和纵队部各配1个工兵连。

建军计划强调，“为加强解放军战斗力，必须消灭军队组织上头重脚轻，前小后大的现象。”除已开始整编精简东北局、东总一级机关外，必须彻底精简各纵、师的后方机关及人员，消灭到处摆摊子、浪费人力的现象，师的后方一律取消，并入纵队。前方则应大大精简警卫员、车务人员，大大增加步炮的数目，以加强

突击力。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2月23日致电东北局，“完全同意”上述建军计划，并“望按此切实执行。”^①

建设一支强大的东北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要解决兵员问题，二是要解决武器装备问题。

关于兵员，东北局、东北军区实行组建第二线兵团的方法，即“是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工人入伍，抽调野战军或地方武装的干部和老战士作骨干，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升级的阶段，直接编成独立团，实施短期训练后，补充主力或编成新的师。”^②1947年7月，东北局作出了关于成立第二线兵团的决定。第一批建40个独立团。经过东北全党全军的努力，到1948年2月底训练完毕，3月间开赴前线补充主力。接着，东北局于1948年3月提出了再建第二批独立团126个的计划。其中北满46个，热河50个，南满30个。每团2500人，总计30万人。第1期4月至7月，先完成70个；第2期8月至12月，再完成56个。^③

关于武器装备，东北局要求后方加强军工生产。据统计，1948年制造八一、八二迫击炮弹58.0385万发，六〇迫击炮弹69.4503万发，掷弹筒弹22.6449万发，手榴弹157.0089万枚，子弹675.1827万粒；复装山炮弹10.7891万发，九二、九四步兵炮弹16.7万发；制造八一、八二迫击炮52门，六〇炮2764门；修理重机枪454挺，轻机枪1143挺^④。东北局同时要求各野战兵团，要纠正不注意收集缴获的武器，不严密打扫战场，不爱惜武器的现象，严格执行一切缴获要归公。所以，尽管部队迅速扩大，武器装备得到了较好的补充。

①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21页。

②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页。

③ 同上，第432页。

④ 朱建华：《东北解放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6页。

1948年3月13日，以原辽南独立第1师、独立第2师及南满独立第3师编成第5纵队，辖第13、第14、第15师，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以原冀察热辽独立第1、第2、第3师编成第11纵队，辖第31、第32、第33师，司令员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麒；原独立第2、第4、第5师编成第12纵队，辖第34、第35、第36师，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

4月13日，将辽东前方指挥所改称东北军区第1前方指挥所，萧劲光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将冀察热辽前方指挥所改称东北军区第2前方指挥所，程子华兼任司令员，黄克诚兼任政治委员。同年9月1日，这两个前方指挥所分别改称东北野战军第1、第2兵团部。

到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计有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2等12个步兵纵队，另15个独立师，1个炮兵纵队，1个坦克团，3个骑兵师和1个铁道纵队，共70万人；军区武装33万余人。东北战略区总兵力达103万人，成为全国各战区中兵力最多的一个战区。

第二节 晋察冀野战军实行宽大机动作战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克运城、临汾

一、晋察冀野战军实行宽大机动作战方针的确立

傅作义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不久，其主力第35军就在涞水遭到晋察冀野战军的迎头痛击。与此同时，东北国民党军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处境更加不利。东北、华北两战场局势的恶化，迫使蒋介石于1948年1月10日从南京飞到沈阳，并把傅作义召到沈阳。11日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东北、华北作战与两区协同配合问题。关于华北战略，蒋介石、傅作义依然决定集中主力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带与经济政治中心城市，由点线扩大到

面的控制，以求稳定华北，支援东北。

由于傅作义将主力集中平津保三角地带及平汉、平绥、北宁等铁路沿线，并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针，这就使晋察冀野战军很难在上述地区求得歼灭战的机会。与此相反，在察哈尔省南部、绥远省东部广大地区，傅作义部署的兵力就相对薄弱。其正规军、非正规军总计不超过5万人。

为了继续削弱、歼灭傅作义集团有生力量，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冬季攻势，1948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中央工委并晋察冀中央局和野战军，同意野战军一时期执行1个纵队向大清河北行动，主力围攻保定并打援的计划，然后休整若干天后，“以主力展开于平绥路大同、北平线，大举破击该路，并准备向路北和冀东机动，以一部在三角地区机动。”17日13时，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致电中央军委、中央工委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再围保定，然后出察哈尔的作战设想。电报称：因傅作义以4个主力军集结保定、涞水、涿县三角地区，“我不便继续在平、保北段作战，拟再南下围保定，将主力置于保定东南及西南地区，又拖敌南援，求得寻机歼敌一部，并配合东北”。“我（们）预定战役继续到下旬末即停止，休整若干天，并进行各种准备，尔后则进入察哈尔作战。”次日1时，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十七日十三时电所提作战计划。”31日，又致电杨、罗、杨、耿等，“你们部队是否正在作出击平绥路的准备，何时开始行动，作战计划如何。我们意见除冀中地方兵团外，野战主力及五台、察北一切部队，同时对北平、大同线举行攻势。但主力先打北平、张家口段，得手后向西再打张家口、大同段。此战役时间估计为一个月至四十天，然后休整一个月向冀东出动。”^①这个指示，明确规定了晋察冀野战军今后作战的主要方向，一是平绥路，二是冀东。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83页。

2月7日，杨得志、罗瑞卿等报告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军委三十一日指示”电悉，“我们正在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以便下一步进入平绥东段作战。战役具体步骤候我们研究确定后再报告。”22日17时，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领导人就共同研究讨论后确定的下步作战方向与计划，报告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经讨论，下一战役方向，如先出怀来、南口段，不能速决，敌主力增援快，我军运动道路受限，有陷被动之虑。拟以二、三、四纵队（缺一个旅），首先歼灭蔚县、西河营、桃花堡守敌。尔后依情况向北、向东扩张战果。一、六纵队全部经浑（源）、涞（源）向阳高、天镇线进击，歼灭守敌，破坏铁路，求得吸引敌一个至两个军援兵，造成主力机动有利的条件。如敌以主力（三至四个军）寻我主力决战，则野战军主力转向平绥路东段，或乘虚回师保北，一、六纵队继续向柴沟堡或大同外围扩张战果。野战军主力抽出一个旅，配合冀热察独二师及地方军各独立团向沙城、南口段破击铁路及公路交通，迟滞敌向察南增援，保证主力方面作战计划成功。七纵队位于大清河以南，相机再出大清河北收复地区。”“为与东北行动协同，各部定于三月上旬开动。三月十五日以后开始攻击。一、六纵队提早一天至两天动作。”^①

2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此次行动是一年多以来你们主力部队第一次远出行动。你们必须克服干部中怕远出，怕山地战，怕到人稀粮少地区作战，以及怕傅作义等项错误思想。干部中如果现在尚存有这类思想，你们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②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学习刘邓、陈粟、陈谢诸军敢于在江淮河汉之间远离后方，而能与强大敌人作战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学习林罗军敢于在-30℃气候条件下在完全敌占区与强敌作战的精神，保证远出机动作战的胜利。

^① 《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83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6页。

3月10日15时，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在作战上，我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即我集中敌亦集中，敌以三十个团左右的兵力堆在一起，我割他不开，咬他不烂，总是不好下手。在此情况下，往往不是打不成就是打不好。”14日，中央军委致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告中央工委、晋绥分局等，指出战胜傅作义“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战法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实行宽大机动。“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灭的困难问题。”关于晋察冀野战军的机动范围，中央军委认为，“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打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必须建立向冀热察交界地区及冀东地区作战的计划，但出动的时机与出动兵力的数量应依情况决定。此外你们必须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在新区工作的策略与政策教育，此点不知你们在此次休整中已做了没有，如果没有或不足，你们应在作战中补足之，此种教育极为重要。”^①为帮助晋察冀野战军领导人尽快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2月7日曾致电朱德、刘少奇：“该军须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扩大了，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以扫除了。此点请朱、刘就近加以督促。”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从战略思想、作战方针、作战范围、作战准备等方面，都给晋察冀野战军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保证了该野战军在尔后取得作战与扩大解放区的胜利。

二、出击察南、绥东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28页。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晋察冀野战军决定将 5 个纵队组成两个兵团：以第 1、第 6 纵队为左翼兵团，在第 1 纵队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王平统一指挥下，首先攻克阳高、天镇等据点，切断天镇至周士庄段铁路线，吸引傅作义部主力增援；以第 2、第 3、第 4 纵队为右翼兵团，在野司直接指挥下，向桑干河以南的广灵至桃花堡一带攻击，并准备打援。

为配合野战军举行察绥战役，晋察冀军区于 3 月 9 日作出如下部署：

“一、冀中纵队（七个团）于平汉线保定、安新、容城地区配合三、四纵队所派之旅佯攻后，主力（欠一个旅）出大清河北恢复地区，一个旅西调满城以北，防敌向冀西山区威胁我主力之侧背。如敌北调则破击平保路滞敌调动。另八分区配合渤海一个团于十八日晚积极向天津南及津浦路北段动作。

二、冀东以独四、五两师及十四、十五分区四个团，分向平古路及三河、通县、香河、武清地区出击配合。

三、冀热察以冀察分区部队破击南口、怀来段铁路、公路。蒙汉联军^①向张北附近活动，如敌调动则乘虚袭击该城。

四、晋绥可能以三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及独立团向怀仁、大同、集宁线出动配合。

五、为防阎匪乘机东犯，抽石门警备部队（四个营）控制于阳泉西地区，协同二分区监视太原方向敌情。”^②

各部队接受任务后，举行了誓师大会，并根据晋察冀中央局制定的《关于我军进入敌占区作战几项政策的决定》和野战军前委的动员令，进行了深入的动员与各项准备。3 月初，第 1 纵队从易县、第 2 纵队从定县、第 3 纵队从唐县、第 4 纵队从安国、第 6 纵队从曲阳地区相继北上，向战区开进。随军出动的民工、民兵

^① 蒙汉联军，指绥蒙军区部队。

^② 《聂荣臻军事文选》第 283—284 页。

达 3.37 万余人，担架 5500 余副，大车 230 余辆。

为解决军队的供应问题，各部队同地方政府联合组成了支前工作委员会或工作团，在中共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动员战区人民支前，筹集作战物资，保障作战部队的后勤供应。

3 月 20 日晚，左翼兵团首先发起进攻，战至 24 日，全歼补训第 5 师和保安第 20 团，切断了张家口至大同的交通线，控制铁路 50 余公里。右翼兵团于 21 日拂晓发动攻击。第 2 纵队第 6 旅进攻广灵县城。广灵为察南第 1 道屏障，城墙高 8 米，厚 5 米，护城河宽 7 米。守敌依托城墙和野战工事组成严密火网，拼死顽抗。21 日 5 时，第 6 旅发起总攻，用 150 公斤炸药炸开北门，仅半小时就结束战斗，歼灭守敌 1500 余人。第 4 旅于同时攻克暖泉、洗马庄等据点。第 5 旅奔袭桑干河以北的阳原县城，24 日拂晓完成包围，25 日 8 时战斗结束。全歼守敌暂编第 11 师及整编骑兵第 11 旅各一部，共 1500 余人。

第 3 纵队攻占桑干河以南的桃花堡、吉家庄、白乐堡、北水泉等据点后，向桑干河以北挺进，进攻花稍营。花稍营为张家口、蔚县、宣化、大同公路的交叉点，北靠山，南临桑干河大桥。筑有 5 米高的围墙及外壕，由暂编第 11 师 1 个团及整编骑兵第 11 旅 1 个连防守。23 日，第 7 旅切断了花稍营守敌的退路。第 8 旅攻占桑干河大桥，进而包围了花稍营。24 日 22 时开始攻击外围据点，激战两小时，全部肃清。25 日 7 时发起总攻，至 13 时结束，击毙守敌 300 余人，俘正、副团长以下 1500 余人。

第 4 纵队第 10 旅攻占北峪口后，直逼蔚县城。蔚县是张家口南面的主要据点，城墙高 14 米，宽约 6 米，筑有碉堡和射击孔。护城河宽约 10 米，水深 1 米。守敌为补训第 6 师等部 2500 余人。第 4 纵队集中各旅迫击炮和野炮 5 门，支援第 10 旅向城南和城西攻击，第 12 旅向城东和城东北角攻击，第 11 旅于蔚县东北的代王城附近准备打援。24 日 6 时 40 分发起总攻，第 10 旅首先突破城垣，向东、南门方向发展进攻；其余各部炸开东、西、南三城

门，突入城内，进行穿插、分割、包围，将守敌压缩在玉皇阁，战至9时，全部歼灭守敌，解放蔚县城。

至此，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晋察冀野战军攻占了广灵、阳高、天镇、蔚县、阳原等5座县城和10多处据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万余人，收复察南大片地区。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第一步作战胜利。”^①

傅作义为阻止晋察冀野战军的攻势，急忙抽调暂编第3、第4军和第35军等部共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向张家口柴沟堡地区集结，形成“以主力对主力”的态势，而这时绥远地区只有独立第7师，补训第2、第3、第4师及地方保安警备队等非正规军，共约3万余人。于是，杨得志、罗瑞卿等决心以左翼兵团即刻挺进绥东，破击大同至集宁段铁路线，歼灭沿线守敌，视情况攻打凉城、集宁，引诱傅作义部主力西进；右翼兵团一部破击平、张段铁路线，切断傅部后路，造成在察南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的机会。

3月25日，左翼兵团2个纵队自天镇地区西进。第1纵队以远距离奔袭手段，于27日一举攻占丰镇，并破坏了丰镇南北铁路线15公里及丰镇以北的公路。傅作义发觉后，忙调柴沟堡地区的暂编第4军等部3个师1个旅西援。29日，其先头进至天镇地区，而主力仍在宣化至柴沟堡一线集结，迟迟不进。杨得志、罗瑞卿等为再度诱其西进，迫其分散，乃以第1纵队于4月3日相继攻占了天成、新堂。第6纵队以奔袭手段，于4日袭占凉城。果然，傅作义误认为晋察冀野战军主力业已西进绥东，遂调第35军、新编骑兵第4师、整编骑兵第5旅由张家口经柴沟堡西开。5日，第35军先头2个师乘汽车经集宁进抵卓资山，后尾1个师进到集宁；新编骑兵第4师、整编骑兵第5旅进抵丰镇至集宁一线；暂编第4军率2个师进到天镇、西湾堡地区。

① 中央军委1948年3月25日致杨得志、罗瑞卿等电。

鉴于调动傅作义主力分散的计划已经实现，杨得志、罗瑞卿等抓住战机，决以右翼兵团歼灭天镇地区的暂编第4军5个团。4月7日黄昏，攻击部队向前运动，暂编第4军主力察觉后弃城逃跑。第2纵队在追击中俘虏500余人，再克天镇。第3纵队在开进中攻占溁沓店。9日拂晓，第9旅包围怀安城。当日黄昏发起总攻，至19时战斗结束，守敌大部经城北暗道逃遁。

天镇失守后，傅作义慌忙将西进部队东调。并令在平绥铁路东段的部队西进接应，还将第94军主力由冀东调到宣化至下花园铁路沿线。这样，傅作义的主力再次结集于张家口东、西地区，又形成了“以主力对主力”的态势。晋察冀野战军原拟以右翼兵团西去绥远与左翼兵团合力歼灭第35军，因该地区粮食缺少、敌情发生重大变化而未实现。于4月10日决定左翼兵团东返，准备夺取晋北应县；右翼兵团南返蔚县、广灵地区，准备出击冀东。至此，察南、绥东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是晋察冀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进行的第1个战役，历时20天，以伤亡和失踪3589人，消耗子弹54万多发、手榴弹1.6836万枚的代价，取得歼灭国民党军共1.8466万人，缴获各种炮50门、轻重机枪336挺、长短枪6712枝及子弹64万多发、手榴弹1.3751万枚，解放察南、绥东地区1.3万余平方公里土地，人口80万的重大胜利，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迫使傅作义抽调主力往返驰援，忙于奔命，无法抽出兵力援助东北，而且使傅作义的后方交通线陷于瘫痪，其战略要点张家口、大同等地更为孤立突出，处于不利态势。

三、围攻应县和粉碎阎锡山部偷袭石家庄的图谋

应县位于山西省北部，既是军事重镇大同的南面屏障，又是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伸入雁北解放区的一个反动据点。应县周围各县的地主、富农、恶霸大都逃至该城。应县四周地形平坦，多沙土，水位高，不易坑道作业。据守该城的国民党军有1个步兵团、1个保安团和骑兵团，共5000余人。守军以城

墙为骨干，构筑了较坚固工事，组织了严密火网。

晋察冀野战军第1纵队奉令担任夺取应县的任务，于1948年4月10日由左云地区向应县开进，15日到达指定地区，完成了对应县的包围；第6纵队奉令于16日进至怀仁地区，准备阻击从大同方向来援的国民党军。

第1纵队扫清外围作战于4月20日19时40分开始。外围守敌1000余人，迅速缩回城内。

22日16时，第1纵队第2旅，在山炮、野炮共6门掩护下，从城东南角；第3旅在4门山炮掩护下，从城西南角，同时发起攻击。3次攻击，均遭守敌猛烈反击，伤亡300余人，第一次攻城受挫。

5月3日18时，第1纵队第二次攻城。第1旅和第3旅在山炮、野炮14门火力支援下，集中突击城西南角。突击队登上城墙，当即遭到守敌三面火力封锁，伤亡过半。这次攻城伤亡400余人，再次受挫。

第1纵队虽两次攻城受挫，但指战员士气仍非常旺盛，他们决心再战。经过14天的充分准备后，5月17日18时，第1旅及第3旅第7、第8团，在山炮、野炮14门火力支援下，重点攻击西南角突出部。战至18日拂晓，第三次攻城又受挫。随即转为围困。第6纵队奉命结束阻援，移到浑源待机。

5月24日，应县国民党军在大同出援的暂编第26、第38师，新编第7师等部共9个团兵力的接应下撤至大同。应县获得解放。

第1纵队围攻应县40天，伤团以下指战员1950人，亡348人，被俘8人，共损失2306人，消耗各种炮弹1.0608万发、子弹43.6401发。击毙应县守敌504人，击伤1803人，俘虏113人，共计2420人，缴获轻机枪58挺，其他枪973枝、汽车3辆及弹药物资一批。然而，进攻应县却打了一个消耗仗。其原因，一是弹药缺乏；二是纵队成立不久，缺乏攻城经验，如第3次攻城时，几个营集中在突破口，部队拥挤混乱，又不适时向纵深发展，致

遭守敌火力猛击，造成很大伤亡。

在应县作战期间，阎锡山乘晋察冀野战军主力远在察南，而石家庄防守兵力较少，以其第43军暂编第49师及第8总队，自山西寿阳东犯，企图偷袭石家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即令位于浑源地区的第6纵队迅速南进，并指挥冀中军区第7纵队第21旅、北岳军区第2军分区的2个团，歼灭偷袭石家庄的阎锡山部队。第6纵队于4月30日出发，5月8日进至孟县附近。与此同时，吕梁军区独立第3、第7旅及太行军区3个团亦奉令逼近太谷，配合第6纵队作战。

5月9日，暂编第49师等部进至孟县西南的东、西郭村和南、北上社，继向孟县城前进。第6纵队当即以一部从正面攻击，主力从两翼迂回，首先围歼第8总队。该总队除1个营突围外，其余被歼。接着，第6纵队在北岳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配合下，攻击暂编第49师。该师大部被歼，残部于10日分散向榆次方向逃跑。

此次作战，第6纵队等部共歼灭敌军4700余人，其中俘虏第43军中将军副军长兼暂编第49师师长张翼以下1700余人，粉碎了阎锡山偷袭石家庄的图谋。第6纵队这种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受到了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勉。

四、解放运城

运城位于晋南平原盐池北岸的同蒲铁路线上，是河东盐的产销中心。占据运城，西可出击关中，南可威胁陇海铁路，且对巩固晋南解放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运城原为阎锡山部队的防地。1946年秋，胡宗南派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率4个整编师进入晋南配合阎锡山部作战，南京国防部随即将临汾及东西一线以南各县划归西安绥靖公署。

1947年4月4日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发起晋南攻势，并遵照中央军委乘胜夺取运城的指示，于26日将攻击矛头指向运城。5月1日，对外围据点发起攻击。守敌整

编第 17 师第 49 团及炮兵 4 个连、保安团等部共约 4000 余人，依托坚固工事，在空军支援下，顽强抵抗。经过激烈战斗，第 4 纵队等部攻占羊驮寺机场和西、北两关。5 日，西安绥靖公署接到蒋介石：“运城为晋南战略要地，必须固守待援”的电令，急令整编第 10 师师长罗广文率第 10 旅和青年军第 206 师 1 个团，由韩城东渡黄河增援，第 4 纵队鉴于夺取运城的条件尚不具备，同时为了迅速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乃于 5 月 9 日放弃对运城的围攻。这是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第 1 次打运城。

1947 年 8 月下旬，陈谢集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为不使晋南地区国民党军干扰陈谢集团的行动，中央军委于 9 月 8 日命令晋冀鲁豫军区第 8 纵队“歼击运城出扰之敌”。第 8 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指挥该纵 2 个旅和太岳军区部队（后来吕梁军区独立第 3 旅亦赶来参战），发起了第 2 次运城作战。苦战 37 天，歼灭守敌 2000 人，攻占了外围 7 个碉堡和飞机场，推进至距城壕百十米，破城坑道也挖至距城数十米。这时，胡宗南接到运城告急电，即令整编第 36 师师长钟松率第 1、第 27、第 28、第 83 旅增援运城。11 月 12 日晨，该部从太阳渡、茅津渡北渡黄河，占领平陆。王新亭根据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的指示，留 5 个团监视运城，率主力与在曲沃地区休整的西北野战军第 2 纵队在杜村、马村、七里坡地区与援敌激战数日，歼敌 3700 余人，将其逐过黄河。然而，第 2、第 8 纵队和独立第 3 旅亦伤亡达 3000 人，无力再攻运城，遂转入休整和补充。

11 月 21 日，王新亭、王震就此次南下打援打成一个大消耗战的原因，向中央军委、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作了检查：“此役教训，我们在指导上的主观错误，乃对此南北横断、东西水阻、绝壁深沟、天井窑（之地形）；对在杜村、马村、七里坡有敌来时挖的工事之利害关系认识不足。我埋伏在敌通过道路东西两侧十五里地左右，夹击敌二十里行军纵队，敌发觉我即成密集队形，跑进村落防御，我跟着猛扑，不得手，伤亡甚重。”²²

日，中央军委在回电中指出：“攻运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二次仗未打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①

第2次打运城结束后，攻运部队第2、第8纵队进行了休整。这期间，徐向前、滕代远与王震、王新亭认真分析研究再打运城问题，并在12月3日将其决心报告中央军委。第2天，中央军委复电：“（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②

这时，运城守敌为整编第36师第123旅第369团、整编第17师第48旅第250团、整编第90师第182团（欠1个营）、炮兵第11团第2连、汽车第6团，以及山西保安第5团、晋南3个专署16个县的保警队、盐警队、政卫队、还乡团、特务营等共6000余人，统由第369团团团长覃春芳指挥。安邑守敌为山西保安第11团和一些县警队。两地的国民党军队，共计1.3万余人。

针对运城国民党军分布情况，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的前线指挥部决定：集中主力由西、北两面实施主要突击，即以第2纵队2个旅由西关至马家窑地段实施突击；第8纵队2个旅并指挥独立第3旅2个团，由老北门实施突击；独立第3旅1个团及第2纵队独立第6旅1个团，担任城东北角及东南角箝制任务；同时以第2纵队独立第6旅2个团配合安邑、夏县、闻喜、猗氏（今临猗）、万荣5县游击队，围攻安邑县城；太岳军区3个团及各县大队，位于茅津、太阳、沙窝、风陵、吴王等渡口，担任阻援。

12月16日，攻城部队分别完成了对运城、安邑的包围，并从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55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36页。

西、北两面对运城发起攻击。因守敌工事坚固、火力较强，激战两天，无大进展。前线指挥部及时检查总结了原因，重新组织兵力火力，再次发起突击。至23日，扫除外围全部据点。

前线指挥部原定25日黄昏发起总攻，因24日获悉胡宗南派4个旅来援，其先头部队已由陕州（今陕县）渡过黄河，于是决定提前在25日拂晓攻城。由于准备仓促，步炮协同不好，两次攻城均受挫。而这时，胡宗南的援军已逼近，为保障攻城作战，前线指挥部调独立第3旅加强阻援方向，并要各旅在阵地前开会研究战法与再进行政治动员。大家认为，在炮火不足的情况下，坑道爆破是攻城的最有效手段。第8纵队第23旅第69团车元路等9人，从26日19时起在寒风冰水中，不顾伤亡，用双手扒开泥土强行坑道作业。至翌日天黑前，作业人员虽大多负伤，却挖成了一条5米多长，可容3000公斤炸药的药室，随即完成装药。

27日黄昏，发动总攻。第8纵队第23旅在老北门的坑道爆破成功，突击队乘爆破烟雾神速登城，同守敌反复进行白刃格斗，打退敌数次反冲击，巩固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梯队投入纵深战斗。第8纵队第24旅与第2纵队一部改从第23旅的突破口进入，第2纵队主力架云梯从西门进城。守敌防御体系虽现混乱，纷纷弃守。28日2时，约4000人向盐池庙方向突围逃跑。其中一股3000余人逃至平陆县七里坡附近，为阻援部队歼灭；另一股700余人逃到永济以西中村附近地区亦被追歼。是日7时，运城守敌残部被全数歼灭。

28日黄昏，安邑守敌保安第11团等部弃城北窜，亦被追歼大部。

此役，解放军参战部队伤亡团级以下官兵6803人，消耗各种炮弹2.0270万发、子弹55万余发，损失各种炮6门、枪587枝，毙伤国民党军2692人，俘1.0463万人，缴获各种炮和掷弹筒94门、轻重机枪887挺、其他枪3106枝、各种炮弹8748发、子弹78.5万余发，以及汽车108部、电台47部等大批物资。有力地配

合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对平汉、陇海两铁路的破击战。而“更宝贵者是取得了攻坚经验。”^① 1948年2月23日，王新亭在山西翼城召开的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报告了攻打运城的经验：一是注意攻击准备；二是强行坑道作业；三是采用小组连续爆破；四是在兵力使用上反对平均主义；五是坚决执行命令，不打滑头仗；六是要有忍劲，坚持最后5分钟。

蒋介石认为，“运城陷落，有关晋局甚大”，乃手令胡宗南“从速收复”。^② 已捉襟见肘的胡宗南，虽派出救援部队，但一闻运城失守即回缩。经过3次作战，人民解放军终于占领了运城。

五、攻克临汾

运城解放后，整个晋南地区只剩下临汾一座孤城仍为国民党军盘踞。

在运城作战期间，徐向前、滕代远已在考虑夺取运城后下个战役目标。1947年12月29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今后作战我们提议两个方案：甲、二、八纵并独三旅及地方五个团攻取临汾；乙、如二纵需西返，则八纵开豫北，结合太行、冀南四个独立旅及独立师共八个旅兵力，攻取安阳、新乡、焦作等据点。”是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攻克临汾对各方面（特别是对支持西北战争）极为有利。”“但对临汾城防及陕州宜川两处敌人增援之可能性，我们尚无把握，望调查并考虑电告。”^③

1948年2月上旬，晋冀鲁豫军区在阳城召开太岳区党政军联席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研究了打临汾问题，并就这个战役的准备工作作了布置，组织了前方指挥所，由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任司令员，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准备参加临汾战役的部队，计有第8纵队第22、第23旅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2旅组成的

① 徐向前 1948年2月17日致中央军委电。

② 《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1月2日。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58页。

该纵第 24 旅；太行军区独立第 1、第 3 旅和晋冀鲁豫军区独立师组成的第 13 纵队第 37、第 38、第 39 旅；太岳军区 8 个步兵团；吕梁军区独立第 3、第 7 旅。总计 5.3 万余人，榴弹炮 6 门、野炮 15 门、山炮 10 门、战防炮 8 门、迫击炮 128 门。这些部队，除第 8 纵队第 23 旅和第 13 纵队第 37 旅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部队，战斗力较强外，其余都是解放战争开始后，由地方部队升级组成的，作战经验，尤其是攻坚战经验缺少。

临汾为晋南最大城市，相传是尧王建都的地方，故有尧庙宫、尧陵等古迹。城池依自然地形建在一个大土丘上，内高外低，城高壕深，状似卧牛，故素有“卧牛城”之称。历来为军事重镇。自从纵贯山西全省、沟通华北与西北交通的同蒲铁路通车后，这里是同蒲铁路南段的交通枢纽。抗日战争时，侵华日军一直在临汾驻扎重兵，修筑了坚固工事。日本投降后，胡宗南派部队占领临汾，并在原日伪军工事基础上又进行了加修加固，以其整编第 30 师久驻此地。因此，临汾又成为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基地。1947 年冬，胡宗南把整编第 30 师主力空运西安，临汾改归阎锡山部据守。这时，防守临汾的兵力，计有阎锡山的第 66 师和 6 个保安团、2 个补训团，胡宗南的整编第 30 师第 30 旅（欠 1 个团）和第 27 旅炮兵营，总兵力 2.5 万人，统归阎锡山的第 6 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指挥。

梁培璜，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是阎军中较有作战经验的一名将领。他在临汾筑有 4 道防线：第 1 道防线是外围警戒阵地，以城东、南、北各 2.5 公里，城西 7.5 公里内的较大村镇为据点构成。第 2 道防线是护城阵地，以环城周的 27 组碉堡构成。每组 3 碉，以水泥、片石构筑的主碉居中，距城 50 至 80 米，有的还有暗道通向城内。第 3 道防线是外壕和城墙阵地。外壕在旧护城壕基础上挖成，深 20 米，宽 30 米，紧靠青砖砌成的城墙。城墙高 15 米，上宽 10 米，底宽 15 至 30 米。在城墙顶部四角和四个城门楼上修有火炮、各种枪和喷火器使用的据点工事。将城墙腰部挖

空，修筑轻机枪、步枪和喷火器的发射掩体。底部墙根周围修筑地堡，由墙内出入，射孔朝城墙外。第4道防线是城内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城墙内有一条深、宽3至6米的内壕，壕内每隔15米修一伏堡。城内主要街道和高大建筑物上，共修了11个巷战据点。在城东偏南的东关，高度略低于主城，也构筑了完备的防御工事，与主城形成一个整体。据当地人说，临汾在历史上没有被攻破过，连李自成也是望城却步。梁培璜面对坚固的城防工事极为得意。他说：“八路军作战，向来是以多胜少，我们把临汾城周工事筑成法国的‘马奇诺’，来个以少胜多。”^①

2月17日，徐向前致电中央军委：由于增援运城的胡宗南部已经退缩黄河以南，“我们第一步作战计划，拟攻歼临汾之敌。”因未解冻，准备在作战开始前普遍进行攻坚训练，内容：“土工作业，连续爆破，破坏外壕，坑道作业，攻击碉堡群、地堡，打开城墙突破口，竖梯登城。巩固突破口向两翼发展，纵深战斗及步炮工协同动作等项。”徐向前认为，必须熟练掌握这一套攻坚战术，“才能代价小，收效大。”18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向前，并告李井泉、周士第，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滕代远、薄一波：“（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②

2月21日至23日，前方指挥所在冀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第8纵队司令员王新亭介绍了运城攻坚战的经验。23日，徐向前作攻打临汾动员报告。他说，本军区今后的作战任务，在本区来

^① 《临汾攻坚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5页。

说“就是要肃清内线的残余敌人，及其残留的据点”；“在全国范围说来，我们要配合外线作战，同时要把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培养成为专门的攻坚部队”。关于当前任务，徐向前在报告里指出，“本军区春季攻势第一个战役计划，主要的对象就是临汾。”“这个战役，不仅影响本区，还将有力配合西北和黄河以南的野战军作战，并且打下临汾后，晋南就完全没有敌人的残留据点了，我们晋冀鲁豫区就可和晋绥和西北，在很宽广的地区连成一片了。所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能不能攻克临汾这样设防坚固的城市呢？徐向前分析敌我力量后，认为，“是有胜利把握的。”就敌人方面而言，一是，“已丧失了守城信心。敌人内部不团结不统一，临汾城的敌人，有胡宗南部队，有阎锡山部队，还有土顽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互相磨擦、抵消。”二是，“敌人是孤立的，四周被我们解放区军民紧紧包围着。敌人要想来援，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北边是唯一可以来援的方向。如果敌人来援，正是我们欢迎的，我们就打援，在野外消灭他。”三是，“临汾城内的敌人，总计不过二万五千来人，而且也受过我们的打击。临汾的工事，同运城差不多，可是临汾城的四周，比运城大得多，这也是便于我们突破的。”就我方来说，“内部是统一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有全边区三千万人民的支援，我们的兵力比敌强。”徐向前强调指出，上述这些，“只是解决问题的根据，要经过战斗才能解决问题。”^①徐向前的报告，使参战的各级指挥员明确了任务，增强了胜利信心。会后，参战部队立即开展了练兵运动，积极进行攻击临汾的准备工作。

临汾战役原定3月10日发起。但是，胡宗南于6日派飞机来临汾接运整编第30旅返西安。为扣留该旅，徐向前决定提前于3月7日攻击临汾，首先夺取飞机场，封闭敌人空中逃路。

3月6日夜，第8纵队从南向北逼近临汾。次日，该纵第24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145页。

旅以火力封锁了城南飞机场，击毁飞机2架，其余8架仓皇飞逃。第13纵队于5日西渡汾河，对出拢襄陵、汾城地区的阎军第66师等部，突行奔袭，歼其一部，其大部回窜临汾。与此同时，太岳军区部队亦从北向南逼近临汾。经过3天战斗，共计歼灭国民党军1200余人，对临汾构成合围。

梁培璜为引诱解放军于坚城之下，令外围各据点守军边打边撤，逐次向城周各据点集中，并调整部署：以整编第66师守东关及外壕外沿各据点；以杂牌部队填补空隙及次要据点。蒋介石为给阎锡山、梁培璜打气，在南京“国民大会”上宣称“决心保卫临汾”，并派国防部次长林蔚请求美国人陈纳德派飞机助战。阎锡山忧心如焚，手中又无兵增援，只好3次电令梁培璜，要他“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同时，阎锡山还派第61军副军长娄福生飞到临汾，转达他的指令，要梁培璜“依现有力量死守，不要希望援兵解围”^①。梁培璜决心拚死抵抗，他给部下颁发了“八杀”命令：凡“进攻或赴援迟延者；放弃守地者；邻阵被攻不援者；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待恢复者；射击后阵地前无敌尸者；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代行职务者”，均在被杀之列，企图以此恐怖手段胁迫部属死守城池。

徐向前根据实地观察和从俘虏中获得的城南难登，且登城后也不易发展，而城北地势较高，利于登城和便于兵力、火力展开的情况，决定改变原定的从南、东、北三面攻城方案，将城南改为助攻，集中主力攻城东、城北两面。遂调整部署：以第8纵队第22旅并指挥太岳军区2个团在城南助攻；以第13纵队从城东攻击东关及电灯厂；以第8纵队第23、第24旅从北门以西地区攻击兴隆殿等据点；以太岳军区4个团从北门以东地区攻击第4、第5号碉堡。各部队随即挖掘交通壕，向守军据点逼近。

23日，攻城部队全线发起攻击。第13纵队第38旅至26日，

^① 《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9页。

三次攻击东关均未成功。配合第 38 旅攻打东关的第 39 旅向东关北侧电灯厂发起攻击，经过两天坑道作业，于 30 日晚爆破成功，全部占领了电灯厂。第 8 纵队第 24 旅攻击兴隆殿据点和太岳军区部队进攻第 4、第 5 号碉堡，均受挫。

至 30 日，经过外围激烈战斗，攻击部队已歼灭守敌 3000 余人，夺取了一些据点，初步取得了攻坚战斗的经验，但也付出了较大代价，“伤亡三千至四千人。”^①为了总结战斗经验，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于 3 月 31 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作了《关于攻临汾外围作战检讨及今后作战等问题》的报告。报告在分析敌情时指出：“阎锡山花样多，一贯主张防守战法，当我开始包围临汾时，敌远距离外围据点，不战而退；但近距离城壕外围据点则拚命固守，土顽换为正规军。”由于“守敌待援无望，突围有被歼之危险，只有死守一条路”。徐向前指出，“我们人力物力消耗亦很大，也只有坚决打下临汾的一条路。”徐向前认为，“坑道是对付这个敌人的最好手段。”“我们要用‘土行孙’的办法攻打临汾。”

4 月 1 日，前线指挥部第 2 次调整部署：第 8 纵队第 23 旅，第 13 纵队第 37 旅在炮兵掩护下，作为夺取东关的主力部队。从这天开始，攻城部队进行坑道作业。至 9 日，挖成了 4 条坑道。

4 月 10 日 16 时，争夺东关战斗激烈展开。经过 2 小时火力准备，第 23 旅同时爆破 3 条坑道，炸开两个大缺口，突击队乘烟雾登上城头，勇猛向纵深发展，至 11 日上午，歼灭守敌第 66 师大部，攻占东关。

东关失守后，临汾守军第 66 师仅剩 700 余人，整编第 30 旅虽有战斗力，但也伤亡 400 余人。为填补兵力之不足，梁培璜强迫市民上前线，并在鼓楼、关帝庙建筑据点，城墙上每隔 50 米加修 1 个地堡及横墙，将东城靠城墙 200 米内房屋平毁，加修内壕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 169 页。

及壕内沿地堡，在东、南、北三面城墙下挖防御坑道，坑道底部设听音缸，监听解放军挖坑道的情况，作垂死挣扎。

4月19日，徐向前下达《临汾战役攻城作战基本命令》：“我决集中八纵、十三纵全部，太岳集团主力自东南两面同时攻城，彻底歼灭城内之敌，另以一部对城北、城西举行箝制攻击。”其中，“以八纵全部配属野炮八门、榴弹炮四门、战防炮两门、十五公分迫击炮两门、十二公分迫击炮十门，由东城门以北第一突出部（含）之以南攻城，登城后，以一部迅速攻占东城门楼；主力应即向纵深发展，攻占梁培璜指挥部”。“以上三纵队全部配属野炮四门，十二公分迫击炮六门，由城南门楼至城东南角中间东段攻城。”“以太岳集团一部，由东城门以北第一突击部（不含）之以北攻城。”“以吕梁集团十分区主力，位于临汾之河西岸积极活动，箝制城西之敌”。“另以独三旅部队于总攻开始前一日，秘密进至土门东南地区集结，如临汾敌人向西或西北突围时，应彻底歼灭之，不使溃敌窜入西山。”命令规定，“各部应加速进行攻城准备，争取于四月二十八日完成总攻击之一切准备工作。”^①4月20日，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庆贺你们歼灭阎敌六十六师及肃清临汾外围和攻占东关的胜利。你们坚持近迫作业，坑道爆破，并控制主力，决心长时间夺取临汾的计划是正确的，对北面可能来援之敌，仍望严加注意。”5月2日，徐向前发布《总攻临汾城的政治动员令》，指出，解放临汾已进入最后决定阶段，争取最后胜利的时刻到了，要求全体指战员“要热烈响应中央号召，以百倍紧张的精神，紧急动员起来，扫除一切倦怠、松懈、烦腻、迟疑的现象，坚决、勇猛、积极、顽强，坚持最后五分钟的精神，争取解放临汾的最后胜利。”^②

临汾作战从3月上旬开始至5月上旬，已经60余天，且消耗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174—175页。

② 《临汾攻坚战》第37页。

很大，以弹药消耗来说，“我子弹消耗近九十万发，杀伤敌人仅四千人，平均二百二十五发才打一个敌人；手榴弹消耗三十万发，平均七十五发才打一个敌人。”^① 而这时，傅作义等“为解救平绥线及应县、大同之危局，近日到太原与阎锡山商量，由阎出兵攻石家庄。”^② 中央军委要求徐向前从围攻临汾的部队中抽出2个至3个旅，兼程赶到太谷附近，策应晋察冀野战军消灭偷袭石家庄的阎锡山部队，保卫石家庄。在这种形势下，“莫如放弃临汾，回师东向，集中力量保卫石家庄”^③的议论，在有些领导干部中提了出来。朱德在赴濮阳视察华东野战军的途中得知上述议论，立即于5月11日晚写信给薄一波、滕代远：“我很顾虑你们怕伤亡，又打不开，不如不打。这样决心，那就前功尽弃，敌人守城更有信心，我们攻坚的信心又会失掉，部队也学不会攻坚。如此损失更大，又毫无代价。”他嘱薄、滕全力给徐向前一切支持，“撑他的腰。”朱德还告诉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④

5月12日，滕、薄致电朱德说：“攻临汾所需弹药等物资，全力供应，时间不受限制”，“滕与徐曾谈及不惜再以相同伤亡（时已伤亡8000余人）拿下临汾。只要拿下临汾，徐兵团对于攻坚攻城的难关就算渡过了。临汾城以历史上从没被攻克的迷信也可打破了。”朱德的信，对坚定指挥员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朱总司令的果决，信任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⑤

经过近1个月的以挖坑道与破坏坑道为中心的激烈斗争，至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177页。

② 中央军委1948年4月30日致徐向前等电。

③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页。

④ 《朱德传》第596页。

⑤ 徐向前：《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光荣——纪念朱德诞生100周年》，《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日。

5月16日，攻击部队终于把两条各长110米的破城坑道通过外壕底部，挖至城墙底下，分别装黑色炸药6200公斤和黄色炸药3000公斤。17日19时30分，总攻开始。坑道爆破首先成功，将城墙炸开一宽37米，一宽39米之两个大缺口。突击部队立即登上城垣向纵深及两侧发展。第24旅第71团沿城墙向南发展，很快控制了东城门楼。第23旅第68团沿城墙向北发展迅速占领城东北角，继向北城门发展。第13纵队第37旅随后从第8纵队突破口入城，直插纵深，进行分割包围。守敌除在内壕的部队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外，其他均纷纷缴械投降。至24时，城内战斗基本结束。梁培璜、姜福生等在城破时率一部并裹胁部分群众出西门，涉汾河仓皇逃窜。在渡河时，遭到埋伏部队第39旅及吕梁军区部队的堵击，大部被歼。梁培璜等于18日晨在马务村北麦地里被擒。姜福生带300余人狼狈窜入灵石。

临汾战役，历时72天，歼灭守敌1个师部、1个旅部、6个步兵团、1个炮兵营，非正规军8个团及军政机关等，毙伤5000人，俘梁培璜以下1.8162万人，共计2.3162万人，缴获各种炮554门、轻重机枪1224挺、步马枪1360枝、炮弹7517发、手榴弹6.5722万枚、各种子弹217万多发。临汾前线解放军伤亡1.5333万人，消耗各种炮弹9.5123万发、各种子弹164.5万余发，以及炸药5万多公斤。拔除了晋南地区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解放区连成一片，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西北解放军的作战，并为尔后消灭阎锡山部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徐向前在1948年8月16日的一次讲话里指出：“打临汾的经验要很好接受，那时假如说我们指导得好，打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不须要七十天时间，早一点打下呢？是可能的。是不是不须要伤亡那样多？也是可能的。”^①

在临汾攻坚战中，第8纵队第23旅战功卓著，经临汾前线指

^① 《华北军区关于临汾战役总结》。

挥部报中央军委批准，授予“临汾旅”的光荣称号。6月4日，第8纵队在洪洞召开庆功大会，徐向前将“光荣的临汾旅”锦旗授予该旅，并勉励其戒骄戒躁，奋勇前进，打到晋中去，解放太原城，活捉阎锡山。

5月19日，中共中央电贺临汾大捷：“庆祝你们解放临汾，全歼阎、胡守敌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敌军，解放全华北而奋斗！”2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致电徐向前并转临汾前线全体指战员：“我们热烈庆祝解放临汾的大捷。当此华北我党我军与全体人民在各解放军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声中，业已形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建立了全华北党政军的统一机构，在华北中央局统一领导之下，将更加集中力量，齐一步伐，努力建设，继续支援前线，为解放全华北而奋斗！”

临汾战役，系一典型的阵地攻坚战，双方均以堑壕对堑壕、地堡对地堡、坑道对坑道，进行剧烈复杂的搏斗。在炮火不足的条件下，攻城部队利用坑道爆破夺取坚固设防城市，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电指出：“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①徐向前深有体会地说：“虽然我们耗费了七十二天时间，但使我们取得了许多攻坚作战的经验。我们深深体会到，部队要由运动作战转到攻坚作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阶梯。这中间必须解决一些战术和技术上的问题。一般士兵除了三大技术之外，人人掌握土工作业与爆炸两大技术，步、炮、工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72—473页。

必须密切协同，而各级指挥人员，则必须学会使用火力、爆破、突击三者紧密结合的艺术和精细组织战斗的本领。只要抓住了这样中心的几个环节，那我们就可以达到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要求”。^①

第三节 华北军区成立和华北人民解放军加强进攻作战

一、华北统一领导机构的成立

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成立统一的华北领导机构，是革命战争发展的必然，也是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1948年2月16日，刘少奇致电彭真、聂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刘少奇认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的分界线，原系被敌人封锁分割。故我们亦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线来划分我们的行政与工作区域，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分界线两边虽同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却各自为政，军事指挥不统一，政策执行的先后与分量不同，财政负担轻重不一，货币不流通，贸易往来困难等弊害不胜枚举。“自正太、德石两路及石家庄、元氏之敌完全消灭以后，两区分界线的客观原因与必要，即已全不存在。”为此，他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即晋冀鲁豫中央局）与五台局（即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管辖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将来或者再与华东局商量合并渤海区，共辖七个区党委。此外，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学校、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

^① 《徐向前将军谈临汾战役》，《人民日报》，1948年5月29日。

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野战军仍分南北两个兵团，但指挥与建制统一，若干军分区亦实行合并统一。”^①两个解放区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既可以抽出大批高级与中级干部到黄河以南去工作，又可以发动几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

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区合并，这是一件大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极为重视。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电后即在2月20日复电：“我提议由中工委于寅（三月）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你两区合并的提议，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华北局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②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指出，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有利无害。时机亦已成熟，拖下去无必要。我们意见即以中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个中央局成为北方局，刘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时不合并。但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经过几个月，待党务及财经两方面工作在统一之后有了头绪，再将军事机构合并。待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华北人民民主政府，再将两区政府合并。”^③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将统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事，通报全党：“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

^① 刘少奇1948年2月16日致彭真、聂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电。

^② 毛泽东1948年2月20日致刘少奇电。

^③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91—292页。

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于1948年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25日，他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4月30日至5月7日，毛泽东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著名的城南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研究了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确定人选的问题。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此向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发出通知：“（一）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原隶属晋冀鲁豫解放区之豫皖苏解放区改隶于中原解放区。原属太岳区沿同蒲路自赵城、洪洞（均含）以南直至蒲州以及路西各县，均划归晋绥解放区管辖；原属晋绥之太原附近各县，则划归华北解放区管辖”。“（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林（峰）十七同志为委员，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滕代远、刘澜涛、黄敬八同志为常委。（三）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以徐向前兼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及政委，调王建安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未到职）；以杨得志为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四）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林（峰）为副主席，宋劭

文为秘书长。(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并以刘澜涛为党校校长;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萧克兼副校长,朱良才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磐石为华北日报社长;范文澜为华北大学校长。”^①

经过这次调整,华北解放区包括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西和以东的部分地区,同蒲铁路以东、平绥铁路以南和以北的部分地区,拥有4370多万人口,1.63亿亩耕地。

二、华北野战兵团的编成与军区建制的调整

5月20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华北军区成立后,进行了建制调整。其调整后的建制如下:北岳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赵振声、王平,辖第1、第2、第3、第5、第6军分区;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辖第8至第11军分区和石家庄警备司令部;太行军区,司令员鲁瑞林,政治委员赖若愚,辖第1、第2、第4、第5军分区;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王鹤峰,辖第1至第5军分区;冀南军区,司令员徐深吉,政治委员王从吾,辖第1至第5军分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赵健民,政治委员潘复生,辖第1至第9军分区及独立第1、第3旅。

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组成野战军第1兵团部,辖3个纵队: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副政治委员周仲英、政治部主任桂绍彬,辖第22旅旅长胡正平、政治委员王焕如,第23旅旅长黄定基、政治委员萧新春,第24旅旅长邓仕俊、政治委员王观潮;第13纵队,司令员曾绍山(未到职)、政治委员徐子荣、副司令员鲁瑞林兼、副政治委员袁子钦、参谋长白天、政治部主任郭林祥,辖第37旅旅长王诚汉、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152页。

政治委员张春森，第38旅旅长安中原、政治委员杨绍曾，第39旅旅长钟发生、副政治委员王贵得；第14纵队，司令员韦杰、政治委员甘渭汉、副司令员石志本、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思和、参谋长高厚良，辖第41旅旅长曹玉清、政治委员丁先国，第42旅旅长黄光霞、政治委员张希才。

晋察冀野战军指挥部组成第2兵团部，辖4个纵队：第2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韩伟、参谋长赵冠英、政治部主任刘国梁，辖第4旅旅长萧应棠、政治委员龙道权，第5旅旅长马龙、政治委员李水清，第6旅旅长盛治华、政治委员钟华农；第3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胡耀邦、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道邦、政治部主任陆平，辖第7旅旅长易耀彩、政治委员蔡顺礼，第8旅旅长宋玉林、政治委员黄文明，第9旅旅长陈仿仁、政治委员蔡长元；第4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副政治委员王宗槐、参谋长唐子安、政治部主任李昌，辖第10旅旅长邱蔚、政治委员傅崇碧，第11旅旅长李湘、政治委员陈宜贵，第12旅旅长曾保堂、政治委员李亚光；第6纵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副司令员萧新槐、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旷伏兆、副参谋长张挺，辖第16旅旅长廖鼎祥、政治委员李斌，第17旅旅长徐德操、政治委员李志远，第18旅旅长罗文坊、政治委员严庆堤。

第1纵队，仍属北岳军区建制，司令员唐延杰兼、政治委员王平兼、副司令员萧文玖兼、参谋长张开荆兼、政治部主任张连奎兼，辖第1旅旅长曾美、政治委员丁莱夫，第2旅旅长成少甫、政治委员钟炳昌，第3旅旅长马辉、政治委员黄连秋。第7纵队，仍属冀中军区建制，司令员孙毅兼、政治委员林铁兼、副司令员周彪兼、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漆远澍、参谋长李波兼，辖第19旅旅长杜文达、政治委员谢继友，第20旅旅长刘秉彦，政治委员马泽迎，第21旅旅长黎光、政治委员邓可运。

晋冀鲁豫军区炮兵旅组成华北军区炮兵第1旅，旅长赵章成；

晋察冀军区炮兵旅组成华北军区炮兵第2旅，旅长高存信、政治委员李呈祥。两旅均归华北军区直接领导，分别配属给第1、第2兵团指挥作战。

除第14纵队两个旅外，每个纵队3个旅，共计26个步兵旅及2个炮兵旅，共23.4846万人。加上军区直属机关、单位和地方军，合计为42.9101万人。

这次组织机构的调整，没有成立华北野战军领率机关。华北野战军第1、第2兵团和以后成立的第3兵团，先是受华北军区指挥，后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分别归第1野战军和中央军委指挥。

5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北岳军区第2军分区、太行军区第2军分区、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吕梁军区第8军分区各一部合并成立太原军区，司令员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归华北军区建制；因王建安改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决定周士第任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为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满足野战部队对兵员补充的要求，1948年3月在石家庄成立了华北补训兵团，下属9个补训旅。补训兵团成立后，先后举办了3期集训，共训练新战士8.3623万人、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和初级军官6.1947万名。

华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的建立，使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便于统一组织和调动华北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对加强华北解放区建设和提高华北军区部队的战斗力，加速华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都有重大意义。

三、转战热西、冀东

察南、绥东战役后，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仍摆在平绥铁路东段的察南地区，而在热河西部与冀东地区的守备兵力只有第13、第92军及一些地方部队。这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了冬季攻势的巨大胜利，把东北国民党军分割在长春、沈

阳、锦州等3个互不联系的地区内。蒋介石为扭转东北局势，答应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准备从关内抽调几个军增援东北，打通北宁路交通。为配合东北解放军作战，中央军委要求华北人民解放军向热河、冀东地区实行机动。1948年4月22日，中央军委致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你们有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主力3个纵队必须于5月初出动，5月15日以前到达热河境内。这3个纵队立即在桑干河以南休息至5月2日左右为止，“准备七天携粮并在政治上完成远出之一切准备工作，注意不要暴露企图，待命出动。”^①23日11时，杨、罗、杨、耿致电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表示对中央军委的指示“当即遵照执行。”但由于部队远出之前必须穿上棉衣、补充新兵、做好政治上组织上的必要准备，因此5月初出动时间来不及。他们建议5月15日前后出动。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杨得志等决定，以兵团主力第3、第4纵队和第2纵队第4旅，共7个旅，由杨、罗、耿率领，进入冀东、热西地区作战；以第1、第2（欠第4旅）、第6、第7纵队组成一个集团，由杨成武指挥，留在平汉铁路以西，牵制傅作义的部队，策应热西、冀东方面作战。

5月13日，杨、罗、耿率部由蔚县地区出发。16日黄昏，第4纵队由怀来、康庄间越过平绥路，攻克延庆县城，歼灭守敌800余人。第3纵队和第4旅进到大、小水峪、高崖口地区，拟于18日黄昏由沙河、南口间通过平绥路，进到昌平以北集结。这时发现第92军第142师2个团已进到上、下店，1个团进到阳坊、桥头地区，妨碍过路。第3纵队指挥员遂以1个旅5个团的兵力，于18日20时对上、下店展开攻击，至19日12时，将其全歼。这一仗，第3纵队等部亦损失3000余人。

傅作义发觉杨罗耿兵团企图越过平绥路挺进热西，急忙将部署在张家口、宣化地区的主力东调，妄图将其阻挡在平绥路以南、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57页。

以西地区。其时，第4纵队已越过平绥路，进抵平承路以西汤河口、宝山寺、琉璃庙地区；第3纵队和第4旅，适时改从沙城、土木间越过平绥路，于29日进抵怀柔以西黄花城、四海子等地区。傅作义的阻挡计划彻底落空。

关于进入热河的作战计划，5月21日9时30分，杨、罗、耿致电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和林彪、罗荣桓、程子华：部队全部集合后，择地休息，尔后“即以一个纵队结合冀东部队出击平古，四个旅进入热河，结合十一纵先打丰宁、隆化、滦平等，并准备打援。第一步打下丰宁、新滦平、截断平古路；第二步夹攻古北口，或围攻承德。”中央军委于当日24时复电，“二十一日九时电作战计划甚好，望与程子华商定配合。”26日15时，杨、罗、耿致电中央军委，“为着供应支前，特别作战计划的统一，提议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主力在热河境内作战时，归（程）子华同志统一指挥。”他们的提议立即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程子华当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前方第2指挥所（4月13日，由热前指改称，后改称第2兵团）司令员，指挥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部队，在冀热辽地区作战。

5月29日至6月2日，第2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和独立第4、第5师配合下，攻克丰宁、隆化、平泉、鞍匠屯等地，对承德形成包围。热河作战计划的第一步基本实现。

在解放隆化的战斗中，第11纵队班长董存瑞负伤后手托炸药包炸毁隆化桥上的暗堡，英勇献身。纵队党委追授他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命名生前所在班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为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与此同时，5月29日10时，杨、罗、耿就下一步行动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集中力量打承德。但从敌我各种条件对比看来，“把握不十分大，粮食恐亦为大问题。”二是以热河部队包围承德，第2兵团主力在冀东部队配合下，“对平古、平津、津榆各段作战。”他们认为就配合东北作战来说，似以第一方案为好；就歼敌来说，

则第二方案较好。究取何方案，请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在答复杨、罗、耿之前，于5月30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请他们对杨、罗、耿出冀东与攻承德两方案何者为宜提出意见，“我们觉得攻承德如无把握似以出冀东较为适宜。”^①31日，林、罗、刘致电中央军委，“如军委决定我东北主力向热河前进时，则杨罗耿及热河部队可在承德、古北口外，防止古北口之敌向承德增援，或接承德之敌南退，我们约须一月至四十天时间能到达承德附近，进攻承德。”如军委决定“我东北主力仍集中长春附近，围困长春、沈阳，加强攻城训练，然后再行攻歼或追歼长春之敌时，则我杨罗耿部队可到冀东广大地区寻敌歼灭，和彻底翻毁铁路，断敌交通，封锁粮食。”6月2日，中央军委决定，杨、罗、耿率部在古北口、密云之线以西或以东地区休息数日，待命或向冀东机动，或即在现地区机动，“总之不打承德，也不去山海关以北。”因为，一则，傅作义急调第92、第94军、暂编第3军和新编骑兵第4师、独立第95师，由平绥线向平承线增援；二则，东北野战军决定主力位于长春、沈阳之间休整，暂不南下北宁路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面敌情，杨、罗、耿决定以第3纵队在平谷地区牵制傅作义部主力，第4纵队和第4旅以隐蔽行动，突然进入冀东地区作战。6月12日晚至15日，连克榛子镇、丰润、任各庄等12处，歼灭第62军2个营又1个连、保安第27团及地方武装共5379人，逼近唐山，对北宁铁路构成了威胁。傅作义又急调第16、第92、第94军等部7个师的兵力，自平谷地区经三河、蓟县、玉田仓促东援；第62军第157师和独立第95师分由杨村、通县车运唐山，摆出与杨罗耿兵团决战的架势。当傅作义集中兵力东援北宁线的时候，平古线的守备兵力相对薄弱。杨、罗、耿抓住这一机会，以第3纵队及东北独立第4、第5师，出击平古线古北口至怀柔段，6月19日攻占小营、石匣，20至22日进攻

^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13页。

古北口。这一行动，虽然没有攻克军事重镇古北口，但又迫使东援的傅作义部西调，第3纵队遂转至遵化地区待机。

傅作义部主力西调后，第4纵队和第4旅协同东北第11纵队，从6月23日夜开始，对滦县至山海关段北宁铁路发起攻击，至25日攻克昌黎县城及石门街、景家庄、安山镇、后封台等据点，破坏了该段铁路，歼灭保安团队共4856人。

华北军区第2兵团主力转战冀东的情况与特点，该兵团前委于6月22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作了报告。报告说：“我此次在冀东作战，依照敌人多次对我之规律（即我集中打那里，他即集中跟上来），一反我过去的行动规律，即采取差不多改为平分兵力左右开弓的打法。以三纵先在西面吸敌，而以四纵率四旅突然出现其东面，并预定三纵于四纵打响后，适时收缩隐蔽平古东侧，待敌东援时又突然出现打平古北段。我四纵在丰润、野鸡坨线歼敌六千一百余人（内正规军两个半营），三纵于十八日晚打石匣、小营，只几个钟头歼敌一千八百人，现正打古北口。敌主力又向西增援，我四纵及十一纵共七个旅，预定二十四日晚打滦榆段，估计还可歼敌一部。这几仗打完，拟休整半月，待南面发起攻势，敌分散时，我再集中二个纵队打，求得歼敌一二个旅。”这是杨得志、罗瑞卿等通过同傅作义几次交手后，针对其“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而采取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采取适时分散与适时集中的作战方针，即以相对分散对敌人的集中，实行大踏步进退的机动作战；对分散守备之敌则集中一定兵力，采取远距离奔袭，大胆深入至敌占区域内歼灭敌人。毛泽东收到上述报告后，极为欣慰，于23日致电罗瑞卿等，指出“只要有分散之敌可打，分兵打小规模及中等规模的仗，较之集中兵力作战更为有利。”^①

此次转战热西、冀东，历时43天，收复隆化、平泉、延庆、

^①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651页。

丰宁、滦平、丰润、昌黎等7座县城（后4座被国民党军重占），毙伤国民党军7041人，俘1.7351万人，共计2.4392万人，缴获各种炮243门、轻重机枪586挺、其他枪1.0765万枝、各种炮弹1.2924万发、子弹214万余发、汽车84辆及其他物资的胜利。而两区参战部队仅伤8067人，亡2191人，失踪85人，共计1.0343万人，消耗各种炮弹1.9830万发、子弹85万余发。

四、再战保北

华北第2兵团主力转战热西、冀东，将傅作义部主力往返调动，迫其疲于奔命之际，杨成武指挥的第2、第6及第1、第7纵队等部，乘平汉铁路涿县至保定段防守兵力薄弱，再次发起了保北战役。这是解放战争以来，华北人民解放军对保定以北地区的第5次出击。其战役计划是：第1纵队并指挥北岳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炸毁琉璃河及永乐南北铁桥，破击长辛店至涿县铁路、公路，阻击傅作义部南援；第2纵队（欠第4旅）进攻涑水、徐水县城；第6纵队攻击定兴县城和北河店；第7纵队并指挥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部队攻取新城和高碑店、固城镇等地。北岳军区第1、第6军分区部队破击张家口以西平绥路，策应保北作战。

战役从7月15日开始。第2纵队主力逼近涑水时，守敌暂编第31师第2营弃城东逃被歼灭于北义安。15日23时，第6纵队围攻定兴。定兴是国民党军进攻冀西、冀中解放区一补给站，城墙高10米，外壕深5米，筑有碉堡及鹿砦、铁丝网等副防御设施。第6纵队第16旅向城北首先发起攻击，吸引了守敌的兵力与火力，第17旅乘机炸开南门与东门，主力从此两门进城，投入纵深战斗，直捣暂编第31师指挥所，俘师长陈治平。残敌退集西北角顽抗，至翌日12时30分，定兴解放，守敌被全歼。

在此期间，第1纵队在涿县、长辛店间大举破路。恰遇暂编第17师来援，当即转人阻援作战。第7纵队相继攻克新城、固城镇和高碑店。

第2纵队攻占涑水后，于7月18日以急行军逼近徐水。这是

该纵队自解放战争以来第4次攻击徐水。守敌为新编第2军暂编第31师第3团及保安部队，依托“王凤岗式”工事顽抗。所谓“王凤岗式”工事，就是在平原开阔地域修筑的隐蔽小型堡垒群。20日拂晓，第2纵队开始攻城，不到10分钟爆破北门成功，突击队登上城头，南门也相继爆破成功，各部队源源冲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全歼城内守敌2000余人。

华北人民解放军在保北地区的行动，使保定陷于孤立。傅作义急忙将暂编第3军、第94军（欠第43师）、独立第95师和新编骑兵第4师调至平汉铁路北段，7月18日进到涿县、良乡地区，保定暂编第32师亦向北推进到漕河。杨成武原拟诱歼从保定北上的暂编第32师，但这个师惧歼，又迅速从漕河缩回保定，加之阴雨连绵，影响部队行动，遂撤离战场，转入整训。

保北战役历时6天，由于保持了战役的突然性，打得迅速、彻底、干脆，仅以损失4115人，消耗各种炮弹7124发、各种子弹56万多发、手榴弹1.7172万枚之代价取得毙伤傅作义部队2288人、俘8485人，缴获各种炮弹7270发、各种子弹102万余发、手榴弹1.1517万枚^①的胜利。解放了涞水、定兴、徐水、新城4座县城及一些据点，孤立了保定，调动和牵制了傅作义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冀东作战。

7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聂荣臻、薄一波、转杨成武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杨成武部在现地区之作战应于二十五日以前结束，全军主力撤至平保线以西山地隐蔽休整，一部接近平保线休整。”“杨成武立即开始组织西进兵团，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杨罗耿部本月底结束在现地之作战，即行休整至八月十五日止，准备于八月二十日左右直接接受林罗刘的作战任务。”^②这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将要进行的北宁

^① 《华北军区关于保北战役总结》。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44页。

路作战，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赋予华北人民解放军新的战略任务。为此保北地区的杨成武部和冀东地区的杨罗耿部，先后于7月25日和7月底结束作战进入指定地区休整。

五、横扫晋中，威逼太原

在临汾战役前和期间，徐向前已开始考虑临汾战役后进入晋中地区作战的问题。

1948年2月27日，徐向前致电滕代远、薄一波等和中央工委，“我们攻克临汾后第二战役计划拟北上攻歼介休、平遥、孝义、汾阳等地之敌”。3月6日，又在致中央军委并中央工委等的电报里提出，攻克临汾后，“再向晋中发展”。3月22日，徐向前写信给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提出“在打下临汾后，第二步行动计划，拟即向晋中作战，打下介、平、汾、孝，并准备歼灭阎之援敌。”徐向前认为，集中第8、第13纵队及太岳、晋绥军区部队，“兵力约在六万上下，打阎匪与开展晋中局面，当较有把握。”^①

4月30日，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并告滕、薄，“你部无论临汾攻克与否，第二步全力对阎作战，各个歼灭阎军，并保卫石家庄”。因为此时，阎锡山正派兵偷袭石家庄。徐向前在同一天报告中央军委等，“攻下临汾北出晋中时”，兵团东进，协同第6纵队歼灭阎锡山偷袭石家庄的部队。临汾战役结束时，阎锡山的偷袭行动已被挫败。徐向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兵团主力转入休整，准备进入晋中地区作战。

晋中盆地，纵贯山西中部，自北向南有大同、忻县、太原、临汾、运城等河谷盆地。太原盆地，北起阳曲，南达灵石，北高南低，为云中山、系舟山、吕梁山、太岳山所环抱。汾河、文峪河等流贯其中，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盛产小麦、谷子、玉米、高粱及棉花、烟草、花生、大豆等，是山西省的粮仓，也是阎锡山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166页。

的兵员、物资供应地和赖以生存的基地。因此，阎锡山极其重视对晋中地区的防守。在临汾被围攻时，他感到临汾是守不住的，解放军攻占临汾后必向晋中发展进攻。为保卫晋中、固守太原，除将 13 万部队集中于太原和晋中外，阎锡山感到需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就是改变以往的一套战术。1948 年 3 月 1 日，阎锡山发布《寅东对各干部唯一活路的指示》。他总结了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屡吃败仗的教训，看到解放军之所以打胜仗就在于解放军的指挥员善于打运动战，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以保存有生力量。他说：解放军“不要城可是想出了个不要城的办法，就是会跑，使我们打他，百打百空。”共产党“能把孙子的‘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从来未实现的兵法，实现在他的军队中。”“我们有飞机，有大炮，占了这飞机大炮的光，学下个守，受了飞机大炮的害，没有学下个跑。”阎锡山是一贯重视筑垒守御的。他曾把自己的守城经验告诉前来取经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要傅作义在唐山至塘沽、天津一线构筑坚固碉堡 1 万至 2 万个，认为这可以阻止东北人民解放军入关。当晋中、太原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却告诉他的部下，出路就是要学会跑，“一跑万有，一跑万胜。”“我们今天是万事皆备，只欠东风。什么是东风？就是只要我们军政能迅速配合起来跑，我们即可打通临汾、打通大同，恢复我们寿阳、平定。”^①

根据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阎锡山决定忻县、太原、榆次、太谷、汾阳、平遥为死守城，任何情况下不能撤退，其余各县城为固守城，必要时可以放弃。以主力组成“闪击兵团”，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固守点线，以攻为守。兵力区分与部署是：第 43 军暂编第 39 师和第 19 军第 68 师驻守太原以北的忻县和黄寨。第 34 军之第 73、暂编第 44、暂编第 45 师位于平遥、介休、灵石地区；第 19 军暂编第 37、暂编第 40 师，第 33 军第 71 师、暂编第 46 师及

^① 《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20—422 页。

暂编第 9、第 10 总队，位于榆次、太谷、祁县一线；第 43 军率第 70 师及“亲训师”（第 61 军第 72 师）位于汾阳、孝义地区；第 61 军率第 69 师位于文水、交城地区；工兵师位于晋源、清源等地；第 43 军暂编第 49 师及暂编第 8 总队及各特种部队守备太原。集中第 34、第 43、第 61 军共 13 个团组成所谓“闪击兵团”，进行机动作战。以高倬之为“闪击兵团”司令。

阎锡山之兵力计有 5 个军 15 个师、3 个总队、22 个保安团、21 个保警大队，总计约 13 万人，民卫军 3 万余人。另有飞机 37 架常驻太原，供阎锡山使用。阎锡山面临的一个严重困难是缺粮，首先是军粮问题。13 万军队，以每人每天平均斤半粮食计，每月即需耗粮 292.5 万公斤。阎锡山认为解决缺粮的有效办法就是抢。这时正值麦子成熟季节。于是，阎锡山各部队挂出了“军食司令部”的牌子。各保安团、队在正规军一部掩护下，到其控制区，执行“快割、快打、快交、快运”的抢麦计划。晋中地区人民望着辛勤劳动的黄灿灿麦穗说：“麦子麦子不要黄，黄了不够交公粮。”表露出对阎锡山的极端仇视。

为保卫晋中麦收和为夺取太原创造条件，徐向前于 1948 年 5 月 30 日致电中央军委和华北局：“此次晋中作战，虽以保卫麦收为目的，但应充分估计阎锡山处此失地失人的情况下，势难坐以待毙，必纠集其主力与我决战，以图解救其粮缺兵缺之危难。我亦必须攻下若干据点，楔入其纵深地带分割包围，求得歼其主力一部，争取在敌主力与我决战时，予以歼灭性的打击，方能达到确保麦收和创造尔后攻取太原之有利条件。”徐向前认为，为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统一行动。为此，他提出以下四项建议：1. 晋中军区应早日组成^①；2. 周士第来 1 兵团工作；3. 晋绥、北岳、太行三区，应集中最大兵力参战；4. 党

^① 晋中军区，1948 年 8 月 15 日成立，罗贵波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政军民均需作充分政治动员，适当配备较强干部到新区工作。^① 6月2日，聂荣臻和薄一波等致电徐向前和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等并报中央军委：华北局决定组织晋中战役，“由向前、士第统一指挥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太岳军区主力、太行军区二分区、北岳军区二分区全部地方军，晋绥部队（能抽调多少兵力，由李（井泉）陈（漫远）电告）。决定将太行军区二分区与北岳军区二分区部队，统组成一个集团，由萧文玖指挥。晋绥所有参加战役的部队，亦组成一个集团，并请指定专人指挥。”“各参战部队，均须严格进行政策（特别是新区政策）及纪律（群众纪律、战场纪律）教育。”要求徐向前、周士第拟定战役具体部署及开始时间。^②

6月4日，徐向前就晋中战役的具体部署报告中央军委：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割裂阎匪防御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某些据点，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麦收。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而于野战中求得消灭其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匪实力。”任务区分如下：

1. 晋绥军区第12旅和警备第2旅于6月16日进至太原以北，切断忻县至太原间铁路，并向太原逼近，保卫忻口至太原间两侧地区麦收。

2. 吕梁军区独立第3、第7、第10旅及第1、第2、第6、第8、第10军分区部队在彭绍辉、罗贵波指挥下，于6月19日进至汾阳、孝义、文水、交城地区，切断太原至汾阳公路，扫除外围据点，压缩阎军于少数孤立据点，确实控制汾阳、孝义、文水、交城及清源之平原地区，保卫麦收，并调动阎军主力西进，以便野战军各纵队于太谷至灵石间同蒲铁路东侧展开。

3. 太岳军区部队，于6月16日逼近介休、灵石地区，扫除外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189—190页。

^② 《聂荣臻军事文选》第285页。

围据点，相机攻取灵石与切断灵石、平遥间铁路，保卫麦收，并准备机动，歼灭阎军主力。

4. 北岳军区第2军分区和太行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共6个团，在萧文玖指挥下于6月19日逼近榆次南北地区，切断榆次至太原、榆次至太谷间铁路和公路，阻止太原阎军向祁县、太谷增援，并派部队插入徐沟、太原、榆次三角地区保卫麦收。

5. 第13纵队于6月19日以一部扫除子洪地区据点，尔后攻占东观镇，切断太谷至祁县间铁路，保卫麦收；主力集结于东观镇地区，待机歼灭阎军主力。

6. 第8纵队于6月19日以一部扫除平遥以东、以南外围据点，切断平遥、祁县间铁路，保卫麦收；主力集结于平遥以东地区，待机歼灭阎军主力。

以上参加晋中战役的部队，共47个团，6万余人。

战役发起时，徐向前派周士第去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请示晋中战役问题。据周士第后来回忆说：“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在西柏坡晋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晋中战役给了极重要的指示，说：保卫麦收这个口号很好，可以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晋中人民要收麦子，阎锡山要抢麦子，这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敌人要抢粮就要出动，你们就有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灵石解放了，阎锡山还有14座县城，只要再打掉一两个，敌人就会慌乱了。此次战役是保卫麦收的战役，但是战役的重心还是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消灭了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毛主席又说，要达到消灭敌人，保卫麦收的目的，要经过艰苦的战斗才行。不但要善于打运动战，而且要善于打阵地战；不但要会攻，而且要会防。”^①周士第返回前线传达后，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受到莫大鼓舞。

6月初，华北第1兵团等部按照既定部署分别向晋中地区逼

^① 周士第：《晋中平原的第一个歼灭战》。

近。11日，吕梁军区部队首先进入孝义、汾阳地区活动，主力独立第3、第7旅攻占高阳，进逼孝义。12日，太岳军区部队攻占灵石。阎锡山错误地判断徐向前的主力已他调，仅留下2个地方部队掩护麦收。于是决定以其“闪击兵团”由平遥、介休、汾阳等地出发，以所谓“藏伏优势”和“三个老虎爪子”的战术，扑向高阳，企图一口吞掉吕梁军区部队。双方展开了激战，形成对峙状态。阎锡山为迅速结束战斗，又将其“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5个连调来参战。

这时，隐蔽集结在平遥、介休东南山区的第8、第13纵队，突然向祁县、平遥、介休出击，打乱了阎锡山的部署，迫使“闪击兵团”仓促回援同蒲路。第34军回援平遥，“亲训师”、“亲训炮兵团”由介休北上与第19军会合，企图与徐向前兵团决战。徐向前原决心集中第8纵队和太岳、吕梁军区主力在运动中，先歼灭第34军于平遥、介休地区。事后方知情报有误，第34军系集结汾阳后开平遥，故未打成。但同时，“亲训师”等部正由介休开平遥途中，恰与在平遥西南张兰镇以北的大甫、曹村一线的第8纵队遭遇。第8纵队先头第24旅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展开，组织所有轻重火器，突然猛烈地开火，接着发起冲锋，迅速将“亲训师”队形打乱。后续部队第23、第22旅一部，立即投入战斗。太岳军区部队则猛打该师的后尾。“亲训师”遭此突然打击，乱成一团，被压缩至汾河滩上。经3小时激战，大部被歼，少数窜回平遥。徐向前关于“晋中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总结”中说：“此役敌死伤极大，沿汾河东岸五里宽地区，每公尺内均有一、二尸体，敌死亡将近三千人，牲口死伤占百分之八十（因敌密集队形运动，被我压于汾河岸开阔地，遭我火力急袭）。”^①徐向前兵团首战告捷。据统计，共歼灭阎锡山部5400余人，缴获山炮24门、重迫击炮12门。阎锡山苦心经营的“亲训师”就这样覆灭了。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200页。

6月22日晚，徐向前指挥部从报话机得悉阎锡山的第19军军部率第40师及太原“民卫军”由平遥北开祁县，当即决定第13纵队从东面，吕梁军区部队从西面，以伏击手段将其歼灭在祁县、平遥之间。23日15时，当第19军等部进至洪善西北之北营村附近时，伏击部队立即从东、西两面开火，除先头1个团逃出伏击圈外，余均被包围于北营村内。当夜，第19军军长温怀光及第40师师长曹国忠率少数人员潜回平遥，其余被歼灭。之所以未全部歼灭，徐向前说，那是因为“此时汾河水涨，吕梁部队未能及时东渡堵击，”“致未能全歼，至为可惜。”^①此仗，共歼灭阎锡山部1个军部、1个师部、2个团共3000余人。同时在东山湖、郑家庄击退由祁县出援的第33军3个团。

至此，从6月11日开始至28日结束的第一阶段作战。徐向前兵团共歼灭阎锡山部1.7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百余门，并为下一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徐向前指出获胜的主要原因：一是主动地调动了敌人，诱使阎锡山的主力全部出动，从而创造了野战条件；二是部队行动秘密突然；三是火力高度集中，如北营村歼第40师，炮兵先轰击2个小时，发射八二迫击炮弹1500发。^②

阎锡山眼看“亲训师”等部被歼，十分恼怒，决心同徐向前在晋中决一死战。急令其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和副司令原全福（日本人，原名元泉馨，为侵华日军独立步兵第14旅团少将旅团长）率领以原日军官兵为骨干组成的暂编第10总队，于6月23日由榆次进到太谷，向祁县推进。25日，第33军与第34军由祁县、平遥对进，集结洪善镇地区。

6月26日，徐向前致电中央军委，决心集中主力在祁县、平遥以东地区与敌决战，并置重点于消灭第34军。但因准备不够和个别指挥员对敌情判断有误，处理失当。加之，第34军已与第33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200页。

② 同上，第201页。

军靠拢，因此分割围歼第 34 军的计划未能实现。29 日，徐向前报告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决心改变计划，“调动敌人于太谷、祁县间歼灭之。”^① 因为太谷、榆次、祁县、徐沟地区战场较宽，麦子丰收，仅有阎军暂编第 8、第 9 总队，和第 37 师 2 个团，兵力薄弱。其部署是：以太岳、北岳、太行等军区部队破袭榆次、太谷之铁路，切断阎军北撤退路，迫其由榆次、徐沟之间北撤，投入我预设之包围圈；主力第 8、第 13 纵队进至太谷、祁县间待机。为策应主力在太原以南地区作战，另以晋绥军区孙超群集团（7 个团）切断黄寨至太原段铁路，威胁太原，箝制当面之阎军 2 个师，不使南援。6 月 30 日 7 时，中央军委批示，“部署甚好。”

赵承绶发现徐向前兵团主力北移后，惧怕自己的后路被切断，乃急于 6 月 30 日由祁县地区北移太谷、东观镇，并继续沿铁路北撤，但在太谷东北的董村遭到太岳军区部队的顽强阻击。第 33 军、第 10 总队，并附山炮 20 余门，装甲车 3 列，全力猛攻，激战三昼夜，未能突破。赵承绶被迫放弃通过铁路北撤的计划，改由榆次、徐沟间北撤。太岳军区部队董村阻击战，为主力围歼赵承绶部争取了时间。

当把赵承绶集团赶入预设的包围圈后，7 月 6 日，徐向前下达聚歼该集团的作战命令：以第 13 纵队全部并指挥第 8 纵队第 22 旅，跟踪追击由东观镇向徐沟撤退的第 34 军，插入徐沟、尧城镇以东，子牙河以南地区，切断其由徐沟北撤之道路；以太岳、北岳军区部队自东阳地区进至车辋村东西一线，切断其向榆次的退路；吕梁军区主力独立第 3、第 7 旅自汾阳以西东进永康镇地区阻击北面来援之阎军；以第 8 纵队于攻克祁县后兼程北上，由南面封闭合围圈，协同友邻各部队歼灭赵承绶集团。7 日晚，徐向前兵团各部均到达指定位置，将赵承绶集团包围于太谷以北的大常镇、小常村、西范村、南庄等东西 10 公里，南北不足 5 公里的狭小地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 203 页。

区内。随即展开了晋中平原上的最大一个歼灭战。其战况，徐向前作了如下叙述：“八、九两日，敌集中炮火掩护步兵，向我军车辋村猛攻，企图突围北窜，被我阻击，未逞。十日晨，我即集中主力向敌三十四军发动总攻。十三纵队由西北攻大常镇敌三十四军之七十三师及暂编四十四师二团，八纵队同时由西南攻击南庄敌暂编第十总队及三十四军之暂编四十四师一、三两团。敌利用坚固房屋（晋中民房较坚固）顽强抵抗，我以炸药逐屋爆破，南庄、大常房屋尽毁，敌我伤亡均重。十总队伤亡过半，撤至西苑。敌第三十四军十一日晚为我全歼。”^①接着于16日攻克西苑村、小常村，全歼敌野战军总部及第33军等，活捉赵承绶和第33军军长沈瑞等人。

赵承绶集团被围歼之际，阎锡山又集中暂编第49师、第68师及暂编第40师残部，组成所谓“南援兵团”，进至榆次西南之怀仁镇、王都地区，企图接应赵承绶突围。徐向前当即以第13纵队一部，兼程北上，配合北岳、太行部队插到萧河以北地区，截断其退路，主力则于歼灭赵承绶后北上再打“南援兵团”。“南援兵团”获悉赵承绶被歼，解放军又向其扑来，遂仓皇后撤。

赵承绶集团被歼后，阎锡山军纷纷向太原逃窜，徐向前兵团乘胜追击，至21日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至此，晋中战役胜利结束，先后占领灵石、平遥、介休、汾阳、孝义、祁县、文水、交城、太谷、榆次、晋源、清源、徐沟、忻县等县城。

晋中战役，从6月11日至7月21日历时月余，以损失1.7065万人，消耗山炮弹3000发、八二迫击炮10万发之代价，取得了歼灭阎锡山1个兵团部、4个军部和另1个军部之一部，共8个整师、2个总队，以及1个师5个整团、14个整营、4个装甲车队等正规军7.4670万人和保警队、民卫军等2.6万余人共10万多人（其中俘将官16名），缴获各种炮4341门、轻重机枪3469挺、步

^①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204页。

马枪 2.9904 万枝、各种炮弹 13.5942 万发、子弹 360 多万发、手榴弹 27 万余枚，击落飞机 3 架的重大胜利。解放县城 14 座和许多村镇。除太原、大同两座孤城外，山西省全境均获得了解放。中共中央指出，“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①

晋中战役获得如此辉煌战绩的原因是：“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②从战役组织指挥方面看，其主要经验是：利用敌人的弱点，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先小后大，先弱后强，各个歼灭；参战部队连续作战，勇猛顽强，既打运动战，又打阵地战。正如徐向前指出的，“战役指导上没有犯严重错误，战役开始即估计到敌人发现我们时会集中其主力一部南下找我作战”，故作了相应的部署；“正确的估计敌人可能集中的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四至六个师”；“作战重点是放在北面不是在南面，放在东面不是在西面，着重拦头断绝敌人逃回太原道路”；“发现敌人向北逃窜，不顾疲劳伤亡消耗，大胆迂回包围堵击追击敌人，各纵都完成了自己任务”；“指挥员要有机断专行，打歼灭战对敌要狠，对自己在歼灭敌人行动上也要狠，不怕伤亡消耗疲劳，扩张战果”。^③

在徐向前等指挥下，经过运城、临汾、晋中三个较大战役的锻炼，由地方部队升级编成的华北第 1 兵团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主力兵团。

① 1948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贺电。

② 同上。

③ 《徐向前军事文选》第 207 页。

第八章 南方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一节 闽粤赣边、粤赣湘边和 粤中游击战争的开展

自从1946年11月中共广东区党委作出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后，游击战争之火在广东全省及与之相邻的广西、湖南、江西、福建边境地区重新燃起，各地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中共中央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华南游击战争情况，为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华南地区的对敌斗争，加强对华南人民武装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简称“香港分局”）。1947年5月6日，香港分局正式成立，方方任书记、林平任副书记。5月7日，香港分局将开展华南地区游击战争的通盘部署报告中共中央：

1. 将粤南、桂南划分粤桂边区工委，下辖4个地委，以勾漏山、十万大山为基地，开展游击战，并恢复过去红七军左右江据点，与黔南游击战配合，将来成立粤桂滇边区党委。
2. 准备成立粤桂湘边工委，辖西江以北，粤汉路以西，桂林以东，将来发展至湖南零陵、桂阳一带。
3. 准备在粤汉路以东，东江以北，至赣南、湘南，成立粤湘赣边区，以九连山一直至五岭为据点，展开游击战。
4. 珠江三角洲、中区、潮汕一带平原，现有武装分散各地，坚持发动群众，进行隐蔽斗争。
5. 闽粤赣边区以一部兵力分散各地保卫老区，发展新区，同时以一部兵力配合各地群众武装斗争，威胁潮汕、梅县，恢复过去边区基点。
6. 海南岛仍作为一个战略单位。

5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李维汉并转香港分局，同意香港分局的部署。指出，原在广东之蒋军第63师已开至山东，现仍留广东2个旅，系属第69师被歼后新补者，无战斗力可说，如前线情况紧张，将来仍有调出可能。故国民党只能凭扩充保安团队镇压群众斗争与游击运动，因此，“目前闽粤桂及赣南、湘南各地，实使我组织与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运动。从布置分散的武装据点到建立成块的游击根据地，在你们那里（琼崖外）还需要经过一些过程。不要急于打大仗，也不要过早集中武装建立根据地，而应将武装力量散布得愈广，发动群众愈多，先从多多消灭乡村地主联保武装做起，便愈能在广大乡村中站稳，为根据地奠定基础，而不致引起保安团队过早集中地调来清乡。”“你们于闽粤赣边区党委外，建立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三个工委地区，领导与发展地区的游击战争是适当的”。同时还指出，“现在从北方人民解放军中抽兵南下，既不妥也不可能，因现在在解放区内继续消灭蒋军，直到他无力进行全面防御，这于将来的全面反攻是最有利的。”中共中央要求“华南除琼崖外，应靠本身力量于本年底建立起三四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组织起多支“成为中坚的游击队伍，准备迎接与配合明年北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反攻。”^①

华南游击战争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好形势鼓舞下，蓬勃发展，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军的大后方，从战略上配合了北方人民解放军的大举进攻。

一、游击战争的展开

（一）闽粤赣边区游击战争的展开

1947年6月18日至25日，闽粤赣边区工委在广东省大埔县隘头村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指

^① 《粤赣湘边区革命史资料》第99页。《周恩来年谱》第735页。

示，确定边区的总任务是：建立闽粤赣边区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以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为口号，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巩固老根据地，发展新根据地，推动斗争不断向前发展。会议决定，成立“闽粤赣边区人民解放军总队”，刘永生任总队长，魏金水任政治委员，朱曼平任副政治委员。这时，游击队有粤东支队、闽西支队和闽南支队。

10月22日，适逢农历重阳节，刘永生、朱曼平指挥粤东支队在梅（县）埔（大埔）丰（顺）边游击队和民兵100多人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对大麻镇突然发起攻击。大麻镇是大埔县一个较大的圩镇，位于三河坝下游6公里的韩江西岸，是国民党政府区署所在地，驻有1个自卫中队和警察所。经激烈战斗，一举摧毁区公所、警察所和小留乡公所，缴获长短枪70多枝、子弹300多发。守军一部被歼，一部逃跑。

10月27日，国民党广东省第6行政区保安司令部调集大埔、梅县6个保警中队，从大麻、银江、丙村和白宫，分四路对转入三乡小都村的粤东支队进行追踪围歼。29日晨，粤东支队将进入小都村中和学校的梅县保警第1中队包围歼灭，计击毙12人，俘虏50多人，缴枪60多枝、子弹2000多发。大麻、三乡等作战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而且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战后有3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

11月中旬，粤东支队经休整后，兵分三路，向梅（县）兴（宁）丰（顺）华（五华）边、梅（县）兴（宁）平（远）蕉（岭）边和饶（平）和（平和）埔（大埔）丰（顺）边展开。至1948年初，在各地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共摧毁国民党区乡公所30多个，歼灭2个县自卫中队和30多个区乡自卫队，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400多枝、子弹2万多发。开辟了梅（县）埔（大埔）丰（顺）、梅（县）兴（宁）丰（顺）华（五华）、梅（县）兴（宁）平（远）蕉（岭）、饶（平）和（平和）埔（大埔）丰（顺）、永

(定)和(平和)埔(大埔)和杭(上杭)武(平)蕉(岭)梅(县)6块边区游击根据地。粤东支队也扩编为4个中队和1个教导队,共300多人。

闽西、闽南支队成立时,虽只有70多人,但他们大都是红军或抗日游击队保留下来的武装骨干。从1947年8月下旬开始,闽西支队连续摧毁了永定县的堂堡、湖雷乡保自卫队,缴枪20多枝。接着挺进龙岩县的大小池,歼自卫队12人,缴枪10枝。10月16日,袭击陈东坑,击毙号称永定“反共老虎”的苏煌辉等7名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尔后,又摧毁了许家山、李家畲、湖雷、黄畲等乡公所。

闽南地区由于与台湾隔海相望,又有漳(州)厦(门)重镇所在,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国民党当局十分重视对该地区的统治。

1947年9月,闽南支队袭击诏安梅州、下葛乡公所,缴获20多枝长短枪,解决了部队的部分给养。12月,福建保安第2总队纠集云霄、诏安等县的保警中队近千人,“进剿”乌山根据地。由于敌强我弱,为避敌锋芒,闽南支队主力转向诏安、饶平交界处的八仙山地区开展外线作战。“进剿”乌山根据地的保安团队扑空后,即在上板、公田、进水、金溪和水晶坪等地“驻剿”。1948年1月8日,保安第2团第2大队5中队从水晶坪向公田撤退,当进入坪坑地区时,闽南支队立即发起攻击,仅经10分钟战斗,共毙俘副大队长以下36人,缴获轻机枪3挺、长短枪26枝、子弹5000多发。游击队无一伤亡。

1947年6月,潮汕人民抗征队成立后,针对潮汕地区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决定建立以揭(阳)丰(顺)华(五华)边的大北山为战略据点,以大南山、凤凰山为支点,以南阳山、五房山为转动点的游击根据地。7月3日,潮汕人民抗征队镇压了八乡山反动乡长后,又以突袭手段摧毁了地扼潮梅交通枢纽的丰顺重镇汤坑,歼灭1个保警分队30多人,缴枪50

多枝。打开汤坑谷仓，向群众分粮济贫 200 多担。8 月 21 日，国民党第 5 区专员兼保安司令郑绍玄，调集潮安、普宁、丰顺、五华等县共 9 个保警中队，分四路向八乡山中心地区戏仔潭实施“围剿”。潮汕人民抗征队避实击虚，跳出包围圈，冒雨急行军 50 多公里，奔袭了南阳山要冲普宁县鲤湖镇，歼保警队 60 多人，缴枪 50 多枝，迫使进攻八乡山的敌人回撤。经过这一阶段的积极作战，潮汕人民抗征队获得了很快发展，由 70 多人壮大到 200 多人；由 1 个中队，扩编为 2 个大队。

10 月底，抗征队决定向大北山、大南山发展。大南山地处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边界，纵横数十公里。31 日，第 3 大队进入大南山后，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摧毁了林樟、锡坑 2 个乡公所，歼自卫队 30 多人，缴枪 30 多枝，首先恢复了大南山西北部地区的工作。11 月初，摧毁了南阳、天青湖、高埔、葵坑等乡公所，并成立了梅林、葵坑、天青湖 3 个流动民主乡政府，打开了南阳山地区的斗争局面。与此同时，第 1 大队袭击了揭丰公路上的新亨镇公所和警察所。中旬，粉碎了揭阳保警中队和保安队 170 多人的进攻，接着以突袭手段攻取揭阳重镇河婆（今揭西县城）。在 1 个多月的作战中，歼灭乡保武装 64 人，缴获长短枪 60 多枝。

从 1948 年 1 月下旬开始，到 3 月中旬，潮汕人民抗征队第 1 和第 3 大队，先后对大南山东面和南面的惠来县、潮阳县，大北山西面的五华、揭阳进行出击，摧毁乡公所、警察所和自卫队 10 余个，毙俘敌自卫队近 200 人，缴获轻机枪 1 挺、长短枪 220 多枝，破仓分粮 6000 多担。

与大北山、大南山根据地的斗争相呼应，在潮安、饶平、大埔、丰顺 4 县边缘开展武装斗争的潮澄饶丰人民抗征队独立中队，于 1948 年 1 月 14 日成立后，在近 3 个月作战中，共摧毁 5 个乡公所、3 个自卫队、2 个警察所，毙俘自卫队 1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70 多枝，在凤凰山地区开辟和建立起百余个乡村的游击根据地。

闽粤赣边地区的游击队，经过半年的武装斗争，共摧毁国民党区乡基层政权 99 个，歼灭保警武装 2100 多人，缴获机枪 22 挺、长短枪 2900 多枝，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闽粤赣边地区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多块游击根据地。

（二）粤赣湘边游击战争的开展

粤赣湘边区，包括珠江三角洲、江北、江南、九连、潯江和五岭等 6 个地区共 50 余县。到 1947 年 5 月，粤赣湘边区游击队已有 2160 人，其中九连 450 人，江北 200 人，江南 420 人，潯江 700 人，五岭 330 人，珠江 60 人^①。从这年 6 月开始，游击队广泛出击。

江北地区，位于广州东北方的三角地带，包括增城、龙门、博罗、花县、从化、佛冈和番禺北部、清远东部等地区。国民党驻扎正规军与地方军 3000 余人。在这里活动的游击队计有：“博（罗）龙（门）河（源）人民解放军”、“清（远）从（化）佛（冈）人民义勇大队”，“增（城）龙（门）从（化）博（罗）人民自卫队”、“龙（门）从（化）人民保乡队”和“东江人民解放军独立第 10 大队”等。他们积极开展活动，袭击国民党区、乡公所、自卫队、县警大队。到 1947 年底，共歼灭国民党县警和乡保武装 300 多人，缴获轻机枪 7 挺、长短枪 600 多枝，游击队发展到 1000 多人，拥有机枪 20 多挺、长短枪 1000 多枝，活动区扩大到北至新（丰）河（源）边境，南到广九铁路沿线和广州近郊，控制了 28 个农村墟镇和 3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江南地区，包括惠阳、惠东、东莞、宝安、紫金、海丰、陆丰和深圳、惠州等县市，由于周连潮汕、兴梅，毗邻广州和港澳，广深铁路和广汕公路纵横境内，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国民党当局极为重视对该区域的控制，驻有正规军 1 个旅，连同地方保安队、

^① 中共香港分局：《关于广东各根据地部队人数及武器统计》，1947 年 5 月中旬。

县警队等共 5000 余人。从 1947 年 3 月到 12 月，国民党对该地区发动了 13 次“全面清剿”。在反击国民党军的“清剿”作战中，江南游击队共歼敌百余人，缴获长短枪 116 枝。部队在积极打击敌人的同时，还组织了大批的武工队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和发动群众除奸肃特，打击反动势力。游击队在斗争中得到迅速发展，由 1947 年初的 30 人，发展到 2500 人。

九连地区，横跨粤赣两省，包括广东连平、和平、河源、紫金、五华、龙川及江西的定南、龙南、虔南、寻邬等 10 县。游击队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广泛袭击国民党乡公所和地方反动势力，收缴武器，扩大游击武装。1947 年 7 月至 10 月，国民党第 6“清剿”区纠集各县反动武装 3000 多人，对九连地区游击队发动两次大规模进攻。游击队灵活运用地雷战、伏击战先后歼灭进犯军近百人，迫使其不得不收缩兵力，撤回老隆、忠信、蓝口等据点。到 1947 年底，九连人民武装已经发展到 28 个连和 13 个武工队，游击活动地区扩展到 52 个乡镇，纵横 150 余公里。

湓江地区，东起粤赣两省交界的双峰山，西临大北山和粤汉铁路。活动于该地区的粤赣先遣支队（辖 6 支游击队），在武工队的配合，广泛出击，先后攻打了岩庄、江尾、水头、沙溪等乡镇公所和警察所，歼灭保安团队 110 多人，缴获机枪 3 挺、长短枪 200 多支。还策动了翁源、新江、仙源、陈砾、蓝李、英德等地区的国民党自卫队、联防队起义或投诚。到 1947 年底，湓江地区人民武装先后组建了 21 个游击大队，57 个武工队。

五岭地区，1947 年 6 月，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第 6 支队一部进入赣南地区，攻打了信丰县下坪乡公所，另一部奇袭了南雄大塘乡公所，两次作战共歼灭国民党乡保武装 20 多人，缴获机枪 1 挺、长短枪 41 枝。9 月 26 日，解放总队总队长黄业、政治委员张华等率第 1、第 6 支队，攻打了南雄县新田乡据点，俘保安队近 200 人，缴获轻机枪 2 挺、长短枪 60 多枝。接着，又偷袭了白云乡，歼灭保安队 40 多人，缴获轻机枪 1 挺、长短枪 60 多枝。

在此期间，解放总队第1支队在“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北上先遣队”的配合下，在向湘南进军取得胜利之后，又兵分数路，向汝城、井岗山、资兴和湘赣边区发展，到1947年底，“先遣队”发展到200多人，民兵发展到300多人，初步打开了湘南、赣南地区的斗争局面。

据不完全统计，粤赣湘边区在恢复武装斗争的1年时间里，游击队共进行大小战斗258次，歼国民党军及反动地方武装1847人，缴获机枪63挺、长短枪3493枝、子弹8.2万发。游击队发展到1.1790万余人，先后在五岭地区建立了南雄帽子峰、油山、始兴北山游击基地，在九连地区建立了以九连山为中心的连和、和东、河西、河东4块游击基地；在湓江地区建立了翁（源）虔（南）边、翁源黄洞山、英（德）佛（冈）边等游击基地；在江北地区建立了南昆山、桂山、罗浮山3块根据地；江南地区建立了惠（阳）东（莞）宝（安）沿海基地和海（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山区基地。

（三）粤中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粤中区，包括新会、鹤山、开平、台山、赤溪、恩平、阳江、阳春、高明、高要、新兴、罗定、云浮、郁南等14个县，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8万。该地区的西部和中部为山地，东部和南部地区多为平原和丘陵，区内江河纵横，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广州通往湛江的广湛公路和西通梧州、藤县、桂平的西江水道，横贯境内。

活动在这个地区的游击队计有：“高鹤人民抗征自卫大队”、“新恩人民保乡自卫大队”、“台山人民解放军”，以及“朱德队”、“德怀队”等。他们从1947年6月起，广泛出击，袭击国民党的乡公所、自卫队，破仓分粮，救济贫苦人民。

1947年4月至10月，“高鹤人民抗征自卫大队”为配合群众救荒，利用敌人在本区兵力空虚，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连续三次袭击了国民党高明县合水墟田粮所、乡公所保警队和蛇

塘、巨塘、泽河、更楼等粮仓和据点，歼合水、更楼国民党警察分队和乡保武装，向群众开仓分粮 50 多万斤。

在新恩开边和两阳地区，游击队结合群众反“三征”，重点开展了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的斗争，先后捉获和击毙了国民党恩城联防大队长 大恶霸梁德骥、恩平谍报队长胡祥、抓丁逼粮无恶不作的东山乡保长廖孚群，在游击队的打击下，这一带的国民党乡公所不敢再恣意妄为，派人下乡催征。7 月 17 日，“新恩人民保乡自卫大队”袭击了恩平县牛江圩国民党 1 个保警分队，全歼该敌，缴获长短枪 30 多枝。9 月 23 日，“德怀队”与“新恩人民保乡自卫大队”联合行动，奔袭恩平县沙湖国民党警察所，俘警察 30 余人。11 月 2 日，“朱德队”袭击开平县鹤州乡蕉园村，俘联防队员 40 余人。12 月 4 日，“台山人民解放军”袭击了那扶区公署，收缴了反动地方武装的枪械，破仓分粮，影响很大。1948 年 1 月 7 日，“德怀队”夜袭国民党云浮县保安中队，俘虏保安队员 60 余人。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游击队，“德怀队”扩大了队伍，并成立了“云浮人民自卫队”。据不完全统计，粤中地区的游击队在这一阶段斗争中，较大规模的破仓分粮行动有 20 次，向群众分粮 120 多万斤，游击武装由 100 多人，迅速发展到了 400 多人，并建立了一批基干队伍，大部分老游击活动区也逐步得到恢复。

二、粉碎国民党军“清剿”，游击队发展壮大

闽粤赣边、粤赣湘边、粤中游击战争和游击队的迅速发展，游击区域的不断扩大，国民党地方政权被一个一个摧毁，加之农村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征税斗争和城市人民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发展，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华南的统治。为确保华南，巩固其大后方，1947 年 9 月，蒋介石派宋子文到广东接替张发奎任国民党政府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广东省保安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强化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

宋子文一到广东就声称，“广东治安三个月有办法，六个月见成效”。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召开“绥靖会议”，制定了“一分区

清剿，二军政合作，三整训团队，四剿抚兼施”的“清剿”计划。收编土匪武装，将原有的 10 个保安总队统一改编为保安团，并陆续扩编了 5 个美式装备的保安团，成立了 11 个独立保安营、86 个警察大队和 353 个自卫大队。宋子文还按广东行政区域成立了 9 个“清剿”区，由行政督察专员兼任“清剿”司令官。并在粤桂南、粤赣湘边、闽粤赣边增设了“联剿指挥部”。从 1947 年 12 月开始，宋子文在“分区扫荡，重点进攻”的方针指导下，集中 8.9 万余人的兵力，对广东人民武装发起了“清剿”。其作战部署是：以整编第 69 师与保安第 5、第 8 团重点进攻粤北地区；以保安第 1、第 2、第 9、第 10 团和桂南之武装进攻南路（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及廉江、化州和广西浦北、钦州地区）；以保安第 12 团和福建地方武装进攻兴宁梅县游击区。此外，还以部分武装进攻潮汕和西江地区。

中共中央极为关注华南形势，针对宋子文的所作所为明确指示香港分局：应尽量揭露宋子文的阴谋，加强华南人民及南洋侨胞的反蒋反美运动，特别要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并注意其适当发展，准备击破宋子文的“清剿”计划。香港分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广东各地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抓住时机放手发展，“与宋子文作胜负竞赛”，大力摧毁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巩固和发展山区根据地。1948 年 2 月，香港分局在香港召开了会议。会上，香港分局书记方方作了《刘邓大军渡黄河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的大好形势，总结了华南地区恢复武装斗争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并对各地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进行了部署。会后，香港分局发出了《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信》，对当前的军事斗争，政治工作，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等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指示。关于军事斗争方针，《指示信》提出，要普遍发展与建立主力；避免敌人的包围、限制；大胆领导非党武装；灵活运用战术；加强部队政治、军事教育；争

取瓦解敌军。能不能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是对各边区游击队的一次严峻考验。

（一）闽粤赣边区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

1947年12月，宋子文派陆军中将曾举直任第6“清剿”区司令官兼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1948年1月，任命陆军少将俞英奇为潮汕第5“清剿”区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任命原国民党第9战区中将参谋长涂思宗为“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实行两省“联防联剿”，企图歼灭闽粤赣边游击队。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战斗在闽粤赣边的游击队决定实行以进攻打破敌人进攻，以发展消灭敌人发展的方针。进一步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巩固梅兴丰华边区阵地，加强各县独立大队的建设，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不断扩大斗争范围，把斗争普及到全粤东地区。为了统一指挥与协调各县游击队的行动，中共粤东地委将各县游击队统一整编为8个独立大队。粤东支队兵分三路出击：一路去梅（县）兴（宁）平（远）蕉（岭）边；一路去饶（平）和（平和）埔（大埔）丰（顺）边；支队主力挺进杭（上杭）武（平）蕉（岭）梅（县）边，并攻打蕉岭县城。

蕉岭县城，位于广东省的东部，周边与梅县、平远和福建省的武平、上杭相邻，地处石窟河平原地带。守敌为1个警察中队、1个自卫队以及国民党1个接兵连等，共约300人。1948年3月2日晨，粤东支队和独立第7大队第1中队对蕉岭县城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烈战斗，除县长率大部逃脱外，毙伤俘敌6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多枝，子弹1.5万余发及其它军用物资一批。摧毁了国民党蕉岭县党部和县政府，并打开监狱，释放被监禁群众100多人。蕉岭战斗是闽粤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以来首次攻取的县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均有重要影响。蕉岭战斗胜利后，粤东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大批青年踊跃参军。

在此时期，为配合粤东支队进行蕉岭作战，各地游击队也频频出击。饶和埔丰游击队先后袭击了恭洲、大埔角乡公所和警察

所，缴获长短枪 60 多枝，子弹 4000 多发，摧毁了富岭、桃源、平原、双和、长乐、上下善和大东乡公所，俘敌 130 多人，缴获机枪 1 挺、长短枪 80 多枝、子弹 6000 多发。3 月 14 日，又袭击了江西寻邬县的茅坪乡和广东平远县的八尺乡公所，毙敌 10 多人，缴获机枪 2 挺、长短枪 60 多枝。在永和埔地区，游击队先后袭击了梅县的松东，大埔的保安、维新、永平、长治和永定的下洋等乡公所，共缴获 200 多枝长短枪和 2500 发子弹。

1948 年 3 月，国民党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涂思宗统一指挥广州行辕独立第 2 团、省保安第 5 团、第 12 团和福建省保安第 2 团、第 3 团各一部，以及闽粤边 10 个县的保警大队、自卫队，总兵力 1 万余人，采取纵横“十字”交叉的扫荡战术，对闽粤赣边游击队发起进攻，其气焰十分嚣张。

3 月 20 日，“进剿”军在第 5、第 6“清剿”区配合下，分别从梅县丙村、白宫和新塘、水车，以及大埔的大麻、银江和丰顺的马图、北溪方向，兵分四路向铜鼓嶂、阴那山游击根据地发起攻击。粤东支队和各独立大队，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充分利用山高林密、地域广阔的有利条件，与之周旋。4 月 13 日，粤东支队和独立第 7 大队，乘敌兵分多路，难以协调之机，集中兵力于武平岗背地区，采取伏击战术，沉重打击了福建保安第 2 团 1 个营，毙伤其营长以下 40 余人，游击队牺牲 3 人。4 月 17 日，梅埔丰边独立第 1、第 2 和新成立的第 8 大队，对梅县重镇丙村发起攻击，摧毁国民党丙村镇政府和警察所，毙伤俘自卫队长以下 40 多人，缴枪 30 多枝。

5 月底，国民党闽粤边“剿匪”总指挥部少将参议张光前率 1 个营的兵力深入三乡游击区时被游击队生俘。涂思宗得悉后调集广州行辕独立第 2 团第 1 营、广东保安独立第 1 营以及广东新编保安第 12 团和梅县自卫总队各一部，共 1500 多人，于 6 月初进行报复。粤东支队在马头山连续打退其 6 次进攻，毙伤其 60 多人，缴获重机枪 1 挺、长短枪 20 多枝，迫使涂思宗部连夜撤回大麻镇。

马头山作战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所谓“十字扫荡”和“全面清剿”计划，涂思宗也由于“作战不力”被撤职。

为策应粤东支队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潮汕人民抗征队和闽西、闽南支队，主动出击，积极作战。1948年3至5月间，国民党第5“清剿”区司令喻英奇先后集中近3000人的兵力，对大南山、八乡山和南阳山根据地，发起进攻。潮汕人民抗征队以小部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主力则向山区外围出击，采取以主力部队、武工队和民兵相结合，内线外线相配合，灵活运用伏击战、袭击战和阻击战等战术，从3月15日开始，到5月中旬，先后进行了云盖月、长滩、白石岭、钱坑、石桥头等数十次大小战斗，歼国民党军328人，迫其不得不撤出根据地。1948年7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将潮汕人民抗征队改编为潮汕支队，由刘向东、曾广分别担任支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大北山、南阳山主力 and 30多个武工队，部队发展到1900人，装备轻机枪13挺，长短枪1300多枝，为进一步发展山区和平原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在潮安、澄海、饶平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潮澄饶丰抗征队，由于国民党采取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斗争极为艰苦。抗征队除留一部坚持凤凰山游击根据地斗争外，主力转向外线，开展平原游击战争。1948年4月上旬，第5中队挺进饶平中部地区，摧毁了潮安桂坑、饶平西四乡公所，缴获长短枪50多枝。第6中队西渡韩江，与潮揭丰边游击队一道，袭击了潮安的归仁、大和乡公所，打通了凤凰山与八乡山的联系。6月，抗征队经整编后，成立韩江支队第11团。

与此同时，闽西支队先后在永和埔地区和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国民党区乡公所，建立武工队和民兵组织。闽南支队以小部兵力坚持内线斗争，大部兵力挺向外线发展，开辟了饶平、诏安北部新区。

闽粤赣边游击队，不但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清剿”，而且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1948年6月，中共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中

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刘永生，政治委员魏金水，副政治委员朱曼平。纵队下辖梅州、潮汕、闽西、闽南和韩江 5 个支队，共 7000 多人，有机枪 34 挺、长短枪 6500 多枝。同时，还组织起一支 6000 多人的民兵武装队伍，建立起纵横数百公里，有 180 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和游击区。

1948 年 8 月 7 日至 24 日，中共闽粤赣边区党代表会议在广东大埔县樟溪乡召开，会议总结了闽粤赣边区工委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根据中共香港分局的决定，宣布成立中共闽粤赣边区委员会，魏金水为书记，朱曼平为副书记，林美南为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维为组织部长。区党委下辖梅州、潮汕、韩东、闽西、闽南 5 个地委，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由刘永生任司令员，魏金水任政治委员，朱曼平任副政治委员。

国民党军对闽粤赣边区游击队的“清剿”，虽然连连受挫，但仍坚持既定方针，在闽粤赣边区 25 个县中，驻扎 5 个保安团，4 个独立营，5 个“清剿”大队，连同各县保警队、自卫队，共 2 万余人。

在粤东地区，国民党闽粤边“剿总”于 6 月下旬制定了“分区驻剿”计划，将辖区 10 个县及江西的寻邬和韩江西岸地区，划分为 10 个“驻剿”区，实行所谓“固守据点而截匪，机动援剿而歼匪，联保联坐而灭匪”的策略。

6 月份，粤东支队根据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的指示进行了改编，原粤东支队机关和直属连编为闽粤赣边纵队直属第 1 团，并再组建了新的粤东支队，支队司令员郑金旺，政治委员廖伟。针对国民党军的“清剿”特点，边纵第 1 团转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饶平、平和、大埔、丰顺 4 县边区，粤东支队则向以大埔坪沙为中心的大埔、永定、梅县边活动。1948 年 7 月 22 日，边纵第 1 团在转战中与国民党独立第 11 营遭遇，激战中歼灭其 1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60 多枝。边纵第 1 团伤亡 48 人。在此期间，粤

东支队在各县独立大队密切配合下，在埔梅边展开攻势。从9月5日开始，先后进行近10次战斗，歼灭乡自卫队等180多人，缴获长短枪198枝。10月上旬，粤东支队改称梅州支队，支队下辖2个团、7个大队共1600人。

在潮汕地区，1948年8月，喻英奇接任国民党闽粤赣“剿总”总指挥后，指挥部由松口迁至潮州，“清剿”重点也随之转向潮汕平原。潮汕支队针对国民党军尚未准备就绪之机，决定抢先向山地外围出击，开展平原游击战。7至9月，支队北山团各部先后袭击了五华、揭阳、丰顺等县10多个乡公所、警察所和联防队，俘60多人，缴枪80余枝。在保卫大北山龙潭根据地战斗中，歼灭广东保安第16团等部60余人，将其击退。支队南山团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向惠来西部三清山地区、惠来东区、普宁平原3个方向出击，袭击敌军据点10多处，摧毁炮楼8座，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地方政权和武装。9月中旬，潮汕支队主力转向普宁林惠山、普（宁）潮（阳）边和五房山外线作战，使国民党潮普惠南各县纷纷告急，进入游击根据地“清剿”的国民党军不得不撤出。11月上旬，广东省保安第2、第16团和潮汕、兴梅地区的反动地方武装3000多人，分路对大北山根据地发动进攻，15日9时，其前卫连进入五华通向良田的埕口茅坳嶂时，潮汕支队立即发起猛烈攻击，歼其110多人，俘5人。给进攻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

在1948年中，潮汕支队作战110多次，歼国民党军2100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16挺、长短枪900多枝，部队发展到3个主力团、9个游击大队、40支武工队，共3800多人，民兵发展到1.2万余人，大北山、大南山、南阳山、五房山根据地更加巩固。

在韩江地区、闽西地区和闽南地区活动的韩江支队第11团、闽西支队、闽南支队，也广泛出击，积极摧毁国民党的乡公所、警察所，镇压地方反动头子，不断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到年底，韩江支队第11团发展到5个连队和2个

武工队，共 860 人。闽西支队第 1、第 3 大队扩编为第 1、第 3 团，部队发展到 650 人。闽南支队组建起第 1、第 2 团，部队发展到 750 多人。

闽粤赣边区游击队在 1948 年反“清剿”作战期间，共歼灭国民党军 3490 多人，缴获小炮 2 门、轻重机枪 25 挺、长短枪 3200 多枝，摧毁国民党乡镇公所和警察所 100 多个，先后建立了 28 个县委和工委。闽粤赣边纵队先后建立了 1 个直属团、5 个支队、9 个团和 27 个大队，由恢复武装斗争时期的 180 人，发展到 8260 多人，装备轻重机枪 70 挺、长短枪 7960 枝。

1948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同意将闽粤赣边游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1949 年 1 月 1 日，闽粤赣边纵队宣告正式成立。司令员刘永生，政治委员魏金水，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铁坚，副政治委员朱曼平，政治部主任林美南。下辖第 1 支队（原梅州支队）司令员郑金旺，政治委员廖伟；第 2 支队（原潮汕支队）司令员刘向东，政治委员曾广；第 4 支队（原韩江支队）司令员许杰，政治委员黄维礼；第 7 支队（原闽西支队）司令员蓝汉华，政治委员范元辉；第 8 支队（原闽南支队）司令员李仲先，政治委员卢叨；纵队直属第 1、第 5、第 7 团，人数达到 1 万多人。

（二）粤赣湘边区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

国民党军对粤赣湘边游击队的“清剿”，是从进攻浔江游击区开始的，接着就向五岭、九连、江北、江南展开全面进攻。1948 年 1 月 20 日，敌人夜袭翁源太平，企图围歼粤赣先遣支队司令部。先遣支队领导机关在其“钢铁大队”掩护下安全转移，但根据地大部分被国民党军占领。3 月，粤赣先遣支队钢铁大队主动出击，于翁源新江瓦窑排地区歼整编第 69 师第 99 旅 1 个排，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20 多枝。5 月，又在新江小径地区伏击第 99 旅 1 个团部和广东保安第 1 团 1 个排，毙伤其副团长以下百余人。经过 30 多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 730 多人，缴获轻机枪 12 挺、长短枪

800多枝，扭转了淞江斗争的不利局面。

国民党军在对淞江地区展开进攻的同时，1月中旬，集中了1万多人的兵力，由“粤赣湘边剿匪总指挥”叶肇统一指挥，对“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活动地区五岭发动进攻。1月17日，第99旅一部在始兴县地方武装1200多人的配合下，向五花旗进犯，“解放总队”当即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歼灭其40余人。1月23日，“解放总队”对始兴城发起攻击，因兵力分散，未达到预期目的。部队遂转向下北山地区。在国民党军追堵不利形势下，“解放总队”被迫移向赣南崇义、信丰、大庾边活动。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困与封锁，“解放总队”第6、第3支队于3月间先后返回油山和始兴地区活动。

在淞江和五岭地区游击队进行反“清剿”斗争的同时，九连和江南、江北地区游击队也进行了反“清剿”斗争。3月间，整编第69师第92旅第276团和广东省保安第1、第5、第8团各一部共6000多人，对九连地区发动进攻。3月11日，保安第5团1个营在和平县警队300多人的配合下，由和平南下奔袭大湖。九连游击队与民兵1000多人，乘其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1天激战，将其击退。3月17日，国民党军又兵分两路向青州和热水发起进攻，并占领热水。随后多次集中兵力对大湖、彭寨、古寨和黄村、叶潭、康禾等地进行“清剿”，游击队和民兵虽英勇作战，歼灭“清剿”军500多人，但终因力量悬殊，到今年5月，连和、连东、河东的主要镇圩失陷，游击队被迫退守河西。

1948年3、4月间，国民党军集中5000多人，对活动于东江北岸的粤赣湘边游击队江北支队发动进攻。江北支队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但因力量悬殊和兵力分散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清剿”，游击区军民受到严重摧残。在此时期，江南支队先后袭击了布吉车站、固戍联防队、深圳沙头角海关及宪兵队，歼国民党军近百人，缴获各种枪支80多枝、电台1部。5月16日，于东莞长塘地区全歼国民党军1个连，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长短枪30多

枝。这些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江南支队也在斗争中得到很大的发展，从 2791 人发展到 7200 余人。

粤赣湘边游击队经过半年的积极作战，部队有较大发展。据中共香港分局统计，到 1948 年 6 月粤赣湘边区游击队的总兵力已达到 1.5868 万人，其中江南地区 5000 人，江北地区 1800 人，九连地区 5000 人，潏江地区 2000 人，五岭地区 2000 人，珠江地区 68 人。由于这里是国民党军重点“清剿”地区，因此，形势一直比较严峻。为粉碎国民党军“清剿”，建立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中共粤赣湘边区党委在认真总结了前期反“清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后，要求各地区迅速建立主力团队，开展整训工作，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经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批准，粤赣湘边区党委决定在各地成立地委的同时，对各地区部队也进行整编，整编后的江南部队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司令员为蓝造，政治委员为王鲁明，辖第 1、第 2、第 3、第 4、第 5 团和独立第 4 大队；江北部队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北支队，司令员为黄柏，政治委员为黄庄平，辖第 1、第 2、第 3、第 4 团和直属大队；九连部队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司令员钟俊贤，政治委员魏南金，辖第 3、第 4、第 6、第 7 团和直属第 2、第 5 大队；潏江地区部队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北江支队，司令员何俊才，政治委员邓楚白，辖第 1、第 2、第 3、第 4 团和 1 个总队；五岭地区部队仍以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名义开展斗争，总队长黄业，政治委员张华。各支队成立后，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深入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纪律教育，开展立功创模活动，进行军政训练，部队的军政素质进一步提高。

7 月上旬，国民党军以正规军 1 个师和 2 个保安团等部约 1.2 万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兵分三路，对江南游击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压缩江南支队主力于坪山地区而歼灭之。江南支队决定采取“先发制人”战术，对国民党军防守较弱的沙鱼涌发起突击。沙鱼涌地处大鹏湾北岸，距坪山 15 公里，驻有国民党军 1 个营部

和 1 个加强连，以及海关关警、税警等部队。7 月 16 日 4 时许，部队发起攻击，经 4 个小时激烈战斗，全歼守敌 327 人，缴获 82 迫击炮、60 炮各 2 门、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8 挺及其它枪支 180 多枝、子弹 7 万多发、电台 1 部和其它物资一批。江南支队伤亡 32 人。

沙鱼涌战斗后，国民党又以正规军 1 个团和 2 个保安团及反动地方武装共 4000 余人，分别由淡水、横岗、约场和盐田向坪山地区压缩，企图围歼江南支队主力于该地区。江南支队利用敌军分路进攻，各路不易增援配合的弱点，决心集中第 1、第 2 和第 3 团共 7 个连的兵力，设伏于山子下地区，首先歼灭由横岗方向来犯的这一路。7 月 23 日 8 时许，一支由 600 人组成的进犯军进入伏击阵地后，游击部队居高临下突然开火，经 40 多分钟战斗，歼灭其 315 人，其余被打散，仅有 80 多人逃回深圳。这次战斗，江南支队伤亡 18 人，缴获 82 迫击炮和 60 炮各 1 门，轻重机枪 14 挺、长短枪 200 多枝、子弹 5 万多发、电台 1 部。迫使其它三路进犯军分别退守沙鱼涌、淡水和新圩。8 月 3 日，江南支队又取得了红花岭战斗的胜利，歼灭广东保安第 8 团、虎门守备总队等部 300 余人。红花岭战斗后，江南支队为争取主动，除留一部兵力于坪山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转入惠阳、东莞和宝安作战，到 9 月中旬，先后歼保安团队约 300 人，击毁汽车 5 辆，缴获机枪 12 挺、步枪 250 多枝。9 月底，国民党军将其进攻坪山地区的兵力撤回深圳、东莞、惠州、淡水等地区。至此，宋子文在江南地区的“清剿”宣告破产。江南支队在 1 个多月的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 1500 多人，缴获 82 迫击炮和 60 炮 8 门、轻重机枪 31 挺、长短枪 700 多枝、各种子弹 12 万多发，电台 2 部，巩固了以坪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为尔后的发展并建立更大块的根据地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8 年 10 月，保安第 13 团、第 5 团及保安第 1 团 1 个营，对九连地区游击队发起了“清剿”。粤赣边支队认真总结了以往作战经验和学习了江南支队的斗争经验，从本区实际情况出发，采取

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的方针，在白马、大湖和鹤塘进行了3次战斗，均获胜利，全歼保安团2个连和1个连大部，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9挺、掷弹筒7具和长短枪近百支，物资10余船。12月24日，又在骆湖大坪山地区，歼灭保安部队57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37枝。

活动于潯江、江北和五岭地区的北江、江北和解放总队第5支队，在反击宋子文的第一期“清剿”之后，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从下半年开始，集中兵力，主动寻机打击敌人，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6月至12月，先后歼灭国民党军400多人，缴获轻机枪13挺、长短枪368枝，并策动了始兴县澄江自卫大队大队长等人率120多人举行起义。这些斗争的胜利，使该地区的形势逐渐开始好转。

194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将粤赣湘边游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1949年1月1日，粤赣湘边纵队宣告正式成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平、副司令员黄松坚、政治部主任左洪涛。2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补梁威林为副政治委员，严尚民为参谋长。“粤赣湘边纵队”下辖东江第1支队（江南支队改编）司令员蓝造，政治委员王鲁明，支队下辖7个团和2个独立营；东江第2支队（粤赣边支队改编）司令员郑群，政治委员钟俊贤，支队下辖5个团和4个独立大队；东江第3支队（江北支队改编）司令员黄柏，政治委员黄庄平，支队下辖6个团和2个独立营；江北第1支队（江北支队改编）司令员何俊才，政治委员邓楚白，支队下辖5个团；江北第2支队（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改编）司令员黄业，政治委员张华，支队下辖2个团；赣南支队以刘建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湘南支队以刘亚球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三）粤中游击队的反“清剿”

1948年1月，宋子文为肃清粤中地区的人民游击队，将该地区划为3个“清剿”区。第1“清剿”区，由周汉玲任副司令官兼

“五邑清剿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对台山、开平、恩平、新会、赤溪五县的“清剿”行动。第3“清剿”区由陈文亲任司令官，彭程、赵仲荣任副司令官；并在云浮县设立罗（定）云（浮）郁（南）“三罗清剿指挥所”，彭程兼任主任；在新兴县设立新（兴）鹤（山）明（高明）“清剿”指挥所，赵仲荣兼主任。在阳江、阳春两县设立了两阳“清剿”指挥所，由第7“清剿”区副司令官周万邦坐镇阳春县城“督剿”。

从1948年3月开始，国民党集中8000多人的兵力采取重点驻扎，穿梭“扫荡”的方法，向粤中区游击队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清剿”，为加强对各边区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成立包括广东南路、中区及桂东南、桂中南在内的中共粤桂边区委员会，在粤桂边区属下，设立中共广南分委，专事领导云雾山区的茂名、电白、信宜及原中区所属各县的党组织和游击队。

粤中游击队当时仅700余人，其中台南80人，高鹤120人，恩新200人，两阳70人，“三罗”30余人。1948年3月，中共广南分委成立，遵照香港分局的指示，采取分散发展广大农村，集中兵力消灭反动乡镇武装；对付国民党军的“清剿”，则寻敌弱点，集中3倍的力量打破之，或以打屁股的方式粉碎之。4月18日晚，在中共三罗党组织和武装小分队的策动下，国民党郁南自卫大队、都城镇公所自卫队、桂河乡自卫队等共200多人，在桂河镇宣布起义。起义队伍收缴了桂圩警察所的枪，打开桂圩、通门两处粮仓，将38万斤稻谷分给贫苦的群众。4月19日，起义部队进入峡上，与云浮人民自卫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三罗总队”（后简称三罗总队）。郁南“四·一八”武装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在西江南岸的反动统治，广东国民党当局随即纠集重兵对“三罗总队”展开围攻，起义部队虽受到一定损失，但三罗地区的武装斗争则逐步进入了“大搞”阶段。

1948年2月，中共香港分局为有计划地向敌薄弱地区突破，决定由粤桂边区党组织抽调主力，编成挺进部队向粤中发展。东征支队于4月5日从遂溪县北区下洋村出发，历时50天的时间，行程500余公里，沿途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歼敌160余人，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于5月下旬先后抵达两阳、新恩地区。这时，国民党第1“清剿”区副司令兼“五邑清剿指挥所”主任周汉玲指挥所部展开围堵。鉴于敌强我弱，东征支队又经长途跋涉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决定以连为单位，在两阳、新恩及三罗等地实行分散发展，开辟新点线，并与两阳、新恩游击队统一合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广阳支队”，由郑锦波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5、第6、第7和漠南、春北2个独立大队。在此期间，三罗总队也同时改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三罗支队”，由李镇靖任司令员，唐章任政治委员。

在新高鹤地区，随着武装斗争发展，1948年3月27日，高（明）鹤（山）人民抗征自卫大队与各县武工队，统一整编为“新（会）高（明）鹤（山）人民解放总队”。部队整编后，采取“分散搞发展，集中打敌人”的方针，转入敌后袭击“清剿”军。3、4月间，第3“清剿”区副司令赵仲荣，集中800多人，向新高鹤游击区更楼、合水发动进攻。“新高鹤总队”乘虚转入敌后，一部突袭了布午、布茅敌据点，一部袭击了新圩，并两度攻击鹤城，先后歼灭乡保武装4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0多枝及5只运粮船和大批粮食。5月15日，活动于皂幕山地区的游击队，袭击了新兴县东城圩警察所，毙警察自卫队等34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33枝、子弹4000多发，打开了由山区向西南平原的发展局面。25日，游击队进入平原地区后，袭占了高明重镇三洲，俘虏自卫队等3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枝，子弹数千发。三洲作战的胜利，为继续向西江南岸平原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形势。5月27日，驻肇庆的广东保安第14团一部及四县地方武装700多人，向“新高鹤总队”发起反扑。面对优势之敌，“新高鹤总

队”凭借有利地形，奋力阻击，经1个多小时激战，打退保安团多次冲锋，击毙其数十人，夺得机枪1挺、60迫击炮1门，并乘隙转入鹤山云乡游击基地。到8月中旬，“新高鹤总队”在高鹤山区和西江南岸地区，又歼国民党军100多人，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近百枝。

在台（山）开（平）赤（溪）地区，1948年4月，为适应“大搞”的需要，“台山人民解放军”与该地区的武工队统一整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台开赤总队”。总队成立后，以大隆洞为基地，向东西两翼发展新区。5月上旬，海宴武工队在总队1个机枪班的配合下，突袭了台山县海宴、沙栏两镇据点。全歼海宴联防中队57人，缴获长短枪57枝、子弹3200多发，开辟了台山九区的工作。在此期间，活动于台（山）开（平）恩（平）边、台（山）新（会）赤（溪）边和恩（平）阳（江）台（山）边的武工队，广泛进行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和减租减息，帮助地方建立民兵和组织农会，对当地欺压群众的恶霸地主进行了坚决打击和镇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台开赤总队”与各地武工队不仅巩固了老区，而且又在恩开台边、恩阳台边、台新赤边以及阳江东部等地，开辟了大片的游击新区，建立了紫罗山、葵田山等游击基地。

1948年8月初，广东国民党当局集中1.58万人，其中省保安团2540人、县警4600人、自卫队8650人，对漠南、漠东和恩阳边区、台山的滨海游击区、三罗的郁（南）罗（定）边、云（浮）阳（春）边游击根据地，展开所谓“交叉扫荡”、“穿插扫荡”和“清剿”。从8月中旬到8月底，粤中游击队先后进行了高要水口、开平锦湖、台山莘村、新兴船岗、开平单水口、高明三洲、台山海宴等七次较大的战斗。共歼灭国民党保安团1个排、5个联防自卫队、1个乡自保队，缴获各式机枪11挺、长短枪162枝、子弹1.1万多发。

为进一步发展粤中地区的斗争，9月中旬至10月初，中共广南分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上半年的斗争经验，决

定从分散发展起来的队伍中建立主力，并强化部队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建立新（兴）恩（平）阳（江）边山区中心根据地，扩大老香山、皂幕山、天露山和恩阳边、新云边、大隆洞山区根据地。9月29日，在广南分委扩大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广东保安第14团以1个加强连，在高明、鹤山保安团队的配合下，企图向老香山、皂幕山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中共广南分委获悉这一情报后，决定集中直属连和新高鹤总队、广阳支队各一部共4个连的兵力，于新兴、高明两县交界处布辰岭东侧的塘面村有利地形伏击敌人。30日拂晓，各参战部队按部署进入指定位置，上午8时许，战斗打响，经2个小时战斗，全歼敌加强连，毙伤保安团连长以下46人，俘虏74人，缴获轻机枪9挺、枪榴弹筒7具、步枪70多枝、子弹1万余发、手榴弹200多枚及其它军用物资一批。战斗中游击队牺牲3人，负伤2人。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粤中区反“清剿”斗争以来战果最多的一次胜利，被中共香港分局称为1948年广东几个模范战例之一。

为挫败国民党军对“三罗”地区进攻，三罗支队将3个基干队集中于新兴、云浮边地区，依靠游击根据地展开频频出击。11月7日，夜袭桂圩据点，歼保警1个排，俘27人，缴获轻机枪2挺、枪榴弹筒2具、步枪19枝。11月下旬至12月，基干队又连续袭击了砵石、金鸡圩、桂圩等乡公所和自卫队，歼自卫队等70多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55枝。到年底，三罗支队发展到630余人，活动地区扩大到南至西山的圭岗，北至云浮的茶洞，西至罗定羌塘和围底，东至新兴的廿四山，与天露山根据地形成了相互策应的有利局面。

从10月份起，两阳、新恩游击队在西江大队的配合下，由山区进入平原，广泛开展以拔“钉子”填“空格”为主要目标的外线作战。在人民武装的不断打击下，这些地区的保警队、自卫队，不得不收缩防地，撤出一些据点。到年底时，两阳和恩平边地区与新恩阳边游击区连成一片。

在新高鹤地区，进入平原作战各部队连连发动进攻，先后打下新会石步乡和鹤山靖村、新会棠下镇等据点和乡镇公所，歼灭国民党保安中队和联防队各 1 个，缴获轻机枪 2 挺、长短枪 30 多枝，扩大了新高鹤游击根据地。

到 1948 年底，粤中游击部队继 1948 年上半年反“清剿”作战之后，又进行大小战斗 150 多次，毙俘国民党军 1000 多人，缴获小炮 1 门、机枪 33 挺、枪榴弹筒 11 具、长短枪 800 多枝。粤中游击队发展到 4334 人，比上半年增加了 1 倍多。

第二节 粤桂湘边、粤桂边和桂滇黔边游击战争的发展

一、游击战争的展开

（一）粤桂湘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粤桂湘边区辖西江以北，北江以西，桂林以东的广大地区。域内山峦起伏，交通不便，桂江、贺江、绥江和连江纵贯，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1947 年 7 月，中共粤桂湘边工委成立，决定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粤桂湘边根据地。在广宁地区，西江游击队频频出击，先后对锦波、永泰、黄田、江谷、江屯和带洞等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反动武装发起攻击，毙俘保安团队 81 人，缴获轻机枪 2 挺、长短枪 44 枝、手榴弹 20 多枚和子弹一批。控制了绥江两岸 2/3 的地区，并于四会、高要、清远、怀集、德庆、封川、开建等县交界地区，建立了 1 个区级政权，5 个民主乡政权和 5 个乡两面政权。到 1947 年底时，共建立了 3 个区级政权、12 个民主乡政权，共有人口 10 万。各区普遍建立了民兵和农会，组织了互助组，开展减租减息和参军支前，初步形成了以广宁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在粤桂边区，1947 年 8 至 12 月，广（宁）德（庆）怀（集）

边挺进队先后摧毁了诗洞圩、永固圩和六龙坑等乡政权，歼反动地主武装 30 多人，缴获长短枪 20 多枝。建立了怀南六龙坑乡民主政权和游击根据地，挺进队由 40 多人发展到 180 多人。

在桂东和桂东北地区，1947 年 7 月，怀集县人民抗征义勇队配合粤桂湘边挺进队先后袭击了甘洒、屈洞、坳子鱼北乡公所和自卫队，歼自卫队 30 多人，缴获长短枪 30 多枝。7 月下旬，灵（川）全（县）灌（阳）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并袭占了灵田、石塘、巨望、新圩乡公所，歼灭反动地方武装数十人，缴获轻机枪 1 挺，长短枪五六十枝，破仓分粮几十万斤。在不到 10 天时间，队伍发展到 1000 人，成立了“全灌人民自救团”。国民党广西当局急派保安团队前往镇压。由于起义队伍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在强敌“进剿”下，遭受严重挫折，起义人员被迫分散隐蔽。

（二）粤桂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粤桂边区，东联粤中，西以北仑河为界与越南接壤，北接桂西北，南临南海和北部湾，与海南岛隔海相望。其地域包括广东的西部和广西南部地区，共 38 个县市，境内东南部地区多为平原和丘陵，中西北部地区多为山地，高雷台地纵横数百里，十万大山、六万大山、镇龙山、勾漏山、云开山横贯 20 几县，是汉、壮、黎、瑶、苗、京等多民族聚居地区。

1947 年 3 月，“粤桂边人民解放军”成立，吴有恒任代司令员，同时将各地游击武装实行了统一整编。遂溪中区以 4 个中队为基础，编成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 1 团，下辖 5 个连和 1 个便衣队、1 个政工队，全团共 500 多人，配有轻机枪 5 挺、长短枪 500 多枝；廉江县独立大队扩编为新编第 3 团；化县、吴川地方部队组成新编第 4 团。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在组建 3 个主力团后短短的 1 个多月时间内，频频出击，摧毁国民党乡公所近 20 个，解放圩镇 8 个，歼灭自卫队等 300 余人，缴获机枪 3 挺、长短枪 200 多枝、子弹 4000 多发，向群众破仓分粮 1 万多石，控制了遂（溪）廉（江）化

(县) 边长 150 公里, 宽 60 公里的广大地区, 使遂(溪)廉(江)化(县)吴(川)游击区联成一片。粤桂边区人民武装也发展到 5000 多人。4 月 29 日, 华南地区党组织正式决定由庄田任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司令员, 温焯华任政治委员, 唐才猷任副司令员, 吴有恒任副政治委员, 欧初任政治部主任。中共香港分局成立后, 6 月下旬, 又任命左洪涛为参谋长。遵照香港分局积极发展地方武装, 争取在对敌斗争中增强人民力量的指示, 从 4 月底至 7 月, 又先后组建了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新编第 2、第 7、第 9、第 10、第 12、第 14 团和独立第 1 团, 分别活动于遂溪、廉江、化县、吴川、海康、博白、陆川地区。

在钦县、防城地区, 地方党组织按照广东区委关于武装斗争先“放手小搞, 准备大搞”的方针, 于 5 月 14 日发动和领导了防城县三波乡、光坡乡和企沙镇人民武装起义, 解放了 3 个乡镇, 控制了光企半岛。起义队伍 800 多人组成了“农民翻身独立大队”, 开展开仓济贫、镇压敌特地霸、收缴反动武装枪支, 并袭击了防城县狗岭据点, 歼县警察 1 个分队, 缴获重机枪 1 挺, 影响很大。6 月, 钦县、防城各部人民武装在防城那梭炮台, 统一整编为“钦防农民翻身总队”, 辖独立大队和第 1、第 2、第 3、第 4、第 8 等 6 个大队和 1 个直属连, 共 1500 人。为了加强对钦县、防城、灵山、合浦地区的反动统治, 国民党广州行辕在防城增设了“钦防清剿指挥部”, 并增派广东保安第 9 总队移驻钦防地区。为避敌锋芒, “钦防农民翻身总队”除留部分武装坚持防城地区的斗争外, 大部转向十万大山的东山口、马起山地区活动, 将反“清剿”作战引向外线。9 月, 根据上级指示, “钦防翻身总队”改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 20 团和第 21 团。

在桂中南及思明地区, 1947 年 8 月 25 日, 中共思明工委领导十万大山地区的宁明县边境圩镇爱店首先举行起义, 组建了游击大队, 建立起思(东)明(江)4 个边区乡游击根据地。9 月, 贵县中心县委又领导了横县人民举行起义, 成立了横县人民解放军,

共 800 多人。不久被正式编为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第 19 团，全团 500 多人，另 300 人编为横南独立营，归入第 18 团建制。

各地人民武装起义和斗争，使国民党广西当局十分惊慌，他们纠集保安第 4 团、第 6 团和横县、永淳、灵山等县自卫大队，对起义部队和人民武装展开围攻。在反围攻作战中，游击队先后毙伤国民党保安团 605 人，俘虏 175 人，缴获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10 挺、步枪 228 枝及其它军用品一批。同时，还摧毁了许多乡镇公所，扩大了游击区。

粤桂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广州行辕主任宋子文惊慌不已。1947 年 10 月，他除决定在高州和湛江设立第 7、第 8 “清剿”司令部外，还特派广东保安处长陈沛任“粤桂南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广东省保安第 1、第 2、第 9、第 10 团和广西省保安第 6 团及各地反动武装，对遂（溪）廉（江）化（县）吴（川）地区进行重点“清剿”。

粤桂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战斗，在内线不能打破敌人“清剿”的时候，根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关于把内线斗争变为外线斗争，粉碎敌人各个击破的指示，12 月初，在廉江召开了粤桂边区地委扩大会议，决定抽调 2 支部队，从两个方向挺出外线作战，实行东征和西征，以分散国民党军的兵力，打破其“清剿”。东征部队挺进茂名、电白、信宜和粤中地区；西征部队挺进粤桂边的十万大山地区。留高雷的部队，坚持原地斗争。

（三）桂滇黔边游击战争的展开

滇桂黔边区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该地区包括云南省东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曲靖、文山、红河、思茅、玉溪地区，广西省西部和西南部的左江、右江（百色）地区，贵州省的西部和西南部的毕节、六盘水和兴义地区，共有 100 多个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区内山峦连绵，河流密布、林密谷深、沟壑纵横，著名的云贵高原横贯境内。边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该地区的统治比较薄弱。这

些就为游击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桂滇黔边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滇桂黔3省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动工农运动。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李明瑞、韦拔群、俞作豫、雷经天等人先后在广西百色、龙州发动武装起义，创建了红7军、红8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云南和贵州地下党在小东山、马关、陆良、宁洱、会泽、镇雄、盘县、郎岱、安顺、炉山、大方、毕节等地发动过武装起义和进行武装斗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桂北、贵州和云南地区的90多个县，在桂滇黔地区形成较大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期间，桂滇黔边区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组织 and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为加强对其后方的控制，在桂滇黔进行白色恐怖，制造了“李、闻惨案”。在此形势下，各地党组织，依靠多年的工作基础，在广大农村普遍建立和发展农抗会、翻身会、兄弟会，组织秘密武装，发动群众反对“三征”，并遍过合法斗争形式，掌握了一批国民党乡镇政权。在广西左右江地区的19个县建立了根据地，掌握了数十个乡公所和几块连片的山区，秘密农会会员发展到2.7万多人，掌握地下武装5000多人。在云南的18个县建立了武装斗争据点，秘密武装发展到近2000人。在滇黔交界地区也建立了工作基地和地下武装。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47年5月2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粤桂边区工委正式成立，周楠任工委书记。中共粤桂边区工委为加强对左右江地区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了左江工委、右江地委和靖镇边工委。8、9月间，左江工委和右江地委在大青山、平孟、爱店和万冈、凤山、果德、武鸣四坡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左江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和桂西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在左右江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有13支武装游击大队。11月间，周楠等人率原

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1团600多人转至广西靖镇地区，会合当地游击队开展游击战。这个月上旬，中共香港分局鉴于粤桂边区工委跨地区实行领导，已显鞭长莫及，为集中力量领导左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并向桂滇、桂黔边区发展，决定撤销粤桂边工委，成立由周楠、庄田等12人组成的中共桂滇边工作委员会，周楠为书记，庄田负责军事工作，大力开展左右江地区的游击战争，并相机向桂滇、桂黔边区发展。

桂滇边区工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和香港分局的有关指示，提出了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地区主力部队，发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并决定，以桂滇边地区的靖西、镇边、敬德、富宁、麻栗坡、广南等县为重心，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而后再视机打开右江地区的局面。根据桂滇边工委的部署，11月上旬，庄田率先遣中队和靖镇独立大队，共300多人，首先袭击了国民党保安团队驻果梨据点，歼灭保安部队9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00多枝。20日，游击队又袭击了国民党靖西保安团的百合据点，歼反动地方武装15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长短枪100多枝。百合守敌被歼后，惠仙守敌惧歼连夜逃向弄蓬，企图凭险顽抗。12月1日，游击队夜袭弄蓬，一举歼灭靖西保安团副司令以下11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100多枝。3战3捷，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斗志。在此期间，靖西民兵基干队乘机袭击了南坡圩、荣劳乡2个保安团据点，歼灭其100多人。在1个多月的作战中，桂滇边区游击队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共歼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700多人，控制了靖西和镇边的7个乡镇，部队由10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农会会员由3000多人发展到1万多人，使4个不完整的乡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又发展了10几个整乡的游击根据地。1948年2月，经香港分局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边部队，庄田任司令员，周楠任政治委员，黄景文任代参谋长，饶华任代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第2支队和左江游击队。在右江地区则成立

了桂西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在云南地区，1947年1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在建水召开会议，确定游击战争先从地处滇桂黔3省边区的滇东南地区展开，而后再向滇南、滇东北和滇西发展，利用云南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和团结一切力量，以“讨蒋自救”为号召，成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

1948年2月，朱家璧、张子斋等遵照中共云南省工委的布置，带领一批武装骨干返回滇东南地区，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后，开展游击战争。3月3日，国民党整编第26师第579团及反动地方武装1个营，对西山地区发起“围剿”，朱家璧率部利用山区的地形先后毙伤“围剿”军60余人，缴枪20多枝。跳出包围圈，转向外线发展。3月底，进至盘江阿乃地区，部队发展到3个大队共1000多人，取名为“一支人民的军队”（简称“一支军”），朱家璧任司令员，张子斋任政治委员，何现龙任副司令员，祁山任副政治委员。4月上中旬，“一支军”进行了扩编，将师宗、罗平地区的基干武装编为第6、第7大队，部队发展到5个大队，1500多人。

游击战争的迅速开展，立即引起国民党当局严重不安。4月底，国民党整编第26师第193旅旅长率4个营1500多人，在地方反动武装配合下，分三路向板桥、钟山、金鸡、龙岗、八达河等地区展开“围剿”，企图一举将“一支军”主力消灭于南盘江北岸。5月3日，朱家璧、张子斋采取避实就虚方法，以第2大队与罗平地方武装为一路佯装主力，由板桥取捷径北上富乐吸引敌人；主力4个大队跳出敌包围，隐蔽迂回敌后，11日拂晓奔袭师宗县城，俘国民党县长及保安团队100余人，缴枪100多枝。接着，又乘胜攻克第26师留守兵站，缴获步枪130枝、子弹3万余发、手榴弹400多箱、卡车4辆及大批其它军用物资。

5月下旬，部队由龙海山经圭山，进入西山，准备相机南渡盘江。28日，国民党军第578团尾随跟进。针对国民党军求战心切

的情况，朱家璧决定率部在三家村至莫香井之间地区设伏。在西山地方武装配合下，经一天激战，击毙国民党军 110 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50 多枝。游击队伤亡 50 余人。

三家村战斗后，部队乘机渡过盘江，进入邱北、弥勒、路南、泸西、罗平、陆良、师宗、平彝等县，建立起多块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在此期间，为适应泸西地区的斗争情况，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对“一支人民军队”于舍德地区进行整编，将新近又成立的 2 个大队，共 7 个大队整编为 3 个支队，第 1 支队，朱家璧兼任支队长，下辖第 1、第 2、第 3 大队；第 2 支队，何现龙兼任支队长，下辖第 4、第 5、第 6 大队；第 3 支队，杨体元任支队长，许南波任政治委员，下辖第 7、第 8、第 9 大队。

在滇东南地区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滇南、滇中、滇西和滇东北，以及黔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也迅速发展起来。

1948 年上半年，中共滇南工委为打开该地区的斗争局面，利用元江、石屏、建水有利地形，在各族人民群众支持下，除建立了民兵联防武装外，还将 8 支共 300 多人的游击队，组成“滇南人民自卫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8 月间，自卫军袭击元江洼垵告捷后，9 月 14 日，又在猪街全歼国民党新平专区保安团独立大队，俘保安副司令以下 130 余人，缴获轻机枪、长短枪 100 多枝。为适应游击战争的发展，自卫军在元江韩家寨整编为第 1、第 2 支队，随后又在石屏组建了第 3 支队，部队发展到 1500 多人。部队扩编后，除集中主力打击敌入外，其余全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

在滇西地区，1948 年 5 月，中共滇西工委成立后，在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反“三征”和建立山区游击根据地的同时，注意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建立山区据点和两面政权，先后在 16 个县建立了工作基点。

在滇东北地区，中共滇东临时工委成立后，积极领导滇东和滇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先后在昭通、巧家、会泽、永善、大关、彝

良、峨山、玉溪、新平等地区，建立了 17 个武装斗争基点，并成立了第 3 支队。在地下党的配合下，摧毁国民党乡公所和反动地方武装，部队发展到近千人。

在贵州省西南部的兴义、关岭、水城、郎岱地区，游击战争也迅速发展，成立了“黔西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 1 支队”，由龙腾霄任支队长。到 1948 年下半年，部队发展到 8 个大队，1000 余人。

二、游击队在反“清剿”斗争中壮大

（一）粤桂湘边区游击队的反“清剿”

1948 年 1 月 23 日，宋子文以所谓的“分区扫荡”、“重点进攻”的绥靖新策略，重新划分了“清剿”区。任命叶肇为第 2“清剿”区司令官，陈文为第 3“清剿”区司令官，并在怀集成立了“联剿”指挥部，由陈文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广西保安第 2、第 7 团、广东保安第 14 团和独立第 6 营以及各县保安团队共 1 万多人，对粤桂边区进行“清剿”。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经中共香港分局批准，成立了粤桂湘边区工委军事委员会，边区工委书记梁嘉兼任边区军委主席。与此同时，边区工委对所辖地区进行了调整，成立了绥江、连江、桂东 3 个地（工）委。同时决定成立连江支队、绥贺支队和桂东独立团。绥贺支队由绥江下游的广（宁）四（会）高（要）边部队和挺进广（宁）德（庆）怀（集）封（川）开（建）边区部队组成，下辖第 1、第 2、第 3 团。连江支队由原飞雷大队、火箭大队和战斗在广（宁）四（会）清（远）边、英（德）清（远）边等地方武装组成，下辖第 1、第 2 团和 4 个地方大队。桂东独立团以怀东地方武装编成。4 月初，粤桂湘边工委和边区军委在广宁寮炭岗召开会议，决定抽调主力，从 3 个不同方向挺进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开展斗争。连江支队第 1 团挺进粤湘边区的骑田岭云雾山地区；第 2 团东征英（德）清（远）阳（山）边区；桂东独立团主力向贺县、钟山地区的萌渚岭西进；其余部队坚持原地斗争。

1948 年 4 月底，桂东独立团计划取道怀集凤岗、洽水，挺进

桂东，在部队进至阳山地区时，遭怀集、广宁两县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几经苦战牺牲 23 人，未达预期目的，部队返回广宁。6 月以后，粤桂湘边区工委经过认真地总结经验，采取回派广西籍干部返回桂东开展工作，使斗争取得较大进展。

1948 年 4 月，执行北进任务的连江支队第 1 团先遣分队进入清远，支队主力随后跟进。这时，粤、桂、湘 3 省国民党军联合“清剿”粤桂湘边，连江支队第 1 团难以继续前进，遂与广宁、四会、清远地区的游击队配合，进行反“清剿”斗争。7 月 18 日，连江支队第 1 团先遣分队，在英（德）清（远）边游击队配合下于蕉园庙歼灭英德县自卫总队第 4 中队 80 余人，使国民党的英德、清远两县“会剿”失败。连江支队第 2 团，于 1948 年 6 月开始向英德、清远、阳山边挺进，于清远县浸潭、石潭地区摆脱了国民党清远保警大队等反动武装 800 多人的纠缠，歼其 10 多人。8 月份，袭击了太平、联城等国民党乡政权，歼敌数十人，缴枪 20 多枝，打开了珠坑、禾云、鱼坝地区的局面。

1948 年上半年，粤桂湘边游击队 3 支主力部队执行北上、东征和西进任务后，国民党粤西桂东“联剿”指挥部，仍以广宁“四雍”^①为“重点进攻”方向，企图将粤桂湘边武装压缩于该地区予以聚歼。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广宁四雍地区的“清剿”，粤桂湘边工委遵照中共香港分局关于“从普遍发展中组织主力”，以便能够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示，确定以绥江河东、河西部队为基础组成主力第 1 团；以四雍、怀东部队为基础组成第 2 团，每团 300 多人，装备轻机枪 5 挺、长短枪 300 多枝。

1948 年 6 月，国民党粤西桂东“联剿”指挥部，纠集广西、广东省的 2 个保安团及 11 个县的地方武装，兵分 10 路对粤桂湘边区游击根据地展开进攻。并把重点进攻方向从怀南转向广宁四雍

^① 广宁四雍指：广东省文宁县的雍和、雍睦、雍熙、雍宁四个乡。

地区。这时，在广宁地区坚持斗争的仅桂东独立团 500 多人，形势相当严重。粤桂湘边区游击队实行内外线结合的作战方针，展开了反“清剿”作战。

7 月 20 日，粤桂湘边游击队的河东、河西部队，于排沙河与绥江交汇处的扶罗口地区，伏击了国民党船运队和广宁县保警队，毙俘国民党军 29 人，缴获轻机枪 2 挺、长短枪 130 多枝、子弹 30 多箱及其它物资一批。扶罗口作战的胜利，提高了部队的士气，振奋了人心，虽歼敌人数不多，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改善了自己的装备。7 月下旬，广西保安第 7、第 2 团及广宁、四会等县反动武装 1600 多人，对排沙、紫荆坑、大塘山等根据地实行报复性“清剿”，并实行“驻剿”和经济封锁。为反击敌人的封锁，粤桂湘边游击队绥贺支队第 1 团于 7、8 月间，先后于黄岗水、江美坪、排沙地区袭击了国民党广宁县保警队等反动武装，歼敌近 30 人，缴获军粮 2.5 万公斤，并争取了国民党江谷联防大队多名士兵携机枪 2 挺、步枪 4 枝投诚。

9 月中旬，国民党粤西桂东“联剿”指挥部，调集 2500 多人的部队，向广宁四雍地区展开围攻。为避敌锋芒，粤桂湘边区工委决定留桂东独立团和绥贺支队第 3 团各一部，坚持原地斗争，掩护主力转移，边区第 1、第 2 团主力 600 多人转向绥江下游活动。从 9 月 16 日至 23 日，坚持四雍地区斗争的部队与多路进攻之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战斗。终因力量悬殊，被迫于 27 日进入山柏地区。部队进入山柏地区后，整编为 1 个大队 2 个中队，并转向怀南森膺洞坚持斗争。29 日上午，部队在转进中，于坑头地区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虽突出包围圈，但损失较大，指挥这支游击队的粤桂湘边工委副书记钱兴，于 11 月 6 日突围时不幸牺牲。

粤桂湘边区游击队在反“清剿”斗争中，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牺牲指战员 120 多人。歼灭国民党保安团队数百人，缴获轻机枪 14 挺、长短枪 560 多枝以及其它军用物资。游击队由 1948 年初的 1200 多人，发展到 3200 多人，民兵发展到 5000 多人。游击

根据地发展到粤湘边、粤桂边 20 多个县，面积达 600 多平方公里，游击战争也由广宁、四会、清远、德庆、怀集等几个县，逐步向桂东和湘南地区扩展。

（二）粤桂边区游击队的反“清剿”

为打破国民党军对粤桂边游击区的“清剿”，1947 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中共粤桂边区地委在廉江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决定以游击队一部坚持原地斗争，以主力组成 2 支部队，从东西两个方向转入外线作战。东征部队向茂（名）电（白）信（宜）和粤中地区挺进，西进部队转向粤桂边的十万大山地区。会议为此决定组建东征支队和第 2、第 3 支队，欧初任东征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支仁山任第 2 支队司令员、温焯华兼任政治委员，谢王岗任第 3 支队司令员、陈明江任政治委员。

西进部队由遂溪新编第 1 团和廉江独立营以及吴川的光中团和化县的 1 个中队组成，共 500 多人，编 3 个营、6 个连和 1 个便衣队，对外仍称新编第 1 团。随后，将横县转入廉江休整的第 19 团 300 多人也编入西进部队。1948 年 2 月中旬，部队编配就绪后，西进部队在第 3 支队司令员谢王岗、政治委员陈明江的指挥下，从廉江金屋地村出发，沿途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追堵，经博白、合浦、灵山、钦县、上思等地，行程 650 公里，于 3 月中旬抵达十万大山南麓的防城县滩（散）峒（中）地区。西进部队的胜利到达，大大加强了十万大山地区的武装力量。

东征支队由新编第 4、第 3、第 2 和第 12 团各一部，于 1948 年 2 月编成，辖 3 个营 8 个连，共 800 余人。4 月 5 日，东征支队在欧初的率领下，从遂溪县北区下洋村出发，取道廉北东进，先后穿越了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近 10 个县境，历时近 50 天，行程 500 多公里，沿途经历大小战斗 20 多次，歼灭国民党军 160 多人，缴获各种枪支 50 多枝。胜利完成了挺进粤中的任务。

粤桂边区主力执行东征和西进任务后，不仅保存了部队主力，而且还吸走了国民党军 2 个保安团，从而分散了其对付遂溪、廉江

重点“清剿”的兵力，减轻了老区的压力，

1948年4月，留在遂溪廉江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组成第2支队，下辖新编第8、第5、第4和第3团，共700多人，部队经过短期整训后，很快投入反“清剿”战斗。4月9日，新编第8团在骑牛岭地区袭击了国民党保安第2团一部，毙俘其副营长以下28人，缴获轻机枪2挺、掷弹筒1具、枪榴弹筒3具、长短枪32枝、子弹2000多发。5月初，该团突击队再次袭击了遂溪县自卫大队第2中队，毙俘8人，缴获轻机枪2挺和其它军用品一批。

面对国民党军继续以重兵“清剿”粤桂边游击根据地，中共粤桂边区党委为变被动为主动，并解决部队给养的困难，1948年6月下旬，在遂溪洋青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先恢复吴川、化县老区，再南下海（康）徐（闻）开展新区，首先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集中高雷部队袭击湛江赤坎。

湛江位于雷州半岛的东北部，系国民党在南路统治中心，当时驻湛江赤坎的国民党军主要有：广东省保安第10团第2营2个连，保安第2团1个连，湛江自卫大队2个中队200多人，以及赤坎警察局60多人。敌人驻地分散，警戒松懈，利于我突袭。担任袭击赤坎任务的为第2支队，其部署是：以新编第8团担任主攻，首先攻歼保安第10团2个连和赤坎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并以火力封锁商团大楼、老鱼街、培才中学之敌；以新编第3、第4团分别担负对遂溪、西营方向的警戒，阻敌增援。

7月10日2时，主攻部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仅经10多分钟战斗，即将保安第10团2个连全歼，并攻下两家银行，赤坎其它据点守敌害怕被歼，龟缩工事未敢出援。为保持主动，9时许，第2支队撤出战斗。这次袭击作战共击毙国民党军80多人，俘虏70多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7挺、长短枪180多枝、掷弹筒7具、枪榴弹筒11具、炮弹和手榴弹260枝、子弹3万多发，港币2.5万元、国民党钞票3亿多元。第2支队牺牲3人，伤1人。袭击湛江赤坎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也震惊了国民

党广东当局。宋子文急派其亲信张君嵩出任“粤桂南区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10“清剿”区司令，并将广州行辕警卫团第1营调往湛江加强守备。

7月底，第2支队按计划转向化县、吴川地区。从8月到11月初，新编第3、第4和第8团，先后袭击了国民党后坡、三块石、吾良、灯草堡和分界等据点，共歼国民党军230多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机枪7挺、步枪100多枝、掷弹筒2具。12月下旬，新编第4团以“围点打援”的战法，在围攻羊志埔据点时，在一天之内先歼塘缀援兵2个中队110多人，后又集中兵力攻歼羊志埔据点守敌40多人；接着再歼良光和新安、笕桥、官桥援敌40多人。4战皆捷，共歼敌近200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60多枝、子弹18担。这些胜利，为全面恢复化吴老区奠定了基础。

从1948年春到年底，国民党粤桂南区“剿匪”总指挥部先后纠集了广东、广西5个保安团，对十万大山地区的游击队展开重点进攻，粤桂边游击队第3支队针对国民党军的攻势，采取集中主力，乘虚出击的战法，先后作战132次，歼灭国民党军543人，缴获轻机枪9挺、长短枪300多枝。

活动在六万大山地区的粤桂边游击队第18团和第24团先后分成8路，向合浦、博白、钦县、灵山、横县开展游击战争。在半年的反“清剿”斗争中，经过大小战斗30多次，摧毁国民党乡公所20多个。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部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由开始时的1500人，发展到2300多人。

1949年春，粤桂边游击队按照既定方针，在恢复化县、吴川老根据地后，向海康、徐闻地区发展。

（三）桂滇黔边纵队的成立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桂滇黔边的游击战争以云南为主要行动方向。为此，特成立桂滇边工委前线委员会，由庄田、朱家璧、郑敦、杨德华、黄景文为委员，庄田为前委书记。率部队主力向云南进军。为保持队伍精干、减少指挥层次，增强

部队战斗力，桂滇边工委决定将桂滇边部队第1支队与自救军第1纵队合编，朱家璧任司令员，郑敦任政治部主任，黄景文任参谋长。部队仍沿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1纵队”的番号，编为2个支队和1个独立大队。第1支队由何现龙任支队长、祁山任政治委员，第2支队由李炳发任支队长、马仲明任政治委员，独立大队由孙太甲任大队长，进入桂滇黔边的盘江两岸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为策应部队主力向桂滇黔边地区进军，桂滇边区工委决定，由唐森等人带领武工队进入开广地区的麻栗坡、马关、田蓬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周楠、唐才猷、饶华、林杰、岳世华等组成滇桂边指挥所，带领坚持斗争的部队，在中越边界北侧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月18日，部队从河阳出发开始向南盘江南岸挺进。为策应主力渡江，滇东地区第3支队主动出击，在摧毁了国民党陆良、师宗、平彝等县反动政权和武装后，又向泸西地区发展，共歼灭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15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短枪90多枝。

桂滇边前委率主力向南盘江地区挺进后，驻云南的国民党军十分恐慌，遂调整兵力部署，加强渡口设防，同时还派出部队追堵游击队。10月底，游击队进抵盘江南岸格勒，由于国民党军渡口工事坚固，攻击未果。这时，尾追之敌已经迫近，形势对游击队不利。在此情况下，前委决定暂时放弃渡江计划，将部队分散转向丘北、广南、砚山、西畴地区活动，先站稳脚跟打开该地区局面，再寻机渡江向外发展。

格勒渡口作战受挫后，敌人更加趾高气扬，常常孤军进入游击区进行骚扰。11月6日，国民党保安第1团第3营会同反动地方武装600多人，由文山出发，企图袭击珠琳乡。前委指挥独立大队将计就计，9日在敌必经的拉沟塘地区设伏。这次战斗，除敌副营长带2个班逃脱外，其余全部被独立大队歼灭，共缴获轻机枪14挺、长短枪200多枝、手榴弹400多枚、电台1部及其它军

用物资一批。独立大队伤亡 5 人。拉沟塘战斗，是游击武装挺进滇东南地区后，取得的第 1 个胜仗，它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反革命气焰。11 月中旬，独立大队与广南、砚山地区游击武装合编为自救军第 7 支队，孙太甲任支队长、陆毅任政治委员，下辖 6 个大队，共 900 多人。

12 月上旬，庄田率一部兵力南下西畴，于兔董乡地区毙俘国民党麻栗坡县少将督办谢崇奇以下 150 多人，缴获 60 炮 2 门、轻机枪 3 挺、长短枪 50 余枝。游击队仅伤亡 7 人。在此同时，麻栗坡武工队乘机攻占县城，缴获 60 炮 1 门、轻机枪 2 挺、步枪 40 余枝及弹药一批。西畴护乡大队也乘机突袭，攻占西畴县城。

兔董战斗后，庄田、朱家璧率部进到西畴董马地区。12 月 14 日，又于西畴以南之芹菜塘地区歼灭国民党第 26 军第 578 团第 3 营，击毙营长以下 118 人，俘 190 多人，缴获 82 迫击炮 3 门、60 炮 3 门以及其它武器一批。战斗中，游击队伤亡 4 人。芹菜塘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军合围计划，再一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其士气更加低落，厌战和恐惧心理更加普遍，逃亡日增，而我游击根据地的军民则更加欢欣鼓舞，斗志昂扬。

在桂滇边前委率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桂滇边工委书记周楠带领部队在桂滇边和中越边境地区积极出击，先后歼灭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 210 多人，缴获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4 挺、步枪 160 多枝、子弹万余发。

12 月下旬，驻桂滇边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先后撤走，使该地区的斗争形势对游击队更加有利。桂滇边前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扩大战果，攻占广南县城。

广南县位于盘江南岸，它是连结盘江南北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2 月 30 日，庄田、朱家璧率第 1、第 7 支队各一部共 600 多人，对广南县城发起攻击。经 2 小时战斗，解放广南县城，歼灭国民党广南县长以下 200 余人，缴枪 100 多枝、子弹 1 万余发，游击队无一伤亡。广南战斗的胜利，为主力渡南盘

江挺进罗平，建立中心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在桂滇边工委的领导下，前委率部进入滇东南地区几个月时间里，共与国民党军和反动地方武装作战 50 多次，毙俘国民党军和反动地方武装 2 万多人，瓦解和俘虏敌军 1500 余人，缴获小炮 7 门、重机枪 5 挺、轻机枪 55 挺、长短枪 2000 余枝，电台 5 部，解放县城 10 余座，开辟了 20 多个县的工作基础，扭转了该地区的斗争局面。在广西左江地区，游击战争发展到 27 个县的大部地区，建立了 16 个大队 3000 多人的武装队伍。到 1948 年底，云南、广西左右江和黔西南地区的游击队，发展到 1.5 万余人。

1948 年 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战斗在桂滇黔边的游击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1949 年 1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宣告正式成立。庄田任司令员，周楠任政治委员，朱家璧任副司令员，郑敦任副政治委员，杨德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各支队由原桂滇边游击队、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 1 纵队、广西左江指挥部、桂西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以及云南的开广区、弥泸区、罗盘区等地区的游击队编成。第 1 支队，黄景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支队下辖第 1、第 7 团；第 3 支队，杨守笃任代司令员，许南波任政治委员，下辖第 24、第 25 团；罗盘指挥部，辖罗盘第 2 支队、独立支队、警卫支队、黔西南游击支队、罗平北区主力团及 3 个独立大队等，杨江任指挥员，刘清任政治委员；盘北（弥泸区）指挥部由何现龙任指挥员，祁山任政治委员，下辖第 31、第 32、第 34、第 36 团；滇东南（开广区）指挥部唐才猷任指挥员，饶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 8、第 9、第 10、第 11 团和护 5、护 7、护 11 团；桂西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辖第 1、第 2、第 3、第 6、第 7、第 10 支队、邕江支队、武鸣人民抗征团及 5 个大队，赵世同、区镇、余明炎、黄耿为部队负责人；左江指挥部莫一凡任指挥员，黄嘉任政治委员，辖第 3 团及 5 个大队；右江上游指挥部刘包任指挥员兼政治委员，下辖 10 个大队。全纵队共 1 万余人。

第三节 海南岛游击战争的发展

一、琼崖独立纵队坚持海南岛游击战争

海南岛，又称琼崖，面积 3.39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1584 公里，是中国的第二大岛，南疆的重要门户。岛上中高周低，黎母岭和五指山高程均在 1800 米以上，沿海一带多为平原，南部为丘陵，主要河流有南渡河、万泉河、昌化河。海南岛不仅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矿藏资源和森林资源，而且由于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四季常青，世人称之为宝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岛分为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定安、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陵水、崖县、白沙、保亭、乐东共 16 个县，人口 300 万。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海南岛开展了武装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坚持斗争的琼崖独立纵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同国民党军的“围剿”、“清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到 1947 年 4 月，初步建立起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控制的地区占全岛总面积的 40%。中共中央 1947 年 4 月 29 日指出：“海南根据地已在五指山初步建立，是一大胜利”。^①

1947 年 4 月 14 日、22 日，中共琼崖特委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海南岛的斗争情况，并提议召开琼崖党的代表大会。4 月 29 日，中共中央复电指出：“现琼境只六个保安团，在全国解放区继续胜利前面，粤省很难再抽调多少兵力去，惟在你们继续胜利威胁下，反动统治又决不会放松你们，而美英帝国主义又都很重视这一华南的海军根据地。因此，琼崖自卫战争有它相当顺利的条件，同时，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7）第 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0 页。

也有它相当困难的条件，结果，必然要在长期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这就是你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琼崖全区代表大会可根据中央丑东指示^①总方针与当地具体情况，规定出适合于自己环境和力量的发展方针与任务”。^②

1947年5月9日至26日，中共琼崖第5次党代表大会在白沙红毛乡便文村举行。大会总结了反“清剿”斗争以来的情况和经验，通过了关于建设解放区和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以及召开全军代表大会的决议。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琼崖特委改为琼崖区党委，选举产生了中共琼崖区委员会，冯白驹、李明、庄田、黄康、何浚为常委，冯白驹为书记，李明、黄康为副书记。会后，为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任命李振亚、吴克之分任纵队第一、第二副司令员，同时决定马白山任区党委军事部长并负责纵队司令部工作，李明兼任区党委政治部长并负责纵队政治部工作。与此同时，支队领导也作了部分调整，由陈求光任第1支队长、符路任政治委员；陈武英任第2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张世英任挺进支队长、林明任政治委员；潘江汉任第4支队长、吴文龙任政治委员。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直属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

1947年8月，国民党琼岛保安司令蔡劲军不甘心前几次“清剿”的失败，又对琼崖独立纵队实行所谓“清剿新阶段”作战。琼崖独立纵队仍然实行外线出击、内线坚持的作战方针，在海南岛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英勇作战，打击国民党“清剿”军。从8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共歼灭“清剿”军600余人，收复和解放白沙县城及南丰、加来、东山、白马井、安江、美党、北连、牛漏、公馆等9个市镇。蔡劲军终因“清剿”失败，而被广东国民

① 中央丑东指示，指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40页。

党当局撤职。琼崖独立纵队取得了反“清剿”作战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成立，五指山解放区的扩大与巩固

根据中共琼崖党的第5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947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在白沙县毛栈乡，召开了琼崖独立纵队全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全面回顾了部队发展壮大光辉历程；总结了从1938年12月云龙改编以来的经验教训；同时提出了今后部队建设和作战的方针。10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大会以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琼崖纵队立即进行了充实扩编，加强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的建设。整编后的琼崖纵队，冯白驹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振亚、吴克之任副司令员，马白山任参谋长，李明任政治部主任，陈青山任政治部副主任。纵队辖3个总队8个支队。第1总队，李振亚兼总队长和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支队；第3总队，吴克之兼任总队长、政治委员，下辖第7、第8、第9支队；第5总队，陈武英代总队长，吴文龙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3、第15支队。

1947年11月，国民党广东当局任命韩汉英接替蔡劲军，任海南岛保安司令。韩汉英来琼上任以后，除迅速进行扩充兵源、调整部署外，采取“固点、联线、扩面”的“重点防御、相机进攻”的方针，将主要兵力部署于沿海重要城镇，以地方武装据守次要据点和边缘地带，以求先稳住阵脚，再行“步步扩展”。针对国民党军的部署，中共琼崖区党委及时向全区发出了《关于目前情况的分析和应付斗争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地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密切与人民结合，运用过去经验，胜利地坚持斗争，杀伤和吸住敌人”；“在敌人非进攻的地区，集中力量，积极乘虚出击，打垮敌人，一面争取胜利，以策应我们别方面坚持斗争，相互配合和呼应，以达到全部胜利，彻底打垮

敌人。这是我们的方针。”^①

1948年3月4日，活动于临高、儋县、白沙地区的第1总队第2、第3支队，一举攻占临高县城，摧毁国民党县政府和镇公所，歼自卫队30多人。4月，第2支队在临高民兵的配合下，采取昼伏夜袭战术，歼保安第6总队70多人，击毙少将总队长陈瑞章。6月3日，第2、第3支队在白沙县阜龙乡保家村，击毙保安第3总队少将总队长曾杰以下官兵4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炮弹80余发和其它军用物资一批。

第3总队第8支队，于3月12日夜，攻克文昌县中山圩据点，歼灭守敌3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多枝。4月11日，又袭击了琼山县福昌乡公所和塔市盐警队，歼联防队50多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42枝。第9支队，在3至5月间，先后于陵水县三十笠和新村港地区，歼灭保安第7总队1个多排。7月14日，又在保亭白石塘至陵水公路上，伏击歼保安部队1个连，缴获轻机枪5挺、掷弹筒3具、长短枪30多枝。第7支队于6月中旬，围攻定安县蒙头据点，歼灭守敌4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30多枝。

第5总队第13、第15支队和第1总队第1支队，在琼崖纵队参谋长马白山率领下，从5月初开始围攻乐东县城，榆林守备队1个大队3个中队前往解围。5月21日，援军在沿千家公路向乐东行进中，遭到琼崖纵队的伏击，被歼71人，随援军前往乐东就任县长的韩超云被当场击毙。乐东城守敌在发生粮荒后，代县长朱挺英率敌400余人外出抢粮时，为我歼灭166人，缴获高射机关炮1门、轻机枪12挺、长短枪55枝。敌人在待援无望的情况下，于6月6日凌晨弃城逃窜，乐东县境遂全部解放。^②

至此，白沙、保亭、乐东完全连成一片，五指山区全部变成

^①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选集》甲47册，第392页。

^② 《琼崖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页。

解放区。

五指山区全部解放后，中共琼崖区党委和琼崖纵队立即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政权，组织农会和民兵，领导解放区的人民进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土地改革通过试点和减租减息取得初步经验以后，在全岛 8 个县 71 个乡镇普遍展开，农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解放区迅速掀起了生产、参军和支援解放军打胜仗的热潮。在 1948 年中，仅在五指山区就有 2000 多名黎、苗族青年参加琼崖纵队，还有大批青年参加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到 1948 年秋，建立了 4 个专员公署、21 个县政府和 1 个特别区，解放区和游击区占全岛总面积的 4/5，人口约占 3/5。为了减轻解放区人民群众的负担，琼崖纵队号召各部队广泛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并规定每个干部战士每天的生产劳动时间不得少于 1—2 小时。由于开展了生产运动，大部分机关和个别部队基本上做到了蔬菜自给和部分粮食自给。琼崖纵队还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新式整军，提高了全体指战员为解放全海南岛而战的决心与胜利信心。五指山解放区的建立与巩固，为海南岛的全部解放奠定了基础。

三、琼崖纵队发动秋季攻势

进入 1948 年下半年，琼崖地区的对敌斗争形势，如同全国各战场的形势一样大好。琼崖纵队在大量地歼灭国民党保安团队和反动地方武装后，战场形势已经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在琼崖纵队的不断打击下，国民党军被迫将大部兵力撤向主要城镇和交通线上防守。其主要兵力有正规军 1 个旅 3 个团，保安旅 4 个总队及榆林要塞总队等共 8 个团，1.3 万余人。这时，琼崖纵队 3 个总队已发展到 7500 人，另有地方部队 1400 余人，民兵万余人，已掌握了琼崖作战的主动权。

1948 年 9 月初，中共琼崖区党委在白沙县毛栈召开了会议，会议确定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以琼东南为突击方向，首歼陵水地区国民党军；然后横扫万宁、乐会地区国民党军据点，截

断琼岛南北交通大动脉海口至榆林公路，割裂国民党军南北的联系。为加强对这次攻势作战的统一指挥，琼崖区党委决定成立前线指挥部，由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李振亚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参加秋季作战兵力有：纵队直属队（粤江队），第3总队第7、第9支队，第5总队第13、第15支队，共5个支队21个连。配合这次作战行动有第1总队的第2、第3支队和松江队（原第3总队第8支队），其任务是在新民、澄迈、定安地区相机出击，牵制国民党第131旅和琼西地区保安部队；在琼山、文昌地区机动作战，监视琼东北保安部队；第5总队留守部队，牵制琼南国民党军。

秋季攻势从1948年9月17日开始，首战光岭。光岭位于陵水至兴岭之间（兴岭为国民党保亭县政府所在地）。18日晨，琼崖纵队第3总队第9支队佯攻兴岭。驻陵水之保安第7总队先是以2个连的兵力，后又增至600余人，驰援兴岭。19日，琼崖纵队主力于光岭地区歼其1个连（8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长枪30枝、迫击炮弹27发及其它军用物资一批。首战胜利后，琼崖纵队从9月23日至10月2日接连拔除了港坡、乌石、兴隆、牛漏、米瑞塘、中兴等据点，歼灭保安部队200余人。在牛漏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纵队副司令员李振亚不幸中弹牺牲。11月17日，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琼纵副司令李振亚同志于围攻牛漏市战役中英勇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损失”。并号召琼纵全体同志“继续努力，为坚持解放琼崖而奋斗，以纪念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①

李振亚牺牲后，中共琼崖区党委任命纵队副司令员吴克之任前线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部队经稍事休整后，于10月17日和23日，连续拔除万宁县礼纪、贡举据点。11月上中旬，攻克岭门、乌坡、枫木据点。11月22日，包围重要据点中原墟。该点为国民党的2个义勇中队，约150人，依托明碉暗堡固守。23日晚，

^① 《琼崖纵队史》第250页。

琼崖纵队用密集火力掩护爆破手，潜入碉堡脚下，炸毁中心堡垒——四脚堡，歼灭守军 30 人，缴获轻机枪 1 挺、步枪 15 枝。

与此同时，琼崖纵队各地区部队也相机出击，第 1 总队的 2 个支队，先后拔除新民县的大同、海军和澄迈县的坡尾等据点。第 3 总队松江支队，先后攻占琼山县的塔市、埔前圩等据点。第 5 总队留守部队，攻克崖县的九所镇。

秋季攻势于 12 月 20 日结束，琼崖纵队共作战 20 余次，歼灭国民党军 1570 人，缴获轻重机枪 20 挺，迫击炮 1 门，掷弹筒、枪榴弹筒 9 具，长短枪 502 枝，攻克 18 座镇圩和 20 余处据点。1948 年底，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琼崖纵队各总队均进行了为期 2 个月的军政整训，并对部队的编制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各部队都成立了炮兵连和工兵连，总队各支队整编为团。整编后的第 1 总队下辖第 7、第 8、第 9 团；第 3 总队下辖第 1、第 2 和第 3 团；第 5 总队下辖第 4、第 5、第 6 团；松江队改编为纵队独立团。各团的实力都有很大的加强，琼崖纵队总兵力发展到 1 万余人。

第四节 闽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一、闽浙赣边区游击战争的展开

闽浙赣边区，包括福建省的闽北、闽东、闽东北、闽中和闽西北，江西省的赣东北、湘赣边和浙江省的浙南、浙西南等地区。

从 1947 年初开始，闽浙赣边区的游击战争逐步展开。在闽东北成立了“闽浙赣游击纵队”，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委员左丰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捷生任副司令员，下辖第 1、第 2 支队。在古田、罗源、林森组建了“古罗林人民游击大队”。“闽浙赣游击纵队”第 2 支队一部进入南（平）古（田）瓯（建瓯）地区后，与该地区游击武装合编为“南古瓯游击大队”，辖 3 个中队共 150 多人。7 月，闽东北游击大队在屏南梅花地区成立，辖 4 个分队。

在闽中地区成立了“闽中游击纵队”（亦称戴云纵队），黄国

璋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3个中队，6月下旬，部队在五台山和南安八都地区，与仙（游）南（安）永（春）游击队和晋（江）南（安）永（春）游击队会合，3支队伍合编成“闽中游击纵队直属支队”，辖3个中队和政工队。

在闽北地区成立了“闽北游击纵队”，王文波任司令员，6月，扩编为3个分队。先后开辟了崇安的坑口、齐白、桐木关，浦城的青山岗、坪阳、北坑以及上饶的五府岗、封禁山等游击根据地。

在闽赣边地区成立了“闽赣边游击纵队”，沈宗文任司令员，王一平兼政治委员，辖直属支队和4个分队，经过艰苦工作，到7月，在泰宁、将乐等地的杨梅凹、狮子岩、天上岗、盖竹洋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在闽浙边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到1947年7月，发展到100余人，在松溪县吴村乡源头村姚厝成立了“闽浙边游击纵队”，叶风顺任纵队长，辖2个支队、4个分队。纵队成立后，以一部兵力守备基本区，以一部分兵力向外扩展。7月14日，外线游击队袭击松溪林尾（源尾）炮台，歼守敌12人，缴枪14枝。随后转至建瓯，袭击了后山乡公所，歼乡自卫队1个排，缴枪30余枝。8月，游击纵队进入浙江庆元地区，先后袭击了竹口乡公所和龙泉的小梅、曹岭乡镇公所，歼灭了一批反动地方武装，缴获长短枪117枝、布匹3000多丈，破仓分粮30多万公斤，部队发展到130多人。

闽东地区，1947年5月，“闽浙赣游击纵队”第1支队和第2支队一部进入闽东地区后，与闽东地区游击武装合编成立“闽东人民谋生军”，辖2个中队，160多人。“谋生军”成立后，先后攻打七都、八都、洋中、赤溪、虎坝等乡公所。到9月，闽东地区游击队发展到200多人，恢复了屏南、周宁、宁德、福安、寿宁、政和等游击根据地。

1947年6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同意浙南、浙西南由闽浙赣省委统一领导”。这时，浙南地区的游击队已发展到500余人，编成浙南第1、第2、第3县队、江北县队和第10、第13区队，以

及特委警卫队，共7支基干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0月12日，江北县队仅经半小时战斗，一举攻克乐清县白石镇，俘自卫队80余人，缴获轻机枪4挺、长短枪60余枝。10月18日，第2县队袭击景宁小顺歼自卫队1个分队，缴获步枪28枝。接着，又攻克青田县西部重要据点章村。12月28日，游击队又攻克泰顺东北交通要点包垵，歼守敌1个独立分队，缴轻机枪1挺、步枪15枝。经过这些战斗打开了浙南地区的斗争局面。

1947年8月，“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3总队”成立，辖第1、第2大队，共160多人。自救军成立后兵分两路，第1大队向金华、武义、永康地区活动；第2大队向丽水、云和、景宁地区活动。8月29、30日，第2大队袭击丽水县碧湖区公所、警察局和大港头兵工厂，歼守敌一部，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80余枝。10月中旬，第2大队返回缙云西乡游击根据地整训。

二、闽浙赣边区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和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闽浙赣边区人民游击战争的展开，严重地威胁着这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游击队一展开活动，就同国民党军的“清剿”、“扫荡”展开了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福建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分区清剿”失败后，改为省际边区“防剿”和县与县联防“清剿”。经同江西省国民党当局会商将福建邵武、光泽、崇安与江西广丰、上饶、铅山6县划为闽赣联防区。经与浙江国民党当局商定，将福建松溪、政和与浙江龙泉、景宁、庆元等县，划为闽浙联防区。福建省国民党政府计划征兵3万人，拟将全省保警队改为常备自卫队，编成125个中队；浙江省国民党政府在浙南各县成立“绥靖委员会”，整编和扩充县自卫队，计划各县保警要增到5至6个中队。

为巩固闽浙赣边区的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开展闽浙赣边区的游击战争，1947年10月4日，陈毅、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对发展闽浙赣地区的游击战争，提出了重要意见。他们认为，“浙

东区，应以发展天目山、大盆山及其周围为目前任务”。“浙南龙跃地区，除巩固现地打通与处州（丽水）区之联系外，应以浙西南之泰顺、景宁、云和、庆元、龙泉、遂昌方面发展，以求得与胡明地区^①打通联系”。“福建除进行广泛之发展外，应以得力之一部力量向南平、建瓯、建阳及崇安、浦城方向发展，以求得造成将来闽浙赣皖边之大基地”。陈、粟指出：“目前各区之游击战争不在调动江北敌人配合江北反攻，而在发展与扩大自己。因此，既不要过分刺激敌人，引起敌人之布置清剿，但亦不要保守不动，怕引起敌人的进剿，而应是对敌重要城镇采取隐蔽发展方式，对敌不甚重视地区及薄弱之区，则积极进击，只有如此才不至引起敌人大的清剿，但又能锻炼自己，解决与扩大自己的武装”。^②

10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复电陈毅、粟裕，同意陈、粟“关于闽浙赣皖等省游击战争发展方向与方式的几点意见”。同时指出，“闽浙赣党委目前应采取放手发动群众游击战争的方针。游击战争已经发起地区，应广泛发动群众，反抽丁、征实、抗捐，开仓济贫等斗争，组织群众并依靠广大群众来巩固边疆和扩大胜利，对发动游击战争各种条件已经成熟地区，应放手大胆发展游击战争。对游击战争条件尚未成熟地区，应深入群众，进行各种耐心准备工作”。

这年10月，闽浙赣区党委就游击战争发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共华东局。报告说：“我们接受中央指示发动游击战争已半年，始将武工队分散发动群众”，“各地游击战争相继发动，除闽中损失外均获胜利，但胜利并不大，目前敌人积极进攻，除闽东北坚持游击战外，其他地方均已分散发动群众”。经过游击战争实践，闽浙赣区党委获得以下经验教训：一是，“我们认识了游击战争是

① 胡明地区，指皖南游击区。

② 陈毅、粟裕：《对发展长江以南地区游击战争的方针和方向的意见》，1947年10月4日。

人民自己的战争”。因此，应“从群众生存着手”；“游击队发展须由群众基础大小决定，随群众斗争发展而发展”；“游击队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游击队应尽量发动群众自己行动”；“游击队组织需要注意人民合法武装建立”，“不可把本地生长的武装全部调走”。二是，“我们认识了游击战争是与各种人民斗争形式相配合相交替向前发展的”。三是，“我们又认识了游击战争必须与学习结合克服经验主义”。中共华东局于12月29日致电闽浙赣区党委，认为区党委“对闽游击战争总结很好、很正确”。同时强调指出：“闽省游击战主要的缺点是群众基础不宽广，而基础之不广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联系的经济斗争，缺乏充分的群众路线”。^①

1948年1月19日，闽浙赣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闽浙赣省委为展开广泛群众性游击战争，恢复与建立民主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现在游击战争已进入发动游击战争到恢复建立民主根据地的进攻阶段。“不过由游击战争到建立民主根据地，彻底推翻地主阶级压迫，目前我们尚不能一下子达到，因此必须灵活的执行”。大体可分为两个步骤：1948年秋季以前，实行部队地方化，普遍建立党，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反动基础——地主阶级，特别是反动地主、反动地主武装、地方恶霸，实行抗租抗债，分发地主财产，摧毁下层部分反动政权，以及抗丁抗粮，恢复与建立部分下层民主政权；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从农民地方武装中，成立主力部队，实行分田废债，粉碎敌人进攻，建立巩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与根据地。

闽浙赣边区游击队根据省委制定的斗争方针，针对国民党军的“清剿”，采取了积极进攻的手段，以巩固老根据地和开辟新的游击区，游击战争蓬勃展开。

^① 中共中央华东局：《福建游击战争的主要缺点和今后应采取的方针》，1947年12月29日。

闽东北地区，在国民党军“清剿”的严重形势下，由于加强了领导，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仍取得较大成绩。1948年4月，游击纵队在建瓯天洋和古田平湖溪歼灭保安团数十人后，进入南（平）古（田）瓯（建瓯）边区，在100多个乡村领导群众开展除霸分粮和反“三征”的斗争，先后除掉100多个恶霸，分粮1.26万余担，在游击区内普遍建立了贫农团、农会和民兵组织。6、7月间，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4、第5团及水上警察总队各一部约500人，采取“长期驻剿”、“步步为营”的战术，实行“三光”政策，先后烧毁了古田、屏南、政和的10余个村庄，杀害大批无辜群众。为反击国民党军的“清剿”，游击队袭占古田石坑据点，歼灭保安队1个排，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3枝。9至10月，游击队积极出击，先后袭击了平湖、凤埔、炉下、鸠源、埂埕、洋后等国民党乡公所，打退了国民党保安团的多次反扑。到1948年底，在闽东北地区已建立起20余个乡的民主根据地。

闽赣边地区，1948年初，闽赣边游击队遭国民党军袭击，游击队司令员沈宗文被捕，游击队损失较大。3月，中共闽赣地委改为闽西北工委，由工委书记林志群兼游击队司令员、政治委员。5月，闽西北游击队分编为8个武工队，从事深入发动群众的工作。中旬，武工队攻克沙县富口乡公所，歼灭乡自卫队，缴枪10余枝。随后，又攻占盖竹、高桂乡公所，歼反动武装47人，缴枪60余枝，解救被关押群众20多人。到这年底，初步形成了南（平）沙（县）尤（溪）和南（平）沙（县）三（元）两块游击根据地，闽西北游击队也发展到400多人。

在闽中地区，闽中地委认真总结了1947年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决定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同时积极组建闽中地区的游击队主力，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经过艰苦奋斗，到1948年上半年，基本恢复了平潭、福清、长乐、林森、永泰、闽清、尤溪等部分地区的工作，并且组织了4个工作队和武工队向莆田、惠安地区展开。游击队先后袭击了江

田、渔溪、海口、兰圃、涵江等乡镇公所和重要据点，镇压恶霸、反动头目 200 余人，开仓 10 余座，分粮 1 万多担。11 月，闽（清）永（泰）游击队成立。到年底，初步形成了以莆田为中心的山区游击根据地，和泉州的安海、英林、塔头、石狮，南安의官桥、诗山、洪濑，惠安的涂岭、山腰、崇武、东岭、张坂等游击根据地和游击据点。^①

闽浙边地区，从 1948 年 2 月起，游击纵队分路出击，一路活动于庆元县部分地区；一路活动于政和、寿宁边境地区；一路活动于政和外屯乡，发动群众，摧毁保甲，建立了以宝岩为中心的天柱、茶溪、黄岭坑、外厝、下坪等 40 多个乡村的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先后进行了筠竹坑、富屯、天柱山、梅厝、后山、后坑等战斗，歼灭反动武装 60 余人，缴枪 20 余枝、子弹 4000 余发。游击纵队发展到 170 多人。

中共闽北地委为适应游击斗争形势的发展，于 1948 年 5 月将原设的 3 个工委重新调整为：上（饶）广（丰）崇（安）工委、上（饶）铅（山）崇（安）工委和崇（安）铅（山）工委。游击纵队采取武工队的斗争方式，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除恶分粮，摧毁保甲等斗争，并主动袭击铅山的英将、平阳，上饶的黄坑、花厅等乡镇公所和其它据点。据 1948 年底的统计，在闽北和赣东北地区，游击根据地的范围已达 300 余个乡村。

1948 年 3 月，浙江省国民党当局采取“改进政治、配合军事清剿”的方针，向浙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中共浙南特委采取以部分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主力跳到外线打击敌人。2 月 11 日，平阳县队攻克平阳县山门街据点，歼 1 个保安分队。3 月 12 日，青景丽县队于泰顺金山岭歼灭国民党永嘉团管区第 3 中队，击溃押运装备的国民党 1 个加强连，缴获机枪 1 挺、步枪 10 余枝。3 月 16 日，瑞安第 1 县队全歼永嘉县 1 个警察所 40 余人，缴枪 42 枝。

^① 《中共闽浙赣边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2 页

特委警卫队，于18日攻入瑞（安）平（阳）边的湖岭脚据点，歼保安队1个分队，随即又攻歼瑞安南区重镇仙降警察所。括苍支队，于4月1日全歼岭头村永嘉自卫队第1中队，俘虏70余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50余枝。在5至9月的斗争中，浙南游击队歼灭国民党浙江省保安第2团2个连另2个排和3个保安中队。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大，据国民党永嘉团管区1948年9月统计，游击武装控制了永嘉、瑞安、平阳、泰顺、文成、青田6个县的129个乡镇，约126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浙南游击战争的扩大，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浙南地区的反动统治。9月中旬，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集中了5个团10余个营的兵力，对瓯江南北地区实行重点“清剿”。10月8日，浙南游击队采取伏击战法，于青田县黄垟村歼灭保安第5团第2营营部及第6连，毙伤15人，俘虏43人，缴轻机枪4挺、步枪40余枝、电台1部。11月5日，游击队强攻乐清县东部虹桥镇，全歼保安第4团第2营营部及第8连，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25枝、电台1部。11月28日，游击队又采取伏击战法，于平阳县晓坑岭歼灭保安第2团第1营营部及机枪连一部，计击毙12人，击伤15人，俘虏35人，缴获轻机枪3挺、长短枪19枝。经过这3次作战，浙南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清剿”。

11月25日，经中共闽浙赣省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宣告成立，龙跃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郑丹甫任副司令员，胡景斌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第2、第3支队和独立大队、警卫大队，

在浙西南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于1948年4月恢复了“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3总队”的番号，下辖2个中队。“自救军第3总队”成立后便集中主力100多人，攻打缙云、云和两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缴枪100多支。8月19日，“自救军第3总队”主力袭击缙云县双溪口据点，俘联防中队长以下29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0多枝。在丽（水）武（义）宣（平）边区和云和地

区的“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3总队”第2大队积极活动，袭击保安队，破坏敌交通和电线。9月，“自救军第3总队”改称“浙南人民解放军第3支队”，同时将全区游击队编为5个大队和1个独立中队，共500余人。部队经过整编后，士气旺盛，战斗力大为提高。到1948年底时，游击武装发展到810多人^①，民兵发展到数千人，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到1948年底，闽浙赣边地区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得到较大发展。据中共中央军委一局统计，活动在以青田、平阳、瑞安、泰顺、景宁为中心的浙南地区的游击队发展到1200人，轻机枪42挺；闽西北以沙县地区为中心，有武装50人；活动在以缙云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的游击队有200人，轻机枪6挺；活动在以南平、古田、建瓯、政和为中心的闽东北地区的游击队有600人，轻机枪7挺；活动在以长乐、莆田、晋江为中心的闽中地区的游击队有100人，轻机枪2挺；闽西北以沙县地区为中心的游击队有50人；活动在赣东和闽北的崇安、上饶、广丰地区的游击队有100人，机枪3挺，总计2300人左右，轻重机枪60挺^②。1949年2月，中共闽浙赣省委所属各游击队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曾镜冰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贵芳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左丰美为副政治委员，黄辰禹为政治部主任。

第五节 苏南和皖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一、苏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苏南地区，位于江苏省的南部，北沿长江，南连浙江，东濒东海，西接安徽。其西部和西北部为宁镇山地和茅山丘陵，其余皆为冲积平原。域内河湖交织，水陆交通便利，经济文化发达。

^① 《中共闽浙赣边区历史》第484、485页。

^② 中央军委一局编：《闽浙赣游击区概况》，1949年2月20日。

全面内战爆发后，由于该地区地处国民党京沪统治中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各地武装受地区条件限制，处于独立分散的发展状态。宁沪铁路以南地区为中共苏浙皖边区特委领导，下设太（湖）溇（湖）工委和茅山工委。太溇工委负责领导武进、宜兴、太湖、金坛地区，游击队共约 120 人；茅山工委领导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横山、溧阳、茅山地区，游击队共约 160 余人。宁沪铁路以北地区，为丹北中心县委（属中共苏中 2 地委），领导澄（江阴）西、武进、丹阳、镇江地区的斗争，有游击队 100 余人；宁沪铁路以东为路东中心县委（属苏中 1 地委），领导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和苏州、常熟、太仓两个工委地区的斗争，游击队共约 100 余人。淞沪地区设有淞沪工委（属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委领导），下设浦东、浦南、青浦、嘉定、宝山、松江、淀山湖等地区特派员，具体领导各地区的斗争。从 1945 年下半年至 1946 年底，国民党先后调集了大批正规军，在地方保安团队的配合下，对苏南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清剿”，坚持苏南地区的游击武装被迫转入隐蔽发展。

1947 年上半年，为加强对该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共华中分局决定将苏浙皖边区特委改为苏浙皖边区工委，并将分散活动的游击武装进行了集中，积极对敌展开袭扰。6 月间，太溇工委在积极开展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进行“三抗”（抗粮、抗收捐、抗抓丁）斗争的同时，还组织起一批农会，打击和镇压了一批特务和横端反动分子。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除茅山地区的斗争遭到挫折外，其它地区的形势开始好转，建立了一些游击基地，恢复了锡（无锡）西、长（长荡湖）溇（溇湖）、溧阳、丹（阳）金（坛）武（进）等部分地区的工作。1947 年 6 月下旬，苏中区党委重建第 10 地委，负责领导路西丹（丹阳）北、澄西、镇江、句容地区的斗争和茅山地区的恢复工作。路东的苏常太、澄锡虞地区暂由苏中区党委直接领导。

坚持淞沪地区斗争的游击队 1947 年上半年，先后袭击了航

头、宣家桥国民党军据点，缴枪 30 余支，影响很大，并组建了 50 余人的基干连。接着袭击了奉贤县高桥、泰日桥国民党军据点，此后，一部转向青浦开辟新基点，一部进入浦东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坚持斗争。

1947 年下半年，坚持苏南地区的游击队克服种种困难，广泛开展游击活动，给国民党造成很大的威胁。为加强对该中心区的控制，国民党除增调 1 个混成师和青年军 2 个团以及 2 个保安团，担负苏南地区“清剿”任务外，还将各县保安队和警察改编为保警大队，与国民党特务武装勘建队，分驻大小集镇配合“清剿”，并在路南、淞沪和路北地区分别成立了“清剿”指挥机构，以“驻剿”、“会剿”和“连保连坐”、“移民并村”等手段，妄图一举消灭游击队。在国民党军严重“清剿”形势下，游击队主要采取合法斗争形式，领导群众开展“三抗”，同时适当并区并组，减少公开活动，以“静”对“动”，巧妙与敌周旋，寻机打击敌人。8 月，太湖地区游击队配合边区基干连，袭击了国民党宜兴长岭据点，全歼江苏省保安队 1 个连。在平原水网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则利用合法斗争手段，积极开展锄奸活动，镇压反动分子 20 余人，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

在此期间，路北地区在第 10 地委的领导下，整顿了党的组织，加强了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并组建了精干的武工队，逐步摆脱被动的斗争局面。

在茅山地区，1947 年 8 月，茅山工委成立后，除进入茅山地区积极开展斗争外，同时组织了 30 余人的武工队，分散活动于句容、丹阳、金坛、武进之间地区，创建游击据点，开展武装斗争。

1948 年 3 月，路北地区游击队和武工队采取内外线结合的办法，与国民党“清剿”军展开斗争。澄锡武工队两度进入国民党据点，击毙即将出任“剿匪司令”的反动分子，震慑了敌人。5 月，为加强对整个路北地区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了以管文蔚为书记的华中江南工作委员会。此后，苏中军区第 1、第 2、第 9 军分区

也相继成立了江南工作委员会。其中第1军分区的江南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澄锡虞及澄西、武南地区的斗争；第2军分区江南工作委员会领导丹北、镇句（包括茅山）地区的斗争；第9军分区江南工作委员会领导苏常太地区的斗争。

在淞沪地区，1947年7月以后由于加强了领导力量，游击战争逐步展开，先后袭击了国民党塘桥、章堰据点，缴获长短枪10余枝，建立了基干队2个班和3个武工队，扩大了活动地区。11月，浦东地区武工队袭击了南汇县万祥镇国民党军1个连，缴获机枪步枪10余枝，以缴获的武器建立了第2个基干连，成立了“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在金山、松江地区还建立了两个武工队。这年冬，国民党青年军一部在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对该区发起“清剿”，游击队被迫再次转入隐蔽斗争。1948年4月，浦东游击队袭击了国民党自卫队陈家桥据点，摧毁该乡公所。在打击反动武装的同时，游击队还积极开展敌军工作，5月14日，南汇县大团镇国民党常备第3中队和马厂、泥城、书院等乡自卫队共130余人举行了起义。之后起义部队随浦东基干连转向浙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5月中旬，浦东游击队配合活动于横沔一带的武工队，袭击了川沙县王家港国民党军据点，并利用缴获的武器建立了新的基干连。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在全国战场上接连遭到沉重打击后，为加强对京沪地区控制，调集大批军队进入苏南沿江沿海地区增强防御，坚持苏南地区的游击队也进入空前紧张的斗争环境。根据斗争形势，苏南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决定利用国民党军内部动摇恐慌的心理和广大人民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国民党反动地方武装和基层政权。

路南地区的游击队，为发展太滬地区的形势，集中地区基干连和武工队，主动对敌展开攻击，先后摧毁杭村、砖桥、山北等国民党军据点，巩固了宜（兴）溧（阳）山区游击基地，到1948年底时，苏皖边区的宜（兴）溧（阳）广（德）地区连成一片。

在路北地区，游击队仍主要以组织群众开展“三抗”和锄奸反特、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巩固敌后斗争阵地。

在淞沪地区，基干连和各地武工队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跳向边缘地区与敌周旋，寻机打击地方反动武装，从而保存和发展武装力量，开辟了浦东与浦南纵横百里的游击活动区。

到1949年3月，路南地区形成了以宜南山区为基地，武工队发展到300多人；太湖基干武装发展到2个连，并在宜兴、溧阳、武进3县建立了办事处，大部乡村基层政权为游击队控制。路北地区的丹北武工队和游击武装发展到140多人，活动地区扩大到60多个乡镇，控制了这一地区大部分国民党乡保政权；茅山地区游击队发展到70多人，并建立了5个区政权；澄锡虞地区的游击队发展到150多人；苏常太地区的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太湖地区的游击队发展到80多人，淞沪地区的游击武装发展到300多人。

二、皖南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

安徽简称皖，全省由三个地区组成，淮河以北为淮北，又称皖北，江淮之间为皖中，长江以南称皖南。皖南西北部地区濒临长江，与皖中隔江相望，东北界江苏，东南与浙江省毗连，西南与江西交界，全区共23县，人口410多万。皖南为低山丘陵地，黄山山脉横亘全区，青弋江、水阳江中下游和南漪湖地区较为平坦。由于该区位于京沪侧背，又当苏浙赣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经是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战场之一。

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集中兵力对解放区发动进攻，在皖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全部北调，只留下不足3000人的保安团队驻守。中共地方党组织乘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三抗”斗争，仅泾（县）绩（溪）两地，就有4万多人参加了斗争。各地游击武装则积极开展打击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反动武装，在4至10月间，先后袭击了茂林、章渡、赤滩、松德、江枝、甲路、鲤鱼、西坑、杨溪、伏岭、登城、周王村等乡镇公所20余处，一度还攻占了绩

溪县城。5月30日，游击队于开门岭地区，一举伏歼了该县自卫队1个分队，毙俘3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30多枝。7月以后，又接连打下蓝田、龙门、木镇、榔桥、河峨岭和泾县茂林、黟县渔亭。游击队的活动地区迅速扩大到西至太平、石埭、东流，南到歙县、淳安，并继续向沿江和赣东北地区发展，形成了纵横250余里的游击区。建立了黄西（包括太平、石埭、休宁、黟县），铜（陵）青（阳）贵（池）、南（陵）繁（昌）芜（湖）3个中心县委，游击武装发展到3000人。

194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皖南地区党组织：“目前刘邓已完全控制大别山，陈谢控制豫西，长江以北地区大部为我控制，这使全国局势起了基本变化。”“皖南正是处在这种历史发展的重要的战略基地，正因为如此，应估计到敌人可能不久会对你区压迫，防我南渡，但同时也应估计到广大群众会因隔江群众翻身解放而更加起来积极斗争，反动势力更加紧进攻革命势力，……这便是今后皖南局面的主要特点。你们的任务就在乘此时机加紧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创造根据地，以便粉碎蒋匪之进攻，同时为将来主力南进准备基地。”为此，华东局要求皖南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在大力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三抗”的同时，抓紧游击队的发展和整训，深入向敌人的薄弱地区发展，建立游击根据地和解放区。^①

游击队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反抗“三征”斗争的高涨，威胁着国民党在皖南地区的统治。从1947年10月底开始，国民党调集正规军2个营和1个保安大队，在各地反动武装的配合下，首先对泾（县）南的茂林和太平、屯溪地区展开重点“清剿”，并随着“清剿”地区的不断扩大，又增调了正规军3个团和2个保安大队参加“清剿”。为避敌锋芒，游击队除留部分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外，

^① 中共中央华东局：《对皖南地区目前工作的指示》，1947年10月2日。

主要兵力转向歙南、婺（源）休（宁）边区和祁门东流山外线地区发展。在3个月的反“清剿”战斗中，游击队先后摧毁8个国民党乡镇公所，歼灭国民党军和反动地方武装20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120多枝，游击队伤亡40多人。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加强了对南部山区的控制，并在屯溪成立了联合“清剿”机构。游击队为争取主动，积极与“清剿”军进行周旋，寻机打击敌人。10月，在婺源边地区全歼国民党军1个排，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0多枝。11月10日，又于茂林南山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446团第1营大部，毙俘100多人，缴获60炮1门，轻重机枪各2挺、冲锋枪2枝，长短枪40枝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反“清剿”斗争以来的最大胜利。

在苏浙皖边地区，1947年上半年，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抓住该地区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有利时机，在积极发动宣城、广德和郎溪地区的人民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的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从4月到10月，先后缴获轻机枪8挺、步枪100多枝，利用缴获的武器，组建了3个机动连和各县武工队。1947年10月，国民党集中第63师1个团，在皖浙保安团队5个营和20多个县乡自卫队的配合下，对宣（城）郎（溪）广（德）地区开展连续3次较大规模的全面“清剿”。在反击国民党军第一、二次“清剿”作战中，游击队转向广（德）宁（国）孝（丰）边地区，连续摧毁7个国民党乡镇公所，缴获步枪90多枝，打开了该地区的工作局面。但在第3次反“清剿”斗争中，由于思想麻痹，被国民党军包围，伤亡30人。1948年4月，国民党正规军调走后，游击队以2个月的时间，集中力量恢复了广宁孝地区工作，8月初，又派2个机动连进入宁（国）昌（化）於（潜）孝（丰）边地区，在当地武工队的配合下，打开了该地区的工作局面。

从1947年6月至1948年11月，在1年半的时间里，皖南地区游击队共毙俘国民党军及反动地方武装650多人，缴获60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2挺、冲锋枪2枝、长短枪474枝，游

击队伤亡 80 人，损失轻机枪 3 挺、步枪 90 枝。游击队发展到 28 个连，加上各县武工队，共 2600 人，建立起青（阳）铜（陵）边、繁（昌）新（华）边、泾（县）青（阳）南（陵）边、泾（县）宁（国）宣（城）边、泾（县）旌（德）边、九华山、绩（溪）歙（县）边、婺（源）祁（门）边、太（平）石（山）边和宣（城）郎（溪）广（德）边、广（德）宁（国）孝（丰）宣（城）边、天（天目山）西区、广（德）北等共 15 块游击根据地和活动区。^①

※ ※ ※ ※

南方游击战争的发展，沉重地打击和严重威胁了国民党在南方各省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军在这些省份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以北的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游击队在一年多时间里，同国民党军进行较大战斗 1000 多次，共歼灭敌人 2 万余人。游击队由 1947 年初的万余人，发展到 5.4 万余人。他们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与当地人民群众建立了很好的联系，这对于尔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执行解放南方诸省的任务，将发挥重大作用。

南方游击战争之所以有如此迅速发展，首先因为有中共中央的关怀和适时地指明斗争方向，并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从而使南方游击战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其次同解放战争形势密不可分。南方游击战争是解放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北方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将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消灭国民党军，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把分散在南方各省本来为数不多的正规军也调向北方主战场，使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因而给游击战争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三，游击战争的领导者、指挥者，中共南方诸省的各级组织，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运用灵活机动的游

^① 中央军委一局：《1948 年 5 月至 11 月江南游击战争情况》。

击战术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清剿”，建立游击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成为巩固的解放区。在斗争中，游击队运用人民解放军行之有效的教育训练方法，建立健全政治机构，加强军事训练，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使游击队向正规军方向发展。

本卷结语

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伟大成就及胜利原因

从1947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战略计划，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到1948年7月，历时13个月，胜利地完成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和继续在内线作战，收复失地的任务，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13个月作战中（包括睢杞、襄樊、晋中、保北4个战役的战绩），人民解放军共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非正规军168.4万余人，其中，争取起义者2.8万余人，俘虏106.4万余人，毙伤58.2万余人，击落击伤飞机85架、坦克55辆。歼灭国民党军2个兵团部、2个绥靖区司令部、2个整编军军部、25个整编师师部、81个整旅。击毙、生俘国民党军少将以上军官201名。到战争第二年结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下降至365万人，如果除去1948年7月被歼灭的兵力，那么，它的总兵力已不足365万人了。

同时，人民解放军收复与解放土地面积15.56万余平方公里，使解放区面积达到235.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解放人口3700余万，使解放区总人口达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7%。解放和收复县以上城市182座，使解放区的城市达604座，占全国2009座城市的30%，其中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7座，有的是有军事、政治、经济意义与国民党军强面设防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占领，与解放军的转入进攻一样，大大地改变了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也大大地改变了全国和全世

界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前途的认识。”^①

人民解放军除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与收复大片失地外，这一年“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七个军区，并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②东北解放区的巩固与扩大（其面积为148.95万平方公里），不仅使人民解放军摆脱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不利战略态势，并使解放战争获得了战略上巩固的后方；而新的中原解放区的建立与日趋巩固（其面积为23.74万平方公里），就使中原地区由原来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现在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对解放战争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胜利。

上述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地判断了战争形势，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制定了正确的战略进攻计划，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和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领导者能够结合本战区实际，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战略总方针和十大军事原则的结果。尤其是由于坚决执行了外线作战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一方面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从而使解放区得以广泛地联成一片，并恢复相对的安定，以便完成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建设，加强支援前线；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从根本上撼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广了革命斗争的规模和影响，造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③

其次是同人民大力支援、配合分不开的。毛泽东指出，“人民

① 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1948年7月29日。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

③ 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1948年7月29日。

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① 转入战略进攻以来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论断。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放区人民参军参战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热情空前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刘邓、陈谢两军南征时和到达大别山、豫陕鄂地区后，由晋冀鲁豫解放区支援的各项物资、经费，折合小米约 10943.5 万公斤。山东解放区人民支援南麻临朐、胶河、莱阳、胶济路西段、中段以及兖州等 6 个战役的民工总计 173.5 万余人。东北北满解放区 1400 万人口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 750 万人，在 1947 年上交的公粮占总收入的 50%。这些不完整的数字，充分说明了解放区人民对战争的支援。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大规模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卖国的人民革命运动，长江以南各省的游击战争，均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其三是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的结果。在战争中涌现了“临汾旅”、“潍县团”、“洛阳营”、“洛阳连”等英雄集体，和董存瑞、刘四虎、魏来国、张明、王良虎等等战斗英雄和模范共产党员。在作战中，9 万余名指战员英勇牺牲，39 万余名光荣负伤。这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人民子弟兵，将永垂千古。

二、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特点和主要作战经验

（一）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战略指导上的特点

1. 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是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转为优势，就以主力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战略进攻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在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还没有过战略进攻，长时期以来是敌人的战略进攻，自己处于战略防御。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46 页。

战争史上,战略进攻通常是防御一方已将进攻一方的进攻打退,并且在兵力上已由劣势转化为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却打破了这个常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战略防御阶段交战双方各种条件的发展变化为着眼点,把战略进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综合起来考察,认为,1947年7月至9月,是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最恰当时机。这是因为全国解放战争经历一年之后,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虽尚在继续,国民党军的兵力、装备仍占优势,但确实发生了三个主要变化:一是由于国民党军深入解放区,人民解放军赖以支持长期战争的基本区域缩小了,人力、物力资源不足与战争需要之间的矛盾已越来越突出,要转换战局,迫使国民党军全线转入防守,单靠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在内线歼敌,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最后可能遭致挫折。二是战争之初交战双方那种强弱悬殊情况,已经有较大改变,且解放军的机动兵力已超过国民党军。而国民党军的战略后备力量即将枯竭,其战线过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锐,它的几个战略集团已被分割,有的完全处于防御,有的深陷解放区包围之中,其攻势已呈强弩之末,后方空虚的弱点明显暴露。三是蒋介石统治集团已处于“全民包围中”,遭到解放区人民与国民党区人民的夹击,政治上空前孤立。

以上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说明,人民解放军必须调动敌人的兵力出解放区,以保持解放区基本区域,逐步恢复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方能支持长期战争。第二、第三个变化证明,人民解放军已有条件结束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在战略进攻中大量歼灭敌人,开辟新解放区,也就是说,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解放战争打了一年之后,“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

使我们要早反攻。”^①战争进程表明，选择这个时候转入战略进攻，“是恰当其时的”^②。

2. 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不是直指国民党军实行重点进攻的主力集团，而是指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战略纵深和关系其统治安危的腹心地区，即指向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这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依据当时的战略态势，既着眼于最能对战略全局立即产生重大影响，又有成功把握的正确选择。当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时，反而将自己置于不利的战略态势，主力部队陷在陕北、山东两战场，东西两翼不能相顾，连接两翼的战线中央兵力空虚。毛泽东谈到战略进攻方向选择时，打着手势形象地说：“蒋介石两个拳头（指陕北和山东）这么一伸，他的胸膛（指中原）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③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挺进中原，不仅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 160 多个旅中约 90 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为配合陕北、山东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迫使国民党军全面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而且，在江淮河汉区域，人民解放军立足生了根。中原全区的解放为时已经不远了。

3. 战略进攻不是采取正面一线平推样式，而是以主力不要后方大胆向敌人空虚的战略纵深跃进的样式。

在以往的战争史上，战略进攻通常采取正面进攻，一线平推的样式，即是有依托地逐步向敌方区域前进。例如，中国 1926 年 7 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就是依靠广东省后方，分路向北，逐城、逐地前进。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没有采取这种样式，而是避开敌人战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3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第 97 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83 页。

略要点，以主力远远脱离自己的后方，向敌人战略纵深千里跃进。由于是不要后方的跃进，因此风险很大，困难很多。因而为一般战争指导者所不曾采取。人民解放军之所以采取这种样式，一是自己在数量上、装备上仍是劣势，在没有能力逐一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的情况下，向敌人守备力量薄弱且极为敏感的腹心地区及其后方的广大乡村和小城市实施战略进攻，则是发挥人民解放军进攻和机动优长的极好场所。二是人民解放军因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这支军队走到哪里，只要有人民，就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援，在哪里立足生根。更何况鄂豫皖边区曾经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过土地革命与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地区，共产党在这块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种子，人民是衷心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毛泽东对这种跃进式进攻曾给了高度评价。他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大别山方式是好的，好处把牛牵走了，此种政策甚为正确，胜利很大。

4. 战略进攻实行“三军挺进、两翼牵制”，内外线作战相结合的部署。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是孤军向国民党统治区前进，而是采取了三军挺进，两翼牵制，内外线相互配合的部署，即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先战鲁西南，后跃进大别山；然后，陈粟大军在东，陈谢集团在西进行配合，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形成“品”字形的阵势，互为犄角；陕北、山东两战略区军队分别攻击当面之敌，使其不能回援中原；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展开攻势，歼灭敌人、收复失地，配合外线出击。刘邓大军在优势敌人的“围攻”情况下，仍然能够在大别山立足生根，这种进攻部署起了重要的作用。组织实施上述协同配合的基础，是各独立活动的野战军或野战兵团或野战部队，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战略目标，即全力支援配合三军转入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这个共同目标下，中央军委赋予了各个战略区及外线兵团具体而明确的任务。因此，内外线野战军，中原三军和大

别山内外线部队，都能发挥各自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全局利益出发，做好战略上、战役上的密切协同，使敌人顾此失彼，完全陷入被动。

（二）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作战的主要经验

1. 根据力量对比的变化，选择作战目标和确定战役规模。

如前所述，人民解放军是在兵力与装备还居劣势的特定条件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因此，作战目标的选择，战役规模大小的确定，直接关系战略进攻的胜负。遵循《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关于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等原则，在战略进攻初期，在内线作战的部队，以歼灭敌人1个师（整编旅），夺取小城市、中等城市，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为主。在外线作战的部队，采取先占广大乡村及小城镇，以歼灭敌小股正规军及大批保安团、地主土匪武装为主，力求每次歼敌1个团、2个团，至1个旅为目的的伏击战、奔袭战等小规模运动战，对敌之主力部队则暂时避其锋芒，不过早同它作战，同时也不去攻打敌人守备坚固的城市与据点。这样既歼灭了弱敌，广占了地盘，开辟了战场，“奠定了品字阵势的基地”^①，又拖疲削弱了强敌，孤立了敌之坚固据点与城市，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自身的壮大，作战条件的逐步改善，和国民党军兵力的削弱而不得不转入分区防御时，人民解放军则扩大战役规模，从一次歼敌1个整编师（军）扩大到歼敌几个整编师（军），如豫东战役、晋中战役那样规模的歼灭战；从夺取县城到夺取有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如开封等。

2. 力求运动战，同时注重阵地攻坚战。

“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②人民解放军转

① 《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4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7页。

入战略进攻后的 13 个月作战，进行了重要战役共 49 次，其中运动战战役 25 次，阵地战战役 16 次，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战役 8 次。运动战战役占总数的一半，仍然是歼灭国民党军的主要作战形式。这是因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时，国民党军依然在兵力、装备方面占优势，并加强了城市的防御设施，而人民解放军特别缺少攻坚兵器，还不能主要靠阵地战逐城逐地的同国民党军较量，而运动战就能扬己之长，攻敌之短，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消灭敌人，保存、发展壮大自己。实施运动战，关键在歼敌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时，因此，必须善于调动敌人、捕捉战机。其主要手段，一是实行宽大机动，迫使敌人往返调动，分散兵力，借以创造战机，集中兵力迅速予以歼灭。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在中原立稳足之后，在江淮河汉之间广阔战场上，纵横驰骋，威胁、攻击敌之要害，迫使它东西调动，南北应援，趁它在分散运动中，求歼一路或一部。晋察冀野战军针对华北敌军“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战法，实行宽大机动，转战察南、绥东和热西、冀东，调动了敌人，寻得了许多中小规模的运动战。二是攻城打援，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一种重要战法。并且随着条件的逐渐具备和战场形势的发展，这种战法成为主要战法。例如东北冬季攻势和豫东战役，均是此种战法成功的运用。攻城打援的关键是要真攻城方能调动敌军来援。毛泽东指出，豫东战役时，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①

人民解放军力求运动战的同时，抓住有利战机，进行了许多次阵地战，攻克了石家庄、四平、运城、宜川、洛阳、临汾、潍县、兖州、开封、襄樊等战略要点，并在攻克这些城市的作战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攻坚战术。“这些战术是：（1）连续爆破——以炸药对敌人各种防御设施进行连续爆破；（2）坑道作业——秘密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第 566 页。

掘进到敌人碉堡或城墙底下，用炸药炸开，随即发起猛烈突出；（3）对壕作业，亦即近迫作业——对着敌人的坚固工事，挖掘壕沟，荫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冲击；（4）抛射炸药包——利用抛射筒或迫击炮发射炸药包，破坏敌人防御工事；（5）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实行穿插分割等‘尖刀战法’。”^①朱德在1948年8月的一次讲话里说：“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攻克石家庄是第一个试验成功的，然后陆续攻克了洛阳、潍县、开封、兖州等城市。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不会有什么攻不破的城市。”^②

3. 广泛开展铁路交通破击战。

交通线的斗争历来是战争的重要内容。在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和战略进攻初期，人民解放军广泛地开展了铁路交通大破击战。人民解放军尽管没有掌握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没有控制主要的铁路交通线，但其机动能力却很强，这是连蒋介石也承认的。蒋介石说：“现在共军的装备虽远不如国军，但是他行动迅速，一天或一晚之内，能步行一百到一百二十华里；而国军则每天只能步行四十里，两天所走的距离还赶不上他一天。”^③因此，国民党军很注重对交通线的控制，依托铁路、公路快速机动兵力，输送作战物资，也依托交通线来分割解放区的联系。为着剥夺国民党军的这项优势，并为自己创造有利作战条件，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无论是在内线还是在外线，在一段时间内，交通破击战仍然是一项主要作战。先后对北宁路、平承路、平绥路、平汉路、陇海路、津浦路等主要铁路线展开了多次大破击，炸毁桥梁、涵洞，破坏车站设施，拆除铁轨、枕木、路基，使这些交通线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0页。

^② 《朱德选集》第240—241页。

^③ 蒋介石：《快速纵队之特点及其使用方法》，1948年3月10日。

断，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同人民解放军进行徒步竞赛，和调动正规部队去维护交通线与守备重要交通据点。这样就减少了敌人的机动兵力或迫使敌人徒步往来调动，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在运动中打歼灭战的机会。到1948年春夏，人民解放军的交通破击战逐步停止了，或者只作战术性的破击，保护交通线，防止国民党军的破坏，反而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铁路交通线有的已经掌握在或者即将为解放军所控制了。

4. 实行无后方的作战。

大兵团进入国民党统治区，远离自己后方的作战，是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一个特点，是人民解放军采取跃进式作战样式必然出现的。大兵团没有后方作依托，如何作战？如何解决部队补充供给？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均是没有经验的。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实行无后方作战，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执行无后方作战任务的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关于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以及“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域求补充”的指示，结合中原地区、尤其是大别山区的实际情况，比较好的解决了无后方作战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并较快地由无后方变成了有后方作战。他们的经验是：（1）不断加强思想教育，使全体人员充分认识到实行无后方作战是改变战争形势的需要，“是新时代中领土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①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树立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的思想。（2）捕捉战机，多打胜仗，在消灭小股国民党正规军的同时，用大力扫荡“土蒋”，即消灭民团、地主武装、土匪，摧毁反动政权，使人民群众坚信，“这回红军不会再离开鄂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2页。

豫皖了”，因而敢于起来斗争。有人民群众的支援，什么样的困难就都能够战胜。（3）将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地方化，作为组建军区、分区和县区武装的骨干，广占地盘，肃清土匪，建立和保卫人民政权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如此虽然暂时削弱了野战军的力量，但可迅速形成野战军和地方军配合作战，并为野战军尔后高度集中作战和获得更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4）主要向国民党区域求补充，以解决军队的供应。人民解放军实行无后方作战的最大困难，是军队的供应问题，这也是在新区首先要解决的最大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既关系到军队能否坚持斗争，又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稳妥解决。解决的办法主要是：部队进入新区之前应作必要的思想上、物资上的准备；实行征借粮食和派款，并尽可能地实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鉴于过去打土豪分浮财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新区革命政权尚未建立以前，仍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保甲长）及原有的税收机构，采用原有的税制，而逐渐地加以改造和取消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等政策；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立与健全随军的行政机构，全盘负责管理征借粮食，税收，筹款，接管城市，接收和处理缴获物资，这样可以避免由军队直接去筹款出现的混乱现象。总之，克服无后方作战的困难，一是取之于敌，二是取之于民，三是取之于己。

三、实行边打边建，边打边练；既扩大部队数量，又注重质量的建军方针，在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和宝贵经验

（一）为建设 300—500 万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总目标。为实现这个总目标，首要条件是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那么，这支军队究竟需要多大呢？毛泽东曾做过科学的预算。他在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说：为着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将来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军队

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胜利，天下太平，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①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建军五百万”的战略任务。指出，“建军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②

中国共产党为缔造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进行了长期艰苦奋斗，到1948年6月，即解放战争第二年结束时，其总兵力已发展到280万人，长江以南各省的游击队4万余人。建设300万人民解放军的目标已接近实现了。这个伟大成绩，既为尔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又为随之而来的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的重兵集团，夺取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创造了最主要的条件。

建设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一个是兵源，一个是武器装备，再一个是技术兵种的建设。在战争过程中，这三个问题均得到较好的解决或正在解决之中。

关于兵源。动员解放区农民参军，这一度是兵员的主要来源。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两年内，由于解放区彻底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大约160余万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人民解放军的骨干。长期战争的消耗，使解放区扩兵达到或接近饱和点，因此，补充俘虏兵就逐渐成为人民解放军所需大量兵员的主要来源。在战争头两年，共溶化了大约80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里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1948年7月，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全党全军应注意，“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③ 人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党的文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党的文献》，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期。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30页。

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正确地执行俘虏政策，创造了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使俘虏兵中的 80% 左右补入部队。

关于武器装备的补充。人民解放军所需武器弹药，除自己生产一部分外，主要来自战场缴获。“以俘虏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分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条重要的作战原则，也是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经验。战争第二年（1947 年 7 月至 1948 年 6 月）的缴获，连同 1948 年 7 月的缴获，共计各种枪支 59.7030 万枝，各种机枪 5.4481 万挺，各种口径炮 1.3921 万门，掷弹筒及枪榴弹筒 6028 具，火焰喷射器 27 具；各种炮弹 100.3048 万发，各种子弹 9135.8588 万发，手榴弹 97.2240 万枚；坦克 31 辆，电台 1038 部。到战争第二年结束时，全军装备情况是：各种口径炮 9555 门（其中，小炮 1092 门、60 炮 3570 门、轻重迫击炮 3063 门、机关炮 97 门、战防炮 305 门、步兵炮 164 门、高射炮 58 门、山炮 592 门、野炮 207 门、榴弹炮 129 门、其他炮 278 门），火箭筒 507 具，掷弹筒及枪榴弹筒 1.6533 万具，各种枪支 101.9354 万枝，各种机枪 9.1170 万挺^①。生产与缴获，基本保证了部队的需要。

关于建设技术兵种。主要是建设一支强大的炮兵，这是人民解放军军队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说：“没有炮兵，便没有胜利。”朱德说：“炮兵为建军骨干。”^② 1947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指出，“今后军事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9 月 1 日，又强调必须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到 1948 年 8 月，在东北建立了炮兵纵队（辖 3 个野榴炮团、2 个重炮团、2 个高炮团，1 个重迫击炮团、1 个战车团和 1 个工兵团）；在华东建立了特种兵纵队（辖

^① 中央军委一局：《解放战争第三年度末我军兵力武器统计》，1949 年 7 月 20 日。

^② 林彪、高岗、彭真等《关于炮兵建设的命令》，1946 年 7 月 9 日。

2个野榴炮团、1个山炮团、1个工兵团、1个骑兵团和1个坦克大队)；在华北成立了2个炮兵旅(共5个炮兵团)；在西北充实了山炮营，扩建了炮兵教导团；在中原建立了榴弹炮团。人民解放军自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军的防御体系就显得渺小了，战略进攻以来所取的巨大胜利是同炮兵的支援分不开的。人民解放军建设炮兵的经验是：(1)所需装备(火炮、炮弹)除自己制造外，主要靠战场上的缴获，规定一切重要缴获都必须集中上缴，作为建设和加强特种兵的物质力量。(2)所需技术人员，一是自己培养，二是大胆使用俘虏中的技术人员。(3)通过实战锻炼与利用一切时间进行战术技术训练，逐步提高技术、战术水平。

(二) 建设了拥有150万人的野战军

野战军是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建立与扩大野战军，始终是人民解放军建设的中心任务。从中央军委到各战略区的党委、野战军前委，均以最大的注意力来加强野战军的建设，将其列为军队建设的第一位，要求把好兵、好枪、好马拿到前线去，壮大野战军主力。到战争第二年度末，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有49个步兵纵队、2个特种兵纵队，共150余万人，占当时总兵力的53.5%强。组建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4支野战军和华北军区2个野战兵团。各野战军均有自己的主力纵队。有的善长野战，有的善长攻坚，有的善长防御。

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各战略区先后编组了兵团一级临时的或固定的指挥机构。例如，中原野战军的陈谢兵团，陈锡联兵团；华东野战军的陈唐兵团，山东兵团，苏北兵团；东北野战军的第1、第2前方指挥所；华北军区的第1、第2兵团。这样就形成了中央军委——野战军——兵团——纵队比较完善的指挥系统。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都逐步加强，工作效率不断提高。

因为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部队伤亡消耗也大，如何经常保持

野战军的充实和旺盛士气，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除不断补充新的兵员外，各战略区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有的战略区实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地方部队升级，编入野战军序列，但同时又十分重视地方部队的建设，不仅不连根拔掉，而且当老的地方部队升级后及时组建新部队，并积极设法给予新部队作战锻炼的机会，不断以缴获的武器补充他们，使其成为坚持本地区的骨干。有的战略区实行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即动员解放区人民入伍，不经过地方部队逐步升级的阶段，直接编成独立团，经过短期训练后，补充主力或编成新的师。这些，对保证野战军兵员充足，迅速扩大，适应战争需要起了重要作用。

（三）思想政治工作有新发展

人民解放军在不断扩大数量，改善武器装备的同时，还极其重视提高部队的政治质量。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战争第二年是战略转变的一年，即是由自卫战争转为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由在解放区作战转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同时也是人民解放军大发展的一年。由于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特别是俘虏兵大批补充，不可避免的使部队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产生许多不良倾向。为着适应这个转变，适应新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头等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正因为新式整军运动具有如此重要意义，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富有很大创造性，其中最突出的成绩和经验，就是结合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整党运动，普遍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这一运动把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式整军运动首先是一个提高部队阶级觉悟的群众运动。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基本的觉悟是阶级觉悟。通过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富兵同诉、军民同诉，揭露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对比新旧两个社会，新旧两种军队的不同本质，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战争的正义性，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坚定革命意志，高度政治自党的阶级

战士。

新式整军运动又是一个有领导的有秩序的民主运动。这种民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通过发扬民主，自觉进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了思想上、作风上的错误倾向和不良现象，纯洁了组织，改善了部队物质生活，增强了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激发了指战员练兵、打仗的积极性、创造性，获得了一切剥削阶级军队无法获得的巨大力量。

新式整军运动还是一个整顿纪律，提高全体指战员有效地执行中共中央规定的各项政策自觉性的运动。人民解放军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后，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新解放的农村和城市，这是能不能在国民党区域立足并取得胜利的关键。为此，中共中央适时地制定了新区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及其他政策。从总体上讲，人民解放军较好地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但也产生了“左”的或右的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一度给革命事业造成不良影响。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各部队普遍深入地进行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教育，领导机关和干部还检讨了执行政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通过学习，广大指战员深刻地认识到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基本掌握了各项政策的具体内容，因而减少了执行政策过程中的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成为遵守纪律，执行命令、执行政策的模范。

正因为新式整军具有如此重要意义，因此毛泽东指出，“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整军运动，今后必须继续进行。”^①

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及运动结束之后，各部队大力加强了党组织的建设，恢复与健全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和作战任务的完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2页。

后 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是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林登泉部长，曾庆洋、支绍曾副部长领导下编写的。参加该卷撰写的人员是：周宏雁（第1、第5章及本卷结语）；李昌华（第3章第1、第3、第4节，第6章第6、第7节及第7章）；赵焕明（第6章第1、第2、第3、第4、第5节及第8章）；杨学军（第2、第4章及第3章第2节）。个人稿完成后由周宏雁修改形成送审稿。随后，在林登泉部长主持下，邀请莫阳、沈宗洪、姚杰、毕建中、张廷贵等著名军事历史专家进行了评审，同时还广泛征求了其他专家们的意见。根据评审会和专家们所提宝贵意见，周宏雁修改了第1、第2、第4、第5、第6、第8章；李昌华修改了第3、第7章。全书由周宏雁统稿。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广泛吸收了近几年史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尤其是第8章南方游击战争的发展，使用了南方各游击纵队史和边区革命史的资料。在此谨向有关编者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当之处，诚恳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5年5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全国解放战争史

第三卷

主 编 周宏雁
副主编 李昌华
编写人员 周宏雁 李昌华
赵焕明 杨学军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全国解放战争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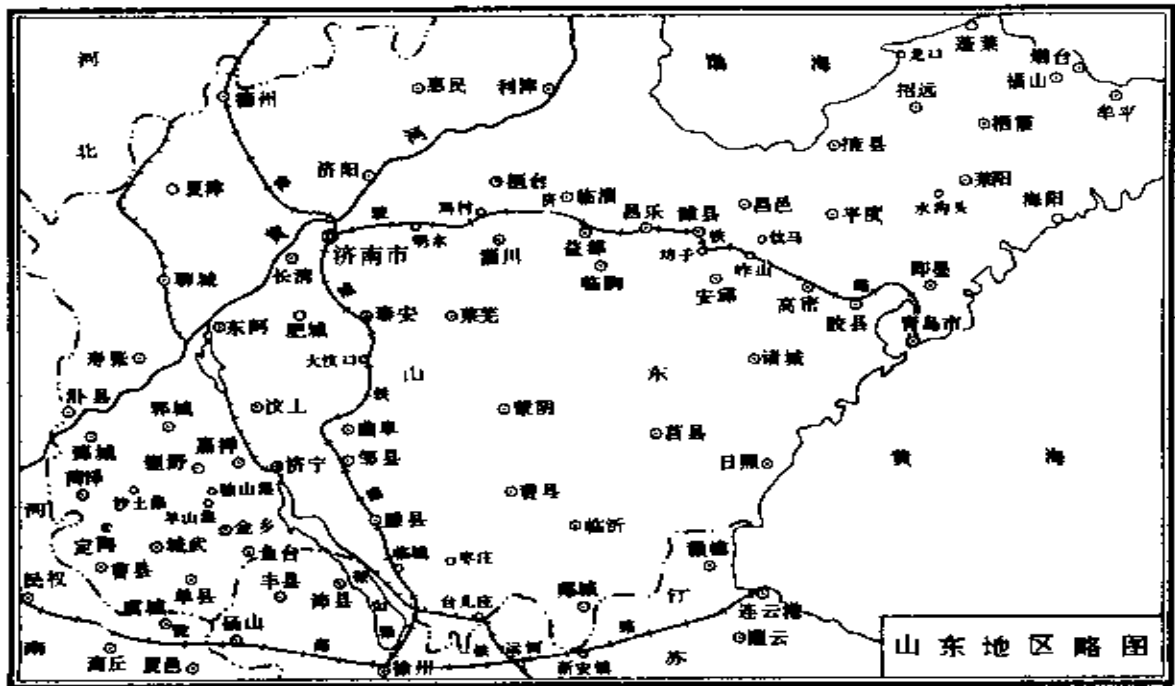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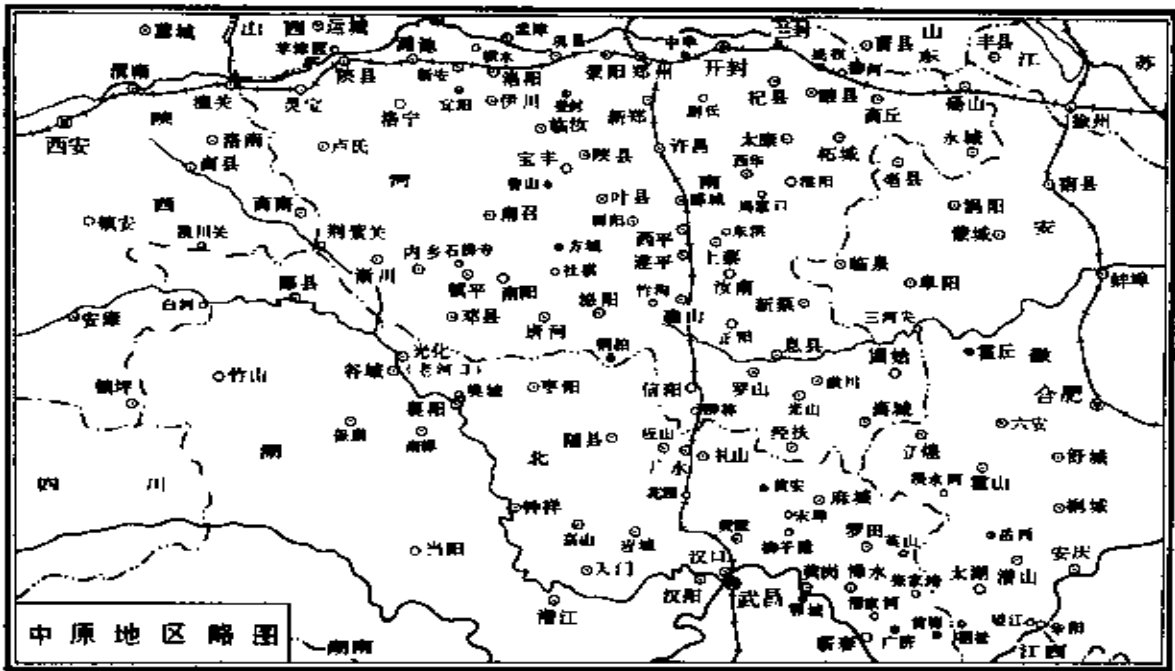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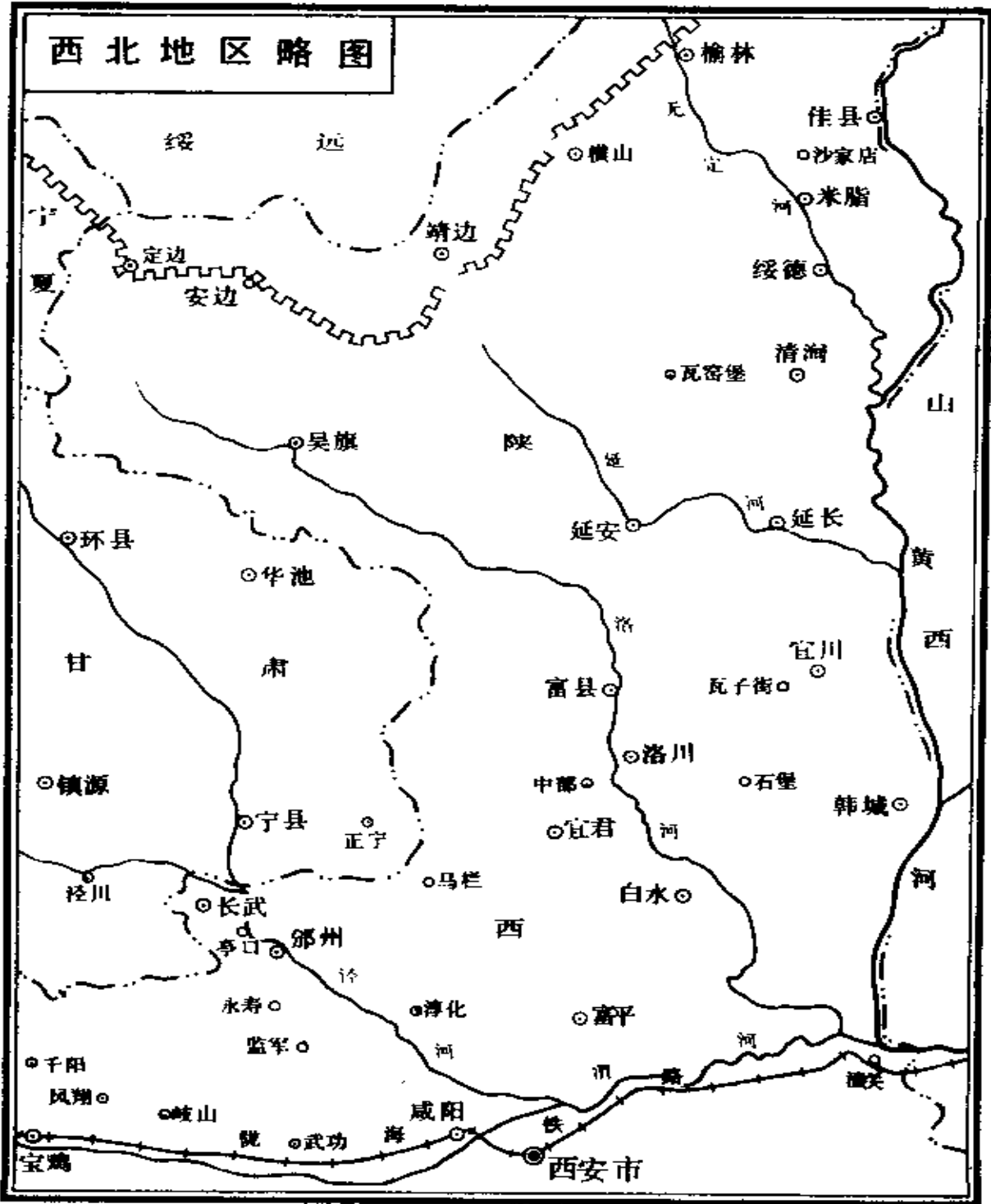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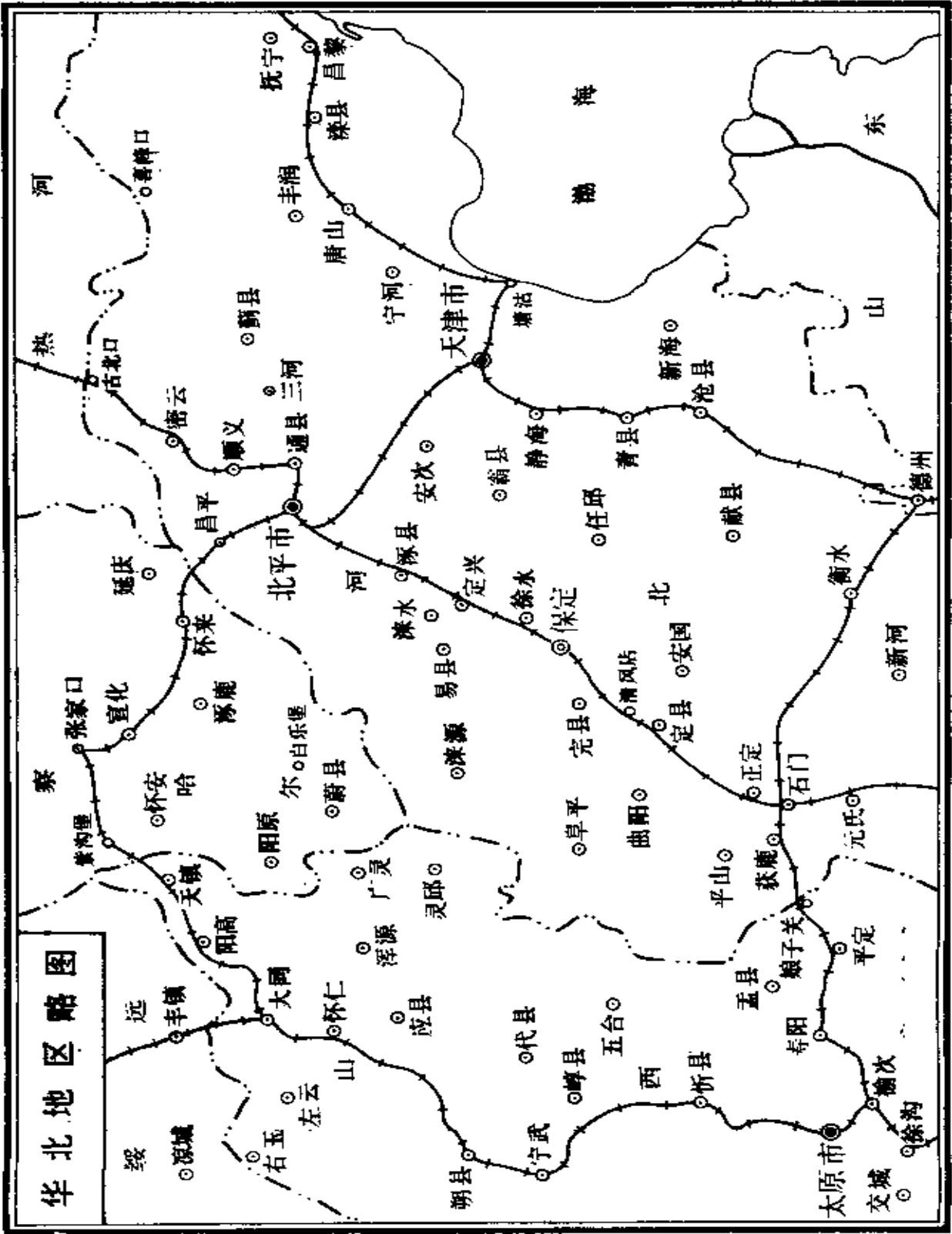
(1947.7-1948.6)



军事科学出版社







ISBN 7-80021-962-3



9 787800 219627 >

(京) 新登字 1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 第三卷/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6. 10

ISBN 7-80021-962-3 (精) ISBN 7-80021-963-1 (平)

I. 中… II. 军… III. 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②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争史 N. E297. 4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91 北京海淀区青龙桥)

北京海淀军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9.875 印张 500 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册 (精装) 3001—5000册 (平装)

定价: 41.00元 (精装) 35.00元 (平装)

ISBN 7-80021-962-3



9 787800 219627 >

(京) 新登字 1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 第三卷/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6. 10

ISBN 7-80021-962-3 (精) ISBN 7-80021-963-1 (平)

I. 中… II. 军… III. 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②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争史 N. E297. 4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91 北京海淀区青龙桥)

北京海淀军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9.875 印张 500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 册 (精装) 3001—5000 册 (平装)

定价: 41.00 元 (精装) 35.00 元 (平装)